

現代經濟叢書

世界經濟結構總體系

上册

王搏今 王漁邨 合譯

中華書局印行

現代經濟叢書

G. D. H. Cole 原著
王搏今 王漁邨 合譯

The Intelligent Man's Guide Through World Chaos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

上册

中華書局印行

譯者序

譯者把這本書介紹到中國來，因為它有兩個特點：

第一，世界在大變動中，我們正經歷着人類歷史上未曾經歷過的大變動。我們若要了解這些變動要知道如何應付這些變動，就必須了解大變動中一切事象的最基礎的經濟機構。這是一本分析現代世界全般經濟機構的唯一的書。

第二，關於經濟的要籍，無論在那一種文字中，都是汗牛充棟；無論要研究其中的任何部門，雖竭畢生之力未易窮究。而經濟學者之着筆，常故意用不易了解的方法出之，使一般讀者望而却步。柯爾此書，遍及經濟上之一切問題，又能深入淺出，使一般讀者對極難了解之問題，能得極明確之觀念；而使經濟上有專攻者，亦能得貫通全體系之效。這是一本分析現代世界全般經濟機構，而以極易了解之方法表達出來的唯一的書。

柯爾是牛津大學的教授，英國工黨的理論家，英國權威經濟學者之一。他的書籍在英國能得到最廣大的讀者，其原因：一，他不避淺語；二，他敢作結論。這兩點都是一般讀者所要

求，而有學者架子的人所不敢爲的。淺語雖可作讀者的橋梁，但一班有學者架子的人，爲保存自己的學問的貴族性，寧願撤去讀者的橋梁。結論容易使一個學者失敗，因爲預言究竟不易語語中的，所以學者們就以其模稜的態度，掩飾其貧薄的見解。有了這兩個特點，所以他的著作在英國能夠得到最廣大的讀者，而這本書尤其是他著作中流行最廣的書。

附錄一篇，爲世界史綱作者威爾士（H. G. Wells）最近與史太林的談話這篇談話曾譯成歐洲各國文字，一九三四年末與一九三五年之間，在歐洲掀起了極大的論爭，幾乎無一刊物不討論這個問題。所以編爲此書之附錄者，欲在結論上，多有幾個意見供讀者參考。柯爾是主張各國有各國自己的社會主義，例如在英國，社會主義的實現應由英國社會主義者負責，英國是不需要革命的。威爾士則贊美美國，他認爲復興運動也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俄國的舊方式已經過時了。而俄國的途徑，則由史太林自己出來說話。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目錄

上冊

譯者序

第一章 世界危機之引論

第一節 貿易衰落

第二節 幾種基本的原理

第三節 生產的問題

第四節 世界經濟學

第二章 世界戰爭之經濟的結果

第一節 世界貿易衰落的前後

第二節 合衆國

目錄

一
一
七
二〇
三五
六九
六九
七八

282629

第三節	歐洲的物價慘落	八八
第四節	英國的危機	一〇〇
第五節	戰債與賠款	一一二
第三章	經濟發展的兩世紀	一一九
第一節	工業主義的形成	一一九
第二節	經濟的帝國主義	一三〇
第三節	大不列顛德意志與遠東	一四二
第四節	機械與人	一五七
第四章	經濟制度之理論與實際	一七一
第一節	經濟學之範圍與目的	一七一
第二節	生產制度	一八二
第三節	生產費與利潤	一九九

第四節	分配問題	二〇〇
第五章	物價與物價水準	二一四
第一節	指數	二一四
第二節	近時的物價變動	二二三
第三節	物價的安定	二四三
第六章	貨幣信用與資本	二六一
第一節	何謂貨幣	二六二
第二節	信用	二七四
第三節	金本位制度	二八八
第四節	英國的銀行制度	三二五
第五節	美國的銀行制度	三四六
第六節	其他國家的銀行制度	三六一

第七節 信用的統制……………三六七

第七章 失業與產業變動……………三二八

第一節 失業的性質……………三八六

第二節 失業的負擔……………四〇三

第三節 貿易循環……………四〇九

第四節 貿易變動的原因……………四二一

第五節 當前的不況……………四三〇

下冊

第八章 對外貿易與財政制度……………四三九

第一節 一般的考察……………四三九

第二節 世界貿易概況……………四六二

第三節 大英帝國……………四八〇

第四節	戰後歐洲的關稅	四八九
第五節	英國的關稅政策	五〇八
第六節	美國的經濟國家主義	五二三
第七節	外國貿易的理論	五三〇
第九章	財政與賦稅	五四六
第一節	國家支出的增加	五四六
第二節	收入的籌措	五六七
第三節	資本與遺產	六〇〇
第十章	經濟組織	六一二
第一節	股票市場	六一二
第二節	合資制度	六二九
第三節	托辣斯與卡特爾	六三六

第四節	股東技術家勞動者	六五二
第五節	集團勞動契約的將來	六六〇
第十一章	俄羅斯的挑戰	六七〇
第一節	計劃開始以前	六七〇
第二節	五年計畫	六八七
第三節	農業的社會化	七〇一
第四節	運輸問題	七一五
第五節	結論	七一九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的替身	七三一
第一節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合作制度	七三一
第二節	何謂社會主義	七四二
第三節	工業的統制	七五二

第四節	馬克斯主義	七五九
第五節	政黨	七六九
第六節	英國的社會主義	七七八
第七節	經濟計畫	七八五
第八節	金融統制	七九六
第十三章	世界的展望	八〇一
第一節	第一個途徑——資本主義的復興	八〇一
第二節	第二個途徑——資本主義的革除	八二七
附錄		
	史太林與威爾士談話記	八四三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

第一章 世界危機之引論

第一節 貿易衰落

本書的撰著，係在一九三二年，這時正是世界大戰告終以後的第十四個年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空前的不況，還在繼續着。因此，本書在後面所待論及之點，就是要看這種不況景象，究在某種限度是發因於戰爭，在某種限度是超於世界經濟組織之根本的缺陷。然在戰爭已經結束了十年度的三四年前，世界各國早已在為其克服戰爭所遺經濟困危的成功而慶祝，且在為其新繁榮時代的曙光而慶祝。此種情勢，以美國為尤顯著。美國那時的繁榮，幾乎及於一切社會階層，由是導來一種在我們今日要視為十分特異的樂觀思想。其實，對世界未來抱着十分樂觀信念的，並不限於美國。歐洲各國的經濟生活中，同樣滲透了這種



傾向，而實際上，歐洲在一九二九年以前的數年中，其生產與貿易的進步，確已駕美國而上之了。然而，過去四年的事實，却到處粉碎了這種輕易的樂觀念頭。世界各國已不復相信她們會導來一種從心所欲的繁榮。她們都認定：繁榮的基礎，要妥為安置，所有國家的與國際的經濟組織的每個部分，都要極審慎周詳的加以配置，務使現在一切國家所遭值的困難，完全得到排除。這樣，以前謂不況能自行恢復的信念，即謂不況在其自然推移上，會產生一種相當的景氣的信念，就全歸消滅了；有了最近數年的經驗，人們對於其一向視為天經地義的，視為毫無疑問的大部分經濟原理與政策，已在重加考查，而無所用其徘徊瞻顧了。

大戰以後的世界經濟史實，有四種不同的現象。第一，是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的短期景氣，那時各國都拚命補救其由戰爭所遺下的荒廢情狀，對於消費者之物品需要，驟然活躍起來；同時，為替換那些由戰爭破壞的，或由忙於戰爭而任其陳舊的生產工具，對於新生產工具的需要，尤為活躍，但這種景氣是短促的，各國人民與各國金融家一有了充分時間考察其周圍情勢，並重新調整其對於困難經濟事實——即由戰時奇異的金融方法，

驅使他們暫時顧慮不到的事實——的政策，這景氣就突然中止。從某種意義上說來，對於各種各樣的物品，對於任何數量的物品，都有需要；無奈這些需要不是有效的，即是說，各國人民儘管需要這許許多多的物品，但可惜他們沒有得到支付那些物品的手段。近時人類的需要，與世界史上任何時代的人類需要，一樣強烈；不過，世界的金融制度解體了，有若干國家幾乎陷於飢餓的境界，同時其他許多國家則擁有不能利用的大規模的生產設備。失業人數迅速增加，全世界物價異常慘落。所以，繼資本價值大事膨脹——因相信景氣繼續而膨脹——的時期，就是資本價值收縮的悲觀的時期。在金融的領域內，有些國家——例如德國、法國——的收縮政策，曾繼續厲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不過，久而久之，各國都先後在金融上乃至工業上，同樣採行了此種政策。在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四年間，世界各國觀察到新的經濟情形，從而發覺了以次的事實，就是世界戰爭的成果，並不是她們曾經期待過的更富有與更進步，而是顯然的貧困與二大些無從解決的問題。

走向恢復之路 然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大多數國家都迅速的爬出了她們自一九

二〇年後所陷落的深坑。在國際聯合會庇護之下，進行一種安定通貨，恢復金本位的大國際運動，這種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對於世界各國之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商品交易，提供一個安定的基礎；同時在生產效率上，亦有極大的改進。新的發明與新的方法極其迅速的採用，在工業上，乃至在農業上，都很快的節省了實在的勞動費用。工業之更集約的機械化，所節省的勞動非常之多；『合理化』（Rationalisation）這個新名辭所以製造出來，無非是要藉這個名辭，表示世界經濟史上的一種新的事象。合理化一語的意義，遠非機械技術改進的涵義所能包括，因為除此以外，它還含有兩種用意：一是對全部工業加以改組，使其成爲協作的單位；一是限制（雖非根絕）諸組合之間的競爭。照一般人的主張，要這樣，並且祇有這樣，新的機械技術的利益，始能由生產標準化（Standardisation）及對特種產物之工廠的專門化（Specialisation）而充分達到，因為前者的目的是要在最大可能範圍內促進製造業，而後者的目的則是要避免那些在當前視爲無限制競爭制度所必有的浪費。在前述的大多數的國家中，德國特別致力於更換其破壞的產業制度，救治其由重大戰

爭損失和割讓國土資源所造成的厄難。然合理化政策之推行，並不限於德國、全歐洲、北美諸國，乃至幾乎整個世界，殆莫不在某種範圍內推行此種政策；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所有擔當世界商務指導責任者的心目中，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充滿了樂觀的氣分的。

誠然，就在這幾年當中，若干國家還遭遇了特別的困難。例如，在大不列顛，一大些失業者，依舊繼續存在，尤其是在那些關於輸出貿易的工業上。此種情形，在恢復金本位制的一九二五年以後更見嚴重。因為我們知道，英國企圖恢復其金鎊到戰前的價值，那在她是一件過於艱鉅的工作。英國的物價是較高的，工資是較高的，實際上英國各社會階層都習慣了獲取較高水準的收入，若把金鎊恢復到其戰前的價值，那她在世界市場上就不能如戰前一樣的從事有效的競爭。世界市場狀況，隨着戰後新興國家工業生產的發展，和較高關稅壁壘的建立（此種情形，以歐洲為尤著），已有劇烈的變動。英國處此情況下，尤當迫而改變其全部生產體制，以期與其一向從事交易諸國之改變過了的經濟情狀相適應。她這時來恢復金鎊的舊價值，那當然是格外艱難了。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這個時期

中，對於戰後困難的克服和未來好況的期待，就世界一切國家看來，差不多祇有英國感到茫無把握。

其實豈僅英國，合衆國之農村購買力的相對低減，農村勞動者之不絕向都市移動，那已算表示出了若干緊迫的困厄的徵候。工業生產無疑是有長足進步的，但製造業上對於勞動的需要，却並沒有相當的擴張。合理化政策所成就的勞動力的節約，以致無法位置那些由農村擠出的剩餘勞動者；而農村購買力的限制，已經威脅到工業製品的增加。然而，一大部分的美國人，這時還不會留意這些危險的徵候。對於工業未來之樂觀與確信，在這個世界是不會維持到許久的，美國當非例外。至美國在過去四年中，因整個世界之深刻不況，而改變其一向最充分的確信，並發生異常的反感，那又是用不着驚異的。

在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當中，儼然像充溢到了整個世界的繁榮之波，首先在美國華爾街（Wall Street）破裂而爲虛幻的浪花了。一九二九年秋季的美國經濟恐慌，加速的蔓延到世界其他國度了。在一九三〇年的最初幾個月中，美國曾試行寇哀先生

（Monsieur Coeur）的方法，以期恢復繁榮。無奈試用這種方法的成果，不旋踵間即使人感到失望。此後數月，美國急速陷入深刻不況中，至同年末期，全世界已為全般的經濟災害所侵襲。本書的主要部分，就是企圖論究這世界經濟大恐慌之直接的原因。但在進行此種論究，並解釋當前世界經濟狀況之事實以前，我們對於若干基本的原理，不能不有一個堅定的認識。

第二節 幾種基本的原理

人類的經濟活動，祇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圖人類幸福的增進。任何不圖增進人類幸福的經濟活動，即可說是失其本旨。不錯，經濟學者往往對此是有過一些不盡相同的解說的。他們曾說，經濟活動的主旨，就在獲得最大的經濟財的生產；不過這種界說，不但要加以修正，且須加以擴充。因為第一，人們也許寧願獲得更多的閑暇，而不欲取得更多的物質財富；第二，物質財富所由創造的條件，我們是萬不可忽視的。人們工作的條件，可以造幸福，也可

以造成不幸。工作本身是善而非惡。沒有工作，人類社會一定非常悽慘。但有些工作——我們毋寧說是有些苦工罷——却顯爲罪過。因此，經濟制度的目的，不應當祇是儘可能的創造財富，而應當是在合理的條件下，即在力求增進幸福，力求減除困憊、厭倦與純然強制的條件下，儘可能的創造財富。

照此推論，我們對於世界經濟制度，就可從三個不同的觀點加以考察。第一我們要問，現存的經濟制度，究在那種程度成就了生產上的富裕？其次，那究竟給了人們怎樣的適當閑暇？第三，那在工作上，乃至在閑暇的利用上，究竟提供了人們多少幸福與快樂？

常有人說，閑暇的需要，惟有起於物質需求得到了充分滿足的時候，這是絕不確實的見解。礦坑與工廠中的過度勞動，那並不是世界經濟進化上的比較原始的狀態，而寧可說是非常發達的工業制度；這種制度就在西歐與北美，亦還祇占有世界史上短短的篇幅。時至今日，最大部分的世界，仍沒有發達到這個程度。並且最大部分的人民，從沒有過着這種生活。在亞洲，在非洲，儘管那些棉織廠，礦坑，乃至歐式工業機關中，通行着長時間的勞動，但

與工業化的泰西諸國強度的與連續的經濟活動比較起來，那是瞠乎其後了。『文明化的』(Civilized) 人們經常指斥野蠻人，指斥東方的異樣文明，無非是說，非其族類的這些人們，沒有過度勞動，實際上，自他們的眼光看來，那些人是懶惰。然而，試退轉去一兩個世代來說吧，用他們同一眼光來看一兩世代以前的西歐北美的文明人，他們定會覺得那是尤其懶惰呢！這些國家既在十九世紀受了工業革命的影響，於是，禁止懶惰，並把勞動義務列入宗教經典，奉為倫理教條。

英美兩國的這種勞作福音，頗得力於清教(Puritanism)的傳播。至這種教義所以左右此兩國的社會制度，則是由於當時積極探求新生產方法之清教的中間階級的興起。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對於奴隸與工匠之懶惰的指責，那差不多是當時最時髦的題目。丹理爾·德福(Daniel Defoe)曾反覆論及此點；亨利·費爾丁(Henry Fielding)曾為此寫一部專書。在亞澤爾·楊格(Arthur Young)的游記(Tours)及在約翰·威斯勒(John Wesley)的日記(Journal)中，隨在可以發現此種論調。而且，監理教(Methodism)對於

新興產業制度的大貢獻，實際不外是在普通商務的活動上，投以神聖的榮光。監理教徒都從事勞作，爲上帝的光榮而勞作。人們通常的娛樂概被禁止，這樣，一宗龐大的能力資源，就解放出來，適川到了產業的生產之上。人們在十九世紀，被訓練成了機械的奴隸，並對這奴隸灌輸了一種使其安心服務的教條。然在今日的世界中，清教已是強弩之末了，閑暇的要求，重新發生於一切工業的國度。大戰後不久，縮減勞動工時的運動，就是這種趨勢之露骨的說明。在十九世紀中，每日工作十時，工作九時，工作八時的運動，曾經過連續不斷的鬭爭。一九一九年在華盛頓之偉大的國際會議，且把每日工作八小時定爲普遍的要求。在實際，這種要求是尙沒有完全達到的。不過，全世界的勞動界，並不僅祇要求達到此種目的，且還企圖由八小時工作之確定，而作進一步改善其生活狀況的基礎，他們會要求工作七小時，工作六小時，乃至作無限的要求；而且，人們生產的權力，在世界各地沒有繼續增加到使其在合理的經濟制度中得到活動的機會以前，他們的要求，是應當沒有止境的。

勞動的負累

然而，僅僅是勞動時間的久暫，決不足以作爲所費勞動量之適當的

估計。我們要注意勞動時間的長度，同時且要注意勞動的強度。機械用在生產上面，有兩種相反的影響。其一是以前由人類體力擔負的工作，現在轉加到機械身上，從而可以減輕勞動的業作——即此而論，這算是機械對於人類最大的貢獻；非人類體力所能控制的力量既可利用，日常工作之體力上的強度，又賴以減輕。但是在另一方面，機械也還有加強勞動的影響；機械日益革新，日益增加速率，服侍機械的人類，就日益辛苦。這種速率的增加，毫無疑的是近年合理化運動的一個顯著特徵。在動力機械成就以前，大部分勞動者所得的報酬都是因工計值。工作的速率增加，勞動報酬亦因而增加，所以這時勞動速率的加大，差不多是勞動者自己的事，與僱主沒有直接的關係。機械發明以後，勞動即開始大大緊張。因為機械所費不貲，僱主為要從速收回其所費的資本以及資本的利潤，乃不能使用機械；從而不能不使服侍機械的勞動者以最大可能的速率從事工作。在此種情形下，工作的步調，取決於個人勞動者少，取決於機械本身者多。加之，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凡在勞動工資騰貴的場所，僱主必然要加速運轉其機械；因為出產最多，而分攤於因時計值的工資乃愈少。

美國的勞動缺乏與勞動價格的高昂，特別成爲造成工業機械化局面之有力動因。當職工組合主義 (Trade Unionism) 發展起來，且形成了一種勢力的時候，它的主要功用之一，就是要限制對於其組合員之勞動的加強。許多僱主所以拚命反對承認職工組合運動，還要算一個主要的理由。新機械方法應用以來，工作的步調，依賴人類應付機械運轉的能力比從前更多，這種相同的情形，到今日還未改變。美國亨利·福特先生 (Mr. Henry Ford) 的方法，就是一個顯然的適例；在福特工廠中的工人，對於其個人的生產，幾乎常常管束不到。他必須停止或發動機械的運轉。如他脫漏了一個步驟，他以一個無關輕重的單位的資格，而活動於其中的一大部門的整個作業，就要失却聯絡。爲要使勞動者忍受這樣的機械工作，僱主不得不付出了『高工資』，但這以時計的高工資，如就勞動者努力的強度計算，也許是不高的。況且，在大多數的場合，這種新工業制度的辛苦，祇有年輕人能够忍受。一到四十歲，工廠僱傭管理者就說太老了。在那些已經施行過相當期間之合理化政策的國度中，較老年的勞動者，就有較多的失業，德國與大不列顛的失業統計，充分說明了此種事實。

真的，關於機械與工廠本身的設計，有許多是從減少勞動者之過度勞動着眼的；有些工廠對於此點已有所成就。近年工業心理學家的主要努力，都是在講求以較好的工廠設計與工作組織，來防止勞動者之流於困倦與工作過度。但說也可怕，大多數的僱主們，都不大留意他們和他們的統計，甚且利用他們這些設計，作爲進一步加速生產的手段。我們要在當前從長考慮此點，勢不能不把那些影響於人類幸福與不幸福的工作條件，一加論究；關於此點，以後還有說到的機會。

對於閑暇的要求 我現在所要論及的，就是在工業發達的諸國度中，對於閑暇漸漸發生了一種要求，這是教育標準提高，教育範圍推廣，以及各種娛樂遊戲漸趨低廉之必然的結果。此種新的閑暇要求，主要的不是由於懶惰，而是由於對非經濟的價值以及對非經濟財與經濟財之不同價值之認識的增加。現在人們對於經濟意義的了解，趕不上維多利亞時代。他們不再相信這種了解是一種美德。這些價值已經改變了；在價值上發生變易的結果，於是在經濟組織與工廠管理的方法上，亦發生一種不可抵抗的改變。人類價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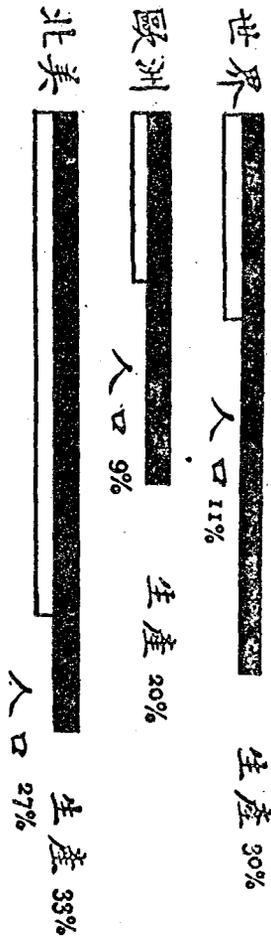
這種改變，究竟對於世界是好還是不好呢？就擴大人類幸福的境遇上說，顯然是好的。不過，就在今日，還有許多人認為那是好的成分少，而不好的成分多，因為在他們設想，那將破壞人們習慣的耐勞的動機。其實，那是包含有新的動機在裏面的，如非有此新的動機，即將成為使人們更進一步馴伏於機械乃至機械所有者的新奴隸制度。我們當前的世界，在發現新動機與課加新奴役的努力之間，存有一種大的鬭爭。資本主義無時不在企圖驅逐人們在一定限度內，縮短勞動時間，加強工作，同時在蘇俄則以極大努力，企圖以新的集團的動機，代替個人的動機，即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所倚畀正股的動機。

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時雖然已經縮減了，人們雖然不像從前那樣爲了經濟的價值，而輕忽非經濟的價值，世界的生產量却並沒有減退。在世界恐慌到來的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的生產，各處都有非常迅速的增加。據國際聯合會所編的統計，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五年之間，世界人口祇增加百分之六，而其食物與原料的生產，却竟增加到百分之十七左右。在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間，世界人口祇增加百分之四，而世界生

產，則又增加百分之十一。單就北美而論，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其人口增加為百分之十九，其生產增加為百分之二六。在歐洲，其人口增加率與生產增加率，幾乎沒有多大的懸隔。前者在同時期所增為百分之二，後者所增亦不過百分之二或三。不過，此時的歐洲，乃因尚未解除其戰後之直接的不良影響。延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之間，情形為之一變。歐洲（蘇俄除外）的人口，這幾年增加到了百分之三，其生產則確增到百分之十九。美國的情況，這時又與歐洲兩樣，其人口與生產的增加率，幾乎相埒，即兩者同為百分之六。所有這些關於生產的數字，僅是指着食物與原料，至關於全世界製造品產額增加的統計，尚不完全；但我們敢於相信一點，就是製造品產額的增加，甚且較之食物原料之增加額為大。因為生產技術上的改進，勢將使一定量之製造品所需耗費的燃料與原料為之遞減，並且幾乎每一生產部門的浪費，也是要逐漸減少的。

食物原料生產增加率與人口增加率之比較

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1913=100)



各國生產的增加 上面這個結論，是由世界主要各國，在同時期中公開刊布的生
產指數而得來的。按照這種指數，在一九二五與一九二九年間，工業生產有了異常的擴展。
波蘭之生產增加率為百分之三八，加拿大為百分之五四，法國為百分之三〇，瑞典為百分

之二七，德國為百分之二二。其增加率在百分之一四的美國，和百分之一三的英國，雖然退落在那些國家的投機發展之後，但其進步顯有可觀。同時，蘇聯之工業生產額，亦達到兩倍以上，不過她那開始的標準額，是很低的。

生產額雖如此增加，但生產上所僱傭的勞動者，却並沒有適應的增加。據大不列顛官方的估計，工業上每個勞動者的生產額，在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九年間，計已增加了百分之二一（見麥克米倫財政工業委員會 *Macmillan Committee on Finance & Industry*）報告，第六附錄，第三表。）美國一九二七年每個勞動者的生產額，約較二十世紀初年增加一半，如其把農場礦山連同工廠通盤計算起來，至少已增加四分之三。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的六年當中，美國勞動者的增加，平均僅及四分之一；並且，就這種增加的進度來說，在同時期之末，還較其開始時為大。由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美國有三十五個工廠經常有出產的記錄，據其標本的調查所示，這時期勞動者每一工時的生產力，約增百分之七四，而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則增加百分之三九（參照最近美國經濟的變動第

四五四頁。

剛在恐慌爆發的前幾年間，世界各種商品的總生產額，以及幾個主要國家內每個勞動者的生產力，誠然都有迅速的增加。但是，就在這個時期的實際生產，究還遠不及其可能的生產呢！當時失業者頗多，人力與自然的生產資源，還是有很多未盡其用。大不列顛職業介紹所所登記的失業工人，總是一百多萬。美國在金融狀況異常良好的一九二九年五月，其失業人數亦達到兩百萬。假如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世界各國都受到一種集中全力保證最高限度生產的命令，不要顧及利潤與損失，不要擔心其大批生產品有無顧客，我想，生產一定有更可驚的增加，那是任何人都不用懷疑的。實際上，蘇俄的情形就是如此；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增加兩倍以上，就在全世界各國還苦於經濟恐慌的一九二九年以後，她仍舊保持着這種迅速增加率，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的蘇俄工業生產總指數，以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為基年來說，那確實達到了百分之三八八。自然哪，在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度，其生產是不能如此迅速的擴張的；但是假定世界上各專門

技業者，不用顧慮市場的狀況，儘可能的集中力量增加生產，在短短的數年之內，西方社會的生產額，將無阻礙的增加一倍，我這樣想，我自信未誇大其辭。

貧困的剷除 爲大大提高人類生活水準，而產生充分物品的技術的問題，在西方的社會裏面，至少可以說是走上了解決的程途。在遠東，在印度，情形是有些不同的；且待後面再說。現在我們不妨把論究的範圍，限於世界那些部分，即那些在最新式的動力機的基礎之上，已經成就了高度的工業體系，或正加速趨於成就高度工業體系的部分。至少在這些國度裏面，關於增加生產的技術問題，是不會使生活水準在迅速提高中受到阻礙的。改進了的技术方法，已經把生產能力，擴展到了遠非市場所能容納的限度；並且，依據各種理由推論起來，如當前的經濟體系，不致因了非技術的原因，而全部崩潰，那在未來的若干年間，各種的發明，將會有更加迅速的進步。在工業與農業的各部門中，各種工程師，化學家，以及從事研究的工人，都會有好的成就——或者說，他們如有一半發展其能力的機會，是當有更多的貢獻的。現在各種的發明，並不僅應用到機械工廠的生產過程中，且還同樣應

用到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上。科學家已經告訴我們，在土壤不同，氣候不同的地帶，我們要用怎樣的選種法，怎樣的栽培法，才能在每畝地面上，產生更多的小麥；並且，要利用怎樣的方法，才能把產麥的地帶，更向北方推廣。在收穫上，現在已有了各種節省勞力的機械。在那些熱帶與非熱帶的國度中，對於預防蟲病與植物病的辦法，已經著有成效。至關於家畜的飼養，與各種動物照料的科學知識的進步，那是一日千里的。工業上燃料與勞動的驚人的節省，電力的偉大發展，製造方法之低廉，在在皆有助於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特感到困難的地方，不是技術家發明進步的方法的失敗，而是農家與僱主，採用新生產技術的遲緩，然其至要的原因，還是由於銷納商品的市場，不能迅速擴張，以致無法盡量利用新的生產資源。

第三節 生產的問題

不幸，生產的問題，並不僅限於技術；那是一個關涉到四面八方的問題，我們主要從科學的技術上去考慮，且當從經營組織上，從金融上，從人類心理學上，

題的

性質，就以次的幾個要點，即可顯示出來：那不外發明生產工具，使最宜於各種特殊業務；不外繼續創設新的改良的工具，以期用較少的物質與勞力，獲得生產的成果，達到新的人類需求。但是，那也還有其他當注意的方面；因為新的機械，定然不僅是用作生產的工具，且是創制出來，由人來使用的工具。因此，使用它們所感到的便利與快適和不快適的程度，在社會的效率上頗關重要。在這一點上，技術的問題，就連繫到心理的問題。

其次，生產的問題，又是一個組織的問題。現代生產工具的使用，並不僅祇關涉到個人，而是要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把一大些人聯合成爲生產的單位。許多的生產過程，必須合組在一個簡單的工廠或作坊裏面；那怕是一大些各別的作坊的業作，在其一件簡單商品的生產上，仍非密切的配合不可。加之，這組織，又非單把生產上連續的各階段妥爲配置以期免除浪費與衝突，並使複雜的工業機械，運行無阻的問題，同時又是以有利條件購買原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分配與推銷加以通盤籌畫的問題。尤其要緊的，則是對於現代任何大工業設備中所使用的聯合勞動力的處理，所有各種的集團，如手工業勞動者，熟練的與

非熟練的勞動者，專門技師，管理者，本部職員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員，都當使其協同勞作，務期每個人員能各盡其長以助成事業的成功。機具儘管再好，組織不善即無從發揮其效率。由技術效率而來的一切低廉生產費的利益，也許可以抵銷買賣上失算所受的損失而有餘；並且，工廠的物質設備雖然優越，如裏面充滿不道德的氣分，不安定的精神，或者充滿散漫而無統率的景象，結局，其實在的生產費將會因之增高起來。

關於買賣上的組織問題，顯然會要密切關聯到生產效率的其他方面——即金融的方面；因為，買賣組織的主要部分，包含在以極有利條件籌集業務上所需的活動資本之中。現今世界各國，成千成萬的企業之倒塌，不是由於技術組織上的缺陷，而是由於上重下輕的資本負擔，由於以不利的條件通融借款，由於在順利時期沒有替不況場合預留相當的貯蓄。有許多在技術組織上非常完善的經營，都握在銀行或其債券保有者的手中，而以金融上的困窘，不易謀其生產事業的順利進行。有些公司的資本是過多的；有些公司的資本是缺少的。對於後者，現在資本市場的組織，否認它們在技術效率上有擴張的機會。

有限的市場

然而這僅是金融問題關聯到生產的一方面。現代工業主持者最重
要的問題，就在找尋他們發賣其工廠出品的市場。無疑的，找尋市場，大半與以減低生產費
的問題有關；因為，能較其競爭者以廉價出售的企業，普通都可為其生產品找得適當的市
場。但那又與整個市場的範圍有關。某一業務由低價賤賣所獲得的大市場，僅取之於其競
爭者，所以一種業務的繁榮，往往是其他業務的損害。自然，貨物的需要，是可以伸縮的，即是
說，那可因價格的削減而擴張。可是各種商品的需要，其伸縮程度，至為不齊；例如小麥的需
要，難得有多少的伸縮。即令某特殊商品的需要大可伸縮，然而仍受一切其他商品之需要
的限制——一方面是一般人手中之總收入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收入所有者用其收入購
買物品之意嚮的限制。近年以來，全世界都在拚命的設法減低其生產成本。每個國家，有時，
各國的每個生產者，都用減低成本減低價格的手段，以期攫得較大的市場。但是一談到削
減成本，往往就是降低工資，或者以合理化的方式減少所僱勞動者，緊縮那分配在工資方
面的總額，其結果不外是限制整個市場的範圍；所以價格儘管低落，而物品的需要却反較

從前縮減。關於此點，在收支方面的生產問題，顯然與世界各社會之收入之分配問題有關。這個問題的解決，包含有兩方面，一是在生產過程上的收入——工資，地租，利息，利潤——之正當分配，一是在各種大規模工商業之金融關係中保有根本聯繫的帶有神祕形式的購買力——銀行信用——之正當調節。

資本的供給 業務之財政組織的又一方面，就是對於資本的準備。一種業務要能進行，要能擴張，須得不斷的獲有新的資本來源，以供其發展；這發展可就兩方面來說：一是增大其生產規模，一是採行可以減低生產費之最新的機械與技術發明。從大體上說來，這種新資本祇有兩個來源：其一是得自業務本身所生的利潤，某些管理得法的現代式的公司，其資本是繼續增加的；因為一個有組織的合股公司，決不會把它賺得的全部利潤概行分配於其股東。它必然要以積貯的方式，截存下一部分——往往是大部分。這宗存款，或者用作活動資本，解除對銀行的債務，或者用以購置新的生產設備。工業上技術變動的速度增加，則在機械方面有一種趨勢，即當未完全毀耗以前已老早陳舊不合用了。由是，把這宗

特別準備金拿來更新機械，遂無異是防止減少那些應當分配於股東之總利潤的一種方法。但股東們往往是反對這種大規模的積貯政策的，他們——尤其是那些小股東——寧願當前收入之加多，而不願其股本之資本價值的增大。例如，當德國推行合理化政策，致工業主持人力求把一部分利潤貯作準備金的時候，他們與股東之間，曾引起關於這個問題之劇烈論爭。可是現代工業上的一般趨勢，却在趁着業務興旺之際增加準備金的積貯，而不採取向社會公開募集新資本的辦法。

因為，一種業務如非由其自己積貯的利潤以爲活動的資金，它要擴張生產，就祇好以股票與公債的方式公開向社會募集新資本。在繁榮的時候，信用卓著，規模廣大的康色恩（concern）要募集股份或公債，那是再容易不過的；但是，就在同時，那怕是頗有成效的小本經營，亦是非常的棘手；而且，由這公開所募集來的資金的大部分，往往都花費在利息與那些幫同推銷債券之代理人的手續費上而了。設當不況的時候，其情形比這更壞；一般人對工業附投資金的意嚮，係取決於一種打算，就是，看這增募資本的業務，是否有賺取利潤

的可能。他們在此種情形下，頗容易計慮到不良的結果；如在利潤難得，而且許多康色恩顯然蒙到損失的場合，那就用任何條件，亦休想募得新資本。一般人這時既不購買普通股票，亦不購買工業公債。他們的錢寧可存入銀行不動；然而也有一些人是與其認購工業股份，不如拿去收買政府或市府的股票或公債。

由此，我們知道，工業上資本的積蓄，無論是由積貯利潤，抑是由募集債券，根本都是繫於其業務能否獲得利潤。一種公司無利潤可圖，自無利潤可以積蓄；一般人不相信某種業務有利潤可圖，他們自不會借出或投出資本。因此，在我們現代工業制度之下，利潤必然要變成推動工業發展的樞軸。而利潤之可能性，又存於吸收工業品之適當市場是否存在。這樣，生產與分配的問題，都密切關聯到企業之利潤問題上面了。

利潤的異說 對於利潤的期待，實在是現代工業制度賴以進行生產商品的主要動機。工業之貨幣的成果——即商品所由出賣的價格——要分拆為若干股，攤派於各種生產要素上面。商品出賣的價格，在生產的過程中，再由工資，利息，地租，利潤表現出來。但在

我們今日的工業制度之下，利潤的支付，與其他工資，利息，地租的支付，對於生產過程有不同的關係。控制生產的人們，必然要把工資，利息與地租，看作生產費去支付，他們是願意把生產費儘量壓縮的；並且，生產過程的目的——在現狀下必有的目的——就是以合算的價格出售商品，使在支付各種費用之後，尚剩下一定的利潤。從此看來，利潤就不僅當作一種利益而出現，且是由生產中出來的利益，它與工資，利息，地租諸形態，尖銳的對立起來。

然而，如我們不把地租，工資，利息，利潤看作是生產過程中的諸成分，而看作是分配於社會上各種成員的收入，這種對立就不存在；因為一切的收入，顯然都是正當的，並且分配於社會各成員的總收入，當力求其豐饒。自然，這總收入在分配上，是可以發生謬誤的。有的人可以分得極多，其他的人會分得極少；收入之不合理的分配，結局會減少一種經濟制度提供人類之滿足或幸福的總量。許多經濟學家所謂一人的金錢愈多其效用遞減（diminishing utility），與所謂一定額的收入分配愈均則其滿足亦愈大的論調，那都是日常的話柄了。但是，沒有分配上的謬誤，能使收入成爲利益；並且，我們現代經濟制度之似是而

非的地方，似乎是不把一切由生產過程所產出的收入形態看作利益——即看作生產過程之目的——而祇把利潤看作利益。這是對於我們現代經濟秩序加以理解與批判的扼要之點，我們以後還要從長討論。

工業心理學 此刻，我們姑且不批評現代的經濟制度，祇把現代經濟制度所由形成之誘因的性質，加以考察。在考察利潤之中，我們已算由前述生產問題的第三方面，移到其第四方面了。這第四方面，就是關於心理的——即生產的刺激與誘因問題，而工業上有效的管理實奠基於此。工業的範圍與經濟組織之複雜性愈大，則動機或誘因的問題，就愈變為重要。在初期經濟學者看來，這似乎是比較簡單的問題；他們創造出「經濟人」(economic man)這個名辭，以為從人類觀點來論究經濟制度之實況的基礎，這本是十分切近真理的一句空話。僱主發動生產力，由於個人利得的動機；被僱者肯在僱主指揮之下服務，亦由於同一動機所驅使，這可說是一種公理。離開了利得關係，似乎沒有討論其動機與誘因的必要。並且，他們還假定，如每個人都是在合理而開明的方式下追求其個人利得，則世

界的經濟組織大半會運轉自如。在這些初期經濟學者的心目中，以及在反映其主見的那些業務者的心目中，都以爲世間的事物通同有一個先天安排好的『自然秩序』（*perfect harmony*），這秩序使得每個人在追求其各自利益的當中，即能提高社會全體的同利益。

這種意見在今日有點說不通，但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期的經濟情況下，却來得非常自然。當時在生產過程中活動的僱主，常專心爲自己的利潤打算；他的努力，他的利得，大半都是他個人的。但在現代工業中情形就不同了。今日要發現一個十足的僱主，那往往是一件難事；那怕一種務業顯然是在某個資本家，或某些資本家的最後指導之下活動，而舊式僱主自己成就的那種功用，却由一大些對業務關係不同的人們分別處理。近代合資業務的利得，決非簡單的籠統的歸於所謂僱主一人之手。就經營的任務來說吧，現在擔任這種任務的，是大規模的企業者資本家，是一部分爲了薪金，一部分或者爲了分得佣金或紅利的業務管理者，還有一大羣祇供給資本不負管理責任的股票所有者與債券所有者。

最後的一種人實不能負何等責任，他們散佈在廣泛的區域，並且在事實上他們對許多不同的業務有同樣的關係，他們又常常改變其投資，他們在業務經營的方略上，不便參加任何活動。他們與公司的關係，單純是由希望或預期獲得利潤或利息的觀點投下其資本；一旦業務大虧特虧，他們才以抗議的形式臨時發表意見。股票或債券所有者，對於他投資的康色恩，除某些特別情形外，大抵希望從所投的資本中取得利潤或利息。有少數特別的康色恩，如像爲田園城市 (garden city) 建築而成立的某些有益於公衆的公司，或爲改良公衆房屋設備而成立的某些組合，誠然有例外的人們，爲社會動機所驅使投下一些的金錢，祇能收回有限的紅利；但是，這類情形畢竟是極其稀罕的，而一般人肯對於近代工業投資，當然是希求利潤或利息。股票與債券的所有者，在當前籌集工業資本的方式下，自然對於業務經營是萬不可少，可是在實際生產的經營上，就他們本身而論，就與金錢分離的人而論，却沒有任何的作用。

企業者 活動的實業家或企業者 (entrepreneur) 所處的地位是完全兩樣的。他

有一種任務；他的職守是在指導工業政策，在決定生產所取的樣式，在計慮是否應當或何時增添新的資本，在估計物品以如何的價格出售；此外，還有許多其他關於業務進行的重要事體。但是在現代世界中，企業者已不像從前那樣，他們與其說是一個技術者，或者說是一個直接的勞動僱主，倒不如說是一個金融家。他往往不僅從事一種特殊業務，或某種特殊生產部門，而同時經營有各種業務與工業的各種部門；並且，對於所有這些，他僅看作是他的真正職業——即企業的建立，公司的推進，金融的組織——的附帶事體。大實業領袖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如麥爾些忒卿（Lord Melchett），或華爾澤·拉澤勞（Walther Rathenau），他們不僅是重要的金融家，且是重要的技術者，所以不算是典型的。典型的企業家，實在祇帶有極少的技術者的意味，也不能說是直接的僱主。即如已故的伊發爾·克洛格（Ivar Kreuger），是以經營火柴業著名的，然在複雜的高級金融活動當中，他的火柴業仍變成一種附帶的事體。他的實際工作，係受技術管理者的支配，金融家大半依着技術管理者的策畫，從事活動。但這些管理者，自然祇能在金融家的指揮之下，才

有所動作，且限於金融關係人所定的大政方針之內。他們自己通常沒有極強烈的金融上的要求，並且他們主要部分的收入，也不是依賴業務的利潤。實際上，業務進行順利，他們可獲得若干金融上的利益，他們的薪金的大小，原可以受到金融業上所得報酬的影響；但他們對於業務的態度，却很少是純粹金錢的。他們在使業務技術化的努力上，多少有一點自由職業的意識與科學的熱忱。金融業者的統治所加於他們的限制，往往使他們感到不滿，所以，如一旦在不同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經濟秩序有所需要，他們是願意效力的，這是他們大大不同於企業家的地方。

工資勞動者 舊時素樸的情態，不獨從直接參與工業過程者原有的動機與誘因上失去了，且也從那些工資勞動者的心理上失去了。資本主義初期的典型的工資勞動者，通是包工工人。生產的件數加多，其所得的工資也加多。他們在金錢上的利益，與舊時僱主的利益相類似，且是同樣的單純。這種包工工作的誘因，在現代工業上，仍殘留下若干；而且為要鼓勵工人增加產額，甚至有人對於這種方法希求其更廣泛的適用。不過，在今日比較

高度機械化的許多工業上，個人包工工作的誘因，逐漸失却了效用。因為，我們見過，機械與發電所一天一天增設起來，所有協同生產的人們全體的工作步調，都是被強制着行動的。日益無從控制其自己所生產之額數的個人，包工工作的事，遂漸行不通。至於在機械經常能夠不受拘束的場合，則又當別論，因為在此種場合的機械，由個人來發動，較之由一羣工人所形成的團體來發動，並不會更速。一種機械可以迫脅個人，却不能迫脅團體。由是，工作的步調，就漸漸不是取決於那種提供於個人勞動者的誘因，而是取決於一大些人之集體的態度。像福特公司（The Ford Company）那種例外的組織，它用因時計值的辦法，使其被僱者因較高工資的刺激，而較其他工廠工人操作更多。但是，這種誘因能收到效果，不僅是工資要高，而且要高過其他各地工人所得的工資。如所有其他僱主與福特所支付的工資相若，他就無法使其被僱者工作逾恆了。

機械一遇到逆境的時候，即常人們懼怕失業而格外努力的時候，就會加強的運轉。但這裏也可遇到不絕增加的反抗；就是在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普通勞動者，他

是沒有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那樣願意工作的。他自以為好好工作了一天，就當在他對於閑暇之擴大的要求的限度內，和他對於工餘充分恢復其疲勞之享受要求的限度內，受到好好的待遇，而且，人們對於資本家的社會秩序愈感到不滿，他們就愈不肯從事過度的勞作。所以，想用機械來加強勞動的努力，便常遇到反抗的。因此，往往有人拿這個理由來反對社會主義，以為社會主義一實行，現在促使人們辛苦勞作的誘因就會完全失掉。但是，我們頂好看以次的事實吧，今日對於工作感到極濃興趣的國度，要算蘇俄，蘇俄五年計畫的施行，是有意識的用新的集團的誘因，推進人們盡量發揮其能力。蘇俄以集團的誘因使個人加倍努力，其發展與現代機械技術的進步一致。

以上我們已從四方面討論生產問題了，這種討論指示了我們一點，就是在西方社會裏面要行更高度的生產，要提高一般的生活水準，其阻礙不是由於技術而是發生於業務組織，金融與人類心理學的範圍。因為兩個主要的問題，尤其是金融的與心理的，以言前者，就是要找到販賣那些有利可圖的商品的手段以促進較高度的生產；以言後者，就是要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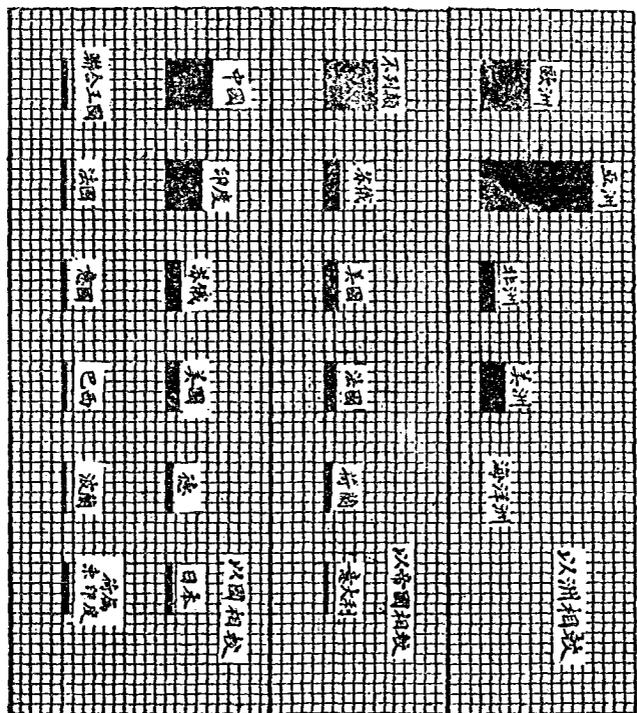
現一種鼓勵各種人類能盡其所長的適當刺激如這兩個問題解決了，生產額固可無限制的擴大，西方社會的生活水準亦可無限制的提高。

然則遠東方面怎樣呢？印度、中國、非洲，乃至其他尚未接觸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大國怎樣呢？在這些國度中，人口遠較發展了的工業國家的人口為多，正在和原始的貧困問題爭鬪，我們已經把經濟過程的目的，看成促進人類幸福——促進最大多數人類的幸福。這個原則，我們不僅要明白的適用到歐美工業先進諸國，且要適用到全世界。

第四節 世界經濟學

我們所考察的，是『世界』混亂與『世界』經濟制度之關係；所以我們首先必須講到一般的世界各國。我們不要忘記：在世界二十萬萬居民當中，祇有四分之一住在歐洲，五分之一住在北美——全美洲的居民，還沒有達到世界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亞洲的人口，超過了世界總數一半以上。單是中國，其人口將近有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十倍。

世界人口圖表



之多，有法國或意大利十倍以上。印度人口爲大不列顛人口的八倍。中國人口數是四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印度是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而美國則僅祇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除中國與印度外，擁有人口最多的，要算蘇俄，其總數是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且還在迅速增加。與這廣大地域相對的講來，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是頗不足觀的。德國的人口數爲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約與日本相當。聯合王國爲四六、〇〇〇、〇〇〇，法國與意大利各爲四一、〇〇〇、〇〇〇，波蘭爲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其餘任何歐洲國家的人口，都沒有超過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之數。把歐洲全居民合起來計算，還沒有達到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若把歐洲部分的蘇俄人口除去，那就祇有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的總數了。

其他國家的人口（以百萬計）

人口數

國別

二三

西班牙

- 二二 安南
- 二一 高麗
- 二〇 奈幾利亞(Nigeria)
- 一八 緬馬尼亞
- 一六 墨西哥
- 一五 捷克, 埃及
- 一四 法屬西非洲, 土耳其, 巨哥斯拉夫
- 一三 菲列濱, 暹羅
- 一一 阿根廷
- 一〇 加拿大, 阿比西尼亞(Ethiopia), 比屬剛果
- 九 波斯, 匈牙利
- 八 比利時, 荷蘭, 南非洲, 哥倫比亞
- 七 奧國, 蘇丹, 阿爾及利亞, 阿富汗, 阿拉伯
- 六 希臘, 保加利亞, 葡萄牙, 瑞典, 秘魯, 尼泊爾, 錫蘭
- 五 法屬摩洛哥, 坦干伊略(Tanganyika), 塞內
- 四 丹麥, 芬蘭, 瑞士, 智利,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古巴

三

愛爾蘭、挪威、伊拉克 (Iraq)、敘利亞、里比利亞、金海岸 (Gold Coast)、堪雅 (Kenya)、烏干達 (Uganda)、安哥拉、摩贊比克 (Mozambique)、羅打烏米地 (Ruanda-Urundi)、海地 (Haiti)、波爾維亞 (Bolivia)、委內瑞辣 (Venezuela)、新羅、馬來亞 (Manaya)

二

立陶宛、新西蘭、塞拉勒窩內 (Sierra Leone)、突尼斯、坎麥隆 (Cameroon)、危地馬拉 (Guatemala)、薩爾瓦多爾 (Salvador)、波托里科 (Porto Rico)、厄瓜多爾 (Ecuador)、烏拉圭 (Uruguay)、蒙古

一

尼亞薩蘭 (Nyassaland)、北羅德西亞 (N. Rhodesia)、南羅德西亞 (S. Rhodesia)、索馬里蘭 (Somaliland)、多米尼加 (Dominica)、牙買加 (Jamaica)、巴拉圭、海峽殖民地、香港、拉特維亞 (Latvia)、阿爾巴尼亞、愛沙尼亞

依一九三〇年初的統計，世界總人口爲一、九九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農民的殘存

我們在西方諸國的人們，自然會有這種想法：以爲我們自己的問題，都比亞洲或非洲的問題重要得多。我們常把我們自己所處的國度看作現代世界，至於亞非諸洲的國家，則祇認爲是市場或原料的供給地，或是帝國主義者對敵與政治糾紛的醞釀地帶。不少的著作家，曾不自知其矛盾地昭告其讀者，說農業人民已漸變爲沒有用處，

並說大規模的經濟組織才是現代整個世界的特徵，至從事此種組織者祇占有世界人民一小部分的事實，他們却不大理會。在關於此種問題的考察上，我們切不要忘記一點，就是，現在大部分的世界，仍舊是在農業狀況——那種狀況不僅我們西方人要回到產業革命以前才能找到，甚且是歐洲大部分國家在產業革命前許多世紀的情形——下生活。真的，在遠東，甚至在非洲，早經在開始工業化。像日本那個國家，且以非常的速率，加緊使其工業方法現代化，西方化，現在已有了非常的成就。但在中國與印度，工業主義却祇觸到經濟生活的邊緣。在印度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居民中，實際從事現在西方式工業與運輸業務的人，還不過二百五十萬，若綜計其國家大工業上的僱傭工人，却僅略多於一百萬之數。中國工業化的程度，甚至還不及印度。非洲除却那些為白種人定居的地帶以外，雖然它為世界市場提供的農產品和原料的生產頗稱發達，但機械的生產技術却是很難見到的。埃及的棉花，奈機立亞的錫，對於西方工業諸國，頗關重要，可是非洲生產的大部分，在實質上仍未脫原始形態。

世界工業化

然而最新的機械不僅可供西方國家的使用，且可供全世界的使用；最近機械技術的發展，在許多工業上自然更易利用非熟練的土人的勞動，至於那些以較簡單生產樣式，作多量生產的工業，更不待言。說工業制度不能在世界落後國家作突飛猛進的發展，說這種國家不能在短短數年之間備有現在先進諸國同樣的生產工具，那都無從在技術上發現理由。不過，其障礙在非技術的方面——尤其是土著資本的缺乏。在十九世紀中，後進諸國之工業圈內的主要生產手段，都是由於外國的投資。繼英國而後，還有其他國家把她們工業上所得的巨額利潤投一大部分於海外；由是，許多國度逐漸工業化，這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又轉過來採行投資海外的方法；這樣，工業化區域自然不絕擴展起來。不過，那些在同世紀後期進行產業革命的國度，與現在的落後國家不同，她們有的是在早前的經濟制度下，其文明、財產與生產技術已經有了相當的進步，像法國與德國就是如此；有的則是地廣人稀，且富有可資開發的自然資源，像美洲合衆國阿根廷與澳洲就是如此。若中國與印度，其人口稠密，其財富貧乏，其工業化的問題遂與前述諸國度完全兩樣。因爲

像印度那樣人口稠密的國家，要蓄積資本，要使用資本來從其貧乏的資源發展工業，那是異常困難的。日本人口較少，她在工業上的成就，不是仰賴外資，而是由於其封建財富的轉用。至人口比較更少，而資源特富的俄國，她是早待開發的；迨乎今日，她在工業上的進步已使西方諸國爲之驚異不置。但是，俄國之有此成就，還是由於她對當前的物資有了重大犧牲，由於她以集體的信念與野心，喚起人民的努力。而且，俄國如不施行類似狄克推多的統制，即是，她如沒有一個能使其命令澈底貫注到廣大農村的中央政府，其成功的希望亦是很少的。然而，像中國，像印度，她們即使被統治在共產主義者的狄克推多之下，她們對於工業的發展依舊要遠較俄國爲困難，因爲她們的人口稠密了，她們蓄積生產資本的活動，尤其太不容易。

各國人民之職業的百分比

國度	年度	農業與漁業	礦業	工業	貿易	運送	其他	軍隊	公務	自由職業	家務	其他
美國	一九〇〇	二六·三	二·六	三〇·八	一〇·二	〇·四	七·〇	〇·五	一·三	五·二	八·二	七·五
英國	一九二二	六·八	七·五	三九·七	一三·九	一·九	五·一	六·五	二·六	四·四	一·八	二·四
法國	一九二二	四·五	一·五	二九·四	一〇·四	〇·三	五·九	二·〇	二·六	三·五	三·九	—
德國	一九二五	三·五	三·二	三六·一	一七·七	〇·五	四·二	〇·四	二·〇	四·一	四·四	〇·九
意國	一九二二	五·一	〇·六	二四·〇	六·四	四·〇	—	二·〇	一·五	三·〇	二·四	—
波蘭	一九二二	五·九	〇·七	八·七	三·八	—	一·八	二·六	〇·八	一·六	二·一	二·一
捷克	一九二二	四·三	二·七	二〇·二	六·九	—	四·〇	二·三	一·九	二·八	四·三	一·六
蘇聯	一九二六	六·七	—	六·一	一·四	一·六	—	—	二·三	—	—	一·九
瑞典	一九二〇	四·七	〇·八	三〇·二	八·四	一·五	四·四	〇·七	一·二	三·八	七·〇	一·四
比國	一九二〇	一九·一	六·六	三九·九	一〇·七	〇·八	六·八	二·二	三·三	三·六	五·〇	二·〇
丹麥	一九二二	三〇·八	—	二七·〇	二〇·八	一·三	四·六	〇·七	〇·八	五·五	二·三	一·二
荷蘭	一九二〇	三三·六	一·七	三〇·二	二二·七	三·三	六·三	〇·六	一·一	六·五	八·一	一·〇

加拿大	一五二	壹〇	一六	六九	一三〇	〇七	七一	〇二	二六	六〇	六七	—
印度	一五二	五三	〇三	二二	五九	〇二	一二	〇三	一一	一五	一八	四一
澳洲	一五二	三九	二九	三二	一五三	二一	六九	〇五	一七	六五	九〇	一一
新西蘭	一五二	二七	一六	二七	一五五	三二	六七	〇三	一〇	八四	八七	—

西方比較有充裕資本的各國投資者，當他們覺得能够賺到的利潤有充分保障時，他們就打算投資到中國、印度或非洲，這是事實；先進諸國之工業建設的指導者，為要對其商品找得擴大的市場，他們極願意促進世界落後國家的工業化，這也是事實。沒有這些條件存在，無論中國也好，印度也好，都不會有她們現在的鐵道系統與設備和現代機械的工廠。低廉的勞動，已經在某種限度，把西方的資本吸收到比較落後的國家了。但是，就技術上的便利機會來說，工業化的步調實在很遲緩。為使西方資本家樂於投下大規模的資本，市場必須擴張，但一大部分居民沒有從他們的原始貧困狀況跳出來，市場又無法擴張，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循環，這個循環所加於比較落後國家的桎梏，祇有蘇聯在國家整個計畫之

下，同時擴展生產與消費，才能予以嚴重的摧毀。

世界協調的前途

如人們真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認識，如國際聯合會真是一個國際的有力機關，那末，一切國家對於促進整個世界的進步，對於亞洲非洲人民之永劫的窮困的救濟，就會發揮和衷共濟的精神。但是在實際上，各國的猜忌，帝國主義者的對敵，與工業制度的競爭，已使此路不通；同時東方社會對於帝國主義者深入勢力的抗拒，又造出了阻止西方資本流向海外之不穩定的政治條件。加之在世界物價不絕變動的狀況下，借貸是危險不過的，一筆債務的償付，以商品換算起來，也許要變成一個可怕的高率的重負。比如銀價的慘落，不但大大的縮減了中國的購買力，並還大大的增加了中國要以黃金或外國通貨償付的債務；此外，原型商品價格的低落，已使一切借款國家的債務負擔，較其所借借款的實在價值，簡直大到不成比例。通貨的穩定，借者貸者間之條件的均等，那都有關於經濟的國際主義的發展。如我們當前種種努力的目的，不在獵取我們特殊國家之部分的利益，而在增進世界的總財富，那我們拚命努力使印度與中國工業化，結局一定能叫世

界財富有極大的增加。這一來，一切先進國家所改造的工業，就能在未來的長的期間內盡量發揮其效用。但是經濟的帝國主義，祇努力獨占殖民地，以殖民地為其市場，為其原料供給地；而比較後進國家的人民，又為其不平待遇而表示怨憤，由是海外投資不得穩定，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上的地面，不能迅速增加其財富，以致使占有世界二分之一以上的人民，繼續陷入於完全不必要的原始貧困狀況之中。

自然，技術上的生產力之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那並不是為了什麼新的原因。世界自始至終就不曾在技術方面有讓它充分發揮其經濟利益的機會。在每個階段，世界都為此而阻止其進步的前程，究其原因，一部分係由於具有國境的政治單位的強制劃分，這種劃分，完全沒有顧及經濟的分工；另一部分，則係對於科學進步所提供的技術功能沒有充分能力加以組織，對於要適應不絕擴展之生產力的分配狀況沒有充分能力加以安排。自現代經濟制度開始以來，沒有一個時期不存在有阻礙貿易自由的人為關稅壁壘與政治的障礙。某種地域之資本的過度缺乏，與其他地域生產資本財之剩餘能力密切關聯；政府與

實業家們，縱令對於經濟問題不是怎樣的鈍感與短視，但他們所孜孜計慮的，不是要繁榮世界或世界的工業，而是要繁榮他們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工業。十九世紀提供於人類，讓人類自由處置的一切技術，如能充分應用起來，那世界一大部分的原始貧困的景象就不但不難解除，也許老早就解除過了。但是，當我這樣說，並提示這原始貧困問題在今日指顧間可以得到解決的時候，對於這種希望的限界性與幻想性質，我是意識到了的。以今日這樣廣博的生產的資源，竟久而久之的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實在使人難於相信；但我們必須記着，像這種的解決，並不僅是要依存於可資利用的技術力量，且還要依存於能利用這技術力量之經濟的與政治的秩序之存在。試一環覽宇內，任誰都不能相信貧困的問題，會在當前經濟制度的構造中得到解決。因為不論在什麼地方，這種制度似乎已在受着一種愚弄其充分技術力量之崩潰的威脅。

我們的出路 擺在我們前面的，實在有三個可能的前途：一是現在經濟秩序的改造。這種改造要基於以次的基礎，即允許技術上之生產力的充分利用與加速的發展；一是

能做成同一結果的新而非非常異樣的經濟秩序的建立；一是當前秩序趨於混亂的瓦解。如這第三個可能的前途實現——任誰都不能保證其不實現——那世界的景象就實在是黯淡不堪了。因此我們必須下大決心，在最精密最客觀的事勢考察當中去選定其他兩個可能的途徑：我們是要在一個較寬廣，較包容，並且必需是較集體的基礎之上嘗試改造當前制度——即創造一個以世界為經緯的新的世界資本主義以代替今日部分的，相互衝突的資本主義呢？抑是大發願力，認定這在某種經濟階段有其必要的資本主義，雖然已經成就了它的歷史任務，但再也不適於二十世紀由人類所支配的技術上之生產力的利用與發展呢？這是在當前危機中每個有識者所必須明加抉擇的重要問題；本書的要旨，就是想對於當前之事實與趨勢，儘可能的加以非感情的客觀的分析，以期對於這些有識者個人的判斷，提供一點必要的基礎知識。

從外表上看來，世界資本主義的情勢，已再無從保證。過去數年的危機，本質的表示了現代的經濟制度，不能適應其急速發展起來的技術上的生產力。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生產

力儘管日益迅速增進，而利用生產力的可能性則日益減少。有相對自給自足能力的合衆國，對世界市場有精密特殊生產系統的大不列顛，都無法阻止其崩潰與衰落的大勢。這事實，歸根結底的顯示了以次的見地：就是世界必須組成一個簡單的經濟體系，並且在世界各地陷於不況與危機時，任何國家都不能獨特的享受繁榮。但是，世界即使是一個經濟體系，當其活動起來也決不會和衷共濟的。由危機所招來的反動，就是各處地域主義與國家主義趨勢的高揚，就是每個國家，每個集團，都企圖躲在人爲的防禦線裏面，以期迴避世界危機的侵襲。資本主義不圖建立一個適應二十世紀需要的世界經濟體系，却已加速的摧毀其曾經著有功效的國際主義。也許有人說，這種趨勢是在十分變態境況下求得安全的一種自然事態；是使資本主義改造成爲一個世界經濟協作體系的真正嘗試的前奏曲。但是，我們在何處能發現這種改造嘗試的徵象呢？各國政治家與實業界領袖們不是連想都沒有想到這個新的協作的世界秩序上來麼？在當前，我們也無須說資本主義不能或不曾改造，但是我們祇要把刻下的情勢略加考察，就必然無可避免的要得到以次的結論：即這

種改造工作不但不會開始，就連那些在政治經濟上居於領導地位的一大部分人物的心目中根本就不會把這當作一回重要的事。

其實我們這大多數的人，都是極端憎惡現勢下之真理的發現的，人類心理上有一種對於定局的自然要求。這種要求，總把世界看作是固定的、不變的；對於某種問題所成就的解決，總把它看作是最後的解決，以爲一度有效，就註定永遠有效的。在十九世紀時代，經濟制度的大體輪廓，大多數人都看爲是固定的、不變的，除了占少數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及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者而外，誰都難得對於經濟秩序之根本基礎發生疑問。

回顧一下過去罷。但是，到了現在，誰肯對於十九世紀的狀況作一非感情的回顧，他就一定要認定這諸般狀況有許多方面絕對是出於人爲的。那些狀況是由決計不能持久的特殊環境產生出來。所謂產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由此導來了一種植基於動力機基礎之上的工業制度——亦不過是一種歷史事件，這事件之發生於大不列顛，是當着世界其他各地尙不能利用十八世紀乃至十九世紀初葉之種種發明所

成就的新生產力的時候。因此，大不列顛乃得在工業生產效率上長期占着優於其競爭者之領導地位。她很自然的利用了一切良好機會，使其經濟達到極其專門化的限度，她因着新機械技術的使用，幾乎能生產出較他國低廉得多的各種商品。這種種優勢，使她獲得世界最好的市場；同時，因為勞動階級的權勢，這時尙屬微小，即尙不够使其生活水準抬高到與生產能力擴張相稱的限度，於是她就獲有了異常高率的利潤。由新工業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龐大剩餘，主要是可用以從事資本的蓄積的。大不列顛於新生產力獨占之外，又益以龐大的資本剩餘，無怪其經濟發展的權力，不僅及於本國，且及於大部分的世界。處在這一種情形下的不列顛的工業家，自然要選擇那些能由新機械技術給予以比較最大利益的商品，以爲其生產活動的範圍。她開始着手棉業生產，並發展織物貿易——換言之，就是從事消費者所消費的物品的生產交易——但以後，她遂由供給世界以織物，過渡到供給世界以運輸與生產的工具。她建立了世界的鐵道，設置了世界的船廠，擔任了世界各地之公務事業的準備，並且在許久以前，她已販賣了那些用以模仿其生產方法之機械於世界各

國。主要由於大不列顛之向外傳佈其新工業主義，動力生產的技術乃傳佈於其他國家，自然，合衆國基於其本國之發明，開始曾在某種限度進行其獨特發展程序的事實，那是無庸否認的。蒸汽機關與火車頭，鼓風爐與鋼製機械，都是英美兩國按着多少不一致的程序，而分途發明出來。但是，經過許久許久，合衆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當她由發展北美農業而進於工業化，有許久許久，還是以國內市場爲其工業活動之適當出路。在十九世紀時代，美國人實在不需要輸出機械與其他的資本財，因爲這些在國內都有莫大的需要。大不列顛把剩餘資本投向海外，但美國不然；美國地大物博，人口迅速增加，她自己所能籌集的資本，還不够供應其對於資本的需求。直至一九一四年，美國還在繼續由海外輸入資本；一個資本輸入者的國家，她在世界經濟發展上，是不能立於主導地位的。

不列顛的優勢 由是，在十九世紀當中，大不列顛就變成一個優越的經濟特殊化的典型，她一天一天趨向於依賴外國，帝國要仰給於外國的，不僅是必要的食品，還有其日益發展的工業所需的原料。她在對外貿易的少數製品的生產上所進行的分業，比較任何

其他國家所已經成就了的要窄狹得多。加之她的極端的分業活動，促起了其他各地分業的反響；因為由不列顛需要食品與原料所形成的廣大而迅速擴張的市場，不期然而然的使新大陸加拿大阿根庭諸國在農產品與原料的生產上，成就了不列顛在製造業上那樣專門化的分業。這樣，世界相互依存的大體系，遂主要基於英國在製造品上之專門化而開始建立起來，並且在這個相互依存的大體系的幕後，隱伏有十九世紀的自由貿易的哲學，這種哲學的全體，照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百五十年前所指示的，不外就是國際的分工。但是當着新大陸諸國在初期商品生產中發展到特殊化，以為大不列顛之工業特殊化作補充的時候，產業革命竟取一個不同的路徑在舊大陸其他諸國擴展起來。這些國家的，特別是德國的產業革命的成就，並不是要建立一個經濟體系以為英國經濟體系的補充，而寧可說是為了要與英國的製造業者相對抗。不過，在開始的時候她們是不希望在自由貿易狀況下成就此舉的。因為，大不列顛在工業的效率上，有許久許久是居於主導地位，她的充裕資本，及她的大批的技術工匠與手工業者，究不是其他國家所能與之抗衡的。

因此新興工業主義在德國，在歐洲其他國家，乃至在美國（她還有其他多少相異的原由）的發展，類皆採用了保護關稅政策。在關稅的壁壘後面，那些業經採行了新生產技術的較舊的國家，遂開始建立了直接與不列顛體系相對立的製造體系。在某一時期內，這些新國家要嚴重的排斥輸出者大不列顛，她們對於其國內市場的供給，自非常忙碌；因此，不列顛的製造業者，遂得為應付此逐漸受到排斥的局面，用其資本在其他地域促進需要，並為此新的需要，而計畫新方式的生產。不過，她對新生產技術的獨占，漸漸由新國家的工人與技術家之習得工業主義方法和接受工廠制度訓練而歸於喪失。直至一九一四年，這種競爭勢力儘管日益擴增起來，而不列顛的輸出還在繼續擴展，這原因就是由於新市場的開拓，由於其得之於新市場者比較其失之於舊市場者還多。可是她在一九一四年的情形，已經頗不安定，競爭的壓迫，日益加強起來，尤其是對於比較後進國家的市場的搶奪，和對於新發現之原料供給源泉的獨占。

不列顛不能獨占了

大不列顛在某一個時期中所處的願境，自其在生產效率上

所占優勢，因新機械技術進步而漸形減縮以後，那種順境乃大大發生動搖。新機械自然然的要爲一切國家之購買者所利用。因此，其他國家之技術與手工技能，乃迅速提高其程度；並且，新機械本身，日復一日的變成了愚呆的證據（Goof-Tool）。廣大範圍之工作技術，由發明的改進而移到機械去擔當了；這一來，大不列顛工作上之特殊技巧的長處又因之逐漸縮減下來。不列顛勞動者的生活水準，較之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爲高。把此種生活水準與不列顛的生產力相對的說來，雖是非常之低，但對於不列顛僱主們與那些使用低廉勞動、使用新式機械的外國相競爭，却仍不免是一種妨礙。

簡言之，在一九一四年前好久，大不列顛就已經喪失了她的獨占優勢，並且在她所供給世界的一切製造品當中，她已不復能自由選擇，她漸漸受迫而與其對敵者作減價的競爭；其他國家企圖分割世界的熱望逐漸增加，她以前所占有的比較有利可圖的領域就逐漸縮小。從不列顛的眼光看來，要對當前情勢施行救濟，那顯然祇有其他國家依照其生產力的增加而抬高工資；就從世界立場來說，這也是正當的解決途徑，但外國的製造業者

却不是從這方面來考察；他們企圖獲得較大分額的貿易，低廉工資，正是他們在從事此種擴張貿易競爭中的重要武器。他們如此競爭的結果，遂反過來影響到不列顛的工資水準。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大不列顛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即不絕增進的真實工資，至是已決然的中止了上騰的傾向。即令一九一四年不曾爆發世界戰爭吧，當時依然存在着種種暴力足以嚴重威脅十九世紀工業秩序上的既成的調和關係而使之瓦解。這也許是世界戰爭必然要爆發的理由罷。

自由貿易的福音

當不列顛的製造工業幾乎獨占有世界市場的時候，英國的經濟學者、政治家、實業家們，正爲其成功而躊躇滿志，對於植基於國際分工的自由貿易，他們不但堅決主張是具有特殊環境的大不列顛的適當政策，且是全世界在一切時代都應採行的適當政策。在布萊脫 (Bright) 與柯布登 (Cobden) 以及其他師承曼徹斯特派 (Manchester School) 見解的理論經濟學者看來，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之普行於世界，那祇是時間問題。真的，在某一個時期，英國經濟方法的大成功確會使自由貿易在他國獲

有非常的威勢，許多外國的經濟學者與政治家們都爲此政策而傾倒。法國巴師夏 (Bas-
sac) 對於自由貿易學說的竭力宣揚，與柯布登在英國沒有兩樣。在十九世有一個短短時
期中，一切西歐的國家，甚至在美洲合衆國，似乎都傾向自由貿易；這時，一向具有優勢的保
護主義者的意見暫歸銷沉了。但是英國經濟學的這種傳道式的成功，祇是曇花一現；並且
在老早以前，其他國家重又回頭來服膺腓特烈·李斯特 (Frederich List) 的說教，且極
力在關稅壁壘下發展其幼稚工業 (infant industry) 她們相信，她們惟有習得了英國
在工業上佔有優勢的動力生產的技術，她們方能希望繼續爲現代世界狀況下的強國。在
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與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關稅的壁壘迅速在世界各國增高起來。就
是那些專門輸出原料與食品的國家，亦渴望以關稅爲武器來建立自己的製造工業。這一
切的勢趨，都會嚴重的加大世界經濟秩序的不安。所有採行保護政策的國度所建立的工
業，幾乎都是英國所專門從事的工業。於是，在某種製造工業的緊要部門，特別是在生產資
本財的工業上，其生產的能力乃自然而然的要增加起來，因爲在每個國家看來，要在現世

界經濟秩序當中扮演一個獨立的重要的角色，就必得發展這種形態的生產以爲其工業制度的基礎。這樣，那種遠於事實的普遍自由貿易，遂日復一日的不成爲問題了。那是一種夢想，一種已經完全失却其世界經濟基礎的夢想。自然，這不一定是說大不列顛應當修正其自己的自由貿易態度的時期已經到來；依着她那特殊的環境，就在保護政策風靡一時的世界，自由貿易也許還可繼續予以利益。不過普遍自由貿易像夢一般的消逝了，那就無異是說大多數國家已經決定在某種集體的指導下發展她們自己的經濟體系。其實，保護關稅是頗不科學的，或者說那祇是打算發展那些工業，即一國有發展其生產效率的最好機會的工業，但是，一種保護政策——它具有發展某種工業，而阻害其他工業的權力——的思想，顯然就是走向國家經濟計劃的思想的初步。世界保護主義的復活，那就等於說是一種內在的經濟調和觀念與自由放任主義的決然放棄，和一種與此正相反對的見解的採取，後面這種見解，就是認定經濟活動的計畫與指導都應放在某種有意識的統制形式之下。

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

但是，如果保護關稅被視為經濟統制唯一的或主要的工具，那世界的經濟勢力就毫無疑義的要日益轉落到對抗的國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集團的控制之下。因為保護主義如其說是對於國家計畫思想的肯定，那就是對於國際計畫思想的直接否定。那在一國之內，係以統一的經濟發展的觀念，代替那在十九世紀為英國人所熱忱愛護的無限制的個人競爭的觀念。不過照此下去，勢必要視每個國家為一絕對的經濟單位，其結果將導來一種純粹各顧各的政策，並使每個國家永久與其一切隣國作經濟的鬭爭。因此普遍自由貿易思想的成爲過去，那就是說世界不但要想到放任主義的將來，且要想到計畫思想的將來；但也就是說，計畫如不能使其行之於一國者行之於國際間，則國家主義的衝突，就必然要把世界導向經濟毀滅之途。

無限制的經濟國家主義，也許在某些國家有實現的可能，但這種政策的實現，對於其他大多數國家，對於世界全體，必定是一種損害。而受害最烈的還是採行此種政策的，即企圖在保護甚或禁制關稅掩護下完成一大自給經濟體系的小國家。因為現代世界的許多

工業，實質上都是那種性質的工業，即它爲廣泛市場所從事的製造，乃完成現代大規模生產經濟所不可缺少的。顯然的，一個小國如爲其本國市場而在這些工業上發展大規模的生產，或爲提供其本國人民以合理的生活水準而作廣泛的充分有效的生產，那又是另一問題。從世界經濟效率的觀點看來，現在東歐與南歐之錯綜複雜的關稅障礙，實在是荒謬不過的。像這些祇擁有幾百萬人口的國家，絕對不能完成一大包羅的經濟體系，而不大犧牲其生產力。至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度，其情形也許頗不相同；這種國家對於自給自足的政策，雖然再徹底推行起來，亦不致招到其他歐洲小國那樣的損害，但其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努力，終必受到無可超越的限界。那怕就是美國罷，她在原料甚至在食品的供給上亦尚不能自給自足，且還須向海外投售大宗的貨品。特別是，當一個國家一旦在金融上變成了其他國家的債權者，要輸出資本財，她就應當打算同意以貨還債的辦法，接受債務國所能夠提供的商品；世界大戰的結果，美國變成了主要的債權國，雖然美國人民迄今尚未充分認識事勢的推移，但有一點是知道的，就是經濟的國家主義政策，就在美洲大陸亦破

產了。

現代的世界，與普遍自由貿易不能實行的情形是一個對照。訴之於普遍保護主義的結果，無非是生活水準之不必要的降低，貨物由一國到他國之自然移動的通路的破毀。無論是普遍的自由貿易，抑是普遍的保護主義，在現代世界都行不通。當前有一個壓倒的趨勢，就是在世界經濟組織上加以努力。各國都當在相互調和利益，而在相互保護獨特別益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有組織的世界體系，並且這個體系，對於不斷變動的環境要有彈性，要能迅速的適應。保護主義最壞的特徵之一，即是它的硬性，因為每種保護政策的效果，總會對受保護的產業造出多大的專利，這種利益往往使經濟制度硬化，使其不能適應那些變動更速的生產技術條件。新的經濟秩序，是資本家的抑不是資本家的，姑且不管；但在此刻敢於相信的，就是這新的秩序必得是世界的秩序，並且各國想藉國家主義的排外政策，以期躲避當前經濟暴風雨的分途的努力，其結果是定然要趨於混亂與崩潰的。

一種滑稽的狀況 把我們所說的總括一下吧。無論那位有識人士，祇要他對過去

數年的世界下過觀察，那情形定是滑稽不過的。世界生產力在過去二十年中實有驚人的發展——那種發展較之有史以來（產業革命時期亦不除外）所成就的猶大得多。在製造業固不必說，就在農業上其發展亦是驚人的。由是世界所能生產，所能交換的物品與勤務，都有極大量的增加。不論在那個地方，這種生產力上的改進皆超越了人口的增殖。並且人類各種肉體的精神的勞動之生產的價值，殆莫不有真實的增長。像這些生產能力上的進步，顯然是有利益的。那應當能够大大提高世界的生計水準使人們享受更多的閒暇；應當能我們解決世界一切國家——遠東諸國在內——的貧困問題；應當能我們少受社會經濟問題的壓迫，多把精力用在那些比較不『陰慘』的生活技術的培植上。總之，這個世界應當更富有，更健旺，更幸福，更智慧，並且對於將來更有希望。無論從那方面來假定，生產力藉着科學的幫助，在未來二十年中，一定能——如果能妥為組織的話——較過去二十年有更迅速的進步。我所寫的書，應當是論及如何才可最好的利用世界新的財富與對於閒暇的機會，而不當論及世界衰落或世界恐慌的危險。我們大家的光陰，應當花費在

講究如何使生活水準特別提高，而不當把時間費在職業介紹所，費在油膩的廚房中，或者爲這世界經濟的陰慘景象而費在這陰慘的書籍的著述上面。

豐裕的咒詛

世界本來是應如我上面所說的那樣，但實際情形怎樣呢？一大部分主要的食品與原料都不能找到肯出適當價格的顧客。這原因不是由於世界不需要這些物品，而是由於世界雖有這些生產物以上的需要，無奈需要這些物品的人們沒有交換手段去購買這些物品；所以生產儘管可以大大的擴增，而擴增的物品不過更使市場滯塞而已。同時在世界製造的領域內，製造業者所投的資本，雖然不像初期生產者的投資那樣不容易伸縮，從而製造品的過剩，似乎沒有初期那樣利害，但其結果却是廣泛的失業。因了生產品不能以相當利潤售出，即因生產工具所有者得不到適當利潤，幾百萬的男子婦女都找不到工作，幾千個工廠都停止活動。世界對其生產力簡直感到莫知所措。這種生產力愈增加，世界就愈沒有方法去利用。說這種情況是滑稽的，悲劇的，我想誰都不能否認。生產力增加的結果，如果竟成了失業與災害的積極原因，那科學家使人類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發

明，究有什麼用處呢？機械的作用如僅在驅逐勞動，那目的在減輕人類勞動重累的機械的發明究有什麼用處呢？播種而求收穫的農人，爲了救濟其財政上的困難，竟祈求一個歉收的年成，這樣的世界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們確實是生在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中。

自然哪，對於這類問題的答案，我們可以說那不是豐盈作祟，不是自然賜予或科學成就上的罪過，而是我們沒有把這些毫無疑義的利益妥爲組織支配。這全是真的。農人豐盈的收穫，工人更多的生產，那是怎樣也說不壞的，恰恰相反，要這樣才是積極的利益呢！他們所生產收穫出來的東西，必須使其作爲提高全般生活水準的手段。所以，錯誤不在人們的生產技術上，不在物品的豐盈上，而在經濟制度的組織上。我所要述及的，也祇限於這無可爭辯的彰明較著的真理。不論是誰，他都會同意一件事實，就是說世界經濟事象，完全是受支配於一種非常錯誤的管理，或完全缺乏正當管理。但是我們一問及錯誤所在的地方，馬上就由確定的領域轉到意見紛歧的領域了，比如問：那種錯誤的原因，究有怎樣深的根底呢？那能夠藉一些簡單的改革，像世界貨幣制度之改良組織，關稅政策的修改，國內國外債

務普遍勾銷或折減，對於軍縮問題，太平洋方面之國際困難問題的實行改進，或者對於其他有關現時經濟制度之存續的種種變更而得到救治麼？或者，我們必須試行比較激進的步驟，甚至仿效蘇俄，實施共黨專政，推行五年計劃，努力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由一國擴展到世界麼？

顯然的，我們此刻不能一一解答這些問題，並也不能希望有使每人而悅之的解答。在我們企圖解答這任一問題之前，我們要考察事實，要探究世界是怎樣陷入這種危機，並看其向着恢復或向着更悲慘局面邁進的趨勢是如何。

因此，我在次章所要敘述的，就是世界恐慌的根源，恐慌的連續情況，以及它在世界各國和各地方所發生的反動影響。不過關於這點，還祇是對於本書所要解明的諸問題之性質加以初步的考察。在這世界恐慌之初步的考察中，為圖易於了解，我們首先必須回溯到大戰終結與世界恐慌開始的那十一年間的歷史，然後再進而考察大戰時的情形，以及戰前世界的，和形成於十九世紀的經濟制度。至少我們要在大體上論究那些在大戰中拚死

對敵的諸大國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勃興，並要考察到現代動力生產方法，逐漸由一國擴展到世界大部分文明領域之經濟的影響。這幾層做到了，我們於是再回頭來論述現在的事實和趨勢，再來判斷那些對世界恐慌所下的各種解釋，以及各國政治家各派經濟學者認為可以挽救世界恐慌所提的方法。

生產過剩之不可能 但在描述世界恐慌本身，甚或開始其原因之探究以前我在本章所特別屬意到了的，是強調世界經濟情形之絕對荒謬，並強調現經濟制度之實際成就，和一種合理經濟制度之正當要求間的對照。我在前面講過，人類一切經濟活動之唯一目標，不外是藉着最大可能之財富的生產以促進人類的幸福；人類對於閒暇，對於合理的工作條件，乃至對於財富之最善分配的諸般要求，都是要有了財富才可滿足的。任何經濟制度之成功與失敗，必須以這些要求為標準來判斷；本書自始至終是把握着這種見解的。如其有人主張世界的生產實在過多了，或者說，我們對於目前的困厄祇須聽天由命，不必孜孜於救濟，那我不難據此見地加以批駁了。經濟制度係由人所形成，當然可以隨

人的需要而設法救濟。設或有人訴說需要不得滿足，那一定非增加生產力和增加實際生產不可。如我們所能控制的生產的資源不能充分利用，則又必然是由於愚昧，由於錯誤管理；這種的弊害，祇要人們肯用智慧去設法救濟，那定然是可以救濟的。若連這種事理還不相信，那不但為人類的理性與常識悲，且還確信人類對此已失却了常態。實在說來，過去二十年的事故，似乎可以明白證示人類集團的愚昧與無能。而且，要把廣大世界上之龐大的生產的資源加以妥當的組織，那種業作之困難，及其需要萬眾一心和竭全人類才智共同努力的事實，是用不着否認的。不過這種種的困難，究不是悲觀的理由，而是應當加強努力的理田；過去愚人的道德，就是說，要訴之於人類的理性，非集思廣益不可。因為人類都是有他的領導者的。如其大家對於經濟問題有了理解，並有一種智慧的輿論，對於領導者所作的正當事體極力援助，對其所作的不正當事體橫加阻掣，那一來，諸國民在經濟事實的安排上顯然可以達到妥當的目的。工業上的技術家與工人，都是可以在生產更豐裕的財富上勝任愉快的，但可惜世界各國的聯繫，還沒有達到完全利用其勤務的境地。在此種情

勢下，實有羣策羣力以求經濟秩序安定之必要。因爲人類不創造一種經濟秩序，使大家都
能分得其由征服自然所獲有的物品，那顯然是不會罷休的。

第二章 世界戰爭之經濟的結果

第一節 世界貿易衰落的前後

在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中，全世界的經濟活動已達到一個新記錄的水準；世界各地的生產額，不論是食品原料抑是製造品，殆莫不較以前爲高。而且，經濟活動之更大的成果，就是由此招致了種種利益。全世界的生活水準幾乎一般皆較過去爲高。但是，就在物價達到最高頂點的一九二九年的某一個時期，已經利用了的生產力，距離可資利用的生產力還是隔得很遠。世界這時的失業者還有很多；許多工廠都停歇，許多發明不能即時利用。不過，實際情況雖然如此，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全般景象，似乎仍足以引起人們以次的樂觀見解：說戰後世界經濟的困難幾乎沒有了，從此世界將向着更高生活水準作一巨躍。

但至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間，世界情形丕變了。一九二九年秋季華爾街（Wall Street）的金融瓦解，無異是繁榮中止的最初的顯明號信。合衆國的不況，迅速的加大壓力的擴展到其他的國度，迄乎今日，我們仍處在這種大不景氣的波瀾中。真的，我們彷彿已與這不景氣習慣了，前數年把我們的樂觀幻想破毀無餘的震動，現在也彷彿開始減弱了。由恐慌開始以迄今日，時期已夠長了，我們不但可以開始對其原因作明敏的考察，同時對於人們以次的說教，即主張恐慌是一種貿易上習見的循環運動，就是人類不加救濟，亦會在不況之後導來恢復與繁榮的說教，已因難耐這長期的痛苦而不能不逐漸懷疑了。

在本章，我首先須問到不況是什麼，以次，根究其發生的原因，再次，論及其主要的連續現象，如何連續的情形，以及其主要事實，究會在那種限度發生相互的影響。我們要對物價慘落影響於各種貿易、各階級和世界各國的事實加以考察；我們還須問到，各國爲解除此困厄或逃避其結果所施的救濟方法，究竟是實行改善了現狀，抑是使現狀變得更壞。最後，我們更須努力發現的，就是，當前的不況究竟是在日益加深其程度，或者繼續沒有改善，抑或是

有了逐漸消除的期望。所有這些，都是關於事實的主要問題。不過像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普遍一致的回答。如其對於這些事實及其解釋大家意見一致，那救濟起來，也就沒有什麼困難了。

無奈大家的見解，是怎麼也難得一致的；人們是依着他們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成見，對事實作不同的觀察。就因此故，從什麼角度的視線來觀察問題的這一點，那是首先要弄清楚的。本書的著者是一個英國人，他在著述此書時，自然會極關懷到英國的事情。不過，他頗知道，如其他以英國人的資格從英國人的視野來寫本書，那他對危機的事實，特別是對危機的原因，就不能希望有一個妥當的解述了。因為我們當前所遭值的危機，是所有各洲各國都受其影響的世界危機，要恰如其分的觀察其實情，要正確的了解其意義，那是非從世界的國際的觀點出發不可的。

世界的公民 因此，我對寫本書所取的态度，是一個世界公民的态度，或者寧可說是從非任何特殊國度的立場來考察世界的情事。而且，國際的觀點，是糾正普通人對危機

觀察的必要條件，所以我更非從此立場出發不可。我們一般人關於危機的認識，大體上自然是側重在危機對於我們的國家及我們自身的影響上面。因此，我們對於我們自身及我們國家所遭遇的困難的救濟，就往往不容易想到那些救濟在世界其餘各國所發生的反動。加之，當前世界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沒有形成一個有力的共同政府，在某種限度內，這種情勢也足以促使普通人祇寄其希望於其自國政策的傾向。然而，那怕就是一大部分處理危機的方策，要各個國家來施行，但那些方策終須根據以次的理解：即危機不是國家的而是世界的，一個國家的自救方策，如其會在其他各地發生破壞影響，其結局終不免要回頭來害及其本國。

自然，我們知道危機是世界的；但要使人們認識救濟亦必須是世界的，那却就困難。一大部分事情其所以弄糟的，就是由於其中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即一國要想把事情弄好，勢非與他國通力合作不可。試把危機的主要附隨事體及其特徵一加思索罷！那其中無論那一項，都是不能單純就那一國的情形來解述的。物價的一般跌落，維持金本位制的困難與

白銀的減價，賠款與戰債問題，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更廣泛的關係，關稅提高與輸入限制，遠東與歐洲之工業上的競爭的展開，危機前後之海外投資的過分幻想——所有這些事項，殆莫不具有國際的性質。而且，它們都與和平條約之國際政治背景保有緊密的關聯，而這和平條約又曾在歐洲造出一些新國家和新的國境，並破壞了既成的生產與貿易的經濟單位，重新分配殖民帝國。至若其他世界戰爭的遺產，如俄國的共產主義者革命，對於意大利式之獨裁政體之議會德謨克拉西的懷疑，中國與印度之民族與階級的動亂的迅速增長，以及由戰爭與革命留給全世界之不安定的尖銳意識，都顯然與前述諸事體有了相當聯繫。所有這些活動於人們心目中的酵母，不但會影響各國政府的政策，且會影響到一切國家各個人對於日常經濟事體的態度。我們對於世界將來缺乏一個定着的信念，那就是現代危機之心理的方面，那是頗關重要的，因為這種心理上的危機，不但可以影響各國，且幾乎可以影響每個人的經濟習慣，商務處理，乃至其對於較廣泛之經濟政治方針的態度。

我們把危機的若干特著事實講述出來，其世界的性質就昭然若揭了。它開始是集中於合衆國股票交易市場上的物價飛漲與慘落。接着，南北美與澳洲大農業國家的困難，不絕增大起來；美國投資者由歐洲提回其資本，危機遂侵襲到德國與中歐，金融奇窘的結果，奧國的昂斯塔爾銀行（The Anstalt Bank），德國的達那特銀行（The Danat Bank），先後倒閉了。這一來，世界的『信用危機』（crisis of confidence）激成英國及其他許多國家廢棄金本位；合衆國由是發表暫時停止償付國際債務宣言，大不列顛由是而撤廢其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此外，爲阻止貨物自由移動，尤其是阻止支付貨物之貨幣的自由移動，差不多每個國家都實施政府限制與統制的積極方策。

荒涼景象的擴展 在這諸般不幸事實之深入結果上，每個國家的困厄，無非是使其他國家的地位弄到更壞。合衆國的破產，直接影響到大不列顛、德意志以及所有其他以合衆國爲其貨物銷場的國家。德國金融的奇窘，又嚴重的打擊奧大利與中歐一切國家，同時，大不列顛與合衆國的金融狀況，亦相因而受到危險。大不列顛之放棄金本位制，其他尚

維持着金本位制國家的輸出貿易馬上感到威脅。並且，每個國家爲保護自己而採行的政策，幾乎沒有不加害於其隣人，於是其隣人自必要採行相當政策以圖報復。提高關稅，限制輸入，限制國外匯兌以及限制資本由一國向他國移動，勢必阻害貨物與貨物之正常交易，結局，彼此的生產額同受其限制。在世界所有的貨幣市場上，貨幣全行封鎖；而現代貿易與工業所賴以維持其生存的信用，乃陷於完全梗滯的危險狀況中。由不況致形成收入短少的政府，甚且迫而縮減其必要的國家支出，這種緊縮政策，又進一步限制了貨物與勞務的需要。要在日益縮小範圍的市場中，保持住一個最大可能的分額，縮減生產費是必要的，由是一國削減勞動工資，其他國家也競相削減。然而，工資削減，無異進一步縮小需要，增加世界失業的總數，並在負擔維艱的政府肩上，加上一個維持失業者的新的重擔。這樣，在每個國家的經濟制度中，因窘景象乃不絕增大其環圈。而各國爲救濟其緊急關頭所行的方案，直無異爲他國造出一個新的難關。

在此種情形下，每個特定國家的危機，非與他國相聯繫起來是難於理解的。是的，某些

國家在這方面的遭遇，也許比較其他國家要利害得多。但對於危機的描述，却不定基於任何特定國家的觀點，而必得具有一種精神，就是湯瑪斯·哈第（Thomas Hardy）在其所著王權（Dynasty）中的精神，當其觀察人類事故，有如一個人居高俯視一個蟻丘。其不同之點，寧可說是那對象並非無止息的活動，甚且不是顯然有計慮的活動，而是生活逐漸向下與痿癱的現形；那使礦山與工廠停閉，使船舶在海洋上停止行駛，使棉花小麥橡皮充滿堆棧，甚且使黃金在世界各地死藏起來，同時，在中國，有數百萬人民陷於半餓狀況，其他各國的男子婦女兒童都缺乏日常生活用品，這些用品，是那些失業工人與停閉工廠可利用堆棧中堆積的原生物而增加其生產的。我在前章講過，在物價慘落的前幾年中，世界生產迅速增加——遠較人口增加為速——而由戰後深刻不況恢復過來，歐洲尤為顯著。在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九年中，世界食品與原料生產增加百分之一，歐洲則增加百分之一七；同時，全世界的對外貿易增加百分之一九，而歐洲則增加百分之二二。至這四年中的工業生產，那亦有迅速增加的，那種增加率，至少是與原料與食品之增加率相等。

一九二九年世界主要各國生產狀況

國	麥	煤	煤	油	電	銅	汽	車	船	船	花	家	畜
度	(平均)	噸	噸	噸	噸	噸	(生產數)	輛	噸	噸	(消費量)	百	萬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國	二五,一三三	一,九二九											
合衆國	三三,四	一,三三											
大不列顛	二二,三	一,二二											
德國	一七,一	一,一七											
法國	一四,三	一,一四											
意大利	九,七	一,九											
加拿大	一七,六	一,一七											
—	—	—	—	—	—	—	—	—	—	—	—	—	—

世界	蘇俄	中國	印度	日本	澳洲	阿根廷
二四九	二三三	—	九〇	—	四	—
二三七	三六	一五	二四	四	二	—
三〇六	一四	—	—	—	—	—
—	六·四·五	二·三四	—	三,〇〇五	二,二六	—
一〇·五	四·七	—	〇·六	二·三	〇·四	—
六,五七*	—	—	—	—	—	—
二,七四	二四	九	—	一五	—	—
五,四四	四三	四六五	四七	六四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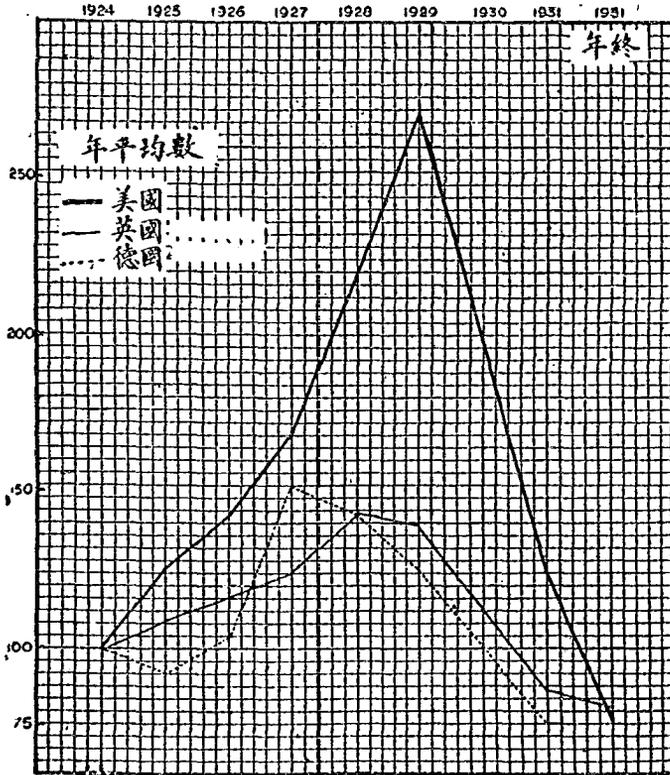
十德國還有木炭一七四萬公噸
* 限於主要各國

第二節 合衆國

實在說來，歐洲的發展，較之美國的發展要規則些。美國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

的景氣，在其不同的經濟部門上顯示了極大的差別。而當時為景氣所籠罩的部門，主要不是股票交易所，地產經營與建築工業，至若在工資或僱傭上，在真實消費者的需要上，却並不會顯出怎樣了不得的繁榮景象。不過，這種在發展上的區別的徵候是很少人留意到的，直至股票交易所倒閉時，美國一般人幾乎還是一致貿然相信繁榮的進步。在一切工業上幾乎都能掙到高率利潤，投資事業儼如瘋狂一般的活動。建築業上加強活動的結果，新工廠，新房屋，以及壯麗堂皇的辦公室一類的長排建築，都在各處興建起來。因為大家預期繁榮的繼續，土地便被視為一宗發財的對象，於是買進賣出者頻繁，其價格迎風陡長。同時工業股票在市場上的價值，簡直高到與其實際所生利潤不成比例。投資者樂觀地期望將來，大投資本；比較短視的投機者，則利用一般人的易於矇蔽，大發其財。為了渴望豐裕的酬報，各種各色的美國人以及世界各國的人士，都把他們的金錢注集在美國股票交易的市場。股票價格迎風陡長，購買股票的人自沒有一個不獲有過分的紙上的利潤，紅利幾乎是計數不到的。因為在這種場合所珍重的是資本，資本的評價，就隨貨幣的不絕增積而不絕

由1924—1931年之美英德三國之股票價格的變動
 (普通工業股票之年平均價值)



增大起來。信用驟擴。對於防止信用用作投機之努力全歸失敗。就在這當中，許多外國人既把他們的流動財源不絕由其他世界中心地域移注紐約，由是黃金乃從其他國家流出而一無所用的堆積在美國。

在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九年中，美國普通工業股票的平均價值已超過百分之二百，而同時大不列顛與德國之同種類股票價值之增加，則不過百分之二五左右。

物價慘落前後的股票價格的變動

普通工業股票或公共股票價格（一九二四年為一〇〇）

年	度	美	國*	德	國	英	國†
一九二四(年平均數)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五(年平均數)		一二六		九二		一〇九	
一九二六(年平均數)		一四三		一〇五		一一五	
一九二七(年平均數)		一六九		一五二		一二四	
一九二八(年平均數)		二二〇		一四一		一四二	

一九二九年(年平均數)	二七〇	一二五	一三九
一九三〇(年平均數)	二〇一	一〇〇	一一二
一九三一(年平均數)	一二四	七五(七月止)	八七
一九三二(年終)	七七	交易所停閉	八一

* 在交易所停閉前之一九二九年九月，美國指數達到三〇九，至同年十一月，則低落到二〇七。一九三〇復高揚到二四四，同年末慘落到一四六。

† 英國剛在金本位制停止前之一九三一八月，其指數為七八，此後，於十一月升至九二，十二月再降至八一。

股票價格的這樣龐大的膨脹，那決不是由於實際經營利得之合理的預期。那怕就是工業繼續維持繁榮，那也不能期望其利得能支持這高的價格。因此股票價格膨脹，一大部分是純粹投機，投機的結果，遲早總有某些人要蒙受損失。專於覓取短期贏利的投機者，如其他如期拋售，自然可以大發其財，不過在這種場合終不免要導來一種認識，就是覺得證券股票的價格高到過於滑稽了。設或大家都意識到這一點，那馬上便有人要大吃其虧，然而在一九二九年的前大半年中，短期股票的價格還繼續上騰，即令人講到怎樣危險的

理由，誰也是聽不入耳的。各銀行仍繼續基於景氣膨脹價格的評價，對各種股票債券行使
鑿支。投機者常拋出有利的時候，依舊繼續期待更有利的價格。結局，股票價格雖在此後許
久還保持上騰趨勢，但迫切崩潰的情況却已顯然可見了。

困難的徵候 其實，自那些比紐約證券市場投機者眼光較遠的人以及能觀察時
勢之歸趨的人看來，美國經濟制度在一九二九年中就已經充滿了失其平衡的徵候。美國
是一個大工業國，同時也是一個大農業國。在建築業上，在證券市場所表現的景氣，決無從
助益於農民的狀況。由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當中，世界其他各國的物價，都有下落
趨勢，而美國一般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的水準，實際尚屬穩定；不過，這是就工業品而言，以
農業品與工業品較，其相對價格，與絕對價格都是表現下落的，美國農民處在世界全穀物
價低落的情況下，他不得不以低廉價格拋售其產品，但同時却要在本國市場上購買較高
價的必需工業品。在一九二八年，美國農產品價格祇高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三九，而其所購
買之工業品價格則高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五六左右。

這種情形，一部分是發因於美國銀行系安定本國物價的精密政策，另一部分則是發因於投機活動與吸入現金的增加，結局，農民大受其害；而農業不絕地合理化，又使一批一批的農民由農村移向都市尋覓工作。

合理化與失業 然而，美國工業上的合理化，至少與農業上的合理化保持有同樣迅速的進度；所以，工業總生產額儘管增加，而在一九二九年所僱傭的勞動數量，實際還較一九二六年為低。這樣，由農區向都市移動的勞動者，就不會有工作等待他們。我在前面講過，美國當繁榮達於極頂的時候，其失業者的人數已經估計有二百萬以上。而那些有工作的勞動者亦沒有受到繁榮的絲毫好處。紙上繁榮的大大增加，投資者投機者固然獲利匪淺，而對於一般勞動階級，那却是漠不相關的，以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二六年較，工資勞動者每週的所得，實沒有一點增加。勞動工資與被僱人數，既不能與生產的發展保持均衡，其勢不能不使美國的經濟生活受到攪擾。因為，要使增加的生產的財源，得到有利的使用，唯一的途徑，就是充分擴大那些能夠吸收增加的產量的需要，在某一個時候，工資儘管停滯，

分批購買的迅速發展，也幫同促進了消費的需要。不過，利潤的提高與合理化的增進，卒使消費者的需要，不能與擴大過速的生產力以同一步驟增加。全美國人民只顧生產，不管消費，結局，生產與消費間的缺乏平衡，自不免要導來景氣局面的崩潰。在此種情形下，那些效力更增大的新工廠，新礦山，縱令尚可繼續由出售產品而獲得利潤，但消費者的總需要量既受有限制，那在較陳舊的較少效率的經營中，一定要引起更多的失敗者與破產者。就社會全般而論，如非消費者需要能擴大到容受新舊工廠所生產的物品，那工業的投資是難得達到營利目的的。

也許說，美國可以藉輸出增進手段而謀恢復其經濟組織上的平衡。但這是有幾種行不通的理由的。第一：我們講過，美國的銀行系一心一意要維持物價的穩定，生產費減低了他們不管，其他國家的物價下落了他們也不管，這樣，主要是由於這樣，美國的物價乃相對的較任何其他國家的物價為高。第二：我們須記着，大戰以後，美國變成了一個大債權國；在目前的情形下，一個債權國如不打算貸與他國以購買其產品的手段，她的輸入就必須要

大於輸出。直至一九二八年，美國人向海外貸出了大批的貨幣，他們投資於南美，投資於歐洲——尤其是德國，德國合理化政策之得以推行，主要是受了美國金元的幫助。但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當中，美國華爾街異常景氣，投資與投機的預期利潤，在美國比較在世界其他任何國度爲高；就因此故，美國人自樂意把他們的金錢保留在國內。同時，外國的資本，又因企圖分有美國股票投機的膨脹的利潤，而不絕向美國移動。在這諸般情形下，要想外國人由美國購買更多的貨品，那是難能的。不但如此，因了美國對外投資的縮減，又因了外國人要由輸出抵償其流入紐約的貨幣，他們所能購買美國的貨物，是一定要較以前爲少的。

因此，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美國景氣，是當然無從穩定的。有人說，美國物價慘落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工資太低，這是似非而實是之論。有人或要問，美國的工資，不是世界最高的麼？這本不錯。但一國工資的正當水準，應當按比例於其生產能力的水準。顯然的，美國的工資率，大大的落在其生產力發展的後面了——這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工資增加

太少，一部分是由合理化政策使工業農業上的勞動需要減退。此外，迄今仍包括有美國最大部分人口之農村社會的購買力的降落，那亦不失為一種有力原因。美國華爾街的金融解體，其所以不旋踵間就使世界各國都陷入不況的深淵的，要不外由於美國一般購買力一旦減退，一切以美國為其產品之主要市場的國度，皆因此蒙受了莫大的損害。

其實，工業上的緊縮，在股票市場投機者業經感到驚恐以前，就已經開始了。證券價格在紐約市上仍能維持於不墜的時候，工業家早已逐漸發生貨物滯銷的困難，並開始緊縮其生產。為了擔心物價的低落，食品原料都投積在市場上；對於勞動的需要迅速低減。由是知道現存高率利潤不復能維持下去的人，日益加多。實際上，當華爾街假定生產力迅速增高，需要將以相當速率擴增，因而奮興投資於工業上的時候，一些有識人士已經在開始收回其股票交易的方面的財源。迨到大家都知道需要擴增的希望沒有保障，於是一座完全投機的建築，乃像紙屋一樣的歸於破毀。

在一九二九年九月華爾街恐慌的當中，膨脹的紙上價值，乃遇到一種駭人聽聞的慘

落。在同年之末，工業股票的平均價格已經跌落三分之一。在翌年最初數月，曾有一個短期的、部分的、幻想上的恢復。但此後又復低落，至一九三〇年年終，股票價格僅及繁榮期之半，並返到一九二六年的水準。迨至一九三一年，跌落趨勢仍繼續不變，同年末的價格，祇略高於同年初之價格之一半，尚不及一九二九年價格的三分之一。

第二節 歐洲的物價慘落

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不但追蹤着美國物價慘落的途程，且還要蒙受着美國物價飛漲與物價慘落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反響，其物價慘落固是貽害他國，其物價飛漲同樣貽害他國。因為，當投機熱在美國如火如荼的展開時，美國資本向海外移動突然中止，而歐洲的資本反注集到美國市場。歐洲這種財源的喪失，再加以有支付美國之戰債與戰後借款之利息的必要，於是引起銀行率之抬高和信用的緊縮。這一來，歐洲物價因而壓低，其失業人數因而增多。前此由美國向海外大投資流出的黃金，重又開始匯集到美國銀行，致歐洲中央

銀行缺乏充分的準備金額。但是，當歐洲物價因美國信用緊縮壓低時，生產量的減落與利息率的提高，以致生產費用實行增加起來。

德國的困厄 但歐洲各國所受美國物價飛漲的影響並不一樣，有的國家的受害實遠較其他國家爲烈。德國自從在一九二四年道斯計劃（The Dawes Plan）下穩定通貨，整理賠款以來，其工業的改造異常猛勇精進，然其改造過的工業，皆係極度機械化，因而需要極多資本的支出。我們知道，德國自己的活動資本，是幾乎在馬克膨脹的前一時期喪失殆盡了的。她對這多的工業資本支出，以及其對於賠款的償付，計惟有仰賴外債。在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八年間，德國由國外，特別是由美國所借入的債款，實在遠較其所付出之賠款爲多。她這時期由各國投資者借入的總額，計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約合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有她所付出的賠款（包括實物償付）的兩倍，而這樣大的借款，美國至少要佔一半。顯然的，沒有這借款，賠款固無法償付，工業亦沒有實行合理化的可能。實在說來，德國之使其經濟——那爲戰爭與膨脹所摧毀了的經濟——

——維持平衡，蓋不外仰賴大批的海外借款。

在美國物價飛漲的一九二九年中，美國對德國的投資突然中止。德國這時如非找到一個代替的財源，馬上就要遭到經濟的厄難。特美國所借給德國工業、公共事業及各市政機關的債款，通是長期借款。美國既停止貸借，長期資本難得，如是，這必須彌縫的缺陷，勢不能不由德國銀行向國外通融短期信用來彌縫。英國、荷蘭、瑞士以及其他銀行家，皆以高利率通融充分的短期資金於德國，但是，德國為維持經濟上的平衡，她不能採行特別有效方策，縮減輸入，並拚命擴大其輸出。在此種變動的情況下，德國的勞動需要與生活水準，通同降低，德國的經濟體制，乃陷於一種要用信用來維持的極度危險的境地，而這信用，又祇靠短期的借款，其償付一隨貸借者的意志。

當美國物價由狂漲轉到猛落的時候，德國的情形，立即變得異常險惡。美國已不再向海外投資了。美國投資者受到證券市場崩潰的嚴重打擊，對於未來充滿了疑慮，他們無意把金錢拿來冒險。加之，許多美國銀行，都因購買證券，或對價值慘落的證券大量墊支而陷

於苦境。爲要縫補其當前的破綻，這些銀行都想急於收回其海外的資金。這一來，德國受到兩重惡害：一是直接影響其對美國的購買力，一是影響他國貸款於德國的意願。因爲美國銀行是要向其他金融中心提回其資金的，並且，歐洲金融家出貨於德國的貨幣，事實上一大部是由美國以短期條件借給他們的。

長期短期的資本移動（單位百萬元）

國入借		出檢一國出貨											
		加拿大	法國	英國	美國	國別							
澳洲	14	107	—	700	(1) 26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德國	—	27	—	—	—	—	—	—	—	—	—	—	—
上面的負號係表示資本輸入													
澳洲	30	110	10	10	37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德國	—	66	15	10	—	—	—	—	—	—	—	—	

入輸一	
阿根廷	三
日本	一七
	三六
	四
	三
	一四
	一三
	六
	(一)五

上面的負號係表示資本輸出

注意：上表是混同的表示長期短期資本的移動，至若美國在一九三〇年國外長期投資的繼續縮減，以及在德國以短期借款代替長期借款的一九二九年之長期投資的完全短縮的情形，這裏都沒有指示出來。一九二七年之法國資本的大量移動，那主要也是屬於短期的。

德國對外的債務（單位十萬萬馬克）

年	終	一三六	一三七	一三六	一三九	一四〇	一三三（七月）
A 德國借入的							
長期	四二	五四	七〇	七三	九二	九〇	
短期	四一	六六	九〇	一二七	一〇三	八〇	
其他	五五	四五	五五	六〇	六〇	六〇	

C 德國的淨值	B 德國借出的		總數
	短期	長期	
三·六	八·一	四·五	二·七
八·一	八·四	四·五	一·六五
二·三五	九·〇	四·五	二·五
一·五〇	二·〇	四·五	二·五〇
一·五八	九·七	四·四	二·五五
一·四·五	八·五	五·〇	三·〇

德國的貿易差額(單位十萬馬克)

年	貨物入超	貨物出超	金與匯割入超	金與匯割出超
一九二四	一·六	—	—	—
一九二八	一·三	—	〇·九	—
一九三〇	—	—	(+)	(+)

賠款支付	0.3	2.0	(-1.7)
由輪船及服務的淨收入	(+)0.3	(+)0.5	(+)0.2
由外國投資的淨收入	(+)0.2	(+)0.6	(-)0.6
總不足額	2.9	4.3	0.7

德國的對外貿易(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單位百萬馬克每月平均數)

年 度	淨 輸 入	淨 輸 出	淨 差 額
一九二七	1186	852	(-)334
一九二八	1167	968	(-)199
一九二九	1121	1055	(-)66
一九三〇	866	944	(-)78
一九三一	561	767	(-)206

注意1. 就在德國仍由海外輸入資本的先頭幾年, 其不利的貿易差額, 在逐漸低減。

2. 在一九二九年以後, 輸入銳減, 那一部分由於物價低落, 但也因為自動削減輸入, 以期在支付債務賠款

上能保持平衡。

3. 表示在物價慘落當中，拚命努力維持輸出。

一九三一年度德國支付的平衡

由揚格計劃顧問委員會之估計(單位百萬馬克)

輸出剩餘(包括服務與貨物交付)	三、〇〇〇	七月三十日期賠款	八〇〇
德國銀行利用之外資	一、三〇〇	利息與外債償還基金	一、五〇〇
外國信用(包括德國中央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	一、二〇〇	外資的提取	四、九〇〇
由國家銀行貯積的現金及其他	一、七〇〇		
合計	七、二〇〇		七、二〇〇

因此，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一年中，德國政府雖採行了一些異常猛烈的救濟方策，但其經濟狀況却日壞一日，甚且弄到不可收拾。在壓低人民生活水準的情形下，對各種的輸入是嚴加限制的，同時為努力擴張販賣，其輸出價格竟低減到使其世界市場上的主要

競爭者，發生驚恐。爲改善對外貿易，從而盡量削減價格的德國生產者，他們都竭力使之於國外市場者取償於國內市場，高抬國內市場的物價；這樣，德國一般的生活水準就進一步受到不良影響。德國工業的合理化，原本是設想世界需要擴張，因爲，合理化的工業，如希望以較低費用生產，就必得提供市場以極大數量的產品，生產數量愈多，其生產費即愈經濟，這是合理化的一種特質。也就是說，機械設備能充分使用，生產費自必減低，若大規模之合理化工廠時作時輟，其生產費當然增高。合理化減少了勞動費，減少了對每個生產單位的勞動需要。不過，它由是增加了資本費，增加了利息的負擔。後面這種費用，集攏來看是非常之大的，要使每個生產單位的負擔減輕，祇有盡工廠的所能，多生產分任此負擔的生產單位。非然者，合理化是並不經濟的；但當德國人發現此種生產費的關係時，世界市場已在美國華爾街金融恐慌之後開始嚴重的縮小。

胡佛的延債宣言

就在這世界貿易衰落的過程中，德國居然成功了一種輸出超過輸入的大有利差額，並開始由她自己的財源支付賠款。然而，她的這種成就，無非是由於

猛烈的削減輸出價格；而其國內市場的極度不況，以致失業險狀日甚一日，大部分合理化工業之嶄新機具停止活動了。維持失業人口的費用，在國家支出預算上一天一天的加多，延至一九三一年最初數月間，德國已完全陷於束手無策的困境。這時，把她由經濟大破局援救出來的，是胡佛（Hoover）對戰債賠款延期支付的宣言和柏林的『停付』協定（The Berlin "stand-still" agreement），根據這種救濟辦法，德國的債權者乃同意其延期支付短期債務。不過，這些方策純然是暫時性質的，而促使實施這些方策的病根，却絲毫沒有去掉的徵候，她們所能保障的，不過暫時的保障罷了。人們對於宣言效力失去，和協定中止以後所要遇到的事體，還是驚疑，對於將來的信用，可說完全沒有恢復。德國國內市場既沒有改進，其生活水準，反因世界情形日壞一日而進一步壓低。德國之局面的撐持，祇是靠着國家採行嚴厲方策，曲加統制，那在其一般人民之間，已釀起了憎憤與失望的酵母。所以，當荒涼狀況繼續不改而債權國救助的實際效果漸使人感到絕望時，德國中間黨政治勢力，乃為希特勒主義與共產主義平分春色了。

至關於延償宣言的本身價值，那也有一部分爲接受此宣言所惹起的困難所破壞。此宣言對大不列顛雖爲一直接損失，大不列顛立即允諾了；法國幾經折衝交涉之後，雖然終於承認了，但她附有修正的意見。德國在楊格計劃下每年所要支付的賠款額，是分作兩部分：一是無條件償付部分，即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延緩；一是有條件償付部分，即德國如因償付有危及其國外匯兌安定場合，得請求延緩。法國強烈反對胡佛宣言涉及前一部分，因爲她在這一部分中，是可獲有最大部分的數額的結局，她接受宣言所附的折衷辦法是這樣：德國須支付無條件償付部分之賠款於國際清算銀行，爲避免此款有流出國外的危險，由國際清算銀行立即貸借於德國鐵道方面。延償宣言雖在這種基礎上得到了允諾，但那種允諾過遲了，以致爲那些由德國提取大批短期資金者造一機會，因此，楊格案規定償付的部分儘管延遲，而立即崩潰的威脅還是難於避免。於是，繼延償宣言而後的，又有德國銀行與外國債權者間的停付協定，這協定主旨在阻止提取短期資金，和緩那崩潰的威脅。在某一個時期，這些方策確也收到了防止德國經濟組織總崩潰的效果，不過，這些方策之收到

此種效果，還是由於德國政府採行其他極力限制外貨輸入，限制本國資源輸出之諸般方策的協助，而輸出入方策之猛烈的限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是更加破壞低落不堪了。

由胡佛宣言與停付協定所造成的這苟延殘喘的局面，理應立即用以為重新澈底考慮整個賠款戰債問題的機會：在這種現狀下的德國，凡是一個腦筋清醒的人，一定不會相信她在一九三二年延債期滿時再有償付賠款的可能，德國付不出賠款，協約諸國對美國的戰債，也自沒有人相信她們能按期償付。然而，事勢儘管如此迫切，各國還是月復一月的遷延着，不圖對此問題作一確定的解決。至一九三一年年終，德國根據楊格案中的規定，要求修改其所負的義務：聯合委員會按照實情作成報告，這報告不僅確認德國沒有償付能力，且強硬提示整個問題有重新考慮之必要。由是，關於德國私人債務的停付協定，又復據此報告重訂。但協約國政府對於賠款問題，仍沒有達到一致的決定。洛桑會議（Lausanne Conference）時開時輟，無非為了英法兩國政府意見的參差。英國堅決主張賠款戰債有兩俱勾銷之必要，法國因把應得賠款，償其應付戰債還有多額贏餘，不肯贊同英國主張。這

時，德國政府因了輿論壓迫，宣言她不但在一九三二年無再行償付賠款能力，且在將來亦無此能力。她這種宣言，在法國引起了異常的反感。同時，美國明眼人雖明知歐洲無力償付，但其輿論却敦促政府，宣稱賠款與戰債無關，並表明美國無意低減歐洲各國所欠美國債務。美國國會的這些宣言，我們是無須過於重視的，但當時却實行阻止了美國人對賠款戰債混作一團的談判的參與。在不久的將來，賠款與戰債顯然都是要勾銷的，但這勾銷之舉，是否能在歐洲國家財政大崩潰以前做到，那却是疑問。我在進行本書的著述時，洛桑會議已達到了一種紙上的解決，其關鍵全在美國有否取消戰債的準備。美國現在雖無此表示，但洛桑會議的決定總算是有進步的。

第四節 英國的危機

在德國由胡佛延付債務宣言及『停付』協定勉強避免掉的危機，却迅速擴張到了其他國度，特別是大不列顛。大不列顛因為據有世界金融中心的優越地位，其經濟與金融

制度特別容易受到損害。倫敦銀行與貼現匯業局曾爲資助國際貿易，借與了世界各國的大宗款項。德國雖則陷於顯然的崩潰危機中，他們猶率先對德國銀行與工業家繼續助以短期的墊款。不過，倫敦金融家墊借於德國及其他國家的短期款項，並非他們自己的資金。不列顛輸出的減落與其資本家投資海外的進款的短縮，已使倫敦用以周濟世界的自由財源大形減縮了。在此情形下，英格蘭銀行似乎要審慎周詳的，設法由較高水準的銀行率，依短期存貯與投資的形式，把外國貨幣向倫敦吸收，而倫敦銀行家借與他國的金錢，一部分就是由此得來，從而，他們對於那些短期債券所有者，就隨時要負起償付的責任。

危機在世界上日形擴大，倫敦貨幣市場上的反動也就日形嚴重。在一方面，提回德國借去的款項既不可能，同時因世界物價的繼續跌落，與其他國家困難的不絕增加，以致像澳洲、南美共和國一帶所通融去的短期信用，都在原料食品價格慘落的情形下極難支付出來。但在另一方面，那些曾經借款於倫敦的債權人，却爲了要應付其國內增加的困難，急欲收回其對倫敦的借款。紐約證券慘落所引起的美國銀行界的難關，使美國人由倫敦提

回去了大宗的財源，法國當膨脹政策實施期間，佛郎逃出國外許多了，到這時法國人也拚命收回其國外借款。

金資像這樣大批的由倫敦提出，那在其本身上是再壞不過的。倫敦的金資缺乏，倫敦金融家自必要縮減其對海外的借墊。但這影響還是積累的。在老早以前，他們這種繼續提取金資的活動，已開始捲起了對於不列顛金融制度是否穩定和其金本位制是否有力維持的疑懼。在大不列顛維持住了金本位制的限內，存在倫敦的貨幣，與黃金有同等效力，因為那是隨時能够以無大出入的兌換率，換成黃金的。但外國資金既不斷由倫敦提出，外國的金融業者就開始要發生一種疑慮，怕大不列顛不能長久讓他們無限制的輸出黃金。

關於這點，有名的關於國家度支的五月委員會（May Committee on National Expenditure）——其反對的壓力，曾導出不列顛之勞動政權——作成了一個多所論爭的報告，這報告批評不列顛之預算不平衡的情形，主要是由於收入減落，和維持失業之支出大增——這兩者都是世界恐慌的結果。此報告在簽名者心目中，原已有了要求不列

政府實行緊縮政策的成算，故其措辭無疑要大驚小怪，並過分誇稱實際狀況的危險。然而這種帶有宣傳性質的報告，國內反對報紙自然盡力推揚，而國外亦承認其表面價值，就因此故，其直接影響乃在促使金鎊進一步的流出。在這場合的金鎊流出，一部分係由於外國金融家由倫敦提回其借貸相抵的差額，一部分則由於那些較小國家的實行所謂『金匯兌』本位，她們對其國內所發行的通貨與信用之一部分實際準備，不是黃金，而是保留在英國銀行的借貸上的差額。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一懷疑到金鎊將來是否能夠穩定，她們就要因為顧慮大不列顛的拋棄金本位，而迅速把那差額改換為黃金。法國銀行在借貸上對倫敦亦有頗大數量的差額，但因她渴望維持不列顛的金融不使破產，故這時沒有向倫敦提出多少黃金，不過，她前此的大量提取，終不免大有影響於英國的危機。

大不列顛支付的差額(資本及短期金資的移動除外)

年 度	1924	1928	1929	1930	1931
商品與原金銀的入超	324	358	366	391	*376

政府由海外所得的淨收入	- 25	15	24	19	16
由海運所得的淨收入	140	130	130	105	80
由海外投資所得的淨收入	230	270	+ 250	+ 220	+ 165
短期利息及信託佣金之淨收入	60	65	65	55	30
其他財源的淨收入	15	15	15	15	10
總收入	410	495	484	414	301
總的正負差額	+ 86	+ 137	+ 103	+ 23	- 75

* 包括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磅黃金之淨輸出。

† 由修正縮小的估計。

大不列顛轉變為借入者

英格蘭銀行遭遇到這種大量提款的危險關頭，就是全

部犧牲她的金準備，亦殆難於應付，為打開此危局，她不能不設法向法蘭西銀行及紐約聯邦準備銀行通融緊急借款了。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由此種方式所借得的款項，計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此款規定用金償付。但借來不久，隨即證明這項金額，究不足以應付繼

續提款的要求，不到幾個星期全部告罄了。由是，英格蘭銀行把此種情形通告不列顛勞動政府，並宣稱今後祇有兩個挽救的途徑：一是停止金本位，不然的話，就是要依政府的保證向國外大借其債。

當這個時候，不在這以前許久，大不列顛的唯一聰明的辦法，顯然是停止金本位制，使金鎊的對外價值低落。這一來，金鎊的移轉，定會蒙受嚴重損失，從而外國向倫敦提款的趨勢，就可得到阻止。但勞動黨內閣的財政部長斐斯康特·斯洛敦（Viscount Snowden），是一位金本位制的擁護者，他對金本位制的狂熱擁護，就連英格蘭銀行或國庫部的官吏們，亦望塵莫及。在他的影響下，勞動政府決定爲了拚命維持金的支付，而進一步向巴黎、紐約商借更多的借款。不過，顯而易見的事，就是英國政府雖然出面保證，紐約、巴黎的金融家，仍然要依極繁重與例外的條件，始肯允諾英國進一步的借款要求。照那些條件做去，不列顛不但要設法平衡其預算，且要縮減失業維持費來平衡其預算。誠然，政府是不承認這條件是外國銀行所提出的，但不承認儘管不承認，而這條件的提出，顯然大有人在，不列顛首

相麥克唐納 (MacDonald) 氏，在衆院答覆質問時，分明承認了此種事實。

對於這最後條件的爭持，不列顛勞動政府因而解體了；大多數的閣員，都不贊成縮減勞動失業維持費，而主張依其他方法平衡國家預算。奇怪得很，勞動黨內閣對於放棄金本位的事體似乎不曾加以考慮。這原因，也許是由於財政部長斯洛敦氏的勢力過大，以致其同僚不能接納此種提議。在此種情形下，首相納姆薩伊·麥克唐納氏因遇事與其大多數閣員發生爭執，遂決意犧牲這些閣員。他根據閣員們在同意他的主張的理由，向英皇提出內閣總辭職的辭呈。但辭呈甫上，隨即受命爲聯立政府的首腦，這政府包括有前勞動內閣的一部分閣員，有保守黨及自由黨的領袖，但路易喬治這時因病垂危，未曾入閣。

金本位制的放棄 新『國民』政府開始亦未停止金本位制。它成立之始，即重與

巴黎紐約商談借款，這次借款總額爲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償付辦法，與前借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同，以金支付。借款雖然成立了，但倫敦這時的情勢頗足引起外人的驚疑。由是，除外國繼續提款而外，不列顛的財源還繼續輸出，以致在不久期間之內，這宗

新的借款又迅速告罄。結局，負有『挽救金鎊』之權能的國民政府，在成立不久之後，就不迫而停止金本位制——這是早前幾個月就應當採行的步驟，設前幾個月實行此辦法，許多外國金資都不至於流出。

大不列顛之金本位制的停止，馬上就在全世界發生有力的反響。因為，倫敦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大不列顛是各國最大的自由輸出市場，這地位，使金鎊具有極大的國際的重要性。在英國金本位制停止前不久，有許多國家（特別是在南美洲與澳洲），在實質上已算把她們的金本位制停止了。而那些以英國爲其主要出口市場的斯堪底納維亞諸國，如瑞典及丹麥，都在英國停止金本位的數日間即開始步英國的後塵。此後數月，停止金本位的國家爲數甚夥，至一九三一年年終，真正維持金本位的祇有美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與瑞士，德國因受楊格計劃之束縛，亦尙維持着用金的原狀。由是，風靡一時的金本位制，已不復是一種世界本位制，而是限於少數國家的本位制，凡屬維持着這種本位制的國家，馬上就發覺其輸出縮減，並經驗到其失業與困苦有一種可驚的增長。

因為停止金本位的效果，就是那些貶低其以金計算之通貨的諸國，必然要在那些維持金本位制國家市場上，降低其輸出貨物的價格。同時，金本位制國家之輸出的物價，就要依停止金本位制國家的通貨貶落程度而提高起來。所以英鎊價值貶落，以前值一鎊的貨物，可由較少的美金或佛郎而購得，值一美金或一佛郎的貨物，則須較多的英鎊。這一來，國際貿易遂不利於維持金本位的國家，而有利於停止金本位的國家。在英國停止金本位以後的若干時期中，無疑在某種限度產生了此種結果。不過，效法英國停止金本位的國家愈多，英國由停止金本位所收到的有利結果便愈少。加之，整個世界的不況日益加深，世界市場日益縮小，英國輸出者所能掙得的純利就益覺微乎其微了。況且，美國的恐慌情形是日壞一日的，她以前繁榮所繫的原料與食品的『廉如糞土的』(dirt cheap)價格，至是進一步趨於低落，美國市場的如此繼續縮減，那無異促使其他國家進一步陷於困苦狀況中的要因。

英國停止金本位，英國的危機確因阻止了外國的提取金資而得到了某種限度的緩

和，但那對於世界恐慌的救濟却没有何等幫助；不但如此，那甚且加強了美國的不況，從而使世界以金計算的物價更加低落。在一九三一年那種情況下，許多國家之放棄金本位，那是必然無可避免的，並且可以說是必需的。但是，處在那種境地，不惜一切犧牲的維持金本位，那固是愚妄，而現在還主張一經放棄金本位，一切經濟困難即可解決，却是同樣愚妄的。

英國放棄金本位以後的德國情形

英國金本位放棄，德國的情形是更加變壞了。

德國要支付賠款，要償還那包括有龐大的海外投來資本之利息的商業債務，用金或金幣，當然可以對那些廢止金本位的國家占得一些便宜，就因此故，她祇好繼續保留金本位制。但金本位制的維持，却又不免阻害輸出貿易。就德國的實際情況而論，那怕就是停止賠款的支付吧，她要想保持國際支付的平衡，惟一的途徑，就是藉助於大量的出超，爲求出超的增進，乃進一步限制輸入，同時並極力在此不況的世界市場上，在此由各國普遍貶低貨幣引起了新的阻礙的世界市場上，維持其輸出的販賣。然而，要在此種市場上推銷貨物，勢不能不一步緊一步的壓低工資，同時且爲了要在國外以『探併』(dump)的價格出售，乃

極力維持貨物在國內的價格。這些辦法，德國都做到了驚人的地步。然其結果不外是加深德國國內的不況，並使失業者人數迅速增加到空前的限度。

此種情形，在其他許多國家復製出了更其尖銳的事態。澳洲、阿根廷、巴西、智利諸國，誠然不像德國那樣，要償付賠款，但她們對於外人所投的資本，却要支付鉅額的利息與紅利。她們都是食品與原料的主要輸出者，食品與原料的價格的低落，既大大的超過了製造品價格低落的限度，她們要以這些實在生產物支償的債務，就無形增高起來，變成了不堪壓迫的重擔。她們不能由此償還債務了，於是也不能不限制輸入。她們限制輸入的辦法，是更加提高那在許多場合已經够高的關稅壁壘，是對某種物品輸入加以直接的限制或禁止，凡屬爲支付入口貨而仰給於外國貨幣銀行的事，則更嚴厲予以限制。這一來，購買者愈不易得到貨物，貸款者愈不易獲得償付，就令一國對他國某種貨物之需要仍存，而他們彼此間的貿易進行就一天難似一天了。

這諸般限制，對製造國家有很大的打擊，她們出賣貨品益發困難，並且隨即會震驚於

入超的危險。由是，她們也開始提高關稅以攤比與禁制的方法限制她們所允許輸入之貨物的數量。每個國家都希求祇賣不買，都想以本國貨物代替輸入，同時並不欲減少其輸出。這樣，國際貿易的範圍愈益窄狹，各地經濟往來受到障害的結果，就是失業人口的可驚的增加。

而且，與這些困難相伴的，還有銀價的慘落。在數年之內，中國購買力由銀價慘落減了一半。中國的內戰與經濟絕交運動，印度的內亂與不合作運動，都加深了世界市場的凋落，且以特別反動的壓力加在大不列顛之由來已久的輸出工業之上。

大不列顛之停止金本位制，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之繼大不列顛而停止金本位制，那在債務國方面是輕減不少負擔了，她們不復支給債權國以同樣多的金或金幣，並且在用銀的地域，亦因各國貨幣貶價而受有好的影響；但是這些緩和和恐慌的事實，究不足以抵消那些促使不況加深的誘因；由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九三二年冬，全世界是繼續陷在一天加深一天的厄難中了。

第五節 戰債與賠款

前面講過，在世界這種局面下，戰債與賠款的困難問題，是難得有妥善解決的希望。在主要與此問題有關的五個國家——英、法、意、德、美——中，惟有德國以嚴厲的內國統制方法和不絕犧牲其國外債權者，勉強能避免崩潰，而其地位則顯然沒有何等改進。他所能成就的一切，祇不過是倍增其對外的借款。這事實可以說是一種最深入的世界危機，是很

債務之物品價值

年	度	一九〇〇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六	一九三六	一九三九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不列顛的批發物價指數 (一九三三爲100)		三〇七	一九一	一九六	二四八	二四〇	二七〇	二二〇	二〇五
一九一三年百磅債務之價值		壹	壹	壹	壹	七	壹	壹	壹
不列顛的批發物價指數 (一九〇〇爲100)		100	三三	四	四八	五	四	五	四
一九二〇年百磅債務之價值		100	一五	一五	二〇	三三	三三	三五	二九

戰債與賠款

戰債總債	分年支付的總額	總年金百分之四又四分之一之現有的價值估計	
		已經承認勾銷的百分率	
欠美債務(百萬美金)			
大不列顛	四, 六四	一, 一〇六	三, 七六六
法國	四, 〇三五	六, 八四六	一, 九七九
意大利	四, 〇四一	二, 四〇六	五九
比利時	四一八	七六	三五
欠英債務(百萬金鎊)			
法國	三〇	七九	三美
意大利	五九	二七	六
賠款(百萬金馬克)			
德國	* 三, 五〇〇	十二, 三, 六五	三, 一三
			六九〇

* 一九二一年所定 十楊格案中的數字

有伴隨革命可能性之德國經濟組織的解體。大不列顛雖曾宣稱她樂意取銷賠款，但却不

便開罪法國，使其金融危機進一步的加深。法國有許久沒有觸及世界危機的影響。她開始感到那種危機的嚴重乃是在一九三二年的最初幾個月中。可是危機儘管襲來，她却仍是不願意解除對德國的要求，如其美國不肯勾銷戰債，她就連低減賠款的事亦不願加以考慮。至於美國，其商工業的不況和金融的危機是仍在迅速增大的，國內一般輿論，都強烈反對援助歐洲，聯邦政府雖認知了情勢的嚴重，可是爲了遷就輿論，爲了迫近目前的總統選舉，它始終不敢拿出任何創意的主張。

一九三二年的情勢 上所云云，是一九三二年初夏的情形。胡佛總統延付債務的期間告滿，德國還是沒有重復支償的可能。那時，美國顯然不肯勾銷或縮減戰債。美國的態度如此，歐洲各國自然不肯勾銷賠款。她們大家覺得最好的辦法，不外是對於某些到期的償付，再行暫時延緩下來。以當前情勢而論，就是關於這點亦似乎不免要引起多少的爭論。而且，僅是延期償付，仍顯然不能使德國避免完全的崩潰；我們已經講過，賠款即令停止，德國人依舊無法應付各國加擔於他們的其他要求，一九三一年的『停付』協定，誠然

在其滿期的一九三二年一月重新續訂了，但德國經濟制度上的壓力，却繼續在促進希特勒主義，使其在德國作突飛猛進的發展。

賠款問題一時既難解決，德國現有的私人借貸，又不絕有感到提回的威脅，在此情形下，對於任何信用的恢復，顯然是都談不到的。整個歐洲的全部混亂，祇不過是遲早問題罷了。在德國，乃至在東歐與南歐，幾乎逐日都有不履行償付義務的新危機發生。同時，經濟的狀況，金融的狀況，又都繼續趨於惡化。這一來，不經過一種破壞的改造的期望，就一天一天的減少了。

不錯，在六月間所開的洛桑會議中，法國人的態度是有所改變了，這種態度的改變，似乎大可促成問題的實際解決。如其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勢將促進德國的法西革命（Naz. Revolution），其結局，德國不但對於賠款，就對於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其他部分，亦不免要直接的正式的加以否定，這是大家都認知的事實。這事實使法國的態度趨於緩和，使會議能達成一種紙上的協定；不過紙上協定究有多大實際效果，那却就成爲問題，而且賠款

問題即令得到解決，對於潛伏於這個問題裏面的較廣泛的經濟事件不加以處理，那仍無補於歐洲的復興。然而這些較大問題的處理，被推諉到此後待召集的國際會議（如其美國參加的話）身上了。

這諸般情勢，顯然是愚昧不過的，並且一個人如非相信世界革命是當前混亂的唯一出路，那我們無論從什麼觀點看來這種情勢是危險的。不過，實際情形雖然如此，我們要使其改善，究非一國所能為力。這問題的核心，乃在各國不能調協各自國家的立場以達成一種和衷共濟的行動。依着過去數年的經驗，我們不得不同意共產黨的意見：就是，當前的問題不能依照常軌來解決，即是說所有關係的國家，都不肯即時採行一種避免總崩潰的步驟。在當前的情勢下，賠款問題無論是解決也好，不解決也好，賠款總歸付不出來，這是十分顯然的事實。賠款不付，協約各國也定然不會支付美國的戰債；各國不付戰債，美國當不免多所責難；但事實上，責難儘管責難，她結局祇好出以默認。這一來，所有的賠款戰債全行停止償付，一般情勢也許會有一個稍蘇的機，或者使世界有一個充分的考慮期間，以期

對於主要的經濟事實達到一種較為妥善的理解，然而在當前的情勢之下，那怕這種見解亦實未免過於樂觀哩！

況且，任何這類方策的成功，勢必與最近將來之世界貿易，生產及金融狀況，緊相依存。如其因着某種奇蹟，全世界復興起來，物價水準亦實行提高，那像戰債賠款一類問題就在世界經濟上無關重要，其解決亦輕而易舉了。物價慘落與貿易衰退——同一事的兩面——曾經大大增加了一切債務的負擔，同時並縮減了債務者手中的財源。加之，物價一經慘落，一切國家的製造業者，就要堅決要求實施保護政策，以反對外貨的傾銷。由是，在一切債務國乃至債權國中，就相率建立了較高的關稅壁壘，與不絕擴增了輸入的限制。然而，債權國對債務國貨品的輸入，既加以有效的排斥，那債務國所欠的債務，究將何從支償呢？美國一方面希望盡量排斥歐洲貨品，同時又希望由歐洲取償戰債，那是可能的麼？

世界物價恢復，實業家的困難地位，必因之緩和，其結局，他們對於保護政策就不會怎樣堅持；由是縮減關稅，撤消世界貿易障礙，乃可次第推行了。但是要在貿易繼續不況中自

動恢復物價，或者要在關稅壁壘森嚴與債臺高築的現狀下恢復貿易，那都是很不可能的。在實際上，這整個的問題都不能分開來說。世界物價的抬高，固需要世界債務問題的解決，也同樣需要國際間協同的活動，世界所遭逢的困難，是決不會自行解除的。對於這些困難的處理，惟有訴之於各國的共同努力。不過其問題在確定最好着手的地方罷了。關於這個問題的種種方面，我將在本書以後各章詳加討論，但在進行此種討論以前，我第一要追述到現代世界經濟制度的發展，其次要對這通行於世界所有一切大國（蘇俄是唯一的例外）的經濟制度的顯著特徵，加以概括的考察。

第三章 經濟發展的兩世紀

第一節 工業主義的形成

從本質上說來，文明的成長，在其經濟的意義上可以說是對於自然支配的展開。人類之擁有廣大而潛在的生產資源，曾有了許多年代，許多世紀，但可惜他們以前沒有利用這些資源的知識。煤礦老早就蘊藏於土中，此外還有其他許多豐富的礦產。在土壤中，在未被發覺出來的動植物的蕃育與淘汰的可能性上，一向就存在有廣大而潛伏的繁殖能力。汽力與電力是早經存在的，但以前無人知道，也無人使用。迄乎今日，人類已有了關於這些方面的知識了，不管是好是壞，現代西歐的文明，總算是這種知識的成果。但是，我們應該有多少不知道啊！我們已經知道了的，還該有多少人不能利用啊！現在地面上一大部分居民，比如在中國，在印度，在非洲的人民所過的生活，實在還沒有脫離原始生活的形態啊！那怕就

是在那些比較發展的國度罷，她們對於種種不斷擴展的生產力，也還是談不到充分的利用。

不過，當地球上某一部分居民一經脫却其固定社會之束縛與傳統時，這諸般生產能力，就自然有迅速而連續的發展。一種發明可以導來其他發明，由是形成一列無窮發展的聯繫。就科學而論吧，比如應用科學之類，其目的有時即使不在精求經濟之進步，但却不絕導來了經濟領域內的最關重要的諸般發現。現代西歐文明與各種既存在的其他文明之間的顯著差異，就在現代工業主義的本質，不在要求達到一種固定的勻整的完全，而在不絕對自然勢力行使征服。工業主義是不能停滯的，但它一分鐘一秒鐘也不希望停滯。固定狀況是它的致命傷。它常常要靠它自己的不斷發現予以促進，要生產規模日益擴大，要當作安定生產之必要條件的市場無限擴張，要適應生產力發展之經濟組織形態的不絕變更。

自馬克斯時代以來，這種事實，雖早被一切經濟的歷史學派公認為普遍原理，但時至

今日，那些堅欲以固定的全不相稱的條件，去分析這些迅速變動之生產諸力的專門經濟學者，却還有一大部分感到格格不入。現代經濟學說的形成，恰好是當着西歐顯然由舊的環境開始過渡到新的工業主義的時期，在舊的環境中固定的均衡之保持，似乎對於社會生活爲一可能的定式，而新的工業主義則使任何這類觀感變爲幻想，變爲陳庸，那不足以認知新勢力之真實意義，也無從發現一種適於探究這種新勢力之新的概念。正統派經濟學對於探討現代世界問題之努力，其所以不能有何等幫助，蓋不外由於此種原因。自然科學是在不絕進步的，任何固步自封的成見，對於人類必須加以控制的新經濟勢力既無從理解，自更談不到控制了。

假若我們能理解這些新勢力的真正性質，那它們在形成這種勢力以前的突發的迅速活動，顯然與緩慢推移的許多世紀的背景是正相抵觸的。據說，在兩千年前，亞歷山大學派（The Alexandrians）已經發明了蒸汽機關，不過，這機關在當時只當作玩物看待，不久便因無益於世而被人忘記了。羅馬帝國有衆多的人口，且有以地中海沿岸一帶爲中心的

國際市場，這些人口與市場，大可對於機械的大量生產制度和資本主義的交易制度，提供一些基本的必需條件。但羅馬的文明，雖然在灌溉與農業上，在大規模的市場組織上，有了頗大的成就，可是它終竟沒有脫出商業資本的階段，從而，無從夢想到大規模工業生產的效力。中世紀的經濟組織，全都拘囚在牆垣市集（walled towns）與莊園村落的限制中，它之所以在經濟領域內從未脫却一種固定社會的觀念，那是無怪其然的。中世紀的科學，係隸屬於宗教；那時的諸般想像，本質上都帶有一種非經濟的式樣。然則，羅馬帝國在希臘學術基礎上，竟不能建立起一個與其偉大的政治征服相稱的經濟勢力，那究竟是不是有什麼阻止她呢？從物質上說來，我們不能發現什麼阻力；因為一大部分既經提出的解說，都是極其不足信的。那純是不會有的事；也純是從不會有過的事。如其那樣的經濟力量已經開始發生了，地球上決沒有什麼力量——那怕就是野蠻人的侵略——能够阻止其向前發展。

然而，約在兩百年以前，這種長久停滯過來的技術發現的時期，終於在西歐各國，特別

是在英格蘭開始了。至爲何這時開始的問題，那與爲何不在人類歷史上更早些開始的問題，是同樣難於解說。實際上，中世紀之舊的、固定的、地方的經濟，至十七世紀已澈底破除（就中以英格蘭爲最澈底），這很可說是發明時期所以開始的一種解釋。因爲這一來，新生產力發展的人爲的障礙，就破壞無餘了。英格蘭在一六八九年的革命解決下，完成了國內的和平。特別是英格蘭與蘇格蘭併合以後，不列顛的商業，乃可在國境內自由發展。加之，美洲的發現，與東方之海上貿易的擴展，那已大大的開拓了歐洲商業的機會，並展開了一些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的大國際市場，這些市場的廣闊程度，足有形成諸般補充生產物之大規模交易的可能。這樣，一個廣泛的世界經濟基礎建立起來了。世界市場迅速擴展，許多人自汲汲於尋求增加生產的的手段。自凱依（Kay）的飛梭到瓦特（Watt）的蒸汽機，由白克威爾（Bakerwell）的飼畜實驗到化學肥料的發現，其間還有其他許多大的發明。把這些大發明的原因，歸之於世界市場的拓展，歸之於農工業發展機會的展開，那是大體無誤的。不過，這些條件雖大有助於那種既經發端的工業主義的成長，但要用以解釋工

業主義爲何有此發端，那却就完全失常了。事實上，羅馬人之不能適用大規模的生產方法，與現代世界之能從事大規模的生產，都非一種純粹的理由可以解釋。那可以說是偶然如此，並且我們也幾乎祇能說到這裏爲止。

不過，除此以外，我們還能作以次的補充，就是前述那諸種條件，如其不是便利新生產力之利用與發展，則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許多創意的發現，也許不免要逢到以前亞歷山大大的或中國的發現之同一運命，不久即爲人所忘記了。十七八世紀的許多創見之所以首先應用於工業，蓋因這時工業遇有日益擴展的不能以舊生產方法供應的市場，因而渴望利用這諸般創見。當某些創見一經開始利用了，其他的創見就自然而然的跟着利用起來。由一種發明導來其他的發明，每種發明不但有助於增益物品之有效的供給，同時也有助於擴大市場。

況且大不列顛與北美之社會經濟組織的構造，特別利便於那些由人類宰制的新生產力之迅速拓展。工業基爾特制度與土地上之封建制度之崩潰，和市場日益擴張的事實

聯繫起來，造成了一種利便於發明的環境，一大部分有野心的工農業小規模生產者，都急欲求得更多的財富，而不復受任何有力的合理體制的拘束；人們到處都從事實驗，在開始時，機械的複雜與費用，並不像此後之需要著有大量資本，那時備置新機械所需的資本或獲取資本的信用，都是綽有餘裕的。新紡績機也好，較後發明的動力織機也好，甚至蒸汽機也好，祇要是能由小規模生產著有資金的人，或者能由那些用老式貿易致富的商人借得資金的人，都可以自行備置，或由他人租賃。無數的小經營的老板，俱在實驗新的機械。誠然有許多人是失敗了，同時也有許多人成功致富，從而繼續擴大生產規模，並添購那些不絕發明出來的更新的與更多費用的機具，在此種情況下，工業進步的觀念，與個人開創才力和私有競爭經營之觀念，在人們心目中，發生了不能分離的聯繫；這種聯繫，曾強固的存在於此後若干世代的人們的心目中，那怕就是大規模的合股公司與托辣斯發展起來，那怕就是生產技術異常進步，以致使有效生產所需的資源全都控制在那些遠非個人能力所能勝任的基本工業中，人們還是在固執着那種觀念。

在這簡短的一章中，無疑是要描述現代工業主義之導源於其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之商業資本主義的連續狀況。但是於理解當前困難最關重要的一些工業主義發展的特徵，這裏是非補充說明不可的。因為我現在不是敘述經濟史，而祇是要由此顯示出當前經濟制度之錯誤的業作。

從廣義上說來，普通稱爲『產業革命』(Industry Revolution)的大變動，蓋始於十八世紀中葉以迄於現在。我們現仍處在這種變動之中。世界有一大部分地域，至今日始經歷其初期的階段。那怕就是那些最稱發達的國家吧，她們仍沒有完全理解其教訓，仍沒有在組織與生活方法上完全適應其所提供的機會。備有現代生產機構的諸國家，彼此非參組於一種緊密聯繫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殆難期望有健旺而安全的發展，然而這緊密聯繫的世界經濟體系，現在幾乎還沒有初步的成就。機械的威力，全沒有加以集團的指導或控制，而一任其橫行於各國；由是，這種無規制的、沒有被理解的力量，就不但對於增進人類之較完全較幸福的生活式樣沒有何等益助，且幾乎進而破碎了世界，摧毀了世界的

文明。

『產業革命』的開始，係在商業已經由其刺激較高的生產的活動而大大增進了世界財富的時候。日益拓展的市場，日益擴大的市集，對於工業品、農業品之增加不已的產額，造出了一大需要。因此，在當時人民一知道應用改良機械於工業上面，一知道發展水力乃至汽力的用途，增加可耕農地的產額，並為肉食品、羊毛、生皮及牛酪等而改良動物的保育時，種種新發明的要求，遂在所有那些有充分和平保障及內國秩序能促進其經濟發展的地域強烈高揚起來。就歐洲而論，大不列顛是完全具有這些必需條件的。獨立戰爭甫告結束的當時，合衆國所具備的這些條件，比大不列顛還要充實。拿破侖戰爭的結果，新的生產力是受到了不少的阻害的。就在隔離大陸的大不列顛，亦因戰禍與歐洲市場長期的封鎖，以致影響其財政，從而在某種限度妨害其生產力的發展。不過，與大陸各國比較起來，大不列顛總算是受害最輕的了。她的領土未被侵略，她之獨立於封鎖政策以外，那是她在十九世紀初期即已在新生產力發展方面，對於所有其他各國確立了長期優勢的主要原因。

英國是以她的農業見長，曾有一個時候，她也優於造船業務。但是，美國人口是稀少的，美國人的主要注意當時仍是集中在農業方面，而非集中在工業方面。由是，大不列顛在機製品的世界貿易上遂一往直前，幾乎沒有與其抗衡的敵手了。

所謂『產業革命』，其開始時實是兩重的運動，一是工業方面的，一是農業方面的。在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大不列顛之較大的棉花與羊毛的紡織工業，乃至煤礦與鐵的生產，誠然都革新過了，但同時在這諸種工業革新的影響下，農業亦遭遇了非常的變動。敞地與公共場所的圍圈——鹵莽滅裂的推行着，全未注意其對於農村人民的後果——無非是對於有利的土地開發機會大大擴增起來了的一種反應。而戰爭需要擴大和歐洲荒廢所惹起的缺乏，自然會導來高昂的戰時物價；這種高昂的物價，恰好又是對於圍地運動的一大刺激。不過，從根本上說來，圍地運動的進展，究還是由於農業知識的進步。有了進步的農業知識，人們乃不甘採用以前耕作與畜牧的傳統方法，乃進而創行那些便於更有利的利用土地之租地法（land tenure）的條件。伴有圍地運動之農業方

法的改進，在動力蒸汽機刺激下所形成的織物、礦物、金屬工業之迅速機械化，構成了『產業革命』的第一個形態。

當『產業革命』進到第二個形態時，就在大不列顛亦還沒有完全成就第一期的變動，而在歐洲其餘各國，則不過剛剛開始罷了。這第二個變革的形態，實質上就是包含着新動力由生產上移到運輸上的擴展。工業與農業產額日益增加，既經存在的運輸手段，遂愈加顯示其笨拙，愈加成爲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迨至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這個問題始由蒸汽機關與金屬工業之生產資源的應用得到了解決，自是水上陸上的交通手段通同改良了。鐵道與汽船，火車頭與鐵甲艦，把世界全裝置起來，使它在更大部分的地面上，能以更大的速度運載更多的貨物。貨物由水上運輸，不但其運費較爲低廉，且手續較爲容易，時間較爲迅速而確定，而陸上運輸的改革，則尤達到了一個更大的限度。總之，新式運輸手段的出現，致使廣闊的諸大陸的內地，都開拓爲國外貿易市場，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單一的經濟單位，由是一國的繁榮，愈益有賴於國際的情勢；每個經濟問題，都成爲世界的問題，都要

求國際的協力的解決，如其有一部分國家反對協同動作，那整個世界就難免陷於全般的混亂。

第二節 經濟的帝國主義

『產業革命』的第二個形態，實在與運輸發展及對運輸提供有效手段之金屬貿易發展，保有不可分離的關聯。在十九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世紀中，煤、鐵與土木工程，建立了新運輸系統的基礎。在一八二六年與四十年代初期，大不列顛已經大體築成了她全國的鐵道幹線，此後，她乃開始利用其既經獲得的技術與經驗，對世界其他各國從事有利可圖的建設鐵道的工作，像柏拉塞（Brassay）那樣的大鐵道承建者，當他們一在國內發現沒有多少承建契約可訂時，馬上就開始把視線注集到國外了。但鐵道對經濟發展的期待雖然是異常之大，經濟未發展的國家，要想拿出現款支付這繁巨的鐵道建設費用，那是難於做到的。在此種情勢下，那些由先前冒險事業致富的不列顛人民，乃不但供這些落

後國家以技術，且更貸以借款。由此，不列顛的資本，不列顛的技術家，不列顛的技術勞動者，遂擔任起各國建築鐵道的業作，即是他們以新式的運輸手段，裝置了大部分西歐國家，以後更裝置了印度與阿根廷，裝置了中國、非洲以及世界其他許多地方。

鐵道與資本主義 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上，鐵道建設實在占有異常重要的地位。從一方面說來，它是使世界遼闊諸洲的奧地成爲貿易市場的手段，它與汽船聯絡起來，使新大陸、非洲以及東方的原料與那些具有生產能力的事物得供歐洲的利用。在另一方面，因爲動力生產由此迅速廣被於全世界，它對於資本主義之企業組織和海外投資事業的發展，乃具有決定的大影響。

就推進國際貿易之功能而論，鐵道所扮演的角色，那是比汽船重要多了。大部分汽船，雖亦能以頗大的速率裝載大量的貨品，但它所走的是熟識的商業航線，而不若鐵道之能在世界地面上大大的開發商業。鐵道未出現以前，工業主義祇不過是點綴在最進步國家之沿海岸一帶而已；既有了鐵道，世界各洲的內地，乃漸趨於工業化，或者說，極度的商業化。

了。尤其是在美洲合衆國，那裏之成爲進步的工業國家，鐵道殆爲一有力的動因。

可是鐵道的發展，對於企業組織機構上之影響亦極關重要。卽如在十九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世紀中所建樹起來的大不列顛鐵道公司，就其企業機構而論，誠然是仿模先前稅道托辣斯與運河公司，爲了要取得一種侵蝕私人權利，完成其整個系統的權力，這諸般的組織，都曾由國會所通過之私有案而被賦有一種特權。不過，鐵道公司在實際上却是向着新的異樣的方向而發展。新鐵道建設計劃所需的鉅額資本，祇有求之於大眾，求之於一大部分有錢沒有用在他種工業上的人們。一般向大不列顛新興中等階級徵集資本的鐵道創建者，居然創用了一種典型的現代合股公司，其股東與債券所有者散在各地，他們的人數太多了，他們的居處太分散了，以致對於公司的活動不能作有效的控制，而僅僅從金融財政的觀點與公司發生利害與共的關聯。鐵道債券與鐵道股票同經驗，對於合股組織之一般公認，對於所有工業上有限責任之由一八五五年不列顛公司法案的最後允許，都算是提供了一個基準。自然，除鐵道上的合股組織以外，也還有其他首倡的合股經營——

像煤氣公司、自來水公司之類就是實例——不過，在合股制度的發展上，在大眾投資的傳播上，鐵道合股組織實在是居於主要的地位。

至關於資本供給之國際化，鐵道亦可說是盡了同樣重要的功能。不列顛之海外投資，本來是在鐵道出現以前就開始了的，當十八世紀時代，不列顛已有私人在西印度與北美洲從事投資活動。拿破崙戰爭後，海外收益頗豐，就中甫脫西班牙羈絆的南美諸邦，尤足爲美國貨物之有希望的日益拓展的市場。但是，在海外鐵道建設時代以前，除了以政府公債形式借款或由純粹私人冒險從事經營——如西印度種植事業——外，實不見有何等海外投資的事實。不列顛投資者開始用金錢從事外國的工業經營，主要是在海外建築鐵道。鐵道工業一經開始，於是乃迅速擴展到其他工業方面。在現世界的經濟發展上，資本輸出占有一個重大而不絕增進的地位。而且，投資國外與投資國內，同是以鐵道事業爲其嚆矢。

資本的移動 在這種海外投資的大運動上，擁有大量剩餘資本的不列顛，當然是占着領導地位的唯一國家。她輸出貨物力量之迅速增長，給予了她的必要財源。不過，她

要在一個比以前貧困得多的世界發展其對外的輸出，勢必要貸與其他國家以購買其所售貨物的手段，並且要以能獲得遲延的報酬（即所貸出借款之利息）為滿足。我在前面講過，這種海外的借貸，在初期祇限於公債，自鐵道出現以後，始不絕擴展至工業部門。在一八五〇年，不列顛資本家對外的投資，大約已經達到了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中主要是政府公債，至商業礦業上的投資，不過占有零星小數而已。據最可徵信的統計，一八七六年的投資總額，計已達到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在一八六〇年與一八七六年之間，倫敦市場上移作新的海外投資的金額，約為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大宗金額的當中，由鐵道擔保的政府公債，占一半以上，而所有其他方面的投資尚不及一半。單是合眾國的鐵道，計已吸收了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而有餘，由是鐵道的擔保，就容易占有次於公債的地位。在一九一四年，不列顛投資者之海外投資的估計，至少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中由鐵道擔保者，占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由政府公債形式投出者，占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大不列顛在一九一四年的海外投資總額，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及她一半。法國約計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德國約計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合衆國約爲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合衆國的這宗國外投資，主要是投用在南美與中美。而德國法國的國外投資，則多半是投用在歐洲及其殖民地帶。但不論那個國家，其投資總額總有一大部分包含鐵道擔保，此外還有一部分是爲建設國有鐵道系統而進行的政府公債。法國除了在她自己的殖民地以外，曾限定其國外投資於公債及資助俄國經濟發展的方面。德國對於國外投資的分配，是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保持均衡，這種投資，曾賦與有一種固定利率保證的優越條件。大不列顛的投資形式，則與她們不同，那是廣泛的分佈於世界所有的國家，公的私的，各種各色的股票債券都有。

這鉅額資本向海外移動，當然要加速促進比較後進國家之經濟的發展，並且會在比較發達的地域益加刺激那些生產資本財貨之工業的擴展。就大體而論，投資海外，實係金錢集中於比較富有者手中的結果，他們一方面增加貯蓄，一方面限制國內消費品的市場，

由是遂激勵起一種常向海外探求新市場的經濟體系。假若工資曾在較舊國度中較迅速的提高，那整個世界之財富總體的增加也許要較為遲緩，而比較後進地域之工業化，勢將不免趨於停滯。但是，現在較進步國家的財富是應當更妥善的分配的，她們彼此之間應當少作國際的抗爭，少作帝國主義的活動，少欺凌弱者，少撒種些戰爭的種子。

國外投資是一種盛舉麼？是的，較富有的，各種設施較充實的國家，對於那些比較落後國家的發展予以幫助，那顯然是一種盛舉。並且，她們從事此種資助落後國家的活動，理應不使那些受資助者屈受其政治的支配，也理應彼此之間不為權利而互相抗爭。但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却不是如此。比較落後的國家，並不會多向比較進步的國家貸款，她們借得的債款，有時竟是違反其意志的一種強加的負擔。同時，貸款的進步諸國，且為其國民爭得此貸款的權利，時常發生糾葛。由是，在比較落後國家進行的事業，不但其資本是由他國所供給，其管理亦係由那些在貸款國登記過且受其支配的公司所控制。至事業的利潤，則是由這些資本供給者匯回他們本國。事業所由進行的國家，如其不是公認為完全文

明的國家，她就勢必要屈伏於投資國的警察，甚且在公開的或假裝的保護形式之下爲其實行吞併。她本國的市民，無論出於自願抑或反其志願，都被迫而替外國資本家從事勞作；有時其稅收的一大部分尚須劃作支付外國資本利息之擔保。降及十九世紀下半期中，世界未開化民族，乃至那些比較西方經濟進步水準落後的國民，愈益不能忍受壓迫了。歐洲一方面在自己領域內高唱國權與民族自決的權利，同時對於非歐洲的人民，則否定其權利，禁止他們同樣利用其土地與勞動之潛在的富源。不但如此，她並且認定強制開拓那些由非文明人所占有的地域，即令反乎當地人民的意願，亦算是履行了白種人的一部分文明的使命。

自然，從具有大規模生產信念的歐洲人的觀點看來，他們是有取那種態度的原因存着的。現代工業主義的發展，必須具有兩個條件：一是要能夠爲其製品找到日益擴大的市場，二是要能夠用其製品換得充分的食物與原料；所以，他們不但要求美洲原野地的產物，澳洲農場的產物（那裏產業被沒收的土人比較還少），且要求非洲熱帶的產物，要求馬來

亞(Malaya)與荷屬東印度的橡皮，此外，還要求那些人口稠密，但非在白人干涉的刺激下不能希望其有充分剩餘生產的國度的許許多多的物品。就因此故，歐洲人所以不能讓那些土著居民不知利用其故土的廣大經濟機會。在他們看來，土著居民要提高其文明與財富的水準，就祇有學着利用其擺在面前的富源；這種教導責任只有白人能夠擔當。白人就負有這種使命——這是爲了世界文明，同時也爲了自己發財的一種使命，一種與工業主義必然發生聯帶關係的使命。依照此種見解，民族的自決，就祇是對於那些能够睜大眼睛看清其主要經濟機會的人民才有利益。對於民族主義之感情的尊重，決不許其盤桓於工業系統的文明境界。

帝國主義者的抗爭 不幸，白種人履行其文明的使命並不像軍隊那樣統一起來。他們爲了取得開發落後地域的權利常相互爭論，甚至訴諸武力。整個非洲都被瓜分了；列強在瓜分非洲的業作上，雖未導來實際的戰爭，但却不曾除去戰爭再發的威脅。在一九一八年，德意志殖民帝國爲戰勝諸國分割了，吞併的形式，雖然被隱藏在委任統治制度的假

帝國主義國家的發展

總之十九世紀下半期的顯著特徵，就是一種新形態的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在一八八四年與一九〇〇年間，不列顛帝國的領土，計增加了三百七十餘萬方英里，而在這增加的領土中，包括有五百七十餘萬居民。法蘭西增併的領土為三百五十萬方英里，其所屬居民則超過三千六百餘萬。德國向外擴張領土的情形，比較沒有其他帝國順利，她主要在非洲所建立的殖民領地約為一百萬方英里，居民則將近有一千七百萬。合衆國兼併了古巴、菲律賓、夏威夷以及阿拉斯加。意大利追隨英法之後侵入北非。俄羅斯與大不列顛為波斯而發生齟齬，為阿富汗斯坦及小亞細亞而發生糾葛。法國、西班牙及德國曾在摩洛哥互相角逐。在里阿普爾德 (Leopold) 治下之比利時，曾拚命拓展

剛果的國境，那種舉動，就在一個帝國主義者的世界亦是不免有些羞澀的。直至一九一四年，地面上未被一兩個『文明強國』佔據的地域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像堅果一樣，耐得住現代文明摧殘的中國，那算是一個大例外，但中國正因為沒有瓜分，遂做了列強糾紛與抗爭的犧牲。就全世界而論，經濟的帝國主義已經成了世界政治上的主動力，而隱在帝國主義背後的就是不絕增大起來的戰爭的威脅。

第三節 大不列顛德意志與遠東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上，對於新運輸方法之影響的研究，使我們由鐵道與輪船的勃興一直敘述到今日的世界。但『產業革命』有一個特徵，即是在它發展過程上的每個連續的形態，並不是對於以前行動着的勢力的代換，而只是對於那種附添的新勢力的代表。運輸祇是一種物質進步的手段，運輸的發展並不會代換生產組織的機械化，也不會代換農業方法的改良，不過它却以空前的速度促成了這兩者的進步與擴展。因為市場擴大了，貨

物由海陸運輸的速率加大，費用減低了，貨物的生產就會因此運輸改進而增多；而基於貨物之國際的相互交換的國家與地方的分工，亦會因此運輸改進而加強。所以我們在此還可這樣的解說：就是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中『產業革命』已進入了第三個形態，在這個形態上占着主動地位的，不是生產，不是運輸，而是這兩者合同動作，使工業主義以空前的速率向着更大的領域擴展。這時期德國的工業化，根本是基於金屬工業與鐵道，而後者最大的成就，就是促成了那種使德國經濟組織統一起來的關稅同盟（The Zollverein）合衆國自由鐵道開拓了她內地一切閉鎖情形以後，她遂能為其本國市場着手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同時並能為其食品與原料開拓國際的市場。自此以後，她的人口增加，工業發展，她益發能自給自足了。這樣，她的經濟組織乃比較偏向於國內，工業品與農產品的相互交換。美國的保護關稅，以及她幾乎到現在還能支持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能力，使她大體能够離絕歐洲錯綜複雜的經濟關係，而無須汲汲於從事建立大殖民帝國的冒險。迄乎今日，美國對於她所有的能力，幾乎都能在國內找到充分的發展機會。世界的市場，世界的經濟情勢，雖對

於美國不無關係，終沒有對於大不列顛及德意志那樣的壓倒的重要。至於法國，她因為堅固的支持着農業，和繼續屬意於小規模工業，故對於世界市場的依賴，亦遠不若英德兩國之甚。法國重工業在法國經濟政策的編組上，能够充分表現一點決定力量，那是在一九一八年兼併了亞爾薩斯洛林以後的事。不過，我在前面講過了，法國是一個資本輸出的國家，並且是一個廣大的殖民帝國。這些情形使她對於世界的經濟問題，保有非常確定的關係，而在美國，她却大體能够居於比較自由的地位。

在十八世紀中，法蘭西與大不列顛曾是商業上的勁敵。不過她們彼此之間的直接事件都由拿破崙戰爭解決了。至十九世紀，她們的經濟制度的分道揚鑣的發展，使她們對敵的原因逐漸撤銷。新的工業主義把德意志與大不列顛變成了經濟上決死的對頭。德國的工業發展是遠較大不列顛落後的，就因此故，她一走上工業主義的旅程就直接的不可避免的要與不列顛引起最尖銳的經濟的對立。不錯，德國在紡織業方面是不會嚴重侵害不列顛之優勢的。但她集中全力所發展的工業，却正是那些在國際貿易上會驅除紡織業之

原來優勢的工業。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柏森麥與西門子法（The Bessemer and Siemens processes），至七十年代之基爾克利斯特（Gilchrist）與湯姆斯（Thomas）的發明，都是製鋼上的新的大發現，這些發現恰好都做了新德意志工業主義的基礎。大不列顛要想適應那些對於鋼之大量生產的新機會，勢非廢棄並重新裝置其大鐵工業不可。在鋼鐵的新時代，大不列顛乃與德國爲控有迅速擴展的世界市場而開始對等的爭衡。德國因擁有亞爾薩斯、洛林與魯爾，不久即迅速跑到了大不列顛的前面。在八十年代的中間幾年，不列顛之鋼的生產，仍爲德國之鋼的生產的二倍以上，且仍對美國占有優勢（後者的鋼產額，實際全是供應國內市場的需要。）但至九十年代中，美國的生產頗容易的超過了不列顛之生產以上，至二十世紀初頭，德國之鋼的生產亦駕大不列顛而上之了。同時，其川鋼工業異常發達，就這樣，在廣泛的機械製品的世界市場上，德國的生產者就變成了大不列顛生產者之最重要的勁敵。

在經濟帝國主義新時代之政治關係上，英德對抗成了一個主要的成分。不過從國內

的情形說來，這兩個世界製造品市場之勁敵的經濟組織，絕對是兩樣。德國有一個保護政策防衛的國內市場，而同時英國則允許任何國家的貨物自由輸入。德國仍是一個債務國，由海外借入資本，同時英國則對海外作大規模的投資，她主要由貨物形式吸收其海外投資的利息。德國人這時確也開始在海外投了相當數額的資本，但她所借入的仍較其所投出的爲多。除此以外，英德兩國還有一個更有意義的對照，就是依據自由放任主義，英國的工商業很少受國家的干涉，反之，德國的工業商業的發展，却正是由於國家的鼓勵，並且大體還受着國家保護。英國的鐵道是私人所有的，是相互競爭的，而同時德國鐵道則是屬於國有，由國家自行管理。英國的銀行與金融，大體是採行國際化的形式，其目的在藉此調劑外國人間的交與關係，乃至本國工業與商業上的金融困難，但德國的銀行，却顯然是看作促進德國生產與商業發展的一個輔助機關。托辣斯與聯合公司一類組織，雖然大不列顛也有不少，但仍不免爲社會輿論所鄙視，且不能取得法律上的裁可；可是像在德國的卡特爾以及與卡特爾相似的工業組合，那却是由於國家的積極提倡，即如在有名的倫利希。

威斯特斐倫煤卡爾特 (Rhenish Westphalian Coal Cartel) 中，實際就有國家的參與。德國是有一大些農民的，她對於農業是如同對於工業一樣的保護。大不列顛不然，她的一般農民老早就歸於消滅了，所有各種形式的農業完全是任其受世界競爭的摧折。總之，在十九世紀初期形成的大不列顛企業者的性格是非常個人主義的，同時他們却又帶着這樣一種國際主義者的色彩。就是，他們這班生產者，總以為他們要與世界市場發生關係，因而不大注意政治的國界。反之，德國企業者的性格却帶有異常濃厚的國家主義的興趣，故他們對於自己某種目的的实现，總以為要期望那種在國家鼓勵與保護下的集團行動。

這種集團活動的性向，使德國在重工業方面成就了非常迅速的發展。重工業對於大規模的組織方法，遠較紡織業來得方便。因為把紡績廠或毛織廠擴大起來其利甚微，而金屬工業上的技術的變異，則非大大擴展生產單位，不易取得廉價的效果，而且在每個特殊工廠的生產上，都是需要進一步專門化的。這種趨勢不但要大量蓄積資本——在這點上大不列顛要比德國優越多了——同時且要同業諸組合間有一種合作的精神——在這

點上大不列顛就遠不若德國。不錯，至一九一四年爲止，大不列顛的金屬工業與機械工業還在非常迅速的繼續發展，但德國在這些工業方面，却剋凌於前者以上，且每年還不絕增大其世界市場中所占的分額了。

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爲止，新的工業主義還祇在西歐立下基礎，合衆國的工業却不過粗具形體罷了。若干世紀以來，遠東對於歐洲的重要性，就在爲其精細的紡織物、奢侈的食品以及少數容易運載的原料品，供給來源。由紡績工業勃興以至十八世紀末爲止，那裏還是頗關重要的市場。在十八世紀的非洲，主要是一個獵取黑奴的場所，由那裏捕獲的黑奴，都賣往美洲從事墾植。至黑奴貿易禁止的十九世紀初期以後，它的商業重要性穩縮減下來。加拿大是一個人口稀少的農業國家，她的出產是羊毛與木材，至一八四〇年後方始有少量穀物的輸出。她的唯一重要工業是造船業，自金屬建造汽船的新式造船業產生，她這種工業就歸於淘汰了。澳洲與新西蘭的人口還不到二十萬，雖然它們的精緻羊毛生產已經開始，但在一八五一年金礦發現以前還是沒有多大的經濟價值的。就南美洲而論，巴西

在十九世紀之初即已成爲一重要市場。她與阿根廷、智利、祕魯的貿易在不絕擴展，不過，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前，這些國家都還是停滯在經濟發展的原始階段。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半世紀中，除了美洲合衆國的廣大發展，和大不列顛與德國之工業迅速發達外，我們還目擊到了現代商業與工業方法之加速擴展於一些新的國家。幾乎長期與世界貿易絕緣的日本，她在這個時期勃興起來了，她不但對外國商業開放其港口，且還異常澈底異常迅速的採行了西方世界的生產技術。不列顛的資本，在印度裝置起了網狀的鐵道，並開展其爲西方所需要的生產資源。歐洲人所侵占的非洲，以前祇限於近接海岸的若干地域，但此後侵占範圍擴展，一直到全洲都爲歐洲列強所吞併。俄羅斯一向被稱爲歐洲的倉廩，她向較富厚的各國借入資本，建築了貫通歐亞廣大領域的鐵道，她並企圖在極高的保護關稅之下成就她自己的現代工業。如橡皮，如機油一類新商品的出現，使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墨西哥、波斯、緬甸的經濟重要性陡然大大增加了。商業已不復限制於舊的貿易航程，行駛海洋的船舶，把福利與罪惡參雜的現代文明，載到了一切海角天涯。

鐵道建設熱充滿世界，且由是展開了對落後國家大投資本的機緣。在十九世紀初期，貿易大抵是以貨物與貨物交換，此後則有一大部分是依靠着先進國家市民之海外投資。這種海外投資的結果，竟導來了一種可怕的帝國主義的再生，和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行使政治的干涉。因爲，你如售給某人以襯衫，這個交易算全部完結了。但你如售彼以鐵道，彼就能夠希望售價在一個長的時期內分期付款，這樣你就可以繼續由他所運轉的鐵道方面收得利息。在這種情形下，投資國對債務國乃持有利害與共的關係，並且會視債務國之秩序而有信用的政府的存在，爲其財產權利之保障。加之，先進國爲了獲有其製品銷售的市場，和其所需原料食品之供給的來源，她隨時皆在設法擴大其殖民領地，有時她甚或單純是爲了阻止旁人侵奪那種地域，卽是她打算將來要侵奪的地域。

經濟的帝國主義之興起 十九世紀後半期之帝國主義的再生，實在不是由於政治態度的無故變動。帝國主義的深固基礎，乃存於世界各國之經濟關係中。柯柏登（Cobden）布萊脫（Bright）以及大不列顛與他們同時代的大多數人，都曾抱有這樣一種信

念就是他們相信一切白人殖民地像合衆國在十八世紀所做的一樣，宣布獨立，變為主權國家，那祇是時間問題。他們這班人並不反對殖民地的這種活動。因為他們曾認定：貿易如其不遭受任何政治的壓迫，那定是發展更快的。除印度外，所有包括在不列顛帝國之內的土著地域，在初期維多利亞時代的人（Victorians）看來，並不感到有何等利益。而他們在印度的主要利害關係，無非是為蘭開夏（Lancashire）的棉製品擴張市場。他們觀察世界，完全是用一種製成了的消費品的貿易者的眼光，至其所奉為圭臬的自由放任主義，則不過是由他們經濟野心所必然導來之結論而已。

在大不列顛的情形雖然如此，但在其他採行新工業主義的國家，却發覺她們對於大不列顛乃是立於比較不利的地位。她們的工業領導者，覺得在自由的世界市場上，難於和不列顛競爭。並且她們自己也沒有足與不列顛相抗衡的殖民領地。她們一方面保護自己的工業，阻止來自大不列顛的輸入，同時更着手使那些已經為她們獲有的殖民地，變為專於消納自己貨物的市場，不許其他國家染指；此外，為了保障更多的保護市場和有利的投

資地帶，她們還設法取得更多的殖民地。大不列顛是相信她的工業優越性和其較迅速與較大規模之投資能力的，她沒有感到有對外貨封鎖其殖民市場之必要，那怕就是在對她自己貨物課稅的地方，亦是如此。但是新起的殖民帝國，如德意志，如法蘭西就完全兩樣，他們的殖民領地，差不多全變成了她們母國之貨物與資本的獨占市場。

這種事實，並不是說大不列顛不受帝國主義發展的影響。恰恰相反，她這時亦着手吞併新的地域，在各處修建帝國鐵道，並設置許多公共經營，以便爲不列顛的資本，爲不列顛的生產資本財貨的諸般工業製品提供有利的出口。不僅此也，她的活動，並且不限於帝國領地之內。阿根廷主要做了不列顛的資本與機械的市場。在中國，在印度，甚至在那些屬於其他列強之殖民地帶（如荷屬東印度），都可發現不列顛之投資的活動。

合衆國——她大體上是籠罩在高率關稅下的一個自行集中的經濟單位，是『世界最大的一個自由貿易的地域』——的勃興，歐洲工業主義與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勃興，以至英德對立形勢的發展，都是一些劃時代的事實，我們如把這些事實擱在一邊，那末，戰前

數十年最顯著的經濟事故，就可以說是遠東方面之工業化的開始了。大不列顛十八世紀的種種征服，使她幾乎完全獨占了遠東的市場，這些市場對於開闢之高度機械化的紡織工業都是極關重要的。此外，大不列顛是遠東產品的主要輸入者，她把這所輸入的產品，再輸往歐洲與美洲。印度乃至中國，通為不列顛資本投注的重要區域。在一八四二年吞併的香港，簡直成了不列顛對中國南部貿易的大倉庫。中國迫而把上海及其他某些港口都為不列顛商業開放了。一八五三年封鎖的日本市場的開放，蓋由於以美國人為領導的西方人的強迫。日本在一八六七年的革命以後，迅速轉變為一個進步的經濟的與軍事的強國了。日本人以異常澈底的進取的競爭精神，努力採行機械生產技術，並應用西方之商業與金融的方法。她的製銅、造船，乃至機械等工業，都繼紡織工業擴張起來。藉她充裕的廉價勞動的惠助，她在遠東方面建立起了輸出市場。迨戰勝俄羅斯帝國以後，她遂一躍而為帝國主義國家了。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那是她在世界舞台上有了新的重要性的佐證。此後，工業主義開始逐漸擴展到印度與中國，迨至歐洲大戰發生，歐洲對遠東的供給受到阻

害，這一來，遠東方面的工業生產大受刺激，而橫遭蹂躪的關開夏製造業者，簡直離絕了他們一大部分最重要的市場。大不列顛在金屬工業與機械工業上既已感受了歐洲的與美國的競爭的威脅，現在在紡織工業方面又受到亞洲生產之威脅，亞洲這種生產可以利用極低廉與長時間的勞動，那在競爭上更使她容易受到打擊。

不過，工業主義在中國與印度雖然和在日本一樣的開始了，但其進步至為遲緩。印度與中國之最大多數的人民仍然是固着在土地方面，就是她們的製造業的生產，大都還是採行手工工業的形式。例如，中國在工廠中生產的棉製品的數量，雖然增加頗速，但與其用手織機所生產的數量較量起來，却就頗不足觀了。在印度也是如此，我們就令把甘地先生（Mr. Gandhi）宣傳的效果置諸不論吧，她現在的手織機，仍然要供給其全國極大部分人民的需要。特其在工廠生產方面有極大進步的，與其說是織機，却不如說是紡績。

遠東的競爭 不過，在印度與中國的這種手織機生產的繼續活動，那對於西方各國，特別是對於大不列顛的輸出者，就同日本之工廠生產活動一樣的要引起嚴重的競爭。

因爲中國與印度之工廠，在效率上雖遠不若日本工廠，雖更不足與歐美工廠相提並論，但其過於低廉的勞動費用，却使她們能以極低廉的價格發賣，若在技術比較無關重要的粗製品上，那就更有此種效果。蘭開夏在戰前的廉價品的遠東市場，定有一大部分爲日本，中國與印度的紡織工業所侵奪去了。不但如此，遠東方面的競爭，一定會一天天的趨於激烈，並且在相當的時期內遠東的工廠不但生產比較低廉的製品，且會生產更昂貴的製品。真的，從表面觀察起來，令人驚訝的事體並不是工業主義在遠東的進步，而是在遠東不會更迅速的進步。因爲輓近工業技術上的變動，確實要相對的縮減先進國家的利益。嶄新的自動機械，一方面減少了技術勞動的需要，同時却使遠東方面更容易有利地利用其比較不強固不技術的勞動。由此看來，遠東工廠制度進步遲遲的真正原因，就是由於它們不能找到更迅速發展其工業的資本。它們在國內斂得的一大部分蓄積，都要用以償還過去由西方列強舉借外債的利息。它們要擴展工業，勢須向國外舉借新的資金，不過近年中國與印度的政治情形的欠安定，使它們在舉借外債上發生障礙，至於工業主義較中國印度發展

迅速得多的日本，她却又爲其增加極速的工廠制的產品找尋市場，而發生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困難。

在世界比較後進的國度，其基於現代動力生產之工業的發展，顯然還祇進到最初期的階段，由是在世界經濟的地位上也顯然要日益增大其影響。像蘇俄今日所進行的五年計劃，那是包括着工業與農業之整個經濟的澈底改造，使其在使用最進步形態的機械動力的基礎上從事大規模的集團組織的活動；我們沒有理由說中國與印度永遠不應照着蘇俄這種做法。誠然，這在今日是有許多嚴重困難的。就蘇俄來說吧，她盡量壓縮其極大多數人民之生活水準，猶難得籌集充分資本以完成其野心的工業改造計劃。但蘇俄人口還較遠東各國爲稀薄。遠東如中印各國之人口既稠密，其密集的農家經營又復限於極小規模，且貧困達於極點，要像蘇俄那樣進行包括的經濟發展計劃，其困難一定更大。中國印度無論是否仿行蘇俄式的趨於澈底的共產主義，抑是要更迅速的成就資本主義的發展，都非大大集中政治權力以期造出便於實施這類經濟改革的環境不可。這些地域的工業的發展

展，在最近將來至少可以做到這種地步，即促成西方與東方之許久以來之商業關係的改革，並使東方各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上處於一個完全新的地位。實行上的困難儘管再大，誰能說中國印度在最近的將來不會完成一種便於實施蘇俄那種經濟計劃的政治革命呢？世界各地所受蘇俄思想的影響，以遠東方面為最強烈。要把這種思想適用到印度與中國之不同的經濟環境上來，雖然必須經過一番修正，但要懷疑印度中國始終不會有從事此種修正工作之充分力量與自主權能，那是沒有理由的。

第四節 機械與人

在歐亞兩洲交界的烏拉山脈 (The Urals) 之旁，有一個稱為麥尼拉哥斯克 (Magnitogorsk) 的市鎮。這個市鎮照計劃是住二十五萬居民。在數年以前，那裏並沒有什麼市

集，不過是地面下蘊蓄有未經開發的一大鑛源之空曠鄉野而已。然在今日，它却像是因了什麼奇遇，使它那裏集中有許多大規模的礦務工程，並還設備有歐美最新式機械的工廠。在這些新工作場的裏面及其周圍，有許許多多的男女在辛苦勞動，他們想迅速的把這個荒野地域造成一個廣大的新的機械動力的中心。在整個蘇俄的境內，滿佈了這種情景：幾乎許多世紀以來沒有多少變動的原始狀況，現正迅速過渡到一種有偉大動力做基礎的新的文明。那些支配這種新發展的人們，都在殫精竭慮的把最新的技術方法，應用到機械製品的大規模的生產方面。

蘇俄今日之向着這種新文明邁進，其步驟是空前急遽而突躍的。她不畏艱難，想直接由最原始的生產方法過渡到最進步的生產方法，歐美各國曾經緩慢經歷過來的中間階段，她是要統統跳過的。美國、大不列顛或德國之進步到今日這個地步，幾乎在機械生產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了兩個世紀，但蘇俄在實際上却企圖一躍而走到她們前面。因為她對於新的工業主義，是動員其廣大國境的全部資源，並在單一而包括的計劃下，在完全統一的

統制下發展其所有一切的新興工業。同時，在其他工業國家，大多數的私有工業仍然是由一些獨立的公司經營，統一計劃的地位被一種至近年始漸趨軟弱的信念所代替了，那種信念是說：每個企業如有追求其個人利益的自由，那末，藉着一大些混亂的且往往相互衝突的努力之先在的經濟協調，定然會造成某種限度的秩序與進步來。

蘇俄已決心由原始的農業文明一直跳躍到電氣與巨大動力的時代。在共產主義者領導之下，她已在數年中完成了大不列顛由兩百年逐漸進步所完成的一切，甚且還超過了這一切。因為在兩百多年以前，大不列顛的全般機械發展情形，那比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還要進步多了。

特蘇俄今日有進行此突躍工作的可能，蓋因空前進步，正為現代機械發展的特徵。當動力機首先應用時，無論就現代那種標準來說，其進步是異常緩慢異常遲疑的。於十九世紀物質進步所關至鉅的瓦特蒸汽機關，那並未成就一種急速的進展。就在大不列顛，其用途亦是經過許久許久才漸趨普遍的。這機械在它被發明以後五十年，還有很多工業，許多

生產行程中它難於侵入。而在大不列顛以外的其他國家，其進步是更加遲緩了。法國德國的最大部分的新織工業，是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採用蒸汽機關。而且在每種工業上，在每個國家，蒸汽機關都是行之以漸，且還要遭遇許多困難。因為蒸汽機關一經採用，原來的工藝與生產方法就不免廢棄，因而勞動者與職工都表示強烈的反對。

不過，十九世紀進步的結果，機械變動步驟乃頗較以前迅速。因為以機械動力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一經確立，機械的改進，新生產方法的設計，勢不能不加速的進展。一種發明會導出他種發明；渴望低減生產費用的製造業者，時時刻刻在尋求新的創見。加之，勞動者自有了組織，且能由組織的力量爭持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僱傭條件，僱主們自必要為他們的金錢覓得一些能掙取較大價值的方法；那些方法不外是使較昂貴的勞動更能生產，或者縮減勞動量，用機械代替以前由人類兩手或體力所從事的工作。僱主與僱主乃至一國與他國，都競求低減生產費，都要求由減低價格多售產品，其結果，定然會引起機械化的急速進步。因為，大家不久都發現了：許多物品如由較大規模的生產，乃至較大量的聯合購買，

和在一切可能的市場上有組織的發賣，那定能節省許多許多。生產規模增大，商業規模更要增大。由是資本較大量的積聚起來。為增進資本總量——依着合股制度——而發明的新手段，使工廠與機械愈益擴大而集中起來。機械化的加速邁進，無非是向着一個目標，那目標彷彿除了使人類體力在生產行程中失其競爭地位外無他意義。『由起煤以至於按鈕』(From coal heaving to button pressing)，似乎可以說是現代世界之工業的敘事詩。

人力限制的撤除 在這工業迅速超於機械化的過程上，有三個各別的然而而是相互密切關聯的方式，人類勞動係由此而轉化，並由此而為機械力的發展所代替。那三個方式中，第一是，以前由個人體力所加於生產力上的限制，至是幾乎完全被克服了。一種機械能够升起的重量，或者它所能應用的壓力，與前此由人們——個人或集團——操縱槓桿所能發出的體力，簡直沒有何等關係。一具現代的墜鎚(drop-hammer)或起重機，那並不僅是一個人力的代替物，它所發出的力量，決非人力——那怕是建築金字塔所集合的

人力吧——所能供給。技術改進了，這種新力量也就能够加速的應用起來。在重工業上的現代生產方法，恰好是被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技術的廢棄 至第二個方式，就是機械能成就人工的技術與熟練。以前祇有經過

長期實驗的工人纔能勝任愉快的無數業務，現在機械可以自動地日益趨於準確的運行起來。由是，對於這類工作所需的訓練時期大大縮短，而沒有技術的勞動，就非常容易由這種機械工作換到那種機械工作了。同時，機械漸趨於精巧複雜的結果，它不但愈加可用以代替人工的熟練，且愈加可用以代替有訓練的手工業者的優越，及其費過頗多辛苦習得的技能。例如，就機械的製作上來說，鑄鐵法的改良，致一大部分舊的技術都歸消滅了，砂製模型者和木製模型者的技術固不待言，就是那些用舊式機械從事調整工作的裝配者與旋盤匠的技術，也同樣歸於淘汰。真的，技術勞動並不是完全沒有需要，比如工具製作及機械修理那一類工作，甚至可以說需要比從前還要高明的技術。不過，無論就那種高度機械工業而論，高等技術工作對於僱傭總量的比率是大大的迅速的縮減了。而且機械的應

用範圍並不限於生產行程方面；它侵入了事務室，侵入了會計處。打字機與計算機，已經革新了現代商務上之書寫的和管理的部門。那怕就是以前由舊來手工賤役出入的私人家庭吧，自從家奴與不支薪的管家婦勞動供給停止，那種家庭也馬上革新起來。

從另一方面來說，新機械往往需要新式的技術，並且有時還產生一種須以技術勞動代替非技術勞動的結果。這是事實。例如現代機械工程出現，那些用木製舊式機具的水磨師的傳統技藝誠然是破壞了，但它却產生了旋盤、裝配、鑿鏈冶鍊以及其他許多的新的技藝。此外，如紡紗工廠制度的出現，十九世紀的較高等技術的紡織職工，代替了舊來以手紡績的『家內』工人。但在比較晚近的時候，這紡織的業作復又為那種需要極少技術的輪紡機的方法所代替了。以前裝配者與旋盤匠的工作，後來逐漸代以標準化的模型仿造和自動的與半自動的機械製作。十九世紀造出了一種代替其所破壞的舊技術的新技術。二十世紀則更大踏步的趨向一種轉換，那就是使技術由工人過渡到機械的轉換。

勞動的代換 工業機械化過程上的第三個方式，就是現代機械不僅逐漸除去了

體力或手工技術的需要，且進而積極的代換了勞動。假如機械能如人類一樣的技巧，能如許多人之聯合勞動一樣的強而有力，那麼，從事某一定量活動所需的勞動者人數，就可縮減至頗少的限度了。例如，不論是誰，祇要他去參觀一個現代的麵粉廠，他就會知道在一種容易機械化的工業上，勞動幾乎是絕對用不着的。

由海外裝來穀物的船舶，橫在碼頭旁邊，要起卸穀物，就是安排一個備有強大吸引器的長管，這管之一端插入船艙，把穀物吸引上製粉廠的頂層。製粉廠充滿了種種自動機械，那些機械分別把穀物研磨，類別，勻調，以至成爲麵粉。麵粉自動的由頂層下瀉到其他階層，以後自行盛入袋中，裝入貨車中，由貨車把它運往需要的地方。在所有這一系列連續的行程中完全無需人手觸及穀物，甚且無需人手觸及製粉廠中活動的機械。除了少數服侍起重機的人，少數加油並調整機械照常運轉的機械師，或者再加一兩個把持揩布毛帚，奇異的看定地位使工廠掃拂清潔的工人外，再也看不出其他的人類勞動。是的，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一切機械化的工業，似乎都在因着一種不可抵抗的動力的敦促，而不絕向着這個

目標活動。要求代換並擴大人類的體力，要求代換並改進人類的手藝——那是還嫌不夠的。工業主義的最後目的，就是要使勞動者變為機械的附隨物，為其日就稀少的服侍者。

在工業主義最近發展的過程中，對於這種絕對代換勞動的努力是更加重視的。勞動階級的組織愈堅固，他們對於較高工資與較好待遇的要求愈急切，僱主們想免除勞動並以機械代換勞動的壓力就愈加增大了。當無技術的勞動低廉時，僱主們自力求以無技術的勞動男女代行技術工人的工作，像今日的中國與印度還是如此。但在美國與西歐的工業主義，却已經超越了這個階段。因為她們早已沒有廉如糞土的無組織無奧援的勞動者可供利用，其技術與工資都已達到了比較高的限度。在此種情形下，縮減生產費的顯而易見的方法，就是完全免除勞動，或者至少用極少的勞動。最近各國，特別是美國德國所行的合理化政策，那已經使這種代替勞動的努力達到了可驚限度的成功。

然而，人類勞動與生產間之關係的革命並不限於製造工業方面。十九世紀進步的結果，世界農業狀況亦因新大陸開拓而同樣革新。農業新形勢的展開，開始與其說是由於改

良的耕作方法和畜牧方法，倒毋寧說是由於農產物運輸情形的顯然改變。鐵道開放了廣大的美洲與澳洲的奧地，並且在每隔十年中，汽船把新供給的穀物及其他產品，更低廉，更迅速地由新大陸運往西歐，而其運輸的數量則是增加頗速的。開始運輸的物品，原祇限於小麥，但自七十年代以後，冷藏器出現了，由是美洲澳洲除供給西歐以小麥外，更能供給西歐以肉類。大不列顛是一個最富的國家，她有最好最廉的製品交換這些食物，就因此故，她遂變成了一個對於新大陸農業的主要市場。在自由貿易制度之下，她自己的農業逐漸縮減，農民向新大陸找尋出路，向工廠集中的城市找尋出路，由是形成了一種農村人口減少，新的運動。就每畝地的產品而論，新農地自不能與歐洲高度耕種了的農地相比較，但在低廉價格上說，新大陸處女地却占着便利，並且無須多少勞動的低級耕作，那在人口稀少土地低廉的地方是再便當沒有的。

這一來，新國家之農業狀況就對於機械化給予了一種刺激。自是農場曳引機，刈禾機，以及其他為現代大規模農業所使用的動力機的農具，通同變成了這些草原地農業者的

獨特工具。此外，新地域的農作，又可刺激有關農業的科學的進步，例如繁殖於各種不同氣候狀況下之動植物的選種法，以及世界各地之動植物病害的防禦法，都由此得到了新的改進。科學的研究，可大大增加農作的收穫，可改進動物之體重與品質，並能使運往遠地的貨物減少腐壞。羊毛之品質與產量改良了，像腐肉一類廢物設法利用了，凡工業上所需的新樣的農產品都由農業方面予以供給了。並且有人還推測：農業不能與現代工業上的大規模生產方法相競爭，農產品的價格，定然會與工業品價格相關聯的提高。但這種推測是沒有實現的。就全般講來，其趨勢簡直是反乎這些人的預期。在過去一世紀中，農業上的革命，對於工業上的革命並沒有何等遜色。『報酬遞減法則』(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這使十九世紀初期的經濟學者政治家不絕感到惶恐——今日更不足以使人類流於飢餓。今日世界所嗚嗚申訴的，不是農產品的缺乏，倒是農產品的豐盈。而地面上最大部分的農作效率，且還是極低極低的。蘇俄對於其全國廣大農村之集體經營化，在幾年之內，已使世界農產品的供給有了巨額的增加。不過，世界是用不着為其食物盈豐

而恐懼的，它今日還有幾千萬幾萬的居民極度缺乏食品啊！

專家農業的發展

然而，在大宗農產品的種植上，最新式的農業方法，與最新式的耕業方法同樣有代換勞動的趨勢。而在那些努力減削費用，因迫而轉向比較不集約的耕作方法的較舊國家，其情形尤屬如此。但在某種限度內，這種趨勢為專家式農業的發展所抵銷了。所謂專家式農業，就是為了供應日益增大的都市人口需要，乃以比較集約的方法從事花卉、水菓、雞蛋、家禽一類物品的培育，在丹麥與荷蘭兩國中，此種農業方式是收到了成功效果的。特此種方式的農業的發展，蓋有賴於世界生活水準之繼續提高。因為專家農業的產品，大體上都是一些半奢侈品。世界所能生產的物品，世界顯然都能消費，這雖是些半奢侈品，究不足為其發展的妨礙。不過，這裏含有這樣的意義：就是專家農業的發展，不能不靠工業繁榮來支持。因為，如其工業家不能得出其製品，生活水準勢必低落，水菓、蔬菜、雞蛋、家禽以及所有其他一切比較專門的農產品亦必縮減。鄉村人口的維持，蓋不外依賴都市工業的不斷進步。工業上僱傭人口的縮減，也可說是農村僱傭人口的縮減。

當前的窮境 如就過去一世紀作全盤的考察，則經濟的進步，要不外存於以次的事實：即對一定量貨物由生產以至搬運到消費者手中所需的勞動量，在不斷的縮減。單是這種趨勢，已能使每個採行新生產方法的國家大大提高其生活水準。用新生產方法來提高生活水準，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在拿破崙戰爭與一九一四年世界戰爭之間的那一世紀，全是向着這個方向邁進，雖然勞動由舊的僱傭形態轉變到新的僱傭形態，時時都發生過嚴重的衝突，並且像手織機織工一類的工人，都因工業行程的改變而歸於淘汰了。全般的說來，這一世紀之所以能利用日益增進的生產力以改進生活水準，那有一部分是由於工業上的改變——在我們的祖先看來，那也似乎異常急速——遠較今日類似的工業改變為遲緩；尤其是由於世界市場的迅速擴張，致使那些進步國家，能增加其輸出的生產；此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是由於這種外國的需要，因對落後地域之資本輸出增加，而進一步受到刺激。但時至今日，資本的輸出已遇到障礙了；世界的需要早已不能趕上生產力的擴張；而在另一方面的機械驅逐勞動的活動，則比較過去任何時代為急速。因此，在生產制度與消

費力之間就顯然發生一種缺陷了。世界最迫切的問題，不是進一步的增加生產力，而是在發現充分利用已有的生產財富的手段。現在努力為其剩餘產品找尋出路的世界各國，都在藉着削減生產費的方法增進其輸出，因而都在不絕縮小其國內市場的消費；這一來，那個問題就愈趨嚴重了。但這些國家要想趨避這條絕路，却是不大容易啊！因為，如其他國都如此做法，某一國不依樣而行，那她就不免有喪失輸出貿易，從而喪失其對必需輸入品之購買力的危險。但是，各國愈加向這方面做去，全世界的失業人口就愈加增多起來。因為今日縮減生產費用的主要手段，要不外絕對排除人類勞動。在技術家看來，在生產中立於主動地位的手工勞動者，彷彿日復一日的變為贅物了。但是，如其他不事生產，他將如何得到消費的手段呢？如其他不消費，現代經濟制度的廣大生產力將如何順利的使用呢？

第四章 經濟制度之理論與實際

第一節 經濟學之範圍與目的

我這一節的目的，是要對於現代經濟制度——主要存在於比較進步工業國的經濟制度——之實際組織與活動，以及對於那些為經濟學者所分析解釋過的理論，作一個廣泛的考察。

假如要使這種考察成為寫實的，那末，它所根據的基礎，就必得是實在的事物和動力，而不是那些曾由人們用以組合這些實體的形式。自然，我們非論究組織的形式——這實在是在我們的考察之主要目的——不可，但我們的論究，必定要強固的依據那些潛伏在組織與統制之形成下的實在事物與動力。

生產力的來源 生產力祇有兩個來源，一是人，一是物；這兩種來源的供給，都有限

制，就生產力——那已經大大增加了——仍有限制的意義來說，它們都是『不足的』(Scarce)。假若某人或某物的生產能力適用於某一目的上面，那末，在同一時候，這同一生產能力決不能適用於其他的目的上面。有些事物會由生產來源之可用量中分拔出來，用之於某種確定的生產的目的。健全的經濟制度的鵲的，就在使可供利用的資源，能有最妥善的用途，若以經濟學者的術語來說，就是要實現『最大的效用』(the maximum utility)。

我們人這種生產力的來源，有兩種能力。其一是在開物成務上實行從事勞動的力，如手藝者，書寫生，技術家，專家，或某種管理人所表現於他們作業上的能力皆是。但人類能力固然表現並應用在這些實際的勞動形式上，同時也表現應用在那些使用人類有史以來所蓄積的智識而成形的物質資源上。人類所蓄積的這種知識，不存在於人的頭腦中，就定然存於那些已經由人們創作的書物與碑石中。不過，像這種知識，其本身與那應用在生產上的實際勞動有若干區別。這是人類經濟的遺產——是整個文明之傳遺的和不斷增大

的傳統——如其財富的創造，能達到最大可能的豐盈程度，這是應當對全世界公開的。

爲生產力之又一來源的物，亦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單純由自然賦與人類之物資；如土地、空氣、水、自然肥沃性與礦源，對於人與物發生有效作用之氣候的生產價值、海河、以及今日看作運輸與交通手段之空氣，和看作清除與運轉之動力的水。但除這些自然物外，還有那些由人類把他們的心智與勞動應用到這些自然物上而成就的生產的物資：如現有的器械與生產工具，體現於礦坑、工廠、貨棧、機械等上之實在造成的資本，以及其他在本身沒有用處，但能用以生產若干於其本身有用的其他物品之許多實物。

經濟組織的問題，就是要使所有這些生產力的來源，用之於最有利益的用途。從根本上說來，這就是要使人與物之可供利用的源泉，以最小的努力，產出那些在正當比例上最感切要的物品與勤務。這就是經濟的問題，經濟問題實全具於此。自然，這不能算是整個人類的問題，因爲人是不想一味辛苦勞動的。他不但是一種生產力的來源，同時還是對於其生產努力結果之唯一享有者，唯一享受者。他必須有享樂的餘暇，且須備有不破壞其享樂

的工作條件；歸根結底的說罷，在更多餘暇與更多生產之間，要有一種決定，這種決定，要與其從事生產作業時的必要勞動強度連同考慮。但這一來，這就不算是純粹的經濟問題。這要把經濟上的考慮，與其他非經濟上的考慮，權衡輕重，再行決定。從經濟學的立場來說，可資利用的生產的資源，就是那些作此種決定的人們，打算用之於生產用途的資源。改進了生產力之最大利益之一，不外就是它會給予人們以更多餘暇和更多物質財富的機會。

非經濟物 勞動條件的問題，並不僅限於工時長度或工作強度的問題。因為有些生產方法是異常可厭的，爲了避免那種煩厭，往往不惜拋棄那些能由開發而創出的附加物質財富。這就是說，在生產上，我們不僅要考慮到如何才能以最小可能的努力來生產貨物，還須考慮到如何才能使這種努力儘可能的避免煩厭與不快。但這也不是純粹經濟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決定，也必須把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價值加以權衡。加之，有些工作簡直可以說是積極的快樂源泉。那怕是用其他手段可以生產更多的財富罷，像這種能發發生快感的工作，也許還是值得照舊保留的。現代的世界，仍在爲窮困問題而掙扎，人們通常

都注意不到這些經濟生活的方面——無論如何，這方面的事體總算是超出了那種因頹危及生命與健康而被排斥的諸方法範圍之外。不過，生活水準提高了，人類自然逐漸會講究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之性質與限量。並且這裏也是要把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價值，權衡輕重的。

照以上所說的經濟問題，自然不能完全由經濟學者來解決。那與其說是經濟理論家的問題，却倒毋寧說是技術家的問題。因為專精生產各部門的技術家，可以說是能夠告知我們，如何才可以用最小生產資源與人類勞動而生產的唯一人物。他們依據其日益增進的知識，計劃並使用更有效的生產運輸乃至勤務的手段，以期用較少費用生產同多物品，或以同多費用生產更多物品。這根本不是節省金錢的問題，而是節省那些費在生產上之實際勞動與實物的問題。所有這些，都是經濟學者須注意，須論及，但不能設計或創見的技術上的事體。在他看來，工業與農業之技術的效率，不過是一種論材，但也有權力把它看成非固定的而在現時是不絕進步的論材。技術效率在繼續進步，那是他可以這樣斷定，或不

得不這樣斷定的。

因此，技術家——包括那些站在他們後面的有研究精神的工人與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在繼續設計更有效率的生產手段。至若應當生產些什麼，他們是談不到的。但在這種事體上，他們自然是最要緊的顧問。生產這種那種物品的實在費用，究要多少——把某些特種品目縮減一些，究能節省多少費用，在什麼生產部門，能够由產額增加而減削經費，所有這些問題祇有技術家才能解答。消費者要顧慮到這些事體，勢不能不請技術家充當顧問。不過，作那種生產與生產多少，那是每個人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是消費者，一切最後完成了的物品，都祇是作為享樂用的。那怕就是對於什麼機械或其他生產工具應當製作的決定，就其非技術的方面看來，亦還是關係消費者的事體。因為對於這些物品的需要，乃取決於那些能由它們創出的最後完成的物品的需要。

消費者及其慾望

在任何組織完善的經濟制度中，消費者總好像是生產之最後

節制者；消費者的需要，往往能依個人的欲求或集體的欲求而自行表現出來。私家主婦或

其他購買者，可以向鋪店乃至任何買賣物品勤務的地方求得其所需要的東西；或者國家、市府，或若干其他團體，也可代市民或市民中之某某結合安排一種物品和勤務的供給。如公路、公園以及其他公共娛樂場所一類物品與勤務之免費供給，那於公共團體是再便利不過的，因此，在安排這些事物的生產上，它們就儼然是消費者之需要的說明者。不過，這裏引起爭論的所在，就是像這類自由供給的設施，不知究應推行到那個限度！大體上，那可希望有兩個目的，其一，如同在稅道的場合，課稅的收益顯然涉及了勤務所提供的實效；其二，非如此不能提供貧民以必要的勤務。

在需求僅是屬於消費者——他對於其所需物品，提供一定價格以表示需求——的事體的限內，在生產方法僅是屬於技術家——他為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設計並使用最有效率的工具——的事體的限內，經濟學者的任務，就似乎祇是一個觀察者的任務，他注意這些勢力的作用，並對任何切望瞭解其究竟的人，解述它們是怎樣的活動。真的，有些人硬想把經濟學的任務看為純粹被動的任務，但在實際，我們無論就那方面講來，它都不是這麼

簡單。因爲在一方面，生產必得照着技術之指示而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定然要引起非關工
業學或應用科學的各種問題。在另一方面，消費者所需要的物品，要取決於那些物品所定
的價格以及存在於消費者手中之收入的額數。而價格與收入的規定又包含有在分配範
圍內整秩社會經濟生活的種種困難問題。經濟學者的職分，主要是存在於這兩組問題之
間。他當在生產力之技術發展與人類慾望所設定的條件內，關心於生產與分配之最妥善
的組織方法。

然而關於此點，顯然會發生以次的困難，就是，生產力之技術發展，那是一件對於那些
能够生產出來的物品之數量與種類加以限制的確定事體；但人類之慾望的概念，却沒有
這樣明白確定的性質。因爲消費者之實在需要，受有他的收入額數大小的限制，且受有各
種物品與勤務之價格高低的限制。一個經濟學者如非承認現存的收入分配與現存的定
價方法，爲絕對沒有問題的『論據』（data），他就必須爲其對於人類慾望的概念重新
考慮它們，並在它們滿足人類慾望之適宜性上加以評定。一定的，經濟學者不用決定人們

應當需要什麼，不要設想人們應有怎樣的判斷標準。但是，假如有各種物品之相對價格變更了，或者現存的收入分配更改了，他就不能避免的要重新考量需要，看在那種場合會有怎樣的需要。他必須有某種可用以批評經濟制度之功能的標準。並且，他所着意的任何標準，定然包含有一種關於人類慾望之判斷。

通常由經濟學者倡言的標準，就是慾望滿足的標準。他們說：經濟制度之目的，不外是生產並分配最大可能的總效用（total utility）量，而效用則是由消費者之滿足程度而測定。他們更進而以次的解釋：就是就大多數的物品與勤務而論，一個人對於某物所獲愈多，他由繼續增獲某物所感到的滿足就愈少。由此推論，如其一定的總生產量平等分配於一切消費者，那就似乎可以產生最大的總滿足；特這裏所謂平等分配的意思，不是說每個消費者——其嗜好不同——都分得每種商品的相等量，而是說他們各個人都可由共同經營中取得物品之總平均量，取得其所最需要的分額。照着這種觀點推論下去，那末成就最大總效用的唯一方法，似乎就在使社會每個成員都有相等的收入，即對物品與勤

務的總量都有平等的要求。因為收入一不平等，就勢必要在消費上產生一種較少於最大可能效用的結果。

生產與分配

但在事實上，財富之生產制度與分配制度是分離不開的。在現存狀況下所分配的收入，那不但看為消費的手段，同時也看為是對於生產之報酬與刺激。因此，說收入平等可以產生最大可能效用的見解，就難得使人相信，因為在反對這種見解的人看來，收入一旦平等，那馬上就會在生產數量上發生有害的反動。真的，對於不平等制度之理論上的防禦，向來就是說，收入平等，不但會減少生產總量，同時，由消費所得滿足的有利效果，且還抵償不了生產上的損失。在我們承認現存經濟組織制度的限內，我們不能懷疑這種見解的正確。因為當前的生產，原本就依賴着那種顯然含有經濟上的相當不平等的刺激。現在要創建一種經濟制度，一方面能確保最大的生產，同時又能確保消費這所生產出來的物品的最大效用，但問題就看這種制度是否有創建的可能。

不過，事實是這樣，由經濟學者設定的標準——最大效用的標準——建樹起了一種

傾向收入平等的強有力的假定；因此，如其組織一種儘可能接近平等分配的經濟組織，而在總生產上又不會蒙到損失，不會蒙到過大損失，那也就樂得嘗試一下了。

這種對於消費者之最大滿足或最大效用的標準，照普通的說法，就含有這種意義：即消費者是其所需物品之最適當的判斷者。在大體上，這是毫無疑問的真實。不過，我們前面講過，需要有屬於集體的，有屬於個人的，個人的需要，往往要受各種物品之相對價格的影響。而在集體需要的場合，集團方面就自行建立起一個標準，對消費者之需要加以判斷——這種判斷，雖然對於每個消費者，不會如其自己所判斷的那樣準確，但却最適於促進全般的最大的滿足量。因為一個人由禁戒某些物品——如湯和水之類——在自己方面所得的滿足，會遠不若其所與鄰人的不滿足之大。在某些場合，國家為要使若干物品低廉或昂貴，以便鼓勵或阻止其消費而施行的干涉，也會發生與此相類似的顧慮。在這諸般情形下的判斷標準，通常不是個人消費者的滿足，而是消費或多或少在全體社會滿足量上的效果。假若一個人消費過多的酒精飲料而不受教育，他就不但最損害全體社會所需要的

生產能力，且會爲害於其朋友或隣人。無論就那方面講來，他的這種行爲定會發生減少總滿足量的結果。

我在前面講過，爲要成就最大的滿足，那些勤務應當免費開放，那些物品價格應當低廉或高昂，那些貨物應當生產較多數量或較少數量，經濟學者雖不妨根據經濟的理由提意見，但他沒有決定這些的任務。以有這些事體，都要讓消費者——個人的也好，集體的也好——自行去決定。經濟學者的任務，在從一種傾向經濟平等的假定從事研究，看生產與分配制度，要怎樣組織才易於對消費者保障其最大限度的滿足。他必須常常問到：現存的不平等制度，究在某種限度爲生產利益上所實在必需，並且這種必需究在某種限度能爲另一種經濟組織方法所減少或撤除。

第二節 生產制度

有了上面這些導論，我們現在乃可以我們所見到的一種清晰觀念來討論生產制度，

在根本上，這種制度就是把一切可資利用的生產資源——人與物——用某種方式組織起來。在經濟學者看來，這些存在着的，尤其是尚在發展中的資源，都算是一些論材——如人口的數量與其生活內容，自然的資源與已經蓄積的實在資本，以及人類知識狀態等等。所有這些論材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絕改變的。人口有增有減，他們的生活有時變壞，有時改良。依着種種開發的方法，自然資源是能夠採盡，也是能夠更新的；並且，知識進步了，今日對生產沒有用的東西，明日也許頗有用處。像工廠、機械、鐵道以及其他許多物件，這是實在資本，這種資本常在消費中。對於這常在消費中的資本，究應在某種限度以同種類或不同種類的新資本財來代換，究應在某種限度增加生產組織的總設備，那都是由人來決定。知識在不絕增進，且在以千百種新的方式應用於各種資源的用途上，而這些資源，則是在當前不絕發展之文明限界內所允許利用的。上述這諸般論材的若干部分，誠然非人們所能支配。它們對於經濟學者也如同對於社會一般人一樣。不過在某種限度內，它們有一部分是能由人們之集體的或個人的行動所支配的。

即如人口的數量，就頗容易受那些組成總人口之個人所支配，而個人的行為又可受國家安排不同種類之教育設施的影響。至社會之物質生活設備，那是同時會受集體與個人兩方面的支配的。對自然的資源，對蓄積的資本，對人類的勞動，乃至對技術上的知識，究竟是怎樣用法？是利用抑是濫用？那都可在某種限度內加以人力的控制。新資本的蓄積，一方面可對其額數加以制限，同時並可依其特殊資本財而行使伸縮。所有這諸般的支配活動，有的委之於國家，有的委之於其他公共團體，或者完全委之於特殊經濟組織機構內的個人或私人合作組織與組合。這種經濟組織機構異常重要。個人或私人組織如何行使其控制活動，一大部分要看這種組織的機構怎樣。那怕就是個人主義最發達的社會，它在實際上亦不能完全讓個人行使控制，因為它如其是一個社會，它就不期然而然的會設定一些規律，使個人在這種規律所定的範圍內從事控制的活動。

因此，經濟學者的實際任務就是在提示那些經濟組織形態，在那些組織形態中個人或集體所要求的物品與勤務，都能依最滿意的方法加以製作，加以分配，從而就能保障

技術上的生產能力。就此種意義上說來，經濟學者的職分，不外就是極廣意義之經濟組織的職分。

我們已經講過了，真正的生產問題，就在對於有用生產資源——人與物——之種種不同的產業與勤務能充分的利用和正當的配分。有了這種根本着眼點，我們就知道在當前的經濟制度下該如何去關懷這些事體。

生產不足 當前經濟制度不能充分利用那些可供利用的資源，那是我們已經解述過了的。爲了時間關係，我們姑且把那些自願離開生產的，即寧願靠着不勞而獲的收入——當前經濟制度允許他們獲取的收入——過着懶惰生活的一小部人，放着不講。自然，與整個獲取不勞收入的階級比較，這種人是少多了，因爲一大部分獲取這種收入的人，同時也還從事他種工作。除了這些自甘懶惰者以外，我們在不得已而失業與資本財廢置不用用的當中可以發現有用生產力未經充分利用的許多證明。世界貿易衰落的結果，這種情形至今日已發展到了頗不尋常的程度。不過，大量失業與若干資本財棄置不用，那幾乎是

常事，就在極繁榮的時候亦不難發現此種現象。

爲什麼有此現象呢？簡單的解答，就是控有這些資本財與控有創造新資本財之手段的人們，不能在那種由生產獲取相當利潤的條件下找得充分利用這諸般資源的用途。因此故，他們把資本財，把創造資本財的手段，置諸不用了。失業的勞動，就是跟着這種事實導來的結果。換言之，在現在經濟制度下，一大部分生產的部門都是組織在一種基礎事實上，那就是，生產如其不能提供相當利潤，生產資源就不免要予以廢置。利潤的期望，是最大部分經濟機構所由轉動的樞紐。

這不是說，沒有利潤的期望，生產就決不會進行。一個公司爲了避免閉廠所蒙到的頗大損失，它也許在受到小小損失的時候，還以繼續承訂契約，繼續使工廠照舊作業爲較有利益。但這個公司之肯出此下策，一定要它存有一種希望，就是它設想在不久以後還可獲得利潤。一種國營事業，市營事業，或受公家津貼補助的事業，也許不願損失繼續進行。但這種事業能不願損失照舊進行，一定要公家能照常徵收稅款；而且，如其在其他產業與勤務

上不能掙得利潤，稅收的源泉就要迅速涸竭了。

特依靠利潤爲生產的刺激，那並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經營之特有現象。一個社會的狀況，如已複雜到使生產者不能靠自己產品的消費，或靠直接物物交換而生活，那在這種社會狀況下的生產，就帶有依靠利潤爲刺激的性質。農村生產者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往往能够自食其產品而不必一定要把產品送到市場。因此，他就在不能由出賣產品而獲取利潤的場合，還不妨繼續生產。但在工業生產者則不然，不論他是從事大的規模抑是小的規模，他要生活，就必須變賣或交換其產品。他除了在小限度內能訴之於直接的物物交換外，如非其出賣產品，能獲有一種超過其生產所費的剩餘，他就決不會繼續生產。由現代工業主義所導來的新環境，第一是，它使世界最大一部分居民都依靠出賣工業品而生活；第二是，它會部分的使農業工業化，這樣，農人與農企業家的生產，也如同在工業生產上一樣，大部分靠着利潤的期待；第三是，它使大部分的工業生產者都轉化爲工資勞動者，就因此故，在生產品數量上具有決定影響的，就不是他們對於利潤的期望，而是生產手段所有

者對於利潤的期望。

資本主義的樞紐

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握住利潤在現代經濟制度中的樞紐地位。在未理解這點之前，我們對於世界不能適當利用其可資利用的資源，好像覺得過於荒謬。實行把大部分的生產力拋棄不用，而反以這樣為有利益，這是難於令人相信的。然而特殊礦山或特殊工廠的所有者不能由利用此種工具而獲取利潤，那却是十分顯然的事；至工資勞動者的失業，則又不過是這種生產工具閒置起來的結果。

在私有經營制度之下，利潤是使物品與勤務得生產出來的唯一可能手段。像其他種形式的收入，雖然對於那般收入所有者，同是生活的手段，但在這種制度下，看來像是一種失費，那不但不能刺激生產，簡直要成爲生產的阻礙。真的，金錢的刺激是可以誘導工資所有者與薪資所有者增加其產額的，但他們的活動究將增加生產，抑或減少就業的數量，那完全要視其僱主對於利潤的期望而決定。總之，利潤是整個經濟制度所由轉動的樞紐。

往後，我將要考察到這種處於樞紐地位的利潤之利弊。不過，此刻我企圖對讀者諸君

解明的，祇是這種制度的若干根本的特徵。現代工業的生產，乃至相當限度內之現代農業的生產，都是靠着大規模的費用浩繁的資本財——如建築，機械，動力供給之來源等等——的設備，這諸般設備，乃表示鉅量之創造的生產資源的支出。它們在不絕的耗費，不絕的需要更新。而其中若干設備，還會因新的發明或因工業技術需要上的乃至消費者要求之性質與方向上的其他改革而變為陳舊。加之，世人如其希望有一種進步的生活水準，希望儘可能的利用不絕擴張的生產力，甚或希望增加人口，同時不因增加人口而減低生活水準，那麼，對於生產上的資本財的設備，就不僅祇補換耗損陳舊部分，且當增添新的部分。換言之，就是要常常充分使用其現有生產資源，創造資本財貨，以便保證消費者貨物產額上之必要的擴張。

自然，對於一個社會所當蓄積的新資本量是沒有固定限制的。因為所有這些資本都能用以增進生活水準。但這裏畢竟有一個『相對的』限制。就是對於資本財所能生產的消費者貨物的供給，必須費去充分的資本；否則蓄積便純是一種廢物。在消費沒有與蓄積

成比例增加的地方，一定會導來經濟的危機，不然的話，就要當事國能由海外投資的不絕增加，或不絕向海外送出其剩餘產品，而不用輸回等價的貨物，那樣，牠才能解消過剩資本的困難。

可是資本的輸出，對於某一特殊國家的困難也許暫時可以解除，但却顯然不能解決全世界的困難。就世界全體而論，如非危機發生，消費一定要迅速增加到能充分吸收資本財——由蓄積造成的一——所能生產的一切貨品。但在資本家的社會中，無論在實在的生產資源上，抑在金錢上，都無此綜合的決定。全社會蓄積量與消耗量，是由個人、企業公司與組合之無數各別決定的結果，其中絕無所謂通盤的規制。在每個國家中，每個有剩餘收入的個人，是自行決定其必需消費以上的剩餘，看把它貯蓄，抑是移作別用。每個各別的企業公司，如其經營有了利潤，這利潤亦是由它決定，看應該分配多少紅利於股東，該留下多少作為預備金的貯積。至若對於公司設備上之損壞與廢朽方面是否要加以適當的補充，那都是一聽公司去裁決的。此外，比如學校，兄弟會（Freindly Society），信託基金會（Trust

Funds) 一類非營業團體，它們對於其收入，亦是自行決定用途，或則現在用去，或則留待將來。所有這些私人與團體的總決定，就構成了全社會之蓄積總量與消費總量。這總量究有多少，祇能猜想，祇能估計，而無從確實知道。在此消費總量與蓄積總量之間，從未曾藉組織的行動，綜合的確定其正當的比例。

這並不是說：資本的蓄積量僅僅是衆多不確定的浮動的個人決定的結果。顯然的，在那些決定當中有一大部分是取決於個人心理的作用——他對於將來的看法，或者，他以爲握在手中的一隻鳥，抵得落在樹上的兩隻；他對於其蓄積之穩固與經濟制度之安定上的信念，乃至其對於子女的責任心等等，都於其收入用途決定上有關。不過所有這些要素本身，對於個人大都是外鑠的，在某些社會與某些階級中，蓄積的習慣，要比在其他的社會階級根深蒂固多了。對於子女的責任心，那要視國家爲大衆設定的蓄積的性質而定。至關於蓄積的穩固性和經濟制度的安定性所具的信念，那在一方面固然是取決於一般事勢的推移，同時却也在不絕對事勢推移發生影響。

蓄積與分配

特對蓄積量大，有影響的另一要素，却是收入的分配。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收入大不平等；龐大的資本蓄積，都是成於那些較富有的階級；他們的收入，大大超過其從心所欲的消費的支出。中等階級的蓄積，亦關重要，且還一年穩定一年；至勞動階的蓄積，則視當前工業繁榮的程度而大不相同。若果在經濟制度完全沒有其他變動的狀況下，同量的總收入能比較平均的分配，那個人的蓄積量也許較少，但其蓄積的傾向，必然逐漸趨於有恆。因為在那種狀況下的中等階級的蓄積，勢必經由更大部分的人口，而自行再生產出來。

富有者的蓄積，一大部分是成於他們怎麼也消費不了的收入，在這種限度內，那簡直是自動的。但在景氣與不況的時候，其蓄積就大有差別。不況的時候到來，富有者（也如同勞動階級一樣）必需消費預算以上的剩餘，是定要減少的。至中等階級蓄積者的蓄積，往往是採用保險政策的方法，或者從事那些附有固定利息的房屋抵押，或者為供將來一定期間內的需要而安排兒童教育基金或退休年金等等。因此，他們的收入如在不況的時候

減少了，他們就寧可縮減消費而不欲減少蓄積。這些情形，一部分也可適用於勞動階級的蓄積，但他們一旦失業，他們過去的蓄積就不免要化為烏有。

所以，社會的蓄積，大體可以說是經濟制度的一種功能，其蓄積量的多寡，決定於收入所由分配的方法。不過社會所蓄積的金錢，並非全部變為生產組織擴張的資本。比如工業經營由利潤中扣作預備金的團體蓄積，誠然有一大部分會用作新的生產手段，並且其額數多少，還要看一年一年的營業利得狀況而定。但在個人方面的蓄積，却有其他一些可能的用途，如買收政府公債——那也許是供生產之用，也許不是——從事股票交易投機，或者單純的存貯於銀行。此外，合作團體的個人蓄積與團體蓄積，還可如在國內一樣，向海外投資或貸借。

蓄積與投資 所以，蓄積雖然是新資本的唯一來源，但新資本對於社會生產資源之發展上的應用，却並不與此蓄積數量保持一致的關聯。在現在的情況下，投用在工業上的新資本的數量，主要是受決定於利潤的期望。有資可投的人，如其看定他能由投資獲得

充分利潤，他自然會把金資投用在工業上面。但是，在他的打算上，如覺利潤的期望不佳，他就不會投下他所蓄積的金錢，他寧可把金錢用在其他方面，甚或存貯在銀行中以待好況的時機到來。

在當前的工業組織限內，把資本用來擴張生產，大約有三種方法：第一，營業上所得利潤不作爲紅利分配於股東，而當作預備金蓄積起來，以後再用這種預備金來增添設備或作業資本；第二，個人投資於合資公司或組合所發行之優惠的或普通的股票；最後第三，以社券或各種債票的形式，出貸資金於這些公司或組合。在第一場合，新資本將由股票所有者獲得較高利潤，而增大現有股票之市場價值。在第二場合，投資所得的報酬會變成一種依靠營業運氣的可變的利潤，有了利潤便有紅利可分。但在第三場合却不是如此，借款者在社券與債票上訂明了一定的利率，他無論是否獲得利潤，利息都非照付不可。投資者以這種方式貸出金錢，他就不是企業的參與者而是信用者。企業要償付他的利息與原本。

一個人投資於股票上面，他是希望獲得利潤。他投資於社券或債票上面，那是因爲借

款者希望由這宗借款的使用可以得到一種償付了約定利息而尚有餘剩的利潤。因此，爲企業目的而舉債的需求，一視人們對於利潤的期望而定。有此期望，借款者乃肯同意支付利息。假若一般對於利潤的期待不高，則投在優惠的或普通的股票上的資金一定較少。企業家借錢的興致較低，附息的借款自然也要相因而減少下來。所以利潤與利息雖是兩個判然各別的收入形態——利息在企業者心目中看爲是失費，利潤則看爲是利得或剩餘——但流入工業中的兩個資本形態，却是密切關聯的，並且在這兩種場合，最後都是靠着對於利潤的期待。

由是，我們在這裏又發覺了，企業家心目中的利潤期待，占有經濟制度中之樞紐地位，那並不是說利潤會決定貯蓄量，而是說它決定工業上之資本蓄積率。因爲較高的利潤，一方面固可產生貯蓄所由形成的較大量的剩餘收入，同時且會誘導這種剩餘所有者，使他在投資或借貸的形式上把剩餘用來發展工業。

利潤的節制器 所以在許多經濟學者看來，利潤的水準，彷彿就是蓄積與消費之

相對量的自動節制品，或者至少是那種用以創造生產財與耗費財之有用生產資源之相對比例的節制器。因為利潤抬高，資本蓄積率增加，貨物的供給必然加多；其結果價格低落，利潤相因減少，直至平衡恢復為止。從反面來講，利潤如其低落過甚，以致不能誘導充分的蓄積，那貨物就不免有相當長期的缺乏；貨物缺乏，價格提高，利潤重又增加起來。這是利潤在當前商業制度上自動趨於平衡的一部分理論。至於這種理論究竟真確到什麼程度，那是我以後要論到的。

在這裏，我們同時又還達到了一個論點：就是現行的生產量與工業上之新資本蓄積率，都是為生產控制者和投資者對於利潤之期望所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利潤的跌落一定會產生生產減縮與資本蓄積低落的結果。而必然伴隨這種結果發生的，就是人與物之生產資源，乃至非利潤低落，即會投用在工業上之金錢的歸於閒散。

因此我們知道，生產量之大小，主要係取決於企業家心目中所期待的利潤，至於生產能力發展的限度，則是為過去所掙得之利潤數量，及這利潤投用在工業設備上之數量所

影響，而當前對於未來利潤之預期，那當然亦有不少的作用。以生產量而論，其決定的要素，乃存於企業家之間的意嚮，特別是存於那些在現代世界中大體能決定主要商品究應生產多少之大企業方面的意嚮。在有些產業上，對生產量仍全無規制，生產多少，純是一些不同企業之各別決定的結果，但在其他企業——例如不列顛的炭業，以及許多德國工業——上，其決定係取決於同業全體。有時產額的規制，還經過了法律的認可；生產超過了認可限的公司，往往還受組合方面的處罰。不過，無論規制是集體的，抑不是集體的，其主要的決定原因，要不外是對於利潤之期待。

生產費用

自然，這種利潤的多少，不僅是要取決於售出物品之數量，且要取決於生產不同物品所費的不同的費用，以及消費者對於較多或較少物品供給打算支付的不同價格。並且，每個單位的生產費，是隨生產量之多少而迥不相同的。在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內，生產費能削減一分，由生產所得利潤就能多掙得一分。至若其他情形究能在某種限度內保持一致，生產費與需要之間，究有怎樣的關聯，我打算留待後面討論。在這裏，我祇想提

論到以次的事實，就是關於所當生產的數量的多少，乃是由那些控有生產機械者——無論是個人的，抑是團體的——依其對於利潤之推測而決定；那不是決於消費者，也不是決於任何為消費者從事活動的其他的人。

真的，往往有人這麼說：消費者在最後場合也實行規制生產，因為生產要看他們是否有購買能力；貨賣不用，誰還肯繼續生產活動。不過，消費者決定要買的，祇是那些售價已經決定了的貨物。東方式的貨物陳列所（The Eastern Bazaar）的講價活動，那究不是現代工業世界的特徵。對於確定的消費者，大多數的價格都是業經決定的價格。價格的決定者，是生產者，是商人，他們由此種決定而影響需要。自然，他們這種人的行動，要為他們對於消費者打算依確定價格購買的物品數量的推測所影響。但在以較高價少賣與以較低價多賣之間，他們是可以自由決定的。他們能夠確定一個價格，然後把他們認定能以此價格投售的貨物盡量生產出來，或者他們能夠確定一個產額，然後再估定這些產額容易脫手的價格。概言之，就是價格決定了，產額隨之而決定；產額決定了，價格隨之而決定。但無論他

們直接由產額來決定也好，間接由價格來決定也好，對於所售貨物的多少，究有一大部分是取決於他們，而不是取決於消費者。

第三節 生產費與利潤

企業者所關懷的利潤，要不外生產費與那物品和勤務所由出賣之價格間的限界。因此，企業者的目的，就在使其每個單位之生產費減到最低最低。但這裏並不說，他的目的，也在使其出售貨物的價格提到最高最高。因為物價如其過高，勢必限制販賣，說不定竟會由此減縮其利潤總額。他所關懷的，不是每個生產單位的利潤額，而是其總利潤對於其總生產費，及對於他與其股東投用在生產上的資本額所持的比例關係。有時候，這種關係會促使他以提高物價為有利，那怕就是在物價提高會縮減販賣的場合，亦是如此。比如在生產行使有組織的獨占的場面下，或者，像那種變更價格而不致對其銷路有多少影響的生產品，特別容易收到此種效果。至若在不同的情形下，他要擴張銷路，就頂好是削減價格。在同

業間發生強烈競爭的場合，或者在銷路可因價格低減而增進的場合，最易採行此種方策。有些物品——包括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是很沒有伸縮性的，那就是說：在相當廣泛的限度內，其價格的動變，於其銷路沒有影響。但其他像那些所費較少的奢侈品一類的物品，那對大多數人的購買力，是立在限界的限度，由是，其需要大可伸縮，其價格一有變動，馬上就在其銷路上發生影響。至若另有一些介乎此兩極端之間的物品，則其需要之伸縮性，亦係介乎此兩者之間。一個販賣需要沒有何等伸縮性之物品的獨占者，他當然會從心所欲的提高其物品的價格。反之，相互競爭的生產者，要出售其需要大有伸縮性的物品，他的地位便最不穩固。

不過，我們在這裏還得考慮到另一個要素。在大多數產業上，生產數量對生產費的單位頗有影響。一個工廠能不絕進行業作，且能充分使用其動力、機械與勞動之常態設備，則產額增加，單位生產費減落。因為許多經常費用，如管理費、機械修補費、保險費、借款利息等等，皆不會因產額增加而增加。這些費用如其能由較大的產額分擔，每個單位的生產費當

然要低減下來。特這諸般事實，雖可應用於大部分的機械工業上面，但前述諸種經常費用對總生產費之比例不同，其程度亦因而大異。至若對於工資在總生產費中占有較高比率之機械設備較少的工業，那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但上所云云，並不是說產額——那怕是最高度機械工業的產額——在短的期間內能以低減的單位生產費而無限制的擴增。因為，假如一個企業家企圖生產較多於其工廠正常設備所能生產的物品而不增加其設備，他的單位生產費勢必又要提高起來。真的，特別是在技術效率迅速發展的地方，他很可由擴大工廠或建立新工廠而更進一步的壓縮其生產費。不過，這需要相當的時間。如其他不是希望那種對於其產品的較大需要，能支持到一種限度，即使其支出的資本得到恢復的限度，他就定然不會在新的設備上投下資本。顯然的，除前述諸種顧慮而外，單位生產費由縮減產額或增大產額而增減的程度，那對於企業者之物品價格與生產數量的決定上將為一強有力的因素。那怕是一個獨占者吧，假若縮減價格，能够出賣更多貨物，假若他的單位生產費能由必需新資本投下所增大的總

利潤而縮減，他也許要低減其價格。不過，照通常的情形說來，企業家如認定增加的需要純是暫時的，他就定然不會新投資本。

需要的伸縮性，不僅因商品而不同，且也因時而不同。因為這種需要，是受決定於消費者必需消費的收入量的。假若他們的收入減少，其收入就須在必需與經常的費用上，支出較大的比例，要由較低價格提高對於某種物品的消費，那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不況的時候，企業家都力求支持價格，因為需要在這時候是簡直沒有伸縮餘地的。

前面所說的，單位生產費能由產額增加而低減的限度，那祇適用於某種特別生產部門而不能適用於全般產業。在這種限界內，任何特殊工廠的生產費，都有因產品增多而減落的傾向，然對全產業則殊不然。因為，需要一經擴大起來，以前廢置不用的較少效率的工作坊，管理部與勞動者，勢必再行運用起來，而這樣增加的生產，自然不免要包含較高的生產費用。當需要的增加不是因為物價低落而是因為消費者手中收入增加時，這種現象是最易發生的。貿易繁榮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增加的需要，一方面促使最有效的生產者

減低其生產費，另一方面且能使效率較小的生產者贏得一種滿意的利潤。在這種繁榮繼續的期內，價格可望抬高，有效生產者可以獲有意外的利得。然則這個時候爲什麼不能永遠繼續呢？那待以後再加論好了。

價格與產額 論到這裏，對於一個與某些企業有密切關聯，同時又與其他企業立於強烈競爭地位的實業家，我們已有一個輪廓了，當他決定其價格與產額時，他心目中有許多不同的顧慮。他最要顧慮的，第一是各種物品需要之不同的伸縮性；第二是對於生產費不同的效果，以及產額增減所需的不同資本量；第三是物品出售時消費者手中所存的收入量。關於這些顧慮，獨占者與競爭生產者的看法各不相同。在獨占者看來，成爲問題的是發現怎樣的產額和以怎樣的價格出售，才能賺得最多的總純收益，此外，並參照消費者需要的限度，決定這彼此相關聯的產額與價格。反之，在競爭的生產者，他們是不能像這樣支配市場的，他們所要做的主要事體，就是決定以如何的價格出賣，然後再生產他們認爲以這種價格所能售出的數量。但是，如其他們決定屯積，那就定然要打算以能夠獲得的

價格用買。有某些企業上的物品價格大體都標準化了，所以這些企業的主要問題，就是看每個生產者要接受多少定單——其競爭與其說是關於價格的，倒毋寧說是關於品質與上市效率的。若在其他企業，情形恰恰相反，除了當大多數工廠都充分使用了的物價高漲的時候，其價格上的競爭是異常尖銳的。

現代企業世界之聯合組織的發展，勢必使一國物品價格趨於標準化，因而使價格上的競爭受到限制。因為，在強有力的聯合組織存在的地方，標準品的價格變動，通常是整個企業上的協同動作。在物品不能標準化的場合，雖然不免有多少價格競爭的餘地，但這往往亦受有以次的限制：那就是關於契約與價格之交互報告的協定，以及由協作諸公司攤分貨物定單的協定。在這諸般情形下，價格的確定就愈加要變為生產制度的一種任務，而愈加不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間之認真斷斷論價的結果。因為在現代企業世界中大家漸漸相信較高的利潤，與其說是求之於不規制的市場，不如說是求之於規制的市場。

然而，那怕就在競爭受到嚴厲限制的地方吧，生產者想低減生產費的刺激，是依舊存

在的。因為，從製造貨品公司的觀點看來，不論用什麼價格發賣，也不論賣去多少貨物，生產費的減少，在其本身總是一種利益。『生產費愈少，利潤即愈多』的意見，個人企業者都視為顯而易見的真理。不管他是獨占者抑是競爭的生產者，利潤因生產費減少而加多，無疑有利於他所經營的個別的特殊企業。但這原則是否可以同樣應用到全般的企業世界，那却難於肯定，要肯定，也得把經濟制度各部分的交互作用以及生產所由進行的諸條件一同研究過了再說。

真實的費用與金錢的費用 然就一般而論，經濟學者在這點上似乎同意企業家的意見。在他們看來，縮減生產費之為有益事體，以及經濟進步主要係存於生產費之縮減，那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因為，世界財富上的大進步，大體上可以說是由於一定量的貨品，能以較少的勞動與較少的其他生產資源製造出來。但與經濟進步依關的生產費的縮減，那是真實的生產費的縮減，即貨物由生產以至上市所需勞動與其他生產資源的縮減。若僱主為增加利潤所要縮減的，那却是金錢上的費用。那是另一回事。企業家對於其所消費的

生產資源，自然須以貨幣支付。並且就因此故，金錢上的費用，乃與真實的費用發生關聯。但它們兩者是怎样關聯起來呢？試假定煤價跌落吧！煤價跌落，生產一噸鋼所需之煤即令照舊，其生產費是要隨煤跌價而縮減的。不過製鋼過程上的真實費用，並未絲毫減少，像這種費用的減少，除非是較好的技術方法出現，把產煤的真實費用減少了。比如煤業不況，引起煤礦所有者間的強烈競爭，因而促使煤價跌落，那也同樣不會招致製鋼上之真實費用的縮減。這就是說：煤價減跌的理由如僅是這樣，那鋼的金錢上的費用無論縮減多少，終與其真實費用無關。

通常使現代工業上之利潤動機合理化的緣由，就是說：那種動機會促使每種企業拚命增進其工作的效率。能够把生產費縮減到最低限度的企業，獲利最豐；而效率最小，所費生產費最多的公司，勢必歸於失敗。因此之故，有人主張工業的進步，在不絕受着刺激，生產技術是會不絕改進的。僱主爲了利潤，自會在可能範圍內，對其企業作最有效的管理，並且時時刻刻期望新的發明和其他縮減生產費的方法。不但如此，他還用選拔最好工人與革

除最壞工人的辦法，用獎勵較多額生產的最有效的辦法，把他對於利潤的刺激轉而用以刺激其僱傭者。

但不幸生產費不但能由效率增加而縮減，且能由生產行程上所配分的收入減少而縮減，或者，能由較低廉勞動代換較昂貴勞動而縮減。企業者自然而然的有一種老習慣，把工資看為一種失費，並以為要攫取較廣泛市場，頂好是使這種失費儘可能的降低。依照經濟學者及這般企業者自己的『常識』較低廉的物品，就是較能銷售的物品。就某種意義上說，這自然是確實的。假如一種物品低廉了，同時消費者用以消費的金錢數量又沒有減少，那需要當然會有所增加。但是，假如物品低廉，係由消費那種物品之勞動者的工資減少，那末，消費者用以消費的金錢數量，就沒有以前那樣多，也就無從由較廉的物價期待較大的需要。不錯，工資縮減，貨物低廉，如祇限於某一企業，其他企業上的情形不變，這種企業是能夠出賣較多物品的。但所有企業或大部分企業如都由低減工資而降低物價，那又兩樣了。僱主慣於考慮的，不是整個經濟制度，而是他自己的企業，所以他不會從這方面着想；

在任何場合，他總以為要使上述那種真理影響其行動，祇有一切僱主都打算起來從事實際的協同動作。就因此故，他覺得在實際的考慮上是不妨把那種真理放在腦後的。但事實是這樣：大家競相縮減工資，勢必致破壞世界的繁榮，而那沒有找着方法阻止這種傾向的經濟制度，定然是要處在嚴重的崩潰危險中的。

但問題尚不祇此。現代的動力機械，已把高度的工業效率，帶到了那些具有無限廉價勞動的比較後進國家。這應當說是整個世界之物質繁榮上的加速進步；在實際，也許終於會在相當範圍內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高度的工業效率，是定然要提高這些比較落後國家之生活水準的。不過，這些落後國家之半飢餓農民對新興工業所需勞動之無限供給，有時會使其勞動工資保持住極低的水準。低廉勞動是能夠導來高率利潤，從而，會促進工業化的速度的。但其中包含有一種破壞的競爭，即這些落後國家與工資水準頗高的國家間的競爭。不錯，後進國家的工業化的速率，往往會受到她們本地資本缺乏的阻撓。然自先進國家資本家漸漸察知低廉勞動大可應付現代自動機械時，他們就寧願把新資本逐漸投到

那些政治安定的後進國家而不欲投在他們本國。這樣，先進國家的景況便會因失業人口的增加而趨於惡劣，而這些國家勞動者當前擁有的較高率工資，勢將受到阻害。同時，爲了維持其國內的利潤與投資，她們是定然要高築保護關稅壁壘的。

工資與購買力 不論是工資率縮減，抑是工資率照舊，而僱用較少的勞動者，那對於購買力總量自然是有同樣的影響。那怕就是失業者由國家基金維持罷，他們的維持費，終歸是要出自那些配分於生產過程中的收入。因此，那於購買力無所增益，不過是由社會某一部分向其他部分的一種移轉罷了。也許說，收入由較富者方面移轉到較貧者方面，多少可以增加一點對於消費品的需要，但這種效果極其有限，如其課稅的負擔是加在勞動者身上，或者是直接加在工業上面，那就尤其沒有多少效果了。因此之故，合理化政策如其會引起『技術上』的失業，其縮減國內市場，就與削減工資的結果沒有區別。

不過，生產費的縮減，若是由於採用合理化政策而不是由於削減工資，其真實的生產費與金錢上的生產費便都會減少。因爲，由此製成的貨物，不但金錢的支出較少，生產資源

的支出亦較少。這簡直是一種純粹的利得。它讓人們在較高的真實收入與較適意的閑暇之間去從事選擇。但在實際，那却會招致與閑暇完全兩樣的懶惰，在許多場合——雖非在一切場合——那將使從事工作的人們更加辛苦勤勞。而且，採行合理化政策並不一定會擴增生產量，因為生產量的擴增，是要以市場的擴增為前提的。這樣看來，合理化的唯一效果，就在縮減僱傭，而不用按比增加工資或減低價格，所以結局遂不免在需要量上發生反動。

第四節 分配問題

這種情形，雖不一定會改變需要總量，却會改變需要的方向，即對於消費品的需要減少，而那要在資本財購買上求出路的『蓄積』比率，則相當增高。但我們知道，消費者的需要，如沒有相當的擴增，資本財之供給的增加，是沒有用處的。真實生產費的低減，暫時也許會刺激產業，因而產生一種物價高漲的繁榮現象，但這種繁榮現象是不能持久的，它的

繼續支持，是靠着高率利潤，高率利潤根本就會引起資本財的過剩供給與對消費品需要的相對減少。所以，當新生產工具一加入生產活動，消費者需要的不足情形就顯示出來，由是利潤復又降低下去。

這種進退失據的事實，不但表明當前收入的分配過於不平，且表明分配的方法極端錯誤。像這樣祇視一種收入——利潤——為利得，而其他收入都被看為失費，看為生產障礙的組織，那是定然會在現代經濟情況下導來一種破滅的危險的。

但是，我們究將用什麼分配方法來代替這種錯誤方法呢？在僱主看來，工資、利息與地租，分明都是生產的失費，利潤分明不是失費，僱主對各種不同收入這樣區別，那不算他的錯誤。他是制度的奴隸，而不是制度的主人。但是對僱主們個人的責備減輕，要不外是對制度本身的批判加重。因為，那好像是說，任何讓個人企業者為利潤而決定其產量與生產性質的經濟制度，必定要導來繁榮與不況，不然的話，如其由工資與稅收的超過某種限度的提高，以修改有惡害的收入分配，那也會導來永久的不可救治的不況，這一切的提示，不

外是說，在這種組織上，即把生產控制權通同委之於一個私人企業者的特殊階級的整個配列上，存有一種極端的缺陷。

自然，這是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社會主義者常常這樣主張，說『爲利潤而生產』(Productions for profit)異常不好，應當用一種『爲效用而生產』(production for use)的制度來代替。他們以爲怎樣決定使用有用的生產資源，並怎樣決定收入分配，使物品與勤務之需要供給平衡，這是兩種任務；這兩種任務應當由社會本身依適當的經濟機關來擔當。我們已經知道，在實行這任務當中含有生產努力在資本財與消費品之間的集體配分，和購買力之相應的配分與規制。這就是說，當作資本蓄積來源之積蓄，不是一種私人的任務，而是集體的任務；並且，配分於各個人的收入，不是爲了生產的投資而祇是爲了消費者貨品與勞務的購買。但這一來，將會使那繼續配分於消費者的收入，能够充分吸收可供消費物品之現行生產的全部。

顯然的，對於現行經濟制度作如是猛烈的批判，那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因爲這種意

見的提示，儼然要使經濟制度所依據的基礎，全盤改造過來。特關於此點，我不能在這裏作進一步的解述，我打算留在本書後而從長討論，因為在本書最後幾章，要論及現在見諸蘇俄之異樣經濟制度的實在業績，並要論到那種為社會主義者，合作主義者，及世界其他所有進步思想派所鼓吹的代替資本主義的制度。在本節內，我祇是企圖曝露現行制度所由建立的基礎，且指證這種制度在實行上引起『衝突』的（那些為我們所理解的）原因。這『衝突』到現在已具有一種特質，它要求對於曾經被大多數人視為普遍有效，而今日則（因經濟世界的混亂，使資本主義的潛在缺陷更顯明的曝露出來）愈加受到嚴重批判的諸般假定，加以研究的考察，這至少是應為大家所承認的。

第五章 物價與物價水準

第一節 指數

過去每度嚴重的貿易衰落，都曾伴有一種尖銳的物價慘落情形。以過去三年而論，世界貿易與工業愈益陷於深刻的不振，大多數物品價格乃愈益趨於低落，這種相互關聯的簡單事實，差不多絕無例外可言。一九二九年以來的物價低落，實在非常嚴重，而在若干原料與食品的價格，則簡直是反常的暴跌。但這種情況，我們祇有由貿易不振的嚴重性與深刻性上去考慮纔可理解；不過，貿易衰落究在那種限度可以視為物價低落的結果呢？或者物價低落究在那種限度可以視為貿易衰落的結果呢？又或這兩者是否都有其他獨立的原因呢？關於這些疑問，我們不能輕易加以肯定。有一派學者認定價格跌落是貿易不況的直接原因，而其本身則大抵是由於貨幣上的變動。另一派學者着重各種物品之不平衡生

產的影響，以爲那會引起某些『生產過剩』物品之價格跌落，以後更在其他物品價格上發生反動，而造成全般的衰落情形。此外，另有一派學者却主張物價跌落本身爲一種好事，他們說世界的困厄，主要是由於對某些物品價格之人爲的支持；因爲勉強維持某種物價，以致在世界生產力與對各種物品之世界需要之間缺乏相當比例，由是導來勞動與其他生產資源之廣泛的閑置。

但我們暫且把這些對立的理論放在一邊，來考察近年關於價格變動的實際事實。首先，我們須把各種物價之間的差別弄個清楚。經濟學者與統計學者動輒利用所謂『一般物價水準』(General level of price)的概念，他們通常把某些物價指數引用來表示近年的這種『一般水準』的已有的變動。但是，除了最漠然不定的想像外，我們怎樣能夠說及『一般物價水準』呢？即使說這是可能的罷，我們那能有一種測量的手段來測量其是否像用物價指數所指示那麼正確呢？今日一大部分物品的價格，較之一九二〇年甚至一九二九年爲低（許多是非常之低），那自然是灼然可見的事。但在這顯明的概括，與用確

切指數所表示的『一般物價水準』變動的表象之間，存有一個相當的距離呢！

批發價格

普通用作一般物價水準之基準的指數，那是各國（大多數是各國官

方）編製出來，表示那些選定的標本物品之批發價格的變動。這包括於指數中之標本物品的選定，多少是不免有些隨意的。自然，在當事國國民經濟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物品，都會儘可能的設法包括進去，但這祇能做到便於獲得滿意的價格材料的限度。至若這種材料的有效性，一部分要看對於那些物品之有組織的市場是否存在，一部分則要看那些物品本身標準化的程度如何，所以，標準品質的商品全部，差不多都可以引出代表的價格。

由公認方式，計數量發賣的貨品，顯然頗容易獲得滿意的價格材料。就因此故，大多數批發價格之習見的指數，主要是測量原產食品，原料，以及計量出售的部分的完成製品。小麥與麩料，肉類與牛油，煤與鐵，原棉與羊毛，汽油與原產橡皮——所有這些，都是能够很簡單的確定其標準價格的標本物品。通常習見的批發價格指數，一大部分是基於這些標本物品之比較的平均的價格。所以，批發價格指數，主要是測量食品與原料的平均價格，至於

那些出廠或輸入的製造品的價格，那簡直是不易測定的。它們並非一切批發價格之實在的代表指數，極其限度也不過是由一些可以或不可以成爲標本的物品所選出的代表指數罷了。

因此，當人們說一九二九年末與一九三一年末之間的不列顛批發物價水準跌落百分之二五，那不能據以證實不列顛製造業者這時期所賣的貨品較以前低減了百分之二五，却寧可說是他們所買的原料減少了百分之二五。但對於後者，自然還不能說是證實了任何特定製造者或特定貿易所買原料的限度；因爲批發指數是由一大些價格所得的平均數字，而這些價格的變動，不但程度極有參差，甚且方向是正相反對的。

評量之方

批發指數祇測量到若干批發價格，而沒有測量到一切批發價格的事實，我們就令放着不講，對於一般的平均數的作成（那怕就是被選定的物品的平均數吧），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一切被選定的物品，並不是同樣重要的。棉花比絲重要多了，小麥比咖啡重要多了。如其我們在製成一般的指數上，對這四樣物品中的每種物品的變動，加以

同樣的『評量』，那顯然是一種謬誤。爲了要相當的限定每種物品的相對重要性，至少非採用一個大致不差的評量制度不可。關於此點，通常是採用兩種方法：或者用幾種比較重要標本物品的——例如加拿大、阿根廷、澳洲乃至不列顛或美國的小麥的——不同市價，然後給每種市價在總指數中以相等的評量；不然的話，就是在製作指數當中對每類物品限定其明確的評量，比如說，小麥爲十，咖啡僅爲一。

但這也不能說是安全妥當。同一的商品，在不同國度的國民經濟制度上並沒有同樣的相對重要性。就因此故，各國爲測定其自國物價水準而編製的指數，所依據的並非同一種類的貨品，種類即令相同，其評量也不一樣。因此，不同國度的指數，簡直不能確實加以比較；比如說，在小麥與棉花價格上的一定變動，對於其全體的影響是不相同的。

不過，如其我們能把這些限制時時記在心裏，並不誤認這種批發價格指數爲一切物價變動的可靠測量，爲製造品價格變動的可靠測量，那末，這批發物價的指數，就會有相當的用處了。大不列顛頗要依賴食品與原料，就因此故，不列顛的批發指數，乃很可視爲（以

金鎊計算的)世界物價變動之大致不差的指標,並且其表現世界物價,就比表現不列顛全般物品價格還要正確。在美國不同。美國的批發物價指數,對美國國內的價格情形,持有更密切的關係,因為美國之輸入與輸出,於其國內生產的消費的物品數量,比較沒有多少影響。

生活費

除了批發物價指數外,各國幾乎都編製零售價格指數或生活費指數,她們企圖由此測定勞動階級維持其經常生活水準所必需的支出的變動。不過這也有相當的困難。通常對此所用的方法,是蒐集一大些典型勞動階級每週支出的『預算』,再由這編製出一種標準預算,以為勞動階級全體支出的代表數字。有了這種標準預算做基礎,然後再由鋪店主蒐集那些表示各種物品各時期價格的規則材料;至此,測定全體標準預算上之生活費變動情形的指數,乃得編製起來。不過,編製這些材料的方法,各國互不相同,其一般目的則無二致。可是,成爲勞動者消費其收入之對象的物品,一國與他國迥異,在同一國之不同生活標準諸勞動者間亦迥不相同;因此,要比較各國生活費的變動固不容易,

要斷言一國內書寫勞動者與非技術勞動者之生活費皆以同一限度變動，那亦欠妥。非技術勞動者的全部收入，有一大部分是消費在食品上面，所以，他受到食品價格變動的影響，要比受到任何其他物品價格變動的影響為大。總之，各種零售價格指數與生產費指數，都祇算是極粗略的概括，祇算是對於真實狀況的近似。但雖然如此，有了這種測量方法，究比完全沒有要好多了。

——其他的指數 現在有些國家於批發價格指數與零售價格指數之外，更為企圖測定製造品價格而編選一種更加粗疏的指數。還有的國家，且編製一種與工業品價格比較的農業品價格指數，或者與輸出品價格比較的輸入品價格指數。但迄未有一個國家企圖編製一種包括的物價指數，以代表所有一切商品（原產的、製造的、乃至零售的）價格的一般平均水準。

不過，像這種指數即令能編製出來，那也不够成爲一種『一般價格水準』的完全測量。因爲，除了時下生產的商品之外，還有許多物品在買着賣着，並且都有它們自己的價格。

出租的房屋價格，煤氣與電氣價格，乃至某種形式的保險的價格，有時都得包括在生活費指數裏面。但除此以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價格，例如旅行者與貨物運載的價格，股票市場上的股票證券的價格，出租或賣出之土地與工業建築物的價格，借入貨幣的價格（即利率），乃至個人勤務的價格（工資、薪金、東修之類）。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要素，都須包括在『一般價格水準』的概念之中。這諸般價格，有若干能作成個別指數，並且某些國家已實行編製了，但包羅一切商品（零售的、批發的），對某特定社會所支付的一切價格製作一種一般的指數，那卻沒有一國敢於嘗試。

依照這些事實看來，我們對於一國在某一時期的一般價格水準已經改變了百分之幾的那種斷定，就必得以十分懷疑的態度來接受。那應用於批發價格，應用於零售價格，或者應用於若干其他種類價格，也許近於真實；但要應用於一切價格上面，那就萬談不到了。那怕我們在一定時期之內，發現了各國價格指數變動上，彷彿有一種顯著的類似，那也不能遽然說是全世界的物價水準已經有了相應的變動。因為普通對於國際間的比較

(批發價格指數)所用的指數,一大部分是應用到那些大都加入了國際貿易中的食物與原料上面。食物與原料價格的變動,並不一定包括有其他物品價格上的相應的變動。因為其他物品的價格,彷彿受支配於國內或地方原因者比較甚多,而受支配於世界原因者比較甚少。

不過,如其我們對於大多數國家之零售價格與批發價格漲落的指數發現了,一般的趨勢,我們就有理由斷定這其中存有促使價格上昇下降的一般的動因存在。從而,物價一有所變動,我們就自然而然的去考察世界貨幣情形,以為那也許是物價變動的原因。但是,如其我們作此種推測,我們切不可遽下結論。因為,除了貨幣的關係外,同時在許多國家還存有其他可以左右物價平均水準的動因。比如,工農業上的技術的大改進,以致把真實的生產費縮減了;或者,世界工資迅速跌落下來了,那一來,那怕貨幣情形無所變動,物價水準還是會全般的趨於跌落的。總之,我們須時時牢記着:價格指數是一種平均數,價格之百分之若干的漲落,那可以說是包括在指數中之大多數物品價格的比較小的變動,也可以說

祇是其中極少數物品價格的比較頗大的變動。不論多少種價格，都能够平均化。但許許多多的平均數，實在全無意義。平均數縱令是正確的，亦須小心處理。一與九十九之平均數爲五十；但是由這兩個相差太遠的數字作成的平均數所導出的結論，那是容易看出其極端錯誤的。

第二節 近時的物價變動

有了前面所述的這些考慮，我們現在乃能在過去若干年關於價格變動的廣泛材料之中，進行某些方面的觀察。我們開始祇述及兩組價格與兩個國家，即是大戰告終以來的大不列顛與合衆國之批發價格和生活費的變動。先看這兩個國家的批發價格指數，那是以她們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〇年之價格水準的百分比來表示的，至同時期的生活費數字，則並列在批發價格指數之下邊。

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一年之英美價格變動表

年 度	批 發		價 格		生 活		美 (勞動局)
	英 (貿易局)	美 (勞動局)	英 (勞動部)	美 (勞動局)			
一九三三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三〇	107	100	111	100	115	100	105
一九二一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二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三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四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五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六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七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八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二九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三〇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三一	10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 看上表的數字，立刻就顯示出了以次幾個重要之點：

(一) 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〇年間，美國批發價格增到兩倍以上，英國增到三倍以上，而生活費在英國增到兩倍以上，在美國則將近增加三分之二。

(二) 英美兩國的價格，都由一九二〇年之頂點，尖銳的下落。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間，英國批發價格幾減一半，同時美國則減去三分之一以上。生活費在前者將近跌落三分之一，在後者將近跌落四分之一。

(三) 物價至一九二〇年的高漲程度，由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的跌落程度，英國比較美國大多了。不過，以一九二二年之英國價格與美國價格較量起來，前者猶大大高過其戰前水準。

(四) 就全般講來，由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英國批發物價沒有進一步跌落，在一九二四年還有暫時的上漲。美國同時期的批發價格略有起色。至關於生活費方面，則英國稍落，美國稍漲。

(五)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英國批發價格逐漸跌落，——美國因曾經過一九二五年的暫時高漲，故其價格祇略低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之水準。至一九二七年止，兩國的生活費皆在降落，至一九二九年止，則同陷於停滯狀態。

(六)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兩國之批發物價與零售物價均趨慘落。不過，迄乎一九三二年終，美國物價雖然仍在繼續下落，而英國在同年九月金本位停止以後，却表現幾許昂騰的趨勢。但英國一九三一年之批發價格的平均水準，究僅及一九二〇年的三分之一。

(七)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三一年之間，英國批發價格跌落三分之二，美國跌落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前者的生活費僅減低百分之四二，後者僅減低百分之三二。

我們對這些廣泛的不定的物價變動，究能作怎樣的解釋呢？顯然的，物價在英美兩國的變動，並沒有完全一致。由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以及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它們的物價都曾破局的慘落，但在那介在的期間當中，它們的價格史是互有出入的。

英國物價變動的原因 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間——在英國可以說是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間——英美兩國都經驗到了戰後繁榮之可驚的崩潰。英國以前物價的騰昂，是較美國更超過其戰前水準的，因之，她的物價跌落程度亦較美國為大。美國尚保持着金本位制，英國則把金本位制放棄了。金本位制放棄，英國貨幣價值自然跌落。結局，在世界市場上購買貨物，英國就相對的要支出比美國為多的貨幣。至一九二二年，英美兩國貨幣上的這種差別，是大大縮減了，但是不會完全消滅。美國已經清結了戰後的繁昌，已經在採行金本位制，至一九二一年以後，她早已無須用人為方法去壓縮價格了。英國不同。她仍然放棄着金本位制，她的金融界巨頭，急欲恢復這種制度；但迄未採行一種決定的步驟，延至一九二五年，美國物價暫時表現昂騰現象，這似乎有助於金鎊與金元之間的戰前平價的恢復。然無奈美國物價昂騰的時間極其短促。英國要在戰前平價的基準上恢復金本位，就勢須採行猛烈的方法以壓低貨物價格。英國政府與英格蘭銀行認定金鎊必須『與金元相對抗』。至一九二五年金本位制實行恢復。在一九二八年，英美兩國批發

價格高於戰前水準百分之四十。這事實，有些人以為可以證明舊平價恢復已經是一種成功。但實際全非如此。因為英國為要維持金鎊，使金鎊對金元保持或接近舊平價，已覺有採行高銀行率與猛烈限制信用的方法之必要了。英美兩國的批發物價之間既經表現了外表上的調和，為什麼還有這些事情發生呢？

那第一是因為批發價格指數，並沒有真正測定英美兩國的總價格水準。英國主要輸出的製造品價格，實際較之批發價格指數猶超過戰前水準甚多。美國因為金屬品價格的極度跌落，其情形亦與英國相同，特程度不齊耳。不過，就依靠製造品的輸出上言，美國沒有英國那樣利害。英國要在舊平價基準上恢復其金本位制，勢必致增高其主要輸出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因而招致其輸出業上的失業與不況。在此種情況下，英國為要由海外吸收金錢來維持金鎊匯市上的安定，且為要壓低國內物價，尤其是壓低勞動價格，自然不能繼續限制信用，繼續提高銀行利率。加之，美國的商業繁昌，是要加強英國不少困難的，美國因商業繁昌吸去了大量的短期資本，那使金鎊匯兌上更形緊迫，以致促使英國政府進

一步限制信用。

美國的物價

當英國正用人爲方法壓低物價時，金本位制穩定，匯兌上毫無顧慮的美國，却已經在推行穩定物價的政策。她這種政策，就是應工業生產的增加而擴大信用的供給。美國生產力之迅速增加，主要是由於工業與農業的不絕機械化。機械化增進的結果，同量貨物就可由較少勞動量生產出來，因而使生產費用縮減。這效果，因勞動工資率增加有限而更其增大了。就通常的情況講來，這應當引起物價的低落。但物價低落的傾向，由銀行不絕增加貨幣的供給抵消了。自然，對於特種物品價格上的變動，這種政策是無從阻止的，但它却維持住了平均的價格水準。僱用勞動者較少，所僱勞動者的工資，又未隨生產力增加而增加，於是利潤大形膨脹，工業投資踴躍，現有工業之股票市價飛漲，因而形成美國一大商業繁榮。不過，生產費縮減的結果，這繁榮並不會伴隨着商品價格上的增騰現象。然像這種固定價格水準，却充分可以刺激一般事業。

特美國的金融政策，究不足以安定那些大抵要在世界競爭狀況下出賣的貨物的價

格。在世界貿易開始衰落以前好久，美國農民已經發現他們農產品的相對價值在趨於低落。這是我們在前面講過了的。據已有的估計看來，農民剛在一九二九年危機發生之前，他們平均是以超過戰前百分之四十的價格賣出其產品，以超過戰前百分之五十的價格買入其所需的貨品。農民購買力衰減，同時工資對生產力增加的比例，又適足以形成消費品需要減少的結果。

就因此故，美國安定批發價格水準的政策，卒因購買力的減退而破壞了。這種破壞程度，由銀行把新金資從事股票與不動產的投機而加強起來。因為土地與投資的價值，最後終是要靠充分的消費者需要量來維持的。英國為要壓低物價，用人為方法使貨幣稀少，致遭逢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九年間的繼續不況；美國用人為方法使貨幣增多，乃在一大繁榮之後，繼以可驚的崩潰。

我們講過，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終末的英美兩國的物價，是有尖銳的慘落的（雖然不若一九二一年之戰後大收縮期之甚），但這一九二九年以後的物價慘落，無論

就英國講，抑就美國講，都不能把其主因歸之於貨幣政策。因為在這個時期中，她們兩國都有非銀行所能控制的其他動因存在。

就美國說吧，消費者需要衰落了，一般人認定股票證券價格已經高到不能為增添資金提供出路了，銀行家雖再賣力安定物價，亦屬徒勞。而在英國方面，英格蘭銀行所壓低的不列顛的物價，究不能比全世界物價跌落更快或者真正同樣的快。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終，銀行方面縱減少了金資的供給，但這原因與其說是由於審慎周詳的收縮，却倒不如說因為對於金資需要的衰落。

世界其他各國的物價變動 現在我們可以由英美的物價變動，而論到其他主要各國之物價變動。歐洲大陸方面的情形，由若干國家貨幣在大戰中或剛在大戰後遭逢困厄，致惹起巨大的膨脹，而弄得錯綜複雜了。德國就是一個極端的適例。一九一九年之德國批發價格，為戰前四倍，一九二〇年為戰前十五倍，一九二二年為戰前三百四十倍；在一九二三年之最後膨脹中，德國通貨實際已無價值可言，由是物價提高到數百萬倍。降及一九

二四年，新通貨採行，依金而使其穩定。結局，以新幣計算的物價，乃跌落到僅高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七了。

法國的膨脹，與德國頗不相同。但法國一九二〇年的物價爲一九一三年之五倍，一九二六年的物價爲一九一三年之七倍。迨佛郎最後在戰前價值五分之一的基準上安定了，法國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九年間的批發價格，乃約爲戰前之六倍。意大利物價在世界貿易衰落之前，已經定着於其戰前水準五倍的限度了。斯堪底拉維亞的價格，亦在一九一八年增高到戰前水準的三、四倍。荷蘭物價將近提高三倍。迨英國恢復金本位制，這些國家亦繼英國之後，在戰前匯兌水準上恢復其金本位制了。

因此，我們在這裏就當計及兩組國家：一組是在舊平價上保持或恢復金本位制的國家；另一組國家，則是以貶價方法壓低其通貨之金的價值，或者是在金的基礎上發行新通貨以代替舊通貨。

由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一年世界批發價格（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1. 在舊平價上維持或恢復金本位制的國家

國度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三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四
英國	三〇七	一七〇	一五九	一五九	一六六	一五九	一六九	一四四	一四〇	一五九	一六九	一四九	一四〇	一四〇	一三〇
美國	三三	一四〇	一五九	一四〇	一四四	一四九									
瑞士	—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八	一五	一六	一五							
荷蘭	二五	一三	一六	一六	一五										
瑞典	五九	三三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六									
挪威	—	—	—	—	三三	二六	二五	一九							
西班牙	三三	一〇	一六	一六	一五	一六									
日本	五九	二〇	一六	一六	一九	二〇	一九								
阿根廷	一〇	一四	一三	一三	一五										
加拿大	三〇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五								
澳洲	三六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九	一五									
南非	三三	一〇	一六	一六	一九										

第五章 物價與物價水準

2. 貶低通貨或發行新通貨的國家

德國	一四六	一九二	三三〇	一六六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	一四二	二四〇	一〇九	一八〇	二一七	三五	一一二
法國	佛郎金	五元	三〇五	三三七	四九	四九	五五〇	七三	六七	六〇	六〇	五三	四三	四三
意大利	里爾金	五元	五七	五九	五五	六四	六四	六五	五七	五七	四九	四八	四二	三三
比利時	佛郎金	五元	五七	五七	四九	五三	五九	七四	八四	八四	八四	八四	七四	五六
3. 世界十五個國家的通貨物價平均水準之大略計算														
	三六	一三	一〇	一九	一三	一六	二〇	二六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右表所揭的數字，係說明世界主要國家在一九二〇年以後的批發價格變動情形。英國在一九二〇年的批發價格，已經超過了平均數以上許多——在第一組國家之中，僅僅瑞典一個較英國為高。但至一九二二年，英國與世界的批發價格重又趨於平衡。直到一九二五年恢復金本位制止，英國價格尚是保持或接近一般的平均數，但至一九二五年以降，則漸漸落到那個水準以下了。

自然，這裏成爲問題的，就在英國物價跌落是否由於在極高鎊價基準上恢復金本位制。不過我們須得牢記一件事，就是英國批發價格指數所測定的，不是製造品的價格水準，而主要是那些大都由外國輸入的食品與原料的價格水準。至其他國家的指數，亦大抵是測量原產品價格，特其程度不必一樣。比如，以德國指數與英國指數較量起來，前者則包括有較大的製造品成分。就因此故，英國物價指數上的相對的跌落，那與其說是任何貨幣上的原因，却大體可以說是由於輸入原料與食品價格的慘落。不過，英國在恢復金本位制之後所行的收縮政策，那究不失爲其批發物價相對跌落的一個動因。

顯然的，英國的輸出價格上的跌落，並不會與其輸入價格或總批發價格的跌落保持同一限度。那怕就在一九三一年吧，儘管輸入平均價格已經低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五，而輸出價格却仍實行保持住了高過戰前水準百分之四十的平均數。英國製造品價格的這種相對的昂騰，就在貿易衰落幾遍及世界的時候尙繼續支持着，並且，自世界貿易衰落以來，各國都會加強這方面的作用。不過，英鎊對外價值高昂，致使製造業者極難縮減費用，就因

此故，英國輸出價格對輸入價格的懸殊乃較全世界的這種懸殊爲大。

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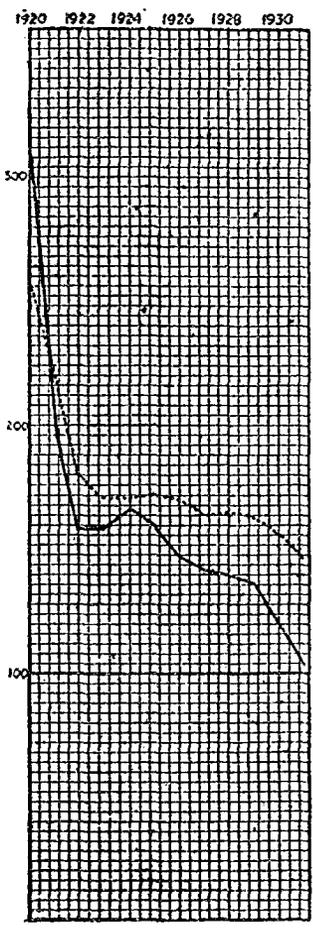
我們現在可以由批發價格論到零售價格了。這零

售價格，寧可說是各國測定生活費變動之指數。我們講過，在大戰中及大戰後，美國生活費提高的程度是遠不及英國的。但至一九二一年以後，兩國指數漸形接近。到了一九二五年以後，她們對於戰前的增加率，簡直沒有多少區別了。不過，美國在一九二九年所受貿易上的破局影響較大，故此後零售價格之跌落亦較英國爲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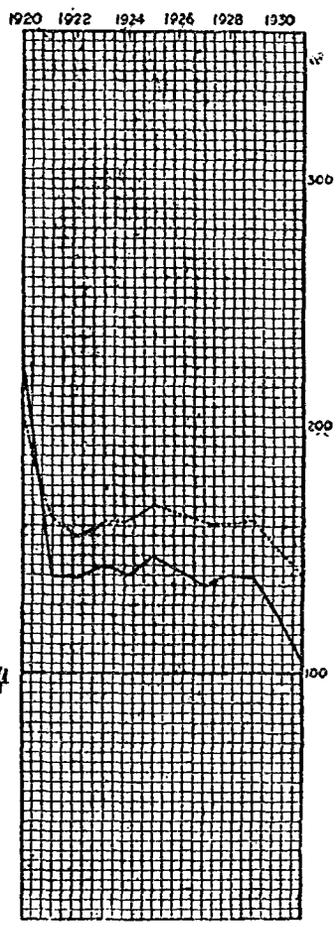
就通常情形而論，當貿易衰落時，批發價格較生活費之跌落尤爲利害而迅速。那正如當貿易興旺時，批發價格較生活費之騰貴尤爲利害而迅速一樣。需要上的變動，在食品與原料價格上所發生的反動極大，且極迅速；而在製造品上發生的反動，則遠不若前者之迅速。一般的講來，這原因可以說是由於以次的事實，即使製成品迅速供應一種變動的需要水準，那是比較容易多了。食品與許多原料的生產，須要一個長的期間，所以，當製造業因製造品需要縮減而縮減其原料與食品的購買時，原生產物生產者就要經過比較長的期間，

才能適應其供給，加之製造業者爲了縮減供給以維持價格，他們類能聯合起來。而同時大多數的食品原料生產者，大都是散住在廣泛的地域，他們要有所聯合，就頗非易事了。不錯，在當前貿易衰落的狀況下，像咖啡與銅一類原生產物生產者，也曾聯合維持其價格，但他們要做到這點，計惟有把大宗積貨移開市場。比如，就小麥來說吧，如其把大宗積貨充塞到市場上去，勢將壓縮價格；不然的話，如在銅的場合，那暫時縱積貯起來，但終久是非出清不可的。這樣，其價格在結局所受到的壓制，就比之聽其自由適應市場而不加以限制，還要嚴重得多。

職是之故，無怪一切國家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之間，或大多數國家在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二年之間，其生活費的跌落程度，遠不若其批發價格跌落的利害。但我們不能據此作這樣的解釋，說在那些相間隔的諸年度中，美國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變動不相上下，英國的批發價格則較其零售價格繼續有更利害的跌落，故此兩者在以次圖表上所明白顯示的距離，亦幾乎在不絕的擴大。



英 國



英 國

由1920年到1930年之英美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
 ——批發價格 零售價格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

金本位制的復歸

英國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間之跌落距離的不絕增大，那是依戰前平價恢復金本位制的結果之一。金本位制恢復，英國通貨的對外價值提高，因而英國就在世界市場上以較低廉的價格購買貨物。可是，英國製品的生產費，却並不因此引起相應的縮減。那原因不僅是由於英國勞動組合堅決反對減低工資，且是由於英國要以人為的方法恢復其由戰前平價所抬高的匯兌率，因而增高利率以吸收海外資金。因此，英國輸出品價格昂騰，英國輸出業者乃喪失其世界市場之貿易。而同時英國的生活費，却又對於世界物價之不絕低落的水準仍保持着高昂的程度。

其實，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之間的變動距離的增大，那並不限於英國，若干其他的國家也是如此。不過，那些國家所發生的這種現象，其原因當求之於恢復金本位制所導來的通貨收縮政策。一九三一年的事實明示我們，英國在當時並不是高抬幣價的唯一國家。以金來計量的法國生活費，無論是對戰前的生活費抑是對批發物價的現行水準，都是相對低落的，這原因，係因法國恢復金本位的方法，不是收縮通貨而是貶低通貨的價值，所以它

但這裏有一件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就是在英國停止金本位制以後，其他金本位國家的物價，還在繼續跌落，假若英國仍維持金本位制，英國的批發價格，也還是會跌落的。此種情形，可由下面的數字來說明。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與同年年終之間，由金元兌換所測定的金鎊價值，大約跌落百分之三十。據經濟學者所說，同期內主要原生產品之金鎊的價格，約跌百分之二一，其在世界市場上用金計算的價格，則跌落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因此，把以金鎊計算的真實價格，和以金計算的價格一加比較，前者就將近提高了百分之二五。雖然如此，這些物品之金鎊的價格的增高，猶較少於以金計算之金鎊價值的跌落。這種情形，一部分是由於累積的貨品之存在，但也由於英國能由海外那些停止了金本位制的國家取得其較大部分的供給，同時，英國的生活費，又祇有非常有限的提高——那簡直與前幾年度之正常季節的提高，不相上下。不過，在此種場合，還須把世界物價跌落的情形加以考慮。如其英國仍舊維持金本位制，一九三一年以來的英國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是定然要尖銳的慘落的。

第三節 物價的安定

我們所考察的是一般的物價。但前面講過，測定一般物價的指數却是由許多不同種類物品之特殊價格所製成。並且，就大多數的用途來說，這些特殊價格的變動，比較一般價格水準之變動的估計還要得多。因為不同物品之相對價格的變動，那在經濟制度上，簡直是和一般漲落的變動一樣固定。並且，在過去若干年間，有些特殊物品的價格，曾經有過極其不常的慘酷的變動。

橡皮價格是一切實例中之最可驚的實例。英國市場上之橡皮的價格，在一九二七年年終，每磅價格將近由四先令跌到八便士，至一九三一年八月，更跌到二便士半。二便士半對四先令，幾跌落百分之九五。橡皮價格在一九二五年之昂漲，係由於在需要迅速擴張時，反以人為方法限制其供給之結果。而此後價格之暴跌，則是由於限制供給的組織破壞，致引起生產過剩之結果。不過，那些未參加限制供給組織之地域（如荷屬東印度）的擴張

產額，也大有關係。一九三一年之過低的橡皮價格，確使最大一部分生產者蒙到了致命的損失，但在實際，還有一大些不能以這種極低價格投售出去的存貨咧！像這種例子，本來算是特出了，但以前有些物品，經過了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間之狂跌，至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三一年間，又復跌落一半，甚或跌落一半以上咧！下面物價變動表所指示的英國市場價格，那將充分說明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九年終乃至放棄金本位制的一九三一年八月的情形。從那個表中，我們將知道，在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三一年間，加拿大之小麥、玉蜀黍、棉花、羊毛和鉛的價格，都跌落了三分之二乃至三分之二以上。英國小麥、錫、銅、咖啡與牛油的價格，將近跌落了一半或一半以上。而同時新西蘭之羊毛價格，跌落三分之一，生鐵、木材、牛肉、乾酪，則跌落四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以上。自然，一大部分這類物品的生產者，要想使其生產費適應這樣慘落的價格，那是全不可能的。

然而，生產費確是大大縮減了。生產費的縮減，一部分係由於低減工資的結果。在大多數國家中，物價一經跌落，生產費就相應縮減。不過，生產費的縮減，往往也由於生產方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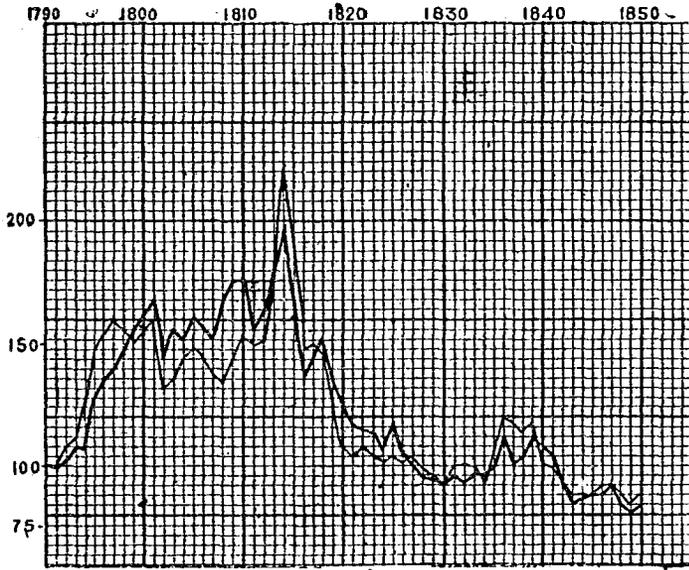
改進——生產方法如其改進，真實的和金錢上的費用，都會減低。像此種生產費減低情形，可見之於採掘業及製造業上，也同樣可見之於農業上。因為工業上機械化的發展，世界大部分地域會因其影響而改良種植方法，而採行更科學的動植物選種和培育方法。直至此次貿易不況的開始時為止，全世界之食品與原料的實在產額，確實有極其迅速的增加。這種產額的增加，有一大部分是因為生產方法的改進。

近年一切物價之極端動搖，以致任何國家皆不絕增加其安定物價的需要。生產者因價格迅速跌落不已，曾力言價格如能使其穩定，則不況可以消滅，工業也不致在發展當中當心更進一步的挫折。因為在他們想來，價格一經安定，不絕增進的生產力，就能希望較多的利潤與工資，因而使僱主與勞動者交受其利。

第一表 物價的動搖

拿破崙戰爭當時及以後之英美批發價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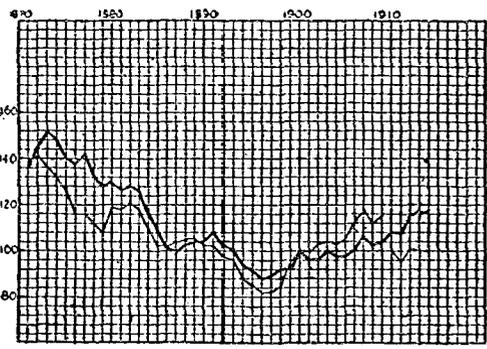
(一七九〇年到一七九一年為一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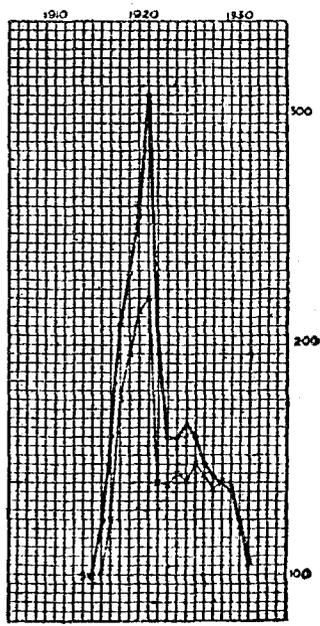
——英國(喜爾柏林的指數 Sillbering's Index)

——美國(農業部指數)

第五章
物價與物價水準



第三表
批發物價 (一九一三年為一〇〇)
物價的動搖——大戰中及戰後的英美



第二表 物價的動搖
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
四年之英美批發物價
(一九〇〇年為一〇〇)

物價可以安定麼 然而事情並不是如他們所說的這樣簡單。我們將安定怎樣的價格呢？我們是把批發價格或生活費的一般水準定着起來呢？抑是把特別物品特別勤務的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定着起來呢？穩定價格，是就一國着手抑是就全世界着手呢？最後，當我們已經決定穩定某些物品價格時，究將怎樣使其實現呢？

近年以來，有些特殊的僱主團體，曾對其必需出售的物品作過種種安定價格的努力。但生產方法與需要趨勢變動，各種物品之生產費，顯然不是以同一比例變動。假若每種物品的價格安定起來，某些企業會立即以超過生產費價格許多的價格出賣其產品，而同時其他企業的產物，就祇能以低得多的價格發賣。這一來，前者就會獲得大量的剩餘利潤，並且，對於那些生產費大減的物品需要的擴張，勢將在極不利的情形下受到阻止。把特殊物品的價格暫時安定下來，那也許是一件有益的事體。但使每種物品的價格安定於一種無關其生產費變動的特殊水準之上，那却就顯然是一種荒謬舉動了。就因此故，我們必須排除特殊價格之永久的穩定。

然則一般的價格水準，究應怎樣去穩定呢？這當然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測定什麼是一般價格水準的材料，本來就沒有。不過，我們暫時可以假定，我們的目的，是要在某種形式之下，安定批發價格的水準。自然，這個水準，要看作是由一大些特殊價格所製成的平均數。假若要使這個平均數安定下來，那麼，某種物價一有跌落，其他物價就必須為抵補此種跌落而擡高。並且，如其在大多數業務上，其真實的生產費用，因生產效率的增加而減少，那麼，除了勞動工資提高到了吸盡生產力改進利益的限度，其限界的利潤，是定然要增加的。在生產力不絕增進的經濟制度下，價格的安定，勢須把生產效率增進的全般利益，在增加收入的形式下分配於一切生產者。

有人會問，為什麼沒有這樣分配呢？假若事情能够這樣安排，為什麼沒有實行呢？大多數人都是寧願增加收入而比較不願低減價格的。並且，前者似乎更容易刺激生產的增加。不過，困難之點，就在各國生產力的增進並不是一致，各工業上之生產力的增加，也不一致。但較量起來，前者還要利害了。價格的一般水準，如其是由國際協定安定下來，那麼，當某種

特定價格允許變動時，在生產力發展最迅速國度的最迅速發展的工業，就能在世界市場上，不絕以較低廉價格的產品競勝其競爭者。真的，假如要使一般價格安定，這些廉價產品價格上的跌落，就要其他物品之價格上的增加來平衡。在收入能按比例增加的限內，這似乎不致引起困難。

可是，這種說法的真實性，祇是靠着一種假定，那假定是說，一般價格的水準能在世界基礎上安定下來。但這是可能的麼？除了極其有限的標準原生產物之外，決不能有何等世界價格。嚴格講來，世界價格水準決不存在。大多數物品的價格，大體都要受各國甚至各地方原因的影響，各國都有各自的貨幣制度。這貨幣制度，會支配其貨幣發行額，由是支配其國內價格水準。不錯，各國如都採行像金本位制度一樣的貨幣本位制度，把她們各自的通貨對於金的換算率加以確定，那也許會使其價格水準在某種限度內趨於平衡。但同本位的貨幣制度的採行，究不是以同一程度影響一切用金國家之國內價格水準，甚且也不會使其維持一種永恆的關係。要安定世界物價，世界須有一種共同的通貨，這通貨由一種世

界銀行制度管理，一切國家對此世界銀行組織，應放棄其控制貨幣的權力。有一天，世界也許是會採行這樣一種銀行組織的，但在目前決談不到。

世界物價水準存在麼 此外，我們應當把我們所謂世界價格水準弄個明白。不同的商品，在不同的國度中，有極其不相同的重要性。但我們講過，任何價格的一般指數，皆包含有指數所含諸特殊商品之相對重要性的『評量』。這對全世界是怎能推行呢？一種對全世界正確的『評量』，對各特殊國家定然是不正確的。

加之，每個國家的價格水準，並不僅受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且會受賦稅特別是關稅以及其他保護方式的影響。假若若干國家擡高關稅，因而擡高其物價，那能由其他國家的物品價格跌落得到補償麼？然而，要安定世界物價水準，又非這樣彼盈此絀不行。而在實際上，若干國家的物價騰昂，其他國家的物價並不隨之而跌落。她們的辦法，大概是以報復的手段擡高其關稅，從而擡高其物價。因此，世界物價水準的概念，如非在各國確然放棄保護關稅政策的世界中，是決難使其容認的。

我們要設法使世界物價較現在安穩一點，雖有可能，但要使一般世界價格水準完全穩定，那就簡直是一種幻想了。然則各國將在一國基礎之上安定物價麼？每個國家應當自行安定其物價水準，同時却又讓這水準，從而讓其匯兌率隨着其他國家之匯兌率上下變動麼？

國內的價格安定政策 在一定限度內，這是一種比較實際的政策。但在現行金本位制存在的狀況下，甚或在其他永久固定各國不同貨幣之相對價值的任何國際貨幣本位制存在的狀況下，這政策顯然沒有實行的可能。就令一切國家同樣採行一種國內價格安定政策，這政策實行的可能性仍少。設有些國家採行此政策，其他國家不採行此政策，其實行可能性顯然就更少了。在短的期間內——够應付貿易者、短期投資者及儲蓄者的需要的時期內——各國誠然能由通貨的管理使其國內通貨安定下來，但管理通貨，要成爲一種按照長期變動而改變其國內通貨之相對價值的手段。在修正的金本位制度之下，這也許能行得通，或者管理匯兌，完全不用金屬本位，也能做到。不過，關於此點，在次章還要從長

討論。

美國之安定物價政策

假若一個國家打算讓她的匯兌上下變動，她就能夠在某種限度內作安定其國內物價水準的嘗試。剛在世界貿易衰落的前數年中，美國就曾實行此種政策，而收到了若干成效。但這種政策的推行，亦頗不容易哩！我們講過，要確定什麼價格的一般水準（那怕單是商品的價格吧），那並不是簡單的事體。貨幣不但用以購買商品，且用以購買各種人的勞務；不但購買那些即時消費了物品與勞務之即時生產的供給品，且購買各種包括有股票證券的土地與財產。一國固定一般價格水準之唯一方法，就是調整其貨幣（包括有銀行發行的信用與通貨）的供給。但通貨與信用都能用以購買任何出賣的東西。而且一定是通貨發行出來，究會以多少購買貨物，以多少購買其他如股票證券一類東西，又訖無保證。這是美國安定物價努力所達到的根本困難。如把物價安定起來，那生產費的減落，就等於說是利潤的提高。因為在物價安定的情形下，勞動者是不會因真實生產費的減少而得到較高的工資的。以較低生產費生產的物品加多，要阻止物價跌

落而加入流通界的貨幣就須愈益加多。但這不絕增添的貨幣，有一大部分不會用以購買即時生產的貨物與勤務，却會用以購買股票、證券、土地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財產。用在這些方面的貨幣愈多，爲要維持物價而擠入流通界的新貨幣，就愈非加多不可。分期付款的購買制度，即無異一種增加新幣的手段。這對於貨幣需要給予了一種人爲的刺激，因而頗有助於美國貿易景氣的維持。但是，工業機械化不絕增進的結果，勞動需要減少，生產却繼續增加，這樣，要阻止貨幣流注到股票投機方面，要維持物品的需要，就越發困難了。由是新增貨幣用以購買其他財產者愈多，用以購買即時消費的物品與勤務者愈少。這種傾向一直繼續下來，最後，大家明白了，這些財產的價值，要靠物品需要來維持。大家一經明白了這種關鍵，股票市場粉碎了，美國銀行組織立即感到它在貨幣需要迅速減縮的情形下無力維持物價水準。因爲銀行方面要向流通界增注貨幣，勢非大家準備向銀行通融貨幣不可。然在股票市場崩潰以後，他們都不願通融資金，並也不能通融資金了。

這樣看來，美國國內價格的安定，無非是建立在股票市場投機的基礎之上，而這僅由

貨幣總供給額之調節，以期安定一般物價水準的方策，應用起來，究能有怎樣的效果，那是無須煩言的。不過，我們不能據此就說股票上的投機乃是美國金融恐慌的結局原因。因為投機本身是一種更深根固蒂的原因的結果。美國生產力增進了，如其美國的工資及其他小收入迅速增加起來，足夠吸收不絕增加的物品之供給，那麼，股票證券以及其他財產的真實價值即令再大，在股票市場上，乃至在不動產上的投機，也是定然要少得多的。然在當前的經濟制度下，我們很難遇到這種事體。現在生產力有最大進步的工業，就是那些以機械替代勞動收到了最大成功的工業。即令勞動者個人方面的收入有極迅速的增加（實際並非如此），而全體勞動的總工資額，却必然要由機械的代替勞動而漸形減少。這樣，對於消費者物品之總需要，仍不免要引起反動。加之，生產力有最大進步的工業上之工資的提高，並不會導來其他生產力進步較小的工業上之工資的一般提高，從而，也無從實現那種增加的購買力之一般的分配。要使這一般的分配實現，計惟有讓那些較有大生產力的工業製品跌落，而不抵償其他物品之價格的提高。換言之，在現行經濟制度之下，消費者全

體之購買力的適當分配，乃與物價水準安定相衝突。

無疑的，假若美國是和蘇俄一樣的社會主義者的社會，這種困難是不會發生的。在那種社會中，國家要使其一般物價安定政策保持平衡，她可以支出儘够維持需要之正當數量之工資，而無須顧慮到已付工資對任何特殊工業上之生產費的關係。但美國是一個資本家的社會，她的每個僱主，都想爲他自己及其股東掙得超過生產費以上的剩餘。因此，在那些真實生產費比一般減落較少，因而不曾引起失業人口增加的工業上，工資就不能增加起來。其實，在全般的工業上，工資率的增加，皆極其緩慢，並且，因了進步的工業之機械化，僱傭總量亦沒有增加。

由是，美國的經驗，遂引起人們對於資本家社會是否真能實行一般價格安定政策（卽令是以一國爲基礎）的懷疑。他們彷彿覺得在這種社會中，要保證消費者需要之必要的擴張，不能專靠提高工資，還須在增加的產品得到銷路的場合減低價格。這種說法，並不是說不應提高工資，工資是決非提高不可的。不過，效率增加的產品如可暢銷，價格也有

減低之必要。

減少物價的動搖

然而，在大多數國家中，物價是能夠有利的維持着，不致像今日這樣動搖不定的。因為特定價格與一般物價水準的變動，乃發生於兩組判然各別的原因——由獨占和戰爭擾亂一類結果所招致的原因，乃至由消費者需要傾向改變所引起的暫時脫線情形，姑且擱着不說——其一是由於生產狀況改變，其一是由於貨幣情形的改變。由前一種改變，受影響的祇是特殊的物價（自然，那怕是一件簡單的變動，也不祇影響到某一種工業），由後一種改變，則受影響的為一切物品的價格，不過，一切物價不是以同一程度漲落罷了。

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消除一切由貨幣狀況變動所生的物價變動，同時，讓物價在生產狀況變動的場合，自行自由去適應，那也許是再好不過的吧。不過，這不是說，貨幣的供給，應當使其固定不變。貨幣供給一經固定，勢必在貨物增加供給的場合，要人為的壓低價格。同時，這也不是說，貨幣的供給應當按照物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因為從低減生產費的觀點

看來，這種方策就等於說是人爲的擡高物價，其結果必致引起社會收入之不當的有害的分配。正當的途徑（假如能够這樣安排的話），就是讓物價隨生產力之增進而減落。但這種減落限度，當比較其能够適應生產力之增高的限度略少，但不能太少；因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以擡高價格的形式，對於生產略施刺激，雖有必要，但此刺激過大，就必然要導來一種破壞。

但是，假如這是一種企圖達到的目的，究將怎樣使這目的實現呢？顯然的，要實現這種目的，不能使貨幣的供給機械的按照物價或生產的指數的變動。因爲物價的指數，乃反映着一切作用於價格上之諸原因的聯合的結果，而生產的指數，又不能指示我們任何有關生產費的事體。實在說來，一種想在價格制度上保持相當限度的安定性與伸縮性的賢明貨幣政策，是不能够機械的運用的，那必須仰賴判斷，仰賴一種力求分析價格變動之各種基因的有意識的處理。要使物價得到相當的安定，那在貨幣政策的管理上，與其應用概算的方法，就毋寧應用經驗。

此外，我們如其把一般價格水準的問題放在一邊，相對的價格，也是至關重要的。這種相對價格的動搖，促成了近年若干嚴重的困難。我們講過，原料與食品價格的跌落，遠較製造品價格的跌落為利害。這一來，那些大體靠原生產物輸出貿易的國家，就要減低其購買力。她們對於製品之需要的減退，勢必引起工業國家之廣泛的失業。而在美國那種國家，同時是原產物生產者與製造品生產者，其農業購買力減退在都市工業上所發生的反動，恰如澳洲市場崩潰在英國工業上所發生的反動一樣。

工業品價格與農產品價格 我們以美國為例來說明當前的情況，那比採用有關一大些國家的例子，實在容易多了。曾有人估定，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三一年冬季之間，美國一定量農產物對於其他物品所具的購買力，一般跌落百分之二五，一定量工業品對於其他物品所具的購買力，跌落百分之三〇，而同時一定量都市製品的購買價值，則反增加百分之九。農民出賣其產品的價格跌落三分之一，他們為購入其他物品所須付出的價格，則增加四分之一。

一個在澳洲或匈牙利之農民，與一個在英國或法國之製造業者，他們與美國同國內之農民與製造業者之地位，實在沒有區別——這種情形，或者一直要繼續到一切國家都先後被迫而放棄其金本位制度為止。下面的數字，可以說明那些國家，即有詳細記載可供參考的諸國，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三〇年之間的原產品與製成品之相對價格的變動。

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〇年原產物與製成品之相對價格的變動（一九一三年為一〇〇）

國 度	原 產 物	製 成 品
德 國	* 110	143
意 大 利	336	415
加 拿 大	106	126

* 除去食品

† 包括半製成品

可惜我們不能由其他國家得到可資比較的數字。但上表所舉列的，却無疑可以看作是代表的數字，並且，自一九三〇年年終以來，這種相對價格的懸隔，甚且比以前更大咧！

論到這裏，很明白的可以作這種結論：就是工業上的繁榮，如其得到了順利的恢復與維持，物價不安定的問題定然可以解決。但絕對的價格安定，不但沒有實行的必要，且也沒有實行的可能。價格的動搖不定，不是純粹由於貨幣的原因，不能純由貨幣上得到補救。比較健全的貨幣政策，確不難減少許多物價上的變動。關於這點，我們在後面還要從長討論。不過，價格不安定的原因，乃更深蒂固的存於現代整個經濟制度之組織與作用中。那些為解決當前經濟困難所提示的救濟方策，雖然都在以這樣的希望指示我們，以為世界各國如其採用這種或那種特別方策，為其銀行政策的基礎，一切困難便可迎刃而解，但我們關於這些方策的採行，究非慎重其事不可的。

第六章 貨幣信用與資本

第一節 何謂貨幣

本書前面述及現代經濟制度之輪廓，皆在可能範圍內盡量避免一切由貨幣行為所引起的錯雜關係。這種企圖，是想把貨幣形態留在後面討論。因為在貨幣形態中，一切進步國家有關貨幣的經濟事項，實際有一大部分要推行到基本的經濟的實體——即使用在財富生產上之實物及在財富消費上所享受的實在滿足。但論到這裏，我們顯然不能再把貨幣問題放在一邊。因為第一，無論在那種場合，貨幣差不多都是交換貨物與勤務，乃至對這些貨物勤務作生產準備之慣常手段；第二，貨幣的行爲，在過去數年之經濟事實上顯然是極關重要的要素。誠然，有些人幾乎把一切經濟的困難都歸之於貨幣的誤用，從而主張貨幣政策一經改變，一切都能納入正軌，而無須經濟組織其他方面之根本改革。這些人都

算是『通貨幻想家』(the currency cranks)。在一切經濟困厄的時期，他們的教義異常迷惑人心，以致產業制度一發生不好景象，我們就可預言那些為恢復繁榮而增多貨幣的一批視為確然無誤的新計劃，將迅速的呈現出來。但是除了這些貨幣幻想家以外，還有許多有理性的人們，也把我們當前一大部分的困難歸因於貨幣，他們以為要走上繁榮之路，改革貨幣要比其他事體急切多了。

這種貨幣政策問題，確非普通人所易於理解，所以要把問題的這一部分加以簡潔的解說，就比較平常更費周折了。我們在想及並言及貨幣時，定然容易失其常態，而失却常態的人，又似乎不能談到任何問題。因此，已經了解世界貨幣與銀行制度之作用的讀者，如其覺得我告知了一大些為他們所完全知道的事體，那就祇好請他們原諒；因為要假定最大一部分人民都有關於貨幣機構活動之基本知識，在我是頗不放心的。

貨幣在現代世界中之第一的最顯著用途，就是購買那些為我們日常所須購買的物件——如零售店中的衣料食品與菸草，如飲食店或公共食堂中之飲料與餐食，如戲院或

電影院中的座位。任何或者一切小的支出，都成爲普通市民每日之常務。至貨幣的第二個用途，那與其第一用途關聯着，那就是支付工資。製造業者，僱有家庭僕役的管家婦，以及其他各種各色的勞動僱用者，慣常是以實在的貨幣支付其僱工的工資。而這依工資形態配分的貨幣，自然有一大部分要成爲消費者日常所要支出的貨幣。

通貨與其他的貨幣形態 我們前段所說的貨幣，乃是在通貨意義上的實在貨幣。『通貨』(currency)爲包含銀幣或銅幣(現世界殆沒有使用金幣)乃至由紙印成的鈔票。像這類貨幣，在發行國內到處自由周轉，到處可以支償貨物與勞務，通常都稱之爲通貨。我們講過，通貨主要是用作零星支付，並且一大部分的通貨，都在不絕由甲手轉到乙手。僱主由銀行方面獲得的通貨，用以支付工資。工資勞動者把它消費掉，於是，原來的通貨，轉到店主，地租徵收者，保險經理人以及其他營業者手中了。經過相當的周轉，通貨重復回到銀行方面。銀行方面又照原來的路徑，發行出去，收取回來。通貨像這樣由銀行轉到消費者手中，又由消費者手中轉到銀行的運動，普通稱爲通貨之流通(circulation of currency)。

不過，在經濟極發達的社會中，貨幣已不復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貨幣形態。商人們彼此的結算，並不用這種貨幣，不但商人，就是那些富有的消費者，他們照例祇是用通貨作爲日常小規模的支付，至其他大部分的支出，則不用通貨了。在一國內的商業往來賬務，通是由支票結算。中產階級的消費者，亦具有支票簿，他們大部分的憑單支付，都是用這種支票。過去一百年來的世界貨幣制度上的一大變革，就祇是對於不絕增大其總額的金錢事項的清償，不用實在的通貨而用支票。

但當金錢的事項，不發生於一國之內而發生於國境以外時，則常常使用其他種的貨幣。一切通貨，都是由政府或某特殊國家銀行發行的國家通貨。這種通貨祇能通行於發行國國境以內。假若一個人要作國外的支付，他就不能使用他本國的通貨了，又或他要往外國遊歷，他必須用本國通貨掉換他要去遊歷的國家的通貨。並且，一個商人要償付他由海外購買的貨物，他也必須攜帶某種外國貨幣。不過，國外遊歷者帶他要去遊歷的國度的實在通貨，雖屬常見，但國際貿易支付的額數過大，那不適於帶通貨，也不常用支票，而是採用

另一種支付工具——這工具實在比支票還要古舊——即所謂匯票。

因此，我們在貨幣制度的考察上，就不僅要論及各國所發行的通貨，且要論及那些在現世界商工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其他支付工具，即支票與匯票。我們第一要做的，就是在可能範圍內，把這各種貨幣形態的相異相似點，解說明白，且把支票、匯票以及其他通貨代替物，對於它們所代表的鑄幣與鈔票的關係解說明白。

符號貨幣 我們開始來考察通貨，並把我們考察的範圍限定在一國之內，而不用涉及一國通貨與他國通貨掉換的複雜關係。前面講過，一國的通貨，包括金屬鑄幣以及用紙印成的銀行鈔票，或不時由政府發行的鈔票。這類通貨，有較大一部分是符號貨幣（*token money*），即是說，它所含的內在價值，與其所標刻或印記的貨幣價值不符。它是由其發行的環境之下，獲得其價值，獲得其對於物品與勤務的購買力，在某一個時期，它誠然不是如此，比如就金屬所鑄的通貨說，那含有實在重量的金屬，並附有刻印，其實際所具價值，與其額面所刻印的價值全然相符。因為金屬也如其他商品一樣，有其內在價值，它這種價

值，係取決於其與生產費有關的需要。但在實際，任何國家流通的貨幣，從不會含有這樣一種內在的或商品的價值，這價值恰與發行當局所標刻的價值完全一致。即令鑄幣在發行當時，持有這種內在價值，但不久即因損耗而減其重量；並且其重量減到某種限度以前，通常還是當作其含有原來的內在價值而通用。在過去，鑄幣的重量，如因耗損或故意削剪過甚，人們往往也不肯照其額面的價值收受；他們對於這種鑄幣的支付，不是按照其數量，而是按照其重量。在許多世紀中，這個通貨貶值的問題，曾成爲文明世界的主要金融問題之一。通貨的貶值，並不僅由於磨損，由於剪削，且由於政府方面的自動。政府當着財政困難時，以貶值的貨幣支償債務，那顯然是一種籌款的方便法門。然而曾在許多世紀，至少在理論上，流通於大眾手中的貨幣，不是標記貨幣，而是實在金屬；這金屬被認爲具有一種與其所購買的物品一樣的內在價值，不過通常要減去一點政府的發行費或鑄幣費罷了。後來，爲了防止剪削，造幣上有了種種改良。例如凸形幣邊的作成，於防阻剪削活動大有功效。並且，金是最有價值通貨所由鑄成的金屬，金所具的這種優越性，不僅是由於稀少，由於它具有

大的內在價值，而是由於它具有不易磨滅的能力。

在整個中世紀中，西歐始終缺乏通貨，即缺乏通貨所由鑄成的金屬；通貨缺乏，於壓縮物價有極大的效果。因為，我們如其用有限的貨幣購買不絕增加的貨物，那物價必然是要低落的。貨物數量增加了，每一枚貨幣，一定要購買較以前為多的貨物。美洲的發現與新大陸貴金屬的大量流入，全歐洲物價突然引起了可驚的暴騰，而以後一世紀中之經濟上的煩惱和社會的擾亂，當可由此說明。在十九世紀中，我們曾經經驗過類似的變動。一八五〇年後之加利福尼亞與澳洲之新金礦的發現，以及同世紀末葉之南非洲新金礦的開採，亦曾惹起了物價水準的暴騰。於是，有些人這樣設想，以為我們今日困難的根源，乃在於金之供給，不能與近年世界金之生產力之發展，保持相當的比例。

我們上面所說的這些，似乎都是表示這些用作通貨的金屬之內在價值，究是一件有根本重要性的事體。因為，政府對日益增加的通貨的流通，如其利用其發行權力，把賤劣金屬參雜在貴金屬裏而以貶減其流通鑄幣的內在價值就行，那麼，金銀的缺乏，就無關輕重

了。然而，事實是這樣，直至最近，流通貨幣的內在價值，還視爲重要，並且，政府的權力——即對於其所發行貨幣，賦予以超過其金屬以上之購買力的權力，是有限得很的。實際流通的鑄幣，除了用以購買貨物外，不能換成其他的什麼，無怪人們都要按照鑄幣所含金屬之內在價值，而評價鑄幣。但時至今日，我們却不妨說，在流通中的鑄幣和其他通貨之內在價值，是無關重要的。人們對於貨幣的態度，爲什麼有這種改變呢？這是非理解不可的。

銀行鈔票

假若我們不先考察金屬鑄幣的性質，而把那在今日最通用的其他通貨即銀行鈔票的性質略加考察，我們就容易理解人們關於貨幣態度的變遷了。銀行鈔票原來祇是一種支付的約單 (promise)，這約單由銀行簽發出來，依約單保有者的需要，照其額面所書的額數，付以實在的金屬貨幣。所以，一種銀行鈔票的價值，根本要看那種鈔票領受者對於銀行的信用如何，即要看銀行當必要時是否可以實行贖回其所發行的約單。約在一百年前，大不列顛的銀行鈔票，不僅由英格蘭銀行發行，且由一切主要市鎮的地方或鄉村銀行發行。在這些銀行中，有的資金豐盈，規模關大，其約單一般通行。但其他許多

銀行，類都是一些暴發公司，它們的興起，乃是應拿破崙戰爭時期所惹起的通貨增加供給之急需。因為，當時物價飛騰，隨產業革命導來的生產力的擴張，又復達於極點。而這時大多數的銀行鈔票，都祇流通於各該地方；祇有在發行銀行被人知道的窄狹地域內，才有人接受。往往因為發行銀行缺乏償付能力的信用，用其鈔票購買貨物，說不定要打些折扣。實際上，許多銀行失敗了，許多不幸的人們都還持着它們一文不值的紙幣。這種情形的不便，後來逐漸被認識到了，於是，採行種種步驟，在可能範圍內把銀行鈔票發行權集中於一個特殊銀行的手中。在一八四四年的銀行特許案中，英格蘭銀行實在還沒有取得發行鈔票的獨占，不過將近是獨占了。依據那次法案，地方銀行的發行額，只限於當時在它們名義上實際還未發完的額數，並且，這些地方銀行的鈔票，還規定要逐漸銷除。這時依舊保留着各別的有限的鈔票發行權的銀行，不過是幾個主要的蘇格蘭銀行罷了。

因此，英格蘭的鈔票，就成了由英格蘭銀行行使支付的一種約單。英格蘭銀行安定，就被大家視為是一種支付的保障，銀行鈔票持有者隨時可以換得他所應得的實在金額。但

是此種發行保障，祇有限制英格蘭銀行之鈔票發行權才能確定。換言之，就是英格蘭銀行不得濫發鈔票。大體上，銀行必得在庫中保藏實在的金額，以爲其鈔票兌換之後盾或擔保。當時規定英格蘭銀行發行的鈔票額數，祇能超過其存金額數的一四、〇〇〇、〇〇〇鎊——當地方銀行的鈔票發行額都由英格蘭銀行一手包辦的時候，英格蘭銀行所發行的鈔票額，就得超過其存金額數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除此超過額以外，英格蘭銀行發行的每張鈔票，都在銀行金庫中，藏有等價的實在金額，作爲後盾。因此，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銀行無疑有對其鈔票兌現的能力。然當金融恐慌發生，銀行勢將完全流出其存金的時侯，它也許不免要停止兌現。自銀行特許案通過以來，銀行曾有幾次在金融發生危機的當中，暫時停止其兌現的義務。然就正常的情形而論，銀行無疑隨時有支償其鈔票的能力，並且人民對於英格蘭銀行的鈔票，簡直視爲與其所實行代表的金額，完全相等。

實際上，在新狀況下的英格蘭銀行鈔票的價值，甚且比早前流通市面的金幣，還要確實多了。銀行對持票人允許支付十足重量的金，持票人不會有引受貶值鑄幣的危險。就這

樣，銀行鈔票乃得十分自由的與金屬鑄幣同時流通。並且有適當兌換保障作後盾的銀行鈔票，漸把人們舊來對於貨幣的念頭打破了，就是，他們不再以為貨幣必需具有與其購買力相等的內在價值。

貨幣與金 然而，這種念頭的打破——也許迄今還未完全打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例！在十九世紀整個下半期中，英國金鎊實含有一種與其所購貨物價值相等的金量，其評價因而頗高。而且，金幣的使用，在現世界各國，雖然都廢除了，但有若干國家——例如法國——却仍渴望恢復舊來的制度。就銀幣與銅幣而論，代用貨幣的觀念，已經是為一般所承認了的，世界重復使用金幣的可能性，實在太少。對於實金的渴望，簡直無異一種迷妄。今日大多數人，都有承認以次事實的傾向：就是，符號貨幣在合理水準上的購買力，如能由發行當局以適當的保障來維持，那麼，這種符號貨幣，就與其他貨幣一樣好用了。

因此，銀行鈔票的出現，逐漸使人承認符號貨幣，且逐漸使人相信現代世界通貨所具的價值，不是由於製造這通貨所用的材料，而是由於發行這通貨的環境。我們已經知道，中

世紀世界貴金屬的缺乏，該引起了物價如何的暴落，並且世界貴金屬的一再發現，即貴金屬一再新增其供給，該引起了物價水準如何的昂騰。假若世界以符號貨幣代替那種具有內在價值的金屬貨幣，那麼，這種符號貨幣的購買力，顯然會取決於其因需要而供給的數量。例如：現代某政府，如單由增印紙幣以償付其所有的欠項，從而，在流通界增投新幣，而不收回其舊幣，結局，其物價水準的提，高就顯然會與美洲金銀鑛開採或加利福尼亞或南非洲金鑛發現以後，沒有兩樣。因此，如其世界使用符號貨幣，那對於這種貨幣的供給，就勢必要依據若干可以安定並維持其購買力的確定原則予以規制。在輓近若干年間，德國、奧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曾不問其貨幣之供給數量如何，不問那種需要金融調節的交易增加的額數如何，且也不問其他一切關係，而一味增發紙幣；她們在這種大膨脹運動中所收到的結果，我們是已經知道的。

不過，現代世界用作流通工具的，不僅是通貨。我們講過，實在鑄幣與銀行鈔票，在習慣上祇是用以從事若干種類的支付，世界最大一部分的商業交易事務的周轉，都不使用通

貨（除了用作支付工資的數額外）。所以，以前在貨幣發行量、貨物生產量與物價水準之間，雖曾存在有一種極簡單的關係，但這關係在現在就不是那麼簡單了。我們今日所需計慮的，不僅是通貨的供給，還有其他支付手段如支票匯票一類的供給。在百年以前，銀行業者最大的任務（就國內交易事務而言），無非是處理鈔票與鑄幣。現代的銀行業者不然，他們的最大任務，却在處理那些沒有包含着實際通貨的賬簿。甲開一支票於乙，不必要授受通貨。甲祇在銀行中的甲的賬簿上，記下這一筆款項的數目，同時在同一銀行或其他銀行中的乙的賬簿上，記下相等額的數目就行。並且，當現代某一銀行借出款項時，她通常不借出鑄幣或鈔票，而是借出一宗提兌支票的權利。自然，這種金錢上的移轉關係是間接的，但也無須授受通貨。因此，在我們現代金融制度上，通貨與普通所謂信用——即現今大部分經濟事項賴以融通的手段——之間，存有一種關係，這關係是我們非弄清楚不可的。

第二節 信用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英格蘭銀行鈔票總額，計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中實行流通額祇三五三、〇〇〇、〇〇〇鎊。在另一方面，單是倫敦清算銀行的存款數字，計已達到一、七一四、〇〇〇、〇〇〇鎊；並且，由倫敦清算所印行的每日銀行清算數字，則超過了九八、〇〇〇、〇〇〇鎊。同時，美國流通中之各種通貨總額，爲五、六四七、〇〇〇、〇〇〇鎊，而一切銀行的總存款額，則爲四六、二六一、〇〇〇、〇〇〇鎊。從此看來，在一年行程中，銀行的總貯積額與總流通額，就大大超過了實際可資利用的通貨額數。這就是說，一國大部分的金融活動，不是靠通貨的互相授受，而是靠銀行系統範圍內之存貯額數的移轉。現在我們要問：這龐大的銀行貯存額究竟是包含些什麼呢？顯然的，那不是實在的通貨。並且，假如一切銀行貯款者都要把他們的存款換爲通貨，那所有的銀行一定非立刻關門不可。這種情形，並不僅限於英國銀行系統，所有現在世界的銀行系統，殆莫不如此，特其程度不同罷了。我們知道，無論現代世界那個地方的商業關係，總有一部分是不用通貨周轉的。

就銀行方面負有支付的責任而論，銀行存款與銀行鈔票正同。假若我有若干存款在某合資銀行中，這就是說，我有權利開發同等額數的支票，或者向銀行要求同等額數的通貨。但是銀行業者知道：他們的存款者祇會要求有限的通貨，他們大部分的往來交易，實際都是用支票結算。他們並且知道：即令某某存款者要求通貨——比如說，他要用通貨支付工資——這通貨的大部分也會迅速的由工資領受者付給商人，再由商人回付到銀行方面。因此，他們所需保有的實在通貨，祇够應付他們認為也許會發生的需要就行。而其額數則不過是占有總貯存額的極小的部分。每個合資銀行，除了在本行保有這一部分實在通貨而外，並還與英格蘭銀行立有賬目，一有需要，即可由英格蘭銀行增加其通貨的供給。但是，這些合資銀行縱令把它們存在英格蘭銀行的存款，及其所有的鑄幣與鈔票加在一起，其總數也不過祇占有其應支給存款之債務總額的一小部分。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倫敦清算銀行把它們的鑄幣、鈔票以及其存在英格蘭銀行方面貸借差額總計起來，恰恰少於其總存款額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即略多於其存款總額的十分之一。然而，它們

知道在一切正常的情形下，有此通貨額數亦足够應付它們認為不時的或不免發生的一切需要。

銀行業者的現金準備

在實際上，合資銀行如見到有某種待應付的需要，它們往往會增大其一比十的金準備，它們可以把銀行的若干財產變換為現金，或者通融短期借款。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倫敦清算銀行有值二八三、〇〇〇、〇〇〇鎊的投資，有值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鎊的活期或短期資金，它們隨時可以縮減這些條項，把那些由投資財產拍賣或短期債券還價所得的支票，付交英格蘭銀行以增加其現金準備。但銀行業者始終不願保持需要以上的現金。因為，投資也好，放債也好，都有利可圖，都可增加其利潤。若把錢死藏在庫中，或存放在英格蘭銀行方面，通是沒有利息可言的。就因此故，它們對於現金準備，總企圖縮減到最少可能的限度。它們根據經驗，覺得在正常狀況下保有存款十分之一的現金，那是綽有餘裕的。

銀行存款

然則這沒有通貨及英格蘭銀行貸款作保障的大量存款，實係由何而

形成呢？它可以分作兩個部門（雖然那看來不像是怎樣判然各別的）。第一部門是由銀行顧客所存入的額數，第二是銀行承認的貸款。合資銀行業者的任務，原來不外是看管人們爲了安全保管及移轉方便而存貯的金錢。他自己的資本，在他所由活動的總額中，祇不過占有一個無關重要的部分。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九個倫敦清算銀行的資本總額（包括其蓄積的利潤）不過是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鎊，其存款則有一、六七七、〇〇〇、〇〇〇鎊；其貸款有八八九、〇〇〇、〇〇〇鎊。由此看來，在銀行的總財源中，存款者存入的額數，實占有最大一部分。這種的存款，或者是由存款者以實際的通貨存入，或者是由他們以其他銀行所開的支票存入。銀行業者負有安全保管這些存款的責任，並且要保障存款者使他們能够以不事先通告（活期存款）或先期通知（比較狹義的存款收據）的形式任意提支。

但除此以外，銀行業者有時也允許其存款主顧在其既經存入的額數以外，開發支票或領受實在通貨。這就是說，他允許放債或墊款——即通常所謂透支——通常對透支是

要有有擔保的存款之要求的。銀行業者每次由這種形式貸款，是把這貸款額寫在存款者的存摺上面。他之所以允許這種貸款，因他由此可以得到利息。在此貸款額沒有達到一種限度，即沒有達到使通貨需要超越可供通融的通貨供給之限度的範圍內，尤其是在某銀行業者不讓其他銀行業者攬去大規模貸款的範圍內，他是可以繼續允許這種性質的貸款的。

銀行墊支

當某銀行業者允許貸款，並把貸款額數寫在借款主願存摺之上作為其存款時，他是期望借款者將迅速提出其擺在他貸方的額數。因為借款者不是要使用這項金額，他是不會支付利息的。可是，當借款者一由銀行開發支票或領受通貨方式把這金額實行提出時，這個額數重又在他貸方寫下；如是，銀行之存款計算額又復減少。不過，借款者由此提出的金額，立即在充實營業或支付工資的形式上，移轉到他人手中，以後更由他人回復到銀行方面。其結果是：借款者的賬項一經記下，而相應額數的賬項，幾乎馬上就會在其他方面開寫出來。因此，由存款者實行存入銀行的金額，大都是銀行業者已經實行貸

出了的款項。銀行總存款額所由形成的兩個要素，其所以在實際沒有它們外表上所顯示的區別，要不外這個原故。銀行所貸之款項，不但會引出一種存款，且會在那種存款中，即由借款者取得此款項的人們，後來存入的存款中再現出來。因此，我們要在銀行的金融狀態中，把那些代表銀行主顧所存入的金額（銀行借款除外），和直接由銀行放款所得的財金加以分析，那是頗難做到的。在銀行業者，他們實在用不着作任何這類區別。他們所必須考慮的，第一是看可供其使用的通貨額是否充足，第二是看其放款政策，是否能與其他銀行取一致的步調。自然，除此以外，他還得考慮那些向他們借款的人們是否穩當。不過，我們在這裏不是要考察銀行墊款之特別目的，而祇是要考察其見總的額數。

銀行業者在放款政策上必需與其他銀行採取一致步調的理由，是極其簡單的。假若一切銀行的放款，對於其存款總額，大體保持着同一的比例，那麼，每個銀行所需付給其他銀行的額數，就將近和其他銀行要付給它的額數相當。例如，倫敦的主要銀行，共同有一個清算所，它們彼此間由存款者開發支票所形成的債務，就是在這清算所中，以簡單簿記制

度相互抵銷。假如各銀行彼此間的債務相互抵銷，那一切債務就不用任何實際支付，而乾脆的得到清結。但是，假若某一銀行尙負有其他銀行一個差額，那簡單的清結方法，祇是把它們彼此在英格蘭銀行的賬目，撥轉一下就行。因此，假若某銀行放款，較其他銀行爲自由，以致在清結上要找出相當的負差額，結局，勢必要減少它在英格蘭銀行中的存差額，而增加其他銀行在英格蘭銀行中的存差額。這一來，它的現金供給縮減了。我們講過，合資銀行都視它們在英格蘭銀行中的存差額爲現金。銀行的現金供給減少，其貸款能力亦必因而減少。因爲，銀行業者通常都視百分之十的現金爲極低限度的現金準備。其現金比率低落，其放款限度即非降低不可。它要增大放款，先須增加現金比率，就這樣，各合資銀行的放款政策，實際乃不能不保持一致。

銀行會製造信用麼 不論在什麼時候，社會上流通着的購買力的總量，多半是由銀行貨幣所形成；而這銀行貨幣，則是藉着支票在人們手中轉遞的。銀行貨幣包括有在合資銀行中屬於存款者——個人、商號以及一切機關——的金額，和由銀行貸與這些存款

者的貸款。關於這種貸款性質，曾有不少爭論。有人會假定，銀行業者會創造信用；又有人假定，它們除了把某些主顧的死存款，轉移到那些需要利用這存款且願出代價利用這存款的其他主顧而外，實不能有所作為。這兩種說法，銀行業者都認為是謬見。但在實際，銀行業者究在何時才僅是轉移信用，何時才是創造信用的事體，不但旁觀者，就在銀行業者自己也是頗難知道的。我們講過，銀行主顧們在銀行賬上的存款，包括有銀行方面允許貸出的款項。銀行業者根本就無法指出他何時是貸與『真正貨幣』，何時是貸與那些由他自己已經造出的貨幣。自然哪，銀行業者自己能夠貸多或貸少，並由他的多貸少貸，而左右有效的購買力的總量。但他所創造的信用，與他僅僅轉移的信用，終是無法區別。他所關懷的，不是貸款與存款間的關係，而是那包括有貸款在內的存款總量與其隨時可供利用的現金準備之間的關係。

在這種情形下，銀行無論何時的貸款——不管是無中生有的創造信用，抑是轉移信用——我們都不妨極簡單的看為創造信用。因為，購買力由他的貸款而增加，由他的不貸

款而減少，在這種意上說來，它確然是創造信用了。

關於這點的解說，極其簡單。銀行業者即令祇看為是轉移信用，而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信用，他轉移信用這種行為的結果，定然要增加貨幣的活動，使貨幣流通較之沒有他為中介要更為迅速。無論何時，銀行存款者總有許多會把他們的貨幣死藏在銀行之中。假使銀行業者這時把他們存入的貨幣與那些即時要用貨幣購買物品的人，那貨幣的總量，縱不因此而增加，而實際流通的貨幣却因此而增多了。

貨幣數量論 這種事實，使我們得到一種影響供給與物價水準間的全部關係的極重要概念。經濟學者通常稱此概念為『流通之速度』(velocity of circulation)。而這流通速度的概念，在所謂貨幣數量論(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中，占有一個主要部分。照此種理論所說，物價的水準，乃取決於流通貨幣量與一切必須買賣的物品數量間之關係。但是，有如要使物品與勞務在價格水準上發生影響，必須這物品與勞務實行買賣(例如不出賣的圖畫與房屋，就於價格沒有影響)一樣，要貨幣在價格水準上發生

影響，也必須貨幣實行改換其領有者。當一個印度君主把貨幣窖藏在他金庫中時，或者當一個印度農民把貨幣窖藏在他的宅園時，這被繼續窖藏的貨幣，並不能看作是於物價水準有何等影響的貨幣。在遠東方面，實在有可驚的鉅額金銀在祕藏着。至一九三二年開始幾個月，我們已看見這貨幣流露出了許多，因而在金鎊價值上發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在最近幾年中，我們又看見美法兩國在一種頗別致的方法上，把那既經實行用作流通基金的大量黃金，吸收到她們中央銀行的窖室中。像這種窖藏的黃金，除了使其價值較實行使用時為低以外，並不得看為是貨幣，從而不得認為它有影響於當前的價格水準。

因此，假若完全不流通的貨幣，即認為於物價沒有影響，那麼，流通迅速的貨幣，就在物價上較之流通遲緩的貨幣更有影響了。貨幣流通愈速，其所成就的流通工作愈多。如其貨幣迅速地由一個人手中轉到其他人手中，每轉一次，即成就一次交換的任務，則一而再，再而三，不絕迅速使用的每一貨幣，其對物價水準的影響，就會與被使用的次數成比例。在正常的狀況下，貨幣的這種流通速度，乃取決於社會既成的習慣，而不是取決於大的變動。但

在特別不常的情形之下，那種速度也許會大大增進，也許會大大減退。例如，假使人們期望物價尖銳的提高，那就是說，他們這樣預想，以爲他們把貨幣保留在手中愈久，貨幣對物品的價格就愈小。所以，他們渴望用這貨幣，購買那些因貨幣價值跌落而變爲更有價值的貨物。這一來，流通的速度增加。這增加速度的影響，使物價更加提高。在德國大膨脹的時代，其物價曾達到一個可驚限度的提高。至那種膨脹本身，大部分却又是人們想儘可能迅速的拋去貨幣換取貨物之熱望強烈增加的結果。

在另一方面，假若人們盼望物價跌落，那就是他們盼望其貨幣因保留而增高其價值，反之，如其他們用以購物，物品將來對貨幣就會減少其價值。因此，他們的傾向，就打算物價不跌到頂點，不肯從事購買。他們把貨幣保留起來，不作購買活動，貨幣之流通速度將因而大減，而物價跌落趨勢，就會因貨幣流通之緩慢而益形加強，這種貨幣流通速度減退的事實，已見於當前貿易衰落的世界各國。而在銀行存款之總營業率逐漸降落的美洲合衆國中，則已達於最大的限度；美國爲防範全般銀行缺陷的曝露，實行凍貯貨幣。美國銀行並爲

抵銷這藏貯貨幣縮減其流通速度之影響，乃迫而以這一大部存款為基礎發行銀行鈔票，增加通貨供給。在某種限度內，這是阻止了物價的跌落的，但却不曾阻止貯藏黃金與縮減流通速度的趨勢。就因此故，美國當前即令把貨物的生產大形縮減，而其在流通界增加供給的鈔票，仍無補於物價之逐漸趨於跌落。

貨幣與價格

從表面上看來，物價的水準，直接隨貨幣數量與那些必須交換的物品數量之關係變動而變動的觀念，似乎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常識。但是照我們上面所說的，我們却應承認這種關係，在實際上並不是如此簡單。從貨幣方面來說，影響物價水準的，不僅是貨幣數量，且是因使用而增大其效率的貨幣數量。至若必須交換的物品數量，亦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那樣簡單。社會上隨時可以交換的物品，並不僅那些即時生產的物品與動務，還有那些已經存在的一部分十分不定的與諸多變動的事物。人們不但買賣新產出的物品及即用的個人勞務，且買賣土地、房屋以及各種派生的物品，特別是股票證券。購買這些派生物所需的貨幣，簡直有購買即用物品所需的貨幣那多。所以，這些被買被賣的派

生物，一經在比例上增加起來，其影響物價水準，差不多要達到貨幣供給增減影響物價水準那樣大的程度。就因此故，股票市價或不動產市價暴漲，勢必招致更大數量之股票證券或土地的買賣。其結果，爲了通融這不絕增加的買賣額 (turn-over)，將造一種增加貨幣的需要。不錯，一種投機的暴漲，也會大大增加那些用在股票證券以及不動產交易上的各種貨幣之流通速度，這一來，所需貨幣數量之增加，就較之需要通融交易事件之貨幣價值的增加要少多了。但是，除了被封固在股票市場活動的可供利用的貨幣供給量，多到了那個程度——即由較少的用作購買的資金，把商品價格水準壓低的那個程度，在貨幣的數量上，總是需要增加若干的。因此，股票市場的暴漲，往往總伴有銀行信用的相當增加。銀行把它們那些爲了即時生產用途的貸款移用到股票投機上來，其信用是容易增大的。到這時，銀行爲了因此會惹起產業上的不況，於是又對生產事業允許更多的信用。有人會主張，把資金由生產事業轉用到股票投機上的這種事體，銀行應當是能夠阻止的。但在實際上，現代銀行制度似乎還沒有一種阻止投機，同時不阻礙工業進步，不招致生產衰落的手段。

美國在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物價暴落的當中，銀行管理者曾作過此種嘗試，詎無效果。銀行家們都說那是完全不能實行的。

由是，我們知道，貨幣與價格間的關係，那比我們一望而知的表面現象，要錯綜複雜多了。貨幣數量理論即令根本無誤，甚且是不可爭辯的真理，那於金融政策的形成，仍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幫助。顯然的，銀行制度的工作，應當對社會提供恰够充分使用其生產資源的貨幣——沒有過與不及——並力求避免貨幣價值上容易引起的投機暴漲與不況景象（即由既定的貨幣期待擾亂所招致的不況景象）的一切變動。不過，像這類結果，一定不能藉貨幣數量理論之概算的應用而有所成就。在我們能够期望銀行會怎樣進行完成此舉以前，我們必須精切考察當前各種貨幣供給所由規制的方法，以及施行此種規制之銀行制度的實在結構。

第三節 金本位制度

在前節中，我們已把以次兩種貨幣加以區別。那兩種貨幣是：實在通貨與銀行貨幣。前者包括有主要用作小支付的銀行鈔票與鑄幣，後者則又是由兩種性質的存款所形成：一是登記在銀行主顧們賬簿之貨方的存款，一是包括有銀行墊支和各個人實行存貯的存款。這種通貨與銀行貨幣之間的區別，非常重要。在任何國家中，銀行所能創造的銀行貨幣量，在某種限度，是取決於可供使用的通貨量；反之，必需的通貨量，又是在比較複雜的關係上，取決於在流通中的銀行貨幣量。現世界所有一切國家的通貨，大體上幾乎都是經由一個稱為中央銀行的特種銀行所發行。而這中央銀行，又是在那種由國會法案所制定的規制之下，在政府統制之下——即令在理論上不是如此，在事實上却是如此——進行活動。在另一方面，銀行貨幣之加入流通，那却有最大一部分不是經由中央銀行，而是經由許多其他的銀行，比如通常所謂合資銀行或貯蓄銀行之類。一部分個人乃至商號，都在這類銀行中立有賬簿。除此以外，還有我們後面要談到的其他比較特殊形態的銀行和金融機關。這類機關對於銀行貨幣之有效流通，實成就了非常重要的任務。但是，論到這裏，我們要把

我們考察的範圍加以限定，就是一方面考察典型的中央銀行所演的任務，另一方面考察那些在單一貨幣制度下與中央銀行相關聯的合資銀行或貯蓄銀行的任務。自廣義言之，中央銀行之主要功能，通常就是在賦與它以權力的議會或國會法案所定的限制與條件之下，規制通貨的供給。不過，這種通貨供給之規制，在大體上却又包含有銀行貨幣之總供給的規制。並且，合資銀行在貸款政策上，實在大大的受了中央銀行態度的限制。各國中央銀行能以嚴厲程度不同的政策，統制合資銀行之貸款總額。所以，合資銀行的任務，與其說是在決定它們究應貸出的總額，却不如說是在各種請求貸款者之間，斟酌情形，配分中央銀行所允許它們貸出的額數。不過，這種說法祇有在某種場合是正確的。在一般銀行制度中，合資銀行甚且有違反中央銀行意志而自行增減其貸款總額的權力，但有些國家不是如此，特別是在英國，那裏的中央銀行不但統制着通貨供給，且統制着可充貸款使用的銀行貨幣之總供給。由是，我要考察到銀行制度之三種主要任務了：第一，通貨的規制；第二，銀行貨幣統供給的規制；第三，在各種請求貸款者間之可供使用的銀行貨幣的分配。我們首

先來考察通貨，並考察通貨所由發行之中央銀行的機構。

金準備

關於這點，我們很容易就一個具體的實例來說。對於通貨之發行，大不列顛之英格蘭銀行實負有全責。蘇格蘭銀行之分別的發行權，以及鑄幣原來由造幣局發行，而非由銀行發行的事實，均不足影響其地位。英格蘭銀行發行通貨的權力，係由議會法案所規制；自一八四四年之銀行特許案成立以來，即是如此。實際上，直至一九一四年，那些由一八四四年銀行特許案中定下的條件，還繼續作用着沒有變更——這種政策繼續的可能，僅是由於在十九世紀中，社會使用貨幣的習慣根本改變過來了。實際情形是這樣：銀行有權發行大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無金作後盾的鈔票，在此限以外，每鎊的鈔票，須備有一鎊的現金。與造幣局金鎊同時流通的英國五鎊鈔票，幾乎都有金作保障。但戰爭把這種情形完全改變了。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金幣曾停止流通，銀行兌現的義務，亦概行停止。政府自己發行一種完全沒有充分金準備的紙幣，即所謂國庫券 (Treasury notes)。物價隨此國庫券的迅速增加而提高，直至一大部分的流通通貨都是沒有金作保障的紙幣。大

戰後，這種政府貨幣還與英格蘭銀行貨幣相並流通了若干時期。但至一九二八年，此種國庫券與英格蘭銀行鈔票，始在銀行統一的規制之下混合起來。對於這種銀行鈔票的統一的規制並，還由議會法案定下了新的限制。至是，英格蘭銀行之無金作準備的鈔票，就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增加到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種無金作保障的額數的發行，被稱為依賴大眾信用的發行（the fiduciary issue）。在急需的時候，英格蘭銀行並得申請政府，在議會許可的限內增發此種性質的鈔票。但是除此急需時的規定以外，英格蘭銀行在上述依賴大眾信用發行額以上發行的每鎊鈔票，仍非有一鎊準備金不可。這是一種規制流通貨額的方法，簡言之，就是由法律規定最大限度的信用發行額，超過此限，即常有金作準備。

世界主要各國的金準備

美國	金	元	百萬	三, 六五九	四, 四九八	四, 四四五	四, 一四一	四, 二八四	四, 五五三	四, 四〇六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六	一五八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

法國	佛郎	百萬	10,000	30,000	10,000	30,000	3,000	4,000	5,000	6,000
英格蘭	鎊	百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德國	馬克	百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比利時	佛郎	百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荷蘭	古登(Gulden)	百萬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瑞士	佛郎	百萬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蘇俄	金盧布	百萬	5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波蘭	值羅(Zloty)	百萬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意大利	里爾(Lira)	百萬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澳洲	鎊	百萬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加拿大	金元	百萬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阿根廷	金庇索(Gold pesos)	百萬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巴西	米萊(milreis)	百萬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印度	羅比(Ruppes)	百萬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日本	四	百萬	一,三五	一,二五	一,三七	一,〇五	一,〇七	六六	四〇
----	---	----	------	------	------	------	------	----	----

一九三二年三月主要各國中央銀行之金準備(單位百萬美金)

國別	保有量	對於前一年之變動
英國	五八八	(+) 一一八
法國	二,九九九	(+) 八〇〇
德國	二〇九	(-) 三三六
意大利	二九六	(+) 一七
比利時	三四九	(+) 一四九
荷蘭	三五二	(+) 一七三
瑞士	四七一	(+) 三四七
美國	三,〇二〇	(-) 九五

注意 此表除去政府或其他銀行所保有之金。把政府存金包含在內，英國有四、〇五一、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再把其他銀行的保有額括入，其總存金額計為四、三八九、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在其他

〇金元，再把其他銀行的保有額括入，其總存金額計為四、三八九、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在其他

國家政府存金極少，最大一部分存金，皆集中在中央銀行。此外，我們還可補充一點，就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與一九三二年三月之間，法國縮減了值五四七、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外國通貨保有額。

但是，這裏有一種為大多數外國銀行實行的銀行制度，即所謂比例的金準備 (a proportional reserve of gold) 制度。這種制度的採行，並不設一種固定的信用發行額，僅規定中央銀行對於其所有發行的鈔票，要在金庫中保有最低限度的百分比，例如要保有百分之四〇的金。美國、德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就是採行這種比例的金準備制。除此以外，有少數國家還根據我們後面要述及的理由而採用其他的規定。照那些規定中央銀行對於其所發行的一切鈔票，必須保有一定比例的準備，特這準備不一定是金，而是金或保存在其他主要國家銀行中之存款，這被稱為比例的金與金匯兌準備制 (a proportional gold and gold exchange reserve)。

金的重要性 由是，我們知道，在所有這些中央銀行制度的形態中，可以發行的通貨額數，大體是取決於中央銀行所保有的金供給量，或者，在少數國度是取決於中央銀行

在必要時所能弄到的金供給量。因此，在現代世界行使規制的通貨制度中，金實扮演了一種根本重要的角色。實際上，世界有一大部分國家都是努力在所謂金本位制度下活動——雖然最近因世界貿易衰落的結果，使她們大都迫而把這種本位制度停止了。在大戰以前，金本位制度已經是一大部分文明世界之通貨規制的基礎。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期，首先採行金本位制度，以後各國相續仿行。在這以前，銀曾為一大些國家之通貨基礎。由銀規制通貨，是所謂銀單本位制，以後銀則與金合作而為金銀複本位制——英國在十八世紀亦是如此。不過，以銀與金較，無論是相對的講，抑是絕對的講，其價值都大有變動；且自世界各國間之貿易關係愈形組織化，國際貿易之重要性迅速增大以來，世界主要各國間之貨物交換，乃愈覺到沒有一種單一貨幣測定本位的不便。於是，各國都相續以金為其規制各種通貨的基礎，而採行金本位制。但各國之所以都有採行金本位制的可能，那却是由於十九世紀下半年世界金的供給量的大大增加。美國、澳洲以南非洲之金的發現，以致因此金供給而採行金本位制的傾向，一般通行，結局金價上漲，物品與勞務的價格則異常跌落。實際

上，物價尖銳的慘落，就是當着金本位制迅速擴張到新國家的時候。在一八七〇年代，德國、美國、拉丁同盟諸國，都採行了金本位制。而那幾乎在十九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中繼續暴落的物價，恰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自是以後，南非洲之金的生產的大增加，和世界使用通貨習慣上的若干節約辦法，竟把那種趨向改變了；在一八九六年與一九一四年間，物價復又昂騰起來。不過，這兩種尖銳對立的物價變動，還不够動搖世界金融業者對於金本位制度的信心。在一九一四年，他們還相信金本位制；一九一八年以後，那些在戰時因緊急需要迫而放棄金本位制度的交戰國家，又企圖依相互的協定，很快的恢復那種制度。約在一九二九年世界貿易開始衰落以前不久，所有的國家，差不多都成就了她們這種志願。當世界貿易衰落之頃，金本位制復又達於極盛時期，不過，因為戰後經濟情形的改變，這種制度在許多方面所發生的作用及其被運用的情形，都是與戰前兩樣的。

金本位的定義 什麼是金本位呢？各國都不惜蒙受極大的艱苦困難，以恢復這本位，然則這本位何以如此受人重視呢？在任何採行金本位制的國家，她的國幣，都等於某種

成色的一定重量的金。在大戰以前，這種本位制度的維持，是由使用一定重量、一定成色之實在金幣，和使那些加入流通的紙幣能在必需時向中央銀行兌換金幣，或兌換與金幣同一重量、同一成色的原金。但現在的金本位，却並不在流通界使用金幣，而祇是使用那些能兌換一定分量之金的紙幣。所以，英國當一九三一年九月放棄金本位時，她不過是把英格蘭銀行對於鈔票的兌現義務停止罷了。

顯然的，假若每個國家的國幣，能夠兌換一定分量的現金，那麼，一切不同國度的國幣，就定然能按照各自所含的金的分量，在一定的比率上相互兌換。像這種比率，誠然不是絕對固定的。在完全的金本位制度下，那可因一國金的生產費和由一國運往他國之運輸費而各不相同。因此，兩個金本位國家之貨幣匯兌率（the rates of exchange），就會在自由一國運往他國之運費（包括保險費）所設定的限界內，上下變動，像這樣對匯兌率所加的限界，即所謂現金輸送點（the gold points）；在實際上，匯兌率隨時在因一種通貨對其他通貨之需要的漲落，而在此現金輸送點限內變動。假若以金鎊換金元的人，較之以

金元換金鎊的人爲多，那匯兌率就會於英國不利，即是說，在相對的關係上，金鎊所值，勢將較金元所值爲少。不過，在完全的金本位制度下，這所少的程度，決不會很多，因爲把金由倫敦運到紐約，或由紐約運到倫敦的費用，就其對於金的價值上說，那是極少極少了。

金本位的好處

把不同國家之貨幣匯兌率固定在窄狹的變動限度內，那顯然是金本位的大好處。因爲匯兌率有所限制，商人們在國外訂結契約或舉借債款，就不用當心其本國貨幣與其關係國貨幣之間的可能變動了。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訂結契約，以金鎊爲基礎也好，以金元爲基礎也好，在他幾乎都沒有多大關係，因爲他用自己本國貨幣計算，究須支出多少或收入多少，他都是知道的。反之，如其世界各國放棄了金本位制，各國貨幣價值之間就沒有一個固定的比率關係，於是對於任何有國際性質的契約，就必然要導入一種極不確定的要素；這時，一個人如由外國貨幣訂定契約，他雖知道將來應收入外幣多少，支出外幣多少，但這收入付出的外幣，究合他本國貨幣若干，他是無從知道的。這種不確定的性質，勢將妨礙貿易，妨礙海外投資，剛在大戰以後若干年間，世界是曾蒙受過這種極

大的不便的。無怪當那個時候，各國社會的一部分有力者，都強烈要求恢復金本位制；銀行家和金融資本家於國際間之貨幣兌換，最有關係，他們的整個計劃，可因各國貨幣價值間之不可前知的變動，而全部推翻，無怪在一切要求恢復金本位制的人們當中，以他們為最迫切了。就商人說吧（我們以後還要論到的），金本位制對於他們頗有利益，同時也非常不利；但在銀行家不然，他們由金本位制所受到的利益，是頗顯明的。戰後金本位制的恢復，首先就是由於銀行資本家階級的促進。

我們應當注意，前面所說的這些，全未涉及一個對於其國內流通通貨之金準備維持的事體。一國要維持金本位制，勢須在其中央銀行中貯存充分的金額，準備那些持有國幣的人們實行兌現。它必須打算對於那些需要運金出口的人們付出實金，而收受其一定額的國幣。不過，在正常狀況下，對於實金輸出的要求，實在極其有限。因為一國為支付關係，把黃金輸往他國，那只是當着兩國間貨幣的匯兌差率已經實行達到了那種限度；即達到了黃金出口還要比較合算的限度。但通例在匯兌差率達到此種限度以前，已經由匯兌上

處於不利地位的國家的中央銀行，採行了改變其地位的有效步驟——那通常是抬高利率，以獎勵外金的流入。所以在正常狀況下由一國流往他國的黃金實在不多；並且，此種正常狀況如一直保持不變，各國的金準備，就令較其慣常保存的少了許多，亦足夠應付一切需要。然而，這所謂正常狀況，並不是常常不變的，在最近幾年來尤屬如此。近年各國的匯兌差率，即令有時還維持着不值得輸金出口的水準，但黃金還是在極大量的移動。這有兩個主要的理由：第一是大戰以來，有若干國家（其著者如法國）已經在外國銀行中保有大量的餘款。這餘款當法國佛郎大事膨脹並不絕減低其價值時累增起來；所以，『由佛郎郎逃避』（flight from franc）的現象發生，法國銀行家乃至法國資本家，都把他們大部分的資金投存於國外。道佛郎郎穩定，這些流出的資金又逐漸返回。當法國人對於他們投存資金的國家的通貨或銀行的穩定性，一比平常感到更不放心的時候，這種資金流轉到法國的運動就更見活躍。外國人對於法國的償付，大都是用黃金；所以黃金就這樣逐漸堆存於法國銀行金庫中了。

黃金大量移動的第二個理由，就是現在世界各國欠有美洲合衆國大量的借款；這些債務國內不能由出超償償，勢不能不迫而用金償還其大部分的債務了。就這樣，黃金乃如同堆存在法國一樣的堆存於美國了。因爲以上這兩種理由，黃金遂在戰後各國間有了空前的移動。

對於黃金的爭奪 在黃金大規模移動的情勢下，各國中央銀行爲了防止鈔票兌現的危險，乃有儘可能的獲得最多黃金的強烈要求。但世界總金準備不絕向着美洲合衆國的集中，致使這種強烈要求的滿足，極感困難了；黃金既集中到了美國，其他各國實皆感到黃金的缺乏。特別是那些較小的國家，她們自己不能積得充分的準備金，祇好在主要各國銀行中建立其貨幣的平衡；對於其所發行的通貨，不以金作兌換保障，而以其國民所需求的外國貨幣作兌換保障。這就是所謂金匯兌本位 (the gold exchange standard)。

在過去，倫敦是世界貿易所由調劑融通的最重要中心地域，同時也是輸出黃金絕對沒有問題的地域。就因此故，那些實行金匯兌本位的國家，乃在倫敦保有其一大部分的對

外差額，並以倫敦爲供給其所需外國通貨的機關。因之，英格蘭銀行就不僅要竭力應付英國人民對於外國貨幣的需要，且還要以中間人的資格，供應其他許多國家之國民的需求。這樣，大不列顛的銀行系統，乃不免招致黃金大規模的變態移動的危險；在此種情形下，英格蘭銀行自己，顯然是不會獲得較其實際所會保有者爲多的準備金的。黃金固封在金庫中，決不會產生利潤；所以，金準備愈少，自然更有利益。

但是，就正規的準則而論，當英格蘭銀行已經不大需要黃金時，它那已經獲有的大部分黃金，究竟是否實在供用於合理的有益用途上呢，那是不無問題的。英格蘭銀行也如其他大多數國家的中央銀行一樣，爲了供應可能的輸出需要，且爲了供應其國內流通的通貨兌現需要，它不能不依照法律保有一定額數的金準備。然則這種金準備的實在用處究竟是怎樣呢？如其繼續發行無金作保障的紙幣，一如發行彷彿有金作保障的紙幣一樣，我們就把這金準備盡行燬棄，或沉諸海底，對於流通中的同額紙幣的價值，依舊不會有一點變動。銀行鈔票之具有價值，不是由於英格蘭銀行金庫中藏有爲其保障的金的數量，而祇

是由於通過銀行制度而流通的貨幣的數量。銀行鈔票的額數如保持不變，那由金的保障消失而響影銀行鈔票價值的唯一原因，就不過是由於一種心理上的保障的喪失；即是說，對於紙幣之失却信心，要不外人民覺得紙幣沒有金的保障而已。從這種意義上說來，一國對於發行通貨保有金準備，那不是因為這金準備有什麼用處，而祇是因為人民以為有此用處罷了。

通貨之金準備的無用 其實，對國內發行通貨所保有的金準備，絕對無用。爲了應付金輸出之可能需要，保有相當額數的金是有必要的，但沒有更大的必要。不過論到這裏，勢必要引起其他問題，就是金『輸出之可能需要』該是怎樣呢？在正常狀況下，這對於通貨總量，祇保有一個頗小的小率；但一到變態的狀況下，我們對於其潛在的要求，却就無從設定一個限界。實際上，任何國家的中央銀行（在極奇特現狀下之美國和法國的中央銀行，又當別論），殆皆不能保有適當的金準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的需要。假若中央銀行實行擠兌，那就祇好停止金本位制度，因此之故，要保有一種金準備，使其應付正常的需要，雖覺

過大，但要使其應付實在緊迫的需求，却就頗嫌過少了。在那些保持着金本位制，其金準備比較極少，並打算當緊急時放棄金本位的國家，這種情形是更加顯而易見的。大不列顛在一九三一年之放棄金本位，要不外由於此種原因。而且，英國把金準備由危機發生前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增到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事實，那於她全無幫助，不過是使她在早應迅速放棄金本位的時候，對維持金本位作一番脆弱的努力而已。

自然，大眾的態度也並不是全無理性的。對於發行通貨的金準備的要求，確有限制。中央銀行發行總通貨額的效果，並還阻止住了通貨過度發行的膨脹。人民都覺得，中央銀行如其對通貨的發行不復遵守金準備的限制，那就隨時難保不發生膨脹的現象。但這種保障，是過於偏向外表，而不着實際的。比如，英格蘭銀行已被允許發行值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鈔票，不用金作保障；至當前特殊的緊急情形之下，更允許這個額數擴增到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國會有權把這種信用發行，增加到它所願意增加的限度；並且它還能在不改變銀行對信用發行額以上的鈔票行使兌現義務的限內，盡量從事膨脹。自

然，這種膨脹活動，是非取得國會之法律根據不行的。但當前的信用發行限度既是由國會法案所規定，那麼，銀行對於信用發行額以上的鈔票，要保有一種金準備的法律義務，就不成其為妨阻膨脹的手段了。真能妨阻膨脹的，祇有銀行自身和國會都不願意增加這種依信用發行的鈔票。

戰前戰後的金本位制 當戰前黃金移動比較有限，同時貿易又一年一年的遵循着完全確定的通路，而比較沒有多少變動的時候，金本位制的活動，自沒有多大的困難。那時大多數國家，都為保障其國內流通的通貨而保有某種金準備，並還為供必要時的輸出需要，備有相當額數的黃金。但雖然如此，那時實行允許黃金無限制輸出的國家，却為數無幾。照一般人往往稱述的，世界上真正實施完全金本位制的國家，祇有大不列顛一個。至若其他的國家，類皆情願提供外國匯兌，即對那些需要外國貨幣的人，不供給以輸出之金，而供給以國外的信用。為了這提供國外信用的目的，她們的銀行，通常皆在國外金融中心地域，特別是在倫敦，保有貸借差額的關係。像這樣的安排，過去並不會引起多大困難。而定規

由南非得到新金供給的倫敦，往往也能供應其需要。

然當戰後各國相繼恢復金本位，或開始採行金本位時，那種情形是頗有變動的。供給世界一大部分新金的南非金鑛產額的擴增，世界金的總供給量，誠然有了空前迅速的增進，但每年由鑛山掘出的新金量，與既經存在的存金量比較起來，那是頗不足觀了。而況在非貨幣的用途上，經常還要消費去一大些黃金。在實施膨脹諸年度之物價總水準的飛騰，致使世界金的總供給，與當時交易上需要融通的貨幣價值對比起來，那是較戰前要少許多了。這一來，世界各國自不能不講求節約金之用途的方法：一方面，不使金幣流通，而代以無完全金保障的紙幣；另一方面，更採行種種使金準備進一步成爲通貨基礎的步驟。假若世界之金的有效供給，曾經是按照每個國家之特別需要而配分，那麼，在那種能出此有效供給而得到滿足的限度內，前述的種種方法，是不難縮減世界貨幣用金之總需要的。然在實際上，世界金的總供給，並不會按照各國之特殊需要而配分，那有最大一部分，迅速爲兩個國家所吸收去了——首先吸收黃金的是美國，往後又加上法國。其結果是世界金的

充分供給，不能保障金本位制之圓滑推行，不能阻止若干缺乏黃金國家之物價慘落。那些擁有過多黃金的國家，她們又不肯冒險利用她們所有的黃金，爲其發行通貨的基礎。因爲她們知道，通貨發行過多，勢必致把本國物價水準，抬高到世界一般物價水準以上，結局將破壞其輸出貿易，甚且會由此突破其高高的關稅壁壘，而獎勵大宗的輸入。就這樣，世界一大部分貨幣用金，都被鎖閉在美國法國金庫，而沒有成就任何任務了；那既不會用以供應輸出的需要，又不曾用作通貨的基礎。像這種黃金的積累，勢必使保有此黃金的國家受到頗大的損失，因爲死藏在她們銀行金庫中的黃金，是不會齎與她們絲毫利潤的。不過，她們由此受到的損失，還祇是沒有利潤，而世界其他各國由此受到的反動影響，那却要嚴重多了。黃金對美法兩國過度供給，其他供給不足的國家，本來可以設法進一步節省其金的用途，但黃金繼續流注美法的趨勢，勢必致迫着她們完全放棄金本位制，否則她們就祇好在通貨的發行上，在對工業之信用提供上，講求緊縮政策。這種緊縮將招致物價水準的跌落。世界物價跌落，美法兩國爲了使其物價水準與他國的物價水準保持平衡計，就愈有把她

們一部分的黃金死藏在其銀行金庫中之必要。

美國的黃金

論到這裏，我們必須作以次的問難：爲什麼黃金堆存在美國 法國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非常簡單的，但兩國的情形不是完全一樣。我們講過，美國在世界大戰中變成了一大債權國；世界所有的主要國家，每年差不多都要負她鉅額的債款，那種債款，不僅是對於其輸入的償付，且是對於其累積債務所付的息金。加之，這些國家主要由美國購買的原料與食品，遠較築有高關稅壁壘的美國，打算向她們所購買的爲多。因此，在經常收支的往來上，美國就占有兩重有利的差額：那一部分是由於美國之輸出超過輸入，一部分是由於各國對於美國政府及其市民所欠債款之償付。美國這種國際收入超過其支出的金額，每年是由美國人到歐洲旅行，和他們在債務國的任意消費，縮減了相當的額數了。加之，美國一大部分的海外貿易，都是由外國船舶（特別是由英國船舶）進行，這也可相當減少其有利差額。但雖然如此，世界其他各國還須對美國支付鉅大的金額。

美國在這種情形下，要避免自己吸入過大部分的世界黃金，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其國

民盡量向海外新投資本，以期每年度維持收支的平衡。在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八年之間的諸年度中，美國國民曾努力從事新的海外投資；至一九二八年終，由美國銀行與金庫所保有的金之供給量，實較一九二四年少多了。但在一九二八年以後，金之供給迅速增加；那原因，首先是由於那時美國的繁榮貿易；照我們前面所說的，那種繁榮縮減了美國向海外貸款，且還獎勵了外資的流入。但至一九二九年以後，則又是由於貿易衰落，貿易衰落的結果，美國國民與銀行業者，都小心翼翼的不肯向海外投資或貸款，他們都切望把他們的資財，用最穩固最確實的現金形式保藏起來。在此種情勢之下，要阻止黃金堆存於美國，勢不可能；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中，美國存金增加異常迅速，同時各債務國的金準備，漸形匱竭，以致使她們都相率限制金之自由輸出，甚至實行停止其金本位制。

法國的藏金 法國的情形，與美國略有不同。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年終，法國的存金，實無多大變動。那時法國還沒有恢復金本位制。金在國內國外的移動，殆皆停止。但在戰後膨脹期內，法國國民因懼怕貨幣留在國內喪失價值，乃在可能範圍內，把他們可

以提動的資金都投存於海外銀行。至法國國民之所以有此大量的資金移動，乃因法國就在當時，還是一個債權國家，她由海外投資與賠款對戰債的有利差額，收得了不少的剩餘資金。所以，當她在佛郎對戰前平價五分之一的基礎上，恢復其金本位制時，法國人民與法國銀行都在國外貯存有極大量的資金。這些資金都是短期存入的，不像美國一大部分的海外貸款，通是長期的性質。像這種短期的存款，存款者高興幾時提回，就可以自由提回。

佛郎的穩定與金本位的恢復，致使那些把資金投存到國外的法國人，又迅速提取一大些回來。在一九二七年末至一九二九年末，法國的金準備突增至兩倍以上。在此後諸年度中，法國的存款雖還是繼續增積，但其增積率頗不相同。不論何時，法國人一經敏感到外國銀行體系有不穩定的徵候，或遭達到其尖銳的政治不信任的定期發作，他們就要迅速提回其對外的存款。就這樣，流入法國銀行金庫中的黃金，乃達到異常的鉅額。法國這種存金的趨勢，因法國人隨時都不肯像美國人那樣作海外長期貸款而更加嚴重了。不錯，法國人爲了要由其大量存款獲取若干利潤，他們往往也準備把這死藏在銀行金庫中的金額，

向國外作大規模的短期存貯。但這短期存款的資金，隨時有被突然提回的可能，因之，那對於被存貯國與其說是一種幫助，却倒不如說是一種麻煩。一九二九年美國對歐洲貸款的突然停止，那幾乎可以說是歐洲恐慌的最大原因；但法國對國外貯款熱度之不斷的漲落，却在歐洲金融體系上，造成了一種經常的不安定局面。因之，這與美國之突然停止貸款的影響較量起來，其嚴重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在這諸般情勢下，金本位制就不但在其所成就的任務上遠較其戰前所成就的爲劣，並且，那在當前世界不況的場面下，對於債務國家，甚至對於大不列顛，都證明是絕對行不通的。債務國爲了努力維持債務的償付，並爲彌縫出口貨大跌價當中買進入口貨的損失，已經把她們的存金用盡了。大不列顛一向被視爲是主要供應世界大部分貿易上之短期借資需要的中心，各債務國所經驗到的緊迫情形，已使她感到那種反響的異常嚴重；在對外收支的平衡關係上，她雖是一個債權國，而不是債務國，但她要在當時的情形下維持金之自由輸出，那已是不可能了。一九三一年度的危機，終於使英國放棄了她的金本位制。這

在這時期以前，她對於金本位制的努力維持，就已經是在縮減通貨縮減信用上大用工夫；這些緊縮政策，是頗有礙於英國工業的發展的。

由金本位制的逃避 在戰爭終結以後的十年中，各國都辛辛苦苦的競求恢復她們既經放棄的金本位，但至此世界恐慌發生後，一大部分既經恢復金本位的國家，重又迫而把它放棄了。大多數國家之放棄金本位，其直接原因雖是由於她們的存金過於缺乏，以致不能許允金之自由輸出，但更基本的原因，却是由於她們應當由一國支給他國的償付平衡，完全推翻了。金本位制的施行，必定要各國間為清結國際收支差額而需要實行移轉的金額，為數不多。今許多國家既負有不能由現貨與勞務清償的鉅額債務，世界的金本位制，自然非崩潰不可。因此，各國間的貿易收支與貸借關係不能重復使其平衡，金本位制就顯然沒有再恢復的希望。這就是說，各國間的實物移轉（自然要對於『三角貿易』[three-corned traders] 及如海運旅遊一類無形的事項，都當加以斟酌，）必須求其平衡，並且，債務國對債權國的輸出，還得允許其較多於債權國對債務國的輸入；不然的話，

就必須債權國逐漸的繼續的向海外投出其剩餘的資金。不過，像這種國外投資方法，勢必要把債務國的債務，逐漸增積起來，因而使那種平衡的建立，一年更比一年困難。實在說來，債權國如非接受債務國以貨物與勞務償債的辦法，那就祇有不絕重放大批的新款，才能取得其舊債的償付，換言之，那就等於說是實無所得。

因此，我們在這裏就不妨作以次的預言，就是，世界如其還想恢復金本位制，現存的國際債務關係，乃至債權國的高率關稅，是非重加調整不可的；這兩層沒有做到，金本位制決不能恢復，但同時在那些因係世界債權國，且因已經擁有龐大金額，以致在當前維持金本位制，尚不感到困難的國家，她們的地位又是怎樣呢？

這些國家——美國與法國——的地位，現在已經是極其困難了。她們有了充分的黃金；但如其她們用這黃金為基礎，發行多量通貨，勢必抬高其物價的水準。最近世界其餘一切國家都放棄金本位了，她們這時要多發通貨，誠然是容易多得。因為英國及其他國家之放棄金本位制，那已在某種限度緩和了她們因缺乏存金所行的通貨與信用的緊縮政策。

我們由此可以探知近年來信用日益擴大的真正意義；這種信用的擴大，現在美國別稱爲『列佛拉辛』（relaxion）——那是一種藉擴張信用供給，抬高物價，因而使美國產業復興的精密企圖。但今日美國人亦還是在極嚴重的困厄中掙扎。放棄金本位制諸國的通貨價值的貶落，已經使她們的輸出品價格，比之那些仍用金計價的諸國的輸出品價格，相對的低廉多了。這一來，前者的產業，固然得到一種刺激，而同時金本位國家的產品，就愈加不易找到銷路了。因爲美國輸出者要獲得一定額的金元或佛郎，他們的貨物就非要求較多的英鎊或瑞典克郎（Swedish crowns）不可。所以，美國法國如其繼續維持金本位制，她們就要感到喪失其一大部分輸出貿易的威脅；同時，那些放棄了金本位制諸國的輸出貿易，則會漸入順境。因爲英國輸出者要獲得一定額數的英鎊，她們祇須售賣較少的金元就行。不錯，美國法國是可由高築關稅壁壘，以阻止其輸入的增加的。但她們除了虧本賤賣，決無由擴張其對非金本位國家的輸出貿易。她們已經實行提高了關稅，並由是妨阻了輸入。然而輸入的阻止，終無補於其由高價通貨所招致的廣大人口失業的危機。

債權國與債務國

假若美國法國不採行提高關稅的步驟，那她們繼續維持金本位制的終局結果，無疑會由限制輸出，擴大輸入，喪失當前國際收支之有利差額，以致破壞其債權國的地位。但是美國也好，法國也好，都沒有打算採行一種讓外國製品在本國市場上逐漸增大其競爭的方策。所以，當其輸出一經減退，她們馬上就努力對輸入實行封鎖。這樣，她們的債權國地位仍可保持，而世界其他各國乃蒙其不利的影響；但歸根結底，這依舊於其輸出工業的恢復無所助益。

此外，非金本位國家通貨對於金元佛郎之相對價值的跌落，那使她們對於金元佛郎借款的償付，需要大量的本國通貨，即更形增大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這種債務負擔的增加，已經引起了南美洲的破壞償付信用，和歐洲諸國的宣佈停止償付。因此，黃金充盈的國家，儘管要維持金本位制幾久就能夠維持幾久，但她們的地位，也並不是如其表現在外面那樣的健全。因為，她們要維持通貨與金的平價，雖沒有困難，可是這件事體在製造工業上的反動，却就不免多所損害了。她們定然會由此喪失其一大部分的輸出貿易。她們由提

高關稅，限制輸入的努力，結局一定要惹起債務各國之破壞債償義務。

所以，事實顯然昭示我們：世界的債務與關稅如不澈底的縮減，已經停止了金本位的國家，決無由恢復；同時，其他尚維持着金本位的國家，也祇好大大的繼續的犧牲其國內的福利。惟其如此，世界各國遲早總會攜手同行；或者是在債務與關稅的方面，達到一種得使金本位制再行回復的和解的基礎，不然的話，就是發明某種代替金的新本位。各國過去兩三年採行過的種種救濟方術，都無非是在繞着她們日益增大的困難打圈子，而不會真正的對應着根本的要求。但這要求，遲早總是要其滿足的，否則世界的經濟制度，將歸於瓦解，且將經過一個混亂期間之後，重新在那種基礎上，再建起一個新的經濟制度來。

我們將回到金本位制度 世界即使爲了金本位制有作爲國際支付標準的便利，決定終久要使其恢復起來，但今後所恢復的金本位，當然不是和以前同一的形態。第一，那些已經放棄了金本位的國家，她們對於恢復其貨幣過去之金價的努力，就頗不一樣。比如英國即令回復金的支付，其金鎊決不會恢復其以前的金的平價，那多半是要貶低的，雖然

我們現在無從預言其究竟貶低多少。法國貶低其佛郎舊時之金的價值的五分之四，德國完全採行一種新的通貨單位，英國是不會仿照她們的辦法的。大體上，她也許會在百分之一五與百分之三〇的兩極限之間，貶低金鎊原來的價值。

英國其所以要貶低其通貨價值的原因，就因為她在一九二五年恢復金本位時的鎊價，與其國內的購買力相對說來，那是失之過高了。鎊價過高，以外幣計算的英國貨物，就未免過於高昂，在這方面講來，英國政府與英格蘭銀行是妨害了英國的輸出貿易。英國在世界貿易衰落後諸年度之失業人口大增，這算是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英國輸出業者要抵銷其鎊價過高的障礙，勢必要能夠極猛烈的削減其生產費才行；而生產費的削減，又祇有大的降低工資，降低貸金利率。但在實際上，一部分因了存金缺少，以致採行緊縮政策的原因，利息仍維持着高率；同時工資勞動者又拚命反對工資的縮減——這種縮減，往往爲了實行的效果，需要大大超過生活費上之實際的或預想的低落限度以上。

因此，假如世界重又回復到金本位，各國國幣的相對評價，一定會與其世界經濟恐慌

以前的評價不同，那是會貶價的，且不僅如當前放棄金本位諸國之通貨的貶落。不過，今後恢復的金本位，即令還繼續在某種限度，用金作為國際清償的手段，那也與其從前的意義不同。舊的金本位制，就在使每個國家的國幣，與其他國家的國幣永久維持一種固定的相對價值。每個國家為其國幣單位，確定一個一定的金等價，並假定彼此的這種等價永遠維持不變。然在事物的性質上講，那是用不着要這樣固定的。一國要維持必要時以金兌換其通貨的志願，她是頗能保有一種應時伸縮其金之數量的權力的；為要在必要時償付外債，她也許有獲得金的權力；不過，各種通貨間的相對價值，那是不會再固定在金輸送點之窄狹限界以內的。

但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異議，以為金本位的全部價值，確實就在它對各國不同的貨幣能保證其穩定的相對的價值；如其這點不能做到，金本位制就完全沒有保存的必要，然而，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各國貨幣之相對價值的不絕變動，那對於貿易誠是一種極大的不便；但我們並不說是每種通貨之金的價值，不應當使其長期保持穩定，而況還有一種

權力，使變動減少，並使其適應那種根據長期趨勢所證明的需要啊！就這種體制的作用看來，在正常狀況下，外國匯兌是會固着金輸送點所設定的限界之內的；但是，假若在各國價格水準上，或在她們相互間的支付差額上，長期不能維持平衡，那末，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就要她們的通貨之金的價值有一種變動，才能予以改正。對於貿易商人，對於金融業者，這種制度會給予他們以充分的安定，使他們在進行融通國際貿易之通常業務上，不致顧慮各國通貨之相對價值的短期可能變動。而同時某種特殊國家如因長期變動招致存金的匱竭，或收入對支出的過於短絀，這種在必，要時改變其通貨價值的體制，還可提供一種避免放棄金本位制的手段。這好像是說，假若金本位制完全恢復過來，那勢必要具有諸如此類的預防作用，而不復使那些主要國家之通貨的金的價值，絕對加以固定。

代替的通貨本位 然而有許多人都頗想完全拋棄金本位，而以其他的本位來代替。這裏有兩個貨幣改革派，一派純粹從國家立論，另一派則由國際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這第二派改革家承認世界須得有一種穩定的國際本位，以保持各國通貨相對價值在短

期內的確定。他們極力鼓吹以所謂『表計本位』(tabular standard)代替金本位。這種『表計本位』就是一種不用金作基礎，不用其他金屬作基礎，而祇用若干種類物品價格之指數作基礎的通貨本位。但要使世界各國採行這種本位，那是困難極了。我們在前章講過，那怕適當測定一國國內的物價水準，那也是困難不過的，因為現行的批發物價指數，並不會適切反映着一切價格的變動；而這些價格，又是在考察國幣供給充足不充足的關係上，所必須加以考慮的。一種包括無遺的、確切的全國物價指數，實際尚不存在；我們要測定世界物價水準，或者要根據那種測定而規劃一種通貨本位，那實在是更難談到了。少數容易移轉且廣泛的加入了全世界貿易中的物品——小麥就是一個極顯著的例子——雖然可以說是具有全世界通行的國際價格，但在其餘最大一部分物品，却就不可一概而論了；況且，這若干出進於國際市場上的商品價格，對於各國其他商品與勞務之變動不常的價格，也還沒有保持着任何固定的關係呢！

無論如何，以世界現在的統計知識與設備，希望把世界物價水準做基礎，來建立一種

國際的通貨本位，那無疑是一種幻想。這幻想，我以為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不過，對於另一派的通貨改革者，則又當別論。這一派是主張，每個國家把她的通貨基礎，建立在她自國的物價水準之上；他們寧願以這種手段穩定其國內的物價，而不欲像金本位制那樣，對各國不同國幣之相對價值加以任何的局限。實際上，一國對於她的通貨政策，有兩種可以求其穩定的方式：她能够穩定其國內的物價水準，或者，穩定其貨幣之對外價值。但在現階段的世界組織下，這兩方面都是不能做到的。把國內的物價水準固定吧，以外幣計算的本國通貨價值，不能不發生變動；把國幣之金價固定吧，國內物價水準不能不發生變動。這兩條道路，通貨改革者都行不通。

但是，假若我們贊同以次的意見，說國家貨幣政策的目的應當在可能範圍內謀國內物價的穩定，那麼，把國外匯兌率的漲落，限定在國幣價值上够應付長期作用的、經過深謀遠慮的變動，那也許是可以實行的。假若這點能够實行，那在國內求價格安定的希求，就與貿易商人、銀行業者對於匯兌率上之短期穩定的需要，能够融合了。

但是，穩定國內價格水準的努力，却並不一定要繼續用金爲國內通貨發行的基礎。對於國際支付的清償，如其額數不過於龐大，那是不妨繼續用金作爲清償手段的；但同時對於國內通貨發行之金準備的保存，乃至對於依存金多少發行通貨的規定，那却是非廢除不可的。以金爲國際支付的手段，與不用金爲國內通貨供給之自動的節制樞紐，其間並沒有什麼矛盾。爲前一用途而繼續用金，儘管有強烈的要求，爲後一用途而繼續用金，那就祇是爲了祛除人們之膨脹的疑慮而已，此外實毫無一點作用。

然而，我們主張廢除依存金爲國內通貨發行規準的那種辦法，那並不是說，我們應當好好採行或種代替金本位的其他自動的本位。我們講過，照物價水準自動的調節通貨供給的努力，那是徒勞無補的。因爲，那怕就在一國之中罷，任誰都不能實實在在指明一切物品與勞務的價格水準是怎樣。關於物價變動——那不僅包括有通常習見的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的指數，且還包括有那些涉及勞動、房屋、股票證券以及一切必須買賣的事物的價格材料——的可能知識，在指導那些負責決定貨幣政策，決定商品究需多少貨幣流通。

的人們的作用上說，那是極關重要的。但我們要把所有這些關於價格變動的零碎知識，都蒐集起來，由是作出一種簡單而包括的指數，使其成爲我們自動調節通貨的適當根據，那就困難了。對發行通貨負有責任的當事者——不管是中央銀行抑是其他機關——當其決定對各種可以測知的價格趨勢加上多大的分量時，他是要用判斷的。這就是說，通貨將來的規制，不是依着金的運動或標準的物價指數自動的適應，而是要根據審慎周詳的管理（deliberate management）每個國家的這種『管理的通貨』（managed currency），就是要使其貨幣的供給，依不絕變動的需要而伸縮；物價的水準，並不求其絕對的安定，祇要那種安定程度，够使製造業者消費者得到合理的保障，且够消除那些純由貨幣原因（非因生產費實在變動）所引起的價格上的動搖就行了。至若在實際上要使國內物價水準安定到怎樣的程度才好的問題，那我們在前章已經論過，這裏所要提示的，祇是兩點：第一，依照我們的意向，使國內物價相當維持安定，那是可行的；第二，祇要國際間的收支差額不過於龐大，同時不用金爲國內通貨發行的基礎，那就繼續把金作爲國際支付的

手段亦是可行的。

我們有了上面所說的這般概念，現在乃可對於現代那些主要負責規制通貨與信用的金融機關之實在機構，加以簡單的考察。在能够採用的許多實例之中，我們姑且以兩個於全世界貨幣制度最關重要的金融機關為例。第一是占有國際金融中心之傳統地位的英格蘭銀行，以及與英格蘭銀行相關聯而其主要任務在對英國國內產業提供信用的合資銀行。第二是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體系，這與英格蘭銀行同為戰後大多數國家改造其中央銀行所準據的典型。

第四節 英國的銀行制度

英國的中央銀行，就是英格蘭銀行，即在一六九四年開始由私人創設的舊金融組合。這個組合，原先是由貸款於當時的政府，而取得特許執照；它初次得到發行銀行鈔票的特權，亦與此貸款有關，因為它被允許發行無金作保障的鈔票，就是它貸與政府的貨幣。在開

始時，它的這種特權地位，曾遭受了多方的反對，並且，其特許執照，亦發生過幾次危險。但在十八世紀中，它的地位漸形穩固了。當拿破崙戰爭時，國家財政需要緊迫，英格蘭銀行遂最後取得了英國中央銀行的資格，不過，它統制通貨的地位，那却是此後在一八四四年之銀行特許法案中才予以規定的。因為它有功績，國會才賦予以種種權力。不過，除此以外，它還是一個純粹的私人團體；由一大些按照投資額配分紅利的股東所有，並由這些股東選舉理事會來從事管理，國家對於其人選不得過問。英格蘭銀行的這種為股東私人所有的性質，與其他大多數國家之中央銀行正相類似，特與美國中央銀行不同罷了。可是，有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雖為私人所有，但中央政府得派選若干董事或全部董事。法蘭西銀行的經理與副經理，通由政府指派。德國在一九二四年依陶斯計劃（The Dawes Plan）改革銀行制度以前，所有國家銀行的董事，也都是由政府所指派。

不過，在形式上，英格蘭銀行除了國會法案所設定的種種規制外，雖然完全不受政府的支配，但它與財政部之間的關係，實在非常密切。財政大臣及財政部官吏不絕與銀行經

理及其他銀行職員商談。在金融政策的形成上，我們往往難於判定財政部對於銀行的權力比較銀行對於財政部的權力爲大。其實，它們總是通力合作的。它們之間的政策上的齟齬，現在幾乎是無從看出的。

政府與銀行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一部分是基於以次的事實，就是在許多重要的金融事體上，銀行係依照政府的規定，以政府機關的資格活動着。政府及其各部的機關，都與英格蘭銀行立有收支賬簿。政府一要借款，就委託銀行去進行。政府往往也向銀行直借，或者讓銀行自行決定；看是逕由她自己貸出，抑是由她以短期國庫債券的方式向市場募集。諸如此類轉換公債的活動，通是由銀行擔當，並與銀行密切磋商進行的方法。就這樣，英格蘭銀行每日都在極密切的接觸財政部的事務，她所處的地位，頗容易知道財政部所要採行的政策，並且，她還可對政府加以某項壓力，使政府不能不採行銀行諸董事們認爲有利可圖的政策。

英格蘭銀行除了爲政府服務以外，同時還與其他銀行有賬務往來，那些銀行包括有

主要經營貯款業務的大合資銀行，以及在倫敦市內金融機關中占有一個重要部分的特殊金融公司。合資銀行如何在英格蘭銀行中保存一個存差額，並如何把這存差額視為它們擴張信用的現金準備，那都是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的。各合資銀行之間的債務，通依簿記登記着，在英格蘭銀行清結——即是把它們應該收入付出的一定金額，轉一下賬就行了。這一來，英格蘭銀行就繼續伸張其勢力，到整個銀行系統——那不僅包括有合資銀行，且包括着倫敦市諸金融公司以及無數在倫敦設有分所並進行營業的外國金融機關——中了。

復次，英格蘭銀行又是國會依照一九二八年的法案，委託其規制通貨的機關，照那次法案的規定，戰時由政府直接發行的國庫券，都移轉到英格蘭銀行，由是，整個通貨制度的管理權限，通操縱在它手中了。它由上面這三項權力的連同運用，遂使它在英國整個金融政策的協作與控制上，都具有極大的權威。假若它這三項權力缺少了一項，它對於其餘兩者的成就，決不會有同樣的力量，同樣的效率。

英格蘭銀行與其他主要各國——如德國、法國——的中央銀行，還有一個不同之點，就是它在全國沒有佈起支店網，且沒有企圖大規模的進行一般的銀行業務。普通私人與商店，都不是與英格蘭銀行共來往，而是與某家合資銀行共來往；其貼現的業務，通常亦不是直接由英格蘭銀行擔當，而是由某合資銀行或某專門貼現的金融公司擔當。英格蘭銀行沒有散佈它的活動，它是儘可能的專精它的三種任務——規制通貨，服務於政府並支配其他銀行與倫敦市內的主要金融機關。因此，它與其他銀行或金融機關，不是立於競爭的地位；它可以自由自在的按照它的三種主要任務決定其政策，而無須顧慮到涉及一般的銀行業務所要顧慮的錯雜關係。根據它的政策，它不支付貯款的利息，它也不努力由商業世界吸收貯金。並且，在實際上，它簡直不是一個企圖為其股東掙求最大利潤的機關。許多年數以來，它已經是在支給那種容易獲得的穩定的紅利，一定額數紅利以上的利潤，都得存留下來，用以增強其將來的地位。它的主要股東，都是倫敦市的大金融公司與金融業者，他們都欣然接受銀行的政策。因為他們所期待銀行的，與其說要銀行本身掙得最大可能

的利潤，却寧可說是更進一步的希望銀行能促進金融機關全體的最有利的業作。換言之，就是英格蘭銀行不是以它的股東們的利益爲前提，而根本是以倫敦金融界的利益爲前提。但這自然不是說，它是爲了那些別於金融家的產業資本家的利益，或者是爲了全體社會的利益。關於這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論及。

銀行率 最爲一般人所熟識的英格蘭銀行政策的手段，就是所謂銀行率（Bank Rate）。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每個星期都佈告那一星期的銀行率；這種佈告，通常於全國的貨幣行情，具有決定的影響，因爲，其他銀行打算放款所定的利率，照例要與英格蘭銀行所佈告的銀行率相適應。不過，英格蘭銀行率在一般利率上所發生的影響，比之在它自己方面所發生的影響，還要重要得多。它自己所佈告的銀行率，祇是打算對於那種至少簽有兩個有信用的倫敦人名（two good London names）的貿易匯票，以這種銀行率再貼現。但是，這種交易匯票，在習慣上並不完是在英格蘭銀行貼現或再貼現。英格蘭銀行率，通常皆較合資銀行、貼現公司以及匯票經理人所定的貼現率爲高。期票貼現的正常業務，不

是由英格蘭銀行進行，而是由其他金融機關進行。後者祇有在特殊的情形下，始有向英格蘭銀行再貼現之必要。而這所謂特殊情形的發生，就是由於正常供給貼現基金的合資銀行與在倫敦的外國金融機關，都決定由限制信用，縮減借款。它們既限制信用，那些由它們借款來貼現的匯票經紀人與其他金融公司，乃不得不迫而向英格蘭銀行融通資金。英格蘭銀行的最重要業務之一，就在它往往要打算以現行的銀行率對那些够資格的匯兌再貼現。所以，當金融吃緊的時候，最後總要這樣一個主要機關來應付。不過，英格蘭銀行的這種再貼現率，往往總較市場率為高；並且，匯票經紀人與貼現公司一有向英格蘭銀行融通資金的必要，他們就定然要蒙到一種損失，即他們須以原來較低率貼現來的匯票，向英格蘭銀行以較高的銀行率再貼現。因此，向英格蘭銀行再貼現，那是匯票經紀人與貼現公司不得已而採行的最後手段；英格蘭銀行如積有大批的再貼現匯票，那往往是金融吃緊的一種表徵。

不過，向英格蘭銀行貼現的人，即令沒有一個，其銀行率對於一般貨幣行情的影響，遠

是異常之大的。倫敦一切短期借款的利率，通常會直接視此銀行率爲轉移。例如，合資銀行對於其主顧之普通透支——這卽是極廣義的工業借款——所課的利率，就是受此銀行率的影響。此外，匯票經紀人及貼現公司對於貿易匯票所定的貼現率——卽可說是爲從事外國貿易而舉債的利率——亦是受此銀行率的影響。因爲英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由匯兌周轉，而不是由銀行透支周轉。並且，在以這種方法周轉世界各國間的貿易當中，倫敦亦擔當了一個重要的任務。不過，以法國而論，它的一大部分國內貿易，雖然還是繼續以匯票周轉，而不用支票和普通銀行業者的透支辦法，但英國的國內貿易，却幾乎不用匯票。英格蘭銀行率對於銀行業者的透支利率和匯票貼現率，是都有影響的，所以，英國國內貿易不用匯票，那並沒有減少這種銀行在各種短期借款利率上的作用。

其他的貨幣率 我們上面的立論，並不是說銀行率一有變動，由匯票經紀人與貼現公司所定的貼現率，馬上就要直接引起與此成比例的變動。例如，合資銀行對於其透支利率，雖與漸形昂騰的銀行率維持相當的變動比例，但是銀行率如其下落，它的利率却不

一定隨着變動，這就是說，它對於下落，設有一個最低的限度，銀行率無論低落到什麼田地，它的利率是不會低到此最低限度以下的。常有人說，合資銀行的這種最低限度利率，是百分之五。爲了應付某種例外，這也許不是毫無變易的定規，但對於普通貸款的正常利率，它們是決不會縮減到百分之五以下的。銀行率增加，它們的利率隨着增加，但往往還要走在前面。因爲，銀行率通常雖較匯票貼現與日常貸款的現行市場率爲高，但在另一方面，往往却較合資銀行對工業透支所課的利率爲低。這種差別的存在，就是因爲對工業的貸款，往往需要較長的期間——通常爲六個月——而匯票經紀人與貼現公司則是舉借活期借款——即是說，銀行要他們幾時償還，就幾時償還。在銀行方面，它們是願意依較低的利率貸出這種活期借款的；因爲，款子隨時借出，隨時收回，它們就能够在極流動的形態上，保有其一大部分的資財。假若合資銀行要由貸款額的縮減，而減縮其債款，它是立即可以收回其若干貼現市場上的資金的，但如其它們要收回其工業透支，那就非經過相當長的期間不可了。

但我們要問，普通企業家對於其借款，爲什麼肯支給比貼現率爲高的利率呢？其簡單的答案是，逐日的活期借款，不適用於他們的用途。企業家爲了周轉生產或交易所借得的款項，都須這款項能讓他們在手中周轉一個長的期間，使他們在必須償還以前，得由完成生產或販賣貨物而有所利得。他們不能冒逐日借款的危險；在經營本利未收回以前，要他們償付的借款，那亦是他們不敢嘗試的。就因此故，他們對於有六個月或者更長期保障的資金，都寧願支給較高的利率。而在合資銀行方面，因爲它們的資金要由此鎖閉六個月或更長的期間，沒有貼現式的貸款流動，所以它們對於比較長期的借款，乃不能不要求較高的利率了。英國的銀行業者，往往總是企圖把他們大部分的資金，用在最流動的方式之上。

這種對於資金之流動性的希求，在某種限度內，是有礙銀行業者依墊支滿足生產者之實際需要的意嚮的。普通銀行的墊支，都是以六個月爲期，但有許多生產或交易的完成，却要求比較長的期間。比如就農業來說吧，農業上的借款，就非較長的期間不可。有許多人，都訴說英國對農村社會融通資金辦法的不當。此外，在許多重要的工業合同中，其延付期

間，往往要比較六個月長多了。生產者接受大批定單或對其顧客擴大信用的能力，常是依存於他由銀行方面通融借款的能力。因此，銀行方面確也常常貸出遠較六個月為長的長期款項。不過六個月是它們普通對工業貸款的確定期間，這個期間滿了，還可在必要場合，允許更新續訂。近年以來，由銀行出貸於工業方面的資金，有許多都因企業公司蒙到貿易長期不況的困難，而終於被封固在那裏面若干年了。銀行要把它們已經『凝結』(Frozen)在重工業乃至紡績業方面的大宗墊款收回來，勢必要驅使借款者陷於破產的境地。但是，這大宗『凝結』了的墊款，並不是由於銀行方面願意承借若干年的長期，而實在是由它們已經無法收回這原來的短期貸款。

信用與資本

英國的銀行家們，慣於在那些能够合法的由銀行透支融通的企業借款，與那些不能够合法的由此融通的企業借款之間，劃一條鴻溝。為工業預備長期的資本，不是他們所要做的事，他們將告訴企業界，叫企業界去作這種準備。因為那是有關資本市場的事體。長期資本應當仰仗貯蓄，而不應依賴銀行信用。銀行業者的唯一業務，就是作

短期放款，過此限度，卽算是替旁人越俎代庖。但這個區別在實際上，常是不容易區劃的；剛在大戰結束以後的繁榮期間，就在銀行業者自己，亦頗不易確切的或適當的把這種界限區劃出來。他們那時曾對許多企業大墊其款，那些企業把他們這種墊款，用以購置機具，或他種企業設備，或者取得現存諸企業的資產，並使這些企業與他們自己混合起來。銀行方面之所以肯作這種墊款，乃因它們期望在不久的期間，企業公司方面卽能向大眾發行股票或債券，然後再以這股票或債券所收得的長期資本，代換銀行貨幣。但世界貿易衰落事態發生後，企業界異常驚恐，借款諸企業之資產價值，迅速趨於低落，這一來，它們要向大眾募得必需的資本，就不可能了。在此種情形下，銀行自無從收回其貸款。銀行營業成規上的這種變調，遂不期然而變成了大增『凝結』信用額數的一種原因。與前面說的『凝結』信用相並說來，這就是第二種『凝結』信用了。這第二種『凝結』信用，於是成了銀行正常營業變調的結果。

誠然，在某些國家中，其銀行營業成規在這方面與英國的銀行營業成規大不相同，比

如德國就是一個顯然的適例。德國銀行在正常狀況下，大規模的收買工業經營的股票，從而它們有頗大一部分資產，都由流動的形態，變為暫時『凝結』的形態了。它們通常收買股票，並不是爲了要永久保留下來，而是準備後來當這些股票價值昂騰的時候，把它投售出去。英德兩國銀行在營業成規上的這種區別，大體是由於德國工業家要籌集長期資本，比較有更大的困難。在籌集長期資本方面，專門作中介活動的德國金融機關，其富厚程度與其設備之完善，都遠不若英國的這類機關。所以，德國的銀行就努力想填補德國金融機構上的這種缺陷。然而，像它們在營業上的這諸般活動，勢必要把它們一大部分基金長期鎖閉下去，以致它們所需的資本，比之那些使其墊款儘可能的保持流動形態的銀行的資本還要多。我們知道，在一般德國銀行與其他大陸銀行方面，以它們自己所擁有的資本，與其所周轉融通的交易額數相對的較量起來，那是比較主要藉存款者資金活動的英國銀行資本，要多多了。這種活動資本額與其總義務上之相對的差別，那和英國與大陸方面之銀行經營方法之差別，是密切相關的。

活期貸款 銀行率會影響一般銀行對普通工業透支所課的利率，我們是已經知道的。此外，銀行率還會影響倫敦市之活期貸款的利率，特其途徑不同罷了。合資銀行除了由透支放款外，同時還是供給這種活期貸款的主要來源。借入此種款項者的主要用途，是用以購買匯票融通國外貿易，但也用以從事股票與實物交易上的投機。合資銀行乃至任何駐留在倫敦的外國銀行，隨時都保留有它們願意以活期——而非註定六個月期限的透支形式——貸出的一定量貨幣。祇要誰肯冒險隨時償付的危險，他就可以用較低的利率，借得這種性質的款項。實際進行這種借款的，大都是那些股票經紀人與貼現公司，他們兩者通是用這種借款，購買那些可以迴轉一個期間——通常比如說三個月——的貿易匯票。這樣看來，他們使用這隨時有償還義務的貨幣，乃是要購買一些非經過相當時期不會得到利益的東西。並且，當他們購買匯票時，自然還要斟酌到他們所應支給的貼現率。可見他們舉行此種借款，就顯然是冒險了。不過，他們敢於作此種冒險嘗試，必定要同時還有其他可以通融款項的機關。當某銀行向他們催討款項時，他們即可向其他銀行舉債彌補。但

就一般情形而論，任何緊縮貸款的趨勢，會同時作用到一切銀行或大多數銀行，所以這種希望借債還債的辦法，往往是行不通的。在此種情形下，匯票經紀人或貼現公司，都只好向英格蘭銀行通融。

除了匯票經紀人與貼現公司外，還有一批向合資銀行與外國金融機關承借此種款項的人，那就是專門從事股票交易與實物交易的投機者。他們通融極短期的借款，亦不免要冒大危險，並且，當合資銀行向他們償還債務時，他們還不便請求英格蘭銀行通融，因為英格蘭銀行是不肯依證券而對投機者墊支的。所以，銀行如實行縮減它們對於那些在股票實物交易市場中活動者的信用，這些活動者就必須承認是一種損失。就這樣，銀行政策乃能在股票與原產物價格上，發生決定的影響。假若在物價暴騰時，各銀行自由貸出投機用途的貸款，那物價就會更狂亂的暴騰；反之，銀行信用如其縮減，那立即又會使大批證券向市場拋出，以致當貿易不況與信用緊縮政策連同作用時，引起股票價值的可驚崩落。我們也許可以說，銀行應當規制它們對於投機者的墊支，以便阻止或緩和股票與實物市

場上之暴騰與暴落。但在實際上，投機者當物價高漲時，儘管實在要借款投機，而他在名義上說是借作其他用途，那是銀行方面無法阻止的；假若物價暴落，投機者存貯在銀行方面藉作其借款保障的證券，勢必迅速跌落，這時銀行爲要使其自己避免損失，乃不能不急於收回其一部分貸款了。因此，要求把銀行制度妥爲組織，以期能阻止物價之投機的暴漲暴落，那雖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體，但我們却不能妄言那是一件容易的事體。卽如美國她就曾經發覺那實在是困難不過了，其原由待我們在後面再來說。

銀行的儲蓄業務

銀行制度的原來用途，第一，顯然是在對於私人乃至公司的存款，提供一個安定地方，並爲他們私人乃至公司相互間的收支借貸，提供一個轉移貨幣的簡便手段。從根本上講來，這是銀行儲蓄業務的最單純形態。而其在現代世界的發展，則大體是以支票制度的發展爲基礎；支票制度依着簿記的登記法，使貨幣的移轉大增便利，其結果乃大大節省了實在通貨的用途。至銀行制度的第二功能，就在對企業界供給充分的信用，務使企業活動能在極大可能範圍內，保障一切可供利用的生產資源之盡量使用，不

過，它同時還得避免信用的過度擴張，以免把物價抬得過高，物價過高了，那倒反而要引起不能保障生產資源盡量使用的結果。

關於銀行存款轉款的勤務，實際是沒有人表示異議的。大家都認定那都是有用的業作，並且都做到了恰到好處的田地。不過，往往也有人作這種提示，以為使用支票的習慣，還能夠大大擴充，一直擴充到遠較英國今日所已經成就了的程度；比如，在他們這班人想來，工資就應當用支票支付，而不用通貨支付。但用支票支付工資，究竟是不是實在經濟，那還是疑問。工資領取者所得工資的大部分，都是要極零碎的付出去的，他的零碎支出如用支票，那簿記中所含的額數，就未免過大，如其他僅在領收工資時接受支票，支票到手，即到銀行兌取通貨，那又全無利益可言了。不錯，工資領取者的生活水準如其大大提高，情形也許不同。支票制度將來的發展，實未可限量，但以英國而論，她目前是一定不够用支票為支付工資的手段的。

銀行業者與信用 關於銀行制度之業作的主要爭論，乃發生於其第二個功能——

——即信用的創造。不論是誰，如其他舉債或透支爲銀行所拒絕，他就會覺得那是信用供給不足的表徵；他所請求的信用如其得到了，他又會覺得銀行對他課加了過高的利率。大多數金融改革學派，不是主張輕減信用的利率，就是主張增加信用的供給。其實這兩件事體沒有大的出入。假若其他情形不變的話，信用利率輕減，立即就會吸引更多的借主；如其利率率增加，許多想借款的人，也會縮手不借。所以，當銀行希望作更多或更少的信用時，它們的主要辦法，不是對於那些本來不予貸款的人貸款，或者對於那些本來打算予以貸款的人不貸款，而是應時伸縮其利率。利率本身的漲落，就會造成信用的緊縮或擴張。但是，銀行對於某人貸借，對於某人拒絕，或者對於某特別主顧不肯作某種額數以上的放款，那又是依着它對於借款者的償還能力及其借款用途之出息，而加以鑑別。那怕利率保持不變，銀行還能由其對於透支所需擔保之較寬鬆的或較嚴格的要求，乃至對於借款用途之較苛細的或較隨便的審查，而影響信用的數量。利率誠然是支配信用數量最顯然的要素，但却不是唯一的要素。

我們講過，由合資銀行課加於普通借款者的利率，乃取決於英格蘭銀行所宣布的銀行率，在合資銀行自己，它不過決定有一個最低的限界罷了。由是，在合資銀行實際貸款的總量中，英格蘭銀行可依其銀行率的或高或低，而使緊縮或擴張。當英格蘭銀行感到信用應當緊縮時，它即抬高其銀行率，當它感到信用應當擴張時，它即降低其銀行率。不過它在這方面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因為，如其它把銀行率定到過高或過低，超越了借款者打算支付，貸款者打算接受的限度，它所定的這種銀行率，就會失其支配作用，市場上將脫離其束縛，自行安排一個自認為妥當而於英格蘭銀行意嚮無關的借貸條件。因此，英格蘭銀行當決定其銀行率時，通常都要小心謹慎，使其不超越市場會認為合理而予以接受的限度。

公開買賣政策 不過，英格蘭銀行除了銀行率以外，還把握有影響信用額數的其它手段；就其最爲吾人所熟知者而言，即爲證券的買賣，即所謂『公開買賣政策』(Open market policy)。英格蘭銀行隨時都擁有容易變賣的大量證券——主要爲政府公債。它一賣出證券，購買此證券的人，就須對它償付。這種償付，通常是用某合資銀行或某金融機

關所簽發的支票。其結果，簽發此支票的合資銀行，勢必要在其英格蘭銀行所立賬簿的貸方，減去同等的額數。但是，我們講過，合資銀行在英格蘭銀行所立賬簿貸方的金額，通常是當作現金看待，即其貸款能力的基礎；現在此種金額既經減少，即等於其貸款能力的削弱。因此，英格蘭銀行之證券投賣，就是它縮減合資銀行信用放款額數之有力武器。

在另一方面，如其英格蘭銀行由公開市場上買入證券，它自然要對此證券行使支付。其結果，就恰好與前面相反的，增加合資銀行在英格蘭銀行所立賬簿貸方的相等額數，由是，合資銀行之信用貸款能力增加。而英格蘭銀行（其他國家之中央銀行大率類此）之公開買賣證券政策，乃成爲其規制商業信用之銀行率的有力補助手段。此外，英格蘭銀行還能利用其政府銀行的地位，對貨幣的充盈或缺少，發生極大的作用。假若它希望貨幣離開市場，它就可以勸政府暫時以國庫債券的方式，增加其短期貸款的額數；反之，如其它希望投出貨幣，它就可以對若干國庫債券行使償付。不過，這種政策，究祇能收效於一時。因爲國庫債券對於銀行墊支的用途，隨時可以當作現金使用，或者被視爲與現金相等。

從此看來，英格蘭銀行規制信用放款的主要手段，還祇是銀行率與公開買賣政策，這兩者連同作用起來，對於英格蘭銀行通常在整個經濟制度中之信用膨脹或收縮，所給予的完全支配權力，那是怎麼也不會說得過火的。在諸借款者間，斟酌情形，配分信用，合資銀行雖有充分的權力決定，但它們對於信用放款的總額，却就比較不能自主了。這種事實的形成，並不是因為英格蘭銀行對於其他銀行的放款政策持有何等強制的權力，而是因為它們放款的額數，終歸要受某種法定規條的限制。本來就法律上講，就技術上講，它們要放款多少，都可完全自由決定，而無須過問英格蘭銀行的意嚮。但在實際，它們却大體要遵從英格蘭銀行所定的政策，並且，它們企圖脫却英格蘭銀行羈絆的任何努力，結局都不免要逢着英格蘭銀行的有力防衛。我們講過，不論在什麼時候，英格蘭銀行都能運用其公開買賣政策操縱信用，使信用差不多緊縮或擴張到合資銀行現金準備所必需的程度。

因此，在整個英國金融制度中，英格蘭銀行實占有機樞的地位。它不但規制着通貨額，且還規制着信用額。以當前情勢而論，後者的規制權力，究比前者重要多了。因為對於通貨

的需要，在邏輯的結論上可以說是視信用發行額為轉移，而在實際上，英格蘭銀行的主要任務，也就在決定信用究應發行到什麼程度，然後再使通貨的供給，與此既經決定的信用政策相適應。我們在前面講過，如其英格蘭銀行得自由管理通貨的供給，而不用顧慮準備金的義務，或對於信用發行沒有設定法律的限制，那它對於此種規制的工作，一定會比現在做得妥當多了。其實，一種管理的貨幣政策，僅僅是對於現有的管理的信用政策之邏輯上的補充。

第五節 美國的銀行制度

美國的銀行制度，與英國銀行制度是大不相同的，那不但是就其結構與業務言，同時還是就其發展過程言；英國的銀行制度之形成，乃是由於逐漸的演化，而並非事先立定了一個整個統一的計劃，反之，在美國的銀行制度，則大體是審慎周詳的由法規創製出來。其實，美國當前的這種銀行制度，還是開始於一九一三年，而為一九〇七年之金融大恐慌之

直接結果；因爲那次大恐慌顯然指示了兩種事實：其一是對於全國銀行活動，有加以較過去爲嚴格的中央統制之必要；其二是嚴厲規制通貨發行，同時不連同統制銀行信用供給與指導之危險。

美國幅員之廣闊及其各地方之經濟差特性質，使它不能像英國那樣自然的、逐漸的產生出一種集中的金融制度。單在股票市場活動的範圍內說，紐約幾乎可以說是美國的金融中心，猶之乎說倫敦爲英國的金融中心一樣。但紐約與倫敦不同之點，就在它不是美國大部分工商業的有力的金融中心。誠然，要由一個單一的中心，指導着美國廣大的生產上與貿易上的金融活動，或者把所有這些方面的金融活動，都直接安排在位置於單一市場中之集中的銀行制度統制之下，那是難於實行的。無論就幅圓的廣袤上講，抑是就產業與人口的地理分佈上講，美國都需要採行一種不像英國那樣集中的銀行制度，即需要採行比較分權的制度。

但是在聯合準備法案(The Federal Reserve Act)通過以前，美國在銀行活動方

面已採行了一種頗大限度的分權制。不過那種制度的採行，並不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且是基因於美國政治制度之聯邦的組織。依照那種組織規定，銀行得在各邦的法律下設立，並且各邦得採行一種具有它自己特徵的各別銀行法。這種制度的不便，縱然在一八六四年導來了一些直接活動於聯邦法律之下的國家銀行，但邦銀行仍繼續與這些新設立的國家金融機關相並的存在着；國家並沒有企圖創立一個中央銀行，甚且沒有企圖創建一種像英國那樣的中央銀行制度。加之，美國的立法，一向對於銀行的分行業務，是側目而視的；典型的美國銀行，仍舊繼續為一種沒有支店的地方金融機關，其任務是在融通某一特殊市鎮及其鄰近一帶的工業商業，在美國各地，特別是在紐約發達起來的許許多多的國家銀行，從許多方面講來，其業務實在與英國合資銀行的業務相同。但英國最大一部分貯蓄銀行，都被集中到五個大合資銀行手中了，而美國則除了一大些經營某種銀行業務的金融機關以外，却還存在有兩萬四千個正式銀行。而且，這兩萬四千個銀行，甚至還是從大戰以來，經過大規模併合運動的結果。在大戰以前的一九一三年，美國銀行數目却超過了

三萬以上。

國家銀行與邦銀行

在一九三〇年還存在的這兩萬四千個銀行之中，約有八千個是在聯邦法律下活動的國家銀行，其餘兩倍這個數目的，則是受邦法律支配的邦銀行或某種托辣斯公司。所有的國家銀行，通由法律強制其隸屬於聯邦準備制度之下，至若其他非國家銀行，則一聽其自由，在它們這些非國家銀行之中，約有一千個已經利用了聯合的機會。因此，整個美國聯邦制度所代表的銀行，不過是略多於全國銀行總數的三分之一罷了。特這些隸屬於聯邦制度的銀行，都是比較最大最重要的機關，所以它們在全國銀行總投資額中所占的比例，要比較大多了。

聯邦準備法案的目的，原在以那些能够擔當中央銀行任務的機關來整備美國的金融制度，換言之，就是原意在通過這些機關，對國內的通貨與信用加以規制。這種法案的壁劃者，立意要廢除當前由許許多多銀行機關各別保有的現金準備，而代以保存於少數銀行——這些銀行的活動，要成爲統一制度的部分活動，並且在某種限度內，還要受共同的

統制——的比較集中比較活動的準備。照舊來的制度，每個重要銀行，都保有它自己的準備金，而較小的銀行，則依賴較大銀行的準備，這種制度是已經發現了大的不便與危險的。某個地方的通貨與信用的尖銳缺乏，大可與其他地方之金融來源過剩同時並存着。並且當困難發生時，它們還不能相互作有效的援助。因為地方距離是頗有關係的。全國各部分銀行間之實行支票的清算，那不能不需要一個相當的期間，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有效聯絡的缺乏，和在鈔票發行權取決於各國家銀行分別保有的金準備的情形下，對通貨的供給，沒有大的彈性。

聯邦準備制度 因此，美國的銀行制度，是非加以聯合組織不可的，但却不能如英國德國那樣的集中。就這樣，它採行了一種比較不同的制度。它的聯邦準備法案，不是在全國建立一個中央銀行，而是把全國區分為十二大區域，而分別在各區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設立十二個聯邦準備銀行，此後，這十二個聯邦準備銀行又有權在其他次等重要的中心區域設立分店。不過，它們這十二個銀行並不是完全獨立的機關，它們的業作互有聯絡，並

且在某種限度內，都要受聯邦準備局(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的支配；而這聯邦準備局，就是美國全國銀行政策的最高統制機關。

特這裏有一件有興味而且有意義的事實，就是一般的講來，美國的工業，遠不若歐洲各國工業之宜於受國家的統制，但美國新的銀行制度，却大體可以說是一種政府的組織。聯邦準備局中的七個委員，通由聯邦政府直接委定，就中財政部長與通貨管理局長為當然委員。所以，從形式上看來，聯邦準備局純粹是一個國家機關。但在另一方面，十二個聯邦準備銀行都是半公半私的，它們每個銀行都是由一個包含有九個人員的管理局所管理。這九個人員有六個是由那些加入了聯邦準備組織而成為其會員的諸銀行所派定，其餘三個，則是由聯邦準備局派定。至前六個由諸會員銀行派定的人員之中，有三個是直接代表這些會員銀行，其餘三個則是選充當地區之實業界——包括工業方面與農業方面——的代表。爲要使諸聯邦準備銀行之政策保持聯絡，並使它們與聯邦準備局本身作密切的接觸，其中還設立有一個包含有十二個人員——每個聯邦準備銀行派定一個——的

聯邦參事會 (A Federal Advisory Council) 這個參事會定期與聯邦準備局方面討論。聯邦準備局在本身不是一個銀行，且與公家沒有直接關係，但它擔當有其他國家中央銀行所擔當的某種任務，並且它顯然對通貨規制負有最後的責任。

聯邦準備銀行

從此，我們知道，在英國由英格蘭銀行擔任，在德國由國家銀行擔任，在法國由法蘭西銀行 (The Banque de France) 擔當的那種任務，在美國則配分於聯邦準備局與十二個各別的聯邦準備銀行去擔當了。在理論上，這十二個聯邦準備銀行都是處於同等的地位與同等的重要。但在實際，純粹的金融活動，特別是關於股票市場方面的活動，大規模的集中到紐約了，這種的集中，使紐約聯邦準備銀行，得處有遠較其他聯邦準備銀行為重要的地位，並使它的貼現政策，在美國貨幣的行情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種重要，與英格蘭銀行之銀行率與公開買賣政策，在英國貨幣行情上所發生的決定作用，完全可以等量齊觀。聯邦準備法案通過的一大目的，原在阻止資金在紐約的過度集中，並由是阻止那種時常在美國引起危機與恐慌之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傾向。然而，一

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的事態，却分明顯示了這種目的不會達到在物價暴漲的時候，聯邦準備銀行對於阻止資金的流入紐約，從而阻止紐約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簡直顯得無能爲力了。但是，除此極嚴重的缺陷以外，聯邦準備制度究會給予美國金融機關以遠較過去爲大的安定性，並由是產生了比較有彈性的貨幣與金融政策，及全國金融資源在正常狀況下之更妥當的分配。

我在前面講過，一切國家銀行，都由法律強制加入了聯邦準備組織，而其他金融機關，則一聽其自由。凡屬加入了這種組織的銀行，都沒有它自己的現金準備，它這種準備，係由其存放在聯邦準備銀行中的存款所代替。每個會員銀行，都迫着要在其所屬的聯邦準備銀行中保留一個與其對於貯款者所負總債務保有一定比率的金額。這種比率，因各銀行所在地域的情形不同而互有差異。但無論那個聯邦準備銀行，都不支付其所屬會員銀行存入金額的利息。美國大多數聯邦銀行，所以不肯加入聯邦準備組織，這算是一個主要原因。因爲它們與其把準備金額存入聯邦準備銀行不生利息，却倒不如把這存款保留在某

一會員銀行之中，依賴這存款爲其現金的供給。就因此故，美國早就想把全國最大一部份大大小小的金融機關，都包括在聯邦準備組織中的希望，終於是徒然了。不過，在不久的將來，這些沒有加入組織的邦銀行，也許不免會由法律強迫其加入，而況在當前不況的情形下，那些未加入組織的非會員的小銀行的失敗數，究比會員銀行的失敗數要多許多咧！

貿易匯票的再貼現

聯邦準備銀行對於其諸會員銀行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允許對它們放款，它們諸會員銀行再把這種放款，作爲它們自己放款的基礎。聯邦準備銀行之完成它的此種任務，就因它得代表諸會員銀行對貿易匯票及其他流通手段再貼現。在聯邦準備法案通過時，彷彿再貼現的便利，主要是爲了貿易匯票而安置的；但在實際，那種種便利，簡直在極大限度內應用到了其他種種票據方面。例如，對諸會員銀行之貯款者的期票，甚至對於那些用作股票投機方面的票據——祇要有美國政府的債券爲保證——亦予以再貼現的便利。所以，聯邦準備銀行對其會員銀行墊支的信用，實際祇有五分之一是關於商業匯票再貼現的墊支。

這樣看來，諸會員銀行對於信用的供給，全是依賴聯邦準備銀行。而鈔票的發行，亦逐漸集中到這些聯邦準備銀行手中了。在聯邦準備制度出現以前，美國流通的鉅額鈔票都是由各種國家銀行各別發行的。迨聯邦準備制度出現，這些國家銀行還不會喪失其鈔票發行權，不過，近年總發行額一半以上，都是聯邦準備銀行的鈔票，並且後者在全額中所占的比例，還是要逐漸增加的。聯邦準備銀行發行鈔票，要百分之四十的金準備，其餘百分之六十，則以一種流動的證券保障。因此，我們知道，美國的通貨制度，就與英國通貨制度兩樣，這可從以次兩點看出：第一，她的國庫券，各國家銀行發行的鈔票，與聯邦準備銀行的鈔票，相並的通行；第二，其聯邦準備銀行鈔票的發行，不是依照定額的信用發行制度，而是採行一種比例的金準備制度。像美國這種不同於英國銀行制度的特徵，曾為戰後許多建立新中央銀行機關的國家所採用；它的效果，無疑是在使通貨的發行比較具有彈性。因為，照英國的定額信用發行制度，增加值一鎊的實金，祇能使英格蘭銀行增發一鎊的鈔票，減少值一鎊的實金，也祇會縮減一鎊的鈔票；而在美國的比例金準備制度之下，金的供給變動，皆

能使鈔票發行有更大得多的增加或減少。不過，就美國而論，這種規定並沒有怎樣了不得的重要性，因為美國的黃金是够多的，她所蓄積的鉅額黃金，往往使其金準備水準大大高過其應當保有的最低限度。

因此，美國的十二個聯邦準備銀行，特別是紐約聯邦準備銀行，遂成了全國銀行制度所由轉動的樞紐。而它們這些銀行之間的債務關係，則是由一種集中在華盛頓的金清算基金（gold settlement funds）所結算。所以，這種基金所完成的任務，就恰好相當於英國諸合資銀行在英格蘭銀行中轉移其存款。加之，每個聯邦準備銀行對於其所屬諸會員銀行既行着清算所的職務，同時又為政府的銀行業者。這樣，美國就算是成就了一個完全發展的中央銀行制度，這種制度雖大體是在政府支配之下，但對於其國內極廣大的地域與極繁昌的人口與資源，却依舊能適應其對歐洲一般銀行業務那樣的需要。

聯邦準備制度的運用

直至一九二九年物價暴漲與暴落時為止，美國的新銀行制度還不曾遇着實在嚴重的困難，因為美國的存金是够豐富的，有了這充足的存金，銀行

當局就可自由採行一種信用與通貨的管理制度，而幾乎無須要顧慮到國際的錯雜關係。銀行率在美國金融行情上所發生的作用，那是與其在英國金融行情上所發生的作用不同的；因為，我們講過，匯票經紀人與貼現公司向英格蘭銀行借款，那祇是當作它們在金融緊迫時所採行的最後非常手段，而聯邦準備銀行允許其會員銀行再貼現的便利，那却是它們正常業務的一部分。加之，英國合資銀行從不向英格蘭銀行貸款，且反而要時常維持其在英格蘭銀行的存差額，而美國的再貼現制度，則使聯邦準備銀行不絕要向其所屬會員銀行貸款。由是，美國的銀行率——例如由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決定的再貼現率——對於市場行情所保持的關係，就與英國銀行率兩樣了。並且，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打算對於匯票或其他票據再貼現率的變動，那在紐約金融行情上是有不少影響的，但那決沒有英格蘭銀行率變動在倫敦金融行情上所發生的影響之大。就因此故，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就比之英格蘭銀行還要依賴其公開買賣政策——這就是在市場上買賣證券，以規制信用的供給——了。爲了實施這種信用規制政策，聯邦準備制度中還設有特別的一個公開買賣

委員會 (Open Market Committee) 委員五人，美國東部五個聯邦準備銀行各推定一人。在一九二九年以前，聯邦準備制度對於安定物價與阻止投機運動發展的企圖，主要就是仰賴這種公開買賣政策。但其實這兩種企圖，都證明是大相抵觸的。因為，在生產力由合理化政策增加的場面下，為安定物價而提供的充分信用，總難免要逐漸移向股票市場；況且，美國是有許多擁有鉅額基金的金融機關，與聯邦準備制度，沒有關係的。要說有，那也祇是若即若離的關係；這些金融機關既不受聯邦準備銀行的控制，同時，它們又擁有鉅額的基金，那貨幣自然是容易流注到股票投機方面去的。因此，就在今日，美國的金融機構，還遠不若英國金融機構的調節；並且，美國的聯邦準備局及其相關的銀行所處的地位，還頗不夠指導全銀行界的信用政策。

海外業務的發展

近來美國銀行事業發達的顯明特徵，就是海外業務的發展。這種海外銀行業務，大都是由一些大托辣斯公司以及與聯邦準備系統接近的金融機關所進行。大戰發生以來，美國變成一大債權國了，她這種大債權國的新地位，使她對於國外的

金融情形不能不格外注意。加之，美國海外貸款的增進，一方面使美國銀行迅速增加其海外支店，同時並使國內金融機關加速參與那些集中於海外的銀行的工作。不過，這諸般的發展，頗缺欠平衡，並且美國爲調劑海外貿易，企圖在紐約設立一個對商業匯票行使貼現與認支的有力市場，亦沒有成功。美國銀行業者的主要興趣，仍是繼續傾重國內情形，而美國的銀行政策，大體上依舊是受着純粹國內諸般考慮的支配。一九二九年的股票市場的大崩潰，曾在各方面發生了不少影響，就中主要影響之一，就是使美國銀行業者盡量縮減他們對海外的放款。並且，爲要多多保有流動資金，以應付國內的金融變動事態，許多銀行都不能不迫而收回其海外短期的存款或貸款，於是引起海外資金的大量的回流。此種現象，多半是由於美國銀行在股票市價高漲時，對於當時具有莫大膨脹市價的證券，作過龐大的墊款。迨證券市價崩潰，這些銀行遂在許多方面無從掩蓋其已經墊支出去的貸款。並且，它們自己還是那些價值大跌特殊之證券的保有者。因此，在股票市場崩潰以後的諸年度中，美國金融界乃捲起一大銀行倒閉的波瀾。許多銀行都因不能應付其債務，相率迫而

停閉。就是那些勉強耐得住這次大風波的諸銀行，亦發覺它們的資源大減，它們的一大部分基金，都停滯在那些價值大跌特跌的證券中，它們祇好承認這是一大損失，並也祇好承認這會引起股票市價更形暴落的某種結果。

美國現存的銀行與倒閉的銀行

聯邦準備銀行	現存的銀行 (一九三二年一月)		倒閉的銀行	
	數	存款(單位百萬元)	數	存款(單位百萬元)
聯邦準備銀行	一二	—	—	—
隸屬於聯邦準備系統的國家銀行	六,三六八	二九,四七〇	五七〇	六一二
隸屬於聯邦準備系統的諸銀行	八七四	—	一三四	五〇二
不屬於聯邦準備系統的諸銀行	一二,七二二	一九,六八三	二,九三九	一,四四二
總數	一九,九八〇	四九,一五三	三,六四三	二,五五六

第六節 其他國家的銀行制度

在考察英美兩國金融機關的當中，我們知道了整個銀行制度包括有兩個主要任務：其一是主要關聯於通貨及信用貸款之總額的規制，其他則須涉及有效的財源在諸請求借款者間之實行分配。頭一個任務，根本可以說是中央銀行的任務，而後者則通常是屬於儲蓄銀行的事體——即是說，那在保存大眾的流動資金，並爲他們相互間移轉這些資金。除此兩者外，還有一大些依各種不同方式而進行的任務。例如，對於匯票及其他形式的商業票據，行使認支和貼現的全部業務，不論在什麼國度，都是金融制度中極關重要的活動。至若對於各種企業經營提供長期信用或實在資本，那可以說是從事一般銀行業務機關的正常任務，但也可以說不是它們的正常任務。

今日各進步國家的中央銀行，主要都是在負責規制通貨，並指導一般的信用政策。其實它們所有這類中央銀行機關，不是在不同的方式下仿效英格蘭銀行，就是變相的仿效

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在結構上，它們大抵是像英格蘭銀行。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有採行單一銀行的必要。但在它們這大多數的中央銀行的結構中，却又由模仿美國聯邦準備制度，而把那種制度的許多特徵，特別是比例金準備——它們不願意效英國的定額信用發行的規定——的特徵，移植過來了。

大多數國家之中央銀行，還有一點像聯邦準備銀行，不像英格蘭銀行，就是英格蘭銀行幾乎完全委諸合資銀行或其他金融機關（例如認支貼現公司之類）去擔當的業務，它們這些中央銀行却自行擔當下來了。就法國的法蘭西銀行來說吧，它的活動，不僅祇是規制通貨，且還經由其許許多多的支店，直接對貿易的匯票貼現。貿易匯票在法國所占的地位，與其在英國所占的地位大不相同。法國人結算其國內商業款項，通常不用支票，即不用那種在銀行方面轉賬的簡單方法。他們無論對國內乃至對國外的支付事項，照例都是用貿易匯票。並且，在法國通貨制度下，國內鈔票發行的保障，除金以外，還包括有這些國內貿易支票，而這些貿易支票，就是由法蘭西銀行購買來作為其發行鈔票的準備的。德國的

國家銀行，亦有一個擁有許多支店的機關，它除了曲盡其中央銀行的任務以外，並還從事儲蓄銀行的活動。因此，法國、德國的中央銀行——這是其他大多數國家中央銀行的典型——就要遠較英格蘭銀行接近商業與工業了。中央銀行的這種任務的擴張，自然不免要使它與國內其他銀行直接發生極大的競爭。

大陸方面的銀行業務 在大多數大陸國家，尤其是在美國，這所謂其他銀行，並不完全像英國的合資銀行。就銀行的實務而論，直至近年，英國與其他大多數國家之間，還有一個尖銳的差別。英國合資銀行的銀行業者，原視自己為其顧客之貯款的管理者，且為一個用透支方式，對商工業作短期墊支的主持人。他確也從事某種限度的匯票貼現與認支的業務，而與國內專門作貼現認支活動的金融機關相競爭。並且，自經過英國銀行業務大併合運動以後，它們在這些方面的業作的重要性，還頗有增加。因為，在那次併合運動的過程當中，許多營着各種不同業務的較小金融機關，都併合到它們『五大』合資銀行裏面了。這些較小金融機關的原來業務，却還保存着。於是英國合資銀行就益發要着重貼現認

支一類業作了。不過，這些銀行的銀行業者，仍舊繼續把他自己看爲是那些不顧一切破費，而必須使其隨時可以應用的資金的保存者。在通常的場合，他祇肯作極短期的墊支。在大陸方面的銀行業者不然，他大抵都頗直接的對工業作短期乃至長期的放款。許多大陸銀行，原本就帶有工業的性質，並與特殊工業及大企業公司保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德國的貼現公司（Disconto Gesellschaft）本來就可看爲是重工業銀行；德列得納銀行（The Dresdner Bank）與克虜伯工廠（Krupp）保有極密切的關係；德國銀行（The Deutscher Bank）大體可以說是融通外國貿易的，而丹姆斯特與拉辛納銀行（The Darmstadter und National Bank）則除了與國內工業頗有關係外，還以融通東歐貿易爲其主要業務。法國銀行的情形，也有許多與德國相似，但其主要的若干銀行——其著者如里昂信用銀行（The Crédit Lyonnais）、普通公司（The Société Générale）、工商業信用銀行（The Cré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乃至巴黎國家扣算銀行（The Comptois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却在大多數方面，與英國的五大合資銀行極相

類似。大戰以來，德國的銀行業務，也有一種比較效法英國的顯然趨勢，對於長期貸款，漸形緊縮。但是，德國信用上的極端緊迫情形，以及德國銀行資產因貿易衰落而大部分歸於凝結的事實，使它們覺得，要使其資金像英國銀行資金那樣具有流動性，那是全不可能的。

銀行業務在法國德國，甚至在全歐洲大陸，都遠不及英國銀行業務的集中，大陸銀行的情形，比較與美國銀行的情形相類似。許許多多純粹地方性質的銀行，大體祇從事某種特殊業務，或與某種特殊工業或企業團體保持極密切關係。在實際上，我們與其說許多大陸銀行主要是儲蓄性質的銀行，却毋寧說它們是爲了某種特殊企業團體籌集資金的金融機關。因此，就其活動規模相對說來，它們就需要比較英國合資銀行爲多的資本。它們既與某種特殊企業保有密切關係，則爲滿足這些企業的急需，而爲其通融短期乃至長期的墊款，那就是再自然沒有的事了。況且，此外還有一件使它們不能不從事此類墊款的事實存在，就是在大多數大陸方面的國家中，都沒有存在像英國那樣廣多的投資大眾。英國企業公司一需要由其既得利潤所能蓄積以上的新規資本時，照例是馬上向大眾募集。而對於這募

集新資本的事項，通常是經由一個稱爲發行公司 (Issuing House) 的金融機關進行。它並且照例還要與該公司訂定一種請其擔保發行的條款——這就是說，它對一定額的資本發行，給予若干手續費，而擔保發行者對於取得此手續費的酬報，就是它允許大衆因借款條件關係不肯踴躍應募時，它自己得全部接受下來。這樣，某種企業在其股票未發出去以前，就能够獲得它所需要的資本。而在擔保發行者方面，如其有一部分股票必須它自己承受，它就會把這部分股票保留下來，以等待有了有利的機會，再拋售出去。

這種金融機關的恆久設定，顯然是因爲社會上存在有廣多的投資大衆，經常在等候着對於新發行股票的應募。但在大陸方面的許多國家中，却就不能說有這種對新股票應募的大衆的存在。這原因，不是由於國內顯缺乏資本，因而必須直接間接向國外募得其資本的一大部分，就是由於國內儘管資本充足——例如法國——無奈投資大衆不願意接受普通工業股票，而極期望把他們的資本投用到一本萬利的政府債券方面，在這種情形下，企業公司要想靠大衆籌集其所需的資本，那是不可能了。就因此故，銀行及其他金融機

關，乃不能不購買新股票；對於這些股票，它們或者保留，或者依着一種便當的機會，轉移於它們自己的存款主顧。在實際上，這種制度實行的結果，致一部分對工業的長期貸款，不是由大衆貯蓄所積得的資本，而由是銀行方面常常向海外融通的短期銀行信用，這種短期銀行信用，轉移作長期的工業貸款，那是危險不過的。所以，大陸方面的這類銀行業務，與英國合資銀行所進行的業務比較起來，顯然是要危險多了。但無奈它們迥不同的業務，主要是由於實際需要不同，機會不同，投資大衆的態度不同咧！

第七節 信用的統制

金融在它本身並不生產什麼，而且貨幣祇是對於物件的購買才發生價值。所以，爲遷就貨幣狀況而統制工業，或者使生產成爲金融的奴隸，那顯然都是錯誤的。貨幣的目的，原在便利物品與勤務的生產和消費，從而，所有的金融機關，就應當求其適於謀生產與消費的利益。在本章以前諸節中，我們已經考察過若干主要國家之金融機關的業作，並對將來

世界貨幣的規制，作過諸般嘗試性質的提示，但現在所待考察的，就是要看這類金融機關在其他方面，即在其對信用供給的方面，怎樣才能使其適於供應生產的需要。

在現代世界中，信用根本要比貨幣爲重要。無論在現代那個社會，都不能不有充分的貨幣，以供應較小的日常交易事項的需要，那是無疑的。但是，爲供這類用途所需的通貨數量，終歸是取決於商業活動的數量，從而，主要不外是由信用之充盈或稀少所決定。通貨發行的規制，那誠然是一件重要事體，但與信用之數量與分配的規制較量起來，那却應當屈居次等的重要地位了。在今日的世界，我們却大都是用通貨來支配信用，這是大錯特錯的。

現在許多金融改革論者之所以鑄成大錯，要不外由於此種原因。這些改革論者對於金融界之狀況的改正，不自謀信用制度與工業需要調和入手，却自改革通貨入手。通貨發行數量，應當與信用發行數量保持相當比例，那誠然是非常重要，但通貨發行究應取怎樣的形式，那却是比較無關輕重的事體，因此，我們對於以次『通貨幻想家』(currency cranks)的駁斥，也許不用多所辭費了；那些『通貨幻想家』都希望世界的困厄

可由通貨的改革而中止，至通貨的改革方法，就是採行一種價值會自動貶落——如其不使用的話——的新通貨，或者發行兩種通貨，一種供日常小買賣之用，一種供商業大規模交易事項之用。各種通貨改革者都是在這些論旨上翻弄出極其不同的計劃，但沒有一種計劃實在觸到了事物的本體。

至若那些對準現代信用制度而下攻擊的金融改革論者的意見，那是要比較實在多了，他們企圖依某種方法，以確保社會信用之比較充裕的分配，他們以為與其以銀行保有的存金或其他流動的資產為準，就毋寧以工業上的需要為準。他們知道，貨幣應當是工業的奴隸，生產力決不應因必需信用通融的見拒而受到妨止。因此，他們曾企圖依可供使用的生產力的限量而發行信用，並且這種信用的供給，要足夠使社會所保有的的一切生產資源，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信用改革者的錯誤在那裏 我們承認上面這種主張是妥當的。但在這些信用改革者當中，有的人是過於為熱情所驅策了，他們竟作這樣的提示，以為信用如適當充裕的

發行，那就不僅能按比例於可供利用的生產力的限量，而增加商品的供給，且能把物品與勤務的價格，縮減到當前價格一小部分的限度。自然哪，可用生產資源如都能使其充分利用，生產額數必定增大，而由一定額數費用攤分在更大產額上所獲得的利益，當然會使生產費相當節省下來。在某種限度，這利益也許會為生產資源與人類勞動平均較現在略少效率的使用，而予以抵銷。但我們却不妨說，如其平衡起來，可用生產資源的充分使用，究會引起生產費用的大大縮減。不過，我們即此就提示物價能由金融機關的倍增而半減或減到當前物價一小部分的限度，那就顯然是一種幻想。至若有些信用改革者居然提示新貨幣儘管不絕大量的投入流通界，物價終不致因此抬高，那亦是不攻自破的謬說了。因為，我們知道，貨幣數量理論是一種大致不差的學說，貨幣（信用包括在內）的供給增加，如能與物品與勤務的供給增加成比例，那也許不致增高物品的價格，但困難之點，就在不能正確的予以規制，即不能由貨幣數量理論得到多少實際的幫助。

因此，銀行制度的目的，固應當在能够確保一切可用生產資源之可能利用，而同時又

能限制人爲的抬高物價的限內，供給適當數量的信用，但這如何能够做到呢？現在的銀行業者，祇要他們覺得放款有利可圖，他們就要依着一種強烈的利慾要求，而不顧一切來放款。他們所怕的是借款者無力償還，借款者償還能力如不成問題，放款愈多，所獲總利息額愈大。在此種情形下，他們定然不願意勉強緊縮其貸款總額，因爲把錢死藏在自己手中，那是毫無有利得可言的。

信用爲什麼受到限制呢？然則銀行業者不更加自由的放款，那是受到了什麼阻礙呢？就其要者而言，可以說是由於兩種顧慮。第一，他之所以不能從心所欲的放款，蓋因有所限制，他要放款，必需在他未償的貯金額數與其手頭所能用以周轉的『現金』(cash)供給之間，保持一種比例。這所謂『現金』(照我在本章前一部分講過的)，並不僅包含着實在通貨，且還包含着銀行業者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或者其他能夠馬上變換爲通貨的資產。因爲像後面這種能夠隨意變換爲通貨的資產，在銀行業者看來，那是與『現金』相等的。以上是信用受到限制的第一個顧慮。第二個顧慮就是，銀行業者放款，祇能貸與那些

有能力償還的借款者。當貸出一宗款項時，他總得合理的斷定，這所貸出的款項以及由此所生的息金，都能按期的收回。大約在商業興旺的當中，他貸款所受的限制，多半是第一個顧慮；但在不況的時候，這第二個顧慮就頗有力量。因為銀行業者在這時候要找到他認為能够按期償還其貸款的借戶，那是不見得容易的。

普通銀行在興旺期內發行信用的限制，主要是由於中央銀行。因為我們知道，中央銀行是能由其公開買賣政策的活動，而增加或減少普通銀行手頭所能處分的現金數的。但一到不況的時候，中央銀行雖然還能繼續在市場充積新的金融資源，使手頭擁有更多『現金』的普通銀行業者，感到有錢無用處的苦惱，但它這時對於信用額數控制的權力，却是比較要減少許多了。誠然，普通銀行業者手頭存款過多，且不能由這些存款得到絲毫利得，他們要貸款的要求，是一定強烈的。但他們與其把款子貸與那些無力償還的借款者，倒毋寧照樣保留下來，因為求利雖不得，究還有本在咧。

著者撰著此書，正當着一般銀行業者極不放心貸款的時候。美國聯邦準備銀行藉着

公開買賣政策的活動，努力增加流通貨幣額，以冀促使美國普通銀行多作信用放款；但那些銀行終於不肯踴躍嘗試，甚且利用其手頭的新貨幣，去償還它們對於聯邦準備銀行所欠的債款。我們在這裏應注意一點，就是英國合資銀行常保存有鉅額存款在英格蘭銀行，並且它們不向英格蘭銀行借款，而在美國屬於聯邦準備系統的會員銀行，却定規要用貿易匯票乃至其他合格的票據，向聯邦準備銀行再貼現。因此，英國合資銀行對英格蘭銀行儘管無債可償，美國的這諸會員銀行，却就能够利用聯邦準備銀行所發行的新幣而抵償其對聯邦準備銀行的債務。根據此種理由，英國要藉公開買賣政策活動以增加貨幣的供給，那是要比美國容易多了。但是，就說在英國吧，如其合資銀行對借款者的還債能力過於不肯信任，英格蘭銀行就是一味用此手段，膨大它們的存款，那也不一定會誘使它們作較多的信用貸款。它們在此種情形下，勢必致購買更多有利可圖的證券，因而造成一種公債市場上的價格暴漲情形。自然，這種情形，在增大其存款與使金融較為寬鬆的作用上，確有中央銀行用公開買賣政策活動所成就的同一效果。但可供利用的資金儘管再多，那終不

會用之於生產事業，而會死藏於銀行方面。因此，就增加信用供給的效能說來，公開買賣政策是碰着了嚴重的障礙。不錯，就在美國，普通銀行能够不受中央銀行公開買賣政策活動的影響，都有一個限度，但在未超越此種限度以前，聯邦準備銀行的公開買賣活動，究不能對增加信用有多大的效果。如其聯邦準備銀行堅持其現行政策，到末了，我想也能強制增加其墊支，但普通銀行是極度不相信其借款者的償還能力的，非經強制，它們決不欲作此墊支的嘗試。

在倫敦的情形，與這有多少不同；我們講過，那裏的合資銀行並不向英格蘭銀行借款。但倫敦銀行業者對於借款者的償還能力不信任，亦能在貿易與工業上發生有力的挫折的影響。例如，它們一對貸款者不信任，勢將縮減國際貿易一向賴以融通的認支信用，並會使一部分銀行不肯對新工業經營行使墊支。不過，倫敦英格蘭銀行要對普通銀行施以何項壓力，那是比之紐約聯合準備銀行要較為容易，較為有效了。英格蘭銀行如其逐漸推行其公開買賣政策，勢將迅速招致信用貸款額數之實行擴張。

然則英格蘭銀行爲什麼不厲行這種政策，或在更大限度內厲行這種政策呢？從大體上說來，那是它恐怕在當前情勢下，在流通界投下更多的貨幣，其結果將使英國的物價，抬高到其他國家抬高物價的限度以上。我們也許不妨作這種提示吧，假若美國肯繼續厲行一種擴大其金融界之信用的政策，英國定然會十分願意追隨美國之後，而着手實行一種相當擴張其信用的政策。因爲美國有此趨勢，英國就不復再顧慮到倫敦紐約間之金融運動的缺欠調和，以致擾亂倫敦金融市場之平衡了。事實上，一國信用政策是否容易而確然有效的推行，幾乎完全要看其他處於競爭地位的金融中心之實際情勢的推移。

然而，中央銀行對於貨幣資源供給的增加，即令沒有任何阻礙，而在當前情形下的信用擴張政策，也許不免要遇到普通銀行的極力反對。當前一般銀行業者心理，是異常膽怯的。在最近數年中，它們對國內生產與海外貿易所通融的短期信用，有頗大一部分已經『凝結』。英國有六千萬鎊的短期墊支，都在『停付』協定（The Standstill Agreement）之下，被凝結在德國了，此外還在世界每個不況的國家，同樣『凝結』下去了鉅大的金額。

至若國際貿易貸款以外的普通工業透支，亦有極龐大的額數不能收回，因為它們一向企業公司索欠，企業公司就祇有塌台了。因此，銀行業者對於信用貸款活動，就祇圖縮手，而不欲擴張，並且爲圖抵補其過去『凝結』了的透支計，大家都極力把他們的財源，變換爲極其流動的部分。在他們當前的心目中，損失的恐懼，要比利得的希望有力多了。他們寧願對其一大部分的資源毫無利得，而不欲冒更大的損失，不欲因當心債務者的償還能力，使自己陷於終夜不能成寐的苦境。

在這諸般情形之下，銀行貸款擴張的阻礙，與其說是存於銀行制度之規制或定則，倒毋寧說是存於那種支配金融責任者的惶恐心理。中央銀行要用高壓手段促使普通銀行擴張信用貸款，那也許不難做到，但在這種活動當中，中央銀行本身要能避免感染恐慌，且應採行一種鼓勵的，甚且（照正統派的概念說來）是急進的冒險的政策，因爲在實際上，銀行業者的恐懼，大體都是應當的。在貿易深刻不況的今日，要找到有償還能力的借款者固困難，要相信當前看似有能力還債的借款者，到了還債的時候還具有那種能力，那也困

難。此種情形，在對於海外貸款的場合，就比在對於英國國內普通工業墊支的場合，還要使他們不能放心。因為對於海外貿易通融墊款，其困難更大。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實行匯兌限制，英國銀行業者要收回其貸出海外的英國貨幣，往往全不可能。外國私人債務者，也許他們很够用盆戈（pengos），或馬克，或值羅（zlotys）償還其借款，但他們的政府，却會不允許他們把外國通貨掉換為英國貨幣或美國貨幣。就因此故，無怪銀行業者不肯貸款，無怪他們寧願不圖利息，而使其資金保存不用。

怎樣能使信用擴張呢

然則要擴張信用，該怎麼進行呢？信用不擴張，就令其他方

面的情形都告恢復，工業是無法恢復的。在許多國家中，政府對於銀行業者非取得政府保障不肯貸款的用途，主要如輸出業的用途，會經努力出面保證或擔保。英國有她的輸出信用組織（Export Credit Scheme）。德國的輸出貿易，大體是靠着那種信用的資助——那即是政府爲了資力薄弱的製造業者與貿易商人所設定的。各國政府通常都企圖在自行供給的基礎上，進行這種組織；至若自行供給的辦法，就是對它們這種擔保，抽取一項附

加費(Premium)，這附加費要恰够抵償它們由擔保會蒙到損失(即因倒債牽累的损失)的推定額數，不過，在若干場合，輸出信用貸款會包含有一個實在津貼的成分，對於這津貼的成分，所課附加費往往是不够彌縫的。其實，政府在企圖推行這種自行供給計劃的限內，想單靠許與輸出信用，而大大增加信用貸款的總額，它那權力就極其有限了。因為，使普通銀行業者避忌貸款的危險，那才是真正的危險。政府爲彌縫損失而抽取的附加費，那往往會高到妨礙有力借款者的程度。假若不避損失，對於有危險性的企業給以信用，那無疑是能夠增加信用總額的。但在今日這種不況局面下的政府，大多數都比較傾向於縮減支出，而不欲加增新的支出。並且，政府如其以包含有津貼的條件許與信用貸款，那又不免會由普通銀行釀成一種不公平競爭的困難，以致使那些無償債能力的借款，對於比較有償債能力的借款者，反處於一種特惠的地位。

因此，扶助輸出貿易的政府信用制度，從某方面說，雖然有重要的用處，但那種用處究是有限的。就以往的情形看來，那應當更進一步的推行。可是無論推行到何種限度，依舊不

能希望貿易會由此實行恢復。加之，這類的組織，通常祇適用到輸出企業方面，而於國內市場的生產事業無所助益。況在各國爲求改善其貿易差額而極力縮減輸入的當前場面下，那能有藉此種手段刺激輸出的餘地呢！

美國政府幫助企業的方法，略有不同；它於一九三一年年終，設立有一個復興與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這個公司的企圖，主要是給予那些資金『凝結』了的銀行與同類團體以幫助，使它們能夠再作新的放款。不過，在這公司本身，原來並不打算從事新的企業，或直接促進新的企業。但它既使那些資金『凝結』了的銀行得到解放，遂間接有了促進新的貸款的效果。可是，它這間接實行擴張信用的效用，也不免要受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那種顧慮的限制；因爲銀行手頭有了流動資金，並不一定用以從事新的貸款，在它們沒有感到借款者的償還能力更可信賴以前，它們是不會打算再作新的信用貸款的。

依據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凡屬企圖由增加流動資金，以增加對工業的信用放款的

方案，其效果在最後都是受決定於有效的借款者，這種借款者，一方面要自己折算利用資金，同時且要被銀行方面看為是好的主顧——換言之，就是要他具有充分的償還債務的能力。可是，借款者的償債能力，與其說是繫於借款公司本身的經營效率如何的問題，却倒不如說是繫於一般企業活動的狀況。因為，公司是否能夠還債，就要看它是否能出賣產品，是否能由出賣產品獲得利益。而這種產品銷售情形，又繫於購買者的支債能力和各國政府允許對國外償付的準備。有許多借款者的償債能力，如其在一般企業活動向上的情形下，是絕無問題的，但銀行方面對於他們的放款，仍不免躊躇，這原因，就是它們認定某一個公司的償債能力，會產生其他公司的償債能力，同時也是依存於其他公司的償債能力。因此故，對企業界增加信用供給的方案，是否能夠成功，就看為刺激那些由借款諸企業所生產的物品的需要，是否採行協作的方案。

發展經濟的政策

由是，我們知道，在信用擴張政策的本身，於企業恢復上，祇有非常有限的效果。因為，銀行如其不論有無政府的援助，由降低借款的條件，和採行比較不顧

危險的見地，而允許增加信用放款，那新借出的這種金額，也許容易因借款者到期的無力償付，而『凝結』下去。這一來，新增的信用，就不會對工業恢復有何實在的刺激。那在結局上，不過是使銀行方面因新貸款的『凝結』，而作進一步縮減墊支的努力罷了。充分的信用供給，於企業的繁榮誠然是絕對必要，但要單靠增加信用，使繁榮由不況回復過來，那就非同時對於那些利用此信用所生產的物品，能保證其充分的銷路不行。因此，假若政府真要爲了刺激企業的恢復，而使用自己的財源，那就不僅要保障銀行信用貸款的增加供給，且還要採行一種力圖經濟發展的積極政策，對那些擴增的貨物安排銷路。而且，要使擴張信用收到實效，政府還得爲了刺激新資本的需要，而大興公家的建設工程，如建築房屋，修築道路，浚修貧民陋巷，以及在國家統制下改造工業等等。

所以，信用政策，不是企業復興的主動力，那不過是一種增加物品與勤務之實際政策的必需助手而已。信用的擴張，要與政府刺激需要的種種方策相輔而行；銀行界的新財源的用途，必須予以嚴密注意；否則這新財源的大部分，也許不會用作新生產努力的刺激。

而用以購買那些有固定利息的高價證券。真的，像這種證券的購買，如極其風行，那勢必在利率上發生反動，因而使普通工業借款者得到低利的資金。但這種結果的產生（尤其是在美國），也許需要一個相當的時期，同時信用擴張在工業活動的刺激上，就幾乎沒有效果。

因此，政府如必欲保證信用貸款之增加供給，它就似乎應當直接參與新財源的用途，它有兩個可以實行的方法：第一是由一個謀經濟大發展的計劃組織，直接對信用創造需要；第二是由國家統制金融制度。

銀行事業的社會化

如我們在前面講過的，現在大多數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形式上都是私有的機關，不過它們多少都要受政府的統制。至若普通銀行，則是純粹私人團體，它們除了貸款總額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受着中央銀行的統制外，政府是無權對它們行使干涉的。許多金融改革者曾力言一切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應當像美國聯邦準備銀行那樣，變為確定的國家統制之下的公共機關。不過，對於普通銀行是否也應同樣社會化的問題，

那却參雜有極其不同的意見。中央銀行的社會化，就是讓政府直接統制通貨的發行，直接統制其對普通銀行融通信用的總額。因為，我們講過，中央銀行藉着銀行率與公開買賣政策，是可以限制普通銀行所能創造的信用總額的。但是像這樣的社會化，政府對於新增貨幣是否實行使用，既無把握，對於普通銀行所能創造的信用的用途，亦無從統制；因為普通銀行既不在國家監督之下，它們對於這信用在各種借款者間的分配，就得自行處理了。但是，如其一個社會要澈底施行一種謀經濟改造與發展的確定計劃，那它須得密切參與的，就顯然不僅是要保證這計劃所需的充分信用額數，且要保證這可供利用的信用之實行使用，和其在各種工業與各公司之間的適當分配。不過，要做到這點，勢非把普通銀行與中央銀行同樣置諸有效的國家統制之下不可。

一個社會，如其繼續靠競爭的私人企業來提供貨物與勤務之適當產額，那對於這種生產制度之邏輯上的補充，就是普通銀行的私有。但當某種社會一由無統制的私人企業領域過渡到了協作的計劃經濟領域，那就無論是信用的分配，抑是信用的供給，都不免要

受到統制。所以，凡屬經過組織的計劃經濟制度，彷彿都含有中央銀行與普通銀行之連同統制的意味。英國英格蘭銀行與合資銀行應當由國家統制的這種觀念，已經在與國家經濟計劃的觀念相並的發展，這是頗有意義的。在實際上，這兩件事顯然非一致的行動不可。一種國家經濟計劃，如其不伴隨着可資利用的信用之分配的統制，那負此計劃責任者與合資銀行之間的見解和政策的分歧，就容易使這種計劃完全破壞。

由是，把信用的分配和通貨的規制，同樣置於國家直接統制之下，就似乎是一種強有力的要求了。不過，為供給信用設定某種自動的定則，那並不比對於規制通貨設定某種自動的定則容易，無論就這兩者的那一方面而論，其所需要的，都不是應用概算法則的自動體制，而是一種審慎周詳的管理。這種管理要能在最大可能範圍內，盡量利用可資利用的生產資源，同時並不致引起價格上之人為的膨脹。這就是說，由銀行創造的信用額數，應當保證這種生產資源的充分使用。並且信用的供給，應使其在分配上適於供應國家生產計劃的需要。而通貨的數量，則又當使其與這兩件事體相適應；因為社會要求充分的通貨，

乃是爲供給那種需要，那就是由創造的信用額，及由信用在各種用途上之分配所導來的需要。一種國家的銀行制度，與其說是必須要建立在管理的通貨政策上，倒還不如說是必須要建立在管理的信用政策上。但是各別的銀行，如其沒有在統一的統制之下保持密切的協作關係，這種管理的信用政策，亦是不能有何等成就的。而且，這些銀行在統一的統制之下的協作，顯然會造出一種非私人所能控制的極強而有力的獨占局面。

第七章 失業與產業變動

第一節 失業的性質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世界有記錄可資參考的諸國之失業人口總數，就國際聯合會所刊佈的計已達一千三百萬以上。在這個數字當中，單是德國，就占有六百餘萬。英國差不多有三百萬，意大利一百餘萬，捷克斯洛伐克五十萬。其實，國際聯合會所發表的這個數字，對於世界失業者的真正數字，還相差得遠。因為第一，美國的失業人數，全未列入；第二，已經列入的，大多數國家的記錄，又極不完全。單就美國說吧，美國失業工人的數字，曾有極其不同的估計，有的說是八百萬，有的說是一千二百萬；而據官方的報告，則製造業上的就業人數，還不及一九二六年之三分之一，並且總工資額僅及一九二六年之半。法國官方報告的失業人數，雖僅只二十五萬，但其實數至少有四五倍之多。至其他許多國家的失業登記數

字大抵都不完，全在一九三二年之初，我們至少可以估計歐洲美洲的失業者，已經達到了二千五百萬，而且這個總數，至少有三年前失業者總數的四倍。

世界失業者人數的增加（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

國別	報告來源	一九二九年第一季之失業者人數(單位千)	一九三二年第一季之失業者人數(單位千)	一九三二年失業者與一九二九年之比較
德國	E. E.	二,四八四	六,一二八	二倍半
英國	E. E.	一,一〇四	二,八〇九	二倍又三分之一
法國	E. E.	八·六	三三七	近四十倍
意大利	Estad.	三〇九	一,一七四	近三倍
比利時	V. I.	二七	三三三	十二倍
荷蘭	V. I.	五二	一九一	三倍半
丹麥	T. U.	六〇	一〇六	增三分之二
瑞典	T. U.	四四	·九三	一倍
挪威	E. E.	二四	三八	半倍
芬蘭	E. E.	三	二一	七倍

波蘭	E. E.	一七〇	三四四	一倍
匈牙利	T. D.	一七	三四	一倍
奧大利	E. E.	二二五	三六二	將近增三分之二
愛爾蘭	E. E.	一九	三一	同上
羅馬尼亞	E. E.	五八	五八	無變動
瑞士	V. I.	三·三%	二五%	七倍以上
捷克	E. E.	五〇	六二六	十二倍以上
南斯拉夫	E. E.	一二	二一	增四分之一三
澳洲	T. D.	三九	一一九	三倍
加拿大	T. D.	一一	四一	三倍半
日本	Estd.	二六九	四七一	增四分之一三
*美國				

E. E. = 職業介紹統計 (Employment Exchange Statistics) 包含強制保險組織 (Compulsory Insurance Schemes)

V. I. ■ 志願保險組織 (Voluntary Insurance Schemes) 不完全

T. U. ■ 職工組合統計 (Trade Union Statistics) 不完全

Est. ■ 不十分確定的估計數字

* 就業指數以一九二六年爲一百，一九二九年三月爲百分之九九，一九三二年二月爲百分之六六。

戰後世界各國的失業狀況，那已經是產業衰退的一種最顯明最透露的徵候。不過，對於這種徵候，我們須得認爲那祇是發生於經濟組織上之失却和諧與不善整理。因爲，如每個醫生所知道的，由疾病所引起的痛苦，雖可以設法使其減輕甚或除去，但對於疾病未加診斷，病象是無法治愈的。要救濟失業，不能單從失業上着想，而必須在經濟制度本身上去發現造成失業的缺陷，而設法予以救治。因此，透過戰後世界失業的程度與久暫的單純表面事象，而從裏面注意僱傭賴以維繫之經濟關係的錯誤，那是救濟失業必需着手的工作。但是，在從事此種工作以前，我們頂好打量一下，看我們究能在某種限度理解並估計這使戰後一切產業國家都感到幾分嚴重的失業事態之真正性質。任何特定時期之失業

人數的粗疏記錄，在不曾經過進一步的分析以前，那是不能告知我們一些什麼的。我們必須知道失業人口總數是怎樣分配於各種產業和職業上；就中，男子占多少，女子占多少；成年人占多少，未成年人占多少；各種年齡與各種不同技術的勞動者之間，失業者究占怎樣的比列；在列入報告的國度中，其失業者之地域的分佈情形如何；經常失業者或偶爾因懶惰歇業的短工，看失業者總人數中，占有如何的成數。此外，在一般的與特殊的職業上，季節究於失業有多大影響；若干產業大規模使用時作時輟的間歇勞動，究在某種限度增大失業數字；最後，失業者究有多少能够說是產生於一般產業活動之『循環』變動；凡此種種，都是我們所要知道的。

這裏有一件彰明較著的事實，就是在戰後受到失業問題嚴重打擊的一切國家中，其勞動過剩現象，已在某些工業部門顯出了不相稱的程度。在造船業，在鋼鐵業，在機械工業，乃至在煤礦業上，勞動是顯得異常過剩的；假如我們把定規的僱傭不足和短期失業與完全失業，通盤加以較量，就在紡織業上，亦同樣發生勞動過剩現象。特在這種種業務中，其失

業之趨向，一國與其他國家，一時期與其他時期，雖可大不相同，但它們隨時隨地總括起來，都可說明總失業人數中之不相均衡的部分。

這原因是不難知道的。讓我們先就造船業來說吧。對於船舶的需要，顯然因待航運的貨物數量與搭客人數而不同，因在航運中之船舶的積載量而不同。並且，航行速率與船舶是否按照總噸數載重，又足以支配需要的大小。以現代船舶而論，如其當前的船舶能充分運用，那較之二十年前的船舶，確能成就更多的工作。它的航行速率較快；它能較迅速的輪航到特定口岸；並且，在噸位的關係上，它還有較大的載重能力。這諸般事實，都會減少待運貨物量對於船舶的需要，但却不是引起船業上之異常嚴重失業狀態的主要原因。假定某種業務繁昌起來，海運的貨物數量將突然增加，如其這與旺景象有延續的希望，立即就會對於船舶發生強烈的需要。但是，現在如假定貿易總額因某種原因而減落，則已經加入航運的船舶，就足夠應付一切待運的貨物而有餘，而完全沒有新船舶的需要。所以在貿易繁榮的時候，新船舶的需要異常之大，在貿易衰落的時候，則無此需要；不過像油槽船一類特

種船的需要，却又當別論了。船舶需要既隨貿易之興衰為轉移，故一般貿易活動額一發生增減的動搖傾向，對於船舶的需要，乃引起比較不尋常的動搖。由是，我們在興旺時就發現船業工人的不足，在不興旺時就發現船業工人的過剩。

英國若干主要工業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之失業率百分數

- 超過百分之五〇者 造船業，海上建造業。
- 超過百分之四〇者 鋼鐵業，麻織業。
- 超過百分之三〇者 鐵礦，建造工程，鐵器業，公共工程，船業，修船業。
- 超過百分之二五者 煤礦，陶業，洋鐵業，機械業，製鐵業，房屋建築業。
- 超過百分之二〇者 漁業，磚業，玻璃，銅業，車業，棉織業，染業，鞋業，木器業，橡皮業，道路運輸業。
- 超過百分之一五者 化學工業，電器工程，羊毛業，絲業，麻業，皮業，藥材業，飲食業，鐵道，地方政府，旅館。
- 超過百分之一〇者 襪業，花邊業，綫業，梳餅業，麵粉業，紙業，印刷業，公共事業，政府。

不及百分之一〇者 地毯業，成衣業，電車與馬車業，商業，與金融業，自由職業，洗衣業。

注意：在兩百六十萬失業工人當中，礦業上就占有三二、〇〇〇人，金屬業、機械業、造船業上占有五八二、〇〇〇人，建築業上占有三五〇、〇〇〇人，紡織業上占有二六〇、〇〇〇人。僅就這幾項工業而論，其失業人數，已超過一百五十萬以上。右表在一方面極顯然的表示了基本工業與紡織業上之失業的不同趨向，同時也極顯易的表示了生產與分配消費者貨財之諸般業務上之失業不同趨向。

資本設備的需要 這諸般情形，實在不僅造船業爲然，所有一切從事工業上之諸般設備的業務，殆莫不在比較緩和的程度上，表現同一現象。當工業繁昌時，工業設備的定購者，自然極其踴躍。一旦工業衰落，則既有的設備就足夠應付當前需求而有餘。不過，這類工業就在一般工業不況時，亦不致完全沒有顧客過問，因爲在一般工業不況的時候，工廠中陳舊損壞的機具，仍不能不在某種限度內設法更新，而有力運用新資本的企業者，更欲趁此時期購買極低廉的新的機具。特此等設備一般工業的工業生產品，在一般工業不況時，雖不致如新船舶一樣的毫無用處，但其需要總額，却究不能不大減特減了。近年鋼鐵工

業機械工業上之失業情形格外嚴重，其原因當可由此得到一部分的說明。然此等工業因大戰時期之軍需工業需要強烈，致促成其過度擴張，大戰以後，它們遂處在一種比較尖銳的困難地位，而不能不大大縮減人事，縮減生產力，以期與平時的需要相適應了。

對於煤的需要的大小，主要是依存於三件事體：這三件事體之一，是一般工業活動情形，因為一般工業活動，會引起鐵道、輪船、乃至大量使用煤之重工業對於煤的需要；其次是煤與其他作為動力來源之燃料間的競爭；還有一項則是對於煤之消費的節約。這三件事體在近年縮減煤礦工業之產額的情形，我們是容易知道的。汽鍋設備的改進，代替汽力之電力的比較大規模的使用，無疑會大大節省燃料的消費。燃料油與煤的競爭，是日甚一日的，在船舶方面，固然特別顯得這種競爭的激烈，但生產工業上之油引擎的使用，道路運輸的發展，電力發動上之油（或水）力的應用，在在皆足以促成油對於煤的競爭。最後，自世界貿易衰落景象發生以來，大量用煤之重工業，固已逐漸減少煤的需要，同時由海陸輪船鐵道運輸的商品數量，亦在不斷縮減哩。

因此，在戰後許多年間，世界煤工業儘管增大了生產力，但其產額需要，却頗沒有彈性。加之，那些自己擁有煤礦的國家，差不多都爲了維持其貿易平衡，而竭力在可能範圍內阻止煤的輸入。由凡爾賽和約割裂去了一大部分煤礦的德國，乃在其縮小的國境內，尋覓新的供給來源，且不絕增加木炭與瀝青炭（bituminous coal）的使用。至波蘭一類國家，則努力擴大其煤的輸出。美國舊來的煤供給區域，已經不少，而與此等舊供給區競爭的新煤礦的開採，致其國內煤工業之生產力，引起了可驚的過分的發展。因此，世界儘管不況，其超過需要以上之煤的生產力，則日有增加。然而，煤礦工是最不容易改就他業的。隨着煤之市場的縮小，這種工業遂積極趨於機械化；特別是在德國，那裏差不多有一大部分勞動，都爲機械代替了。煤礦工大抵是住在無法覓得代替工作的窮鄉僻壤，他們一旦沒有需要，就要變爲無所用之的廢物。所以在所有歐美的煤礦區中，煤的問題，不但是一大嚴重的經濟問題，且爲一大嚴重的政治問題。

紡織業 若紡織業上的情形，則略有不同。紡織業方面的失業與僱傭不足，不是由

於總消費的衰減，不是由於未按照世界購買增加的程度而擴張，而寧可說是由於遠東方面之競爭的抬頭，由於美國及歐洲許多國家之供給其較大部分國內市場之紡織業的發展，此外，且由於那種與既成紡織業相競爭的人造絲業的勃興。特別是在歐洲諸國中，羊毛工業已經在不絕受着關稅保護。這與遠東方面逐漸工業化的事實聯繫起來，那在英國高度化的紡織業上所加的打擊，是再嚴重不過的。英國歷來的毛織品產額，有二分之一以上輸出外國，其棉織品則有五分之四以上輸出外國；近年其他國家在這兩種工業方面的競爭活動，遂致英國成爲主要的犧牲者。

建築業

世界恐慌發生後，一切工業上的失業人數，幾乎皆大有增加，但在此以前，大多數國家除了重工業及紡織業外，其餘工業領域內的失業情形，都算是比較輕微的。不過，我們在此還須提到一種工業，那就是建築業。建築業之出品的需要，一部分包括着對於工業建築、店鋪、事務室以及學校一類公共機關的需求，一部分則包括着對於房屋裝置設備的需求。工廠建築的工業上的需要，自然頗容易隨機械與其他工業設備之需要而發生。

變動，而店鋪與事務室的需要，則視一般貿易活動水準為轉移。至於在公共機關建造的場合，其需要每隨各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常年預算情形而伸縮。如其它們認為經費充裕，一大些新學校、市廳以及其他公共建築，將相繼興工；反之，則必力求撙節，力求縮減公共支出。結局，在這方面的需要上，必然會引起一極可怕的反動。近代社會之房屋設備，一部分成於私人，一部分乃成於公共機關。某一地方的房屋，如其是由國家由市府興建，或者是由公共基金之補助而興建，則所興建的房屋，勢必要如學校及其他公共機關一樣，其棟數的多寡，一決於常年預算的狀況。

至私人的房屋建築，主要雖是取決於有關大眾購買力之建築工業上的費用水準，但已有房屋所課的租金水準，亦與有影響。在大戰當時，歐洲各國的房屋建築，幾乎概行停止。由是，在大多數國家中，遂為阻止房屋所有者苛取獨占租金，而相率制定了限制租金的特別方策。在房屋感到缺乏的限內，這種限制是非繼續不可的；此外，她們並還設定一種與新建住宅費用不成比例的租金水準——特別是對於較小的住宅——以阻害私人建築物。

的更新。這一來，國家與市府就必得直接或通過建築房屋協作組合，而對建築房屋作規模的津貼。而全般建築業活動，乃比較戰前受有國家或市府常年預算狀況更大的拘束。因此，房屋設備儘管缺乏，各國自一九二九年恐慌發生以來的建築房屋活動，却大形減落；因為工業商業與公共機關之建築物需要的減退，已與公家建築房屋支出的縮減相一致。

在少年與老年人之間的失業情形 失業在各種工業之間的情形不同，在各種各式與各種年齡之勞動者間的分配，亦極不均衡。男子與婦女各別所受到的失業影響，大抵是看失業主要會影響到的諸般工業如何。建築業上僱有極大多數的男人，所以，從全般看來，在產業極度不況的時候，其對在業男子所引起的惡劣影響，就比其對於在業女子要嚴重多了。但是，紡織業上僱有極大多數的婦女；比如在蘭開夏 (Lancashire) 約克夏 (Yorkshire) 一類紡織業區域，婦女的失業，已經成為當前產業衰落的一個極顯著特徵。然而各種工人之間的失業趨向，就年齡上考察，那比就性別上考察要更有意義。在普通場合，少年人之間，不大有失業現象，因為他們的工資比較低廉，從而在不況的時候，甚且會略略增

加其用途，但他們的工資如其接近成人工資的水準，僱主一臨到不況時，顯然就會革退他們。在實際，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體，青年人在此種情況下，不啻是正當着他們一生萬分緊要的關頭，而剝奪其學習一門行業與獲得規律的工業習慣的機會。不但此也，失業對於青年勞動者有異常的損害；如其不採行適當方策，藉訓練與教育以糾正其不檢行爲，那說不定還會斷送其終身的生產能力。

然而在較年老勞動者間所表現的失業情況，却顯得更其嚴酷！根據各國編纂的失業統計，其中年越四十以上者所占失業百分數，一般都遠較年輕者所占失業百分數爲大。特別是一國如因實行合理化，或採用新機械而縮減勞動需要，則在這種場合首先被裁退的，照例都是一些較年老的勞動者。工業活動的步驟愈加迅速，企業家們就愈加樂用那些年輕的男子和婦女，因爲他們比較容易支持猛烈的迅速活動，並且與長期習慣了傳統的工業方法的年老者比較起來，他們又是更能適應新的工業方法的。年老的男子或婦人一旦失業，往往很難得找着新的工作。因此，他們的失業期間，就不免要比較那些年輕人的失

業期間，延長許多。而在實際，確也有一大些因實行合理化或縮減工業範圍而裁汰下來的老年勞動者，幾乎終生不容易有找得新工作的希望。一切施行失業保險制度的國家，都發覺她們的失業基金，一大部分是用以救濟這些較年老的勞動者。就在那些施行老年年金制度的國度，亦因這些勞動者在達到領取年金之年齡以前好久，已經沒有職業。所以，所有現代的失業保險制度，都應當加以改革，務使維持這般年老者以及大都有失業可能者的負擔，不要仰給於企業家勞動者所捐輸的基金，而直接由國家負起責任。因為工業技術的發展，無疑要增大青年就業者的優越，使青年本身變為一種就業的資格；並且，失業保險制度如同時看作是對於有失業可能者的一種年金制度，那是不能期望有何等滿意結果的。

往往有人作這樣的提議，以為較年老的勞動者如由某種工業解僱出來，則維持他們的責任，不應當由國家負擔，而應當由解僱他們的工業方面負擔。把這種提議應用到工業繁盛和欣欣向榮的地方，那是極其允當的。但不幸要大大減縮勞動的地方，都必然無可避免的會裁汰那些較年老的勞動者；並且，實行減縮勞動的工業，又多半是已經在金融方面

感受嚴重困難，從而，決無力支持格外負擔的工業。我們想要求蘭開夏的棉業，或其他任何國家的煤礦業，維持一大批已經由他們解僱了的勞動者，那顯然是沒有用處的。維持他們這般人的責任，必須以某種方式，責成社會全體負擔。在著者看來，由一般賦稅來分受此種負擔，比較把此種負擔非法課加到用作其他目的之失業保險基金上面，那是要好多了。

在近代一切國家中，除了這些較年老的勞動者，以及一些因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致無法覓取職業者外，其餘極大部分的失業羣衆，並不是由一些長期沒有工作的男女所構成的一種凝固體，而却是由一些有就業可能者所構成的一種不絕變易其個體份子的集合體。在職業介紹所登記，或找尋工作的勞動者中，往往總有最大一部分是失業不久，而企圖再找一種工作的。今日誠然達到了極度的不況；迨乎一九二九年，失業者誠然增加了許多。但是，這許多失業者中，雖有比較少的一部分人繼續很久沒有工作，但這並不是說，就業的工作機會，是很公平的配分於較大部分的產業勞動者之間。因為很多有了某種工作的人，其工作極其有限，恰如一種時作時輟的短工，但因他有了這種工作，他的名字就會有若

千星期不列入職業介紹所登記簿中。在實際，有一大部分產業勞動者是完全不會失業的。永久不致失業的勞動者，包括有兩種人，一是從事比較不受產業變動影響的業務——如郵政或其他公共業務——的人員，一是即令從事諸多變動的業務，但實際却持有永久工作的勞動中堅份子。像這些永久不解僱的勞動者，無疑有一大部分是由於他們的工作較有效率，並且解僱的失業者，又多半是比較沒有工作效率的人。但我們決不宜過於強調這種概論。在大體上，失業也算是一個財力的問題，因職業而大異其趣。一個長期失業的勞動者很容易損及其體力上與技術上的效率；他那迫不得已而流於怠惰的結果，勢將減弱其就業的能力。因此，失業保險制度的設計，並不僅只是一種認定這些不能找得工作的勞動者應由公家負責維持的認識，同時且是一種手段——一種維繫長期失業者之生理上的生活水準，以期阻止其右逃弊害的手段。假若產業一直不況，那怕就是一向強烈反對公家救濟的美國吧，爲了避免這種種弊害，她也許不能不進行某種有組織的公共活動，以圖維持一般不能找得工作的勞動者。

第二節 失業的負擔

失業自然不是到戰後才發生的一種新困難問題。在產業革命以前好久，這個問題即已存在着，並且自有資本主義制度，即有失業問題。自從職工組合為救濟其組合員之失業者，而首先編訂失業登記以來，在這個大集團中，殆沒有一個時期不存在有頗多的失業者。那怕就在繁榮的時期吧，失業者在全體勞動組合員中所占的比例，亦實在不會降落到百分之二以下。不過，在大戰期間，失業者對就業者的比率，是少過百分之二以下許多了。由一八五〇年到一九一四年，英國失業者百分比率，時有變動；在異常繁榮時，約為百分之二；在極度不況時，約為百分之二；而其平均水準，則將近為百分之五。這些數字，有一大部分是完全根據職工組合的寥寥幾種報告，自然不能說是完全可靠，但從全體看來，那却似乎是受到了比較精密報告的證實，而此精密報告，則是蒐集自一九一一年成立於比較窄狹範圍內的失業保險機關。我們當然不能說英國的這種失業的百分數字，可以廣泛的適用到

其他無記錄可資比較的國家。但無論如何，戰後一般比率的失業變動，也許不妨說是限於百分之二與百分之二之間。

當勞動者失業的百分比率，已達到（或將接近）此最低限度時，在那些失業者當中，顯然有一大部分是單純發生於工業組織活動上之失却調和。即是說，由這種工作改換到那種工作，其間存有一個造成那些失業者之間隔期間。至若在這場合竟不免長期失業的人們，那不是由於他們從事的產業衰落，就是由於他們自己沒有繼續工作的能力。無論如何，失業者祇達到百分之二的最低限度，失業還不算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如失業的百分比率竟超過百分之五以上，就那不免要發生嚴重的結果。因為此種場合由失業到就業的期間，勢將延長，勞動者想靠他們蓄積的財源，渡過此失業關頭，那是難乎其難的。就因此故，他們這時乃有仰賴公共救濟之必要。在失業保險制實施以前，職工組合確也對於其組合員盡過某種救濟的任務，但能够作此種施與的，究祇限於那些比較有技能，比較獲有優裕報酬的勞動者，從而，那些簡直沒有能力救助其同儕的比較非技術的勞動者，就格外要

爲此失業的社會重負所磨折了。

失業保險

失業保險制度自經推行於英國、德國以及其他國家以後，凡屬由產業不況而招致失業的羣衆，乃由此得到一極有價值的社會救濟。但戰後失業時期的延長與範圍的擴大，致前此失業保險計劃所由樹立的財政預算，頗無法供應此救濟的需求。因爲此等失業保險計劃設定的意旨，原在以戰前失業形態爲準則，以爲失業變動的比率，最低約爲百分之二，最高約爲百分之十二，而逐年平均水準，則不超過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以上。然至戰後，失業的比率，大大超過此預定的限度了。由是，一向由勞動者、企業家以及國家連同提供的捐助基金，立即證示其不敷維持一向允予接濟的定率，而有另闢財源，以增益此救濟基金之必要了。另闢財源有幾種可能方法：第一是由企業家與勞動者增輸捐款，國家可以按比增攤或不必按比增攤；第二是由國家以附加一般賦稅的方式，預備一項特別財源；第三是當有特別急需時，由國家貸出失業保險基金，其意蓋欲以好況時剩餘的額數償還國家所貸出的基金部分。在實際上，所有這些方法，各國都會在不同的程度上採行過。

德國極力提高企業家與勞動者的捐輸率。英國則主要是採行第三方法，即令國家借出的失業基金，顯然沒有多少取價的機會，她有許久許久還是繼續施行這種方法。但到最後，德英兩國所推行的這兩種方法，都告失敗，以致她們不可避免的要由國家直接維持大部分失業者的生活，而不復假借任何保險的口實了。凡屬短期失業的人，例皆領取他在保險制度下額定的救濟費，若已經完全耗盡其額定救濟費的長期失業者，則由國家維持。德英兩國由此支出的費用，都非常浩大。於是其國人乃頻發議論，以爲此種計劃錯誤，以爲鉅額救濟費的支出，多半是濫費。一些實在不肯找工作做的人們，這無疑也是必有的事實。但經過多方考察的結果，却無法證明其爲普遍的濫費。而且，由那些看似無正當權利要求救濟的勞動者，撤回其救濟費的支出，那誠然是一種節省，但此節省的 effort，究祇能成就一點點貯蓄哩。

因此，爲了施行有效的節省，各國乃訴諸其他方法。即把失業保險的基礎，安置在以下的程序上，就是每個勞動者依照一定率——或如英國之全部一律，或如德國之因所得工資多少而異其比率——捐輸，以後也依照一定率——英國一視同仁，德國則隨其捐輸多

少而異其比率——取得救濟費。當長期失業者已經領得其額定期限內的救濟費，而尙不曾謀得職業時，則對於此種失業者的救濟，通常雖承認按照其原來的同一定率支付，但這種關於『節省』的新方法，却在額定支付與非額定支付之間，設有顯明的區別；就是，凡屬未完全耗盡其額定救濟費的失業者，可以繼續按照標準率支取，而對於那些長期失業的人，則定有一種『生計調查』（Means test）的新辦法；換言之，就是他們不能按照標準率領取救濟費，其所得僅係由地方委員會或裁判所判定他們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津貼。並且，他們在自己掙積的貯蓄未完全耗盡以前，還沒有取得此種津貼的資格哩。這種新方法實行的結果，國家爲失業者支出的金額，誠然是削減不少了。但就實行此種制度的諸國而論，她們在一九二九年以後諸年度所支出的失業保險費用，依舊够形成她們預算來源上的一個重壓。不過，像這些國家的輿論，雖認定這各種計劃的活動不免有些濫費，但却依然堅決的主張維持失業保險制度。在他們看來，此種制度不但是社會應維持無業者的一種必要認識，同時且爲對於革命的一種有價值的保險。

然而，失業保險計劃之不能彌縫戰後逐年的失業漏卮，且不能實實在在維持住保險的場面，那已是顯而易見的。要維持現代經濟制度無法位置的一大些勞動者，國家一定有採行某種措置的必要。這種必要，指示了戰前失業與戰後失業之根本不同；以戰前而論，那怕在異常不況的時候，其失業程度，仍不會越出保險一類努力所能救濟的範圍；並且，其不況時期，從未一年繼續一年，而其剝極復來的好況，且還在限於時候季節以外的一切業務上，大大的中止了失業的事態。

在戰前臨着好況的時期，雖亦不免於失業，但勞動絕沒有永久過剩的性質。可是戰後不同了，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那總算戰後比較好況的時期，但各國在這時期的失業事態，終沒有緩和多少，而英國則從沒有使其失業數字低減到一百萬以下。

這種事實的形成，無疑有一大部分是由於工業發展所能提供的新工作，容納不了工業機械化所驅逐的勞動。那怕就在世界貿易慘況尚未增大生產力與消費力間之不平衡以前，現代經濟制度已經顯示它日復一日的沒有運用其所能運用的生產資源的能力。大

戰以後，大多數人對於失業問題起了根本變化的議論，竭力反對。他們都繼續希望着，以爲工業發展，將不難再找到可以容納這些曾由工業方面投出的勞動。至若合理化在一般大基本工業方面日益迅速的代替勞動驅逐勞動的影響，他們都是視若無睹的。

第二節 貿易循環

他們這種態度，就是當着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貿易慘況，還是沒有改變。他們相信這種貿易慘況，不過是貿易循環 (Trade Cycle) 之長久而習見的現象的一種反覆。據說，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爲貿易向上期。而現在則臨到了一種危機，這危機，是那些曾經分劃過前世紀整個行程的周期危機之一。有如在以前諸場合一樣，當前這種貿易不況的期限與深度，勢將與其前此的發展規模相配合。並且，這種貿易不況，也正如以前的諸般貿易不況相同，經過相當期間，會自動的中止，會自動的由一種向上運動所代替。經濟學者爲要使此種不況與以前的諸般不況情形相對照，曾畫出圖樣，表明這次不況該會延長多久，

該會達到什麼程度。因為他們非常相信貿易循環的理論，認定貿易不況是一種無可避免的事態，且是一種非讓時間去救治不可的事態，所以對於任何防阻這種事態的人為努力，他們都表示反對。

但是過去三年的經驗，却使許多極力主張貿易循環理論的人們亦不由得懷疑這種見解的正確。因為，把這次貿易不況與以前歷次不況的情形比照起來，現在理應顯示向上的清明之象；而況此次不況的程度，及由此引起的反常事態，已經迥非歷來不況的結果所能比擬哩。貿易循環理論雖被看作是現代企業經營上之一種自動的與無可矯正的副產物，但却在當前硬化了。著者是從來不相信這種理論的。像貿易循環這種事體，我不相信其會發生，我也不相信其曾經發生過。不過，最大一部分經濟學者既仍把這種見解看作奇矯之論，我也覺得有把正統的經濟學者所述及的這種貿易循環理論加以論列之必要。

從大體上說來，這種理論是說：貿易與產業在繁榮與不況之間所表示的規律變動，乃是基因於經濟制度本身之內在活動。而這種論證的週期運動的解述，則可由其循環之任

一點而開始。不過，最普通的說法，往往總是在貿易和產業經過不況期間，而漸趨向好轉的場合開始。據說，這種好轉，在現世界的經濟組織裏面，必然會導來某些無可避免的結果。特別是需要一經改進，價格隨即昂騰，製造者乃得以較好的條件出售其貨物。他們的製造費用，雖亦有所增加，但不與其售賣貨價的昂騰成比例。因為生產費中的某些要素的騰貴，往往總會落在一般物價水準後面。這些要素包括有幾項，第一是地租及以相當時期的貸借條件所借得的貨幣的利息；第二是工資。而在地租、利息及工資三項當中，又以工資為尤甚。在既定工資合同滿期以前，在勞動者能够利用那種增加僱傭之改進的需要，使其工資與一般提高的物價水準成比例的昂騰以前，其間須經歷相當時期。在此時期中，生產費與買價之間的差額增加，僱傭者乃獲有較大利潤。此較大利潤發生兩種影響，其一是較高水準之利潤的預期，會誘致那些有資本待處理的人們，投資於新的生產事業；其次是因為利潤增加，工資還保持相對的低率，社會總收入比例較大，從而可資利用的資本較多。此兩種影響造成一個投資活躍的時期，其結果致建造業大肆活動，而企業界之有效的生產力，乃大

大增加。

但是這諸般的發展，都有賴於銀行方面擴大信用的資助。因為企業規模擴大起來，那不但需要較大的長期信用供給，且需要較充裕的短期借款。在某一時期，銀行家頗不難由其擴增的信用，以滿足此種需求；但如物價繼續提高，則情形會開始發生變動。工資勞動者將因需要迫切而要求較高報酬。效率較小的生產工具與勞動，亦會加入生產，資本原來是要找尋有利企業資助的；但一切比較有利可圖的機會如全被擱去，自然只好以那些報酬極小的企業為滿足；有時，那怕對於不容易掙得報酬的企業，亦不能不看作是投資對象。這一來，生產費乃對貨物售價相對的提高。同時，銀行家因為融通的資本已經達到其現金準備與中央銀行通貨供給所規制的極限，已不願甚或不能進一步創造信用。加之，他們逐漸顧慮將來了，對於融通其信用之事業的前途，乃開始作比較綿密的考究。

在銀行家踴躍放款的當中，中央銀行照例是大大提高貼現率，以為整個銀行界之危險信號。特利率即使隨貼現率而提高，如其企業界之信念堅強，猶不一定會直接阻止企業

家之借款慾求。但在這種場合，合資銀行必施行警戒；它們開始拒絕進一步融通信用，並逐漸縮減其已有的債務。利率提高結果，生產費乃隨之增加，生產費與賣價間之差額因而減少。此外，銀行之墊款回收，勢將迫使製造業者減縮生產。致勞動者失業增加，利潤低落，購買力與購買意嚮立即受到損害。因為在那些具有購買力的人們，他們亦會認定貿易已達到轉回點，此後物價將更趨低落，而不欲急於從事購買。這一來，產業界將由銀行信用收縮，而直接導來一不況時期。然在銀行家說來，這種不況，不是由他們所促成，而是使前此繁榮過度深化與速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由繁榮到不況的轉變，時或伴有一種嚴重的商業危機，但有時也不一定伴有此種危機。往往有人說：假如銀行縮減信用，較其通常所行者為速，致使繁榮的發展，不達到物價暴騰的程度，那末，不況的限度，也許可以大大縮減，而由是導來的危機，也許會實行受到阻止。但在實際，銀行家照例總是等待繁榮發展到極頂的時候，然後再突然猛烈的縮減其信用，致企業界突然失去其一向融通資金的机会，而預覺繁榮已達到盡頭，至是，極度的信任，乃

轉變到極度不信任，大家清算，大家拒絕購買，而貿易衰落景象，遂不堪聞問；假使人們肯妥為調節，其衰落程度當不至此。所以由繁榮轉到不況，可以伴隨一種危機，也不一定伴有危機；在某一個時候，不況總是會繼續深刻化的。

但根據經濟學者的理論，這不況決不致無限的延長。因為在此不況期間，到處都會發生極度不願意購買貨物的現象；生產者會大大減縮其生產，批發者零售者會更急切的減少其存貨——他們貶價賣出，希望以更低的價格買進。像這種影響生產的廣泛滯銷情形，結局必導來一種自動的矯正。就是，存貨一抑減到要求增額以應付縮減的需要的限度，購買即將開始，生產即將增加。企業家眼看大勢轉換過來，馬上又發生焦急，恐怕購買稍一延遲，將不免以較高價格購買其必需購買的貨物。於是，貿易業者又開始積貯即時需要以上的存貨，而由此增加的貨物定單，遂在相當範圍內給予生產復興以有利的刺激。勞動者重又獲有就職機會，銀行方面亦恢復貸款。社會一般購買力增進，貿易循環之好轉現象，又復呈現出來。

貿易循環論之心理上的解釋

前面這種關於貿易循環之膚淺性質的廣泛描述，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是會予以同意的。但對於其現象的釋明，他們却有極其不同的意見。例如，照某派的主張，貿易循環的基本原因，大體是屬於心理的；企業界之發生循環現象，蓋不外由於過於信任與過於不信任之交迭錯誤。企業家是夙稱敬感的，他們的活動，有一大部分受支配於羣集本能。在一部分企業界感到的信任，勢將延展到整個企業界全體。並且由信任一步一步產生的信任，結局往往會使不絕增加的信任達到過分的程度。所以，每種循環圈上之向上運動，總不免推行太過，對事業預期的經濟報酬過大，通常且在證券與實物的交易上作莫大的投機活動。但從反面講來，亦屬如此：一部分的悲觀，會產生全部的悲觀。並且，當過分信任已經造成貿易衰落的端緒時，企業界勢將轉向到極不信任。迨這種不信任的影響逐漸消失，信任及由信任所造成的繁榮，乃漸有恢復餘地。

關於貿易循環的這種心理上的解釋，在十二年以前的經濟學者們間，還頗占勢力。但時至今日，我想再不會有人支持此種意見。企業界之極其敬感，以及過分信任與歡悲的錯

誤，曾不絕發生，且不絕在企業活動上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那自然是十分實在的事。但心理上之信任與悲觀，究不外客觀事實的反映。把產業上進步或退步的基本原因，歸之於心理上的反應，而不歸之於此等反應所由形成的客觀事實，那是多麼皮相的觀察啊。

貿易循環論之貨幣上的解釋 貿易循環理論過去受人歡迎的第二種解釋，就是

把貿易循環現象幾乎完全歸因於貨幣關係。前面講過，由繁榮到不況的那種變動發生以前，幾乎常有一般銀行縮減信用與中央銀行提高貼現率的事體出現。根據此種事實，有些經濟學者遂主張金融吃緊為危機及不況的實在原因。我們如照此推論，似乎可以說，銀行家如依照利用一切可供利用的生產資源的需要，而盡量創造信用，則繁榮理應沒有止境。自然哪，假若生產資源業經充分使用，並且附增的資金只能用諸投機一途，那銀行上的信用，是不會進一步擴張的。但這裏似乎會有這樣一種主張，就是，銀行家如其能覓得（他們實在還不會覓得）限制投機而同時不阻止生產事業的手段，他們就大可利用這種手段以防阻任何危機或產業不況的發生。

企業家在危險時期的困難，主要是發生於利率的提高和銀行信用的縮減，他們採取這種見解，那是再自然不過的。在他們設想，有利可圖的企業還多。所以，銀行方面之拒絕借款，或對借款苛索較高利率，他們都認為是恣意阻止產業的進步。不錯，在大多數國家之現行法律下，銀行增加通貨權力，都受有法律限制，並且這些限制，又會限制信用的供給——因為增加的銀行信用，必然要相應的造出若干對於通貨的需要。但純由金融關係來解釋貿易循環的人們，通常却有進一步的主張，以為要使信用擴張到足供生產用途之需要，理應取消這些關於增發通貨的法定限制。

然而對於這般理論，這裏存有兩種嚴重的反對意見。第一，信用擴張到某種限度以外，勢將抬高物價。固然，抬高物價祇是在信用擴張沒有成比例的使貨物與勤務增加供給的場合，才會發生。但在繁榮臻於極頂時，所有大部分的人類與物質的生產資源，都會充分使用着；而繼此增加的額外信用，就不一定會和以前一樣的使用於生產用途。因此，物價不免提高。假如一國施行信用擴張政策，致使物價水準抬高，而同時其他國家又不施行此種

政策，結果勢必損其世界貿易上之競爭能力，使輸入受到獎勵，輸出受到阻害，那一來，如其當事國為金本位國家，其金貨將大量流出，如非金本位國家，亦將減落其通貨之對外價值，在此種情形下，一國想對其主要競爭諸國進一步擴張貿易，那就困難了。而且，我們即令把這種對國際上之困難拋開不講，信用如擴張到嚴重抬高物價水準時，其影響所及，勢必使社會收入，改成更壞的分配，說不定還會由此招致一種無從控制的膨脹哩。

但是，純就金融關係來解釋貿易循環不能令人首肯，實在還有一種更基本的理由在。銀行家自己除了相信有某種理由非縮減信用不可以外，縮減信用在他們是沒有利益的。他們能够多創造信用，就有多獲取利潤的可能。他們之所以縮減信用，乃因其對整個企業界有了促使其作此種打算的觀察。他們因為相信企業家之過分樂觀，將不免誘使其從事無經濟利得可言的生產計劃，於是乃縮減其貨幣供給。銀行家是整個企業界之客觀現象的釋明者，但却不是那諸般現象的創造者。一種不賢明的銀行政策，雖可以並確會大大增大那種變動，但我們如即此就主張產業上的諸般變動完全是由於銀行家對生產者拒絕

融通資金之惡意的與無可寬宥的行爲所促成，那就有點說不通了。

然而，關於貿易循環論之貨幣上的解釋，有時是採取另一種形態，就是，對於產業變動上的責任，責諸銀行家者輕，而責諸銀行家所盲目處理之銀行制度者重。根據此種主張，貿易循環乃被視爲物價變動的結果，而此物價變動，又是由於世界金供給之是否適合。據說，前世紀一般物價水準的向上運動，通常都與供世界貨幣用途之新金數量的增加相一致；當逐年金之供給量增加，落在世界物品與勤務生產上的相應增加以後，則物價水準趨於下落。凱塞爾教授 (Professor Cassel) 在其致國際聯合會金融委員會之金代表團 (The Gold Delegation of the Financial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的意見書

中，曾堅決贊同此種見解。在金本位制度下，物價水準該是怎樣受着通貨供給——結局是受支配於金之供給——和要需藉着通貨周轉的交易額之間的關係的，影響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我們並且知道，金供給增大會提高物價，金供給縮減會降低物價；同時，金總額以及可供利用的金的分配，又會影響到以金爲基礎的通貨額；所有這些提示，誠然都是事實。

但貿易不況，係與低落物價緊密關聯；貿易繁榮，係與昂貴物價緊密關聯。如其物價水準的變動主要是由於可用作貨幣之金供給的增減，那末，要主張這種增減變動是經濟繁榮上之變動的基本原因，那不是振振有辭麼？

這種見解是惹人注意的，但却不着邊際。由前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物價水準幾乎在逐漸低落。我們如其把這二十年解作是世界貿易衰落期，那就遠於事實了。不錯，在這個時期當中，曾發生幾度嚴重的貿易不況——如七十年代後期的不況，八十年代中期的不況，九十年代初期的不況。但全般看來，這在世界繁榮及世界生活水準上，却是一個發展異常迅速的時期，那怕就在此後世界物價水準向上的二十年中，其發展甚且還不及這時期的迅速。在產業不況時期，物價誠然是趨於下落；在繁榮時期，物價誠然是趨於昂騰。但要把握物價上的這種短期動搖，證示其與世界金供給變動結果所生的物價水準上的長期上揚或下落的趨勢相一致，那是不可能的。物價的低落，如其不比較生產力的增加更為迅速，則那種低落程度，並不會招致貿易的不況。而且，生產力假如進步迅速的話，

低落的物價水準，甚且很可同工商業上之高度繁榮景象相並行。

因此，貿易循環之純粹貨幣上的解釋，簡直與純粹心理上的解釋，同無是處——不過，我們得承認一點，在增大或縮小那些導因於更基本原因之諸種變動的限度上，貨幣現象是有極重大的影響的。

第四節 貿易變動的原因

關於貿易變動，還有一種最博人贊許的解釋；這解釋，雖然特別與荷柏生 (J. A. Hobson) 的名字相關聯，但其借助於馬克斯資本論 (Das Kapital) 第二卷中之論斷者頗多。荷柏生 氏異常重視貿易由增大生產費與物價間之差額而改進的影響，即增加企業利潤，而不相應增加勞動工資水準，或社會大多數消費者之購買力的影響。我們在前面講過，此種企業利潤的增加，勢必刺激投資，並使建造業呈現一大活躍。但要由這種投資獲得經濟報償，非有容納新工廠所增產的消費財的充分市場存在不可。照荷柏生 氏的提示，在現

行制度下，充分市場却又是不會存在的，因為工資總是低落在利潤後面，而那些獲取利潤的人們，又照例是將其利得用之於消費財方面者過少，用以購買新生產工具者過多。其結果遂釀成社會在繁榮期中的相對『過多蓄積』(Over-saving)，以此相對『過多蓄積』，供應減縮的消費需要，勢必導來一不幸事態，致新設工廠非無利可圖，即係憑其競爭能力，使原有的效率較少的工廠停止業作。由是，勞動者解僱，社會消費力進一步縮減。此種事態，將因新工廠之更高度機械化，即以較少量勞動產生同一數量貨物，而益增大其嚴重。

消費需要一經感到缺乏，首先由競爭受到致命打擊的，就是那些經營效率較少的公司，其次即會影響到效率較好的公司的生產費，使它們不得不停止其一部分的工廠設備。這一來，企業規模因之減縮，在此減縮過程中，許多破產與虧折現象，隨之發生，直至生產力規模達到足夠供應縮減的消費需要為止。當生產力與消費力之新均衡，由此等工廠設備之停止與廢棄而形成時，企業活動乃再有緩慢恢復的可能；此後，新的繁榮景象出現，而同一不況事態，又將緊隨此新繁榮景象而重復光臨。

在我想，在一切關於貿易循環的解釋中，這算最接近於真實。其認識全根據客觀事實，其中心議論，實亦無可非難。工廠與各種生產工具之用途或價值，只有在它們所生產出的貨品能找到有效需要的限內，才可表現出來。把消費財之購買力，轉用以從事生產工具的創造，在超過適當限度以外，是定然不免發生危害的。荷柏生氏且曾指示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把消費財的購買力轉用以創造生產工具的努力，又有趨於超過此適當限度之理由在。那理由就是在企業繁榮增加時，工資照例是落在利潤以後。

貿易不況何以會中止呢？不過，像荷柏生氏的這種解釋，亦並不能說是完全適當。

因爲，我們如其回顧一下前世紀的繁榮與不況，而不在心目中預存着某種理論，我們將發現一種事實，就是所有這些變動，都可有其各別的特別原因。無論在那種場合，這諸般特別原因的活動，都無疑會由心理上與貨幣上的要素，以及由消費與投資之失却適當平衡關係，而增大其作用。但荷柏生氏的理論也好，其他的理論也好，對於貿易不況既經發生，何以復又終止的理由，在我想，都不曾有過滿意的解釋。然而在承認貿易循環理論健全的限內，

却又必須把貿易不況之所以終止的理由解說明白。

況且物質繁榮上之進步與增長，還不應說是人類經濟活動之自然產物麼？在一切時代，人類對於自然的支配力，及其生產物質財富的權力，在較大一部分世界上，其增加的程度，總要遠較人口的增加為迅速。我們一定可以這樣說，貿易不況終止的解釋，不外就是那些造成貿易不況的動因，已逐漸消失其作用，致經濟活動之正常進步，得以毫無阻礙的恢復。

這種見解亦有其是處。但我們決不要忘記一點，就是，經濟生活之正常趨勢，那怕是不斷進步的，然貿易不況景象一經發生，勢將不免引起其他愈益加深不況之人為原因發生作用。物價愈因需要縮減而低落，需要即愈會縮減，以致更進一步促成物價運動的向下。人們愈感到悲觀，他們就愈有悲觀的理由。銀行對於墊款愈加神經過敏，其墊款就會愈不可靠。不況是會演成不況的。照普通的說法，存貨如其出清，一定會在相當時期導來復興與機運，可是這對於大多數不況終止的原由，完全不能予以說明。在現代情形之下，現行生產即令

經過最殘酷的縮減，存貨能有出清的希望麼？以過去數年間的數字而論，在不況開始時蓄積的許多原產物的存貨，慢說出清，就連減少的數字，也不易發現哩。到末了，世界誠然要開始消耗其存積的小麥，但那對於使原產物存貨縮減到允許恢復原初價格水準的企圖，依舊沒有何等成就。

像這種現象，也許可以說是因為世界在經濟的方面，現在比以前要更有組織；惟其如此，聯合組織保藏存貨的力量較大；而這些離開市場之存貨的保藏，乃有使現行生產水準提高的可能，因為保藏的存貨如都投積市場，那生產規模是非縮減不可的。根據這種事實看來，有人就主張藉着有組織的保藏存貨的手段，來阻止不況，其結果實足以延長並加強不況，且使一切必需救治的活動，受到妨礙。但這種提示即令有其是處，然不論不況延長多久，存貨逐漸出清這件事本身，究竟是否會達到足以刺激貿易復興的限度，則似乎頗是疑問。此外，比這更使人津津樂道的見解，就是把貿易不況終止的原因，歸之於銀行政策的轉換。因為，銀行家當貿易不況時，既把信用放款縮減到極低水準，他們的手中，遂存有大量閒

散的游資。因一般企業家的懼怕損失，不肯投資，且因大家願意不論利率高低，把資金安全保存在銀行中，以待好況的到來，於是這些游資大形膨脹；游資膨脹的壓迫，結局乃使銀行家改變其緊縮政策，而允許較自由的墊款。由銀行增加墊款方式而加入流通界的新貨幣，自然能够使物價抬高，而給予貿易復興以必需的刺激。

銀行家能幹什麼呢？實在講來，銀行家在不況時期，由墊款創造新貨幣的權力，是極其有限的。企業家不找得有利可圖的企業，以使用其借得的款項，銀行家決無法強迫他們向其借貸。銀行方面儘管採行低利政策，無奈企業界對此低利資金，不能發現有利用途。例如就中央銀行來說，中央銀行即令用購買證券的方式，努力使流通界的貨幣增多，但這些由購買證券付出的貨幣，也許只會貯存在銀行方面；貨幣像這樣由銀行發出去，重又返回，那於實際流通的貨幣額，無任何影響。所以，要想在貿易深刻不況的情形下，藉創造信用以復興貿易，究非銀行單獨所能為力。銀行只能利用——或不能利用——擺在它面前的有利機會。當機會到來時，銀行如不能利用，不藉此擴張信用，那也許不免要無限遷延貿易。

的復興。但它們的活動，究祇能把握着客觀環境所提供的機會，而不能離開客觀環境有所成就。

荷柏生氏也許會作這種提示，以為貿易不況之所以終止，照他的理論解釋起來，就是由於不況時期的工資與利潤，恰好與繁榮時期表示相反的趨勢。工資率的縮減，通常皆比較物價低落緩慢，同時利潤的跌落，則最為嚴重，因為，我們在前面講過，利潤的取得者，為生產過程上之餘產領有者（the residuary legatee）。所以，在繁榮時期，現代社會會作過多的投資與過少的消費；在不況時期，則投資之抑制，又會較甚於消費。而且，生產資源既因投資抑制而莫由擴張，勢將開始給予那些準備冒險投資者以種種實在的有利機會。這種見解，無疑含有若干真理，但却毫未注意到以次兩種重要動因。第一，社會在不況的時候，就令沒有新的投資，實亦不難繼續運行；並且，在一個長時期內，它還可覓取那些因過去投資過多，以致超過其現行消費力的生產資源。世界今日對於創造其能夠即時購買的一切貨物，並沒有缺乏生產資源的徵候。假若我們要等着『不足的投資』（under-investment）導

來一種貿易的復興，那我們就實在非等待一個極長的時期不可。

第二，不況時期工資率的低減，照例雖較物價的跌落為緩慢，但工資率的低減，究不足充分顯示總工資額的減縮。總工資額除了受工資率變動的影響外，同時還會因解僱與僱傭不足而大大縮減；並且，決定勞動階級之消費力的，不是工資率的水準，而是總工資額的大小。如在當前貿易極度不況的美國，其勞動所得總數的數字，就比較勞動者就業人數，或標準工資率所顯示的慘落情形要嚴重得多。在英國以及其他實行失業保險制的國家，勞動者總購買力低減的這種趨勢，曾由國家以賦稅轉移貧富收入的方式，在某種限度得到抵銷；並且，在此種情勢下，消費與投資間的差額，還會因以矯正。但在美國不同，美國之消費與投資間之差額的矯正，其發因於國家用以救濟勞動階級之現行收入增加者少，而發因於投資者積極停止業作，以致富者一大部分收入，既不用以投資，亦不用以消費者多。但不論招致此差額矯正的原因如何，此種差額矯正本身，無疑為促成貿易不況終止之一原因。可是要完全藉此解釋不況之所以終止，那却頗嫌不夠。

論到這裏，我可以作這種提示：不況的終止與繁榮的恢復，一部分是因為經濟進步，為現代企業世界之正常狀況；但一部分也因為利用某種僥倖事件，或採行足以改正不況趨勢和導來復興的某種精密政策。換言之，不況無論延長好久，復興究不是自動招來的。人們期望復興，要就是不用積極努力，坐待足以招致復興的某種事件或某些事件的到來，不然的話，就要訴之於委為配佈的確定計劃。

過去所有的大復興工作，殆莫不與若干足以克服其累積不況趨勢的僥倖事件相關聯。如黃金的新發現，如處女地帶的開發，如若干特別市場——例如一八七〇年的德國市場——上之需要的突然擴張，如若干曾對捷足先登者給予高利潤鼓勵的劃時期新發現之迅速探索——所有這些以及與此類似的原因，都會使過去因經濟制度活動而招致的接二連三的不況，次第得到解救。因此，處在當前不況的情勢下，我們所待考慮的問題，就是看我們是否能依賴振敝起衰的某種類似的幸運，或者還是必須以有創意的復興計劃來代替坐待幸運光臨的觀望政策。

第五節 當前的不況

當前的不況，實較以前任何時期的不況嚴重，就不況所引起的工業衰落的深度，或其延及世界各國的範圍說是如此，就其在各國財政上及國際關係上惹起的攪亂程度說，亦是如此。正常的企業不況，無疑要使許多生產者貿易業者陷於破產，但過去所曾經歷過的不況，却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的，世界一大些國家的政府，都感受着國家破產與整個政治經濟解體的威脅。這種事實，使當前的不況，具有一種異乎前此任何不況的性質，從而現在要單靠機會，甚且要在單獨一國之內採行有計劃的行動，使世界走上復興之路，那是比較困難多了。

像當前不況的這種政治性質，即使政府與私人資本家同樣受到影響的政治性質，在大體上，顯然是基於以次三種事實。第一，因為由世界大戰贖下了國家與國際間的戰債遺產；第二，因為藉外資復興歐洲的努力之難期確定；第三，因為物價崩落到了不够支持戰時

及戰後債務的程度。戰時及戰後累積的莫大債務，那怕其重壓不因物價暴落而大增，要支持亦頗不易；今其物品價值既隨物價跌落而增加起來，那顯然超出了世界支償能力之外。因此，世界走向復興之路的第一步驟，就分明是在使許多國家的政府由此債務負擔解脫出來；爲要重新確立國家經濟體系上之健全償付能力，從而對再建國家產業安排一穩固基礎，這些國家都希望履行其債務，但它們要求債權國把這債務大大的縮減或勾銷。假若這點不能由國際協定而達到，勢必使各債務國採取賴債的方式。如其債權國多方阻止賴債事態的出現，其結果也許竟不免由此導來世界的革命。

不過，我們就假定說世界各國政府都充分理解此種事態，並且債務負擔已經縮減到了有辦法的限度吧，由此造成的相互信賴情勢，雖然容易使世界走上復興之路，但世界的復興，却並不能由此得到實現。然則解決債務問題以後應行的積極步驟是什麼呢？大體上說來，那些步驟在某種限度是偏於國家的，在某種限度是偏於國際的。國際方面最關重要的努力，就是關稅障礙的減除，自由貿易領域在可能範圍內的擴張，以及使各國間的生產

物，得依某種協定而相互交換。而與此撤除貿易障礙應當同時進行的，就是大量裁減軍備；軍備裁減，一方面可使資金用之於建設的經濟工作，一方面可以對於較自由的國際經濟關係的更生，與投資的復活，造成一種良好的空氣。不過，諸如此類的國際政策，都當與每個國家在國內刺激僱傭和生產的國家政策，相輔而行。我們講過，當前不況的最黯淡的特徵之一，就是工業投資意嚮的潛消。凡在私人投資者不肯投資的地方，政府都起而努力。要在改善的國際關係之下促成世界的復興，最好莫過於世界主要各國政府直接計劃並資助國際間大規模的系統的公共事業的發展。特要實施這種國際建設政策，勢須推行比較自由的信用政策，如有可能的話，且須推行一種國際信用協定；在此協定中，每個國家都同意解除其現行通貨制度的桎梏，而在一種改革的金本位制的基礎上，或藉着一種在管理上不關涉到任何金屬本位的各國相關的通貨體制，而擴大其信用。

由國家準備的工事

在大戰以後的若干年間，許多國家對於其失業的人民，都會由發展公共事業的政策爲他們準備工作，但她們當時的努力，大都近似敷衍。迨失業逐漸

成爲嚴重問題，她們才開始加緊進行那些打算在最近將來始進行的種種工事，以圖緩和。她們實行這種方策，是預計不況不久可以終止；並且只有不況是暫時的性質，這種方策才能顯示其效果。因爲加緊進行種種公共工事的結果，勢必至縮減此後諸年度所需舉辦的工程。況政府通常採行的方法，不外是督促地方當局即時進行其屬內的工事，並爲此目的，給予他們以特別津貼，或輕易的借款機會。在某種限度內，這種政策是不難收到一時的效果的。但不況如其一直延長下來，地方當局就愈加不願因這些工事，而增加其支出，因爲，在他們看來，這些工事都含有救濟失業的性質，其負擔應加在國稅項下，而不應加在地方稅項下。因此，凡屬努力施行此種政策的政府，就令其對地方當局給予以鼓勵的津貼，它們都發覺其效用會很快的歸於消滅。

況當前世界的不況，早伴有一種主要發因於債務負擔的財政危機，這危機，使各國政府都企圖把支出削減到絕對的最低限度。但就眼前破費的支出上着想，僱用一個工人，往往比用失業救濟費豢養一個閒人，要多費許多；因爲工人由工作所得的工資，一定要較

其山閉着所得的失業救濟費爲高，況且工作還要材料，工事完成後還要組織和監督哩。把這些都加以考慮，在企圖減縮支出的政府看來，當然把工人閉着，要比較爲他們安排工作便宜。在這種條件上計算費用，不但完全忽視了使用失業勞動者所能創造的產品的價值，且完全忽視了勞動者長期失業在其將來生產能力上發生的破壞影響。但終日爲財政所苦的各國政府，她們祇關懷眼前開支的縮減，而不大能注意到健全的經濟學；所以，當世界不況襲來後，各國對於其曾在進行的公共工事，或則拋棄，或則猛烈的縮減。

假節省的危險

但這種縮減政策，是自殺的政策。正當着私人投資極其不振的時候，政府又停止其對於公共事業的投資，其結果，當然會加大不況與失業，且進一步使私人投資者，不肯以金錢作冒險的嘗試。其實，政府在長期不況時所須努力的，就是要勇於投資；其投資政策，一方面在用貨幣代替私人投資者不肯投下的貨幣，同時且在由此創造間接需要，以便敦促那些私人投資者，重新參加投資活動。不過，像這種政策如幸而得到贊許，其所取的規模，必須遠較不況以前業經實行過的規模爲大；過去此種政策的大缺點，就是政

府所擔當的工事，幾乎完全限於那些不能直接再生產，和以爲其不會直接再生產的事業。國家小心謹慎的不與私人作牟利的競爭；爲達成此種目的，凡屬於育成工業復興有極大影響的諸般工作，她都不肯擔當。一種由國家提供僱傭機會的更新政策，決不要只限定其工作範圍於道路建設和市政工事。那除了大大發展房屋建築事業外，尤須集中其全力於國民生產力之實際改進，以期有助於舊基本工業的改造與重裝，且賴以促進那些應大眾變動的消費需要而新設的工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在此種政策努力的範圍內，像使全國鐵路幹線電氣化的一類事業，本可列入；但除非國家有充分的資本，能直接使既有的工業合理化，使新設的工業發展，那是無法求其完全和有效的。在當前世界一切國家中，美國算最宜於採行此種政策的國家，她的賦稅比較輕微，她還擁有待開發的廣大天然財富。此外，她並還有一種利益，就是，她可增加通貨與信用的發行，而不用絲毫改變其貨幣制度的基礎。在過去一年中，美國雖然有大批黃金的流出，但她如能覓得有效擴張信用的手段，她仍是擁有可爲擴張信用而自由處置的大量黃金的。

特擴張信用，必與信用的有效利用相輔而行；政府如沒有藉發展公共事業的政策以增加信用的需要，則銀行方面僅僅擴張信用的效果，就實在頗是疑問了，在市場上沒有需要的限內，由銀行方面發出的新貨幣，不是馬上就要回到銀行來麼？但如在美國那樣的國家，實行國家統制的信用擴張與公共事業發展政策，那頗不難招致產業復興——不過，這是僅就她自己的權力說，其實復興產業，同時還待國際債務問題與國際關稅問題的澈底解決。特在世界各國中，究還祇有美國能由國家擴張信用，發展公共事業，而不致引起何等危險。因為，美國即令試行這種政策完全失敗，她由是引起的頂壞的結果，也不致使其較現在更壞。但如其他國家試行此種政策失敗，則恐不免要惹起嚴重得多的破局。例如就德國說吧，德國不但由楊格計劃縛着在金本位制上，且還負擔有莫大的賠款與其他外債利息的重擔，她要試行這種政策，實不可能。即如英國，她要不確然斷定美國與她探行同一步驟，那她對於這種政策的推行，也只能適可而止，超過某種限度，恐亦不免發生危險。

假如世界要從它現在的困境走上一種再造的資本主義的途徑，我看，沒有比這更不

可靠的事。許許多多造成當前不況的動因，似乎還會一仍舊貫的創造將來更大規模的非常狀態。因為，由現行收入在消費與投資間之不當分配所引起的不況，乃係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勢，此種趨勢決不致因任何使資本主義重新創始的方策的採行，而受到何等影響。繁榮即令由當前不況中恢復過來，此後仍將不斷為一次嚴重一次的不況所威脅。如其我們假定說，經濟的國家主義的諸般動因，一旦予以澈底的剷除，當再度不況襲來時，也許不致再有增大其嚴重性和延長其時間的政治糾紛，這是過於理想了哩。在實際，資本主義社會收入在消費與投資間之不當分配趨勢，在將來的繁榮景況中，與其說它會減弱，却毋寧說它會加強。因為，除了那些在以前業經存在過的諸動因之外，現在又加上了一種會不斷代替勞動的合理化的動因；在技術進步最速的時候，勞動由機械代替的程度亦最利害。此種代替，會進一步阻止消費力的擴張，且會阻止消費意嚮與生產力增加成比例的擴張。當一九二九年以前的幾年間，此種趨勢曾在美國有害的作用着，而其他國家在將來的繁榮中，亦殆不免蹈其覆轍。因為，我在前面講過，現代技術的進步，並不會以使用那些使勞動更能

生產的機械爲滿足。它的傾向，還逐漸在使人類的生產力直接由機械來代替。如其各國打算當其全國勞動者一達到中年時，即以年金供養着，這種技術進步的影響，無疑能夠予以阻止。但是，除了美國外，任何國家要致力於此，都非與其餘各國採取同一步調不可。因爲，施行這種政策，勢不能不由較高賦稅增加生產費，生產費增加，當事國之輸出工業即將蒙到阻害。英國是社會立法方面的先進國家，她曾經發現，她在這方面墊支的費用，其限界不是由國家財富總量所設定，而是由國際競爭之緊急要求所設定。如其我們作這種提示，說世界各國可以把養養較年老勞動者，當作一種合理化的墊支，而成立一國際協定，那似乎失之幻想。但是，不從這方面努力，各國究將如何妨阻機械化發展所不絕低減消費力的影響呢？即使世界資本主義最後顯出一種新力量，能把握客觀事實，並協同致力於使當前不況告一結束——一個極大的假定——的復興，但這種復興，並不算是世界資本主義困難的終結。因爲，在世界現行經濟制度中，存有種種爲加爾·馬克斯所稱爲矛盾的內在缺陷，並且，在此經濟制度之基本構造未經徹底變革以前，這些內在缺陷是無從消除的。

國際叢書之一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王漁村著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本書分二編：第一編論現代世界經濟之一般特質；第二編分論當前各種經濟現象，如戰後世界的國際戰債問題、賠款問題、貨幣戰爭與關稅戰爭、貿易與金融、工業與農業、勞動問題、恐慌問題等，皆詳為論述。本書特色有三：①對於每項經濟問題或經濟現象之敘述，均先闡明其根本原則，然後再及其實況；②對於各項經濟問題之展開，皆注意其相互間的有關的發展程序；③對於世界全般經濟實況之今後推移趨勢，有簡要的說明，讀之可窺見世界經濟之全貌。

國際經濟概論 [中華百科叢書之一]

周伯棣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本書理論體系，係采自谷口彥吉博士之講義。關於各種事例，以及新事例的新理論，均由編者盡量增補。內容計分十一章：①國際經濟之意義概念及問題，②國際分業與國際商業，③國際價格論，④國際探併與國際卡特爾，⑤關稅的進化，⑥輸入限額制的成立與其影響，⑦交換貿易制的意義與效果，⑧國際問題的資本移動，⑨金銀之國際的移動，⑩勞動之國際的移動，⑪國際貸借與國際收支。全書條理清晰，層次井然。

中華書局出版

最新編創研究經濟之工其書

經濟學辭典

主編者
周憲文

布面精裝一巨冊 定價四元

王家駒 王秋葦 方若君 杜伯棟 周鈞溪 徐禮榆 孫禮唐 徐樹勳 唐懷仁 陸善燾 陳高燾 陳壽備 陳壽琦 葉作舟 管照微 熊得石 錢亦山 戴蘆石

王漁邨 方秋葦 杜伯棟 周鈞溪 徐禮榆 孫禮唐 馬季唐 許亦非 陳訓彪 符彭念 楊禮恭 管世楷 劉鴻萬 韓通仙 瞿荆洲

本辭典經過三年間之編輯，一年餘之排校。在分量方面，全書一千五百餘頁，正文一百五十萬言，收集詞目達六千餘條，我國固有名詞實占十分之一。各條字數，視詞義之繁簡及其重要程度而定，大體對於經濟學上固有之名稱，說明較詳；對於經濟學有關之名稱，說明較略。在範圍方面，包括經濟科學所涉及之領域，略分經濟、財政、貨幣、金融、工業、農業、商業、交通、社會政策等部門；此外與經濟科學有密切關係之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及哲學各科最通行之名稱，亦均擇要收入。在技術方面，用淺顯之文，作簡明之敘述，每條之詞義顯然而後說明；如詞義分歧者，則先定義而後說明；如詞義分枝者，則亦本客觀之態度，作公正之介紹。本辭典之執筆者，均為各科名家，內容精審無出其右；校對之精細與印刷之精美，更能使讀者滿意。

中華書局新出版

WORLD FINANCE SINCE 1914

By Paul Einzig

戰後世界金融史

著者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世界金融的歷史，分爲通貨膨脹、通貨安定、通貨緊縮、通貨復元四大時期，不僅將各期的原因、發展和效果作一詳細的說明，且檢討了對於經濟、政治、社會生活諸方面的影響，暴露了國際貨幣戰爭內層之經濟的和政治的背景，警備地指出貨幣政策的限度。謂過去一切貨幣政策都是盲目的，沒有計劃的。因此本書對於正統經濟學派的頑固理論，乃至技術統治派、陶格拉斯派等的幼稚說教，大加批評。他認爲貨幣政策，固然是解決爲今日世界混亂之源的社會分配不合理的一個重要方法，但決不是根本的方法，根本方法，還是要從改革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身着手。故歸結到良好的貨幣政策，應作爲整個計劃經濟之一部分而施行。



宋家修譯
精裝一冊
二元

〔一之書叢科百華中〕

世界產業革命史

周伯棣·魯君明編

原售六 角

改售五 角

『產業革命』為奠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我們要瞭解今日之社會，不可不先瞭解產業革命。本書從社會的、技術的兩方面，敘述產業革命之所由發生，及其如何發展的狀況；如英國的產業革命，其他各國的產業革命，以及未完成的中國產業革命，均詳述無遺。末章推論產業革命的結果與影響，更可為瞭解世界經濟狀況之一助。

世界產業大全

牧野輝智著 馮達夫譯

二冊 原售二元 改售一元八角

本書內容分農業、畜產業、林業、水產業、鑛業、工業六編。把世界各種產業詳細敘述，每種產業，先略述其發展大勢，次詳述現在各地生產的情形，並說明其地理的背景，末更敘述該產業在國際上的趨勢，俾明瞭國際間經濟競爭的侵略和現狀之所以形成。內容極為豐富。

英美日產業問題

歐陽淪存著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五分

自歐戰終結以後，當事各國之財政亦隨之告竭；於是英、美各國無不以全力拓治生產，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經濟界發展之速，亦為並世所罕見。本書對於該三國產業之概況，發展之情形；以及改革之經過，均詳述無遺，可為研究世界經濟概況及各國戰後大勢者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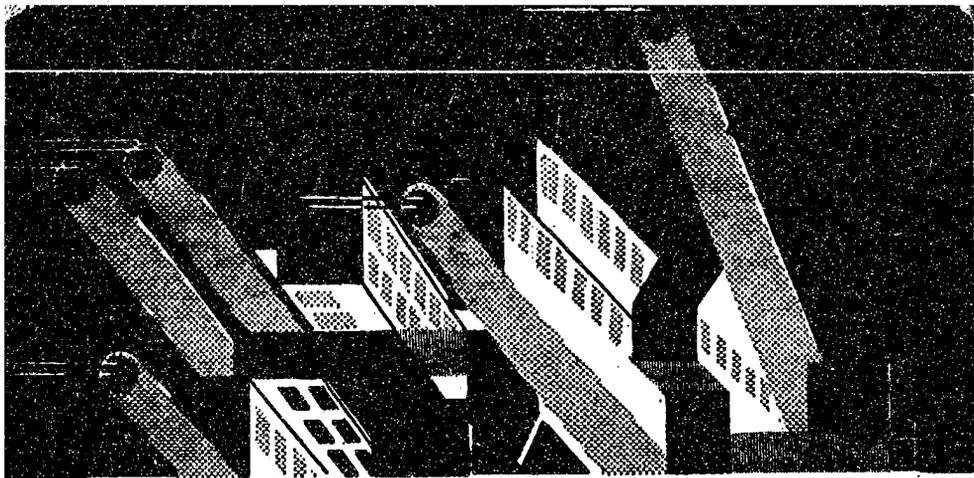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出版

全

55
01058

標商冊註





書叢濟經代現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

冊 下

譯合邨漁王 今搏王

行印局書華中

現代經濟叢書

G. D. H. Cole 原著

王搏今 王漁邨 合譯

The Intelligent Man's Guide Through World Chaos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

下冊

中華書局印行

第八章 對外貿易與財政制度

第一節 一般的觀察

一切發達的國家，都多少要依賴對外貿易。她們必須輸入某些為她們缺少的原料或無力製造的商品，並且她們還得輸出貨物，以抵償其輸入。而在那些經濟進步尙未脫却初期階段的國家，通常還要對資本——主要如鐵道材料以及供產業發展所需的機械一類資本財——的輸入，行使支付。對外貿易原不外是貨物與貨物的交換。但各國間的這種看似簡單的關係，却為以次兩種事實弄複雜了：那第一是一國借款於他國，要求償付元本與利息的資本移動；其次則是勤務的購買。勤務購買係發生於這樣的場合：比如一國的輸出輸入，主要由他國的輪船或鐵道運輸；又如一國國民藉游樂或對家族匯款的方法，在他國耗費其金錢。



282630

至若在那些較大與較發展的國家的場合，其情形更特別要因以次的事實，而益增其複雜。那種事實就是，那些較小與較不發展的國家，大抵是靠着世界大金融中心——特別如倫敦——而周轉其對外貿易。世界一大部分的外國貿易，都是藉倫敦所開的支票周轉；並且許多船舶與貨物的保險，亦是集注在倫敦市場。

因此，世界各國的交易關係的任何賬務，就不僅只包括着由一國到他國的貨物移動，同時且包括有事實上於貨物移動無關的支付。各國間的貿易差額，通常是由她們彼此間實行輸出輸入的貨物總額的比較，而加以推算。但是，對於許多用途比較更重要的支付差額，却包括有『有形的』(Visible)與『無形的』(Invisible)項目，並且，其列入計算的，不僅是關於貨物與勤務的現行支付，凡屬由過去投資，及由新投資或短期借貸而移動的資本金額，都在計量之列。

一切發達的國家，雖然都在某種限度依賴外國貿易。但她們彼此之間的依賴程度，却極不相同。有些國家能消費其國內所生產的物品的大部分，她們對於生活資料，不一定要

怎樣仰賴輸出或輸入；同時，其他國家所生產的物品，却有一大部是爲了供應外國市場，從而，這種國家就非靠輸出以換回其不在國內生產的種種貨物不可。這些大體上要仰賴外國貿易的國家，可分爲兩組：第一組包括有歐洲進步諸製造業國家，如英國、比利時、德國，乃至次於英、比、德的法國；第二組所包括的國家，主要是輸出食品與原料，並由這類原產品的輸出，以換回其所需的大量製造品。

一九二九年度主要各國在世界貿易上之百分比

國別	輸出	輸入	總數	輸出對輸入之百分比
英國	一五·三	一〇·八	一三·二	六九
美國	一二·二	一五·八	一三·九	一一四
德國	九·一	九·二	九·一	九七·
法國	六·五	六·〇	六·二	七五
加拿大	三·五	三·四	三·五	九二

瑞 士	一·五	一·二	一·四	七·七
西 班 牙	一·五	一·二	一·四	七·七
瑞 典	一·三	一·五	一·四	一〇二
英 屬 馬 來	一·四	一·六	一·五	一〇三
荷 屬 東 印 度	一·三	一·八	一·五	一二七
捷 克	一·七	一·九	一·八	一〇三
澳 洲	一·九	二·一	二·〇	一〇一
中 國	二·三	一·九	二·一	七·六
阿 根 廷	二·四	二·八	二·六	一二七
比 利 時	二·八	二·七	二·八	九·一
意 大 利	三·二	二·四	二·八	六·九
荷 蘭	三·一	二·四	二·八	七·四
日 本	二·八	三·〇	二·九	九·七
印 度	二·六	三·六	三·一	一二七

至各國相互間之對外貿易的地位，很可由次表而徵知。這個表所表明的，是主要各國每個國民對外貿易的價值（以美金計算）。至表中選定一九二九年度的原因，蓋以同年度可以代表輸出輸入價值未深受物價大變動影響以前的情況。

蘇俄	一一二	一四四	一三三	一〇六
丹麥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九五
巴西	一二六	一四四	一三三	一〇九
南非聯邦	一一二	一四四	一二二	一〇九
奧地利	一三三	〇九	一一一	六七
波蘭	一〇	一〇	一〇	九〇
愛爾蘭	〇八	〇七	〇八	七八
埃及	〇八	〇八	〇八	九五
新西蘭	〇七	〇八	〇七	一一四

一九二九年度世界主要各國每個國民之輸出入價值(單位金元)

國別	輸	入	輸	出	總	數
新西蘭		一五八		一七六		三三四
丹麥		一二九		一二三		二五二
荷蘭		一四一		一〇二		二四三
加拿大		一二七		一一四		二四二
比利時		一一九		一〇八		二二七
瑞士		一二七		九九		二二六
澳洲		一〇六		一〇七		二一三
英國		一一八		七八		一九六
瑞典		七八		八〇		一五七
阿根廷		七五		八一		一五六
法國		五五		四七		一〇一

德國	五〇	四七	九七
南非聯邦	四四	五二	九六
美國	三五	四二	七七
意大利	二七	一九	四六
日本	一六	一五	三一
波蘭	一一	一〇	二一
印度	三三	四	六
蘇俄	三	三	六
中國	二	一	三

新西蘭與丹麥

從上表的數字，我們將發現，其中每個國民之輸出輸入價值特大的國家，不是我們料想的歐洲任何大製造業國，而是新西蘭。新西蘭主要是為世界市場，特別為英國市場生產食品；她輸出肉類、牛油、雞蛋以及其他許多比較昂貴的食品，同時則多半由英國換回其因地狹人稀，致不能依其簡陋設備，而自行生產的製造品。表中立於第二

位的，是丹麥與新西蘭的情形相類似。其國小，其製造生產設備簡陋，從而，她寧願集中其全力，以從事集約的農業經營，由是提供其他國家以比較貴重的各種食品。在大體上，丹麥也十分之八九是依賴英國市場。因為，在世界一切國度中，英國是這類食品的最大輸入國。至在表中居第三位的荷蘭，亦是大量輸出肉類，牛乳製品和其他在容積上具有相當價值的食品。不過，與丹麥或新西蘭相較量起來，荷蘭還不失為一個製造業國家。

加拿大 表中居第四位的是被稱為現在世界主要倉庫的加拿大。加拿大有大量的剩餘小麥，輸供世界市場。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她會大大擴增其小麥耕地面積，並使她自己極度依靠世界小麥市場的空想。不過，在同一時期，她還大大增加其主要供國內日益擴大的市場的工業生產。實際上，加拿大現正經歷着美國五十年前經歷過的階段。她的廣大地域與豐富的自然物產，顯然還有容受更多人口的大涵容力。當其人口密度增加時，她對其自己原產物的消費將更多，而其原產物對於世界市場的依賴將更少。但她現在却正遭逢着若干困難情形：她的人口，尙不會增加到够為國內市場而促進各方面製造生產的

程度；同時，農業上的種種困難，又使其繼續爲輸出的小麥增加，耕地太不上算。特當前加拿大的農業，已經有一種由草原狀況下之小麥大量生產，移向比較雜植的農作——比較少受某一特殊商品之世界價格的影響——的趨勢。並且近幾年來，她還有一種爲刺激國內製造工業發達，而逐漸增高其輸入製造品關稅的趨勢。加拿大是以唯一輸出物——小麥——繫其繁昌運命於世界市場的一個顯著適例，但她同時却在藉着製造產額的擴增，而迅速向着工業與農業間之比較均衡的關係邁進。

比利時與瑞士 表中次於加拿大的國家是比利時。比利時是歐洲人口最密的工業區域。在百餘年前，她已經在專門爲世界市場從事低廉工業品的生產。其工資與生產費都低。這種條件，使比利時製造業者與其他較大工業國相競爭時，獲有一種利益。大戰以後，比利時的關稅領域，因盧森堡加入而頓形擴大。這種關稅領域的擴大，使她在鋼業生產的諸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主要輸入品爲食品原料，其輸出者爲製造品，就因此故，她一直是一個低關稅國家。她的較大得多的利益，顯然是在擴充她在世界貿易中的分額，而不

在使其在褊狹的領域內，努力求其更進一步的自足自給。就極端依賴世界市場之消費力而論，她與丹麥相似；但丹麥主要是輸出食品，輸入製造品，而比利時則恰好是正相反對的輸出製造品，輸入食品。

表上更次於比利時的瑞士，也是一個輸出製造品的國家，如鐘，如錶，如絲及人造絲，如若干種類的機械，乃至如罐頭牛奶和巧格力糖，都是她的主要輸出品。至其所輸入的品類，則主要為食品以及大部分應用於製造業上的原料。不過瑞士對外貿易的性質，特別使我們容易誤認其國際地位。她是一個多分要靠國際旅行者生活的國度；她由海外購買其所需物品的手段，大部分是由世界各國旅行者所支出。在瑞士的支付平衡上，此無形收入所占額數極大。假若我們把這些無形收入通通列入，則她在右表中所占的地位，甚且比她現在的地位還高。

澳洲 過了瑞士，就是澳洲。澳洲也是一個輸出食品原料，並主要輸入製造品的國家。不過，她努力用高率關稅保育其製造業，維持其人口之高的生活水準，在這點上，她甚至

比如加拿大還要利害。澳洲不像加拿大那樣依賴獨一商品的輸出。她最重要的輸出品，是原產羊毛，其次是頗不及羊毛重要的小麥，其小麥的輸出數量，因年成的變異，而逐年大不相同。至其輸入的製造品，則包括許多項目，就中以機械與其他金屬製品以及紡織物爲最重要。其國內工業生產費高昂，其國內市場亦因人口稀少而相對窄狹。就因此故，她就只能藉着極高關稅的手段，以發展龐雜的製造業。她的最低限度工資法，頗有助於其生產費的抬高。以短視的眼光看來，她彷彿是以更大的努力，集注在農業生產方面，較有利益。可是，這種見解的正確性，大抵要視其將來吸收人口的涵容力而定；而且這是一件極有疑問的事體。澳洲內地多半乾燥，即令能有有效的灌溉設備，亦祇適於集約的開發。其現有人口，多半住在邊海地域；而在此地域內，要爲雜多的大量廉價製造品發展充分廣闊的內地市場，實在頗不容易做到。有些人曾主張：如其澳洲經濟的發展能使其與十九世紀的美國以及今日的加拿大相比較，則其爲有效的經濟發展而開拓內地的問題，將不難解決。但這似乎是難令人相信的；並且，除非她能做到這種地步，她仍將不免要繼續依靠世界貿易——輸出食

品與農業原料；其關稅即令再高，亦還要輸入製造品。

英國 在表中數到第八位，就是英國對於英國，我們極容易把她看爲一個特別要由世界貿易維持其繁榮的國家，以致乍看到她每個國民之對外貿易價值，只當新西蘭每個國民的對外貿易價值的三分之二，及其每個國民所占輸出價值，還不及後者二分之一，我們一定感到驚異。此外，我們還得注意一點，英國也和荷蘭與瑞士的情形相同，其每個國民的輸入價值，遠較大於其輸出價值。此種情形，在瑞士是因爲靠着國際旅行者支出上之大量『無形輸出』（Invisible export）支持。而在英國與荷蘭，則主要因爲她們都是大債權國，她們在國際貿易上，還作着大規模的金融活動。而且，英國除此以外，並還有船舶服務所得的報酬，抵償其一大部分輸入差額。

然而，就在輸入方面，英國亦祇占在表中列入諸國中的第七位。就製造品的輸出者資格說，她不若比利時或瑞士的高度專門化；同時，她也不像那些專門爲世界市場從事原產食品與原料生產諸國之依賴輸入。她的輸入，自然主要是食品與原料；她是世界最大的食

品輸入者——她由海外購買食品的價值，還較多於德美兩國（她們是次於英國的最大輸入者）所購入食品價值之合計。在一九二八年，英國輸入食品值四六九、〇〇〇、〇〇〇鎊，同時德國值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美國值二〇二、〇〇〇、〇〇〇鎊。法國值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鎊。至英國所輸入的原料，則沒有如是之重要。其輸入價值遠不及美國之大，祇約與德國相當。但是，英國對於原料輸入，縱因輸入貿易減退而縮減其需要，在世界最大市場上，却常是佔着第二把交椅。在一九二八年，英國輸入原料所值爲三六三、〇〇〇、〇〇〇鎊，同時美國值四一八、〇〇〇、〇〇〇鎊，德國值三五四、〇〇〇、〇〇〇鎊。

英國不但輸入食品原料，且還是一大製造品輸入國；她所輸入的製造品額，除了足與其相伯仲的美國以外，實較其他任何國家爲大。但就其輸入的製造品與原料或食品比較，那却少得多了。在一九二八年，她輸入的製造品（包含半製造品）值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鎊，而美國所輸入則值二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德國值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鎊。

當我們從另一方面考核，我們將發覺英國是一個極不關重要的食品輸出者，在原料方面，亦祇有煤是重要的大量輸出品。她的主要輸出品，包括有各種製造品，就中，紡織品仍占着優越地位，其次是鐵、銅以及各種建造機具。英國除了主要賴遠東市場輸出其棉織物，且頗依賴煤的貿易外，她在大體上，是一個高度完成品與比較昂貴製品的輸出者，其中包括有船舶、鐵道材料與機械一類資本財。因此，英國的繁榮，乃極度依賴世界其他部分的繁榮；她的資本財在海外市場的銷售力，因全世界，特別因大英帝國領內的經濟發展步驟，而頗不相同。並且，其高度消費財的需要，亦要取決於全世界之生活水準的維持與改進。在這種意義上（非因其每個國民之輸出輸入額數較大於前述各國每個國民所輸出入的總數）英國乃為一最要依賴對外貿易與世界市場之涵容力的國家。

阿根廷

此外，我們沒有再按表一國一國數述下去的必要。我們祇要合理的選定若干國來較量一下就行。表中居第十位的阿根廷，主要是依靠輸出食品；在其輸出的食品

中，以肉類、小麥及玉蜀黍爲最關重要。至亞麻、生皮、原產羊毛，亦有大宗的輸出。她的輸入品，以製造品及石油爲大宗；爲助成其經濟發展計，她的輸入品中還包含有鐵道材料一類的大量資本財。在老早以前，英國就是以資本供阿根廷發展公共事業的主要供給者。阿根廷且靠英國爲其一大市場。這兩國經濟關係之過於密切，以致往往有人從經濟觀點上（非從政治觀上）把阿根廷看爲是大英帝國的屬領。這種事實（如我們後面要說及的），在英國財政制度上，特別是在對於保育帝國諸領地間貿易，或藉特惠關稅乃至『帝國自由貿易』（Empire Free Trade），使大英帝國形成一更密切體系的任何努力關係上，會引起重要的問題。

法國與德國 就每個國民之對外貿易額說，法國占第十一位，德國占第十二位；但德國因爲人口頗較稠密，她全國總合的對外貿易，自然要比法國大多了。法國的海外貿易，因大戰結束時所獲有的領域，而大增其重要；因爲戰前德國工業區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其中包括有洛林產銅區——都由此轉移到法國了。與前表所列各國比較起來，她算是

一個自給的國家，她遠不若英國或德國那樣的仰賴食品的輸入，但對於其國內缺乏的原料，她究非極大量的輸入不可。在一九二八年，法國輸入的原料，所值有其輸入製造品三倍之多，而輸入的食品，則約值其輸入製造品二倍半之多。在另一方面，她的輸出，主要為製造品，特別是如絲和精製棉織品毛織品一類奢侈品。但至現在，她又是一個鋼鐵、藥材、化學用品以及若干種用具與機械的重要輸出者。她因曾獲得有新領域的工業機構，已不復能如戰前那樣不需要外國市場。不過，在她的新國境之內，她究比較英國德國具有使自己自給自足的較大能力。

經過戰時破壞與戰爭結束時喪失領土的德國，其經濟體制根本引起混亂。新國境完全是由其極重要的工業區分割出來；洛林之鐵，與魯爾之煤，截成兩半；而德國與波蘭的新國境，則又是穿過她比較次要的工業區域中心。這些損失，迫着她不能不澈底改造其整個經濟組織。她再已不能重新獲得其戰前在世界市場上之輸出者的地位。然而，藉着美國資本推行的合理化手段，她已由英勇的努力，把她墜落萬丈的地位，重新抬高起來。特別是在

過去數年間，她曾聚精會神的擴增其輸出，同時，爲要抵償和平條約課加的賠款重擔，及戰後迫而拉借的大量債款的利息，她更拚命減縮其輸入。德國如同英國一樣的不是重要的食品輸出者。在最近不況以前，她輸入食品價值，計超過其輸出食品價值六倍以上。至其輸出，係以製造品爲大宗，在此次不況以前，其輸出製造品額數，約與美國相等，但仍遠不及英國。不過，假如她要輸入大量的原料，如鐵及其他礦物，如銅，如原產羊毛、棉花、木材以及熱帶物品等等，她對於輸出，亦祇能達到這種程度。除以上諸種輸入品外，她還須輸入大量食品，其中包括有小麥、大麥、玉蜀黍、水菓、咖啡。在過去若干年間，她曾努力藉出超額支償賠款與外債利息，這種種努力，要不外是拼命壓低人民生活水準，以縮減其輸入。在當前情況之下，德國只能藉着極端縮減輸入的方策，和在國內抬高製造品價格，使製造品向外人廉價投銷，以刺激輸出貿易的方策，使其國際支付（包括着外債利息與賠款）維持平衡，但是，由這種種方法維持的平衡，亦還只能行於短的期間。要使其支持相當長的時期，那自始就能預知其沒有可能。並且，在推行這些人爲方策當中，當然不免要破棄信義，以及在德國一般

人民間造成極不安定的或異常失望的心情。

美國 在表上再數下去，數到第十四位就是美國。美國除了黑人及南部少數貧窮白人外，其全國各階級人民的生活水準，幾乎皆在世界上立於最高地位；在現在乃至在此次世界不況以前，這儘管都是事實，但美國的輸出輸入價值，却比較其國內生產價值爲小。她有廣土衆民，大可自己供給。她能由自己的富源，生產其所需的大部分食品與原料。同時，其遼闊的國內市場，又使其供國內用途的大量生產，幾乎能有效的應用到製造品的全領域。在世界貿易上，美國自然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她是世界最大的原料輸出者。並且，儘管她自國人民的消費力在迅速增加，其食品的輸出，仍頗有可觀。在另一方面，她國內的資源儘管豐富，她却又是世界最大的原料輸入者。她吸收有大量的生絲，原產橡皮，製紙軟木，苧麻，銅，錫，皮革，咖啡，原糖，以及其他特種食品。她輸入的原料，足與其輸入的製品與食物兩者相當。因此，美國對於那些專門生產美國國內缺少的物品的國家，爲一極其重要的市場。日本的絲，馬來及荷屬東印度的橡皮，都是以美國爲其主要市場。以食品輸出者的資格而論，美

國誠然是減少其重要性了。但對於原料的輸出與輸入，仍都是極關重要。棉花是她最重要一種輸出品，在一九二八年，幾占其總輸出價值的五分之一。次於棉花的最重要輸出品，爲摩托車、提煉汽油等等。在同一年度，原料占總輸出百分之三八又二分之一，製造品則占百分之三七又二分之一。兩者的價值，合計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以上。就每個國民之輸出入概數立論，美國的對外貿易，雖然是相對的少額，但她並非可以放棄世界市場，其內國經濟體制，並非不受世界不況的影響。她誠然不像世界其他主要各國一樣的依賴外國貿易，但如說到經濟孤立，或建立國內繁榮，而不關懷世界其餘各地狀況，那就簡直無異一種危險的胡說。

就前表所列各國的順序言，次於美國的是意大利，再次是日本，又再次是波蘭。此後我不想一一數述。因爲我那個表，並不會包括一切國家，而祇是包括着那些在貿易情形上表現有某種值得評述之特點的國家。最後三個國家，如印度、蘇俄和中國之列入，蓋取其可與他國相對照，並非因爲要按照順序排列起來。

遠東 就中國與印度的龐大人口而論，其對外貿易是頗不足觀的。中國每個國民之輸出入貿易總額，不够新西蘭同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在印度，則不够後者五十分之一。這原因，一部分是由於這兩個國家仍有最大一部分是未發達的農民社會，其居民皆係依靠衣食所資的農業，過着低水準的生活。她們的人口稠密，其土地則碎分為小的租地，全國有最大多數的人民，是由此勉強維持其生存。在上海與孟買，聽說製造業方面的工廠制度，近來頗稱發達；並且西方諸國的貿易方法及交通設備，亦在遠東大有進步。但這諸般事體，僅只觸着印度及中國經濟制度的邊緣。設就人口數量的比例上立論，在遠東方面，只有四個國家對於世界市場的生產，有了相當的發達。那四個國家是：專門生產橡皮的馬來與荷屬東印度，大規模植茶的錫蘭，以及最稱發達的日本。但，那怕就是日本罷，無論其怎樣努力，採行西方的技術，和使其國內的機械生產普遍化，她仍要依賴生絲的輸出，並且，大體上，她仍是像中國與印度一樣從事小農經營的農業國，其國內一般人民，則靠着這種農產物及當作其副業之蠶絲業的收穫，以度其極低水準的生活。

波蘭與中歐

波蘭之重要性及其在表中所占的地位，主要是由於她在大戰結束時，由德國取得了已經發達的工業區域。她的特別重要輸出品爲農產物及西勒西亞煤區（Silesian coal field）出產之煤。至於其他工業，那都在世界市場上比較無關重要。

除煤與鋅而外，其主要的輸出品爲木材、豬、雞蛋、糖以及其他的食品與半製品。至她的主要輸入品，則是棉花一類的原料，製造品，特別是機械。她在世界貿易上的重要性，就因其爲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國乃至英國工業的市場。假如東歐南歐的貿易情形能够使波蘭及其隣國得專門從事彼此最適宜的生產物的生產，而不相互以高率關稅使彼此的生產費抬高到不必要的高度，那波蘭將來的發展，顯然是大有可觀的。當前的不況，使農產品輸出國的波蘭蒙受了難堪的打擊。她要發展工業，又極度缺乏資本。而她在政治上的地位，復又動搖不定，假如她對於蘇俄，乃至對於其隣近小國，仍繼續維持其不愉快的關係，她這種地位，一定是要照樣延續下去的。

蘇俄 最後，我要述及蘇俄。在一九二八年，蘇俄每個國民之對外貿易額，與印度每

個國民之對外貿易額不相上下。自這時以後，蘇俄之國內生產與輸出貿易，實均有顯著增加；而這後者的增加，又開始使俄國得重新確立其舊來所保持的歐洲倉庫的權益。今日的俄國（亦如戰前的俄國）是食物與原料，尤其是小麥、木材、煤油以及苧麻的輸出者。她在五年計劃下發展其製造業生產的強烈努力，必然要使其由海外購買大量農業上的工業上的機械和運輸材料。不過，當前的俄國，却在以驚人的努力，使其國家在可能範圍內達到自足自給；就是對於那些需要最高度生產技術的工業亦是如此。假如她在國內能找到必需的有管理效率與工廠訓練的人材，以她那樣繁多而且在不絕迅速增加的人口，更益以她境內那樣豐富的自然富源，她要做到比美國還能自給自足的地步，那顯然大有可能；因為她的氣候，她的原料生產力，較之美國還要龐雜哩。蘇俄的市場如能發展起來，其闊大的程度，幾乎够使其製造業的每個部門，極頂的專門化。而且，在某一個時期內，她爲了償付其必需的輸入，雖然要努力擴張其小麥、木材及油的輸出的剩餘，但我們敢斷言，她此後定會使其生產的任何限度的小麥與油，有更大部分供國內消費，並且，在不久的將來，她的製造

品輸出者的地位，將比其原料輸出者的地位更爲重要。不過，她這種景況是否能夠達到，主要要看世界其餘一切國家對於她的態度如何。現在任何形式的抵制，或充分信用供給的拒絕，都將加強其儘可能的謀國內自給自足的傾向，並使其由縮減製造品的輸入，以縮減其爲償付輸入而必須成就的輸出。在後面，我們將把這與世界其餘各國相關聯的蘇俄的全般景象，加以比較詳細的觀察。我們在這裏所要注意的，只是蘇俄眼前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地位，顯然與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與生產力，不成比例。她的孤立，係由世界大戰與革命所造成。她這種孤立狀況將繼續下去，抑是爲了彼此兩方的利益，在她與其他諸國之間進行大規模的商品交換，那是取決於她，同時也取決於其他各國。我們不妨這樣說，世界其餘各國需要蘇俄的市場，遠較——或者蘇俄的孤立在最近將來還繼續的話——蘇俄需要她們的市場爲利害。最近還協同聯合抵制蘇俄貿易的人，試對這種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加以注意、考究和體驗吧！

第二節 世界貿易概況

上面是關於世界主要各國對外貿易地位的一般觀察；由此考察，我們發覺了若干顯著的對照的事實。各國依賴輸出輸入的程度，不但非常相異，即此依賴的性質，亦顯有差別。有些國家專門從事輸出的製品的生產，有些國家專門從事輸出的食品與原料的生產，還有些國家則同時兼為原產物與製造品的重要輸出者。至關於輸出製造業上所需的原料，有的國家有一大部分是由自國境內取得供給，同時其他國家則須大量輸入。此外，有的國家將接近所謂『平衡的』經濟（balanced economy）——就是，其人民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分配，差不多達到了自給自足的程度——而其他的國家，則或須輸入極大量的食品，或則十分之八九要仰賴海外生產的製造品。一般的說來，在從事輸出製造品生產的諸國中，有的國家生產有種類繁多的商品，她們並非主要的或完全的要仰賴某幾種商品的市場。同時，在主要為食品與原料生產者的諸國中，有的國家則要大大仰賴某一種商品

(如小麥，或橡皮，或茶)的市場，從而，她們所須輸出的某一商品及其需要購買的諸多商品的相對價格水準如有所動搖，她們的經濟制度，就特別容易受到攪擾。不過，在其他許多國家，雖亦專為原產物的生產者，但她們並不以同一程度依賴某一兩種商品的市場。像這樣的國家，即今在世界全般貿易不況的當中，要與其他一切國家蒙受其影響，可是，對於與她們有關的特別市場發生變動，她們却是處在比較容易應付的地位。

我們這種考察所顯示我們的世界，是在分工在若干場合已達到極限的各國之間，對於相互交換貨品，已頗有組織的世界。但我們如把戰前貿易與戰後貿易一加比較，我們立即就會感到，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經濟關係上已經發生了若干變動，海外貿易的貨物總量，乃至那些貨物的總價值，此後確曾有所增加，或許說，曾一直增加到世界不況為止。但這種增加，顯然不會與世界經濟生產力上的進步保持一致。我們很可這樣說，在大戰以後，世界各國至少都有變成更自給自足的趨勢；她們不像從前那樣仰賴海外商品的輸入，從而，也不像從前那樣要為償付輸入而仰賴商品的輸出。

各國輸出輸入價值在世界不況中跌落的百分率

輸入——價值跌落的百分率（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

超過百分之七〇 澳洲。

超過百分之五〇 美國，加拿大，德國，西班牙，（金價值）芬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波蘭，土耳其，智利。

超過百分之四〇 意，匈，奧，羅，保，捷克，希臘，阿根廷，巴西，埃及，印度，錫蘭，日本，馬來，新西蘭。

超過百分之三〇 荷，比，葡，南斯拉夫，南非。

超過百分之二五 英國，法國。

超過百分之二〇 挪威。

超過百分之一五 瑞典，丹麥，瑞士，愛爾蘭。

不及百分之一五 立陶宛。

注意：其在蘇俄，則曾有百分之二七（金盧布）的增加。

輸出——價值跌落的百分率（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

超過百分之六〇 智利。

超過百分之五〇 美國，西班牙（金價值），馬來，南非。

超過百分之四〇 英國，加拿大，澳洲，印度，錫蘭，日本，匈牙利，奧國，希臘，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埃及。

超過百分之三〇 法，意，瑞典，挪威，芬蘭，荷蘭，波蘭，南斯拉夫，瑞士，捷克，阿根廷，新西蘭。

超過百分之二五 德，比，荷。

超過百分之二〇 丹麥，羅馬尼亞，愛爾蘭。

超過百分之一五 立陶宛，土耳其。

不及百分之一五 俄國，比利時，巴西。

世界主要各國輸出輸入噸數在世界不況中減縮的百分率（一九二九—一九三二）

國別	輸入		輸出
	噸	五	
德國	三九	五	

芬 蘭	波 蘭	希 臘	土 耳 其	羅 馬 尼 亞	南 斯 拉 夫	匈 牙 利	奧 國	捷 克	瑞 士	意 大 利	荷 蘭	比 利 時	法 國
二二	四二	八	五一	四八	三二	五〇	二二	一七	(十)四	二三	三	一四	二
二六	一一	二一	(十三)二	(十四)二	三八	三二	三八	四四	三三	一二	(十三)	五	二四

愛沙尼亞	二六	八
拉特尼亞	三三	四二
立陶宛	五	三五
阿根廷	三二	(十一)
巴西	四二	(十二)
日本	一四	一五
新西蘭	三三	二〇

國家自給自足趨勢

各國都要求自給自足的趨勢，是怎樣發生的呢？那有一部分很可看作是由於自然，同時在其他方面，則又確係由於人為；從世界生產力的觀點看來，且是由於浪費與不經濟。按照前一種解釋，那是以前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諸國度之經濟資源發達的結果。在時間的推移上，像印度與中國一類國家之不欲依賴西方諸國輸入的大宗製造品，而努力在國內採行西方的生產方法，那寧可說是十分自然的事。加爾各答、孟買、

上海，乃至日本的中心工業區域，自然會爲了供給遠東諸國市場，而在某種限度發展其紡織工廠工業。至歐洲在戰時對於遠東市場供給的中斷，那無疑加速促進了遠東的工業化。不過，遠東工業發展的程序，係開始於大戰以前，在任何場合，差不多都顯示其突飛猛進。現代更有自動機能的動力機械，極適於那些遠較歐美勞動——已長久嫻習於工業生產方法——缺乏技能的勞動。在某一個時候，蘭開夏紡織工業，定然要喪失其在遠東市場的實質獨占，早前曾開始於加爾各答之製麻工廠的競爭，定然要一樣延及紡紗與比較低廉和比較容易製造的布疋方面。至亞洲一向棄置不用的鐵和煤的資源之將進行開採，及遠東金屬工業之將起而與西方既成的同一工業競爭，那都是必然無可避免的事。不錯，金屬品的製造，包含有一大部分不能由機械代替的技術工作，從而，遠東在金屬業上的競爭，就不免要比在紡紗業和織布業上遭遇着更大的困難。但在鐵路材料與重鋼鐵業方面，她們顯然有爲供給擴大的地方市場，而發展地方工業的機會。

這種情形，自然不一定就是說，她們的輸入需要，會怎樣積極的縮減。因爲，我們很可這

樣假定，遠東進行工業化，勢將提高生活水準，擴增遠東市場的總消費力。即使遠東諸國能為她們自己生產較多的貨品，進一步採用現代的動力生產方法，她們消費總量的增加，也許會維持甚至相當增加其輸入需要。但在此種情形下，她們對於西方貨品的需要的性質，是不免有所改變的。她們此後會少購買較廉價的消費財，和較容易製造的資本財，而在另一方面，則將增加其對於比較複雜的機械和工業固定設備的需要；並且，生活水準提高，那些比較精良的製品——即西方社會在相當時期內還維持着其生產上之優越性的諸般製品——的需要，亦或可以增大。遠東財富如其已經增加到了相當滿意的程度，西方諸國祇須使其輸出貿易組織適於新種類的生產品的供給，但決不用擔心遠東對於西方貨品總需要的縮減。

遠東的市場 遠東的消費力，無疑是有所增加的。但其工業化的程度，却還不够在遠東諸國——日本除外，剛在世界大戰後若干年間，日本人民的生活程度，無疑有相當的增進——一般人民的經濟地位上，引起何等的影響。加之，遠東諸國既然依舊是主要靠輸

出原產物，以購買西方的貨品，故深刻打擊這諸般原產物價格的世界不況，遂使她們逢到意外難堪的困難。其在中國，則更因銀價的慘落，使其購買力進一步低減。因此，對於遠東市場逐漸擴張的合理期望，莫由實現，而在較精良製品與生產工具上之需要的增加，尙不够抵補其在較低廉較簡單產品上之需要的減退。歐美諸國視爲最關重要的事體，莫過於亞洲生活水準的提高。她們的利益，不在爲維繫其現有市場，使東方的生活水準降低，却在爲擴張其較精良的高級產品的需要，而極力助成遠東經濟的發展。遠東諸國經濟發展，雖然不免要減少其對於現在輸入製品的依賴性，但她們的總需要的增加，却够使比較進步的工業國家從另一方面得到利益。

至當前進一步壓縮遠東諸國需要的原因，自然是她們近年政治情形的動搖不定。中國曾繼續爲內戰所蹂躪。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更使西方資本家懷疑亞洲投資的安定，因而阻滯其工業的發展。不過，至少就印度而論，其政治的原因，究沒有其經濟的原因重要。經濟的國家主義之界限，因此，遠東諸國製造業的發展，蓋爲一頗自然與必然的

事體——亦正猶如今日蘇俄迅速工業化之出於自然與必然一樣。至由和平條約造出的若干新國家——例如波蘭——之企圖創建新工業以發展其國內的經濟資源，那亦不能謂非自然的要求。在相當限度內，這種經濟的國家主義，寧爲我們所期望，實用不着憂慮；因爲政治境界既在和平條約下重新區劃，則依此新政治境界所形成的經濟領域，自然不免有所更張。不論在什麼地方，凡屬努力求其設立或發展的新工業，都自然而然的期望其在進行上合乎經濟的條件。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限制；因爲世界不同的地域，顯然對不同的製造業具有極其不同的適合性，今日許多工業上的生產，只有極大規模的進行才能談到經濟。一個小國要爲其窄狹的國內市場發展廣泛的製造業生產，那顯然無經濟之可言；要在小國發展工業，須得那種工業具有兩個條件，其一是能够小規模的有效的進行，其一是極有效率，使其能在輸出市場上爭取一個貿易分額。若果一種工業的創立，僅爲保持住國內市場，還要靠經常的關稅保護，或其他限制外國貨品的方策，那就顯然是徒勞無功。在一切其他情形不變的限內，一國愈小，她所能發展的工業範圍愈狹。歐洲有許多較小的國家，

無疑都創設了遠較其力能有效支持以上的許多工業。其結果是極力抬高關稅，與採行一切可以限制輸入的方策，由是，諸隣國間的貿易，慘遭限制，而其製造品的生產費，乃引起毫不必要的提高。

此種情形，並不限於由和平條約創出的新國家，就是其他的小國家，亦是如此。因為當大戰的時候，大多數國家之製造品輸入的正常供給，都因諸大製造國之軍需生產的優先關係與實際的戰爭行動，而嚴重的受到了阻害。在此種情形下，她們乃迫而在自己國內建立那些在平時不會有建立機會的工業。但無論在任何國家，其工業一經建立，就會成爲一種既定的利益；大多數工人的生活，以及一些投資者的資本，都會賴以維繫。因此，假如有人提議，說這種工業不經濟，說這種工業應當在海外正常供給恢復時，即行停止，那一定會惹起那些與此工業有關的人們的反對，他們並會狂呼大叫的要求保護。在此情形下，利害與共的全體工業家們將由團結一致的要求，取得新形式的保護，或增強其既有的保護。多方保護的結果，這些國家的人民，勢必要對於那些非多方保護不能圖存的工業的產品，支付

較大於其必需支付的代價。也許說，在避免這些工業停止所惹起的經濟攪擾的限內，這所支付的代價，並不算頂大；但是，本來為保存不經濟工業而設定的關稅，在世界貿易不況的時候，特別要成為危險的工具。不況愈形增加，那些向來供給較小國家市場的較大國家，將愈會感到處置其產品的困難。她們為要突破那種防阻其侵入的關稅壁壘，使其產品得重復衝進保護的市場，乃極力削減其價格；這時，較小國家更抬高其關稅以資報復，而較大國家則進一步訴之於『輸出的傾銷』(export dumping)。這一來，在開始看似一種適當程度的保護，當其一用作阻止世界貿易不況的結果時，馬上就要變為不適當了。歐洲關稅水準之所以尖銳提高，以及其近年之所以為救關稅之窮而採行一切限制輸入的手段，這是主要原因之一。然其終局結果，不外是使全歐幾千萬幾百萬的消費者，竟要為某些製造品支付一種大大超過其生產費用——即那些製造品在全歐組成一個經濟單位的狀況下所需支出的生產費用——的價格。

國際競爭的增長 由是，我們知道，一方面有遠東諸國之工業化，另一方面則有歐

洲諸小國之進行過廣泛的製造工業的努力。在此兩極端之間，還有許多比較多滋論辯的變動，出現於世界之國際的經濟構造中。我們講過，在十九世紀大部分時期中，英國對於她所專門生產的各種各類的高級製造品，差不多是獨占世界市場。十九世紀的經濟學者，把這種情形解作是英國對於紡織物、鋼鐵、機械、船舶以及其他大宗輸出的物品的生產享有——一種特別利益。他們不知道這種利益，僅僅是由於英國在這些生產領域的捷足先登，由於其一時具有較高的專門的與製造的技能，且由於其因此享有高利潤——供其工業發展以充分新資本的高利潤的利益。當新的國家，一部分利用自有資源，一部分借用外資，而加緊模仿英國這種生產技術時，英國向所獨享的這諸般利益，乃逐漸消失；而這諸般利益，大體上不是基因於英國自然條件之優越，而是基因於其首先成就產業革命的事實，亦遂昭然若揭。加之，我們已經講過，機械技術改進，專門的技巧，愈益由人類活動移轉到了機械；由是，現代最生產的方法，就愈容易學習，愈容易適應於任何特定國家的環境。而現代機械技術的結果，乃漸知其非如十九世紀經濟學者曾經相信的那樣，即不是在每個國家的不同

工業範圍內，發展其效率，而寧是在經濟資源增加的一切國家，發展那種大體同一型的生產。每個新國家的工業一有進步，她就不但會依現代工廠制度從事紡織物——特別是毛織物的生產，同時且會從事鋼鐵的製造，從事機械工業，造船業，乃至生產電氣及其他依賴鋼鐵生產進步的諸般物品。

這些發展，遲早都不免要給予英國獨占以致命打擊。不但如此，那並且還會使那些比英國有較大市場的國家，獲有若干積極的利益。美國重工業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之驚人的發展，那是極顯而易見的事；德國的發展情形，亦可在某種限度說明此點；而更使我們清楚此種事實的，則是現在正在進行過程中的蘇俄的工業化。

在世界諸大製造國中，這無疑是說明其在製造品——包括有生產財與消費財——生產上之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但在那些企圖發展自己製造工業，同時對於特種製造業又不曾具有特別優點的較小國家，則情形極不相同。這些國家除了在某幾種工業上還能有利的進行小規模的生產而外，她們在全工業領域內，實處於不利的地位。不錯，她們可以

藉提高關稅的手段，保護其工業，但工業縱由此得到保護，本國消費者却要大受犧牲。而在那些大國則不然，她們所要發展的，不是補助工業，而是每個國家在其國境內所企圖發展的同一工業，她們爲要確保其最低可能的生產費，都在可能範圍內作最大規模的生產。因此，她們相互間爭取那些尙維持着門戶開放市場中之分額的競爭，乃愈演愈烈。而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產生，差不多就是她們在這些市場上之利益衝突的必然結果。

大經濟單位之必需

然而，較大國家在生產費的關係上，顯明占有頗大利益；以現代生產方法而論，諸小國在其國境四周設起高的關稅壁壘，那顯然不僅自身蒙受不利，且將形成世界的妨礙。假若較大諸國之利益所在，就是存於現代生產技術所提供的實惠，那經濟單位誠有形成極大之必要。但世界還不曾發現一種方法，由更大規模交易之自由領域的維持，以融和其區劃極小的政治單位。歐洲如其要獲得其潛在生產力所能提供的充分利益，要就是把現存的諸小國治合爲較大的政治單位，否則就須她們自己在貨物自由通過國境的貿易基礎上，結成較大的經濟單位。如謂這些較大經濟單位的結成，將予健全

的政治國家主義以妨礙，並以爲這種妨礙的程度會較甚於美國聯邦制度下，或蘇俄聯邦制度下諸邦之干涉其廣大領域的工業發展自由，那是沒有理由的。

經濟單位較大，世界對於其控有的豐富生產資源之充分利用，將遠較今日爲自由。但這些較大生產單位之間的經濟關係的調整，仍將成爲問題。在世界諸大製造國家之間，將來似乎不免要在總生產額的比例上，減少其貨物交易——這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每個大經濟單位，勢必要在相對意義上，更較以前爲自給自足。並且，這些大單位間的交易，將以專精的製品與勤務爲較多，以任何集體都能同樣製造的標準工業品爲較少。我的意思，不是說在諸大製造國間大宗商品相互交換將會中止，而祇是說將相對的變爲更不重要了。但是，那些主要非輸出製品而是輸出食品與原料的國家，該會怎樣呢？在這種情形下，她們對於那些大製造國的關係，又該會怎樣呢？大體上，這類國家會變成兩組，一組是在不久的將來能發展她自己的大規模的製造業，另一組則似乎仍要在一個長期內繼續從事原生物的生產。加拿大顯然是屬於前者，馬來與荷屬東印度則顯然是屬於後者。至若澳洲

或阿根廷與巴西將來的經濟，却頗難預爲斷定。澳洲要求各方面工業的高度發展，其所備條件實相對的貧弱。她所處的地位過於僻遠，其國內市場過於窄狹。她要發展其工業，只有藉着那種會嚴重增加其人民生活費的高關稅壁壘的保障。至於南美，她却顯然有更大經濟發展的可能。但她畢竟缺乏歐洲與美國賴以建立其製造業優勢之煤與鐵的來源。以紡織物生產者的資格而論，南美也許會變爲更重要，與更能自給自足，且將輸出更多的半製的原產物。但是，對於煤與鐵，乃至對於需要煤鐵之地方供給的那類生產上的許多資本財，她仍非繼續依賴世界其他部分不可。

世界的公開市場 這事實，指示了美國輸出者與歐洲特別是英國輸出者，有在南美市場上發生更嚴重競爭的可能。因爲南美是一個最富有潛力的市場，那對於各國重工業製品的輸出，仍是門戶開放。至於在長期內，大體還會保持着熱帶原產品輸出者地位的非洲，那在過去半世紀中，曾爲歐洲諸國之帝國主義抗爭的舞台，她們在那裏的衝突，曾經達於極點。在一八八〇年，歐洲人在非洲經略的土地，除南部外，其餘都不過只是在環海岸

一帶，作成其居留地域；但在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的當中，整個非洲，實際都爲歐洲諸國所瓜分。這種瓜分的經濟結果，大抵都很令人感到不能滿意。非洲在世界對外貿易的總額中，只占有極小的部分——在一九一三年還不到百分之五，同時其生產額，則只占有世界食品與原料總生產額的百分之三。不過，非洲顯然具有經濟發展的極大可能性。世界生活水準一經抬高，熱帶產物的需要，當然會極迅速的增加。在今後數十年間，非洲說不定要成爲世界發展諸國之消費財與生產財之更重要市場。那在當前雖然不會剩下可資吞併的土地，帝國主義者們的抗爭，似乎還會繼續；並且，同洲各不同部分之發展，與其說是願應她們自己的需要與能力，却毋寧說是爲了統治她們的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

因此，世界主要諸大發展的經濟單位——她們每個單位都大體具有同一廣泛範圍的製造工業，且都渴望在它們體系之外，找得處分其剩餘生產品與消費品的市場——的成長，勢將不免以更大的威脅，使那導來一九一四年戰爭之帝國主義抗爭永久化。在這諸般情勢之下，諸大帝國主義集團必須互相締結條約，或永久感着戰爭的威脅，又或改變其

地位，不復爲威脅世界和平的帝國主義者。在世界這幾種前途命運的決定上，英、美、蘇俄三國最有發言權。把蘇俄除外的歐洲大陸，假如能化除內部的衝突，實現白里安（Blair）的歐洲聯邦之夢，她實在不弱於這三個國家；但經濟上的理由，無論怎樣要求統一，而歐洲統一的局面，一時尚沒有端緒。自相分裂火併的歐洲，自然不會成爲促進世界問題解決的勢力，反之，她却會使世界永久陷入紛擾狀態，致世界問題莫由解決。

第三節 大英帝國

在世界問題中，擁有世界各地殖民地的英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年英國各方議論紛紛，以爲在大英帝國領內，當組成一個經濟單位，由是英國在經濟上，離世界其餘部分而獨立，那一來，歐洲的擾亂與災難，或帝國以外市場之喪失的威脅，英國都可處在漠不關懷的地位。但是這種經濟的統一的見解，實際是最沒有實現之可能的，卽令實現，其成功將給予世界以破壞的影響。

在統一可能性的考察上，大英帝國除了大不列顛本土以外，會分爲三個主要集體，即大自治領（the great self governing dominions）、印度及殖民領地（the crown colonies）與附屬地。關於帝國經濟統一的討論，通常多半是集中於大不列顛與大自治領之間的關係上，但有時也把大不列顛與大殖民地及附屬地之間的關係加以考慮。至於印度的地位，則殊少論及。我們現在試把經濟統一對於這幾個部分的影響，略加討論。

大不列顛與大自治領間之經濟密切統一的基本見解，大體是基於帝國自由貿易；而對於這種見解的鼓吹，則是出自大不列顛方面，自治領幾乎毫無表示。大不列顛方面的鼓吹者，曾預先見到自治領市場之極大發展的可能性，他們以爲那種市場發展起來，將來可爲其全部待輸出的剩餘製品提供充分的銷路。他們曾把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國家的地域，與自治領的地域比較，由是作出帝國諸邦之可能人口的幻想之圖，並由是斷定加拿大與澳洲的人口，將來亦可增加到歐洲最稠密人口諸國的限度。此種廣大的與稠密人口的地域，他們以爲將來仍會繼續專門生產大不列顛所需的原產物，並甘願由大不列顛取得其

大部分製品的供給。然而，我們可以預作斷言的，却是這樣：假若自治領的人口真能繁殖到這裏所提示的限度，它們同時也就能在相應的規模上，發展它們自己的製造工業。在一切自治領中，加拿大最有能力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無奈它的製造工業已發展到了相當程度。我們如其假定，像加拿大這樣一個企圖依高關稅發展其像美國一樣的平衡經濟制度的國家，竟願意拋棄其關稅，以便讓英國貨自由輸入，那實是一種幻想。不錯，假若英國能提供她一種滿意的等價物（*quid pro quo*），她也許願意予英國貨以較大於現在關稅特惠，甚或在若干特定場合參加大批購買英國煤乃至英國鋼的協定。但像這樣增加的特惠，與其說是得自減低英國輸入品關稅，却毋寧說是得自進一步提高外國輸入品關稅；並且，凡屬足以阻礙加拿大工業之可能迅速發展的條件，加拿大都會不肯予以同意的。若在澳洲，英國也許可以期望其有略減現行特高關稅的可能，因為澳洲對於增加其人口，擴大其工業生產範圍，乃處在比較不利的地位。但那怕就在澳洲方面吧，若希望其讓英國貨自由輸入，或希望其為給予英國貨以較大特惠，而使她自己的工業發展受到阻害，那也是幻想哩。

英國美國在二九一九年的輸入輸出

(其來源及其目的地之分類)

英國 (單位百萬鎊)

輸入

來自歐洲四三七·五

來自亞洲五〇·二

來自非洲三四·五

來自美洲三三六·七

來自自治領二二·一

來自印度六三·八

來自帝國其餘部分七四·九

由帝國各地輸入者二九·五%

由外國輸入者七〇·五%

輸入

來自歐洲四三三

來自亞洲三八〇

來自非洲一〇九

來自美洲一六三·一

來自澳洲一六三·一

美國 (單位百萬金元)

輸出

輸往歐洲二二·三

輸往亞洲四八·〇

輸往非洲二六·四

輸往美洲二九·〇

輸往自治領一八〇·一

輸往印度七八·二

輸往帝國其餘部分三〇·〇

輸往帝國各地者四四·五%

輸往外國者五五·五%

輸出

輸往歐洲二三四·一

輸往亞洲六四三

輸往非洲一三一

輸往美洲一九三·四

帝國能否形成一個經濟單位 自治領無疑要發展它們自己的工業，在達成這個目的的必要限內，它們將不惜像排斥外國貨一樣的排斥英國貨。英國決無法對它們提供任何足以改變它們這種意嚮的條件。這裏有一件顯然表示帝國自給自足決行不通的簡單事例。英國現在每年約輸入五百五十萬噸小麥。她的小麥需要，不但不會增加，似乎還有減落趨勢，因為在比較進步的國家中，每個人民的小麥消費，照例是有減無增的。英國即使不向自治領以外的一切國家——即不從其現在小麥之主要供給者阿根廷或俄國——輸入小麥，她也不能吸收其自治領在歉收年度所能輸出的剩餘小麥。若當豐年，恐怕連加拿大與澳洲兩個地方的小麥輸出量，她還不够消容一半。因此，帝國諸邦即使取得了大不列顛之小麥供給的獨占，她們猶須向那些吸收阿根廷、俄國乃至其他為大不列顛拒絕購買的諸國之小麥的海外市場，處分其大部分的產品。假若大不列顛是以一種合理的市場價格——即是世界價格——向其自治領購買小麥，我們就無從發現其自治領的生產者，究由此種交易得到了何等利益。他們誠然在若干市場上取得有一部分優先供給的好處，

但他們對於其餘待處分的產品，至少仍須在外國市場上作同一強烈程度的競爭。顯然的，我們沒有理由作這種假定，說大不列顛市場的獨占，能使其自治領的生產者得有利的生產較現在為多的小麥；或者說，自治領政府如打算允許大不列顛工業家以一大特惠，他們就能由大不列顛獲得何等利益。

不錯，大不列顛如其除同意由自治領購買其全部小麥外，且允許以較大於世界價格的價格購買，由是給予自治領生產者一種類似現在大不列顛小麥生產者所獲得的補助金，那自治領也許會給予大不列顛工業家一種等價物。但不論那種形式的等價物，結局都會由大不列顛的消費者支出。補助大不列顛的小麥生產者，因為國內生產的小麥，祇占其總供給額的一小部分，故在一般生活費上不致有何等大的影響；但這種補助金一推行到大不列顛所消費的全部小麥，其結果就完全兩樣。並且大不列顛的選民，對於這件事會怎樣熱心，我們也難於逆睹。

證示帝國自給自足觀念的荒謬，小麥無疑是一個極端的例。但其實還有判定此種觀

念荒謬的其他理由在。在世界不況以前數年間，英國自治領之對外貿易總價值會大大增加。自治領在極窄狹範圍內之主要商品生產增加起來，她們將在外國市場上出賣其產額多，在大不列顛市場上出賣其產額少，那是極其自然的事。大不列顛的輸出者在戰後是比較其戰前要更依賴帝國市場的。但自治領的輸出者却在逐漸增加其對於外國消費者的販賣。因此，凡屬阻礙自治領購買外國貨物，由是危及其擴充外國市場貿易的計劃，她們都是很難贊許的。

自然，英國諸自治領與大不列顛的經濟的密切關聯，今日頗有不同。澳洲由大不列顛輸入的比例，遠較加拿大為高，加拿大因鄰近美國，與美國結有極密切的經濟關係。新西蘭在食品輸出上，多半是依賴英國市場，她所購買的貨物，亦實在是由英國供給極大的部分。在新西蘭的這種情形下，所謂帝國自由貿易，也許可能，但這大體是既成事實哩！若謂行於新西蘭者亦能同樣行於加拿大，那顯然是錯誤，因為加拿大不僅有進一步發展其工業的必然要求，同時且與美國結有密切的經濟關係。

印度

然則在大英帝國中占着第二集團地位，擁有遠多於帝國其他一切地方人口之合計的廣大人口的印度，該是怎樣呢？在通常的年度，大不列顛所買印度貨物，還不到印度總輸出的四分之一。英國的輸出，誠然形成了印度輸入的較高得多的比例，但大不列顛顯然不能爲印度必須輸出的大部分貨物提供市場。印度現在乃至將來的市場，仍將逐漸移向遠東方面。她與大不列顛結成排外的貿易關係，以致危害其與中國、日本乃至其他亞洲諸國的貿易發展，那顯然非她的利益。在相當時期之內，大不列顛誠然還會控制着印度政府，但即使如此，印度政府決不能冒險強行一種基於帝國孤立的經濟政策。不論蘭開夏的紡織工業怎樣反對，印度政府還不能不對英國棉織物課加一種關稅，並且，印度今日之依賴英國輸出的程度，還不及其過去哩。在此種情形下，想把印度看作是自我供給的大英帝國的一個部分的觀念，那就較之把同一觀念適用到自治領方面，還要近於幻想。

諸殖民領地 最後，我們要述及諸殖民領地與附屬地了。在相當期間之內，這些地帶大都沒有大大發展其地方製造工業之可能。它們在現在乃至在今後若干時期，主要還

是原產物生產者無疑的，在大英帝國非自治領的諸地域中，有的地方——例如奈機立亞（Nigeria）——確還存在着廣大的未開發的原料經濟資源，同時且有增加其熱帶農產品的可能。因此，像這些地方的發展，自能對於英國工業提供有價值的製造生產上的原料。它們於對世界市場的原料生產一有增加，且還有大大擴增其消費力的餘地。大不列顛自己要努力獨占這些利益，本有可能，並且那種政策，還與其過去擴張殖民地的歷史，頗為一致；但這樣的政策，於世界將來有極大危險；幸而它在實現的過程上遭遇了許多障礙。

在和平條約下，以委任統治形式付與英國代管的諸地域，英國不能應用其殖民地排外政策。因為這些地域的『門戶開放』（door open）政策，曾為條約本身所保證，而簽約列強間之相互猜忌，更可在相當限度內，保障這種條款的遵守。因此，大不列顛如其沿着帝國主義者貿易獨占的路線以發展其非洲的屬領，她就不能把坦干伊喀（Tanganyika）或其他在大戰終結時由德國獲取的殖民地，包括在她任何這類計劃中。並且，在南非聯邦，或直接間接受其支配的地域，她亦不能強迫推行其政策。這種困難情形——特別是在坦

于伊略的場合——曾經在統一英屬東非管理的計劃中發生過，且不會發現克服這困難的方法。不錯，英國要把排外貿易政策施行於其非委任統治，且不會享有自治權的屬地，也許不致遭逢這大的障礙；但在某一地域，實施『門戶開放』政策，同時在其鄰近的其他地域，實施『門戶封鎖』政策，那却又難免發生困難哩。

即令這種政策能行，其實行的結果，於非洲，於世界全體，都會蒙其不利。因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致力於此，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亦必起而效尤；而非洲之真正需要，則是爲求統一的發展，而在可能範圍內撤去貿易自由上之一切內部障礙。

第四節 戰後歐洲的關稅

我在前面講過，大戰的最重要遺產之一，就是國境關稅的提高與加繁。這一部分是由於戰後歐洲許多新國的出現，一部分則是由於全世界對於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厲行。至於誘致各國採行關稅政策或其他限制貨物自由移動的諸種方法的理由，以及這種政策在

戰後歐洲及全世界發生的影響，我們現在是可加以比較綿密的考察的。

有些關稅，單是爲了收入目的，而非爲了保護國內工業。像這類關稅，是會迅速撤消的。當一種關稅課加於課稅國不能製造，或因其破費太大以致不肯自行製造的商品時，其目的就不能說是含有何等直接的保護意味。像這樣的關稅，必然要增加此種商品消費者的負擔，由是阻礙消費；但阻礙消費的程度，可因被課商品之性質而極不相同。如茶在英倫三島爲必需品，咖啡則爲奢侈品。因此，茶之需要，比較沒有彈性。其價格上因關稅課加所生的變動，乃比較有益於國庫收入，而不致大減其用途。若咖啡課稅，勢必誘致人民消費代替飲料，而大減咖啡之消費。對咖啡所課之稅，主要會加擔於奢侈的支出，加擔於社會富有階級，若茶稅則特別要出自較貧苦的人民。因此，以收入爲目的的關稅，就大可分成兩類，一是課擔在奢侈品上，大體由較富有者負擔，其結果會阻止消費；一是課擔在必需品上，大體由較貧窮的人民負擔，除了有更廉價的代替品可資利用外，於其消費無大影響。

國別	一九二五年估計的關稅水準 貨物價值的百分率	一九二九年估計的關稅水準 貨物價值的百分率	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 提高的百分率
奧國	一二	一四	一七
比利時	八	一二	五〇
捷克	一九	一八	(一)五
丹麥	六	一〇	六七
法國	一二	一六一五	三八
德國	一二	一五一五	二九
荷蘭	四	八一五	一一二
匈牙利	二三	一八一五	(一)三〇
意大利	一七	一六	(一)六
波蘭	二三	二一	(一)九
西班牙	四四	二五	(一)四三
瑞典	一三	一三一五	四
瑞士	一一	一二	九

大不列顛	四	八一·五	一一二
南斯拉夫	二三	一九	(一)一七

注意：右表沒有指示一九二九年以來的關稅的大增加，因為那種增加，是還不能藉指數表達出來的。要顯示輸入之禁止與限制的影響，自然非借助關稅不可。在過去兩年間，稅影響之重要實，且超過其風濺國際貿易以上（特別是加於外國匯兌上之限制）。

收入關稅與保護 如非對必需品像對奢侈品一樣的課稅，收入關稅對於國家籌款目的，是不會有多大幫助的。因為稅收縮減消費愈多，其所收自然愈少；而在酒稅的場合，往往容易使抬高的稅率，依其縮減消費的程度，積極低減其總的稅收。因此，收入關稅的結果，勢必至差參不齊，假若由此徵得有巨額貨幣，那定有一大部分會重壓在貧民身上。

不過，『收入關稅』(revenue tariff) 這個名目，有時會聯繫到其他極不同種類的稅收上，如對許許多多的商品——包括有國內能生產的那些貨物——所課的低率稅，亦

往往使用這個名色。在這種場合，常有人主張關稅過低，不能給予國內製造業者多大的保護。但當其被認為定有若干保護效果時，則又以爲這可置諸腦後，完全把關稅看作一種公家徵取收入的手段。許多比較落後的國家，大抵是依賴那些主要以收入爲目的的關稅。因爲比較進步國家主要採行的直接稅或所得稅，在比較落後國家，是難得行通的。卽如英國，在拿破崙戰爭以前，尙不曾有所得稅，而在拿破崙戰爭當時行過的所得稅，亦隨卽在一九一五年以後不久予以撤消。但主要爲收入目的而徵收的關稅，其保護的效果，並不能忽視。事實上，每個國家的關稅政策，殆莫不同時具有收入與保護兩種動機。然而，爲收入目的而徵收的關稅愈多，爲保護目的而徵收的關稅愈少，而在各種商品上所課加的稅率，乃愈趨於平衡。在各種不同商品上課加各種不同稅率的關稅，實際除收入目的以外，常具有保護的目的。真的，有時對種種商品課加同等稅的目的，既不爲收入，亦不爲保護任何特種工業，而寧可說是爲了縮減輸入消費，以調整不利的貿易差額。在一九三一年危機以前，克賴士（Mr. J. M. Keynes）及其他英國經濟學者所鼓吹的一種『收入關稅』就是這種關稅。

實在說來，克賴士君雖稱此爲『收入關稅』，其真正目的，却是提示國家不應由此取得任何純收入，而應以此種收入所得，用以獎勵輸出，調整英國由金本位制恢復（一九二五），鎊價過高所致招的不利效果。但把這種計劃，解作收入關稅，顯然是文不對題。這種關稅的目的，雖不在保護特種工業，但其本質是保護的，是期望由此調整全部輸出輸入的平衡。實際上，這是一種最不科學的低等保護，全未注意到每種特定稅的經濟後果。並且，當英國決定停止金本位制時，此種關稅所由產生的實況，實已完全消除，因爲此係一種基於鎊價過高的金融政策，金鎊隨金本位停止而低落，此種政策自應失其存在價值。

戰後世界關稅壁壘的提高，在某種限度，可以說是由於各國有較大收入的要求。參戰諸國都負有龐大的國債，爲要供應國債利息與減債基金的支出，勢不能不希求增加稅收。至於在戰時維持中立的國家，其情形誠有不同，但因政府規模的增大，社會事業的增繁，她們國家支出水準，幾乎全都提高。而普通由間接稅增加稅收，又似較由直接稅增加容易。故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是慣於施用關稅政策的。因關稅能被視爲保護工業的一種必要手段，故

提高關稅，就比之增加直接稅，要頗不容易惹起有力的反對。其實這裏還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在大多數國家中，富有者總比貧窮者明敏而有勢力，又其一則是因為付直接稅顯然比付間接稅要更容易使人知道。因此，當一國需要增加收入時，往往總會因着一種強烈的誘惑，驅使其訴之於保護政策，並且，其課稅範圍，特別會加擔於那些課有高率關稅還能繼續大量輸入的品目。

保護功能的增進 但是，各國政府雖然在增加收入的關係上，頗容易傾聽保護主義者的議論，但如謂世界關稅水準一般的提高，主要都是爲了增加收入，那却是一種錯誤。世界關稅增加的原來動機，大體可以說是由於阻止輸入，保護本國生產，並使本國生產者能在本國市場上，銷售其生產物之最大可能的部分。

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的關稅政策，曾有幾種變動推移。在戰爭剛剛終結的期間，關稅政策上是受着兩種動機的支配：一是對仇國可能貨品輸入的差別待遇，一是阻止那些在戰時成立並擴大的工業之消滅與衰落。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這兩種要求曾導

來了新緊急關稅的課加，以及對戰時確立的大部分輸出輸入之廣泛限制制度的採取。這兩者大體都算是暫時性質。大家都希望世界經濟狀況一經恢復常態，這諸般禁止與限制的規定，即將迅速撤除，此後的關稅，且將穩定在一種不會過高率的水準之上。但世界不特不會穩定，且進而陷在貨幣極不安定的狀態中。在一方面，由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大通貨收縮，致世界依金計算的物價，和那些金本位國或準金本位國的物價水準，都尖銳下落；同時，其他許多國家，又經歷一大通貨膨脹時期，使其國內物價尖銳提高，但其提高程度，還不若其通貨對外價值之慘然下落。因此，這些國家的輸出品，就比較那些通貨收縮諸國的輸出品，能以更低的金價購買；而對此通貨對外價值大跌的諸國輸出品，不啻給予以一種額外獎金。為阻止所謂『匯兌傾銷』(exchange dumping)，此額外獎金，遂激起對手國的報復手段，如加拿大一類國家，曾賦予政府一種權力，使政府得權宜課加那些貨幣價值跌落國家之貨品的差別特稅。除此以外，一般還為阻止外國匯兌上的動搖而抬高其關稅率。由此看來，動搖不定的貨幣行為，曾大大促進經濟的國家主義；全世界的關稅率，不

但不隨世界物價水準降低而變動，且還繼續維持高率，在若干場合，竟逐漸日益增高。

世界經濟會議

上述種種，正是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召集世界經濟會議當時的情形。在實際，一切主要國家都派有代表參加這次會議，並且所有的代表，對現行關稅率過高，實際都贊同應當大加減縮的主要原則。但是，每個國家都渴望敦促他國低減其關稅，而都不肯使自己受到低減關稅的拘束。這一來，世界經濟會議的成就，就不過是各國同意減低關稅的一般宣言，和關稅政策上若干重要的但非根本變更的調停罷了。例如，爲了要使製造業者至少知道其貨品在每個不同國境所應支付的稅率，這次會議會力言全世界，特別是歐洲，有施行比較統一的關稅分類制度之必要；各國關稅分類上之凌雜與衝突的減除，確爲這次會議之一項結果。此外，世界經濟會議還協定有一種草約，目的係在可能範圍內撤除關稅以外的一切禁止輸入限制輸入的規定。這種草約，包括有各國提出的一大批例外與保留條件。不過，草約的主旨，是儘可能的撤除那些用禁制、額定、或允許制度，以規制輸入的諸般方法，至關於國家關稅政策的設定，那就一聽各國自由。這樣的草約，雖爲大多

數國家所承認，但最後却不曾取得一大部分主要列強的批准。自世界不況開始以來，各種輸入的禁阻與限制，重又向着復活之途邁進。

在世界經濟會議召集的當時，世界的關稅水準，確曾顯示了若干縮減的合理期待。因為，在一九二七年，大多數人都以為戰後世界經濟的困難，都在迅速被克服的過程中。許多國家已經恢復金本位制，還有更多國家準備恢復金本位制；一般人以為在短時期內，世界大部分通貨的匯兌價值，定有恢復穩定的希望。由是，為阻止『匯兌傾銷』而採行特別保護手段的理由，將不復存在。而當時集聚在日內瓦的專家們，且以為世界各國政府定然會感知她們把關稅提高到阻礙國際總貿易擴展的嚴重程度的愚笨。

關稅休戰的建議

由國際經濟會議產生了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在監督其建議的推行，和定期報告實際進行的事項。但在此後兩年間，世界繁榮儘管維持着，減縮關稅的進步，却幾乎遲緩到毫無進展可言，至多不過是與世界物價的緩慢跌落，保持同一步驟罷了。在一九二九年，由英國勞動黨政府發起的關稅休戰談判，無非是要發現一種

繼續日內瓦會議之工作的新途徑。這種新建議在使各國至少在一定期間之內，不增加既定關稅率，不增設新關稅。此種消極建議的目的，蓋欲爲低減關稅率之多邊協定的談判，提供充裕的時間和造成順利的環境。然而，談判甫經開始，許多國家——包括有法國與意大利在內——即表示其極難接受不提高稅率的拘束，而其他大多數國家，則附以其餘國家同意，她們始肯予以承認的條件。至每個國家由國家關稅制度受到保護利益的人們，顯然會拚命阻止政府，不讓政府同意減縮那些影響其利益的關稅。而且，要發現一種開始縮減關稅談判的滿意方法，亦頗不容易。如想由考慮特定商品（如煤或鐵）之現行稅開始，那立即就會遇着反對，因爲在每種國定關稅上，要想把對於某類商品所課之稅與對於其他商品所課之稅孤立的區別出來，實所難能；如對於鋼工業所加的保護利益予以縮減，同時對於其他輸入品所課之關稅，則一仍舊貫，殊未免失却公平。當我們在另一方面致力於一般關稅政策之論究時，我們又會遇着許許多多的困難，特別是那些與所謂『最惠國』（most favoured nation）條款有關的困難。

最惠國條款 所謂最惠國條款，就是以種種不同形式，表現於各國極大多數商約中的條款。在實際，這種條款對於每個簽約國所保證的，即是其他簽約國將允許其製造品——受有特例拘束——在她們市場上，至少與任何其他國家的製造品，獲有同一的便利。因此，假若在商約上加入此最特惠條款的任一國家，與其他單一國或多數國進行對於任何商品或一切商品縮減關稅的雙方或多邊條約的談判，則此最惠國條款，將對一切其他參加此條款的國家許予以同一的特惠待遇。就英國的情形說吧，英國在過去曾把最惠國條款當作其商業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她現在還常與帝國各邦結成特惠關係，她給予帝國各邦生產者的特惠，沒有擴張到其他任何國家。但是，如其她已把此特惠擴張到帝國以外的國家——例如阿根廷——則最惠國條款的效果，將使大多數國家同時自動的享有此特惠的全部利益。至在美國所設定的最惠國條款形式，遠不若歐洲此種最惠國條款之廣泛。並且，美國雖常常準備向其他國家要求最惠國條款下的全部利益，但對於要加擔在她自己方面之相互義務的解釋，總比較窄狹。

最惠國條款創立之始，原期其能爲一種促進較自由貿易的手段。當兩國間成立有自由貿易協定時，此種條款的效果，就會擴大自由貿易協定的勢力於較大的領域。但此條款在今日是否真能發生貿易自由化的作用，却頗是疑問。因爲，依特別理由，給予某一國的權利，要使其自動的擴充到其他許多國家，那勢必會使一切國家都不願意許予她們所能許予的任何特別權利。這一來，最惠國條款就不能使自由貿易的區域擴大，且勢必要阻礙各隣國間之互減關稅的雙方協定或多邊協定的進行。並且這在中歐與東歐諸新國之關稅政策上，還引起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就因此故，一九二七年的世界經濟會議，與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的關稅休戰會議，就不得不注意這種最惠國條款政策，看它對於特殊國家之間的互減關稅協定，究否由同政策的修正及由何種限度的修正，而使其較爲容易。而特別應當注意的，則是看最惠國條款在兩國或多數國家間成立完全自由貿易的關稅同盟方面，究會發生怎樣的影響。當德奧兩稅同盟計劃在一九三一年進行時，有人主張兩個關稅領域的完全統一，並不牽帶

有以類此待遇許予他國的任何義務。實在說來，任何其他的見解，都不免要使此計劃變爲毫無意義；因爲那將是說，那種完全自由貿易的權利，是沒有其他國家相互許與的。但德奧關稅同盟，終於受到法國的反對；法國恐怕德奧兩國的經濟統一，將導來政治的統一。此種關稅同盟問題，既頗有影響於最惠國條款，故當時竟無所決定。然自近來多腦河諸國間與全東歐各國間之完全的或部分的關稅同盟計劃產生，波羅的海諸國的關稅協同努力，乃至世界其他地域之雙方或多邊條約計議設定以來，此種問題，復又相因提起。最惠國條款即令不是歐洲關稅率低減的積極障礙，但在它尙完全保持原型的限內，現在是顯非大大修正不可的。

歐洲與美國 特別是，美國對於製造品的關稅，儘管維持着極高水準，歐洲諸國却都反對把最惠國待遇許予美國。美國大多數的通商條約，都含有最惠國條款。凡屬有關低減關稅的雙方協定或多邊協定，美國都不患無利益可圖。這實在構成了修改最惠國條款的最有力的論據。至於同樣由此受到大利益的英國，直至最近以前，還堅決的維持最惠

國條款的原型。但此最惠國條款在各國相互低減關稅途徑上所生的障礙，現在已頗爲一般人所認識，由是英國關於這方面的政策，乃繼續有所更張。

關稅的種類

關稅休戰的談判，係開始於世界不況襲來以前。迨世界不況襲來，所有談判的些許成功機會，都被破壞無餘了。隨不況而發生的物價暴落，誠然會使那些從量的稅率，有相應縮減的可能——因爲這雖不致低減從價稅的比例的負擔，但却實在縮減了額數。像從量稅從價稅這一類語辭，也許有略加解釋之必要。所謂從價稅（*ad valorem duty*），就是依貨物之估計的價值，而值百抽幾之稅，如英國麥克肯那稅（*The McKenna duties*）之定爲百分之三三者是。若從量稅（*specific duty*），則是對於每件輸入貨物，或每磅每噸貨物，課加一定的貨幣額。物價跌落，從價稅亦隨之跌落；但從量稅却會因以加重，正猶如當戰時戰後物價飛漲，這種稅却反而大大減輕一樣。有些國家徵稅是採行從價制度，有些國家採行從量制度，還有些國家，更採行從價從量的混合制度。在一九一四年以後的價格迅速變動的諸年度，這種政策的差異，曾增大了關稅的複雜性。法國、德國、意大利

利、瑞典、巴西及美國，主要係採行從量制；同時英國、印度、新西蘭及加拿大，則大抵採行從價制。近年以來，採行前一制度的國家，即令其稅率沒有變更，亦確曾大大增加其國內工業的實質保護；而那些曾經減縮其名目稅的國家，就貨物價值而論，實在並沒有減少什麼。在另一方面，那些採行從價制的國家，如要增加其對於工業的實質保護，則惟有實行提高稅率。

我們講過，假若保護的程度仍舊維持不變，那物價的跌落，至少應當引起關稅水準的相應縮減。但事實上，當物價一因世界不況而引起跌落現象時，各國的生產者都會因外國需要的衰落與外貨傾銷的威脅，而加倍努力的要求增加保護，以便進一步確保其本國市場。因此，自世界不況發生以來，全世界的關稅率——那怕就是依貨幣計算的關稅率——都有增加；若與貨物價值相對而論，則其真實的增加，猶遠大於此種限度。事實上，關稅真實水準的提高，並不限於製造品方面。特別是最近幾年來的歐洲，其對農業增加保護的趨勢，甚且比其對於工業增加保護的趨勢，尤為顯著。比如在德國一類國家，皆企圖增加本國農產物生產，以期在可能範圍內減少其對於輸入食品的依賴。而在東歐比較專務農業的國

家，更爲確保其本國市場，而極力阻止歐洲以外的大農業區域之廉價食品的輸入。其結果，農產品關稅水準固然提高，對於輸入農產品所課加的新限制，更是普遍採用。此種趨勢，往往且引起輸入製造品方面之保護關稅的增高。因爲農業家與工業家曾成立契約，一方許予他方以權利，由是使自己得到更大的保護。這一來，世界的不況，已經在猛烈的促進經濟的國家主義，並由食品與製造品關稅的相並提高，而保育每個國家之國家自給自足政策。

關稅同盟 然而，至少就那些較小國家的情形講來，這種政策只够引人發笑，並破

壞大規模生產的經濟利益。現在高的關稅壁壘雖然在各國國境周圍維持着，但擴大貨物自由移動之區域的要求，却已逐漸爲人們所認識。於是而有促進關稅同盟，和促進互減關稅之雙方協定或多邊協定的運動。但是，我們講過，這諸般運動的實際進步，實在是過於緩慢了；在每個國家中，要求增加保護者的迫脅，照例比那些要求較大幅度之國際合作的廣大民衆的呼請要強有力多了。那怕增大自由貿易市場能够明明白白的顯示縮減生產費用，那是完全不會使一個特定國家的生產者相信的；因爲他所留意的事體，不是他的絕對

生產費，而是這生產費與其所能售得的價格之間的差額。他時常累心的，就是，國家如同一隣國結成關稅同盟或雙方協定，則此對手國的生產物與他的生產物發生競爭的結果，勢將不免使其生產物價格低落到市場擴大所能減縮的生產費以上。製造業者的這種自私自利主義，往往又益以勞動者對於失業的恐懼，遂致那些似有不能解答的經濟事件，隱伏在他們背後的諸般自由貿易的計劃，都嚴重的受到了妨阻。

其實，對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顯然不能期望她們採行任何縮減關稅的有效手段。那怕是不況臨頭吧，在她們尙能勉強支持的限內，她們不但不會減低關稅障礙，且會增高關稅障礙；不但不會撤消輸入限制，且會課加輸入限制。因為，每次關稅抬高，與每種新的限制，不僅是可以看為保護國內生產者的必要手段，且可看為是恢復貿易平衡之一不可缺少的條件。所以，要各國政府衷心贊助較廣大領域內之經濟統一計劃，只有到了她們已經相信以次事實的時候，才有可能；那就是，儘管她們能够課加一切限制，在當前的現狀下，終歸是不能放手做去的。在目前，多腦河諸國以及東歐南歐若干國家，看看已經達到了這

個地步，而那些以她們爲債務國的列強，亦因爲她們的緣故，簡直達到了此種限度以上。但，雖然如此，在這些領域之經濟統一一上，仍存在頗大的障礙。因此，經濟是不能與政治分開考慮的，那些國家應與那些國家聯合，以怎樣的條件聯合，應受何等較大強國的領導，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容易惹起極其參差的意見的。因爲政治的理由，法國儘管竭力反對德奧兩國的聯合，但她却企圖在她自己的有效影響之下，把東歐南歐諸國形成一個集團。而在另一方面，無論是英國，是德國，抑是奧國，都不願意看着法國在政治上制霸歐洲。所以，當列強開會討論經濟問題時，往往總要牽涉到她們相互對抗的政治野心。但這種種種困難，遲早總是非克服不可的，歐洲遲早總會由其現在的束縛，即由那些窄狹到不敷維持自給生產制度諸國的經濟國家主義的束縛，解放出來。不過，僅有的問題，是看這種聯合，究是在歐洲經濟事體未經過一種積極崩潰狀況以前達到，抑是完全的崩潰與混亂，會發生在一種新的秩序創建出來以前。

第五節 英國的關稅政策

近年經濟的國家主義的進展，當以一向極力鼓吹自由貿易，且在生活資料上最要仰賴外國輸入的英國為最駭然可驚。自然，在大戰以前好久，英國已經存在有熱心擁護保護政策的人，當時稱此保護政策為『關稅改正』(Tariff Reform)；此種『關稅改正』主張，往往與擴張帝國特惠制度，以期在帝國領內創建一有效經濟單位的要求相一致。但是，這種政策雖為最大部分的保守黨所宣揚鼓吹，然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却從沒有遇到採行的機會。因為，英國畢竟仍是過於適合自由貿易制度了，要她在經濟構造上從事一大冒險的更張，實頗不容易。她當時的輸出，仍在迅速擴張；在某一地域喪失的市場，有時可由其他地方的新市場的擴張而得到損失以上的彌補。然而世界戰爭却大有助於人類觀感的改變。英國自由貿易制度的首先破壞，主要是當戰時反對與敵國交易所採行的差別待遇方法。而在戰爭剛剛結束以後，英國亦同其他國家一樣，一方面想維持其在一九一四年以

來所增設擴充的新工業，一方面則想阻止那些幣價狂跌國家之貨物的『匯兌傾銷。』這兩種要求，大抵都是出自『主要工業』(Key industry)，由是『防禦的』(safeguarding)以及其他保護的關稅，乃相續在戰後幾年中課加起來。然照當時英國的政治意見，這類新的保護方式，還須限定施行於比較少數的貨物，且須看作是暫時的應急方策。英國的社會輿論，並不會改變到足以容許採行一般保護政策的程度。對於輸入的食品徵稅，固懸爲厲禁，就是英國鋼業、毛織物業者所不絕強要的鋼輸入稅，毛織物輸入稅，亦在政治上沒有施行的可能。

英國輿論對於一般保護政策，是彼此對立的，這種繼續對立的現象會，顯然的反映在一九二三年的總選舉中；這次選舉的結果，英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任勞動黨內閣。勞動黨政府在當時雖顯然沒有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使它不能不仰賴自由黨的幫助，但保守黨之所以在這次選舉中喪失其多數選民，那却分明是由於它對關稅問題要求自由處置。就在勞動黨政府失敗，保守黨重復出組內閣的一九二四年之末，這個接替的政府，仍不能不

作反對採行一般保護政策的誓言。在此次保守黨當政的期間，無論是對於食品輸入的稅，抑是對於鋼與毛織物的輸入稅，都是一再遭受反對。保守黨的一般關稅政策夢想，只是臨到一九二九年之世界危機發生，才有使其實現的可能；並且，就在此種場合，它對於這種政策，仍須逐步推行，且還要藉着國家財政緊急，需要採行調整貿易平衡之特別方策的口實。總之，沒有一九三一年突發的恐慌危懼的支助，就在保守黨亦是不敢遽然採行一般保護政策的。

英國的新關稅 在事勢的推移上，由拉姆塞·麥克唐納君（Mr. Ramsay MacDonald）領班的所謂『國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竟由選民取得『醫生命令』（doctor's mandate）——換言之，就是完全的自由處置。而參組在此聯合政府裏面的自由黨，亦只好跟在保守黨的關稅改正論者後面拖。這個聯合國民政府的保護制度，是以兩種方策開始，其一是在名義上以限制製造品之『反常』輸入為目的方策，又其一則是限制園藝品輸入的方策。這些方策都經制定法案，賦予貿易局（The Board

of Trade) 以課加極高保護稅——最高得提高從價稅到百分之百，實際則課加到百分之五十——的權力。然而，這還不過新政策的第一章；在一九三二年初，『國民』政府切實設定一種包括的保護政策。根據當時通過的新法案，則所有輸入的製造品，乃至原料與食品的相當數量，均須徵收輸入稅，此輸入稅開始定為一律百分之十，但依同法案下所設置的特別委員會的勸告，得繼續無限增加。該委員會現正準備提出一般的關稅，國會亦打算接受此種關稅；此關稅對大多數製造的輸入品，徵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對奢侈品則徵百分之三十。此外，政府還用另一種法案，課加絲與人造絲的新保護稅。至於那些被認為有『傾銷』之嫌的國家的貨品，或對英國貨課加差別稅的國家的貨品，貿易局還有權課加其差別待遇稅。但貿易局最後的這種權力，與其說它會實際行使，却毋寧說是用以預作談判的基礎，這，我們是不難理解的。『國民』政府為保護英國小麥生產者，又會制定一種小麥定額案 (Wheat Quota Bill)，此案的內容，不在對輸入的小麥課稅，而在對本國農業生產者的全部產品，許予以相當超過輸入品價格以上的價格。不僅此也，一九三二年

七月在渥太華 (Ottawa) 所開的帝國經濟會議，且還要考慮到一種關於領地小麥額定制的計劃；換言之，就是大不列顛農業者在大不列顛市場上所獲得的特別利益，將同樣許予全帝國領內的農業生產者。此種小麥額定制即令只行於大不列顛，而不擴大到大英帝國的全領地，其效果亦等於高的保護關稅，並且英國一般人由此受到的耗費，比較對輸入小麥課百分之十輸入稅所蒙到的耗費還高。我們由此知道，英國在一九三二年最初幾個月所通過的一些保護方案，那並不僅只涉及輸入的製造品，且曾涉及其最主要的食品。在英國輸入的主要商品中，除了像棉花那樣必不可缺的原料外，只有肉類免稅。照當前的情形看來，在今後不久，某種額定制也許會應用到肉類和其他農業輸入品方面。

自然，在新法案下的關稅水準未決定前，從而在顧問委員會 (The Advisory Committee) —— 即依此法案所設立的顧問委員會 —— 尙未完成其對政府的報告以前，要對英國的新保護制度加以批判，實有所未能。但這種保護制度，想直接由法案本身，課加頗較高於百分之十的保護稅率 —— 就大多數的場合言，定然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一 —— 那

却似乎毫無疑問。英國課加高率的輸入稅，還是一九三一年的事，並且那時課加的範圍，只限於極少數貨物。然照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的諸種新政策，它却似突然變成了一個澈底的保護主義國家。

貿易平衡 在此變動演進的當中，對此表示贊成與反對的議論，都為淆惑於貿易平衡及鎊價穩定一類即時問題的英國輿論所隱蔽了。『國民』政府再度把握政權；支持這種政權的選民，大抵是那些相信——不管對與不對——金鎊有喪失其大部分價值之嚴重危險的人們。並且，保守主義者在選舉次日所強調的，不是他們傳統的那一套保護主義議論，却是力言調整貿易平衡之必要。但英國直接的金融危機，顯然在一九三一年年終已經予以克服，不過，那種克服，與其說是由於英國景況的改善，倒不如說是由於其他國家經濟情形之更趨惡劣。在一九三二年最初幾個月中，再也沒有人能故意裝着說鎊價有再大跌的危險。而當時的危懼，其實，倒毋寧說是怕鎊價因他國幣價失其國民信任，而相對的過於昂騰。因此，保護主義者的論旨，只好更置重那些習見的理由了。但在『國民』政府裏

面，已經有深信保護主義的保守黨的極大勢力存在着，保護主義者的議論，並不會發生多大的作用。國會中的最大多數人，顯然都立意在各方面厲行保護政策。但對於全般保護英國農業的計劃，仍必須出以慎重。在小麥的場合，政府寧採行額定制與補助辦法，而避免施行直接保護稅。但有一點，英國在一九三二年設定的保護制度，那顯然不能說是基於金融緊迫的理由，而是根據那些在金融危機尚未發生以前就已經流行着的議論。

英國保護主義者的議論，係根據一種信念，那就是說，保護能看作是擴大利潤與增加僱傭機會的手段。他們力言英國能自己生產她現在輸入的極大一部分的貨品。製造品如此，食品如此，不過原料只能自行生產一極小部分，故他們認為大部分的原料，還顯然有繼續仰賴外國輸入之必要。他們一貫的主張是說，假若外國製造品徵稅，英國製造業者就能利用他在本國市場上的特權地位，由擴增產額而減低其生產費，由是，英國的消費者，將獲有其能由外國輸入品所獲有的便利。同時，英國這般由縮減生產費獲利的製造業者，遂能改進其在輸出市場上的地位；假若製造業者肯採行現在已經通行於德國及其他國家的

『輸出傾銷』政策——即在任何競爭較烈的市場上，以較低於其在本國市場上的價格販賣——則尤有此種效果。至他們關於農業的僅有提示，則以為對輸入農產品徵稅，英國農業生產者將能提供本國消費者以輸入品一樣低廉的貨物，且還能獲得適當的利潤。但英國不能讓她特別鄉區的大生產資源棄而不用，並且，由較高價格增加於消費者身上的負擔，那是不夠由農業上增加僱傭機會與農業社會增加對工業品的需要而得到補償的。

半製品與完成品

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得記憶一件事，就是，那些在關稅分類上被稱為製造品的貨物中，實在有一大部分不是拿來即時應用，而是要由英國製造業者加工製作的，並且，這經過加工製作的完成品，往往打算再行輸出。比如，由比利時輸入的鋼的半製品，照例是由英國製造業者製成塗錫的薄鋼片，再輸往美國及南美各地。英國稱為製造的輸入品中，有更大一部分是油，除非英國對於煤油的生產，並且必待英國對於煤油的生產能夠安排在一種滿意的商業基礎上，這種物品對於提供低廉的運輸，仍是繼續必要的。英國輸入的真正完成的製造品的數量，遠不若貿易局報告中所列入的總製造品額之多。

對半製的輸入品徵稅，勢將大不利於完成品的輸出。並且，爲保護英國農業，許其產品在本國市場上享有較高價格，或對輸入農產品徵稅，那都不免抬高生活費；從而，使工資勞動者有較高工資的要求。在當前不況繼續的限內，這種要求是不會收到效果的。但社會情形一旦變到更有利於勞動階級的行動時，他們定然會強迫求其實現。況且，英國如嚴厲限制其由世界各地輸來之食品與製造品的需要，實難保不在其輸出需要上發生反動。英國一向是世界最大市場之一。如其英國由其他國家購入較少，其他國家自不能不減少其對英國的購買。因此，如謂英國採行保護政策，其輸出將因此受到刺激，實屬荒謬。在此種情勢下，英國定然要減縮其輸出貿易。假如保護主義者要對保護政策加以辯解，極其能事，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說，由保護政策刺激的國內需要，會較大於其對輸出貿易所低減的需要。

但在實際，英國如採行一般的保護政策，勢將處在極其不利的地位。英國曾在自由貿易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極高度專門化的工業組織。此種組織，使她要依賴世界市場出賣其貨物的程度，較之其他任何國家爲利害。由這種基於自由貿易的經濟狀況，一旦改變爲基

於保護本國市場的較大幅度的自給自足，那即使不會引起何等結局的損失，亦將在英國經濟制度的機構上，發生一極大的變動。那些主要為輸出而建立的舊工業，必須切實改造，切實縮減其規模。它們的地位，將為那些專為國內市場或主要為國內市場創立的新工業所代替。在此種變動過程上，英國一大部分現有的工業資本設備，將喪失其價值，許許多多的勞動者，將因對外貿易衰落，使他們既經習得的技術不復有何等用處。加之，保護政策施行的結果，貨物將由原產國，直接交付其消費國，而一向由英國商人經營，且獲有頗大利潤的貨棧業（the entrepôt trade），勢必致損失其大部分利益。因此，要從經濟上辯解英國脫離自由貿易地位的正常，那是非有極強而有力的論據不可的。

自由貿易消滅了麼？然而，也許有人這樣主張，說英國經濟政策的變革，完全是由於她企圖銷售其貨物之世界市場有了改變。一九一四年以來即已通行於世界的經濟的國家主義，無疑在英國經濟體制上發生過異常嚴重的影響。但這影響，不是因為英國貨一般的比較他國貨物受有更高的關稅負擔；英國在極大部分的世界市場上，都因其採行自

由貿易政策享有最惠國的待遇；世界市場變動對於英國的影響，是由於英國要非常依賴輸出，並且，她的大宗輸出品，恰好是其他國家極力想藉本國製造業發展來代替的貨品。

遠東的工業發展，英國較低廉的棉織物輸出市場，將因以減落，那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各國逐漸要求不仰賴外國鋼鐵與毛織品的趨勢，無法改變，英國鋼鐵工業及蘭開夏之主要工業，在今後將不能在海外市場銷售以前同多量的貨品，那亦是事實。世界市場上的這種種改變，必然無可避免的要強迫英國大大改變其工業機構。但如謂英國今後工業輸出品之總量，將不復能達到戰前那大的額數，則殊難令人置信；問題是看她願意採取關稅政策以加強加速那種變動，抑是願寧繼續支持自由貿易政策，徐圖予以調整。

非關稅的保護

英國一般輿論雖然很容易設想除了自由貿易與關稅保護以外，沒有第三方法存在的可能，但這兩者實非唯一之路。關稅保護者與自由貿易者歷來爭論不休，以致習慣了他們的議論的英國輿論，頗不容易想到其他的形式。但我們講過，近年與保護關稅相並發展的，還有其他的保護形式，比如以允許制、額定制以及其他國家統制形

式規制輸入的方法，皆屬此類。在使英國經濟制度適應戰後世界變革機構的精密計劃中，把這些方法運用進去，究竟是否會引起較少於保護關稅那樣的不利益，那是值得考慮的。

英國限制輸入的方法，業經存在於染料的情況，其目的蓋欲依此維持並保育其在戰時設立的染料工業。依照此種方法，染料的輸入，須取得那種代表染料生產者與消費者之特別委員會的允許通告。不論在什麼時候，消費者得根據英國國內精良品不足的理由，或根據英國生產者索價過高的理由，要求特別產品的輸入。這時，生產者方面須得表示其能以合理價格滿足消費者的要求，如他不能作此種表示，則允許輸入。像這種制度，本不易圓滑的或毫無抵抗的進行，但在運用上，究比關稅有更大的伸縮餘地，且更能用為刺激生產與規制價格的有效工具。假若這種制度妥為管理，一方面使生產者受到適當保護，同時使消費者得有反對國內獨占者剝削的充分保障，那末，像這樣一種制度，顯然能夠擴張到更廣泛得多的領域。

額定輸入與輸入局 限制輸入的另一種代替制度，就是額定制——這與英國近

年對小麥所採行的那種『額定』(quota)方法，頗不相同，那簡直談不上是一種額定制，單純是對於英國小麥生產者所給予的一種變相的補助金。在真正顧名思義的額定制之下，國家對於特定商品的輸入額，只限定於補充國內供給所必需的限度；若國內生產者利用其特殊權利地位，把價格抬高到合理的水準以外，則國家將隨時聽其自由輸入。像這種制度，也遠較關稅有伸縮性，並且對於國內生產者還能提供更多的保護。

除允許輸入制與額定輸入制以外，還有第三種制度，那就是由英國勞動黨所鼓吹的輸入局制(Import Boards)。輸入局在國家直接管理之下購買全國需要由海外輸入的全部商品，並把這所購得的商品，投置於批發市場。它們通常由此規制國內生產物的販賣。也如額定制一樣，其目的似在對本國生產者保證充分市場，並制限在補充國內供給的必需限度內向海外購買。自然，對於所有由海外購買的商品，國家不免要施行批發貿易的獨占；並且，至少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制度是否能適用到極度標準化與大批輸入的商品以外，還是疑問。適用此種制度的物品，主要為小麥、肉類及其他食物，但不時也適用於像鋼與原

產羊毛一類半製的商品。至此種制度之目的，大體在以英國同意購買某帝國屬領或外國市場之全部或大部分待輸出的剩餘物——如小麥、肉類或羊毛——的整批契約，以代替個人對輸入品的零碎的購買。據說，用這種方法購買，要比較在購買競爭條件下所支付的價格低廉，並且，對大宗輸入商品加以統制，那會使英國用在中間人方面的費用大大節省。但是，贊成輸入局制度之更有力的論據，却是說，這制度對於各國在一種實質的物物交換基礎上行使大規模的交互契約，可提供一個初步基礎。比如，英國如向加拿大或澳洲購買，其可以提供的某種原產食品或原料的一大部分，加拿大或澳洲也許會由英國購買一定量的製造的鋼或其他大宗輸出品，甚或以她們出賣原產商品所得金額，以信用形式貯置倫敦，以便購買英國其他任何商品。我們講過，巴西已經在與美國行使咖啡與煤的交換。英國與俄國之間的合作組織，早在實行大規模的物物交易。然則這在原先行於大英帝國各邦，以後且行於英國與阿根廷及英國與俄國之間的物物交易原則，爲什麼不適用於更廣大的領域呢？

由是，我們知道，假若保護政策事在必行，那末，除了素朴的關稅保護形態以外，還有三種代替的保護方法值得考慮。並且這三種方法的任何一種，都比較關稅有較大的縮伸性，且較容易採用為有聯絡性的經濟計劃的一個部分。所以，假若英國一定要放棄其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切不要只把保護關稅看作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但是，自由貿易的放棄，我們僅看為是對於暫時急需的一種退讓麼？看為是為恐慌所打擊的英國輿論的一種非非幻想麼？抑或看為是英國在經濟態度上的最後一種改變麼？其實，關於這種事體，在要看他國所採行的政策如何。全世界的經濟國家主義每推進一步，英國要維持自由主義制度就愈加困難。因為，阻止英國輸出的關稅及其他障礙一經建立，英國向海外出賣其貨物的可能性，雖因之受到限制，同時，世界自由貿易領域的窄狹，又會使那些尚保持自由貿易制度的國家，在國內受到外國貨物的劇烈傾銷。外貨傾銷，無疑有利於其國內的消費者，使他們能購買那些往往低於真實生產費的貨品。但那却會在阻止輸出的場合，使這些國家的輸入，激增到非其經濟地位所能長久維持，並使其國內製造

業者不能不從事他們難於支持的競爭。因此，假若世界其餘地方的國家，都在比現今還要擴展的統一關稅領域的基礎上實行經濟的國家主義，那英國無疑會依關稅或其他手段以維持某種形式的保護。但是，全世界如其能翻然傾向比較自由的經濟政策，英國在維持其大輸出國的地位上頗有利益，從而，她理應願作此種自由運動的先驅。但這不並是說，她在這種場合將返到完全的自由貿易，而只是說，她對於其輸入局制一類手段，與其用以限制輸入，就寧不如用以促進帝國與其屬領及與海外各國間之大規模的國際物物交易。

第六節 美國的經濟國家主義

我們已經講過，歐洲大陸對於打破關稅壁壘與發展較大領域之經濟交易，實有其極有力的經濟理由存在。至歐洲反對貿易自由之傾向的形成，主要是由於政治的理由，或由於各別國家已經在高關稅保護下建立的工業的利益。然而，此種分離主義，却無疑使歐洲全體人民受到了莫大的經濟損失。

若美國的情形，則與此多少不同。北美洲即令把加拿大除去，其土地之廣大，其人民之富庶，其經濟資源與生產力之廣博而繁雜，亦頗够其大體不仰賴外國供給，不仰賴外國市場，而造成一個充分發達的經濟生活的基礎。但這並不是說，美國現存的經濟制度，已經達到了這樣不仰賴外國的程度，也不是說，她即令離外國的輸入供給與輸出市場而獨立，亦不會有嚴重損失，或不會於其經濟生活有猛烈的變動。我所提示的，只是自給自足或與自給自足接近的主張，在歐洲分立的諸國，雖沒有實行之可能，而且實行起來不免流於荒謬，但在美國却恰好是一個可能的理想。在美國國境之內，一切大規模的生產，一切專門的設備——這即是依現代技術，謀最大可能經濟實現所必需的設備——都有實施餘地。她現在的需要而論，她國境內僅有幾項原料，不能有充分的供給。在這種種情形下，無怪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即已成爲一高關稅國，更無怪她今日尚維持着高的關稅水準。在過去七八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美國就視其自己國內市場，較之外國市場爲重要。她常自覺其擁有等待經濟開發的龐大資源，所以，至少在過去數年以前，她遠自謂其擁有足夠銷容其全

部資本的出路。即如現在，美國龐大的對外貿易，雖然在世界貿易上占着數一數二的地位，但若以其輸出輸入數字與國內生產的與消費的數字比較起來，那就頗不足觀了。

美國在她高關稅壁壘之下，已經使其全國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準，抬高到高於世界任何地方。美國南部誠然還有黑人勞動者與農耕者的低率報酬問題，且還有被僱於南部諸邦之紡織工廠的貧窮白人問題，但除此一部分人口外，她直至大不況時期到來時為止，尚無疑能保障其國內大多數人民的極高——與世界其他地方相對待而言——生活水準。這種生活水準，誠然沒有由貨幣所表現的那樣高昂，因為美國的物價水準，也大體因其高率關稅政策，而較高於歐洲其他國家。但美國較高的生活費，即使要在物價上加以斟酌，亦還不難維持其優越的標準。美國農民的生活誠然是比不上都市居民的生活，但與歐洲任何國家的小農比較，他們仍要優裕多了。

在美國大多數人看來，凡屬干預關稅的事體，彷彿就不免要危及他們這種既經形成的高生活水準。不錯，一般從事農業者，都願意以較低價格購買其所需的製造品，他們並遠

覺得自己太沒有由世界原產食物和棉花一類原料的狂落價格受到保護。但無奈在近年以來，他們與農業有關的這般人，從未取得控制美國經濟政策的地位。企業界之保護主義者的態度，無疑在華盛頓，在大總統與國會選舉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勢力。美國的勞動者爲了抵制外國勞動者及其低生活水準的競爭，亦竭力支持高關稅，想藉此高關稅以保障其高水準的生活。因此，美國雖然常有由農民領導的減低關稅運動發生，但其成功極暫，並且在一九三〇年之哈勒伊·斯摩特關稅（The Hawley-Smoot tariff）以前的一般關稅行程，都顯然保持着向上的運動趨勢。

美國關稅與歐洲債務

美國在她爲國內發展所需的資本還繼續要多過其能由自己財源供給的限內，她是容易維持其高關稅政策的。但當她在戰時及戰後對歐洲及南美投出了大宗借款，因而變成了一個大債權國，她的地位乃有所變更。在某種工業上，乃至在原料的供給上，她的生產能力，已大大超過其國內市場所需的限度。假若她還是一個資本的輸入者，她就很可能以她這些超過其需要的產品，支償其借款利息及償債基金。但她已

經不輸入資本，且反而輸出資本了，世界各國借了她巨額的資金；在這種場合，如其她要求支付平衡的話，她就顯然需要輸入他國的剩餘物，以代替輸出其自己的剩餘物了。剩餘物的輸入，祇能採取兩種方式：要就是減低關稅，以便接收歐洲諸債務國之較大量的製造品的償付；或者是增加其主要由落後國家所提供的外國原料的輸入。她如採行後一方式，歐洲諸債務國家便可對那些提供原料的落後國家，輸出製造品，以便間接償付美國的債務。自然，美國能同時採行這兩個方式，那是無所不可的。然無奈前面那種方式，要橫受左右美國輿論界之保護主義者的有力排斥，而後者在結局又要取決於美國對於消費財市場之擴張力——因為製造業者所能購買的原料，只限於他們在完成品生產上所需要的數量。但我在前章講過，美國生活水準的抬高，從而一般大眾對於消費需要的增加，並不與其生產力上的增進，或與其國際經濟地位之變動的程度相一致。所以，美國的輸出物品，仍繼續多過其輸入物品，仍繼續增大其對海外各國的債權。各國對美國所欠之債，如不由貨物償付，那就祇能由金償付或由美國輸出資本；美國輸出資本，必然要採取兩種方式：或者是輸

出黃金，或者是讓外國應支付美國的差額，再用以投資於海外。

在世界不況發生以前數年間，美國一部分藉金的輸入，一部分藉海外的投資，雖尚能應付裕如，但是一個大債權國，而又擁有有形輸出超過其有形輸入的剩餘，其情勢已頗不自然。在大體上，她的債權國地位，早與那種繼續支配其財政政策的經濟自給自足觀念相抵觸。更與其生產者一方面而阻絕外國輸入，同時並進一步利用其大量生產經濟以擴增其對外輸出的那種企圖相抵觸。

美國所當選擇者——美國一小部分有識人士，有時亦承認其經濟政策上的這種矛盾的存在，於是在比較進步的美國人士之間，曾掀起一種縮減關稅的運動。但這種運動的成功阻力是太大了。而當前的不況，更對於較高保護關稅需要，頻添了不少刺激。美國現正努力在高的關稅壁壘裏面，在純粹國家的基礎上——疏忽或輕視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改造其紛亂的經濟生活。她對於借款問題，仍不以爲那與其經濟生活改造有不可分離的聯鎖，却只看作是不必過問那與美國整個經濟問題的關係，亦可解決的個

別事件。但照此下去，借款問題就不但不能解決，且定然會阻止比這更廣泛的問題的解決。我們必須知道，所有世界各國所欠美國的債務，即令完全勾銷，美國與其他世界各國之經濟關係的問題，並不能說是完全解決。她的輸出超過輸入的問題，依舊是殘留着的。不過，債務問題解決，其他的事體就比較容易處理了。

自然，外國人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不以美國一般人的觀點來考察美國之經濟地位問題，那定然是容易多了。歐洲因為不能發現償債的可能方法，顯然想對美國賴債；歐洲製造業者因為萬分需要擴充其貨品市場，自然想美國低減關稅。但在美國，她決計不肯單為歐洲諸國的便利而放棄其債權，而低減其關稅。並且，當她看着歐洲各國在忙於拋棄自己自己的經濟機會，並使其自救的工作胡亂的弄到極困難的地步時，她更自不樂意給予她們這種便利。在美國人看來，歐洲各國的關稅境界，比較圍繞在美國廣大領域四周的高關稅壁壘，還要可笑多了——事實確是如此。加之，歐洲諸國對於軍費的龐大支出，以及其小規模國家主義在經濟上的損失，已使美國人深深感到歐洲不配接受其寬大的待遇。在事實上，

歐洲如想美國採行比較寬大的經濟政策，她有一個實現此種願望的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她首先調整自己內部，俾其向美國談判時，不表示自己是一個相互分離且常相仇視的雜合體，而是一個在財富上，在人口上，在內部自由貿易上，都足與北美洲並駕齊驅的經濟的統一領域。

第七節 外國貿易的理論

本章以前諸節，都在討論世界貿易及各國關稅政策的現狀，至關於學理方面，則殊少論及。我們講過，戰後傾向經濟的國家主義——在戰前已經存在——的趨勢，漸形強烈，且逐漸擴展到較廣闊的領域。那怕是那些在過去極力擁護自由貿易的國家——特別是英國——亦相因改變其政策，並為報復其他各地的保護主義，而採行某種方式的保護。在此種現狀下，我們就得考察一下，看那冒稱為科學（a world-be science）的經濟學，究能在那種限度，說明這兩種對立制度——即保護制度（或經濟的國家主義），與自由貿易制

度（或在資本主義制基礎上之競爭的國際主義）——的利弊。

然而，一陳述經濟學者的見解，馬上就會使我感到困難。因為一切經濟學派，都是沒有一致的見解的。誠然，在經濟學說史上，曾有一個劃然各別的分野：一派主張經濟學原是關於交換制度的體系，與政治學判然各別，並且那還要在可能範圍內避免政治的干涉；另一派則認定經濟學與政治學結有不解之緣。這兩派中的前一派，在英國有許久許久就完全支配其國家的經濟政策，支配其普通學校與大學的經濟學的講義，以致英國一般輿論，幾乎都把自由貿易的經濟學說，看作是由諸般根本法則所歸納出來的毫無疑問的結論。自亞丹斯密（Adam Smith）時代以來，英國一切經濟教科書，差不多都把自由貿易論理解作是現代社會之國際分工的理論，而分工則由此論定為經濟交換的基礎。英國人一向對於這種理論，不但容易看為是適乎英國國情的通則，且看為是能同樣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之普遍經濟理論的根本法規。但是，英國這種定型的教義，雖然時時或多或少的影響歐洲大陸的或美國的經濟學者，但他們却都不贊成英國此種學說。在英國經濟學者之

間，保護主義是常常不能得到贊許的，無論如何，那總不免要被他們解作是對於自由貿易正論的一種矯揉的歪曲。但如加雷（Carey）一類美國人，如歷史學派一類德國人，他們却在完全與亞丹斯密不同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經濟理論，且從來不肯承認亞丹斯密的根本假定。特別是德國的經濟學者，他們往往一開始就把政治經濟或國民經濟，看作是國家政務（state craft）的一個部門，並指明一切經濟思考，都在以謀國家社會福利為目的，而不在于以創造最多的總財富為目的。

自由放任學說

為要理解這兩種對立的意見，我們必需把這兩派經濟學者形成

其學說所根據的基礎與假定弄個明白。亞丹斯密及其英國後繼者的根本假定，乃是一個企業社會的私人經營，在此社會中，個人企業者努力為獲取利潤而生產貨物。他並依此目的，使用一切的生產要素。此種企業組織的存在及其活動，都被認為是與國家的任何行動不相關涉。國家在某些方面，誠然是不能不干涉企業經營，且對企業經營提示其活動的條件。但其假定却是主張國家的這類干涉，應當縮減到最少限度，並以為國家干涉即令有其

他的原因存在，亦往往不免有縮減創造的總財富的趨勢。所以，亞丹斯密雖以政治的理由辯護英國航海條例（The British Navigation Laws），但却以爲這條例會縮減英國財富總額。現代英國經濟學者亦同樣的，一方面辯護工廠法（Factory Acts）、最低工資法（Minimum Wage Laws）以及其他保護方式，以爲這於促進人類幸福爲必需，但同時却又把這等等保護方式，解作是必然要在某種限度干涉財富生產企業之無可避免的損害。干涉的限度，儘管有逐漸擴增的需要，但他們仍以爲每種干涉行動都須根據特別的社會理由，因爲干涉是必然要抵觸經濟的個人主義之根本假定的。

因此，我們知道，英國經濟學之基本概念，就是一種根本離國家獨立之企業組織的概念。但是，假如企業組織的性質是如此，她就顯然沒有理由局限於任何國家的束縛，或更注意國家的限界，而比較不注意各國強加於其自由活動的干涉。當經濟關係實行變成了世界的關係，這種經濟理論亦相因而變爲世界經濟理論。這時，根本的經濟目的，就要視爲是無關國界的世界總財富的增加；並且，那些超越國界而活動的企業者的行動，將與純粹國

內的交換行爲，在概念上沒有根本的差別。就正統的英國經濟學說而言，在對外貿易論與國際經濟關係論之間，實沒有何等差別存在。國外匯兌理論誠然是存在的，因為，在通貨繼續以國爲基礎的限內，要作超越國境的支付，勢不能不把一國的貨幣，換爲他國貨幣。但英國經濟學說的理想，却是這樣一個世界，就是，在這個世界中，政治的境界界即使繼續存在，亦必在可能範圍內避免干涉企業組織之世界的統一。

因此，亞丹斯密及其後繼者的根本理論，與其說是國際的，就寧不如說是世界的。他們所設想的，不是在各國之間組成經濟關聯，而是在經濟事實上完全超越國家的東縛，或者至少是承認這些國家東縛，只存在於國家行動必然會因『非經濟』理由，與經濟活動發生衝突的場合。凡屬由這些假定出發的理論，必然要視自由貿易制度爲根本正當的制度。但是，那怕就在這種理論結構中，國家也許還不難在特殊的情形下覓得一種採行關稅政策的口實。特這口實根本要是非經濟的。

李士特的國家經濟學

與這種世界經濟學說尖銳對立的，就是從國家觀點考察

企業活動，且視企業原為國家政務之一部門的經濟學說。這種國學經濟學(national economic)的典型擁護者，通常是推斐特烈·李士特(Friedrich List)。不過，在理論上，這位學者實在受了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的極大影響。他雖然是經濟學上之「國家體系」(national system)的辯護人，他仍視自由貿易為一個經濟發達國家最後必須採行的政策。他希望德國或美國採行一種保護關稅制度，以便保育其國家的工業與商業，使其國家臻於更富更強之境。但當保護主義一成就其普遍發展國家經濟制度的工作時，則關稅障礙撤除，自由貿易時代開始。李士特認定英國的經濟優越，是在其十九世紀上半期撤除的關稅壁壘下造成的。在他看來，英國的經濟狀況，已經發達到了最適於施行自由貿易政策的階段。而德國與美國，則須藉着保護方法，經歷類似演化行程，以便完成那種看作是國家最後發達階段的自由貿易。

至關於工業商業通由私人進行的根本假定，李士特與亞丹斯密並無出入。自由貿易——即一國允許他國貨物自由輸入本國市場——在李士特心目中是一種理想，因為他

與亞丹斯密一樣，把企業組織與政治組織看爲是判然各別的東西，特對企業組織完全不受政治組織干涉的亞丹斯密的主張，則非李士特所能同意。李士特要求一種支配經濟政策的政治政策——即求國家健全的觀念。不過，他亦認定經濟學與政治體制在某些方面不能混同，並以爲經濟學的目的，在創造一國境內的最大可能的總財富。他與亞丹斯密不同之點，就是亞丹斯密所考慮的主要是全世界的財富，而李士特所考慮的，則是某一個特定國家的財富。

李士特如以國家主義爲其立論根據，他就不復能設想自由貿易定爲一種正當制度。誠然，他是視此制度在結局將爲一切國家的正當制度，但沿着他這種議論的線索，是定然不會引出這樣的結論的。即令說，普遍自由貿易的效果，一定可以保證世界最大可能之總財富的增加，但我們並不能即此就說，這將是對於每個各別國家的成果。一國採用保護政策，即令會使世界財富較其不採行此種政策要趨於減少，她本國的財富却說不定會由此增多。所以，對於由國家觀點出發的經濟學者，根本無從預知自由貿易（或保護政策）是

好是壞，那在他們是一個方策的問題，此種問題的解決，一視每個國家之經濟發展階段的特殊情形而定。

不過，對於經濟學之國家的概念，是能够較之李士特更推進一步的。李士特認財富上的最大限度生產，為根本的經濟目的。但在澈底的國家主義，却不能同意此種見解。因為，在此種國家主義看來，財富只是國家許多要求目的物之一，從而，一國最大限度的財富生產，將不免要從屬於其他視為較重要的國家活動。此種見解，始為黑格爾主義（Hegelianism）之廣泛體系的一部分，據此嚴格講來，經濟學並沒有它自己的目的。經濟學的任務是在服務，在謀國家的福利（不論這種福利的成果如何）。在根本原則上，與黑格爾主義有密切關聯的現代意大利的法西主義，對於企業界與全國民生活相關聯的這種概念，大概是會接受的。可是，就在這種見解上，亦同樣不會預言其究係傾向自由貿易抑是傾向保護政策。正如在李士特心目中一樣，在強調此種見解的人看來，這是一個純粹方策的問題，他們沒有作李士特那種假定，說自由貿易將是一切最發達國家所當採行的政策罷了。

國家社會主義與國際社會主義

我們大體算考察過了這兩大經濟學派——一派是國家的，一派是世界的；一派使創造財富的企業從屬於其他國家活動，一派則努力使國家對於企業的干涉，限制於依非經濟理由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但是，它們對於國家應否規制企業的意見雖不同，而對於企業係進行於競爭的私人事業制度之下的主張，則無二致。自由貿易者認定私人事業是超越國界的普及於世界的事體；保護主義者則以為那只是進行於國家政治制度的限界之內。但無論如何，兩者都視私人經營為經濟活動所取的主要形態。現在，我們將進而考察其他非從此基本假定出發的思想派別。約在十九世紀初期，社會主義者與個人主義者之間，乃至在世界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曾經發生過經濟學說的衝突。社會主義也如同經濟的個人主義一樣，能够採取國家的形態，也能採行世界的形態。羅伯特·奧文（Robert Owen）的社會主義是世界的，他心目中的世界，是由一種根據合作原則造成的自治村落社會所組織的世界。嘉爾·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亦是世界的，他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謂其分枝普被於全世界，結局乃由內在的矛盾，激起世界革命。

然在拉塞爾 (Lassalle) 的社會主義，則大體是國家的——他是通常稱爲國家社會主義 (State Socialism) 的真正建立者。國家社會主義的實際發展，乃藉助於各國社會民主黨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雖是遵奉馬克斯主義，但它們所信仰的馬克斯主義，却不屬於馬克斯，而比較接近拉塞爾。因爲，每個社會主義者的政黨，首先不能不從事一種以國家爲基礎的初步鬥爭，並不能不大體限定其政策於國家的範圍；所以，它的社會主義的表現，是要求產業國有化，要求依賦稅方式使國民財富有較適當的分配，而至較近，則藉國家經濟計劃，以達成其目的。在其促進各國民間的友愛，與促進各國家單位間的更密切合作的意義上，這種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是國家的，也可以說是國際的。但一究其本質，那在一方面固不像奧文或馬克斯所主張的世界主義，另一方面也不像由亞丹斯密及其後進者在古典經濟學說上所表現的世界主義。這是自始就在共產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之間存在着的根本不同的分野。依二十世紀的情形重行陳述，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斯的世界主義，其目的在世界革命。而與此根本不同的國家社會民主主義，則是

企圖在每個國家機構中，由議會取得政權，由是在每個國家中建立一種能為國際合作基礎之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然而無論那派社會主義者，對於歐美正統派經濟學者中之世界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賴以建立其學說之經濟個人主義的根本假定，都不能接受。在他們無論那派看來，自由貿易與保護政策之間的爭論，簡直沒有多大意義，充其量亦不過是表面的吵鬧。國家社會主義者要求使每個國家的經濟生活形成為政治制度的一個部門，並且，這顯然含有以次的意義，就是，在此種制度下的超越國境的交易，不是發生於個人企業者之間，而是發生於各國國家本身之間，或者是由國家直接指導監督的機關進行。自由貿易沒有含着國家干涉的意味。但一個國家則非干預她自己的事體不可。因此，國家社會主義要求在當作經濟單位看待的諸國之間，施行有組織的交易，她這種交易政策，根本與正統學派所理解的保護政策或自由貿易政策，絕不相符。

俄國對外貿易的現狀 以世界的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出發的俄國，現在居然在世

界創造成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大典型，這是有些使人感到眩惑的。俄國共產主義者之向着這方面努力，那無疑不是出乎他們的本意。他們因世界革命不能按照計劃完成，乃迫而採行這種途徑。在他們看來，當作一個國家看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埃聯邦共和國的觀念，或目前的政治國界，都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他們樂意把那些願意接受蘇維埃制度的其他地域，甚至全世界，都包括進來，使其變為經濟計劃之統一領域的諸部分。俄國人已經迫而建立起了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但他們這種國家社會主義，沒有參雜着國家主義者的企圖在裏面。他們在意志上，仍是支持嘉爾·馬克斯的世界主義，不過，他們的領袖們，現在覺得走向社會主義世界之路，比較他們籠罩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空氣中所相信的，要遼遠得多，要曲折得多了。

當前的俄國政策，在事實上是國家的，在觀念上是世界的。不過，她這種世界主義，與亞丹斯密及其後繼者的自由貿易世界主義，沒有共同之點。因為她根本是建立在計劃經濟的觀念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觀念上。蘇維埃社會設有各種適當的經濟機關，她由

這些機關決定各種生產部門應在何處，並在何種限度進行生產；應如何交易，應以怎樣的價格買賣。所有這些經濟事項，統依精密而審慎的方策進行，毫不依賴古典經濟學者們所樂於假定的那種基本經濟和諧。俄國實在沒有關稅壁壘存在，因為她能控制貨物的移動，無須多此一舉。不過，她的貿易正如同其生產一樣，都要社會化，組織化，不聽其自由找尋銷路。在世界的社會主義之下，所有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之間的爭論，將都為普遍的世界經濟計劃所克服。

但在國家社會主義，却不能完全做到這個地步。處在今日這種地位的俄國，她不能不與其他尚由個人主義原則支配的世界進行貨物的交易。她在她自己國境內施行對外貿易的獨占，那是蘇維埃計劃經濟制度之一必然的與必需的部分。但在她的國境之上，她所遇着的，不是與她自己一樣的國家，而是一大些私人賣買者——即她必須出售的物品的私人購買者及她所須輸入的物品的私人販賣者。這一來，蘇俄在她對外貿易的關係上，就好像必然要與其他國家之普通資本主義貿易商人，處在極其相同的地位。但實際是決非

如此的。從大體上說來，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只能發生於一種場合，在那場合，個人輸出品生產者，期望由其生產特定輸出品，多少獲得一項利潤；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入，亦只能發生於一種場合，在那場合，個人輸入者，期望由其輸入品再賣，多少獲得一些贏利。若在蘇維埃社會，則根本與此不同。她是爲了要滿足其經濟計劃的要求，才需要由海外購買若干貨品。並且，她爲了要購買這些貨品，才必須爲求此費用之得到填補，而建立充分的信用。對於此種信用，她除了暫時由借款融通周轉外，其唯一取得的方法，就是輸出自己的貨品。但是，生產這些輸出品，國內的費用，幾乎完全不成爲決定其在外國市場售價的要素。其貨品在外國市場的售價，不是看她生產費的多少，再加上利潤，而是看她所能獲得的價格。那價格也許或多或少於其生產費，其多少一聽他國同類物品之普通世界價格水準而決定。她把出賣輸出品所能獲得的外國通貨額，用以購買其必需的輸入品。這些輸入品，或是直接用以充當蘇維埃工廠中、鑛山中或鐵道上的生產工具，或是用以販賣於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內的消費者。其賣價與其由外國貨幣計算之買價，並不一定持有必要的關係。蘇維埃聯邦

共和國在其外國貿易支付的平衡上，如其不用補助其對外貿易，或由對外貿易獲取一種利潤，則她對於其輸入品的售價，只要按照其為償付此輸入品而輸出的貨物之國內生產費計算就行。因此，在每個私人方面輸出輸入的利潤或損失的全部問題，在蘇俄則成為毫無意義。蘇俄所待考慮的，只是她究須為購買必需的輸入品，輸出多少？她所能購買的輸入品的數量，勢將取決於其所能輸入的剩餘物品的數量。資本家製造業者要在外國市場『傾銷』其貨物，必定要受其進行業作所要求的平均利潤的限制，但蘇俄『傾銷』却無此限制；因為，她如廉價投資其輸出品，其僅有的影響，就是縮減其所能輸入的數量，且提高那種輸入品對於她的生產費。

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定然要趨向這種途徑；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總是企圖在多少有利的條件下，進行實質的物物交換。假如有兩個都擁有國家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相互交易，則其交易中之物物交換要素，將要顯明確著多了。那怕『計算上的貨幣』仍用作計算的基礎，其交易方式，將不是以貨幣分別支付，而是直接以

物易物。假若社會主義通行於世界，則在對外貿易上，會有以次兩種現象之一發生：其一是
一切對外貿易，因一切政治境界消失與全世界變為一計劃經濟組織，而不復存在；其一則
是世界區分為多數社會主義社會，這些社會將主要在有組織的、通的、有於無的體制下，進行
物物交換。但無論那種現象實現，都是用不着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政策的。

第九章 財政與賦稅

第一節 國家支出的增加

關於關稅的尖銳提高，我在前章已討論過了許許多多的促進原因，這些原因之一，就是各國對於收入需要的增大。依普通情形而論，關稅誠然有一種強有力的保護的目的存在。但從國家課稅的觀點說來，其開發財源的作用，却亦不庸忽視。關稅壁壘雖再高，許多貨物依舊會突破此壁壘而衝入，而稅率高到實行禁止輸入那種限度的貨品，那究竟是極其有限的。但保護關稅不論高到怎樣的田地，設一旦予以取消，大多數國家將不免要喪失其巨額的收入。就因此故，這種關稅乃迫於工業的與財政的有力牽制，而存續下來。但我們並不能即此就說，現在課加極高關稅的國家，將因其關稅的減低，而喪失收入；因為現行稅率低減，則通過此較低關稅壁壘而輸入的貨物數量，也許會大大增加。不過稅率的變動在輸入

數量上的可能影響，通常是極難估定的，並且，那些慣於依一定率關稅以平衡其財政預算的國家，總會因財政上的理由，不願意低減關稅，而倒非常容易接受那些進一步抬高關稅的計劃。

此種情形，以大戰後尤為顯著，因為在大戰後的那個時期，有兩種促成此種情勢的理由存在：第一，自一九一四年以降，各國國家支出水準，皆大大提高，支出提高的原因，大體固由於政府對於通常政務及社會事業上的支出增加，但也由於——在那些參加戰爭國家，則有極大一部分是由於——債務負擔的加重。第二，在過去數年間，即自世界不況發生以來，各國愈益感到她們的收支預算，難於維持平衡。其賦稅收入儘管因不況而低減，同時，其支出中有許多項目，却無法緊縮，且有些項目還隨不況以前的人口增加與新事業擴增，而自動的增加起來。迄乎今日，大多數國家都難於找到平衡其預算所需的收入。同時，所得稅付納者方面，工業方面，又強烈要求減輕賦稅負擔。在此種情形下，國家乃不得不竭盡所能，提高那些納稅者不能完全意識到的負擔，由是使她在可能範圍內，力求增加那種出自商

品間接稅方面的收入。消費者在大多數的場合，儘管非支出這種間接稅不可，但他們無法組織起來，且其納稅方法，又不像付所得稅付營業稅那樣顯而易見。加之，世界物價是曾有尖銳跌落的；物價跌落，關稅的影響乃比較不為消費者所注意，從而，他們對於加擔於其購買力上的較高關稅，亦遂比較不會引起怎樣嚴重的不平喧嚷。

我們講過，自戰前以來，全世界的賦稅水準，皆曾尖銳提高。以貨幣計算，英國在一九二八—一九年這一財政年度的國稅，竟超過其一九一三年度國稅四倍以上。德國國稅則約為其戰前五倍。不過，德國的此種比較，多少要因其國家與各別聯邦間之關係的變遷而有所更改。美國國稅實超越其戰前五倍。若法國，則不過增大兩倍罷了。各國的地方稅如連同國稅一起比較，其情形多少不同。法國稅收依舊為戰前兩倍，英國則還不到三倍半，美國略多於四倍。這些國家賦稅負擔的增加，主要雖由於債務的膨脹，但同時也由於中央政府對於大大擴展的社會事業之直接創設或間接補助，此外，更還由於以前由地方團體負擔的若干支出，現在都改由國庫開銷了。

主要各國之戰前戰後收入

	英國 (百萬鎊)		德國 (百萬馬克)		法國 (百萬佛郎)		美國 (百萬金元)	
	戰前	戰後	戰前	戰後	戰前	戰後	戰前	戰後
國家收入	一六三	一六五	一,六〇〇	九,三三七	四,二四四	四,七六六	六六一	三,四三三
邦收入	—	—	一,一四〇	—	—	—	三〇四	一,五〇七
地方收入	—	—	—	—	—	—	—	—
總收入	一六三	一六五	一,六〇〇	九,三三七	四,二四四	四,七六六	六六一	三,四三三
總收入增加百分率	—	—	—	—	—	—	—	—
國家收入增加百分率	三三	三三	—	三七	—	—	—	—
總收入增加百分率	三三	三三	—	三七	—	—	—	—

戰前戰後賦稅所占國民收入之百分率

國別	戰前	戰後	每人所納之稅 (一九一三年)
英國	一九一三	一九二四·五	一〇〇
德國	一〇·五〇	二九	三四五

國別	國民收入 (十萬萬金元)	每個人民收入 (金元)	與英國每個人民之百分比
法國	一四	二〇	一八〇
意大利	八·五〇	二〇	—
瑞士	七	一五	—
美國	六·六七	一一	二七四

英美兩國除債款利息以外之國民收入

國別	國民收入 (十萬萬金元)		每個人民收入 (金元)	與英國每個人民之百分比
	年度	一九二四		
英國	一九一四	一九二四	一九一四	一九二四
美國	一〇·七	一七·二	二四八	三八四
美國	三七·一	七九·一	三七五	六九七

主要各國包括債款利息之國民收入

國別	年度	國民收入 (十萬萬金元)	每個人民收入 (金元)	與英國每個人民之百分比
英國	一九二四	一九四	四三五	一〇〇
美國	一九二七	七六·四	六五二	一五〇
美國	一九二八	一五·五	二三一	五三

法國	一九二七	八九	二一八	五〇
意大利	一九二五	五六	一四〇	三二
比利時	一九二六	一八	二二三	五一

戰前主要各國每個國民以鎊計算之國富

超過四〇〇鎊 美國。

超過三〇〇鎊 英國, 法國, 阿根廷, 加拿大, 澳洲。

超過二〇〇鎊 德國, 瑞士。

超過一五〇鎊 荷蘭, 瑞典, 丹麥, 比利時。

超過一〇〇鎊 西班牙, 意大利, 奧匈。

超過七五鎊 俄國, 挪威。

超過四〇鎊 日本。

不足三〇鎊 印度。

主要各國之國債

國別	單位	一九三十四	一九三〇	增加的百分率
英國	百萬金鎊	六六八	七,五九六	一,〇三七
美國	百萬金元	一,〇二八	一六,一八五	一,四七五
法國	百萬佛郎	三四,一八八	四八二,一七九	* 二八二
德國	百萬馬克	四,九二六	一〇,三七五	十一一
意大利	百萬里爾	一五,二八一	八九,八七六	* 六〇
日本	百萬圓	二,五〇六	五,九五九	一三九

* 酌量通貨的貶價情形。

† 不包括賠款。

在一九一三—十四年度及一九三〇年度每個國民依當時金鎊金元市價分擔的

國債

國別	一九一三—四(金鎊)	一九三〇(金鎊)	一九一三—四(金元)	一九三〇(金元)
英國	一五.	一六六	七三	八〇八
美國	二·五	二七	一二·二五	一三一
法國	三三	九五	一五七	四六六
德國	—	八	—	三九
意大利	一八	二三	八八	一一三

國民收入 這些表示各國賦稅相對增加的數字，須得就負擔賦稅能力上之相對變動的若干考察，加以補充。因為賦稅最好是就其對於國民收入及分配的關係來考察的。事實上，國民收入大的國家，其負擔賦稅的能力，固顯然比較國民收入小的國家為大，同時，負擔賦稅的能力，還會以較大於收入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因為，除了那些須由政府或地方當局以不取報酬的形式施設的必需事業，應由一般人民擔負以外，賦稅顯然應當課加於超過必需支出的剩餘收入之上。因此，國民的總收入額及其分配，會大大影響一國負擔賦

稅的能力。至所課賦稅的性質，亦有加以連帶考察之必要。賦稅之種類不同，其對於社會各階層人民，乃至對於各收入形態，都有極其不同的影響。

關於世界主要各國之國民收入與賦稅間之關係，現還沒有一種可靠的估計，但參加世界大戰的若干國家之財政支出，現在顯然要吞沒其國民總收入的一大部分。就英國說吧，一九一三—四年度之國稅與地方稅總計，約占其國民總收入之百分之二二又二分之一；至一九二四—五年度，據某種估計，其比例增大至百分之二二；據其他估計，竟增大至百分之二五。目前的賦稅，因為是由財政緊急的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所課加，同時，世界不況以來的國民收入又頗形減退，故此賦稅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比例，一定更高許多。英國賦稅對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已經算够高了，但比英國更高的，還有德國。在大戰以前，德國的這種比例，一般估計是百分之二〇又二分之一，至一九二四—五年竟已抬高到百分之二九，而此後且還進一步提高。法國戰前的國稅地方稅，約占其國民收入之百分之四，至一九二四—五年，則約為百分之二〇。美國在戰前的此種比例，不過百分之七，在一九二四—

五年，亦只百分之一。世界不況發生以來，美國的數字，自大有增加，但那種增加，由於國民收入減少者多，由於賦稅增課者少。設略略改變上列數字的配列，我們就會達出以下的結論，就是在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二四年的這十年中，每個國民的賦稅，英國約增至百分之二四五，法國約增至百分之八〇，美國約增至百分之二七四。不過，關於德國，我們還不能引出可資比較的估計。

支出增大的諸種原因

試一覽各國的國家收支數字，我們就很可能瞭然於其賦稅之所以大增特增的大體情形。前面講過，賦稅大增，一部分是由於政府費用的增多，和社會公共事業的加大，而一部分則是由於附息債額的擴增。英國現在的國債，竟超過其戰前國債的十一倍，美國則超過其戰前十五倍。法國因為佛郎價值貶低到其戰前價值的五分之一，故其以金計算的國債實額，還未增到其戰前國債的三倍。德國的戰前馬克，實已在膨脹時期喪失其價值，故現在國債，僅及其戰前國債兩倍。不過，她這種國債數字，沒有包括協約諸國對她要求的賠款。無論是絕對的，抑是就其對於國民收入之相對關係言，英國現在的

國債負擔，比世界任何國家爲特重，這是最容易用一種共同通貨比較出來的。試以美國金元爲共同通貨，把各國一九三〇年的通貨換作金元計算，則同年度英國每個國民所負擔之國債爲八〇八金元，法國每個國民所負擔之國債爲四六六金元，美國每個國民負擔之國債爲一三一金元，意大利爲一一三金元，德國如除去賠款，其每個國民所欠國債，僅及三九金元，據估計，美國國債約爲其資財（非收入）之百分之八又二分之一，同時英國國債，則竟超過其總資財之三分之一以上。

有了這諸般考察，我們現在乃可進而研究世界主要各國使用其收入（主要得自賦稅，有一小部分得自其他財源）的方法，以及如何進行籌款彌補其支出所需的方法。特因各國政治機構不同，各國政府所從事的事業的性質不同，以及各國國家會計核算上的方法不同，要在她們之間作一種確實比較，殊不容易。下面所列之表，係就四個主要國家——美，英，德，法——加以大體一般的比較。此表對於支出，分爲三大部門，即債務，軍事與警察，以及包括政府一般費用的內務。在此四國中，以德國用在軍事上及國債上（雖然把賠款包

括在內)的支出爲最少;其軍事支出之少,主要係由於凡爾賽條約限定其軍備的設施。英、美兩國總收入之用在一般內務方面者,其比例大約相同。不過,此種比較,須受以次事實的影響,就是,美國關於教育一類社會事業的支出,有一大部分是出自地方收入。假若要製定一個包括地方支出的總支出表,則美國用在社會事業方面——儘管美國對於失業,沒有有效的救濟設施——的比例,就似乎要比英國的同一比例高多了。美國國家收入的最大部分,皆費在軍事及警察上,同時法國國家收入的最大部分,則是費在國債上,其國債方面所費過多,故其用在社會事業方面者乃極少極少。英國在軍事方面所費,較法國略少,在社會事業方面所費,則遠較法國爲多。至國債吸收其較大部分總國家收入情形,英法却相類似。法國對國債耗用者,占其總國家收入一半以上,而英國則占百分之四五。

世界主要各國耗用其國家收入的情形

國別	單位	一九二八年債務	軍務與警察	內務與一般事業	總數
英國	百萬鎊	三六九	一二二	三二七	八一八

美國聯邦	百萬金元	一、六三九	一、五五一	七八三	三、九七三
美國(中央與各邦)	百萬金元	一、七七八	一、七二一	二、三一	五、八一〇
法國	百萬佛郎	三〇·二	八·五	一三·一	五一·八
德國(僅屬中央)	百萬馬克	一、七〇四	一九〇	*七、四六三	九、三五七

* 包括撥通於諸邦政府的三、二一八百萬馬克。

上表之百分率配列

英國	四五	一五	四〇	一〇〇
美國(聯邦與各邦)	三〇·五〇	二九·五〇	四〇	一〇〇
法國	五八·二五	一六·五〇	二五·二五	一〇〇
德國	一八	二	八〇	一〇〇

英國的國家支出 我現在試就兩個社會政治組織極不相同的國家，比較詳細的探究其賦稅所得巨額收入實行使用的究竟。這兩個國家，一是英國，一是美國。英國在一九

三二一三年度，其總支出的估計是七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就中，有三〇八、〇〇〇鎊用之於國債方面——雖然償債基金已因金融危機半減，且對美債款未作償付準備。至國債以外的最大支出項目，就是在國家保護管理下的社會事業，這項事業由國庫直接支出的金額，估計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多。就中，失業保險佔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鎊，戰爭年金約達四八、〇〇〇、〇〇〇鎊，老人及寡婦年金合計將近五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對於這幾項金額，凡屬由僱主僱工捐助者未經列入，其所列入的，僅係由國庫支出的部分。但爲要記出英國對這類社會事業所支出的總額，其他若干方式的支出，還須加上，因爲英國有許多重要事業，都係責成地方當局辦理，由國庫予以補助，國庫對這類大抵可以稱爲社會事業的項目所支出的補助費用總額，將近達到了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鎊。設把這兩大宗費用合計起來，則英國對各種社會事業由國家收入項下支出的，就約爲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其額數較其現在希望對縮減的債務（償債基金已經減落）所支出的，還要略多一些。但是，當年度對於美國的債務，如實行支付，則

國債上的支出，仍然超過社會事業上的支出。

把軍備負擔與國債及社會事業對照起來，那似乎比較輕多了。在一九三二—三年度，其額數計爲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鎊，與前述兩項費用分別比較，都只略多於其三分之一。但是，現在軍費在國家總收入中所占比例，雖較戰前縮減許多，但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仍不失爲一極大的金額，況在國家債務增加，和對必需的經濟發展計劃感到財源短缺的當前現狀之下，這種金額，亦頗不易支持哩！

現在且把同年度的估計的支出，與戰爭爆發的前一年度——一九三—四年——的實在的支出，一加比較吧：在一九三—四年度，英國國債項下支出的金額爲二四、六〇〇、〇〇〇鎊，而今年度則爲三〇八、五〇〇、〇〇〇鎊。國家對社會事業的負擔，前此僅爲一四、〇〇〇、〇〇〇鎊，現在則將近達到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對地方的補助費，前此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鎊，現在爲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鎊。此外，軍費則由七八、〇〇〇、〇〇〇鎊，增至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在大戰以前，英國除

去那些在目前移轉到愛爾蘭自由邦的種種負擔外，其總支出爲一六七、〇〇〇、〇〇鎊，而今日則竟達到七六六、〇〇〇、〇〇鎊。

要作一完全表式，頗有把地方支出包括網羅之必要。但在一九二八—一九年度以後，殆難獲得任何年度的滿意的數字。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度，此種地方支出額爲八二、四〇〇、〇〇鎊；一九二八—一九年度，則爲一九〇、六〇〇、〇〇鎊。設把此種額數，加入國家支出數字之中，並對愛爾蘭自由邦除外的情形加以斟酌，則英國與北愛爾蘭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度的總支出爲二四七、〇〇〇、〇〇鎊，現在爲九五六、〇〇〇、〇〇鎊。

英國的財政支出 (單位百萬鎊)

國債	支出 一九三一一—二	估計的支出 一九三二—三	支出 * 一九一三—四
利息	(三三二·〇)	(三〇八·五)	(二四·六)
價值基金	二八九·四	二七六·〇	一六·九
	三三二·六	三三二·五	七七

年金與保險	(一六三·九)	(一六九·七)	(一四·四)
老年年金	三八·二	三九·七	九·八
戰爭年金	五〇·四	四七·六	—
寡婦等年金(國庫捐助)	一〇·〇	一一·〇	—
健康保險(同上)	六·五	六·四	四〇
失業保險(同上)	五八·八	六五·〇	〇·六
轉助事項	(一五六·六)	(一四五·八)	(二六·八)
對地方收入補助	四六·二	四五·七	七·九
教育	五六·八	五〇·五	一六·五
房屋建築	一四·五	一五·三	—
道路基金	七·〇	二·八	〇·九
農業	五·七	五·〇	〇·四
衛生	〇·二	〇·二	〇·二
警察	一二·〇	一一·二	〇·四

失業	三·六	四·二	—
北愛爾蘭	九·七	一〇·二	—
其他	〇·九	〇·七	〇·五
國防	(一一·四)	(二〇六·一)	(七八·一)
海軍	五二·二	五一·一	四九·一
陸軍	四〇·八	三七·三	二九·〇
空軍	一八·四	一七·七	—
其他事項	(三八·〇)	(三五·九)	(二五·七)
賦稅徵收	一一·九	一二·八	四·三
在海外與在帝國方面者	二·九	二·七	一·五
帝國市場與殖民事業發展	一·四	一·〇	—
監獄	一·〇	一·〇	〇·九
科學研究等	一·三	一二·二	〇·五
失業者訓練等	〇·六	〇·四	—

工事建築等	五·六	五·一	二·九
退職恩給	一·九	一·九	〇·八
貿易上之便利設施	〇·五	一·〇	—
其他	一一·〇	八·八	四·九
總支出	七九·九	七六·〇	一五九·六
些許節約	八·七		一〇·七
	七八三·二		一七〇·三
		加上愛爾蘭的部分	

* 根據一九一三年國家支出委員會的報告數字。

美國的支出 試把英國國家支出與美國國家支出加以比較觀察吧！在一九一三年，美國由聯邦、各邦及地方收入中支出之金額，計達二、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至一九二八年，竟增至一二、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照下表所指示，美國總支出中由地方支出比例，實遠較英國同一支出比例為大；目前美國聯邦國債的增加，雖然使其

對於此項支出的比例，頗較大於戰前，但今日地方的支出，猶大大超過聯邦與各邦支出之合計。這原因，主要是由於社會事業，特別是教育事業的費用，有較大一部分是由地方的收入開支。另一個表，是把美國一九二八年的各種各樣的支出，儘可能分作幾個主要項目。從此，我們會知道，關於教育費用，美國與英國顯示出了極顯明的對照；美國的教育費用一項，幾與其國債項下支出者相當，那在其國家總支出中，占有極大極大的比例。不過，關於其他社會事業，美國的支出，却遠不及英國支出額數之大。

美國國家財政支出(單位:百萬金元)

	一九一三	一九二八	一九三〇	百分率	百分率
聯邦	六九二	三,九七〇	—	二二·七	三一·五
各邦	三八三	一,八二六	—	一三·一	一四·五
地方	一,八四四	六,八一三	—	六三·二	五四·〇
	二,九一九	一二,六〇九	—	一〇〇	一〇〇

美國一九二八年的國家支出(單位百萬金元)

	聯邦	各邦	地方	總計
教育	一五二·二	五一二·〇	一,九四二·九	二,四七〇·一
公路	九二·七	五八〇·九	一,一二七·九	一,八〇一·五
政務	三五八·〇	一〇七·〇		
檢驗	一,五五一·四	一七〇·〇		
經濟發展	一七八·一	六一·四		
社會安寧	五八·八	二三八·九	二,六九八·九	五,五二九·五
公共設施	七七·三	二〇·三		
雜項	·四	六·九		
債務償還	(二,三三三·九)	(一,六九七·五)	(五,七六九·七)	(九,八〇一·一)
	九〇五·九	五二·四	四〇三·五	一,三六一·八

債務利息	七三三·一	八六九	六四〇·三	一、四六〇·三
	三、九七二·九	一、八三六·八	六、八一三·五	一、二、六二三·二

第二節 收入的籌措

以次，我們要看主要各國是如何籌獲其收入。特我們待考察的，只限於比較其國稅，若地方稅以及地方公共團體的其他收入財源，則暫置不論。我已作成一個關於四主要國家籌措收入方法的顯明比較表，爲要使這種比較簡單化，我並在可能範圍內，把各種稅收加以廣泛的類別。但因各國稅制不同，萬難使這四國的收入項目絕對一致。這四國雖通有某種形式的所得稅、遺產稅以及關稅與國產稅收入，但法國德國由販賣稅或營業稅及財產稅（與所得稅不同）獲有大量收入，英美兩國却沒有此種稅收。因此，我遂勉強把財產稅與所得稅及遺產稅包括在一個項目下，大體代表直接稅的負擔；把營業稅與關稅及國產稅包括在一個項目下，大體代表間接稅的負擔。但法國的間接稅負擔，又曾進一步由登記

費、印花稅及其他類似稅收，徵取巨額資金，由是，我在這種場合，只好把它單獨分別表明。

由次表所示，我們將知道，在英國總國稅中，所得稅占百分之五一，遺產稅占百分之九，合計起來，此種直接稅占其全部稅收的百分之六〇。美國直接稅所占比例還大，其總稅收之百分之六六又二分之一，皆加擔在團體及個人的所得方面。不過，美國的遺產稅，却要比較英國的遺產稅輕微。至關於間接稅的徵收，儘管美國一向採行高率關稅，但其間接稅在總稅收中所占比例，比之英國間接稅在其總稅收中所占比例還小，就在英國新保護關稅課加以前，亦係如此。我們如由稅制大抵相似的英美兩國轉述到德國法國，則情形略有不同。法國總收入幾有一半——若把登記稅及印花稅包括在內，則幾及百分之六四——是由間接稅徵收，其中所得稅、財產稅（包括遺產稅）徵收部分，則尚不及百分之三五。其在德國，因她存在有許許多多難於類別的較小稅目，我們殆不易加以確實比較。但如其把這大部的稅目，類分在間接稅項下，其間接稅就要大大超過其總稅收的百分之五〇以上；同時，英美兩國的間接稅，則都只占其總稅收的三分之一。

英美法德四國國家收入中之賦稅來源

英國 (一九三二—三)

	百 萬 鎊	在總稅收中所占百分率
所得稅項下		
所得稅	二八七·五	四〇
附加稅	七六·七	一一
遺產稅	三六四·二	五一
貨物稅	六五·五	九
即稅	一三六·二	一九
國產稅	一一九·九	一七
	二五六·一	三六

其他稅收	二五·五	四
總計	七一·三	一〇〇

美國 (一九三〇)

所得稅項下	百萬元	在總稅收中所占百分率
(個人方面)	一,一四七	三一·六
(公司方面)	一,二六三	三四·九
遺產稅	二,四一〇	六六·五
關稅	六五	一·八
國產稅等	五八五	一·六
	四六二	一五·五
	一,〇四七	三一·五
其他稅收	三	〇·一
總計	三,五二五	一〇〇

法 國 (一九二七)

	百 萬 佛 郎	在總稅收中所占百分率
所得稅	九,六九三	二二
保證稅	三,三八五	七·五
其他財產稅	九〇三	二
遺產稅	一,九四二	四·二五
營業稅	一五,九二三	三四·七五
關稅	八,六〇五	一九
國產稅等	二,六一七	五·七五
登記稅印花稅及轉移稅等	一一,五四二	二五
其他	二二,七六四	四九·七五
總計	六,四一一	一四
	四五,七一八	一〇〇
	六二〇	一·五

德國 (一九二八—九)

	百 萬 馬 克	在總稅收中所占百分率
所得稅	二,九〇〇	三三·四
公司稅	五五〇	六·三
其他財產稅	五二〇	六·〇
遺產稅	一〇〇	一·一
販賣稅	四,〇七〇	四六·八
關稅	一,〇五〇	一二·一
國產稅等	一,五九二	一八·二
其他稅收	三,六九二	四二·四
總計	八,七〇二	一〇〇

間接稅

乍看上列數字，不免多少使我們感到驚異。因為，照自然的趨勢，一個擁有高關稅制度的國家，其依賴商品稅收入，理應較一個自由貿易國家——如最近不久以前的英國——要利害得多；但上列數字顯示我們的，却是英國的關稅收入，在其總稅收中所占比例，較之任何其他國家為大。如美國關稅收入為其總稅收之百分之一六，德國關稅收入為其總稅收之百分之一二，法國關稅收入為其總稅收之百分之六，而英國關稅收入，則為其總稅收入之百分之一九。這種反乎我們預期的情形，乃因英國徵取巨額金資的關稅，主要並非為保護，而是因其伴有一種課加於國內生產貨品的國產稅。英國一九三二年對輸入的揮發油、煙草、酒精及葡萄酒所課之稅，在其總關稅收入中，比較保護的關稅，要占有大得多的比例。當年度由『國民』政府課加的新稅，估計至少能增收三五、〇〇〇、〇〇〇鎊，此保護的新關稅實施，自然要使這種情形有所改變，但即令如此，它們在總關稅收入中，仍只占有小小的比例。一切較大的國家——那怕擁有高率的保護關稅制度——都不能掙得一大宗收入來源，够使其他稅收作相當限度的輕減。若較小國家的情形，則略

有不同；她們的支出較少，且比較要大大仰賴商品稅收入。例如就丹麥說罷，在丹麥地方稅與國稅合計的總稅收中，將近有百分之三九是由關稅及國產稅徵收，並且，由這個來源所徵收的稅額，實際比所得稅與資本稅之合計額數還大。爲要使這個較小國家的賦稅制度，與前述四主要國家之賦稅制度作一比較，我在這裏把丹麥的國稅來源表列出來。

丹麥的國稅來源（包括地方稅）（一九二九—三〇）

	百 萬 克 郎	在總稅收中所占百分率
所得稅與資本稅	一〇四	一五·五
土地稅與財產稅	二五七·五	三八·二五
遺產稅	一三	二·〇
關稅與國產稅	二六〇	三八·五
印花稅	一七	二·五
雜稅	二一·五	三·二五
總 計	六七三	一〇〇

在這種比較上，我們自然要牢記一點，就是我們所考察的，只是主要各國總稅收中的各種賦稅的相對的規模，而不要以為美國遺產稅、所得稅在其總稅收中占百分之六八，英國占百分之六〇，德國占百分之四七，法國占百分之三五，遂遮謂美國所得稅負擔較大於其他諸國。事實恰恰相反，美國因為其全部賦稅遠較他國輕微，故其所得稅亦定然要比較他國輕多了。

上面的比較，都只限於賦稅收入，而沒有包含賦稅以外的其他國家收入來源。所以上面列舉的數字，與散見於其他方面的總收入數字，不相一致。各國是差不多都有賦稅以外的收入來源的。如英國、法國、美國，通會在利息償付與國內償債基金的償付上，獲有大量的金額。法國與英國還曾由德國領受賠款。在前述四主要國家中，只有德國沒有這類重要的收入。此外，一切國家都擁有某種形式的財產；這類財產，可以獲取利潤，也可以賠補損失。例如，英國每年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上的非賦稅收入，這項大收入中，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鎊是得自郵政上除去一切國家經營費所剩下的淨利。但在另一方面，美國

却爲了提供其國民以極低廉的交通手段，每年竟爲郵政蒙到損失。凡由國家直接擁有直接經營的工業及其他事業，如有利可圖，並且其利潤得列入預算會計中，則國家收入將隨這類事業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如像美國郵政那樣，則國有國營事業每有增加，國家支出上就不免要增加其負擔。德國在戰前曾擁有這類重要的公共事業，鐵道即其一端，迄今日，她仍存有若干。但在道斯計劃下的德國鐵道，已經剝削其民有性質了；由鐵道獲有的贏餘，要提供國家，由國家支付協約各國的賠款。

負擔賦稅的能力 有了前面這種種概念，我們現在乃可進而簡單考察各種形式的國稅及地方稅，以及這類稅收對於工業，對於收入分配和社會購買力的影響了。常有人作這種提示，以爲任何國家的負擔賦稅能力，皆有一個絕對限度，因爲賦稅一課加到那種絕對限度，此後進一步增擔的賦稅，不是在企業經營上發生不利影響，以致減少其總稅收，就是在一般較貧窮大眾身上，增加其必需支出，使他們不能支持。但我們要任何課稅限度確定出來，却顯然是極不容易。因爲，這不但關係課加多少的問題，且要看所課金額究有

多少歸國家使用。像亞丹斯密一流的舊經濟學者，每以為國家的一切支出，都不可避免的帶有浪費的與不生產的性質，且視賦稅的負擔，單純是糟蹋國民收入，而這國民收入，則是可用以消費，或用以擴大生產能力的。但是，我們對於現代國家的賦稅制度，究不能看得這樣簡單。今日的賦稅，大體可視為一種有利於貧苦社會階層，或增進全社會效率的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使用在教育、房屋建築、公共衛生、社會保險以及各種救濟與年金方面的金額，如其使用得法，那都不能單純看為是耗費國民收入的無益浪費。像使用在這些方面的金額，不過是把國民收入換一個用法，使消費者失之於賦稅方面者，得取償於其他方面。社會事業愈發達，這種藉國稅、地方稅再分配收入的方法，就愈值得獎勵。這樣，整個賦稅制度的性質，將因此有所改變。而舊來負擔賦稅能力的概念，更會由這些使用賦稅的新方式，而根本予以修正。顯然，一個社會的支出，如用之於有用的生產的用途，就定然比較用之於非有用的不生產的用途者，更能大大普及於一般大眾。

國債利息 再者，今日大多數國家的國家支出，有一大部分是用以償付國債利息

及償債基金。這種用途所需的金額，都是由賦稅形式徵收。不過，由賦稅徵來的這項金額，隨即要返還國債所有者，成爲其手中能够使用或能够投資的收入。但若國債是由海外募集，其情形自然兩樣，因爲在這種場合，此種可供使用的收入，將償還於他國人民或政府，而增益他國的國民收入。但在內國公債的限內，這由賦稅徵取來的金額，往往一經收得，馬上就會重新分配。

根據這種理由，不時遂有人主張：國債如由國內募集，則不算是一國的真正負擔。但這種主張忽略了一個要點，就是，由利息及償債基金獲有金額的人，並不一定是以賦稅形式付出那種金額的人。並且，這種依利息償付獲有的金額，並不一定會有更妥當的重新分配。比如，由年金與保險支付的金額，有最大一部分入了社會貧苦人民的荷包，以增加其對於消費品——大部分是對於其生活必需品——的支銷；但是，由國債利息形式支付的金額，則大抵是由個人方面的富有者階級，由企業商店，由銀行以及其他擁有大部分債券的社團（corporate bodies）所獲得。社團得到的這種金額，自然會有一部分用之於慈善、教育以

及諸如此類的用途——因為普通學校、專門學校以及其他由捐資設立的文化機關，往往持有許多的政府債券。但政府由利息償付個人方面者，要比較其償付社團方面者多多了；個人方面由此獲得的金額，雖顯然有一大部分是由於國民收入依賦稅而重新分配，但這種重新分配，不但不能使收入平等化，且更將增加其不平。所以，利息所由償付的大量國債的存在，勢將大大抵消社會事業擴張所引起的收入平等化的效果。我們講過，英國對國債——包括對外債務——支出的金額，現仍較大於其對一切社會事業支出金額的總計，設換一個說法，就是英國在國債方面支出的額數，比較其所得稅的總額要多了，比較其所得稅與附加稅的合計額，只小得有限。由此，我們知道，英國由直接稅徵取的最大部分，立即就以債務利息及償債基金的形式，大體再分配於社會富有階級與其他各種社團了。

收入與支出的關係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收入的籌措與收入的支出，不能分開考察。一個擁有並經營有大多數公共事業的國家，其收入和支出預算，自然與一個讓此類基本事業由私人私有私營的國家，極不相同。一個負有大量國債的國家所當設想的國

民收入與其負擔賦稅能力之間的關係，自然與一個沒有多少國債負擔的國家的想法，不會一樣。最後，一個大體要依賴社會事業的國家，她不但要考慮各種社會事業方面的支出，依消費者需要所及於國民收入的影響，且要考慮其對於全部能夠課稅的收入的關係。因為，對於社會事業方面的開支一經取消，勢將不免大大縮減消費者需要，以致嚴重的影響工業利得，從而，影響那些主要加擔於較富有階級之賦稅所由徵取的金額。

在過去，經濟學者通常都贊成國家收入的最大可能部分，不取之於間接稅，而取之於直接稅。這有幾種理由：第一，測定直接稅的結果，一般都遠較測定間接稅的結果容易——對於徵稅當局容易，對於納稅者亦容易。就因此故，直接稅似乎較之間接稅適當而明顯，而間接稅則不能按照社會正義的考量，予以適當的分配。第二，今日普通的直接稅，大體都是課加於所得方面，另有一較小部分，則是依累進制度課加於遺產方面。照通常的辦法，所得稅設有一個定限，過此定限，即完全豁免。因此，社會最貧困的階層，都無須付納直接稅；他們的一點點所得，與其身後殘餘的一點點財產，皆得免稅。確定免稅限度的原則，自然是認定

此種稅收應當加摺在生活必需限度以上的剩餘所得方面，至若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所得，則不應課擔。實際上，除了極有限的奢侈品外，其餘所有課加在商品上的間接稅，都破壞了這種原則。對商品所課之稅，不可避免的要在某種限度直接間接的加擔於社會最貧困的階層。凡屬由商品稅或營業稅徵取的金額，決不能不課加在必需品上，因為在總消費量中，必需品占有最大的數量。加之，通常最容易課稅的商品，就是最廣泛銷場的商品。所以，課加在商品上營業上的稅收，結果都是會轉嫁到消費者大眾身上的。富有者所消費的許多商品，與貧窮人所消費的商品，並沒有怎樣大的差別，無論如何，其差別決沒有他們的收入差別之大。因此，間接稅如其用作斂取巨額國家收入的場合，那必然要在貧苦民衆身上加一重壓。此種事實，就其他形式的間接稅說是如此，就保護關稅說亦是如此。

近年在比較進步的諸國家中，曾有一種趨勢，這趨勢就是想藉加高直接稅或所得稅率，以便由富有者能負擔賦稅的剩餘中，徵收較多的金額。遺產稅亦經增大了，其累進率則比較增高。不過，就各國已經實施的遺產稅看來，那都沒有達到足以嚴重妨害私人蓄積大

量財富的程度。在英國，對於主要靠地產所得的少數地主階級，也許實在苛重一點，但這確實只限於極其有限的土地所有者。至關於企業上以及由成功的投資與投機，以從事大量財富蓄積的活動，則極少受到遺產稅增加的妨阻。假若按照利格拿洛教授（Prof. Riggs）及其他學者所提示的，把遺產稅用作一種使大部分國富社會化和使大私有資產漸歸消滅的手段，則從來所徵取的規模，將要完全改變過來。現在許多國家，都還是把她們由遺產稅得來的金額，看為其正常收入的部分，而不看作資本。但是，這種稅如其要用作財富社會化的手段，則由此得來的金額，就顯然要視為資本，而不要用以平衡其普通的支出。關於此點，我將在後面從長討論，這裏只能在直接稅項下，合理的把現行遺產稅看為與所得稅相類似。

直接稅與間接稅 所得稅與遺產稅這兩個稅收項目，都是現代賦稅制度中之主要進步的要素；因為它們大體都是加擔於社會較富有的階級，且幾乎是依賦稅制度，對社會收入作有利於較貧窮人民之再分配的唯一手段。在另一方面，商品稅或營業稅會轉嫁

於一般消費者大眾的情形，我已在前講過了。從徵稅者的立場看來，這類稅的主要價值，就是它們通常比較直接稅要容易處理多了。對進口貨課加關稅，那固然容易，對國內製造的商品徵收國產稅，那亦不怎麼困難。但一國要確實調查其人民實際所得的額數，以爲其課加所得稅的基礎，或者是爲逐年抽稅，或當所有者死後抽稅，而評價其財產，那都是再困難不過的事體。

在此兩種稅中，所得稅的徵收，特別不易；要求所得稅有效的實施，那只能期諸經濟發展已達到極高度的國家。英國曾於拿破崙戰爭當時，開始試行一種所得稅。但因輿情洶湧反對，和徵收上的極度困難，以致戰爭甫告結束，這種稅即實行撤除，直至一八四二年，才又重新徵收。美國聯邦政府的所得稅，係開始於美國憲法實施修正的一九一三年。若法國的所得稅，則是因爲歐戰中的支出負擔增大，而於一九一六年實施。即在今日，法美兩國所得稅徵收的效率，猶遠不若英國。因爲，要完成這種稅收所需的機關，實非短時間所能做到，而美國納稅者，尤其法國納稅者之間，迄今對於私人所得的必需調查，仍表示強烈的反對。法

國所得稅在徵收上無疑有頗大的偷漏，即如英國更嚴厲的強迫財源公開，且其公開程度確比英國還大的美國，其徵收的手段，仍是極不完全。英國納稅者也許會因所得稅的過高而鳴不平；但他們雖鳴不平；稅還是納，逃稅額極其有限。法國納稅者亦還是嚷叫不平，但他們却仍在相當限度內避免納稅。

英國國家財政收入（單位百萬鎊）

國內收入	一九三二—三三年度實收	對一九三二—三三年估計	一九三三—三四年實收
	金額	的收入金額	金額
所得稅	二八七·四	二六〇·〇	四三·九
附加稅	七六·七	六六·〇	三·三
財產稅	六五·〇	七六·〇	二七·四
印花稅	一七·一	二三·〇	一〇·〇

其他	三四	二〇	三四
關稅與國產稅	四四九·六	四二七·〇	八八〇
關稅	一三六·二	一七四·六	三五五
國產稅	一一九·九	一二五·四	九五
其他稅收	二五六·一	三〇〇·〇	七五〇
摩托車稅 (屬國庫方面者)	五〇	五〇	—
總稅收	七一〇·七	七三二·〇	一六三〇
其他收入			
郵政剩餘	一一·五	一一·七	六二
其他收入	四九〇	二三·一	四四
普通總收入	七七一·二	七六六·八	一七三六
收支品抵項目			

郵務	五八〇	五九二	二四六
道路基金	二二五	二二九	—
總收	八五一七	八四八九	一九八二

賦稅對於工業的影響 關於所得稅在企業活動上的影響，從來是議論紛紛的。比

如就英國說吧，英國工業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以及其他代表製造業與貿易業利益的團體，曾經不斷的訴說所得稅水準過高，並聲言那對於工業大有妨害。在另一方面，加爾文國債國稅委員會(The Colwyn Committee on National Debt and Taxation)却在其一九二七年的報告中，採取反對的立場，它堅決表示：所得稅即令再高，亦不一定會在企業上與僱傭機會上發生有害影響。這兩方面的爭點，是極不容易解決的。照加爾文委員會的主張，所得稅僅僅是課加在已經實現的利潤上面，而這利潤的最大部分，且還實行配分於個人領受者而成爲其所得。根據此種事實，所得稅並不能影響企業者對於生產貨品的刺激，因爲他們所期望的利潤額，並沒有由此縮減。況且，一個創造利

潤的公司，並無須爲其掙得的利潤支付所得稅；所得稅是課加在那些以紅利形式領受此利潤的個人股分所有者，並且，他們這班人的各別總所得，如其在免稅定限以下，亦且無須繳納。

這種說明，誠然不一定適用於那一部分利潤——卽不以紅利配分於股東，却以積存金形式保留於公司方面的利潤。在英國，這種積存金是依標準率課稅。企業家動輒主張未配分的利潤課稅，將阻礙資本蓄積，從而，大不利於企業經營。但我們須得指明：英國公積金是按照標準率課稅，這一來，那些總所得頗大的股東，將在這種課稅方式上，討得便宜，因爲他們由此支出的標準稅，比較其由紅利所得應支出的所得稅，要少多了。利潤經公司方面積貯起來，個人所有者就可在資本增加的形式上，避免所得稅的徵收。結局，這種對公積金只課標準率稅的現行制度，就大有利於富有股東，而於較貧的股東爲不利。因爲對於公積金的標準率稅，大家都是一律平均負擔，若把這留作公積金的金額配分爲各股東的個人所得，則有些人所付的所得稅，將較其依標準率付出的爲多，另有些人所付的所得稅，將其較

依標準率付出的爲少，還有一些人則完全無須納稅。但企業公積金如統通免稅，那企業家將強烈要求少配分其利潤爲紅利，而多截留利潤爲公積金，這無疑是事實，並且這也一定會鼓勵資本的擴增，但此種結果的形成，主要却是由於犧牲較貧窮的股東；因爲富有者依此方法逃脫的賦稅額，勢將比較貧窮人所得的救濟金要多多了。

廢棄陳舊設備 工業家爲要擁護其減免或完全廢除企業積存金的要求，遂提出以次的主張，就是，今日的資本準備，必需大大的多於歷來爲機具損耗陳舊所須準備的額數。今日企業上的技術變動，較之以前迅速；往往一件機具因爲效率關係，在其損毀以前許久，就須置諸不用。這無疑都是事實。但此種事體的正當救濟，與其求之於公積資金稅的完全免除，就毋寧依各國現行所得稅法律，要求對各種機具設備的貶落價值，多予以核減。因爲在一個逃避公積金稅的公司，既未負有爲新機具作適當準備的義務，而對於陳舊機具之適當準備與企業公積利潤額之間，又不復有一種必需的關係存在。

高稅會限制企業經營

我們已經知道，在加爾文委員會看來，所得稅所課加的

利潤，主要是那一部分依攤分紅利形式變形爲個人股東之所得的利潤，從而，這種稅收，並不致影響每種企業希圖獲得的利潤的限界。照該委員會的意見，在這種方式下加擔於利潤的所得稅，並不得視爲一種外加於生產費上的附額，因此之故，高所得稅就不一定會予生產以何等妨礙。然而此種見解，是不能完全令人贊同的。當該委員會的報告一經披露時，許多經濟學者都立即起而攻擊。據那些經濟學者所說：企業家從事生產的動機，並非存於其對生產的總利潤的期待，而是存於其對生產的純利潤的期待。這種純利潤的期待，乃是依存於個人股東或投資者，希望當作其投資結果所獲得的純所得。任何減縮其所得的賦稅，顯然會縮減其這種意義上純利潤的期待，從而，受此賦稅侵蝕的企業，就難免不使企業家不樂意投資。根據此種理由，他們所加於加爾文委員會的批判就是說：高率所得稅雖不致影響生產費，但却會在企業經營上阻止新投資本，以致相對縮減生產規模。在此種場合，現有生產資源所有者，即使不致因課稅而停止其生產資源的使用，但要爲改進企業或新創企業而擴增資本，那却就不免發生妨阻作用了。其實，加爾文委員會考察這個問題，是由

經投用在企業上的資本的視角出發，而經濟學者們對於同委員會的批判，則是由其影響於蓄積及新投資本的不同視角出發。

設從這兩個不同的視角各別的去，兩者的見解，無疑都是允當的。以現正使用的資本而論，所得稅率的提高，當然不致影響這種資本所有者從事生產的意嚮；但投資者在決定其是否投資於生產事業的打算上，却就要為純利潤的期待所左右，從而較高的利潤稅，就難免在某種限度阻礙其投資的動機。自然哪，投資者無論以怎樣的形式獲得所得，所得稅總是不免要課加到的。縱令他不把資本投用於生產事業，而用以出貸於政府，他所得的利息，仍要納稅。不過，在企業蕭條的時候，却有一種危險，就是他這時將不投資，不出貸，而把他所有的資金都貯存在銀行中，以期待較有利的投資機會的回復。高率所得稅無疑是會促使投資者採行這個途徑的。但這究竟是否為促其出此的決定原因，却還難於說定；因為投資者所最為忌憚的，與其說是他懼怕其利潤蒙受賦稅負擔，甚或蒙受頗高的賦稅負擔，就寧不如說是他懼怕投資無利可圖甚或不受受到損失。這是對加爾文委員會批判所提

出的見解，理論上是健全的；但在當前經濟狀況下，究有怎樣實際的重要性，那却是疑問。因為像在目前這樣嚴重不況的時期，除所得稅外，實還有更有力的妨害投資利潤的障礙存在着哩！

地方稅 國家的收入，大體是徵取自所得稅或商品稅或營業稅。但一切國家，都須為其地方行政當局安排某種形式的收入，而這收入，是與那種要解交國庫的地方收入，判然各別的。通常的辦法，是地方當局得徵收某幾種非中央政府所課之稅。但要發現一項中央政府打算讓地方政府徵收的滿意的財源，那却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體。在大多數國家中，地方稅都是採用一種方式，就是各別地方當局在其所屬的領域內，對居民的財產課加一定的賦稅。如在英國，其地方稅的最大部分（除了由中央政府領得的補助金），乃是對各該地方的地產、房產或產業，徵收定額的地方稅。有些國家的地方團體，亦由地價稅特別是城區地價稅，取得其收入的重要部分。她們有的還得徵收地方所得稅，以為中央所得稅的附加。但就一般而論，地方收入的主要來源，仍是對於財產所課之稅。

關於所得稅在生產費上，乃至在從事生產活動的企業者的意嚮上發生的影響，無論怎樣難於決定；但地方稅如加擔在生產事業之上，其弊害是決無可疑的。地方稅加擔在企業方面，企業本身要負擔這項費用，其經營無論有無利潤，稅是非納不可的。這種稅顯然要構成生產費的一部分，這種稅增加，生產費也直接隨之增加。就因此故，企業家常強烈反對地方稅制度，並常聯合起來，迫使地方當局把這種稅降低到最低可能限度，且使其把那項由地方稅維持的社會事業費用的較大部分轉嫁到國庫方面。此外，當一個企業家打算建立新工廠的時候，他往往要考較各不同地區現行的不同稅率。在其他事情相同的限內，他總寧願把他的工廠建立在地方稅較低的地區。某些企業之所以要由人煙稠密的市區轉移到交通稱便的鄉村地域，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工業的遷移 但爲了種種理由，許多企業都不得不殘留在大市集中。例如，有些企業必須與其附近市場保持密切聯繫，一經遷徙到僻遠鄉區，難免不有喪失其市場的危險。有些企業，在生產一件完成品的作業活動上，須與其他企業保持密切關聯，而構成一大串

企業中之一個別環紐，從而，相關聯的其他企業沒有移動，這個別企業亦無法遷徙。此外，在另一些企業的場合，企業家爲圖應付企業活動上的變動，頗需要就近隨時有技術勞動供其適應調節（這在一切阻礙企業遷徙的要素中，也許是最關重要的）。而此勞動存在的地方，又祇能求之於其他許多公司亦作同一企業活動的都市。加之，一種企業由市區移往鄉村地域，往往要頗大的費用，這費用也許會大於其由節省地方稅所得的金額。它得建設工廠，設備房屋，安排僱傭勞動者的種種娛樂場所，修築道路，甚或要對新工業社會備置自來水、瓦斯或電氣一類公共事業。所有這些，往往都是遷徙的有力障礙。現在工業由都市遷到鄉區的活動，其所以仍不怎樣踴躍和顯著，這都是主要的原因。

但困難自困難，英美兩國却曾有大規模的移動。全般的講來，工業由都市移向鄉區，無疑是一件好事。都市是過大了，過於擁擠了，要想有較好的場所，要實行較好的工廠計劃，要有較好的娛樂，只能求之於人口較爲稀少的地域。但是，新工業儘管可以向人口較少的地域發展，而大部分已經設立的舊工業，却都難於遷動；特別是當不況的時期，這事實簡直要

在舊工業區域造成一種異常嚴重的事態。我們講過，過去數年的不況，曾對舊的基本工業及紡織業給予非常的打擊，使它們簡直無法移動。它們不能移動，它們由利潤減落而削弱的支持地方稅的能力，就與那種因不況而大增特增的地方支出，同時並存於舊的工業區域，而在大部分失業救濟負擔須由地方基金開支的地方，這種事態，就要特別顯得嚴重了。

失業費

英國因有一般的失業保險制度存在，地方當局由失業所受的直接負擔，誠然是大大縮減了。但英國的失業保險組織，究沒有把全部失業者都包括進去，換言之，就是對於一切失業者，並不是都給予以最低的生活維持費。因為某種理由，有些勞動者是無法取得救濟權利的。還有些勞動者只能領受一部分救濟費，其餘須由救貧當局以地方基金補助。此外，凡屬對失業者提供工作的任何公共事業上的努力，通常至少要由地方當局擔負一部分費用。國家照例是會分擔此類工事的費用的，但她却難於全部擔任。舊工業區域儘管有最大多數的失業者存在着，但同時却最沒有對失業者預備工作或直接救濟的財源。若在一向沒有失業保險制度的美國，其地方的負擔，更遠較英國為繁重，而在那些受

到不況最大打擊的工業，則尤不免要挨受更苛重的壓迫。像芝加哥與華盛頓一類都市，在可供私人布施之用的財源已迅速告竭的境況下，即使對失業者只給予以最低最低的生活維持費，他們亦感到這種重壓的需求，使其實在陷入了破產的絕地。

英國的地方稅

英國製造業者，特別是那些衰落工業上的製造業者，曾竭力要求減除地方稅的負擔，由是，新地方政府法案乃於一九二八年通過。依照這法案，以前的地方稅負擔，對工業大大縮減，對農業則全部免除。在此新的情狀下，前此按照工業財產評價應納的地方稅額，現在減少百分之七五了。地方稅項下的這種漏洞，由國稅項下增加補助費彌縫。這一來，全國一切生產事業——無論是否衰落——都叨了國庫莫大的實惠。因為此次法案不但對於衰落的工業減輕負擔，即對大大有利可圖的興盛工業，亦同樣的減輕其負擔。結果，前此由地方稅徵收的總金額，現在有最大一部分要加擔在每個地方的住戶身上了。不錯，到今日為止，政府還是用國稅彌補地方，並不會增加地方居民的負擔；但我的意思是說：凡屬要增進地方事業的地方當局，他們定然是會把較大一部分費用加擔於住戶

身上的。

這實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體；因為，地方稅不加擔於生產事業，而加擔於住戶與職工，那不但是倒行逆施，且也無從適合各種參差不齊的納稅能力。照新制度的用意：凡屬為較貧窮居民利益而發展的新地方事業，其費用的負擔，當然不能照從前一樣，而必定要他們擔當遠較以前為多的部分。至對那些衰落工業，在稅率上減輕其負擔，那亦無疑是振振有辭。但在我個人想來，此種用意固無不當，其所採方法則殊多弊害。工業由當地地方當局設備的種種事業，受到了莫大利益，或者，地方當局之所以設施種種事業，大部分是爲了工業經營建立在其所轄地域之內，這都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工業誠然會因地方稅課加而增加其生產費，但我們不要即此就斷言地方稅之不宜課加。生產貨品的真實費用，應當包括其生產所需的一切設施的費用，因此，各種生產事業對其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費用負擔一個適當分額，那是十分允當的。政府即令要予衰落的工業以救濟，其辦法應當是對此等工業的負擔特予減輕，而不當把一切生產事業的地方稅負擔，統行大大核減。

對住戶所課之稅

我們還不應忘記一點，就是對生產事業所課之稅，即今在結果上不得其平，對地方住戶與職工所課之稅，在結果上亦是不得其平。一個商人或一個專業者，他可在僅有幾間房的辦事室中，經營一項企業，擁有相當多的純收入，由是，其地方稅的負擔，極為有限；若在一一個職工，通常須按照其純所得的比例，付納高率租金，從而，就其收入比例講，他的負擔是非常苛重的。加之，工人們付納的房金，與社會較高階層的人們所付納的房金比較起來，一定要在其總收入中占有更大得多的比例；由是，他所支付的地方稅，乃比較社會中階級或上階級，往往要苛重得多。

事實是這樣：以前課加於地方財產方面的各種賦稅，全不公平，全都充滿着弊害。其起源遠在中世紀時代，那時幾乎把有形財產看為是唯一容易課稅的對象，並以為對地方財產課以維持窮人的負擔，那是頗為公平的。迨地方政府的任務擴展，地方稅亦逐漸隨之增加。層層因襲下來，從未努力探求一種比較公平的地方稅來予以代替。迄乎今日，每個人雖然幾乎都知道地方稅的弊害，但要探求一種代替這些稅的稅收，却又感到萬分困難；因為

任何他種形式之稅，中央政府都是不打算讓地方政府去徵收的。往往有人作這樣的提示：就是中央政府於國家所得稅外，更讓地方政府徵收一項地方所得稅。這種賦稅制度，已經有若干國家見諸實行，但要推行於地狹人稠的英國，却就非常困難。在若干地區擁有產業的個人，或在若干地區分佈有工廠的企業，那顯然不能分別向每個地區課加其全部的利得；若要派定其每個地域的所得額，那就真是談何容易了。

地方所得稅不能徵收麼？ 因此，這裏又常有人提出這樣一種提議：就是地方的負擔，應有較大部分由國家稅收開支，而不由地方稅收開支，國家所得稅項下，應增附一項準備再配分於各地方的附加額。這種制度，法國曾在所謂『生丁附加稅』(centime additionels) 中略具端倪，同時德國的各屬邦，則皆在國家新憲法規定下，得由國稅總額之中，分取其大部分的收入。像這類的稅制，似乎是英國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的唯一途徑。在過去，英國地方總支出由國庫擔負的比例，已經漸有增加；今後能在最早可能範圍內，進一步由國庫增加對地方的補助費，並使此補助費隨地方事業的發展而擴增，那顯然是再好不過

的，那一來，地方稅庶有解除的希望。

但是，我們並不希望地方事業的全部費用都由國庫負擔，或都由國家依照一種定額攤分配分於各地方的那種金額支出。因為在地方自由與地方效率的關係上，地方事業費用的若干部分，必需直接由地方選民負擔。地方當局在地方事業的建樹上，必得於中央政府設定的最低限度以外，自己籌資進行，對於其中支配的金錢，更當力求節省。因此，我們知道，地方稅負擔，雖能因國庫增加對地方的補助費用而大大減少，但在沒有找到其他收入來源代替的限內，顯然是無法完全廢除的。

在這所謂其他收入來源中，有一種收入，似乎完全能够指撥於地方政府，那就是地方的地價稅。德國較大的都市，已經把這看為其一大部分收入來源。一種有效的地價稅制度如能在英國確立起來，我看由此所得的收入，無論如何應當撥交地方，而不應提供國庫。然而，這裏頗有理由作這種主張，就是地價稅課加的地域，應當較現在地方當局所在地為大。並且，一種最公平的地價稅制度，必得其課稅範圍不以地方為基礎，而以地區為基礎；其課

稅所得，與其劃歸現在都市與鄉村的各別地方政府，就毋寧劃歸區政府。不過，這是關於地方政府區域再建的大問題，要進而加以考察，那未免離我們本章的論旨太遠。

第三節 資本與遺產

現在讓我將本章所討論的種種問題，共總作一考察的結論。我們開始就講過，一國負擔賦稅的能力，如不考量賦稅對國民收入的比例，不考量稅收的用途，那是無從確定其限界的；因為稅收用之於生產方面者愈多，其國民所能提供的稅額就愈大。在實際，賦稅往往會產生一種購買力轉移的結果。國家由納稅的個人與公司所得中徵取稅金，然後這稅金再由中央政府或攤分此金額的地方政府支配用途。獲有收入的個人，他能把此收入善用或濫用，同樣，由賦稅獲有收入的政府，她亦能把此收入的一部分善用或濫用；個人方面耗費多則蓄積少，蓄積多則耗費少，政府亦然，政府可把稅收供應當前的需要，亦可把一部分稅收用以培植將來的生產力。不過，在個人與社會的場合，其耗費與蓄積之間的關係，究非

完全一樣，或者至少不是顯而易見的一樣。對於個人，我們通常總是把他購買消費財或消費勞務所使用的金額看爲是耗費了，把他投資放債或儲放於銀行的金額看爲是蓄積着。其實，就在個人方面，我們亦不宜常常這樣判定其收入用途。比如，一個父親如其爲了給予兒子一種良好教育，和有用的生產技能而耗費金錢，則他所耗費的金錢，實在等於把它蓄積在他種投資事業方面。國家方面的支出，更是如此。不論何時，國家如其稅收所得用之於改進社會之衛生或教育，由是增加其將來的生產力量，那我們很可以說這是儲蓄而不是耗費。自然，國家也如同個人一樣，她在衛生或教育上使用的金錢，有時也不免流於浪費，但金錢使用在這些事業方面，如其能以合理的審慎，那就簡直算是儲蓄，而非較狹義的耗費。因此，近年國家在社會事業方面迅速增加支出，一般人都以爲這種支出爲不生產性質，且以爲在這些方面支出多少，則可供社會生產用途的金額就要減少多少，這顯然是一種錯誤；他們不知道，把金錢使用在教育、房屋建築以及衛生等事業上，使國家將來的生產力有所增加，那比較把同一金額殘留在那些領受所得的人手中，聽他們處置，其效果也許

還大哩！

事實上，當我們考慮國家爲支出增加而增加賦稅的問題時，那根本就是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金錢是由國家方面使用較好，還是由個人方面使用較好。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乃取決於以次兩點：第一，看國家使用金錢的計劃如何；第二，看金錢的來源如何。若由僅够維持最低文化生活水準的人們課徵其所得，那是決不可行的。賦稅必須在可能範圍內，加擔於剩餘的所得——即是無須用以維持生活必需水準的所得。但是，即令向此種所得方面徵稅，亦須國家能表示她由此徵收的金額，會比納稅者使用得更有利益；能這樣，徵稅才算合乎道理。

投資的活動

然而在當前經濟制度狀態下，這是要發生一些極困難問題的。當前經濟制度要順利繼續，勢非有充分的新資本，源源流向圖利的企業上去不可。在一切進步的國家中，這種新投資本，多半是出自較富有階級的剩餘所得。假若依照累進稅原則，國家逐漸增加這種剩餘所得的稅額，則將不免發生兩層影響：第一，對於投資之純利潤期待減

少；第二，富有者預作投資之用的純所得額減少。因之，不論在什麼地方，國家如採行苛重的累進稅率，徵收其所得稅，那富有者的蓄積，富有者會投用於生產事業上的新資本額，均將大大減縮。在當前的經濟制度下，這種性質的減縮，會給予工業生產力以嚴重的有害影響。不錯，國家所得稅收，可用以增進社會健康與教育的標準，因而使社會的生產力提高。但社會沒有充分的新資本投用於工業，以便引起僱傭機會，則這所增加的生產力，是無法轉用到實際生產之上的。勞動者更健康了，更智慧了，他們個人的生產能力增加了，那無疑會促進僱主僱傭他們的意嚮，並且，有此利益，也許能够抵消那些阻礙僱主向這方面活動的原因。但是，國家的累進稅率如其過高，致使較大的所得受到犧牲，使投資額大形縮減，那就不論社會生產能力如何增進，投資階級對於為勞動者提供僱傭機會的事體，總是不會踴躍的。設使國家把她大部分的稅收不用之於增進健康與教育一類生產用途，而用之於沒有生產價值的擴張軍備和償還大量國債的支出上，那尤不免要發生這種現象。不錯，使用在軍備上的金額，是絕對浪費掉了，支償國債利息與償債基金的金額，却會再配分於國債

的保有者。但這裏的問題，要看國債保有者對於其由國家取得的金額的使用，比那些爲了供應國家債務需要，而對其所得付納所得稅者使用金錢的方法，究竟是好些還是壞些。大量國債的存在，定然會造出一個懶惰的『收入者』(Payers)階級，他們不靠投資生活，但靠不勞而獲生活，這一來，社會的財源，自不免要留下一個嚴重的漏洞。但我不是說，由國家支償債務利息金額的全部，甚或最大一部分，實際都是由這個不勞而獲的『收入者』階級消耗去了；不過我敢作這樣的斷言，就是像這種懶惰的『收入者』，近年却大有增加，因爲戰時幸運的光臨，那怕是極頂的大傻瓜，亦不由得不大發其財哩！

社會主義與賦稅

國家課加的高稅，既不要依課稅的程度縮減工業上的私人投資，那末，假如國家還要繼續維持這種稅率，她就顯然有自己處於私人投資者的地位，自行準備發展經濟所必需的金資之必要。她由賦稅所得金額，必須留下一部分，不作爲即時開支——那怕是促進教育與健康一類最生產的開支——而用以投資於工業及其他事業上，以便提供僱傭機會，增加國民之貨物的生產。許多人都以爲依照這種方法，資本主

義制度可以逐漸轉換到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以為國家逐漸由私人投資者取得其為工業準備新資本的任務，正同其已經為個人擔當。大部分設備教育及其他必需社會事業費用一樣。就理論上講，這種轉換實在是大有可能的。但在此轉換的過程上，却有極大的實際困難在。國家要藉賦稅準備充分的工業資本，同時就難得不使私人投資源泉因擔心將來較苛重的賦稅，而涸竭到代替的社會主義制度未充分實現以前，即使資本主義制度完全解體。假若社會主義者真想利用國家為達成這種轉換的手段，他們似乎更要探求現行諸稅以外的他種賦稅，並得準備一種比他們一向想像的還要迅速得多的轉換——由資本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轉換。

遺產稅 至若促進此種轉換的他種賦稅，顯然只有求之於遺產稅的大大擴張。我們知道，各國現行的遺產稅，都沒有達到頗够影響大財富的蓄積或轉授的程度。但如謂遺產稅即使大加特加，亦不致如高率所得稅那樣妨害企業經營，那亦沒有理由。例如，利格拿洛(Rignano)計劃或修正的利格拿洛計劃如其見諸實行；並且，國家對於遺產稅的收入，

如其明確的用爲資本而不用爲供應當前支出的收入，那在一個相當期間之內，社會較大部分的生產資源的所有，將會由私人手中轉移到國家手中。過去由學者們提出的許多計劃，都曾懷抱有這種目的；我在這裏沒有詳細討論這種計劃的餘裕。我祇選定一種可能計劃，藉作例證。假定國家決定把私人超過極小定額以上的全部財產，當其死去時移歸國有，但同時規定，其承繼者終身得享有這財產價值百分之幾——比如說百分之五〇——的年金；那一來，富有者即令無意殘留下一點財產，但他却可自由爲其子嗣作取得年金的準備，這樣，國家獲有他的財產；當他的兒子或他的繼承者死去時，年金即行取消，國家即完全免除這種年金的負擔。有此遺下年金的權力，富有者自樂意在他一生中蓄積財富，因爲年金的額數，乃取決於其臨死時所遺下的總財產價值。依着這種方法，社會大部分的財富，確能很迅速的成就其社會化。自然，不採行這種猛烈方式的遺產稅，也是有達成此種社會化目的的可能的。比如，國家不取得死者財產的全部，而只取得其中的一半；或者對於繼承者所給予的年金，不以財產價值之一半爲準，而以財產價值之全部爲準。諸如此類的可能

方法，不一而足。但我在這裏只求解明其原理。

俄國的賦稅

假若要以漸進的方法，實現一種轉換到社會主義的目的，那在財政方面，就似乎不能不以某種猛烈的遺產稅爲其主要的轉換手段。設使像在俄國所行的那樣，這種轉換是突然達成，而非行之以漸，則對於經濟發展所需新資本的準備的任務，自然馬上要由國家擔當起來。不錯，蘇俄今日也還用內債募集的方法向其人民籌借小宗款項，但其所需大部分的資本，究還是國家直接由國有的——由過去私有轉化爲國有的——工業經營利得中籌措出來。這在實際就是說——我們在後面從長討論蘇俄經濟時，將會知道——蘇俄由生產手段的國有，徹底統制着分配與社會所得，她允許私人保留在手中的，只是打算耗費在消費財與消費勤務上面的那一部分。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係在個人所得分配以前就由工業實有報酬扣除下來。若在資本主義國家，全部工業實有報酬，除了留下一部分作爲私有企業的公積金外，其餘都依個人所得的形式配分於股東。因此，必需新資本額的準備，全看這些收受所得者對於蓄積和投資的意嚮如何。一個社會由資本

主義制度逐漸轉換到社會主義制度過程中的主要困難，就是在社會主義發達到够取私人投資者地位而代之以前，須得在賦稅逐漸增加的場面下，好好維持住他們較高水準的投資意嚮。

在當前經濟危機之下的賦稅 這裏還剩有一個待考察的比較直接的問題，就是各國在當前經濟危機之下，她們該是如何決定其賦稅政策與支出政策。在過去數年間，世界一切國家殆莫不擁有一個不平衡的預算——因其收入縮減，而同時政府在各方面的維持費用，則不會相應縮減。物價迅速跌落，又益以工業繁榮的減退，致使賦稅收入大減特減；但在會計的支出方面，維持現有事業的費用，雖可減少若干，但有些固定項目的真正負擔，却反因物價跌落而大有增加。在此等固定項目中，以國債為頂關重要。物價跌落，由國債利息所獲得的一定額數的貨幣，實具有遠較以前為大的購買力。比如以較低利率收回一部分陳債的自動改正計劃，又如對流動公債所需金額，願以較低利率再借出短期借款的辦法，那誠於國家支出負擔多少有所節省，但這諸般的節省，在減輕總債務負擔上，結果至

微；而此債務的實在負擔，且隨物價逐漸跌落，而益形苛重。在這種固定債務負擔重壓之下的各國政府，當其預算無法平衡時，都力圖大大減縮其社會事業費用。至關於軍費，他們亦略略設法減少；但在大多數場合，其所減僅够抵消物價的跌落，從而在軍費方面，通常實亦無所縮減。因此，一國預算如竟達到收支平衡，則平衡此預算的主要負擔，必然是加擔在社會事業方面。對教職員及其他公務人員薪水的大大縮減；對教育、房屋建築、衛生乃至其他主要事業的極度緊縮；對失業者救助金額的猛烈減少；乃至對勞動者實施英國所行的「生計調查」一類新調查，以減少領取救濟費的人數，這都是各國平衡其預算的方法。此外，在那些力圖興建公共工事，以期提供失業者以工作機會的國家，她們自然而然的會竭力減縮這類工事，不予失業者以工作機會，而僅予以救濟費；因為，就其結局講，予勞動者以工作，雖然比白養着他們經濟許多，但從立即支付直接費用的觀點看來，白白養着一個人，究比他從事工作要節省多了。

『節省』的禍害

當世界急需增加消費力，以便利用那些可資利用的豐富生產

資源的時候，這種不利益的削減，已曾在縮減僱傭機會與縮減社會消費力上產生了有害的結果。假若各國不削減社會事業費，不削減對勞動者提供僱傭機會的費用，而利用此世界不況所導來的低利借款的大好機會，那也許會要好多了。當前不況的延續與深化，經濟學者們都認為是由於富有者不肯把他們的資財投用於生產事業方面，以致社會應當投用於工業上，藉以刺激僱傭機會增加消費力的大量資金，不是死藏於銀行，就是用之於非生產的用途，甚或以通貨保藏下來。假若國家勇往的利用此游資過剩機會，在短期資本市場上，以低利借入巨額資金，然後再把這資金妥當的用於經濟發展計劃方面，其結果，一定會大大減縮當前世界的不況。如其各國都向這方面努力，則每個國家的這種活動，就容易進行許多。國際勞動局（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曾鼓勵世界各國一致採行這種政策，這頗值得注意。資本主義世界如想逃脫當前威脅其生存的困厄，顯然非採取一種必需的步驟不行。這步驟，就是要由主要各國直接起而擔當一種關於經濟發展的一致的國際政策。此種政策，不但是要為國內發展計劃準備資本，同時且要為刺激落後國

家之經濟發展，而向海外貸出資本，俄國須藉外資開發國內財源，那是世所周知的。即令資本主義各國不欲予俄國以便利，其他許多地域在開發其財源上，正還有待於大量資本的支出哩。例如波蘭，乃至東歐全部，現在在鐵道方面，電力方面，以及在當前經濟制度發展利賴正多的主要公共事業上，都顯有缺陷。先進諸國正多着世界落後諸地域設備這諸般事業的資源。而這些資源，現正因缺乏市場，找不到用處。顯然的，假若資本主義要辯護其生存，或希望延續其生命，就必須把這些閒着不用的資源，用以促進世界落後諸國之經濟的發展，但要做到這點，非重新擴張海外的投資不行。而在當前世界經濟不安定的情形下，期望私人投資者把金錢拿到海外作冒險嘗試，那又似乎沒有希望。由是，在大工業國中，須有一種進步的政策，以便其財源在國內得有賢明的生產的使用，更須那些債權國家，對世界經濟落後地域的經濟組織的擴張，作大規模放款。世界當前的困厄，不是由於生產資源缺乏，却是可笑的由於不能利用其可資利用的豐富生產資源，在這種情形下，各國居然縮減國家資本的支出，縮減國家機關所準備的僱傭機會以資應付，那可說是再壞沒有的方法了。

第十章 經濟組織

第一節 股票市場

在一切經濟發展已達到進步階段的國家中，其工業上的組織，都具有許多相同的特點。自然，每種特定制度都有其國民的特性，和影響各國經濟機構之法規上的重要差異之點。即各種組織的名稱，亦有差異，例如，在一國稱為合資公司 (joint stock company) 的，在他國也許稱為社團 (corporation)；這種名稱上的差異，往往甚至難於把現代工業制度詳細描述出來，使一切講英語的國民都能同樣了解。但是，名稱上、法制上儘管互有差異，在各國工業機構中，終隱伏有一種根本的類似性質；關於這點，我們是無所用其驚異的。現代工業制度的機構，直接是發端於工業的連續性，及物品買賣與對經濟發展籌措資本的方法。這種性質與方法，在各國都顯出極其相同的問題，且喚起極其相同的答案。工業組織

在各國之間的差別，與其說是關聯於其基本的特徵，毋寧說是關聯於其副次的特徵。這些差別誠然重要，並且在若干方面頗有影響；但比這更重要的，却仍是加強世界經濟發展領域之較大部分的工業構造的統一性。

現代大規模生產之基本條件，就是要把大量的資本，在統一支配之下蓄積起來。在大多數的場合，這就是指着直接擁有大規模企業的，決不祇是一個人，而是多數人。誠然，就在今日，單一個人也還能擁有一大企業經營，但這種情形究屬稀罕，而且今後更要稀罕。如其一個人對於經營一大企業，除自己的資本外，單靠借債，那就尤其罕見。現代社會的典型大規模企業，照例是為一大些股東所擁有，他們多半不直接參加管理活動，就是對於其一般經營活動，亦幾乎無從控制。

這種股份企業，早為現代生產諸力——即由市場擴展以及前世紀各種發現發明所付與人類支配的生產諸力——之適當使用的必然要求。在工業制度的初期，對社會新生產力有效使用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在那些具有利用新生產技術之必要知識與能力的

人們手中，缺乏資本。因為在現代式的合資組織尚未取得法律上的承認以前，僱主縱令急欲擴展其企業，縱令他自信能為其擴增的產品找得有利市場，但往往因為缺少資本，致無法實現其願望。不錯，他在當時也還有幾種籌款的途徑。他能以他自身或其企業作擔保——假使有貸款者願意依這些條件貸款的話——向有錢者通挪。他能糾集合夥者，這些合夥者中，也許有人只提供資金，而不參加企業之管理活動。有時，他甚且能够邀請一大些參加企業的股東，組成一個大體接近現代式的合資公司。但揆諸實際，這些途徑在進行上都頗有困難。當時是沒有有組織的通融款項的資本市場存在的；假若他企圖通融款項，他就無從使用發行證券或社債一類方式，而必得找一個銀行業者，一個商人，或者一個願意對他貸款的富人。他不能在資本市場上流通債券，他就無法得到一般大眾的資助。再說到糾集合夥者的辦法吧，如其他努力組成一種合夥經營，應用許多僅僅出資而不擔當責任的合夥者的資本，他馬上就會達到一種困難，即一切合夥者——甚至那些不直接參加企業活動者——須對損失負無限責任的困難。人人都知道瓦爾特·斯喀忒氏 (Sir Walter

Scott) 關涉於其發行者的牽連故事，並且人人也知道他後半生爲償清其牽連的巨大責任所從事的鬥爭。在十九世紀初期，這類事件是數見不鮮的。這對於僅僅出資而不擔負責任的合夥者的投資，且曾爲一有力的妨礙。最後，假若十九世紀初期的資本家要組成一個擁有一大些股東的合資公司，他首先說不定要藉助於一個地方銀行業者或法官，以找得接受其股份的羣衆；這一來，凡屬投資於此種公司的人們，不論投資額的大小，皆一律視爲合夥者，由法律課以同樣無限的責任。然而當時合資組織的困難尙不只此。法律對於合資公司，既不肯承認其爲社團的組織，而只看爲是合夥經營的擴大，故公司一有對簿公庭之必要——例如爲索還債項——時，將不免發生荒謬百出的事態。一切的股東，都得以企業上合夥者的資格，被傳到案。由是在法律上引起錯綜複雜的無限糾紛，致使負公司責任者萬難應付。

這都是直接關係英國當時的情形。但與此極相類似的困難，亦曾在現代工業制度初期，散見於其他國家。但法國及歐洲其他若干國家，則幸託拿破崙法 (Code Napoléon) 之

庇蔭，獲有一種『有限合夥經營』(limited partnership)——被稱爲合夥公司 (commandite)——的特別規定。有此規定，其國內一般不參加企業管理活動的合夥者，乃得以有限責任的條件，提供資本。直至今日，大陸各國還廣泛的應用這種方法。特合夥公司的用意，無論其在現在抑在過去，都是指着比較少數個人的一種合夥經營，而非指着包含一大些股東的公司。對於極小規模的企業的管理，這誠不失爲一有用的方法，但對於現代式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却無何等助益。

合資組織的發展 因此，要設立大規模的企業組織，就必須另有一種規定。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過程中，這種規定已在英國逐漸形成，且還取得了法律上的許可。其實，就在產業革命的當時，已早有形成今日所謂合資公司——即其股東只負有限責任——的途徑；因爲，不論在任何時代，關於設立一種公司，或社團，或托辣斯的法案，乃至賦予這類組織以任何權力的法案，都是由國會通過。在十八世紀中，英國已適用此方法，准許稅道托辣斯修築道路；在鐵道未出現以前，運河在運輸系統上，占有極最重的地位。英國諸運河的開鑿，

亦是在着手修築道路以後，繼續依同一方法進行的。不但如此，遠在這時期以前，更還有對外貿易的特權的合資公司存在，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係創設於一六〇〇年），以及法國、荷蘭乃至其他國家與此相類似的貿易公司，皆其適例。此外，如英格蘭銀行及亞姆斯特丹銀行（The Bank of Amsterdam）一類機關，亦直接由國家賦予特權。我們由此知道，過去並非沒有合資的組織存在，特公司組織與有限責任這類特典，祇能看為是由國王或立法當局賦予的一種特殊的十分破格的權利。

有限責任 這裏無須追述現代合資組織在英國或在其他國家發展的階段。我們最多只要指出一點，就是英國對於各種合資公司給予有限責任之特權，係始於一八五五年；自此以後，合資制度乃迅速擴展到全般大規模企業組織的領域。隨着此有限責任合資制度的展佈，現代意義的資本市場乃因以產生。在此以前，除了鐵道股票外，只有極其有限的證券得在市場上買賣，其餘則概沒有有組織的買賣市場。當時股票交易所所經營的，主要是政府公債，以及像大貿易公司一類擁有特權的極少數公司的股票。現代意義的股票

市場，係成立於工業投資一般通行，和典型大企業非由少數合夥者所擁有，而由一大些投資者——他們大多數只關心於紅利及資本價值之可能的增加——所擁有的那個時候。

現代合資組織制度的便利，是顯而易見的。把一個公司的所有權，區分為許多小的股份，這些小的股份，又有有組織的股票市場，供其買賣；於是，這裏就有一大利益存在，就是個人所有股份能以一定格價買賣，企業上所投資本，就能够在社會流動。此外，企業所有權依股份形式而分散，又大可便利遺產在許多承繼者間的劃分，因為在必需的場合，股份是比較容易向市場投售的，並且，假若這些股份能够在承繼者間零碎拆分，那也許用不着將其全部變賣。至有限責任的利益，則較此尤為彰明較著。此種有限責任的特權如不能獲得，任何精密的股份制度，都將毫無用處。假如一個人在某種企業上一投下資本，比如說，這所投資本為五鎊或一百鎊吧——他的全部財產，就要當企業失敗的場合，擔負償還其債務的責任，那一來，他肯冒險投資的企業，顯然是要他對那企業各方面的情形都充分明瞭，且對其穩妥性質確有把握。但是投資上的這種小心翼翼的要求，萬難使大眾手中的儲蓄，使用

在發展工業方面。特事實雖然如此，國家却有一個長時期不肯爽快給予各種企業以有限責任的特權；好像這種特權一經給予，就無異允許企業所有者放棄其契約的義務。國會與法律，是經過了許久許久才承認有限責任不但要許與鐵道一類特殊公司，且不可避免的。要許與一切大規模企業經營的。因為要利用發展工業所需的大量資本，一定非許與那些企業以有限責任的權利不行。

股票市場的用途及其弊害 現代合資組織既使企業公司資本分割為小的股份與債券，那一方面對於提供發展工業的充分資本，會為一最重要手段，對於資本所有者，又會為使其蓄積更容易分割且更容易轉化為貨幣的一大便利，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含有大大的不利益與危險。因為股票市場不但極便於那些希望把物權變換為現金的人們，同時且還能使資本價值在一種空前未有的規模上，作投機的活動。全世界的股票市場，決不會且也決不能單單變為股票證券所有者轉換其所有權的機關。因為，它們如其限定其業務於這個範圍，勢必要常常遇着以次的事體，就是正當某個人投資者想拋售其股票的

特定日期，沒有人買；正當某個人投資者想購買股票的特定日期，沒有人賣。這種困難，曾由一切有組織的股票市場上之專門作此買賣者——普通稱為股票經營者（stock jobbers）——的存在，而完全解除。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那種開盤交易的股票，他們都打算買賣。凡屬為他們所經營的各種股票與債券，他們往往打算以一種價格購買，以一種價格發賣。這一來，普通持有股票或債券的投資者，就不愁他們這種物權沒有市場投售。在任何時候，大批的股票與證券，都在不絕變換其所有者，並且大批的股票與證券，不是由原來的投資者所保有，而是由那些專門做投機買賣的股票經營者所保有。道地的股票經紀人（stock-broker），僅只處理委託的事務，他買他賣，不是為他自己買賣，而只是代表其委託者買賣。股票經營者則不同，他是為他自己作買賣的活動，他的活動，不啻為經紀人及其委託者提供買賣的市場。

就一個道地的投資者說吧，他購買股票或債券，他所關懷的，是這股票或債券會給予他的所得。他在原來的情況下購買此種物權，係因他設想，在數年之內他將由此獲得一種

所得，有此期待，他就以為值得作此投資。無論就原先講，抑或結局講，股票與證券的資本價值，不外建立在人們對於其將來產生所得能力的期待上。但股票經營者與道地投資者不同，他通常購買股票，並不是要保存它們，而寧可說是打算不久由一種有利價格再把它們變賣出去。他是一種股票商人；在他看來，股票不算是期望由此提供所得的投資，而是購買進來，希望有利變賣出去的商品。因此，他異常重視股票在最近將來股票市場上變賣的資本價值，而比較不大關懷其結局的產生所得的能力；如他對於一種股票，以為那在幾天或幾星期之中，說不定會因大家的錯誤判斷，或其他同業者對於他的錯誤判斷，致使其資本價值提高，那怕他不相信那有結局的產生所得的能力，他亦將認為頗值得購買。

自然，這種態度並不限於股票交易場中的專門經營者，就是那些站在交易所外面，但同樣是專以投機為事，而非專以投資為事的許多人，亦殆十九是採取這種態度。至若在投機熱高漲的時候，不以結局的投資為目的，而以即時有利拋售為目的，而購買股票，而保有資本的一般大眾，他們也還是採取這種態度呢。

局外投機者

假若投機的股票交易活動，專由股票場中的專門經營者進行，那也許害少而利多；因為我們講過，專門經營股票業者存在，那是對於股票所有者得隨時處分其市場的必要條件。但自局外專做股票生意者以及一般大眾相率參加此種投機活動後，其效果乃發生激烈變動。他們這班人的參加，極有間歇浮動性，在物價高漲的時候，他們非常容易為投機熱狂所吸引。所以，在一九二九年紐約股票市場暴漲的當中，就是有利的工業股票，亦因資本價值上的投機昂騰，致其報酬在此種繁榮景象顯示破綻以前，即壓低到百分之二。同時，就在紐約股票市場上，却儘可買到報酬百分之五的高級債券。由此一件事實，顯然表示工業股票的購買，不在計較其真正產生所得的能力，而在計較其在投機熱狂繼續中會增大的資本價值。每個購買者，實際都在賭取其他購買者的狂亂心理。大量紙上財富的造成，不是由於工業股票的真正產生所得的能力有所增加，而只是由於資本價值因投機者的活動，致形成過分的昂騰。這種情形，根本就無法穩定。而在大多數人民都有閒錢作投機活動的美國，其弊害乃遠較其他任何國家為利害。在一九二九年物價昂騰的

當時，美國曾有幾百萬人侵入紐約股票市場，他們這些人的侵入，其影響乃相因而增大。

況且，股票經營者或局外人在股票市場上作投機活動所能利用的金額，並不限於他們手中實際所有的開錢。第一，他們能够把已有的證券，向銀行抵押得投機所能使用的銀行信用。不但如此，在一切主要的股票市場上，大抵都允許實行『限界』交易（margin transactions, "on margin"）方法。這就是說，一個購買股票者，並無須完全付足其所買股票的價格，甚且不必購買任何股票。他僅只要儲下一項足夠抵付股票資本價值上估計的可能變動的金額，同時給予其經紀人以這樣一種通告，即當股票跌落到有使這種『抵付金額』(cover) 受到涸竭的威脅時，則將其出賣。他能託經紀人依當前價值為其購買這些股票；不論何時，這股票的資本價值一由 x 提升到 y ，即請其投售出，並由此交易取得一種利潤；如其此股票的資本價值由 x 跌落到 y ，他亦請其投售出，並使用他原來存儲應付損失的『抵付金額』。依這種方式交易的股票市場，純粹是在股票價格的預期變動上作賭博的活動。這種活動，並不會包含有股票所有權由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實在的移轉。從而，

這種交易活動的對象，就沒有理由限於那些實在能投賣於市場的股票。假若專作此種經營者與局外偶作此種投機者能由銀行或其他方面獲得必要的信用，則此種投機交易的規模，就可無限的擴張。在一九二九年紐約股票市價暴騰的當中，聯邦準備銀行方面雖曾竭盡所能，阻止為這種目的的大量投機信用的創造，但國外非聯邦準備組織所能控制的機關，既把大量資金投進股票市場，它們的努力，自然不能收到何等效果。一切的金融公司、企業公司，一切的私人投機者，都拚命為了投機用途，使用自己的財源和其所能弄得的一切金額。這一來，聯邦準備銀行方面阻止這種信用膨脹的結果，與其說是真正阻止住了投機的活動，却遠不如說是限制了工業發展，以致造成不況的局面。

投機能夠阻止麼？不幸，任何有組織的股票市場，都不能避免這種帶有投機性的危機。因為，股票市場如要履行其對原有投資者手中的股票提供一種市場的適當任務，它就必須對於那些專作股票經營者乃至一般大眾開放。一般大眾如有意以投機代替投資，那是誰都無法阻止的。不過，這種說法，並非要為那些專作股票經營者滅除其對投機活動

應負的大部分責任。專門經營者在其業務進行的過程中，必然會養成一種習慣，就是，他不從股票之結局的所得期待考量其價值，而是就暫時的資本評價考量其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己會不知不覺的形成一種極好投機的心境。就因此故，他這種人就異常容易達觀，也異常容易驚惶。我們每天所見到的，大部分由他們的影響致使其價格或昂或跌的股票，其昂跌並非按照他們對於股票所得之正當期待的任何實在變動，而是按照他們對於大金融中心傳來的關於政治經濟上之達觀悲觀消息——那怕這消息於工業上的榮枯命運漠不相關——所引起的變易心情。我們已經知道，在物價昂騰的時候，該有多少新投機者投進股票市場，他們買賣股票，都不是從股票的結局能力着想，而只是注意其當前的資本價值。所以，股票市場無論因任何理由發生破綻，勢必引起可驚的清理破產現象。在此情況下，那些非慣作股票經營活動的人們——他們只是當物價昂騰，資本價值有異常增大可能時，被吸引到股票市場中來——將立即因情勢的改變，脫出此投機的漩渦，如其他們收手得快，沒有蒙到極大損失，那就算幸運了。至若那些作『限界』投機交易，或以證券向

銀行抵借信用來購買證券的人們，一則耗盡其爲作『限界』交易所儲留的『抵付金額』，一則將因其抵押於銀行的證券價格的跌落，須進一步提供抵押品或清償其債務。投機者要獲得清償債務的金額，計惟有投售其股票。這一來，股票市場上就有大批的股票發售，股票價格由是大跌特跌，而投機者乃蒙到極嚴重的損失。他們無論破產不破產，都山大損失離開股票市場，股票市場上由是呈現一種與其先前極相反對的活動。在以前，購買者爭先恐後的抬高股票價格，現在那怕是就其產生所得能力划算起來，其價格頗爲有利的股票，亦殆無人願買。因爲，某種股票的所得即令看着不錯，仍沒有人肯相信其資本價值不進一步跌落。這種情形，大體是由於以次的事實：即是跟隨着繁榮告終而導來的任何清理時期，都會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手中，殘留下一大部分證券，這證券，有的是它們當作墊款擔保接受進來，但借款者無力償還債款，故此擔保品無法收回；另有些證券，則是由它們自己由投機購買進來。它們爲要使其財源重復以流動的形式保持，故急欲投售這些證券。但它們企圖把這些證券即時完全投售出去，自不免引起有害的結果，因此，繁榮崩潰以

後的清理運動，往往總要因證券的源源投向市場——有的是由於或種有利機會的實現，有的則是由於某銀行或某金融公司，遲早有不顧損失，迫而清理的金融上的需求——而繼續一個長的時期。在一九二九年繁榮崩潰以後的美國，其清理運動直延至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一年。甚至在一九三二年，政府還得爲阻止這種運動引起銀行界更廣泛的崩潰，而採行特別的方策。在一九三一年之末，胡佛大總統曾設立金融復興公司 (Finance Reconstruction Corporation)，其用途在使大部分證券仍保留於銀行手中，不令其投向市場，致引起股票價格進一步的跌落。

由上述種種情形看來，現代合資形式的企業組織，蓋亦不免有極大的弊害；此種組織容易導來大規模的投機活動，使資金由工業經營離開，且使工業組織之金融基礎顛覆。真的，在現代工業制度形成以前，早已有大規模的投機運動存在，在法國始於約翰法 (John Law) 的當時，英國始於有名的南海泡沫公司 (South Sea Bubble) 的當時，而蘇格蘭達利恩計劃 (The Scottish Darien Project) 則是進行於十八世紀初期。人們確是在產業

革命後才開始成爲投機的動物的。但在較早的期間，投機賴以進行的股票，爲數不多，並且當時社會上有閒錢投機的人，亦遠不若今日社會之普遍。所以，法國約翰法的冒險與英國南海泡沫公司的投機，結局雖都致其事業發生可驚的慘敗，但它們在各該國整個工業生活上，並不會引起怎樣的變動。許多人民是由此破產了，但主要城市以外的工商業，却並沒有大受巴黎或倫敦方面的行動的影響。若現代的投機狂熱，則不可同日而語了。這種投機狂熱所引起的比較極有害與極普遍的後果，實不僅累及其本國，且更因現代金融的國際性，而牽連到整個世界。

然而，弊害儘管再多，某種形式的合資經營，仍爲現代資本主義之一必要條件。在工業所需資本仍繼續有一大部分把握在私人手中的限內，工業就必須由擁有一大些零碎股東——他們多半只出資本，不參加管理活動——的大合資組織進行。誠然，工業資本是應當由私有改爲國家自己所有的；我在後面須對此加以考察。但我們此刻還是在作資本主義制度的假定，在這種制度之下，合資顯然是對於大規模企業經營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第二節 合資制度

合資公司以及與此類似的組織，自然有許許多多的形態。當合資制度開始採行，甚至當有限責任特權推行到廣泛的範圍時，一般人都以為這種合資的方法，只適用於那些非糾集廣大的股東，即不能籌得充分資本的極大規模的經營。至對於小的企業，他們不但無意主張其應當改為合資組織，却寧主張其應當一仍舊貫的保持着合夥的形態，不用持有有限責任特權，不必把其所有權分割為能够轉移、能够公開買賣的股份。然而，有限責任與資本金分割為股份兩者，均有其顯而易見的利益，以致在極短期間之內，合資制度竟普及於原來打算推行到的範圍以外了。例如，就親屬企業（family business）的情形來說吧。假若一個親屬企業，以合資公司的形式組成，則該企業的主腦者，要把其身後財產以股份配分於其所屬意的承繼者，那是比較以前容易多了；不但如此，財產以股份配分，企業方面的資本，乃至因折產清理，而引起短絀的危險。至縱有有限責任權利之利益，在任何人都是

清楚明白的。除了法國合夥公司 (the *compagnie en commandite*) 那種特殊形態而外，各國的合夥經營，都承擔有無限責任。因為在法律的視線中，合夥經營單只是一些夥員，而沒有離開夥員的社團存在。公司則不同，公司因其為社團組織，早已成爲一個個別的『法人』 (legal person)，它能離開持有其股票的個人而作種種活動，它得向外借款，它得擁有財產。現代企業愈變爲非個人的——這就是說，單獨個人的控制活動的表現少，許多人在一個組織下之集體活動的表現多——合夥經營的條件，就似乎對於其管理愈不適宜，且愈宜於變爲合資組織的形態。所以，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中，合資事業乃繼續不斷的擴大其範圍。法律在先對於『個人』 (one-man) 公司，對於備有公司形態的親屬企業，雖還另眼相觀，但結局，終於迫而完全承認既成的事實。

私人公司 英國在一九〇七年的公司法案 (Companies Act) 中，私人公司 (the private company) 是被看爲另一種形態。私人公司的定義，就是說，這種公司沒有五十個以上的股東，它不以發起書的方式向大衆募集股份，其股票的轉移，須受公司所定規條

的限制。關於最後這點的規定，自然是要防止股東超過了法案限定的最多五十人的名額。假若因為某種緣故，股東名額竟超過此限以上，此種公司就自動的不復成爲私人公司，而爲一另受舊來條款拘束的公衆公司（the public company）。

在一九〇七年的法案之下，私人公司的發展，是採取兩個主要形態：第一是一大些比較小的私人企業與親屬企業，轉變爲合資組織。許多小工廠以及包括有一大些尙在擴張中的普通零售店的貿易經營，都僭取着合資構造的形態。但第二，却是因爲該法案發生了一種原來提案人始料不及的結果，就是，大規模的合資公司——卽是十足的公衆公司——立即就開始發覺它們以採取以次的經營形態爲便利，卽它們對於其一部分的經營活動，不由自己直接管理，而創設一些照法案以私人公司資格登記的輔助公司去管理。這樣，一個公佈貸借對照表向大衆募股的公衆公司甲，就得使用其募股所得的大部分資本，投資於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等等。這些輔助的部門，或則是對於主腦公司提供其主要企業所需某種貨物的製造公司，或則是爲主腦公司所出貨品在特別市場或一般市場上作推

銷活動的貿易公司。有時候，這種擴張方式發展到極高的程度，致使主腦公司除了分配紅利於股東，或將其由輔助公司以紅利形式收得的利潤加以處分外，實無所事事；它的全部企業活動，都由各輔助公司分途擔任管理了。

現代大規模企業上的分門別類情形，是在不絕增進的；企業活動的程序，務期其極端完全。大的生產公司，都企圖發展自己的買賣機關，以消滅居間圖利的中間人，在這諸般趨勢存在的場面下，上面這種組織形態，實在是非常便利。因此，一個鋼鐵公司也許會經由其輔助機關獲得煤礦，獲得鐵礦乃至其主要生產企業所需的其他物質資源。一個皮鞋公司，也許可以借助於若干輔助機關，張起一條販賣店的鏈索。一個主要作國際貿易活動的公司，它會覺得在各國設立一種分途受各國法律限制的輔助機關，那於其事業活動諸多便利。此外，往往有兩個大公司聯合起來，獲得第三者的聯合輔助公司，而這第三公司，也許又會持有若干其他公司的股份。這一來，整個公司制度，就愈加呈現一種相互聯鎖的所有權與統制權的異常迷離的現象；依着這些權力，某大企業的半打首腦人物所支配的資本與

生產資源，就遠較大於其直接管理企業所屬的資本與生產資源。

在合資機構內這種相互關聯的輔助機關的建立，本來是未可厚非的；但正如合資制度本身一樣，它亦不免有許多嚴重的弊害。合資制度係自然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之企業世界的需求，這種交互聯鎖的企業經營，同樣是自然發生於晚近企業組織上之技術的需求。爲要依垂直的與平面的聯合達成經濟的效果，因而把一大些生產公司配置在統一的金融支配之下，從技術上講來，那往往是值得贊許的。製鋼事業擁有自己的煤礦，生產公司不經由中間人，自己直接出賣其產品於大眾，都會收得經濟的效果。因爲這種種理由，創立輔助公司與交互聯鎖的企業組織的運動，就似乎沒有阻止的餘地了。

『大企業』的弊害 但至近年以來，這種制度的弊害，已經極其顯而易見了。在現代情形之下，一個大企業要募集資本，或由銀行通挪借款，通常總比一個小企業容易得多。由是，當繁榮與企業信用過大時，大企業向一般大眾募集的資本，往往總要大大超過它自己生產事業所必需的限度；而它使用這剩餘資本向四方八面購置其他企業經營時，又往

往會因過於達觀，而增高其價格。它所購置的這些企業，如都能有效的置諸統一的管理與支配之下，那除了出價過高之外，也許不會有其他的大害處。但大企業的主腦人物，最容易流於誇大狂，把一些在管理上需要極不相同的知識與技術的企業買收着，致令其不能有效的與主腦企業相聯合。像這種差異企業的大湊合，在管理上是罕有或者是決不會獲得經濟的效果的。由一個共同中心統制它們的努力，簡直會弄得手忙足亂。當主腦公司的主腦人物正注意到其他方面的時候，某種輔助企業忽竟損失數百萬之多，前此洛爾德·勒費胡爾麥（Lord Leverhulme）的事例，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優果·斯丁勒斯（Hugo Stinnes）為這種誇大狂的雜集的企業統制之一最顯著例證。當其統制手腕一經撤開，他那個大公司就簡直無法支持了。

但我們應當認清一點，就是斯丁勒斯（The Stinnes）及其類似公司的失敗，其主要因不是由於它們的規模太大，而是由於它們的品類太雜。我們並無須反對極大的企業單位；單位如其是合理的一致，其所需的技術與知識，如其是同樣的性質，那末，管理大的單位，甚

且不會比管理較小的單位更難。企業單位規模上的增大，那是現代經濟制度的必要結果之一。若像斯丁勒斯公司那樣，把一大些漠不相關的企業雜湊起來，那則是其投機弊害之一。這兩種現代大規模公司之間的尖銳差異，是必需加以區別的。我們決不要把帝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 與斯丁勒斯公司混為一談，因為前者是企圖依合理的方法，在極相類的工業上面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統制。

現代企業組織上的這種範圍的擴張，顯然與托辣斯和聯合組織的勃興，乃至與所謂『合理化』運動，保有極密切的關聯。但我們在進行討論這諸般事體以前，須得弄清一點，就是在十九世紀初期，企業的單位與生產的單位，經常通為一體，而現代的工業制度，就是在當時那種情形下發展起來的。那時被視為生產單位的實在工廠或作業設備，同時就是企業組織的單位。同一個人或同一羣合夥者，很少擁有許多工廠，並使這些工廠當作一個單獨統一企業的各部分活動的。在產業革命的當時，誠然有一個人擁有多數工廠，或分途參與多數工廠之所有權的實例。如理查爾德·亞克萊特 (Richard Arkwright) 其人，他

就會在不同的地域，擁有許多紡織工廠，不過，這每個工廠，常是看作各別的企业公司，與另一個合夥者的團體聯同活動；他迄未企圖在這各地的生產機關上面，建立起一種統一的財政的支配。就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三四十年代，財政的單位與生產的單位，還照例是彼此不分。直至同世紀最後數十年間，這兩者的分離，才隨着聯合運動的發展，而趨於普遍。

第二節 托辣斯與卡特爾

各別生產組織之所以逐漸結成較大的企業單位，那有三個主要理由。有時候，那是由於一個製造業者或合資公司想把自己所需用的原料的供給，概由自己支配，這樣，除了其原料能得到定規供給，原料價格亦有所節省外，更會在次一生產階段上提供以利潤。像這種運動，一般稱爲垂直的聯合（vertical combination）——即是把生產物品程序上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連續階段，置於統一的支配之下的聯合。此種垂直的聯合，可適用於任何階段；一個公司可向後統制其原料的供給，也可向前統制其出品投售的最後市場。

通常與垂直的聯合相對照的，有平面的聯合 (horizontal combination)——這就是把同一階段同一生產形體的許多公司，結成單一的企業單位，或結成多少有密切關聯的結合。像這種形式的聯合的動機，與前一聯合的動機極不相同。在過去，此種聯合通常是基於一種欲求，即限制市場競爭，規制貨物出賣於消費者的價格，貨物上市的數量，或者規制貨物出賣的條件。由是，平面聯合與垂直聯合不同之處，就是它逐漸具有一種直接行使獨占的性質。若在垂直的聯合，普通總會相並的造出一些競爭的企業，而這種企業，都包含有生產行程上的幾個階段，它不但與其餘的企業競爭，且與每個階段的其他生產者競爭。像這種聯合如其具有獨占性，那就只是說，一切湊集的大資本的獨占。但平面聯合不然，平面聯合如果不是把相當多數的同式生產者結合起來，使每個屬於這種結合的份子，都多少在貨物價格與產量的規制上受到有效的統制，那它這種聯合，就毫無目的。真的一個聯合如其規定價格，規定再低即不得發賣的價格水準，那同時亦會自動的限制產額，因為價格一有昂騰，有些購賣者即不得繼續購買。在另一方面，一個聯合如限制產額，同時亦漸

會自動的規制價格，因為照通常的情形而論，生產愈少，其所能售得的價格將愈高。要之，產額規制與價格規制，僅僅是完成同一目的的兩個不同的方法，那目的，就是想藉貨物上市條件的規制，而增加利潤。

聯合會提高價格麼？

然而，特別是近幾年來，往往有人這樣主張，說平面聯合除了規制貨物價格與產額外，還有其他目的；那目的，就是縮減生產費，並因生產費的縮減，而實行降低價格——即把價格減到低於這聯合存在以前的限度。自然，在現代的生產條件下，工廠的一切設備能充分使用，其生產費即會最低最低；工廠如生產大量的同式標準品，其製造程序上亦常有所節省，這兩者通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特這兩種節省形式，他們以為都能由平面聯合的形成而促進。因為，第一，整個市場的需要，如其不够充分使用一切工廠，那與其使一切工廠都從事供應此有效需要的生產活動，就不如完全關閉一些工廠，只充分利用其餘的工廠，能這樣，那是更有經濟的利益的。一個平面的聯合，有權完全封閉若干工廠，而把供應市場的必需生產，集中於其餘工廠方面，這一來，生產費減低，貨物售價低廉，此

低廉的售價，說不定會刺激需要，使其餘停閉着的工廠，重新開始生產。不但此也，由一個有組織的平面聯合來安排產品的標準化，那比之在競爭的生產狀況下，是更有實行的可能了。假若一大些各別的生產者從事漫無統制的生產，他們通常就會生產品類極其不齊的種種色色的貨物——其貨物的龐雜，說不定竟會大大超越消費者真正需要的限度以上。一個聯合組織就能够削除一些龐雜貨品，從而低減生產費，使消費者由低廉價格所得到利益，要遠大於其由選擇範圍內所受到的若干限制的損失。自然，在這種標準化的統制上，殆不免有破壞有價值的龐雜品的危險。但現代生產上的許多龐雜製品，顯然於消費者無何等價值，且反而會使他們蒙到莫大的弊害。螺旋釘之樣式大小的標準化，以前製造的各種各色的螺旋釘，就大大削除，生產費由是低減，消費者就由是獲有利益；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至英國各式摩托車小製作者的繁多，從消費者方面的觀點看來，那無疑是這種工業之有效發展的嚴重障礙。聯合一切對立的製造業者的一切專利機關，或聯合它們中間最優的專利機關，所出產的廉價摩托車，那對於消費者所提供的利益，比之現在各種

各樣的摩托車對於消費者提供的利益定，然是要大得多的。

特一個平面聯合組織所能成就的節省效果，並不單是靠着產品的標準化與簡單化。因為，產品龐雜的種類即令一仍舊貫，設每個工廠單只選定一種產品作大量的生產，而不令所有各別的工程都分途生產各種各樣的產品的總額之一部分，那也會有頗大的節省效果。近年以來，凡屬大平面聯合組織存在的地方，這種工廠生產的專門化，已經成爲其比較重要的特徵之一；但在實際，標準化與專門化，通常都是相輔而行的。

標準化的發展 自然，標準化的利益，甚至專門化的許多利益，並不是一定要企業進行聯合才能够成就的。像英國特許標準館（The Chartered Standard Institution）那種機關，那就曾使生產的若干標準，極廣泛的應用到那些甚至沒有財政上的統制的諸般企業。因此，英國之鋼製品的種類與樣式，都頗受了標準專門化的影響，至那些標準，則是曾經規定下來，作爲鋼生產者與其顧客間訂定合同的條款的。以前曾經大規模製造過的某種樣式的鋼製品，主要因爲載在一切重要合同中之標準規定，以致現在不復出現於一

般傾向優良樣式的市場。然而，在財政上沒有某種程度的劃一統制，對於標準化或專門化的運動，究竟是難於怎樣強制推行的。擁有龐大生產領域的美國，曾經藉着各獨立製造業者間的知識交換，中央技術機關之生產標準的推薦，而作過一些努力；但結局，總會發覺以次的事實，就是，至少關於專門化方面的節省效果，非有高度的財政統一，則不易有所成就；而一些各別企業之獲有專利，那更會有效的妨阻任何高度的標準化，使其曾經應用的這些方法，難於奏效。因此，近年除了想藉規制價格，限制產額，以統制市場的要求外，更愈益傾向於這種要求，這就是依標準化與專門化方法，以成就其生產上之節省效果的要求；這兩種要求，已經在相並的促進工業上的聯合。

聯合之組成，其形態，其強度，會有許多差異。當聯合諸企業在完全統一的財政支配之下組成單一企業時，其結合最爲緊密。各種不同的工廠，可以繼續活動於各別的經營之下，而這諸般經營在管理上，又可獲有極廣泛的自治權，但關於規制價格、產額，乃至製造品樣式的事體，乃屬於聯合的一般企業政策的範圍，這種政策，必取決於各別工廠僅構成其一

個部門的中央組織的統一支配。因此，其工廠儘管頗多，企業却只一個。這種組織形態，普通稱之為托辣斯，托辣斯得依種種方法而形成。一切各別企業，可以併合為一個單一企業；或者，它們無妨各別維持其生存，但得服從一個發縱指示和保有其最大部分股份的主腦公司的統制。無論在這兩者中的那一場合，其目的都在企業政策的完全統一，但同時得依特殊工業的環境要求，允許其在生產管理上的某種限度的分有權力。

卡特爾 與這種統一的企業組織形態相對照的，就是卡特爾 (Cartel) 式的結合。在加特爾的結合中，各別企業不但保持着個別的存在，且保持着終局的獨立。它們的聯合行動，只限於那些於它們有共同重要性的事體；例如，它們可以加入一種規制價格或產額的協定，甚或可以加入一種對有效總購訂合同行使適當配分——即依照一種方法，使每種特殊企業都得高度專門化的配分——的協定。為要縮減龐雜貨色的種數，它們可以同意生達上的標準專門化，並且，它們對於以國家或國際為基礎的市場，還可簽訂某種地理限制上的協定。此外，就一個比較有力的加特爾說來，它們且可進一步設立一個共同販賣

組織，凡屬參加的各別企業，都同意依此組織以販賣其若干部分或全部的產品。在某種情形下，這種販賣組織對於工業的活動，簡直取得有極大的統制權力；其權力之大，與一個完全統一的托辣斯所實行的一切權力，差不多不相上下。此種場合的卡特爾，實無異一個托辣斯，特其重要不同之點，就是前者並非基於不可變的協定。在大多數場合，凡屬參組於卡特爾中的企業，至少都可依一種詳載在卡特爾協定中的通告手續，或者付納若干罰金而退出。並且，卡特爾本身，亦隨時能由其參組企業會員的同意而解散，或因其繼續存立不能得大多數企業會員之投票擁護而解散。

卡特爾協定的訂立，通常都是以若干年為期，或在滿期以前，再行考慮續訂。在這種關係上，它與托辣斯根本不同，托辣斯是在單一的財政組織之下，把各別企業形成一種決定的不可分解的混合。

其實，卡特爾如按照法律的成案組織，則頗非如此。德國有所謂強制的卡特爾，凡屬某種企業上的生產者，都被強制加入。一九三〇年的英國煤礦法案 (The British Coal

Mines Act)對於英國煤炭生產者間的價格與產額的規制，亦帶有強制卡特爾的性質。此煤礦法案是一種暫定的方策——雖然那無妨繼續更新；並且，以通常情形而論，那怕就是這種具有強迫性質的卡特爾組織，殆亦不能像一大些各別企業資本，完全融合為一個新單位那樣持久。國家誠然不會允許一個強制的加特爾分散，從而，這種性質的卡特爾，也許可以在一國國境之內，保證其永久的存立。但一個卡特爾如參組有若干不同國家的製造業者，那就無法加以強制了。世界上尚沒有一個能強迫參組會員或確立其存續性的『超國家組織』(super-state)。一切國際的卡特爾，是在一定期間之內的自動的有限界的協定。

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召集的國際經濟會議，曾經考慮到各國對於國家的或國際的卡特爾和其他工業聯合組織的發展所應取的態度。因為，自大戰以來，工業聯合上的卡特爾形態，已經表現有一種極顯然的趨勢，那就是擴展其範圍於國境以外，並在各國有組織的工業之間，成立一種對於規制產額，分限市場的協定。其實在大戰以前，已經存在有這種

組織的實例，國際鋼軌製作者協會（The International Rail Makers' Association）即其著者，此種協會在戰後曾經恢復起來，因美國人沒有參加，故為一歐洲鋼軌製作者協會，對於歐洲大部分市場之鋼軌的供給，此協會尚能作有效之支配。

鋼卡特爾 但是戰後國際卡特爾組織最顯著的實例，則為歐洲大陸鋼卡特爾（The Continental Steel Cartel），此卡特爾包括有英國以外之歐洲一切重要鋼生產國家之有組織的鋼工業代表。其主旨在依照一種額定制，規制各國鋼工業的產額，一國產額超過額定限度以上，科以罰金，不及額定之數，則予以補助。此卡特爾創自一九二六年，其進行頗欠圓滑。但此後曾經一度更新；各國對此組織的一般觀感，雖都不很滿意，然當生產力遠較大於市場涵容力的現況下，它們實亦沒有打算取消此種組織，以致引起更不好的結果。關於攤分於各國的定額問題，關於超過定額的罰款制度，它們會惹起大大的爭論；它們鬧到使卡特爾本身受到完全消滅的威脅的程度，實不止一次，有時候，它簡直沒有一點實行規制產額的權能。

至若英國應否加入這個卡特爾的問題，那是常被提起的。大陸諸國都渴望英國和衷共濟的加入。但它們打算許與英國生產者的定額，較之英國鋼工業方面自覺其應當擁有的定額，相差太遠，而英國工業在帝國各市場上之特惠要求，那亦多感困難。加之，大陸諸國的鋼生產者，業經組成了以國家為基礎的卡特爾，英國生產者却還沒有。真的，英國生產者已有了強有力的鋼鐵製造業者聯合會（Iron and Stee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並且它們之間還成立有許多規制特別產品之販賣條件的專門協定。但它們沒有一種能統制原鋼總產額，或對各生產者配分產額的一般加特爾或聯合。不過，英國鋼工業如其滿意大陸鋼卡特爾對它所提出的參加條件，那在不久期間之內，它當不難創立一個够資格為國際卡特爾之一會員的國家加特爾組織。英國參加此國際組織之真正困難之點，還在於其對總市場所要求的分額，較大於大陸諸國生產者所打算派分給它的分額。

卡特爾與關稅 當國際卡特爾運動開始發展於戰後數年間的時候，許多人都以為這種組織如強化起來，其結果必會使關稅障礙變為沒有需要，以前國家以關稅規制輸

入的方法，將代以不用國家干涉的各生產團體之間的直接配分市場的協定。但在實際，事體是不曾按照這種途徑展開的。規制產額與攤分市場的國際卡特爾組織，大體是以已經存在的關稅為基礎，假若把現行關稅政策大大修改到取消各國工業所受保護的程度，則以此關稅為基礎的組織，或將無法支持。加之，國際卡特爾制度只合適用於高度標準化產品——如原鋼或鋼軌，或某化學品，或某種原料——的比較窄狹的範圍；若以其現在的形態推行於較大部分的製造工業方面，則定難通行。根據這諸般理由，卡特爾組織就似乎不會招致人們所預期的效果，即使關稅變為無須或無效。大體上，這種組織的活動，還會保持着，並發展而為一國際經濟組織之永久的特徵，但它決不會代替各國賴以規制其對外貿易所採行的國家的方策。

就全般講來，一九二七年的國際經濟會議，並打算贊助國家的與國際的卡特爾，以及其他的聯合形態，因為在同會議看來，這般結合，都不失為促進經濟制度之比較有效組織——即利用專門化與大量生產機會，並縮減工業變動之多面性的組織——的手段。據一

般人所說，卡特爾得阻止競爭的製造業者們之判斷錯誤所引起的生產過剩。它們能使供給適應需要，並能在必需場合保持存貨，低減生產，以便暫時渡過衰減的需要的難關。以需要上的小小變動而論，這也許是可能的事，但卡特爾制度除了隨着世界不況而競作生產活動以外，迄未顯示出更多的證明。其實，在某些場合進行的阻止需要上小小變動的努力，結局且會使大需要變動更加弄到不可收拾。因為，當需要開始轉向尖銳的低落時，卡特爾僅有的動向，要就是不把其能夠預為積存的商品提供市場，不然的話，就是不願需要進一步受到限制的損失，還支持其價格。它們保留存貨，是因其設想不況不會延長許久，因之，這存貨終於要投向市場，以增加一般的過剩。因為，總需要額愈減，一定額存貨所能供應一切需要的時間就愈長；所以當貯積的存貨一旦投向市場的時候，它們由此促成價格低落的影響，就比之甫經生產出來即逕行提供市場所促成的價格低落的影響還大。

存貨即令不貯存起來，如其不問需要的減退，還努力支持原有價格，則這種努力會進一步降低需要，且最後會在若干場合，使價格低落回到原來不加規制，一聽其自然跌落的程

度以上。我們作這種說明，並非對卡特爾制度表示輕侮；在促成工業變動的諸般原因能够加以制馭的限內，卡特爾制度大體是具有縮減工業變動限度的權力的。並且，遇事須得訴之於經驗；假若卡特爾制度要遇到類於一九二九—三〇年這種不況的其他不況，它將會知道其錯誤，而不致再度過於着重以次兩種方法：即當着需要慘落時，多方維持極高價格，或大量蓄積存貨，而不明白這存貨蓄積起來的後果。

不論在那種場合，我們對於這類政策，不能單獨歸咎那些參組於私人加特爾中的僱主。在政府方面，實曾做了一些比私人加特爾還要無見識的同類事體。就美國聯邦農業局（The Federal Farm Board）的情形來說吧，該局積存的巨額小麥，有許久許久不曾叫市場投銷，但因任誰都料不到這巨額小麥幾時會投上市場，於是價格乃漸趨低落；其低落的程度，實比這些小麥早些時投進市場的跌落程度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總之，這問題的論點，不是說卡特爾組織不好，也不是說此種組織比無規制的競爭還壞，而是說，無論規制的資本主義抑是無規制的資本主義，都不曾覺得足以阻制過去三年那種不況情形的任何

手段。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這種制度如圖存續，它就不能不在國家的方面，實際的方面，求其更有組織，這實在是顯而易見的事體。世界經濟的將來，無論會變成怎樣，我們敢斷言其決不會返還舊式競爭的自由放任制度。假若世界經濟的前途仍是資本主義的，則在今後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各國企業爲了規制生產與交易的條件，將在國家與國際方面，作一種比戰前更密切得多的結合，它們在工業進行上，將與其政府保持一種比戰前更密切得多的關係，並且，它們的這類活動，還會進行在一種比戰前更透澈得多的國家規制的制度之下。經濟制度無論怎樣變更，世界對於這種必由之路，終無法逃脫。俄國的工業——甚且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更要遵循此種途徑——被組織於巨大的密結的生產者托辣斯之中，而在蘇維埃聯合共和國經濟機關之直接監督下進行。俄國工業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的區別，與其說是存於其組織，毋寧說是存於其目的和其經濟事業之生產物的分配方法。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換，自然要包含一種遠較資本主義制度

有更高度發展的經濟組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種工業，不但會有更高度的組織，且會依照一般的經濟計劃，與其他所有一切工業保持更密切的關聯。不過，社會主義工業在較初期的階段，彷彿總會沿着國家的組織的路線進行，而不是沿着國際的組織的路線進行——在國際的組織之下，每種工業第一要視為有助於一特定民族國家所統制的國民經濟計劃，並且國際的活動，主要是進行於各國家之間，而非如在當前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樣，直接進行於各工業之間——社會主義的最後目的儘管是國際的，但它出現之始，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在特定國家之中，作種種爭取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國民運動。若在資本主義，它則依照每種事業的不同環境，而自由成爲國際的或世界的。有些資本主義組織的聯合——如擁有許許多多輔助機關的荷蘭汽油公司，其結構根本就具有世界的性質。而在另一方面，如以國民團體，乃至國家主義者團體爲基礎而建立的國際鋼卡特爾一類資本主義組織，其範圍亦是國際的。

世界主義的這種國際的傾向，曾不時被人們力言是，有利於世界的傾向；因爲，照這班

人所說，那將逐漸超越政治境界，使世界結束到更難於發動戰爭的程度。但我們對於這種見解，實無話可說。因為，那怕是最有世界性的冒險行爲，首先就要連繫到若干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至把油料看爲是國際和平方面的一種勢力，那是定然要使我們大費思索的。

第四節 股東 技術家 勞動者

現代的工業制度，在不絕隨大聯合的發展，大量生產範圍的擴張，合理化運動的抬頭，以及依人爲方法所加於市場的統制，而改變其結構；至這種改變在各關係階級方面所發生的影響，我們是須得加以考察的。前面講過，在典型的現代企業中，即在具有合資組織，且其資本所有廣爲分佈的企業中，其大部分的股份所有者，都毫不過問企業的政策。他們把資金投進工業經營，經營得手，他們即由此領受紅利。他們對於企業方面的關係，盡在乎此。至他們所投資的企業上的各種經營的管理方法，他們概不知道，且也無從知道。因爲，現代世界的投資者，照例是採行兩個途徑：或者是把他的蓄積零細分成小額，直接冒險投向

各種不同的企業公司方面；或者是間接委託某種投資托辣斯或其他類似機關，由其代為履行此種任務。即令他是投資者而非投機者，即令他購買股票，是為保存而非為了再行投賣，他通常對於其所投資的，甚且企圖實際參加管理活動的企業，並不視為他自己的企業。自然，這種情形不適用於極大的股東，或小私人公司的股東——其實就在這諸般場合，今日亦大率如此。但大規模的現代企業的實在支配權，不是把握在資本所有者手中，而是把握在極其少數的行動的企業家手中，他們或為其管理的事業的大股東，但有時不必是大股東，甚或非股東。他們是『工業上的統率者』（*captains of industry*），大抵都有薪水報酬；經營得利，還有紅分，其薪水之大小，時或視其經營成功的情形而定。他們是介乎金融家與技術家之間，前者偶然或與某特殊生產部門或生產諸部門有關，而後者則主要是憑其實際生產活動上的知識，以管理大規模的企業。英國對於企業指導者的選擇，曾有一種主要根據金融理由，而不根據技術理由的顯明趨勢。德國不同；德國企業上的技術者，簡直占有異常重要的實行統治的地位。美國在這方面的情形至為參差，我們殆不能作一

概括定論。但從大體上說來，現代企業組織上的支配勢力，不外是金融的勢力。至那些應用技術知識的人們，原來都是支取薪金者——企業上的僱工，在這種關係上，他們就比較近似工資勞動者與書記，而與工業的實際指導者或靠不勞而獲的股東們不同。

技術家的態度 不過，這些技術家縱令是靠薪金生活，而不是靠專業利潤的紅利生活，他們主要仍視爲是站在管理支配方面。並且，依照階級的緣分與教育，與其說他們會同意任何根本改變經濟制度的勢力，却毋寧說他們會傾向資本主義。不過，他們的向背，亦往往有變動的可能。他們是技術家，關於工業上的效率，他們不能不有專門家的關心。他們想把事情弄好；凡屬看着有促進工業上之更有效組織的任何力量，在直接不威脅他們自身物質利益的限內，他們亦是有意參加的。特他們既怕社會主義採行革命手段，危及其中間階層的社會地位，那末，當他們認定資本主義還繼續爲一種相當有效的工業組織形態時，他們就不會傾向反對資本主義的勢力。但有一個時候，如其他們感覺資本主義崩潰在即，並以爲那是對於更有效組織的實在妨礙，他們又會重新考慮其地位，並更加鄭重的探

間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一種更穩定更進步的工業制度，是否可能。他們以前即令對自己提出過這種問題，但多半爲以次的意念所打消，那意念就是，社會主義缺乏經濟的妥當性。他們總以爲社會主義者比較關心於改變工業生產物之分配，而不大關心於促進生產的效率。但現在人們漸漸明白了，分配的問題不解決，生產亦不能有有效的進行。而且，經過當前蘇俄五年計劃在增進並組織生產與分配方面的大努力，社會主義已開始在人們心目中表現一種新的觀感了。假若俄國成功，她由此成功以促起技術家轉向社會主義，那就比用任何有力的宣傳還要有效得多。

特關於這種轉變，究還有一種障礙，即技術家在工業上的地位，往往容易反對手工勞動者的職工組合，且容易視職工組合這類團體爲其促進更大工業效率的努力的妨礙。因爲，職工組合在其保護組員之生活水準與勞動條件的努力上，往往總不免要反對技術家所進行的低減生產費一類活動。而在那些確立已久的技術勞動者的職工組合，尤屬如此；他們常常看着生產技術一有改變，其辛苦習得的技能，即將無所用之，而其日常生活亦

因而受到威脅。因此，工業上的種種無可避免的變革，總容易碰到他們組合方面的拚命反對。但他們這種反對，縱令在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場合，亦會發生種種有利於勞動階級的作用，即經過他們反對之後，技術家對於低減生產費的努力，乃不致毫無顧忌的做去，從而勞動階級由此所受到的損害，自會減輕許多。因為，技術家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總容易把工業看為單是技術的問題，其實，工業同時當根本的看為是人類的問題，其目的不僅在創造最大限度的財富，且得在創造最大限度的財富的當中，力求把人類的痛苦與不便減少到最小限度，力求財富最妥當的分配。低廉的生產，並不算是絕對有利；這種生產，如其會趨向正當分配，如其是為勞動者對於適當的人類勞動條件的要求所限制，那才能談到絕對的利益。

職工組合制度的功能 就因此故，職工組合即令有時像是採取阻害的態度，往往

亦會成就有用的目的。但近幾年來，工業上的技術發展過於迅速，各種技能的職業間之傳統分野，亦在各方面很快的弄到不能支持，由是，職工組合的妨阻的權力，乃受到非常嚴重

的限制；加之，職工組合之強弱，往往是與勞動需要——與供給相對待而言的需要——之大小成比例，勞動需要減少，職工組合的勢力當然要進一步受到挫折。在近幾年中，無論那種職業，幾乎都感到勞動的過剩。這種對於職工組合行動的不利情勢，又恰好與技術上之加速變動相一致。這一來，職工組合的權力是慘遭挫折了，但却不致因此完全瓦解。那怕是在蘭開夏紡織工業那種極度不況的產業方面，他們的團結一致的程度，還足令其在那種異常不利的情況下發揮莫大的權力。

但近年工業技術的發展，無疑要逐漸增加其對於職工組合制度權力的妨礙；因為職工組合運動的力量，在各種職業上配分得極不均衡，其過去的主要權力，很久都是集注在礦工組合一類大職工組合，和機械造船一類有高等技能與專門知識的職業的組合上面。煤礦業與其他重工業之極度的不況，益以够代替鑿鑛工與冶鑛工之傳統技術的機械方法的採用，致礦工與製鋼者的職工組合的權力，大形削弱。至於在戰爭當中盡量膨脹，以致大大越出其常規以外的機械工業，已經是不能不極度減縮了，同時，它還得對付那些方法

——即會使半技術工人或無技術工人得在各種傳統的生產方式上，代替技術工人的方法——之迅速標準化哩！

以前極強的職工組合，都因這些變動變為脆弱了，由是各國的職工組合運動，乃大大失其推進的能力。就令世界的繁榮完全恢復過來罷，職工組合在不改其組織與戰略的限內，它是決沒有再獲得其舊來地位的可能。

職工組合制度及其運動策略 假如職工組合要恢復其十年前那樣的好局面，它就顯然非在一種新的基礎上自行改造不可。這新的基礎，就是少依賴少數技術勞動者團體，多依賴全勞動階級的整個組織。在當前的情勢下，不但技業與技業間的界域無法維持，就是技術勞動者與非技術勞動者，乃至這種工業與那種工業間的界線，亦在逐漸破除，使勞動由某種工業轉到其他工業，或由某種職業轉到其他職業，遠較從前容易。除了極少數勞動團體而外，前此由一部分勞動者對某一特殊技業，甚至對某一整個工業的勞動者維持其特權地位的勞動獨占時代，確已成爲過去了。由是，新的組合主義必然要成爲一種建

立於共同工業政策（超越各別技業與工業的限界）上的大眾運動。在改變的情形之下，職工組合主義已是漸漸帶有更濃厚的政治色彩的。各別技業與各別工業的目的，雖然常像極容易單由部分的行動而達到，但整個勞動階級之共同要求，却非採行更有政治性質的活動不行。國家在規制工業條件上的幫助，今後將更值得懇求；勞動條件的改善要求，與看作一個生產機關的工業組織的改良要求，將愈加不能分開。因為，今日職工組合一要求改善工資與勞動狀況，或者一想保持常規，反對權益侵害，他們通常總要碰到工業支付能力的拒絕。他們對於這種支付能力的缺乏，通常總會予以反駁，說那是由於僱主們所支持的工業組織有種種缺陷，並說他們沒有過問那種組織的權力，當然不能挨受其缺陷所生的惡果。近年各地不絕發生的關於工資與其他勞動條件的爭議，曾經極錯綜的參雜着工業效率的論爭。英國在煤礦方面，在紡織工業方面，乃至在鋼工業方面，都曾經驗到這種事實；並且，在所有這些場合，職工組合都照例要求採行工業再造計劃，以保證其工資與勞動條件，並要求國會對這種計劃強制實施。一九二四年英國勞動黨內閣的樹立，以及同黨內

閣在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一年間之再建，自然大大加強了職工組合藉政治改善其勞動狀況的傾向；不過，職工組合的這種運動，是必然要發生的，勞動黨內閣再建這件事本身，與其說是工業問題逐漸增加其政治性的原因，却不如說是其一部分的結果。

第五節 集團勞動契約的將來

近年工業技術的發展，歐美技術勞動者之既成的職工組合的權力雖曾逐漸削減，並逐漸破毀其辛苦樹立的勞動獨占，但在過去二十年中，全世界勞動階級的狀況，却無疑有大大的改進。這種改進，主要是由於戰時世界各國都極度感到勞動缺乏；在勞動缺乏的情勢下，國家儘管藉強制仲裁與禁止罷工的手段以阻止工資的過度提高，但當時的工資與勞動狀況，是自然而然的會有所增加，有所改進的。加之，當世界大戰告終之頃，各國勞動者在政治上，在工業上所占的地位，似乎都遠較一九一四年為強而有力。在大多數國家中，僱主因要避免有組織的勞動階級的發動紛擾，都對其要求予以快諾。勞動時間的縮減，差

不多是普行於歐洲乃至美國一大部分地域；工資抬高的水準，簡直與戰爭結束後數年的飛漲的物價水準相適應。在此後世界不況中，因物價跌落，工資復又縮減，勞動狀況復又趨於惡劣。但此係就少數國家而言，大多數國家的勞動者，却還繼續保持着他們由戰爭結束後數年所獲得的若干利益。在已經取得了八小時勞動利益的勞動者，對於此點特別堅持；他們反對工資縮減的氣勢非常猛烈，以致全工業上的工資縮減程度，還大大的落在批發物價與生活費跌落程度的後面。歐洲在某些工業，特別是像煤礦業、機械業一類受外國競爭的工業方面，其工資誠然有嚴重的跌落，但跌落更利害的，還是那些為國內市場生產而受有更大保護的工業方面的工資。勞動階級狀況顯然變到比戰前更壞的國家，就只是歐洲那些實施過極度通貨膨脹的國家。一九二三年的德國勞動階級所獲得的工資，差不多只够維持半飽的生活。法國的工資水準，亦沒有按照佛郎購買價值跌落的比例增高。因此，當技術上的變動，正在縮減英國勞動階級之傳統優越技術之商業上的價值的時候，法德兩國的通貨膨脹，就勢必要增大德法勞動者與英國勞動者之真實工資的差率。這種真實

工資的差異，就在英國恢復金本位制的一九二五年以前，亦頗有影響於其工業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德法兩國通貨相繼趨於穩定以後，其勞動階級的狀況，重又漸趨改善。特別是在德國，在一九二九年，德國勞動時間儘管縮短，其工資却掙到戰前水準，有的且超過此水準以上。法國的進步，是較為緩慢的；其勞動階級的狀況，依舊惡劣，這原因，主要是由於法國職工組合運動上的弱點和其尖銳的分化。他們陣營內分有兩個對立的派別——一是共產主義者，一是溫和主義者——以致不能採取一致的有效的行動。由是，法國勞動者的生活水準的改進，就只好等待着隨伴不況而到來的物價的慘落。特不況在法國勞動者雖蒙到利益，德國勞動者却正相對的受其禍害；因為，德國在財政困難的重壓之下，一方面儘管極力維持國內物價，同時為要獲取一種應付外債的輸出剩餘，又極力壓低工資水準。歐洲諸國這種相對的真實工資的變動，大大增加了國際貿易情形的複雜性，且為全歐的經濟的國家主義增一促進的動力。

工資與生產力 在這一時期，全歐的工業生產力與勞動生產力，都在極迅速的增加。至工資與勞動狀況，是否與生產力同樣增進，則屬疑問。美國生產力增加最大，但美國在世界不況以前的繁榮期間，其工資却顯然是嚴重的落在生產力後面。不錯，與歐洲諸國工資相較量，美國工資還算能維持其高昂——甚至極高昂——的水準。但她這種工資的高昂程度，究還不够對於其人民的廣大的不斷增加的生產能力，在消費力方面提供充分的出路。

世界每個國家都有她的工資水準與勞動生活水準，實在說來，每個國家對於其國內不同部分的人民，也許同時有幾種的水準存在。但在現世界狀況下，許多種類的貨品的競爭，是遍及於全世界的。各國工資水準既有參差，各國貨物的生產費用自極不均衡。就理論上講來，一國工資水準，應當反映其工業生產力的水準；在一國與他國對待的關係上，一國的工資率較高，她就理應有較優越的生產力以資抵補。但事實上是不一定如此的，因為，工資不僅是取決於工業生產力，且取決於有組織的勞動階級之購買力；高度生產力與低度

購買力，是很可以同時存在的。若高度生產力的促成，主要是由於依合理化方法節省勞動，並以機械代替勞動，則尤會發生此種現象。某種工業實行合理化，實行以機械代替勞動，其勞動的需要，將容易隨生產力的增加而嚴重縮減；並且，這些工業之生產物的需要，亦不會擴張到那種程度——即使使進步組織驅逐的全部勞動，都再得到僱傭機會的程度。凡屬發生這種現象的國家，其工資的增加，勢將退落在生產力增大的後面。生產費上的工資低落，在國際競爭上當可獲得一種利益；但她們同時亦會經驗到一種事實，就是，其國內的市場不能與其生產力以同一比例增加。因之，她們除了在國外市場大大擴增其銷路外，勢將感到自己不能充分利用其擴張的生產力。但她們向世界市場推銷較大量商品的努力，不可避免的要引起他國的報復。因為，其他國家的國內市場，如由這些高度生產國家的輸出受到威脅，她們定然會提高關稅，限制輸入，以圖自衛。同時，在那些感覺其輸出品遭受世界市場排斥的國家，她們爲了平衡其競爭能力，必然迫而降低工資，這一來，其國內市場將又因而縮小。因此，一國生產力迅速增大，其工資的增加若不能與其生產力的增大爲比例，那

將成爲全世界的一種禍害。其國內固會因此發生不利的反動，同時且會攪亂他國的經濟組織，增大經濟的國家主義傾向，更不必要的壓低全世界的工資水準。美國不能把她的工資水準抬高到其生產能力擴張所要求的限度，其結果不但美國的不況強半由此造成，歐洲諸國，亦都蒙其不利影響。

貨幣工資的變動（一九一四—一九三二）

貨幣工資提高的百分率	實得	工資率
一六〇	丹麥(每小時)	
一四〇	瑞典(每日)	
一一〇	瑞士(每日)	
九〇		加拿大(每小時)
八〇	美國(每週)	
七〇		* 澳洲(每週)

七〇	英國(每週)
五五	*新西蘭(每週)
五〇	德國(每週)
三五	法國(每日)
三〇	南非(每週)

*單就男子而言。

一九三〇年的比較的真實工資(根據國際勞動局之工資率與生活費的計算)

以英國為一〇〇

一九〇

美國。

一六〇

加拿大。

一五〇

澳洲。

一一〇

*丹麥, *瑞典。

九〇

愛爾蘭。

八〇

荷蘭, 瑞士。

七〇

德國, 捷克, 俄國。

六〇

法國, 波蘭。

五〇

比利時, 奧國。

四〇

意國, 西班牙, 愛沙尼亞, 南斯拉夫。

* 根據所得計算, 非根據工資率計算。

真實工資的比較的增加(一九一四—一九三〇)

以戰前爲一〇〇

一四五

瑞典。

一三五

美國。

一三〇

瑞士。

一二〇

捷克。

一一〇

* 德國, 英國。

一〇五

南非, 新西蘭。

一九二九年。

需要之變動的性質 現代工業技術進步, 除了由機械代替手工技能以減弱職工

組合運動的力量外, 更還有另一種減弱那種力量的方法。我們講過, 職工組合的力量, 向來多半是集中在重工業與紡織工業方面。但隨着工業生產力的增進, 其生產品的性質, 乃逐漸趨於繁雜。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 那並不會大大增加其原產物的消費, 而寧可說是增進其日益繁雜的新的需求。他們購買無線電機, 購買留聲機、摩托車, 乃至購買許許多多的其他奢侈品——即低廉的生產, 使他們得有能力的購買的奢侈品。此外, 他們還會逐漸增加購

買勤務，而不一定購買實物的趨勢。他們將在輸運方面，在娛樂業方面，乃至在茶館酒店方面，有更大的需求。他們會提高其所購貨物輸送上的效率標準，從而，在配分業務上為勞動增闢一個僱傭部門。例如，商店須包好送往購買者家中的貨物，在其總售出品中所占比例，今日是比戰前大多了。消費標準上的這諸般變動，必然要使勞動由舊來的基本工業，轉向生產奢侈品的新而較小的工業，由比較狹義的生產方面，轉向運輸、分配以及其他役使勞動的勤務方面。但在這些尚在發展中的諸般業務上所僱用的勞動，就遠不如舊來那些工業方面的勞動容易組織，因為後者是有集團勞動契約與經濟利害結合的長期歷史的。在適當的時候，職工組合無疑會使其組織適應新的要求，但其勢力却不可避免的要在此適應新要求的中日形減弱。

第十一章 俄羅斯之挑戰

第一節 計劃開始以前

蘇俄擁有一萬六千一百萬人民，與超過三千萬方哩之廣大土地，在世界上，她是唯一的非資本主義經濟組織體系的模範。自然，就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也有非資本主義的許多服務組織——如國有的郵政局，鐵道，及其他的公共企業，為羣衆謀福利的各種服務機關，半公共性質的特種會社如大英廣播合作社，以及許多國有及國家統制之中央銀行，還有，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運動，與其相連繫之廣布的零售部，批發社，生產部，以及許多信用、售賣之合作會社——從農民信用的小規模會社以至於加拿大小麥聯合公司（Canadian Wheat Pool）。但是所有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這一類會社，雖然不是完全採取資本主義的企業方式，但至少在工作中是要受資本主義的影響，因為她們是從這資本主

和資本主義的主要差異，是它對於不同於一般企業組織的形式，具有較大的適應性。正如其歷來適合於資本主義的環境一樣，它可成爲非資本主義社會之一成分，且也適合於社會主義的方法。

至若消費合作社則不然，消費合作在其有限的範圍內，對於資本主義系統實不相容。消費合作社由社員提供的一部分資本誠然要支付利息；但它們並不廢除利息 (Interest) 而只是廢除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利潤 (profit)，因此，它們對於超過費用的賣價剩餘，不是以紅利形式按照所投資本來處分，而是按照消費者的購買量來處分——換言之，就是減輕一部分賣價。消費合作社的管理是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並且不論一個社員有若干張股票，每人只能投一張票，就這一方面說來，它們也是非資本主義性的。但是，這點差異實際也不怎樣大，就像私有股東對於他所投資的合股公司只有很小的支配權一樣，實際上消費者對於合作運動的工作的支配，也是非常有限的。假使他要求此支配權，並且知道怎樣去使用它，他無疑會有更大的支配權力；但就整個說來，合作運動的進行，大體是由於受俸給

的辦事員與經理委員會，不是由於通常的社員。就是這些委員會的民主選舉，亦很少引起政策上的重大差異。

社會主義與合作

但就消費合作社允許社員支配的性質而論，消費合作運動總算是一種民主運動。在實際上消費合作不能成爲更有效的民主化的真正障礙，乃因它的日常事務，對於普通社員沒有多大興趣，所以他們不甚熱心去行使更大的支配權。但這是一個嚴重的弱點；這說明了普通社員對於合作社不十分忠心，社員不忠心社務，遂使合作社發展其生產支社的運動力量，大受限制。有一個時候，熱心的合作運動者，曾幻想把合作運動逐漸的和平的推行到產業的全部，並以爲不必有劇烈的變更，不必有國家的干涉，可以用合作的手段，逐漸代替資本主義。但是現在沒有誰肯十分相信這個意見了。合作運動還在繼續成長，不過它的成長，並不會對於資本主義統治作有力的挑戰。

又有一個時候，熱心的集產主義者，都相信私有的產業能逐漸的零碎的國有化或市有化，社會主義可以由此實現。他們以爲社會民主黨取得政權，通過此政權，每個國家中的

主要產業可逐個國有化；由此，不必要劇烈破壞，資本主義就可經過若干階段達到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者雖還繼續提倡基礎工業與公務之逐漸國有化，我却不相信他們現在仍主張能專靠這些手段以實現社會主義。在現在看來，這樣的過程顯然過於遲緩；並且，把產業一種一種的零碎獲得，視為到社會主義之路，顯然遠不如將資本主義的樞紐制度，如銀行及對發達經濟準備新資本機關等等，迅速歸於社會統制之為可靠。在當前資本主義的難局下，社會主義者們乃覺得將要來到的社會主義的實現，會遠較其過去的宣傳假定為迅速。照他們過去的假定，社會主義沒有一點一滴的把世界的經濟制度完全拿到手以前，資本主義還可以被容許其存在與繼續。

俄國的冒險 因此，在現代世界各國中，大家都集中注意來考察俄國的經驗，考察這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方法中的空前嘗試。俄國共產主義者一擊而取得政權，並且在他的權威之下，使用他的政權以圖於廣大土地上建立經濟政治生活的完全統制。但是他們的成績不止於此；因為他們不但設法用廣博的組織計劃去統一全俄的經濟生活，並且

他們的計劃包含着全國經濟生活的澈底與急速的轉變。就在一個完全工業化了的國家，一個慣於行使大規模的生產與交換的國家，要用廣大的計劃來統一一國的經濟，也還是够不容易的事。而俄國却成就了更艱難的工作，幾年之間，將一廣大落後的農民占優勢的區域轉變為一個全世界中最完全最前進的工業國家。他們的努力不止於工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化，如使俄國在工業上有大量生產之純現代組織；他們並努力於農業之工業化。俄國的農民一向都是慣於以最低水準的效率從事於小規模的生產。他們努力改變這些農民，在浩大的農場及機械力的廣大應用的基礎上，統一工業化的農業組織，現在快結束的五年計劃，與五年計劃下的農業集體化運動，那是這個勇敢的經濟發展政策的兩個姿容。顯然的，在這兩個方面，共產主義新精神的策動力，很够使這轉變成功，但當這轉變方式由蘇維埃政府提出之始，外國人都漠然不加重視。五年計劃或者不到百分之百的勝利，或許集體生產的路上還有多少的困難，但無論是蘇俄的敵人與朋友，都不得不承認蘇俄已有幾乎不能使人相信的驚人的進步。

俄國與世界 試觀察過去幾年世界對俄國實驗的態度吧，那是非常有趣的，她們的態度，在跟着五年計劃的進步而變更。在最初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見，不僅是懷疑的，而且是嘲笑的。她們譏笑俄國是荒唐的幻夢，並以爲所定的計劃是聊以解嘲的幻想。她們堅決的預言俄國的工業生產必然會完全破產，並以爲任何努力去干涉農民管理他自己的土地，或去強制農民採用組織的集體方式，是會造成羣衆饑餓的。但是這種態度，由事實迫而逐漸改變了。泰晤士報的通信員李嘉 (N. J. C.) 及其他在俄國國外的所謂「權威」者繼續發出閉門造事的消息，宣稱俄國組織是在危難地崩潰；但相信這些預言的人一天一天的少了。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很多人期望共產主義經驗之失敗；到計劃進行着的時候，他們相信真正崩潰的可能漸漸的變小了，却轉而在計劃的最初的成功上對於俄國人民爲生產的努力加以更求全的責難。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見，不是友誼的；但却顯然變得更關切了，並且在從前僅以俄國的陰謀故事爲滿足，或者對於計劃的某某部分的失敗之類的顯然偏見的記述爲滿足，現在確遠不似從前那樣容易滿足了。他們更殷切地想得到真事實，想

知道五年計劃是什麼，他們怎樣幹法，新俄政府及經濟生活組織的關係是什麼，俄國人民在「計劃」的可怕的紀律之下真正的思想與感覺是什麼？實際上，共產主義真是極少數人對心懷敵意的羣衆作殘暴的獨裁呢，抑或是那些久與羣衆在一起工作而又深知他們的心意的人們團結來對心悅誠服而熱誠的服從者的領導？歐美報紙對俄國的政治消息，仍然和從前一樣的含着敵意，和從前一樣的發瘋；但在經濟消息方面，爲了要求知道真相的讀者的願望，增長高而開始改變了。

在某些地域，因爲共產主義及五年計劃的勝利，及蘇俄地位的更加鞏固，對蘇俄的反對反而加強。因爲這是顯而易見的，假使資本主義對手方的經濟制度可以安全建立，並且在大部分的歐洲，在提高經濟生活、防止失業上獲得成功的話，這個教訓，決不會在那些對於經濟問題掙扎失敗的各國輿論上喪失其力量的。五年計劃的成功，不僅說明社會主義政治在世界上的一個大而重要的區域得到安全的勝利，並且在各國的不滿意於資本主義制度人們的心中是一種酵母。但是，逐漸感覺蘇俄終於會成功的意識，雖不免要加強某

些地域的敵意，它却特別着重，但同時却也會促進其特別的打算，因為蘇聯已經在世界經濟的前途上成爲一個重要的力量，各國自不復能像前一樣的對她持那樣不負責任的瘋狂態度。並且，蘇俄爲了集中力量於使五年計劃及農業集體化成功，所以遠不如從前那樣樂意參加她以外的世界的危險糾紛。他們對於幫助外國革命運動的宣傳活動已經放鬆了。當着他們有機會的時候，他們願意和資本主義列強結成較好的關係，然後他們能够較自由地從事內部的建設。他們要取得工業貨品的入口以再建俄國的工業；因爲要買入口貨，就必得要賣出口貨於他國。因此，他們需要與資本主義列強訂立通商條約與貿易協定。他們的基本計劃雖仍和從前一樣認爲共產主義的外廓是以全世界爲範圍，但實際上他們的直接態度更明顯地變爲民族主義化了。他們不再因誤信世界革命可在任何動因之下爆發而感受痛苦。他們了解，在目前，他們所能有的貢獻是考慮他們自己的地位。這使他們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暫時共同生存，而沒有不必要的傾軋。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不管他們在政治上怎樣憎惡共產主義，但不能輕視俄國市場前途的可能性，不然，她們自己就要

陷於訴諸戰爭的經濟困難中。共產主義下的俄國的存在，成了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一個公認的事實；即在俄國的一方面，她暫時也有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協的必要。

共產主義的政策

假使從五年計劃經驗的結果來設想俄國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有真的變更，或者在基礎的展望上有任何國家主義的意義（像有些人所曾經那樣的），那無論如何是完全錯誤。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哲學，是深根固蒂的建立在馬克斯主義的學說之上。現在在蘇維埃領土內集中國家事業的形態是純粹爲着便利起見，不是從根本信心的改變出發的。共產主義者們是在等待資本主義世界的崩潰，他們堅確地相信資本主義這副遺產是由他們承受的。資本主義也許遲早要崩潰的；但共產主義者們堅信資本主義這種內在矛盾的最後結果，是毫無疑問要到來的。他們不以爲蘇聯是一種大的民族性的國家，她把現在的政治疆界來明顯的和世界其餘部分分開；他們以爲這僅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聯邦，這共和國是可以無限發展，將包括那些將待成熟的共產主義的新區域。共產主義者的這個理想，意在一個聯盟的「世界國」(a federal

world state) 根據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計劃去治理。他們自己的計劃其所以是國家的，只是因為他們現在的統治，是在顯然很寬闊的但畢竟是有限的政治區域。

俄國革命及革命以後

現在要談到五年計劃是什麼，產生五年計劃的經濟制度是什麼了。俄國的共產革命是在十五年以前——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但是在共產主義者掌握政權後一些時，沒有聽見過什麼經濟計劃。因為經濟制度在俄國完全破產的結果，（這破產的確主要的是遭逢在革命以前），共產主義者們只算是承襲了一副完全經濟解體的遺產。農民獲得了土地，把大的地產分得很零碎，因為沒有城市的供應，回復到自給農業的最原始形態。那些工廠，在舊統治下主要是由外國專家管理，在撤退這些專家管理的許多場合，都退步到無組織、無效能狀態。因為機器破壞了，無法修理，原料供給、產品輸送的交通系統異常紊亂，於是更加退步。國內是飢餓，國外是封鎖，在許多重要的生產及土地肥美的區域，都有內戰。在那時候，任何有組織的努力，都不能希望把這個國家裏面的經濟系統再組織起來。俄國只有以死堅持，假若困難不致弄到完全破產的絕地，她總要等待解決

經濟問題的機會。

在這樣情形之下，沒有，也不能有真的經濟組織計劃；他們所做的主要的是由於本能——由於一種本能使共產主義多少適用於直接問題的解決。這個時期，俄國人自己叫做「戰時共產主義」時期（War Communism）它的特點是在努力把散布於全俄的產業中工廠中的羣衆建立一共產主義制度，這制度在那時並不會事前充分的想出，且在應用上，無論在何種情形下亦不能充分受政府的統制。在這個時代，「工廠蘇維埃」儘可能的工作大批的財產的沒收，而不計及其將來的進行；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把技術專家及經理們驅逐，打算把一切東西都握在自己的手裏。生產像這樣全無效能——就在任何比俄國更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也注定要失敗的；即使俄國在共產運動後面有緊張的意志及策動力也自然逃不了失敗的命運。

列寧的政策 在很早的時期，列寧就認清了以次的事實：就是依俄國的情形，要她一步就進到經濟的完全社會主義統制，那是不可可能的。她必須爲了以後的前進，先退後一

點；並且須在共產主義者沒有充分時間來組織，來充分用集體化的手段以前，允許私營商人及農民在廣大的範圍內用個人的生產方式及貿易方式。由是接着「戰時共產主義」就繼以「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私營商又出現了，政府容忍他們，並且暫時允許他們去賺取很高的利潤。努力於強制農民使在農業上增加生產，並鼓勵農民任意開墾土地，允許他們從售賣剩餘產品上獲得利潤。當着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的時候，國外的新聞界差不多到處都認為是共產主義政權結束的開始，和俄國承襲資本主義制度的初步。他們說：俄國終歸是一個農民占優勢的國家；在俄國政制之下，農民終於要走他自己的路。假使俄國政府要干涉他的自由與墾植方式，這樣政府的生命是不能延續下去的。伴着這農業生產的現象而起的，必然會是私營貿易逐漸廢棄對純正共產主義——乃至於在工業上——的努力。

雖然俄國在作暫時的大讓步，並允許私有企業的再建，並且這些私有企業對於他們正要建立的整個結構具有威嚇的性質，但他們在心裏很明白他們在做些什麼。整個政權

仍然在共產黨手裏，通過蘇維埃制度來工作。共產黨以其密切的結合與有訓練的組織，很如意的來運用蘇維埃。共產黨允許私營商恢復他們的經營，允許其再獲得他們的利潤，那很簡單的是因為他們自信無論在什麼時候要再壓制他們，都是有力量做得到的。他們甚至覺得可以允許富農有任意出賣其產品的自由，因為他們自信只要時機一到，他們有權力來解決農業問題。於是共產黨利用新經濟政策所給與的餘暇，來建立集體制度，先期完成一個新的進展。一到共產主義國家，在廣大的規模上，真是建立了她自己的集體化的制度來供給全國經濟需要時，就輪到私有商及農業生產者的頭上了。

組織蘇俄整個經濟生活的思想與大經濟計劃，是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成長起來的。其發源却遠在此以前，列寧在最初出發的時候，就確實蓄有此意。現在俄國完成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萌芽，可以在一九二〇年找到，那時列寧有這樣的認識：假使俄國要發展一個進步的工業制度，必得要奠基於一個巨大的精密考慮的計劃，使電力的供給遍於全國。只有這樣，才使大規模的工業成長，及農業之工業化成為可能，而不致使運輸系統作不可能的。

過度用力。俄國的計劃是從始就奠基於電氣化。這最現代的機械化的力之源泉的採用，就是俄國新工業制度的基礎，使她在最初就成了她的特質，並在一切產業中形成最現代技術的、最高度合理化的傾向。

然而俄國是直到一九二八年才以完全計劃經濟的觀念，來作實際的試驗。因為在數年以前，他們所曾積極努力的，是發展大計劃活動基礎所需的制度與技術「統制數字」的制度——就是說，先將所希望於工業、農業每部門的出產記下來，然後按時把這些估計和所得的實際結果比較的一種制度——係在一九二五年開始，那在現在成了蘇聯經濟結構的主要部分。

這種「統制」制度，確是「組織計劃」所憑依的基礎。同樣地，當新經濟政策在實行的時候，為各種形式的生產及為整個工農業的各種技術的統制組織的建立都已經成功了；俄國人能自信其執行「計劃」的主要制度已經安全建立以後，他們才發動他們的計劃。自然，自「計劃」開始以來，他們根據經驗對於這些制度有很多變更；但在計劃制度

實行以前所奠下的一般的途徑是一直支持着，沒有根本的改變。

第二節 五年計畫

全俄經濟組織的最高機關是勞動國防會議 (Council of Labour and Defence)，它已向蘇維埃大會 (Soviet Congress) 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在最初，勞動國防會議主要是一個關於防禦對蘇維埃制度的外來侵略的軍事團體，把必要的關於自衛的經濟事務附屬於它。內戰一終了，全國經濟生活的統制就成了它的主要任務，它被保存為關於工商農及為社會服務的糧食等特殊組織所屬的最後同列代理機關。實際上，它是一個在蘇維埃經濟生活各主要場合中的統制權威代表機關，就在政府本身的經濟生活也非例外。但是，它不管詳細的辦法，只是主要的定下政策的廣泛路線，只是解決各種困難與論爭——這是指着也許會發生於各種直接負責管理責任的代理機關之間的論爭。

勞動國防會議是創設於一九二〇年，當作走向計劃經濟制度的第一步。它是人民委

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即蘇聯的「內閣」——中的一個委員會的形式。事實上俄國「內閣」是像一個經濟團體似的，所以它自己沒有行政的機關。它發出命令；而這些命令的執行就是一切行政代理機關的任務。直接在它底下的就是曾經在其權威下負責進行五年計劃的機關。「各司普蘭」(Gosplan)就是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State Economic Planning Commission)照俄文英譯應為 State Planning Committee 即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 係節俄文「國家」與「計劃」前三字母而成——譯者。它是由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召集經濟專家所組成的一個會議，當時是他爲了要考慮他的發展俄國工業中電氣化的計劃。國家計劃委員會與勞動國防會議的性質不同，國家計劃委員會是一個純粹專家的團體，在它下面有許多特別的門類，每一門類都從事於生產系統的特別方面，並且每門類都規劃國家經濟落在它的範圍部分的計劃。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功用是在調節這些部分計劃，並使他們歸屬於勞動國防會議。但「專家團體」性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本身沒有行政或實施的權力。她只規定計劃，至於接受、拒絕、或修改

其建議之權，則在勞動國防會議。

俄國五年計劃表

五年計劃最後一年所增加超過計劃開始前一年的預計(即一九三二—三超過一九二七—八)

計劃中增加的百分數

A	人口	一三
	工資收入的工人數	一八
	製造工業的工人數	二五
B	資本與收入	
	國家收入	一〇一
	投資於產業的總資本	二〇〇
	投資於電力廠的總資本	四三〇
	投資於鐵路的總資本	六七

投資於農業的總資本.....三五

投資於都市住宅的總資本.....四一

C
機械力

在工業中.....一四三

在鐵路中.....四〇

在農業中.....三五六

D
生產

工業的總生產.....一八一

重工業.....二五五

輕工業.....一四四

農業.....一五一

煤.....一二二

煤油(未提煉的).....八五

電.....二五三

蘇聯爲一九三二年預定的程序表

生產	爲一九三二年預定的程序	計劃中的增加超過	
		一九二七—八年	一九二八—九年
投資—百萬盧布	二一、〇〇〇	—	—
工業生產—計劃增加的百分率	三六	—	—
生產			
煤—百萬噸	九〇	一四八	—
煤油—百萬噸	三一	一六四	—
生鐵—百萬噸	九	一七三	—
鋼鐵—百萬噸	九五	一二六	—
鐵管—百萬噸	六七	—	七二
電—百萬啓羅瓦特小時	一七、〇〇〇	二三七	—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

六九二

機器—百萬盧布價值	六、八〇〇	—	三八一
曳引機—千(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從三二一起)	八二	—	—
汽車—千(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從一一起)	七三	—	—
火車頭—千	一三	—	—
貨車—千	五〇	—	—
棉織物—百萬米突	三、〇六一	—	—
鞋襪類—百萬雙	九一五	—	—
罐頭食品—百萬罐	一、〇〇〇	—	—
工資			
計劃中增加之百分數	一一	—	—
農業			
種植區—百萬公頃	一四四	—	—
新曳引機站—千	一七	—	—
貨物運輸量—百萬噸	五〇二	—	—
		二三五	—
			二九

生產費用				
計劃中減低之百分數	七			
運輸費用	一〇			

這些代表機關——勞動國防會議與國家計劃委員會——從事蘇聯經濟活動的全部包括商業、農業與工業運輸；包括整個公共財政計劃乃至較狹義的經濟事業的財政。因為在共產主義俄國狀況之下，公共的財政和業務的財政不能分開，它們是一事之兩面；並且在一個要直接組織全國的經濟生活的國家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把生產事業和預算分開。國家自己公開管理工業，她決不能自己又向國民徵稅。因此，公共的與業務的財政之傳統的區分是必要消滅的。

在勞動國防會議之下——就是在人民委員會經濟部分之下——有各種為統制國家經濟生活各部分的單獨組織。最重要的是農業、運輸、商業委員及最高經濟會議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這會議不是負經濟生活的全部責任，只是負生產工業的責

任。勞動國防會議是整個經濟活動的調節機關，而最高經濟會議只是工業生產各部門的調節機關。

俄國的托辣斯與康拜因 在最高經濟會議之下，根據五年計劃而發展得極快的俄國生產工業，大部組成若干系的康拜因（Combinations），每一系包括一特殊生產部門。這些『康拜因』實際上是蘇聯領土內全部工業的國家統制團體。它們裏面有許多較小的團體，叫做托辣斯，這些托辣斯是由更嚴格的範圍內的同生產部門的若干工廠羣聯合而成的。因此，這種結構在完全的形式中，其基礎單位是工廠，現在是在一個被委任的經理的管理之下，加以僱員所產生的各種代表會議的協助。個別工廠之上是托辣斯，托辣斯是爲了材料的共同供給及生產的分配，把若干工廠結合起來。托辣斯之上就輪到『康拜因』了。康拜因是直接對最高會議負責，實際上是構成最高經濟會議的一個部門。

但是，這種結構不是在一切產業中疊牀架屋。有些次要的工業是在區域的基礎上組織，而且僅對蘇聯地方共和國中的經濟會議分會負責。有些托辣斯不組成『康拜因』而

直接在最高經濟會議下行動。還有小規模的企業在每一個自治共和國較小的地方自治政府指導之下經營。所以，沒有嚴格劃一的結構，至對於組織上多少集中的形式，還努力使其適合產業之每個特別部門的性質與需要。雖然一切俄國工業是當作一個單純統一計劃的一部分而進行，整個體系應當傾向高度的集中化；但是，當着計劃已經發展時，一個實際的傾向，反是增加每一個組織中的小單位的自由的總量；因為努力集中管理，致使必要材料與生產工具的供給延緩；因為當着各種工廠有所要求的時候，必得經過一串管理機關的麻煩手續，於是在這些地方，就特別要增加小單位的自由的傾向。自然，俄國不會以爲她們的經濟組織體系已經達到一切圓滿的結果，也不會以爲聯合蘇聯全境生產產品的集中計劃所發生的分離傾向的困難問題，只是隨時隨地給工業組織以充分的彈性，就算完全解決了。他們是時常在各方面改變其方式與組織以期達到這個結果。

計劃後面的理想 五年計劃，乃至第二五年計劃都不能算是一個工業生產的完全均衡的計劃。這是一個變格的辦法，與其說要打算在均衡的比例中充分供給公眾的需

要，無寧說是爲俄國工業的前途奠定正確的基礎。一心一意注集於未來的共產黨，它是在五年計劃之下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從事生產量的擴張。但是他們的資源是有限的，無論從材料方面說，或就熟練工人與技師的供給說，都是有限的，因此，他們能生產的東西就受了很嚴格的限制。假若他們要建築更多的工廠，或增加機器、火車頭、鋼軌及其他主要的貨物，他們只能把那些限於消費用的東西少生產一些。他們越是能建築更多的工廠，越是能够改善運輸組織，則他們在將來便能更快的提高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不過他們要做到這點，只好在現在少生產一些完成品，即其所生產的完成品，要較其只顧現在不計及將來所能生產的爲少。因此，五年計劃的基本理想，是要迅速擴張製造生產財的重工業，及爲重工業生產原料的自然工業，而比較不迅速發展那些爲購買者直接需要而存在的輕工業。共產黨誠然知道提高俄國人民生活標準的工作至爲必須；在實際消費上已有很大的增加，俄國工農大眾的生活水準，不僅提高到經濟破產那些年度的很低的水準以上，而且提高到戰前的標準以上。但是他們對於生活標準的提高，沒有提到他們可以提到的那樣高，因

爲他們還有更大的理想，在爲計劃達到結果以後作更高的生活標準的準備。第二五年計劃仍是在很大的限度內集中於重工業；但第一次計劃之成功已使第二期對於直接生活標準提高之增加成爲可能。

這是無疑的事實，這種以人民直接福利置於次位，而以目光注視於將來，以建築大規模的工業主義的政策，只有在獨裁之下，與不受公意壓迫的制度之下的國土裏才是可能的。俄國在以下的意義是獨裁的：其制度的控制權，不是在西歐的所謂民主的手裏，也不是在外面的民意機關手裏（這些民意機關，可舉一般輿情指摘政府的報紙爲例），而是在極高紀律之下的男女們的組織的手裏，這些男女們是爲一極遠的目標所鼓舞，他們在爲着這極遠的目標做準備工作，而以眼前的福利看作次要。共產黨有兩百萬的代表份子，都是俄國青年份子中的最活動最有力者，他們僅僅在一個條件之下完全支配這情勢，這條件是其黨員們所熟知的，就是不要大過於強制農民大眾的忍耐力。若共產黨領袖們能無條件的獨斷獨行的話，或者會想更激烈的按下直接消費，使新經濟秩序更臻於穩固；而他

們在這方向走得太遠的，都不得不退回去。但是，這是他們心願的事，自然他們知道增加重工業的生產力的最後也無非是以增加消費者的貨品的出產，及提高生活標準為惟一目的；因為他們要建立的經濟制度不是為產生利潤，而是為人類生產消費的貨品的。在直接消費者的要求與為將來之生產力膨脹之間去衡量輕重，那曾是那些負第一第二次五年計劃責任者們的最困難的任務。

人口的增加 俄國人口的激增，殆為一逼着蘇俄的計劃主持者們不得不增加消費者貨物出品預算的重要動因。不管生育節制是怎樣的流行與自由許可——不過事實上祇是小部分人民——而俄國人口近年以來反而飛躍的增加。這增加不獨不會絲毫引起共產主義領袖們心裏的恐慌，且還是他們所大為歡迎的。俄國是一個廣大的而且大部分未發展的國家，她極富有各種不同的經濟資源，其近來人口的密度，遠較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為稀少。共產主義的領袖們說，在俄國很有地方足供人民數目的大量增加；實在的，如果在俄國指揮之下，從大規模生產的經濟及雄厚的資源取得極充分的利益的話，這樣的

膨脹是必需的。每一個俄國人生下來就是一個準備着的生產者，他的服務，是在爲了對提高俄國生活標準的貢獻的意義上而受僱。共產主義不怕不能給那些新國民找到職業；因爲在俄國領土內，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他們有一切資源，足以爲他們可想見的可能的最多的人口，發展高度自給自足的均衡工業制度。真的，他們現在以最大的努力，用合理化及從工廠中排除過多的勞動的方法，去降低工業生產的消耗。俄國工人以西方的標準比起來，效率仍是不高；即使在工業高度機械化的地方，按人計算工業出品仍是很低。共產主義者們說，這現象必得停止的，產品的標準必得很快的提高，剩餘的工人必得排出；但爲了這些手段而排除的工人，他們能在別處再僱用，及爲達到了工作年齡的新國民找尋職業，關於這類事情，他們對於他們的能力是有充分的信心的。還有進者，當着生產增加效率增進時，他們可以減低工作時間，增加休假日，於是可以把一切能作工的工人都吸進工業裏面來。因爲俄國不是在與俄國以外的世界競爭的情形之下去生產；並且對於工廠對於工人都無失業的必要，因爲無論在任何時候，讓人們遊惰不會比使人們工作更有利於當作僱主。

的蘇維埃聯邦。

共產主義者的這種樂天心理，他們對於俄國經濟制度的膨脹的容受力的信心，他們的超然於支配資本主義國家勞資雙方的恐慌之外的自由，那在大體上算是這個大策動力的祕訣，這策動力就是最近這幾年中所表現的。相信自己是成功祕訣的一半——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困難的主要部分是由於信心的缺乏，無論是資本案或工人，對於現行經濟制的安定與價值，都感到缺乏信心。人人都承認俄國工人在五年計劃之下確曾作驚人之努力。往往有人說，這種努力的長期忍耐，是「反對人類天性」，但世界的歷史所供給的許多忍耐努力的例子，都是基於穩固與忠實的信心——共產主義在俄國那些高擡機要地位的人看來，在那些要從事較低工作的大部分看來，實不僅是智慧的主義，而是一個信念。

俄國在五年計劃之下的工業上的驚人進步，特別其主要努力所集中的重工業方面的進步，就是那些攻擊蘇俄制度最力的人們也是不能否認的。根據官方的數字，在蘇聯領土內，別於農業的工業總出產量，在一九三〇多於一九一三年約百分之八十，並且到一九

三一年大有兩倍戰前產品之望。與五年計劃開始以前的極低的水平對照起來，這進步是更加顯然。在一九二三與一九二九之間，礦的出品增加到百分之一五四，重工業的出品，增加到百分之四八〇，即在輕工業也增到百分之二五九；同時每個工人每天產品之增加，在一九二四與一九二九之間，增至百分之六三。在同一個時期，貨幣工資漲至百分之七十；工業中的生活標準在一九二九年估計約高於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三十，比之一九二四之最低標準自然更高得多。這些在工業中的進步，是遠大於別的國家的任何成就；並且最有意義的，是在前三年中這種進步還繼續着，而世界其餘部分，却因為恐慌的結果，致其工業生產大大減縮。

第二節 農業的社會化

自從五年計劃開始以來，蘇俄經濟上最大的變化是在農業上急速地使農民耕種制度轉變為一個以集體工作為基礎的大規模組織。我們知道，俄國最大部分的人口仍是從

專於農業的經營，直到過去兩年，農業生產的大部分，仍是由農民在個人所有的土地上從事小規模的耕種。但在一九三〇年農業社會化的大運動開始了；根據最近的數字，一九三二年農業產品之將在集體制度的各種形式下生產者不下四分之三。在共產主義者看來，這種變遷之特殊重要性並不僅在農業產品的總數之激增，而最重要的是農民們態度的改變，這種變遷，他們是期望實現於集體生活與大規模機械生產的環境之下，爲了要了解共產黨們所從事俄國鄉村方面的整個轉變的任務性質起見，我們必得要了解他們正努力於轉移的制度，和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共產主義農業政策的繼續的各種形態。

假若共產革命開始就與廣大的農民羣衆爲敵，共產革命的新政權，決不會成功的建立起來，這是一般所承認的事實。俄國的農民雖是散居在俄國的廣大的土地上，無論在任何組織的意義上沒有凝結力，既不能爲自己建立一個政府起來，也不能指揮——除了在純消極的意義——任何俄國國民政府所採用的政策，但是他們若在反對方面聯合起來了，他們却有力量推翻任何與他們敵對的政府。因此，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後，最主要的就

是無論如何要把持住大部分的農民羣衆；他們從事於這個工作的必要手段，是把握在他們手中的。只要他們把土地給與農民，他們當然可以確知農民大眾會表示決心反對任何反革命的企圖，因為這些反革命的企圖，是會以喪失土地威脅着他們，並以重課他們所已逃脫了的義務威脅着他們的。

但是，在任何絕對的意義上，給農民以土地是和共產政策與主義相反的；這曾經是共產領袖間的原則爭論焦點：私有的農民制度，根本是保守的和反社會主義的。最後他們所決定要走的路，是在絕對的土地所有權中把農民錮禁起來，和農民們曾經被法國及歐洲的其他國家所錮禁一樣。因為這是很明顯的，在大部分的歐洲，農民成爲社會主義勝利的最大障礙；除此以外，共產主義者認定，農業經濟在俄國生活的一個長時期中，是極其重要，對於推進農業經濟所持的態度，將很高度的決定整個蘇維埃制度的經濟性質。因此，共產黨以爲對於在初期讓農民在小規模生產與所有權之下得遂其絕對管理之願望，那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農民取得土地 這是很明白的，若要革命不一起塌台的話，當時的農民，無論如何是必得享有土地的。在蘇聯全部土地國有化之後，立刻就作這個決定。公有的原則是宣布了而保留到將來應用；但實際上，不但允許農民保有既有的土地，並且在一個較大的限度內允許他們取得及劃分較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產。剛在革命後的那個時期，大地產主要的是分配給農民管理；只有一較小的區域是繼續由國家保有，用以造成大規模國家農場的经验的基础。

此後，土地的重分配，仍繼續進行於農民的墾殖與管理的基礎之上。在每一個農村中，都給以重新分配土地的命令，便把土地從那些有過多土地供自己享用的人們那裏取出來，分給那些較窮苦的農民及無土地的工人，務使他們都能按着俄國鄉村生活的極低標準，獲得充分的土地。這種重分配的手續，是決不能做得很完全的；但在革命以後幾年中，這已經推行到相當可觀的限度。在『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時期，無論在城市方面，或在鄉村的大饑饉區方面，糧食供給是一個極緊急的問題；而農民輸送糧食及別

的產物到城市去，又是極不樂意的事，因為那時既沒有可供交換的工業製品，又沒有農民們可用以保藏的任何有信用的貨幣。因此，爲了要取得穀物及其他農產物的供給，共產黨只好逼着去訴之於強逼徵發（compulsory requisition）。農民們的產品，除了必要作自己的供給及作種子之用以外，一切剩餘部分都爲政府的官吏們所徵發。對於這些供給的報酬，實際只是予以紙幣，而此紙幣當工業貨品缺乏時，其價值又是很小的。農民們很強烈的抵抗穀物的徵收；在國內的許多區域，且有嚴重的農民反叛，有些區域內的農民，甚且有參加「白」軍的傾向——因爲當時內戰是還沒有終了。

農民反叛的威嚇，爲共產黨迫而變換採行「新經濟政策」之一重要動因。同時，在城市方面既允許恢復貿易私營，於是乃廢除徵發穀物政策，而代之以向農民徵稅的制度。農民要對中央及地方的政府納稅——這些稅後來固定爲一種單一稅制——但從此以後，他們得在「新經濟政策」之下，以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條件出賣他們的剩餘。這種辦法會給農民以增加其產品的最大的引誘；無論在增加墾殖的區域上，或在停止農民因畏拘

捕而作不法的窖藏，野蠻的放恣的破壞上，都有莫大的效果。

農村中的階級戰 在一個時期，共產黨似乎決定了採用農民制度，似乎他們自己

已經願意讓農業進行於小規模個人農莊的基礎之上。我們講過，他們的這種政策，很引起了國外一般的誤會，就在俄國，也被托洛斯基（Trotsky）及其黨徒所高聲指摘，他們覺得這種對農民的讓步，是顛覆共產制度的基礎。但是俄國領袖們讓步的意思，只是暫時的；並且即使對農民制度已經讓步到充分的限度，他們仍採取有效步驟，以制止小規模種植者全體集結傾向的發展。對於這種任務的達成，大部分是憑着鼓勵農村生活中階級敵意的發展，同時組織農民的較貧困者以反對那些經濟狀況較好的，特別反對那些從事於私營貿易而擁有相當資產的人。「庫拉克」（Kulaki 即富農）特別與「貝得惹克」（Bedniaki 即貧農）形成顯然的分離；當着「新經濟政策」繼續存在着，繼續與富農妥協的時候，富農們被剝奪了一切政治的特權，並由鄉村蘇維埃及地方政府組織加以多方的干涉，甚至共產黨影響之下在貧農間組織一種社會裁判來處理他們。富農被允許貿易；但他們

繼續被視爲一種障礙物，以各種可能的努力阻止他們在農村生活中得到任何優勢，以便一到了適當的時機，就可以把這障礙移開。

當着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共產黨領袖們還沒有準備停當離開富農，及認真開始農業社會化的任務。在計劃的初期，他們要用全力於大規模工業發展的鼓勵；而他們所最關懷的是從鄉村中得到充分的食糧的供給，一面供給城市逐漸加多的居民，一面準備以剩餘出口去購買不可缺的工業入口貨。俄國不到她覺得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已經操了勝算，及農產品的供給已經充足以消滅其對於城市生活的威脅，農民制度還是不改變的；但在一九三〇年莫斯科的領袖們是持着很堅定的態度。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進展得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迅速；而農業產品亦可恢復很可觀的規模的出口。他們想，他們久已懷抱的農民生活社會化的理想已到實行的時機了；動人的無情的試驗開始了，這種無情是共產黨前進的每一個階段的界標。他們發出命令，要以極廣大的生產與生活的可能的集體方式代替個人農民制度；地方政府受到命令，以極快的速度執行這種轉變。同時富農階級

的清算很快的起來了。富農被拒絕參加新的集體農場，這些集體農場是農村的保有者們所結合的。富農們的土地與積蓄都要充公；他們被驅逐出農村以外，或者遷徙到很遠的區域（例如西比利亞），或者送到木棚裏或別的公共企業方面去當工人。

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 我們現在有了解新俄制度下之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之區別的必要。我們講過，在革命以後，大部分的土地雖歸農民所有，小部分的從前的大地產，却仍保留在國家管理之下，此後乃以大規模的國家農場的方法耕作。這些大的國家農場，是盡量用來對農民示威，即使用機械與工業化農耕的大規模方式所獲得的生產利益，的模範的力量，來對他們示威。但是，除了農民所取得的土地及為國家所保留的土地以外，在俄國還有極廣大的未墾殖的荒地，在這些荒地上，國家逐年在農業部的指導之下開墾出了大量的土地。這些國家的「穀物工廠」(grain factories)——他們這樣稱呼——被優先的供給以農業機械，而且在現在世界任何地方沒有更比它還機械化的農莊制度下工作；這種區域一季更比一季推廣，以致大有助於國家大量剩餘穀物的輸出。但是，就全部

農業生產而論，國家農場生產究竟只占一極小的部分；因為大部分的土地仍保留在農民手裏，在個人的制度下耕作。因此，這裏的問題就是要——與國家農場在從前未墾殖區上逐漸發展的問題相聯——預備在已被農民占有的極廣大的區域內作農耕方式的社會化運動。

使用在這個目標上面的工具，是「集體農場」(collective farm)，集體農場實際有過若干不同的形式與階段。在最初的階段，那些組成集體農場的農民的土地，是為耕種的目的來合股的，以後就進而成為集體的制度；但每一個農民仍擁有他的私有權，並管理他自己的牲畜以及其他的副生產物。若在比較發展的集體農場，其資財與土地一樣的社會化了；其生產的全部事業的利益皆由整個團體所共營共有。這個形式通常叫做「亞特爾」(Artel)。在集體農場的第二種最發展的形式中，生活與生產的方式，同樣社會化了；團體中所有的農民，公共在新建築中居住和工作，新建築是集體組織計劃的一部分。自然，實際上還有各種不同的集體組織的中間形式；但現在蘇俄新集體農場的主要部分還是

近似這三種模型中的第二種。

蘇俄在廣大的區域內，突然採用集體農場制度，這使世界感到震駭的程度，實比較對於其以前的任何共產政策的發展爲尤甚。在外國很多人是這樣看：這種強迫數千萬農耕者轉變其生活的企圖，一定要產生一個革命，結果是會把共產政權推翻。他們預言農民們定會繼續罷耕，並拒絕在新制度下生產，在鄉村中主辦這類農場的那些蘇維埃的執行人，定會橫遭慘殺，並且飢荒必會很快的威脅俄國轉而承認農民經濟。但事實並非如此。反富農運動倒實在引起了農民對牲畜的大批的慘殺，因爲他們希望沒收他們的財產；這，很使蘇俄的肉食的供給問題發生困難。而農民的反抗力，實際上已被前此採用到鄉村的分離政策完全破壞了；各地都不曾發生過反社會化的農民暴動。從全體說來，農民中的青年份子，似乎已經普遍受了蘇維埃教育方法的影響，而在那些較老的農民之間，無疑還是很不普遍的。

舊俄農業制度

此外，我們還得認識一點，就是外國對於俄國農業社會化的變更

的真正性質，是很容易誤會的，她們大概都以為俄國的農場，也像英美一樣的小規模。其實這是很不相同的。第一，在舊制度下的俄國農民，不是住在他們的田莊裏。他們住在村莊裏面，每一個農民要走到鄰近的土地上去耕他自己的田。這些田地，即或是一直爲單個農民所有，往往分成了若干塊，散佈在村區內的各不同的部分——好像在英國十八世紀前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以前所常見的情形一樣。有些地方，即使土地是有時重新劃分了，但沒有永久的租地。俄國農業實在永遠沒有脫却中世紀耕種方式，這種方式含有公社制度的很大的成分。這種從農民制度到集體化的大轉變，和英國、美國或加拿大，乃至於法國或德國，或在任何歐洲先進國家的將來的轉變，簡直極少相同點。農民社會化之後像從前一樣繼續在村莊裏居住，雖然在已有的茅屋之外加增了屬於整個集體農場的新建築。他們繼續的從村莊裏到外面去工作；不過他們不再在他自己的孤立的田土上耕作，而是一大羣人在公共的土地上耕作而已。所以，這種從舊制度到新制度的轉變，在俄國的那些區域內較之較發展的農業區爲容易。因爲俄國的過去農業方式是最原始的而且有

大部分停留在公社組織中，而較發展的區域，墾殖的標準較高，並且更個人主義化，富農在農民人口中也成了較大的成分。但是，在別的國土內，這些更發展的區域內對於富農的沒收，却會給貧農採用集體制度以更大的物質的引誘。

就因此故，俄國的集體化乃逐漸前進，簡直沒有遇到何等反抗。即令有少許的反抗，其程度則因區域不同而極異；而且地方共產領袖對於新制度的實現，往往不免因操之過激，致引起鄉村生產生活的嚴重紛擾。因此，在一九三一年春，爲要安定那些已經適用了新制度的區域，使其鬆一口氣，於是漸漸有弛緩一下集體化的步驟之必要。但這顯然是暫時的。因爲俄國的整個意向，是要在可能迅速範圍內，使國家農場及集體農場下的整個農業區採用大國家「穀物工廠」生產特質的大規模機械化方法。這事體實現的迅速程度，大抵要看農業機械產額增加的迅速程度如何。因此，俄國乃忙於在史太林格勒（Stalingrad）和烏克蘭（Ukraine）擴張新曳引機製造工廠，以便儘快地用機械設備集體農場，一方面可以增加農業產品，一面教育農民把採用工業主義化的態度適用到生活上。

無疑的，俄國農業的集體化，終久要減少現在耕種區域內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按照別的國家的標準，或按照在俄國本身所已有之國家農場來說，新的集體農場的勞動，是有嚴重的超過的傾向的；因為它們實際上包括全部農民，這種農民從前是在一種效率極低、勞動浪費的制度下從事工作的。現在，共產黨還允許這種超過的傾向繼續下去；不過他們的意向，是要廓清剩餘勞動，而把他們轉移去擴張城市工業及開闢新的土地，這些新土地可作耕種之用的量是無限的。因此，國家準備作集體農場用的地域，以後幾年當然有很大的增加。

俄國農業之將來 自新計劃經濟開始以來，俄國農業生產的增加，自然遠不及工業生產；因為共產黨最大的努力，一直到現在還是集中在工業上面，並且他們承認農業的工業化，是更遠大的任務，那比計劃中的工業部分，要費更長久的時間。但就俄國所已有的成就看來，似乎俄國將來糧食生產上的很大的擴張，那是毫無疑問的事。這種糧食擴增的大部分，無疑會用以提高國內的生活標準；他們開始以注意增加穀類大量生產一樣的注

意增加肉類、蔬菜以及其他食品的生產，那特別含有抬高生活水準的目的。特俄國雖然會以其大量的農產品消費於本國，但是在世界穀物貿易中，她還得占一個重要的原素。俄國在戰前是歐洲的倉庫，她長期由歐洲穀物市場脫退出來，那並不是他所樂意的事。因為她在長期間內還需要大量工業品的輸入；她一時還沒有成爲製造品輸出者的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她的最主要的出口貨還只是煤油木材——在她的廣漠的森林中有無限的蘊藏——以及穀類。不錯，她的穀物出口的前途，從價格的條件上看來，是極其不利的；因爲俄國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之失去其海外穀物市場，那是別的地域，——特別是加拿大和阿根廷——大擴張小麥生產的主因之一；在現在小麥剩餘的情形之下，俄國穀物在世界市場上，遂只能賣得很低的價格。這一來，她用穀物去換取工業品的數量，就頗受了限制，這足以阻礙她自己的生產，同時亦阻礙別的國家的私人生產。這件事給她的領袖以正面的刺激，使作更大的努力，以期能輸出更多的穀物，以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工業品。這是所謂俄國「傾銷」(Russian "dumping")的真正解釋，傾銷對於其他產穀的主要國家是不利，而在俄國

則是無法避免的。

穀物的低價，促使俄國盡力去增加其他貨物的出口，特別是增加其木材及煤油的出口。她的煤油資源仍有大部分沒有開發，在全世界是無與匹敵的。煤油工業，無論在出口上說，或者在擴張本國生產的燃料上說，的確發展得很快。俄國還在設法大大擴張其木材出口市場，其結果，致使其壓迫的芬蘭、瑞典以及其他區域的木材出產者，都趕快組織對俄國產品的抵貨運動，以期阻止俄國木材營的恐怖。但這樣一種抵貨運動是不能取勝的。因為俄國是必得為買而賣的；因此，她打算把她的木材出賣於外國，而取得其所要的外國物品；那些木材營幕中的兇險故事，將不會長期引誘世界其餘的部分，爲了瑞典與芬蘭的輸出者的利益，而放棄其可由俄國得到的低廉的供給。

第四節 運輸問題

從前面兩節所敘述的看來，五年計劃之成功，無疑是關於農業與生產工業兩方面的。

這不是說，這個成功是完全的，也不是說這成功達到了計劃策動者的最高希望。但，這的確是卓異而且震驚了全世界的事；因為俄國已經被一般人認為是僅以堅苦與系統的勞動的紀律來變更「人性」，尤其是缺乏組織的容受力這一點，早被一般視為是必使五年計劃在初期就得解體的缺陷。當然，按照西方的標準，俄國勞動仍然是很缺乏效率，且只有低小的生產容受力，而五年計劃的現有的成就，若無大批外國專家——技師、電機師、企業組織者等等之幫助，也就不能達到。戰前俄國工業主義之技術發展中的德國人的位置，大部分是由美國人來代替；俄國人能不要外國人幫助，而能自己進行的話，那是言之過早的。

但我們必得牢記一點，俄國共產黨中包括了許多份子，這些份子在外國特別在美國，有過大規模工業的經驗，他們在革命後轉回俄國；同時現在蘇俄還在以緊張的努力，在蘇維埃各教育學院中，訓練俄國的專家。這種訓練，在目前因為太過於匆忙，所以難免缺乏精通；但是當着專家的供給到很充分的時候，俄國必能更自由的專致其注意力於質的增進以及訓練時期的延長；而且，俄國直到現在的安全，正表示共產主義的堅決信心影響之

下的俄國人的特性，是足夠適應新的制度。這不但可適用於專家和管理者，且可適用於技術的手工人。共產黨的「突擊隊」，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根據五年計劃，站在發展工業的前線，是具有適應新的技術與工業能力的先鋒，他們對於個人的收入的期望要求很少，而對於社會服務貢獻要求很大。大家常常這樣揣想，在這種服務的理想後面的熱情是會很快的消失，而舊俄的特質會重新出現；有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的確會遭遇這樣的事情呢？十九世紀的後半期的德國，從半世紀以前的德國獲得一種很不同的民族性；丹麥人也獲得了程度相等的同樣民族性。俄國無疑的是企圖把國民性轉移得比她從前所曾轉移過的更快更激烈，但他們的觀點——一世紀以前英國奧文（Robert Owen）所講述的——以為國民性依於環境，但在環境中作無限度的適變，不是對的嗎？美國以及德國與丹麥的佐證似乎很給這個觀點以堅強的支持。

但是，在五年計劃下的俄國的人類大成就雖超絕前古，其工業生產或農業生產上雖都有驚異的復興與發展，但在俄國經濟制度中，仍然有一個很弱的關鍵存留着。俄國的運

輸工業，仍然很不够在五年計劃進程中適應大量貨品的繼續增加。俄國在鐵路事業的發展上，老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她的一大部分地域，是在她鐵路系統所能達到的範圍以外，她的鐵路系統的支線，很不够培養主線。水道運輸也給鐵路運輸若干幫助；但這仍不能適應於大部分的鄉村，有些地方不能整年適用。共產黨所承襲來的運輸系統，完全給戰時過度的使用與軍事的必要以及後來內戰的破壞所擾亂了。從前鐵路材料曾經大量的輸入俄國；嗣後供給停止了。要去重修鐵軌或將損壞了的車頭或車廂重新使用，那是不可能的事。在共產黨開始他們的建設很久以後，鐵路的效率，還是繼續減小；鐵路制度的改組，還遠不足以供新生產組織的需要。因為要建設起一個效率很高的鐵路系統，那是一件驚人的艱鉅工作。對於既有路線的改造與修理是必要的；但爲了那些迅速的工業化了的新開區而增加新線也是很急切的要求。著名的「土耳其西比」(Turksib)線，就是爲了迅速發展的工業區的便利而創設新鐵路的這種企圖的顯著的例子。五年計劃對於鐵路的改造及擴張的浩大消費，有了準備；但這種準備，就貨物擴張所需鐵路的運輸的比率說來，還是顯

嫌不夠的。因此，第二次五年計劃乃包含了認真解決運輸問題和用足夠供給其迅速發展工業化的需要的鐵路系統，去建設俄國的企圖。她已經解決了鐵軌供給問題；但車廂之供給是遠難於鐵軌的供給，並且她對於任何大規模的道路運輸之發展，就到現在，也還只算是剛剛開始。曳引機與農業機器的供給，已經開始趕上因農業集體化所引起的廣大要求，運輸便利之擴張，將成爲俄國土木工程與其同類事業的主要任務。

第五節 結論

其他國家對於俄國試驗所下的判斷，不可避免地要大大蒙受政治思想的影響，這些政治思想，不但影響其由陳述事實而得出的判斷，且影響事實的陳述與記載的本身。不管在最近幾年來觀光俄國的外國遊客的增加，以及這些遊客所寫的書籍的增加，但要得到俄國制度的真確事實，仍然是很困難的事。這原因，由於俄國政府的審慎掩藏者少，而由於俄國制度的異常與新鮮，致使外國觀察者非常難於知道應當看什麼，以及怎樣去了解

他所看的關係居多。有些人去到俄國時，心裏總懷着他自己國內的完全不同的經濟系統；他去尋求那些可與自己所知道的來比較的東西，因此他就容易陷於他所習知的制度中所產生的比較標準。或者正相反，他是以反對他自己國內經濟制度之意念而去俄國，去各種異點中尋求一種較好的異點。即使是如此，在這樣短的一個遊歷期間，也很難了解俄國經濟機構的基礎建築；沒有這種了解，要正確領略其各部分的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事。統計數字差不多可以應用來證明任何事件，這是人所共知的，無論如何，這對於那些人，即不知道那些數字所根據的客觀現象的人，是可以滿意的。因此，在別國的關於俄國的寫作者覺得依據他們的先入之見及標準去解釋他們之所見於俄國者，或是去尋求和他所希望尋求相差不多的東西，照例不感到什麼困難。

在很多國家內，有俄國流亡者的團體，他們是受了對蘇維埃的感情的憎惡的驅使，他們要使全世界的眼睛不信任蘇維埃制度，因此使搜集事實的困難更其增加。一大部分在報紙上關於俄國的消息是間接直接來自這些流亡者之手，他們所供給的材料都是對於

進行中的事實加以完全曲解的色彩。在別一方面，從共產黨來源的材料，既不爲報紙所接受，亦不爲對共產主義有政治敵意的公意所接受。因此正面的敘述，反面的敘述，交飛於那些渴望獲得真理者之前，而使之迷惑；即使閱讀很多關於俄國的書，從各種觀點來寫的書，但仍然是容易使他增加迷惑，不容易使他得到真正的啓示。

却是，在這些矛盾的事實敘述中，似乎有一種一致的衡量在產生中，無論從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就是俄國制度已使其政權穩定，不再有真正的坍台，雖然她也許會遇着災荒、戰爭，或暫時很利害的遭逢經濟封鎖的挫折。但在俄國共產主義的安定是好是壞，這是不能希望有一致的意見的；對於那些在俄國以外的國家，希望資本主義再造者，這種經濟組織完全不同的制度之勝利是非常不受歡迎的，自然，這是因爲這種勝利，足使資本主義國內加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並暗示一般人以不要相信資本主義的再造，而相信資本主義的替身，才真是對於世界要尋求逃出現經濟恐慌的道路的正確路線。資本家也許會承認與俄國接近的必要，是漸次成爲事實了；但我們不能希望資本家不以俄國共產黨爲

其所欲保存的制度的一種威脅。因為我們知道，俄國分明是以俄國革命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序中，這革命要推廣到一切國家，從西方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到廣大的農民文化的中國與印度，她這種理想，是決不會放棄的。

社會主義者對俄國共產主義的態度 在別一方面，在那些對資本主義制度懷敵意的人，也並不是對俄國制度一致歡迎的。因為社會主義所從長育出來的，是西方的國家，那些國家的環境是遠異於沙俄的環境。在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差不多都可公開組織政黨，表示自己的意見，在各種國家議會中取得少數的代表。在近年來迫害更漸次減少；在好些國家中，社會主義的政府的確取得了政治機關——即使不能算是取得了實際政權的話。西方社會主義在這種環境之下，作煽動的工作，大半都成爲改良運動；因爲要取得政治代表，就必得向選舉者示以直接利益。革命的前途，在大多數西方的國家從非直接的——無論如何，當着西方的各種社會主義運動成長起來，並獲得其明顯的性質的時候，不是直接的。加之，在許多西方國家中，社會主義是在職工組合制度的基礎上成長起來，那些職工

組合，早已爲許多直接問題所先行占據，如工資、工作時間、失業的準備，以及其他社會與工業改良的手段等等，在他們，這些直接問題，比較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澈底改造社會的問題重要。就因此故，社會主義的政黨，實際上都是直接努力在現存制度的結構中去作社會改良運動，而把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置之次位；至社會主義本身的實現，亦被他們視爲不是像一九一七年之見於俄國者那樣，由一經濟制度突然轉變到別一經濟制度；而是社會改良運動的擴張，從工業與公務的一一逐漸國有化以達到她的建設階段。但這種社會主義的概念，是爲共產主義者所咒詛的，共產主義者尊崇馬克斯的主張，認定社會主義必得是政治經濟制度上的純粹突然的與革命的轉變。他們不相信，現存的資本主義國家會漸次由社會主義勢力取得支配地位。他們以爲：以此爲社會主義政策執行的工具，那是太滲入了資本主義的理想。他們相信（如馬克斯所相信的一樣），資產階級國家決不會逐漸轉移其政權於社會主義勢力，要達成此種目的，必得以革命的意識行動，予資本主義制度以摧毀，然後再使新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建立於其廢墟之上。他們堅決相信以現存國家爲

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結果一定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使採用此政策之政黨，從社會主義的目的，轉到改良主義。這種改良主義，必會把那些政黨穩穩的籠入於資本主義的意識與結構之中。此外，他們並指出執政的社會主義政府的實錄，及一九一八以來德國社會主義所採用的那種與資本主義政府合作的政策，以作為這陰暗的預言的充分的證明。

在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方面，他們是以複雜的感情望着俄國共產黨的勝利。他們多半是民主議會制度的辯護者和保衛者，他們堅信議會民主的工具，以為到了羣衆爲了合法的宣傳而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支持者的時候，這工具可用來達到社會主義。議會民主制深入了他們的骨髓，而成爲他們國家的承襲的傳統的一部分。他們不像俄國一樣，撇開政府行動的任何關係，撇開法的任何影響；而他們改良社會及提高工人階級生活標準上的成功，很能够鼓勵他們相信；這工具對於較小的目標既是如此便利，當然可用以達成更野心的企圖。在他們的國中，許多團體已經走向共產主義之路，反對改良主義者政策之無能，這，給他們以威脅；並且他們很容易看出，俄國共產主義之成功，會加強他們本國的共產主

義力量，其結果必使其盡畢生之力所樹立的政黨，有受威脅以至於分裂的危險。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相信社會主義；他們很深的受着這在世界所僅見的社會主義組織的大規模試驗所吸引。這兩個觀點把他們向兩面拉，有些人走向這面，有些人走向那面，有些人儘可能的避免決然走向那一方面。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較之大陸諸黨更少與共產主義接觸些，在國內也很少共產黨與之競爭，所以還保持着最開明的心理，也很少發展反共產主義狂的傾向。德國不同，德國因為當着他們自己內部的大困難，所以在許多的場合，都是強烈地反共。在最近粉亂的幾年中，德國社會民主黨最有力的領袖們似乎都以爲他們第一的任務，就是保存新德意志共和國，反對暴君主義的反動，並避免德國陷於內戰的分裂，和經濟政治的完全瓦解。爲了這原因，他們於是集合自己以及代表德國資產階級的中間黨，把他們的社會主義目的去遷就當前的政治危難，甚至默許那些爲他們以前所拚命反對的事體。這樣的執行政策，自然不可避免的要加強德國共產黨的力量，因爲德國社會民主黨，要從事於共和國之防衛，與實行凡爾賽和約之條件，自然無法保障德國工人的生活標準，德

國工人的生活標準，是已經爲了避免德國賴債而一再壓低了的。正統的德國社會主義的地位，是介在兩個強敵中間——一面是共產主義，另一面是希特勒主義。在這樣的環境中，德國社會主義者中間的反共產情緒非常強烈，甚至對於俄國努力樹立社會主義政權的本能的同情，亦都消失於德國共產黨政策所引起來的恐怖中。

在這種狀況下，世界社會主義就在其對俄的態度上表示了分歧與猶豫。西歐的社會主義者，受了流亡的社會革命孟塞維克諸黨之俄國社會主義者意見的影響，在一個很久的時期，都易於相信共產統治是迫切在崩潰中。後來，他們不得不改變意見，轉而承認俄國共產主義在歐洲政治制度中即使不是惟一的最穩定的，至少是最穩定中的一個。但是承認俄國制度已經到了站得住腳的這種認識的影響，還不够改變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政策與態度，這在最後儘管是必須要實現的，但現在還不是時候。歐洲社會民主黨或將特別注意俄國的地位及其試驗的教訓，以便修正它的理想與程序，不然，也許在歐洲國家中，會使共產主義成長起來，致社會主義勢力於致命的崩裂。西歐的共產主義在現在沒有希望

變成一個能够奪取政權，够建立一個共產制度的力量；但它也許很够成爲一個阻礙力，使社會主義諸政黨不能取得政權。

因此，無論是西歐及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也好，抑是資本家也好，對於地球上大部分地域的共產主義的安全建立，及其必然很快的在經濟意義上增大其重要性，終不能不再考慮它們的態度。在社會主義者方面的問題，是如何規畫他們的政策，較之從前他們所規畫的要更迅速的使資本主義基礎的社會轉變爲社會主義基礎；因爲這是很明顯的，在以後的若干年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域不在新基礎上改造，就會被另一個制度取而代之——若資本主義國家的命運竟不在這危機中沒落，那末，兩者都不能成功。在下一章我們將進而考察社會主義政策的最近的發展。但在這一點上，對俄國試驗的反響的考慮，我們不必把自己置身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上，而置身於資本主義的方法與態度上——換一句話說，就是置身於現在正在進行的視爲改造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的政策上。

組織經濟的教訓

俄國經濟的特殊的姿容，在資本主義世界看來，是有組織的計

劃——從國家全經濟生活的一個單純的中心發號施令，以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負責任，中央政府掌握着國家生產資源的極大部分，且擁有隨意指揮資本積蓄用之於任何生產企業方面的特權。若在資本主義國家，其每種產業或勤務所達到的發展程度，不是由於組織的中央計劃，而是假定在消費者的要求上的獨立活動所引起的自發成長。產業的興起或衰落，資本的損失或致富，都視消費者對於特種產品的要求的升降而定，自然輸出的要求和國內市場的要求都包括在內。資本主義的支持者相信：企業上的自發擴展，會自動造成平衡的經濟制度，及財富與福利的最大量生產的結果。但這個論點是基於下面的假設：第一，除了生產貨物的力量外，對於貨物的要求必須沒有限制；第二，在經濟機關的活動上，雖不免小小牴牾，而可用的生產資源，通常可充分使用於生產財富與收入。但是戰後世界的經驗表示了這些自動的調整差不多只是產生衝突，造成大規模的失業，和財政與工業機構之嚴重紊亂。由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人們的心理，乃轉而傾向於系統經濟計劃的理想，這理想，在其國家的形式上，益發適於其正在發展中的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傾向。因為

關稅似乎可以看作一種執行國家計劃的工具。一種關稅或任何一種保護的手段很明顯的可以用來刺激一種工業而阻礙別一種工業，因之，可以看爲是一種促成資本流動及僱傭機會轉變的工具。把一種審慎的工業計劃看爲是對於商業保護政策的邏輯結論和交互關係，那該是何等自然的事！

資本主義能有一個計劃嗎？但是，正當資本主義國家努力計劃其經濟生活時，在俄國意義上的一切計劃，却很快的被認爲在資本主義環境下決沒有實行的可能。在蘇俄，資本是屬於國家，而在別的國家却是私人的財產，私人可以自由去投資，乃至可以像現在這樣，簡直全不投資。國家用盡了方法，給投資者以各種誘發，譬如國家對利息或紅利予以擔保，或設各種的投資機關，使其向公衆募集債款，然後再以募得的資本再投資於國家所欲發展或重新充實的工業方面。當着現存工業與新資本仍掌握在私人手中時，要對於投資與生產活動作有效的統制，雖或許不是不可能，但是非常困難的事；而且，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若干國家計劃的形式也許能夠推行，但與俄國意義的經濟計劃比較起來，那顯然

是相差很遠，且只是表面的類似而已。而況當着計劃的時候，馬上就要引起以次的問題：即是由國家來統制資本主義，是否能造出一個系統的國家計劃，使能保存資本主義的特質，抑是使兩者都弄得一塌糊塗，——一方面推翻私有投資者及工業的私有領袖的刺激物及發動力的基礎，同時沒有在那種基礎上樹立社會主義的動力。因為資本主義這種制度，根本是靠著兩種力量——一方面是消費者要求的自由活動，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者的發動。如其這種基礎被推翻了，資本主義再也不能成爲一制度而進行工作；一個奠基於國家計劃的統制資本主義，是否能容許這兩個力量的活動充分自由，頗是疑問。在大體上，漸進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政策，就會遭受同樣的困難；因爲不完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只以社會統制的某種成分注入資本主義，其結果不外是在無法工作的妥協基礎上，樹起一個含有內在矛盾的制度。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的替身

第一節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合作制度

從前一章的起頭看來，即使除開俄國，即使除開世界人民的大部分在中國、印度以及其他未發展的國家還是在小規模農民墾殖的前資本主義環境下生活着，除開非洲以及其他地方還有千百萬人民還在更原始的方式下存在着的事實來說，資本主義決非存在於現世界上的經濟組織的唯一形式。在進步的國家本身，資本主義也從經濟組織的各種敵對諸形式遭受到繼長增高的挑戰，這所謂敵對諸形式，即各種公有以及消費者合作等等。就在資本主義本身，其顯著的特質，也並不是隨時隨地一樣。如在英國、德國、美國一類最進步國家中，大批生產與大規模組織之進展，仍不能把小規模生產者消滅。在大量生產經濟不能夠，至少是還不會順利的適用到的很多的行業中，小規模生產者還繼續保持他自

己的所有，就是退讓也是很遲緩的。按照主要諸國的繼續調查，這種小規模營業的數目，甚且還有增加的傾向；很多小規模的經營，實際上無異於諸大公司特約代理店或補助代理店，而小規模生產者，還有更多的小規模貿易者，就在最進步的國家中，在經濟上仍然占有一個重要地位。零售商自然是在小規模生產仍然很明顯的存在着的領域。近年來，聯絡公司和支店，衆多的商店，都在與合作社一樣的大量的增加；在一切進步的國家中，小規模商在總貿易額中所進行的貿易的比例，遠較小於其一代以前所占的比例。但是，小規模商的貿易經營，雖不能趕上生產的進步，其絕對貿易總量，却是增加了。最近，特別在美國，小規模貿易者爲對抗聯絡公司及分店衆多的商店，乃企圖對於購買，甚至對於供給製造品而創立自由代理店，以支持他們的地位。在這一類企圖中，有些已經成就了小商店聯合團體創立的結果，這種聯合團體，和生產者合作組織很相類似；但在其他種情形之下，那些已經參組於一自願聯絡商店運動中的小商店，實際上是在大規模批發商的統制之下，這些批發商的業務，就是對於一切聯絡份子，供給貨物。至若在別的場合，小規模商除了爲保障貿易

而外，殆沒有其他任何合作的企圖，他們有他們的集合代理店，用以收賬，用以通過商會或特殊分配部門的零賣商組合之類的機關，向政治當局表示其意見。但他們照例並沒有多少結合力與合同動作的力量；因為小規模商業主要是相互競爭，在小規模商業間之生存鬥爭，通常是很緊張的。一方面破產與失敗的例子儘管川流不息，但這並不足以阻礙源源而來的新進者；因為在比較發展的國家中，其人口有一大部分都很容易成爲小規模經營的店主。

很多小規模店主，起頭幾乎是沒有資本，全靠以信用向批發商取得貨物的供給。這種依存性，在飲料商中最多，那些公共酒家（public houses）的資金，常由大釀造公司（brewing concerns）供給；但是，這亦通行於大部分的小規模商店，並且在這種商業領域內，小店主的真正獨立性都橫被摧殘了。

小規模工業之殘存 至那些仍持有若干生產部門的小規模生產者，其普通狀況並不比小貿易經營者更佳。他們的組織力甚且較之小規模商還少；除非他們能產生一種

高度特殊形式的消費品，得支配一個自己的市場，那他們只有依賴大規模經營的統制。他們對於工業及商業政策幾乎沒有發動力與影響。他們最多只能在大規模資本主義曾經放過的世界中的角落裏或間隙中去找點生路。這普遍情形中的主要例外，只能在新的發展得很快的貿易中找得，因為在這些地方，常有機會給小商人去擁有他們自己的業務，且可獲得高度的利潤，並登上經濟之梯，向着更確定的獨立走去。車行老闆就是這一類成功的特例，他們的興盛的基礎，就在近年來汽車應用的突增；但是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很多小店主猶必得靠借貸從事經營，並且他們還是在大摩托公司的掌握中，儼然是大摩托公司的代理商一樣。

因此，在前進的國家中，小規模的生產，雖不致因大規模企業的增長而完全排除，但對於整個生產與金融制度的性質上的影響，是比較不甚重要的。到現在實在有些使其成爲更重要的若干傾向，因爲二十年來，工業技術的很快進步，益以生活標準的提高，曾引起適應日益增加的需要的新企業的增殖，這些新企業恰好是小獨立生產者的如意的獵場。但

是當這些企業成爲更標準化，並達到了易於適用大量生產方式的階段時，小規模經營者的地位，勢必要在生產及販賣的活動上，都會蒙受大公司的威脅；假使小規模的生產者與貿易者，志願獨立經營，他們仍得繼續去尋找他活動的新區域。近一百年以前，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馬克斯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描出在現代大規模資本主義與他們稱爲小資產階級（*petite bourgeoisie*）所進行的小規模生產間的一個尖銳的對照。在一八四八年間，他們就已視小資產階級爲一個正在死亡的力量；在由產業革命所導來的大規模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階級的衝突之前，小資產階級是無力的。依馬克斯與恩格斯說來，小資產階級甚且是一個與新生產力發展相敵對，且不斷希求阻礙轉變的反動羣。有時，他們和工人階級新興力量聯合來反對新資本主義；但是假使工人階級的聯盟要企圖作基礎的革命，他們就會馬上轉向而聯合大規模資本主義來幫同鎮壓。這曾見之於一八四八歐洲革命的行動中，他們起頭在革命的方面，後來却在革命的反對方面。在巴黎的社會主義的轉變卽是一例。以後，這樣的事常見到——在美國的反

托辣斯法運動中，在法國激進左派內的非社會主義政黨中，以及在英國自由黨的評議會中，都曾發現此種現象，但是如馬克斯和恩格斯所說的，它根本是一個非建設的力量，它只設法阻止事件的發生，除了想保持小規模生產者的地位，反對現代意義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雙方以外，沒有積極的政策。

新小資產階級 馬克斯與恩格斯在人們心中正充滿了產業革命與新工廠制度之驚異情緒的當時，就預言在新力量發動之前，小生產者與小商人會很快的消滅。他們以為小生產者與小商人會粉碎於浩大的資本主義及工人階級運動之間，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將會發現他們的本身被驅入於工人階級的隊伍。但就我們所見却並不如此。小規模的生產與小規模的貿易仍殘存着，似乎它們會隨着資本主義以俱存的樣子。但是，馬克斯與恩格斯對於他們的消滅的預言雖沒有中，他們以為小資產階級是非建設的及不足重視的一個力量，那却仍是非常正確的。他們所沒有看到的，是跟着大規模資本主義而起的一個新中間階級，這中間階級不是小規模生產者及店主，而是大規模產業及職業的薪俸雇

備者，這種人隨着生活標準的提高而在數目上與重要性上很快的增加。這個新中間階級，隨着現代機械生產而發展，不是像馬克斯時代的小資產階級，而是一個衰頹的力量。在它的後面有它自己的一個創造力，因為它主要在組織現世界的生產工作。在二十世紀的一切政策中，都得把它看作一個力量。並且，今後無論資本主義是保存是改造，抑是為別一種經濟制度所代替，它無疑要起很大的作用。

俄國的這個階級，沒有真正影響社會事業推移的力量，這是給俄國革命以特殊性質的諸重要要素之一。俄國工業之進行，大部分是靠外國專家及經紀人的幫助。這個職業階級在數量上是很少、很弱，而且差不多是無組織的。在舊統治之下有一個大的國家官僚階層，它在統治者與勞動階級之間造成一個中間階級；但是這個官僚階層很緊密的聯系於舊統治制度，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官職關係，同時也是沙皇統治的一個周到的政策。他們根本算是舊制度的同盟；當着革命一來，他們就破碎了，他們不能在改革的工作中盡任何顯著的任務。

因此，俄國差不多是純以無產階級的成分建立她的新國，其他社會階級的革命份子則適足以增加她的力量。這些革命的階級叛徒，擔負革命運動的領導；但他們不得不就那些主要從俄國無產階級所得來的工具從事工作。這樣的形勢在任何較發展的工業國家，不會發生；因為在那些國家中，這個包含有薪俸技術專家、經理人、與專門職業者的中間階層，是太多了，其勢力太大了，不容輕易忽視過去——不過，我們也不能把它當作是固定的資本主義的支持者。現在，它無疑是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因為，無論那一個階級掌握了經濟與政治政策的最後統制權力，它就當作這階級的代表來發揮它的權力。但它的轉向是非常可能的；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根本衝突的當中，它將明顯表示其究將誰屬。假使社會主義在更發展的工業國家實現，它就必得在這中間階級中取得其一部分有力的支持。如其遇到這階級的堅決反對，或不能取得這階級一些建設的幫助，那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但當前中間階級，在其直接從事工商業的限內，是當作大規模資本主義的代表而現

身於業務的實際執行中。近年來，它自身逐漸有了自覺，即逐漸在工業管理中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並有一種在各種職業聯合的基礎上創造職業精神的顯明傾向，也和別的職業組織一樣，它在外面看來多是隘狹的，部分的，在有些部門，如在醫藥方面，那不但把手工勞動者由職工組合學來的教訓，加以熱心的運用，甚或比手工勞動者自身還要運用得更有效。但其結合能像勞動者保衛其勞力目的而從事結合的那種緊密程度，那究只是很少的職業；在近代工業活動中，很多更重要的技術羣仍只在職業自覺與職業良心發展過程的最初階段。他們的權力業已成長，在成長中，且還會繼續成長；它將來還會更快的成長，因為現代廣佈其所有權的合資企業，在其外觀上逐漸變得更非人格的，而更爲金融的了。我們講過，股票所有者，在工業的管理上或經營組織的改進上，沒有盡任何建設的任務。他是純被動的；就是現代大產業的資本領袖，也是做金融家的傾向多於做工業家的傾向；因此，以技術活動而積極從事工業經營工作的人一天一天的更落在領受薪俸階級手裏；此種階級已逐漸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感到他們所服務的資本主義之沒有功用。這，很容易使

他們變更信心，而相信一個不同的社會秩序，並在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政策上發生影響。至這些社會主義政策，則是根據極不同的國家經驗的俄國人所感到極難了解的。俄國共產主義之不能了解西方社會主義的潮流，主要是由於俄國方面對於中間社會羣之力量與意義之不能領會。

產業上以薪俸爲生的技術人材及管理家的權力，在那些公共治理的生產及公務的各部門中，已經很充分的被認識到了。如在直接受國家管理的郵政一類產業中，由政府簡派的部長一流人物，對實際管理的事務，知道很少，其實權照例是操在其治理下的公務人員手中。若對於公共管理事務的處理，通常是派代表到公務機關（或與此相同的團體，）如在大英廣播社（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或在大不列顛的中央電局（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那樣，則上述這種情勢，將更爲明顯。因爲在這些團體，無論在理論上與實際上，都是由以薪俸爲生的首領管理，甚至沒有政治上的部長來對他們的日常工作直接負責。這種情形，在那些大的合資公司（如鐵路公司、銀行等等）亦殆沒有何等

相同；因爲，在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別的情形下，以薪俸爲生的首領們，必得站在一種地位並發展一種心理的態度，即在很多方面，會很密切的與食俸的國家官吏相聯繫，這些公司和國有的實業不同，他們自然仍是爲私人利潤而工作；但我們不妨這樣說，他們拿薪俸的首領們的心理狀態，爲業務利益的概念所左右，那和爲股東獲取紅利的願望所左右，是差不多的。

公共事業的增進 我們知道，在現社會中，已有許多產業與公務，或爲公共團體所有，或爲公共團體所管理，或直接歸國家，或歸市，或歸屬於國家所指定的某種公務公司。但是，這些公共管理的公務，若要置之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機構中時，却不能把它們當做一種社會主義的現成模範；因爲任何受國家扶植而進行的制度不能不以負其責任的國家的性質爲性質，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公有的業務都會具有很多資本主義的特質，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很顯然的例，比如英國的所謂「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在很多城市就完全是爲保守主義所把持——伯明罕(Birmingham)就是一例，這是很

意義的。近年來公有事業的最重要的擴展，不是由於社會主義政府的行動，倒是在保守者或資本主義者的保育之下，這亦是很有意義的。這適用到大英電力供給案，就樹立了『網線』制度（“grid” system），並使鉅大的傳遞與電流的售賣得了公有的專利。

第二節 何謂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實際上並不包含產業公有的建立，不過，關係自然是有的。有很多產業與公務已經公有了，而其社會無論在結構上或外觀上仍然基礎地是資本主義，這是很可能的事。社會主義的要素，不是在產業經營的組織的特別方式，而是在人們的特別關係。社會主義者主張：這種人的特別關係是他們希望建立於全世界的，只要產業、公務與資本的所有權仍在私人手裏的地方，這種人的關係就不能存在。爲了這個理由，和關於生產效能的理由，他們希望把生產與交換的事業都社會化了。但社會化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個手段，——一個用來達到實現人類平等理想的手段，這平等理想，是放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

之上。

自然，平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它可以這樣解釋，凡人都應當有平等的學識與才力，並把這些特質在平等的衡量中，用之於各種服務。但，這是很明顯的，使才力平等，決非人力所及——即或其真正意義是指各種不同的才力間的那種平等觀念的話。可能的事，只是排開那些無能而又阻礙羣衆去發揮其所有——至少是潛在的形式——的才力的人，以減少現存的才力與服務的不平等而已。社會主義很明顯地不是主張人類間的才力平等；但是主張一個制度，一個儘可能的使每一個人都充分發展他內在的特點的制度。這包含了一種給一切人自由公開的教育制度；並包含有一個很進步的物質環境，用以防止疾病，防止營養不足，防止有價值的人性的阻塞，這些有價值的人性在過去生活中，是困於擁擠而被壓迫的環境，致不得伸張。此外，它還包含了一種進步的精神環境，在這一點上，從奧文(Robert Owen)的時候起，社會主義者至少是同等的着重。因為，若人們要盡其可能之才力時，他們必得在心裏有服務的觀念，所以在年輕時就要知道，要視他的才力當作一種

力量，這力量發展到最充分的限度，是爲了要在這社會上加上他們的重量，社會是他們這些份子造成的。就形式上的意義說，這有一部分是教育的工作；但是，和家庭環境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制度賴以促使人民工作的動機的性質，也是很密切的關聯着。因爲一個拘束的家的環境，是一個想像力與服務的精神性質所不易生長的場所；至若使一切人訴諸一種隘狹的自我利益的動機的工業制度，那也不像能使那些從小在這種影響下長成的人，會發育其較高尙的集體責任心的精神。

平等 不時會有人這樣提示過：人們要求在他們社會中所建立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這自然是很必要的；但它本身還嫌不夠，因爲機會的性質，還得充分說明。機會平等也許會解作一個給人人以與別人爭勝的平等機會——魔鬼取最後的政策——這樣所得出的結果，不是給人人以自我表現的最充分的機會，而是以成功的少數踐踏失敗的多數。機會應當儘可能的是做有用的事業，成就良好的職務，並在確定的目的上，發展先天的才能的機會。因此，教育機關的民主化，使每一個男女小孩得充分發展其能力的機會，那雖是

這種社會事業的必不可少的正當企圖，但它本身還嫌不夠；因為企業制度與民主教育的平等基礎是顯然衝突的，爲了供應企業制度需求而推行的民主教育，其結果，定然不會在最大可能範圍內使全社會中人得展遂其意志與能力。

承認人們的天然不平等，及承認必得多準備平等機會，以減少現存的不平等，這是必要的，但同時也必得去組織社會生活，然後其所準備的機會，才是爲樂意而有效的服務的機會。但是現在工業制度所由建立的基礎與這種理想是尖銳衝突的；因爲它的基本假定是：對生產努力的特殊引誘，必得是對個人給予以物質報酬的引誘，或失去勞動機會的災難的恐怖。十九世紀的全部經濟原理，是奠基於這樣的論點上，以爲對生產的建設的衝動，必由人的欲望引起，那不止是求生存的欲望，且是儘量積聚物質財富的欲望。但這實在不是事實的真實說明；個人獲得的動機，雖不無若干理由，但每個人的心理，乃至其他許多事實，都不得不加以考慮。熱心的工商業者要求權力和要求金錢一樣。他甚至重視由金錢得來的權力遠過於金錢自身；工人的從事工作，其爲獲得工資的意識動機，還沒有因爲工作

是一般命運的原因多；社會環境的傳統習慣，使他天天去工作，而全無關於動機的反映。如果不爲了這個原因的話，職工組合主義早已經有了更堅定更有力的運動，或者工人們早已表示不能忍耐他們的命運。但在事實上，最多數的人們在他們所長成的環境中，本能的滿意而且毫不發生問題。他們也許會由一些特別原因驅使其從事革命，不然的話，即使在極壞的經濟價錢上，驅使他們成爲真正的『經濟人』(economic men)，他們也可以出賣其勞務。

人類動機問題 在造成現在經濟制度的工作上，舊來社會習慣上的「傳統」具有很強的力量。動機曾給它增加力量，但經濟學者在論斷其制度時，却過於依傍動機了。那些個人獲得的動機，或因爲職業的喪失，以致陷於收入喪失的結果的恐懼的動機，對於大眾心理的影響是次要的，是很小的。這些動機，在一個少數人的階級是永遠藏在心裏的，工商業的活動的領袖們大部分是從這階級中出來；而這些動機對於羣衆則僅是間或在害怕由反抗艱苦的環境的結果時，發生制止的作用。但這些動機並不是，而且永遠不會是生產

制度的大策動力。

當我們要考慮找一個別的經濟組織來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究有若何的可能時，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體。古典派經濟學者以為若不經過大災難，那是絕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相信，羣衆只是爲個人賺錢的恐懼與希望策動他們去工作。假使這個觀點是錯誤的，而這些動機僅是集體傳統力的次要的事情，那末，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爲衆所習知的原因就成爲很弱了。從資本主義到一個新制度的轉移的過程，縱然是非常困難的事，但是一個有組織的代替形態，却能依傍這同一集體的傳統力量。

不過，我雖認定顯著的資本主義的動機是從屬的，但並不以爲它們是不重要的，也不以爲人類之繼續工作，完全是由於集體傳統力量的推進。有了這從屬的動機的敦促，人類所成就的工作，乃能比較單靠傳統力量所成就的工作多。假使這爲人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者的動機被廢棄了，自然要有別的同樣強度的動機來代替它們。然則在社會主義者——即主張在經濟秩序的基礎上來一個根本變革的社會主義者——看來，這些動機該是什麼？

麼呢？

在現存制度下，工作的集羣性（collective impetus）的力量是被階級敵意的影響減除不少的。活動於大規模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廣大羣衆，不論其是否因壓迫禁制而懷着怨恨，他們總不會意識到他們對於那些在生產進程中的事業，負有任何真正的責任。責任是必得跟着權力而來的，那些沒有管理權的人們，當然不能希望他們來感到責任。社會主義者們說，爲了這個原因以及其他現代工業工作上的單調乏味的的原因，一般大衆對於他們所做的工作，是敷衍、是不樂意的。人們爲工資出賣他們的勞力，至多不過使他們覺得爲了獲得工資的義務，而給予以他們視爲合理的經濟報酬的東西。特別是在那些大規模經營中，其龐大與非人格的性質，簡直破壞了雇主與被雇者間之一切個人的關係。而一般無同情心的與糊亂的管理，自然更會使這種情形加壞。凡在這種情形流行的地方，工業管理者爲要減低其消耗，對於他們被雇傭者自願服務精神之消失，自不得不設法救濟；於是加快機器的速率，驅策他們更苦一點；或者在生產品送上移動臺以前，使工人依照順序，受機

器的速度的迫促，不能不在一定的時間內做他指定的工作。但越是訴之於這種更苦的驅使工人的方法，其自願協作的精神與負責任的意識便越被摧毀了。因為這種催動的方式的要素，是使出產品的責任從工人移給機器，工人僅僅成了機器的自動的助動者。那樣的方法，於摧毀自願服務的精神外，對於公民身分，對於工業，無疑是一樣的壞；因為人類在工作的時間內所受的待遇，是會深深的影響其在暇豫時間的態度。

服務的觀念 在廣大的社會的動機的刺激之下，男女們所能提供所能持續的有效的服務，超過於資本主義所能命令他們做的，這個觀念，種下了社會主義者信心的根源。社會主義者相信，在使作工成了公共命運的傳統上，建立一個在公共服務中的工作責任的積極意識，是可能的。他們指出，現代生產主要是一羣密切合作的人進行的一種社會進程，所以整個服務的效能全賴每個人對於羣的工作上的貢獻。他們相信，在這些條件之下，建立起一種羣忠（Group loyalty）與負責的意識來督促人們作最大的貢獻，那是可能的，不過這裏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工作的本身要是值得做的，就是說，那是顯然打算供

給真正的需要的，並且在裏面從事工作的人們，都瞭解工作的性質。這個意義所包含的，但是說生產的貨物將是有用的貨物，並且對於那些需要這些貨物的人，能有分享的保障。換言之，就是不但要節省不值得生產的貨物的無用勞動，而且要有一個分配的合理的制度，將貨物儘可能的用之於人類的福利。

第二個條件在實際上是同樣重要，那是說，那些參加工作的人，會覺得他們所從事的工業組織，自頂上到底下是一個進程，在這進程中，各人都盡一部分任務，都是各人自己在同樣的動機與刺激的基礎上盡一部分任務。

現在，工人或事務員沒有這個感覺。甚至營業中的負責的經理們，在工人、事務員們看來也同樣的是領薪水，因此，同樣是被雇的技術人材。因為他們覺得這些領薪水的營業管理者是管理的代表者，這些代表所關心的，是在推進企業為私有的股東生產最大的利潤。在這些環境裏面，從事企業活動的全部用手用腦的工人中，沒有公衆的意志——沒有羣隊精神（除開那些為經理負責者方面以非常例外的性質而獲得成功者外）。這羣隊

精神的消失，在工業組織的效力上有很不幸的成果，它產生不斷的衝突與接二連三的不正確的意識；特別是它逼着以督率的頭目的交替作爲鞭策生產力的刺激。生產者分成敵對羣，和生產者在生產努力上缺乏公共服務精神，那對於生產效率的損失是不能計算的。

假使工人們，或者說從事企業活動的全部雇傭者，（從用手的工人到高級的經理）能了解，工作效率是加於他們在羣的意義上的一種社會責任，能了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值得做的而且會利用得好的工作，能了解他們這個團體有依他們自己的方法，組織他們的工作的極大可能，那社會主義者就會相信，一向工業賴以推動工作的諸般手段，如較高生產的物質引誘哪，如恐懼失業而刺激人們作較大的活動哪，如使人附屬於機械的自動騙策哪，都會很迅速的減少其作用。這不是說促使個人作較高努力的物質引誘可以完全廢除，而僅是說，當新動機在有效的表現其作用時，這些舊動機會大大的降低其效用。由舊制度轉移到新制度，定然有種種的困難，新刺激的反應，對於從新環境裏面長成的新工人，較之對於那些久習於舊環境的工人，是容易多了。但社會主義者們相信：如果藉教育制

度的改造與工業組織的改造，以造成便於新動機成長的正當社會環境，那人們對於工作的態度的轉變，是定然很快的。他們指出俄國的實例，表示在新環境之下，新社會動機該會如何迅速的顯示其作用。真的，俄國會保存了低工計值的制度，並且對於海外的批發販賣生產，亦不曾拋棄物質的引誘；但與這同樣真實的事，就是，俄國對於工業效率的引誘，已比較不著重這些原素，而是更着重於受僱傭羣衆對於新動機及其對於在蘇維埃工廠中青年共產黨突擊隊的熱情領導之自願的反應。

第二節 工業的統制

在戰時與戰後不久的期間，很多國家的工人，都發生參加工業統制的新要求。事實上，這種要求是早於世界大戰。它是在十九世紀末的 Fernand Pelloutier 的原始靈感之下，爲法國辛迭開主義者 (syndicalists) 所提出。它在世界產業工人的宣傳中最初出現於美國。它是基爾特社會主義運動中理論的主要點，基爾特社會主義會在戰前的「新時代」

(New Age)的影響之下，在英國成長起來。但戰時的環境，給它以新的更緊張的刺激；當戰後各地工人階級團體重新陳述其綱領時，「工人管理」的要求，總要在他們所有的要求中，占一個重要地位。那在英國係為礦工、鐵路工人、郵務工人以及其他許多團體所提出。在法國則見於工聯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所提出之工業國有化的綱領中。在戰後的德國，亦曾表現於其社會化的綱領中。其在美國，由世界產業工人的「藍刊」(blue print) 宣傳，以至關於鐵路的一次著名的「普覽計劃」(Plum Pain)，都會由許多形式，提出此種主張。

這各種計劃，內容各異，但都有某種共同的特質。它們都以為產業必得成爲一種很廣大範圍的合作與基爾特事業，這事業，要付託於各種業務下工人全體所組織的各種形式的自治團體。他們認為沒有什麼產業可以絕對由它自己去進行，並且認為像產品的價格、生產者的報酬一類事體，必得由一些權威的機關來決定，這些權威機關必得比產業的本身更廣闊，而且可以代表整個社會來說話。但是在這一切條件之下，每一個產業必使之在

那些首領之下，盡可能地使它成爲一個自治的團體，至那些首領，則須由將來接受其指揮而活動的人們選出。大家覺得，每種工業的自治責任的允許，可以使雇傭者全體間能創造「羣隊精神」，並且能提供爲公共利益的工業行爲，同時還能避免官僚管理的危險。

剛在大戰後的工業最不安寧的那幾年中，這種觀念，非常盛行。在那時候，職工組合是占很強的地位；並且在工人管理的方面，似乎有很大的實際進步。但一九二一年的恐慌，擊毀了當時職工組合的權力，它們只能對於減少工資和加惡工人狀況，作抵抗的要求，而再沒有餘力來提出它們的新要求。基爾特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其他要求「工人管理」的運動，在以後不況的諸年度中，差不多完全無聲無臭了；但他們理論中的一些東西，已經參入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策中了。因爲無論如何，它教會了社會主義者們，使他們不相信國家的直接管理下之工業社會化的計劃，或者由官僚的方式來管理這些工業的計劃。社會主義者逐漸傾向於以次的辦法，就是，關於一般企業的計劃與政策，要儘可能的由社會全體來支配，但產業的詳細處置，則儘可能的委之於職務上的各種團體。

公共管理的諸形式

但是關於這些職務上的團體的結構，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些人主張要樹立專家的會議，這些專家由國家指派下來，向國家負責任。就他們和從事於各種服務的工人團體的關係說起來，他們是占一個私有工業中的雇傭者或以薪俸為生的管理人的地位。有些人則堅持，各種工業之管理團體，必得要以實際代表各階層各部門實際從事於工業的工人來建設。第一種意見的理由，是說要推進工業，使能達到很高度的技術的適合性，最要緊的是把他們放在管理人的地位，而這個結果，決不是採用選舉的代議制度可以獲得的。第二種意見，則是根據於以次的要求，即使全體工人有一種為服務的效率的集體責任，並使他們有一種自己也是合作分子，而不是僅以兩手從事勞動的意識。

很明白的，這兩種意見都有很多的論據。那些主張把產業都拿到手裏來的社會主義者，顯然不能不以可能得到的技術效率來管理它們，至那些很像是安排在社會管理形式之下的工業，尤需要大規模的技術上的改造。在另一方面，假若以技術管理者由國家派定

的方法，代替由私有股東派定，那在其一切照舊的限內，從事工業的工人的地位與其對日常工作的態度，依然會繼續不滿，對他們所要求的新反應，也不見得會發生出來。因此，在要求工業社會化的限內，我們是有努力調和這兩個觀點之必要的。為技術的發展計，現在各工業的實際管理團全體，必得是由國家所指派，指派他們，完全是為他們適於這種職業，而不是要他們作任何特殊團體，任何利益的代表。但是，在那些位於大社會化公司之領袖地位的完全專家中，應當參加工人所選出所信任的份子，那是有很多理由的；並且，要從產業全部份子中產生各種代表會議，而且在產業事務的規制中，要給這些會議以逐漸增長的權力，那也是有很多理由的。這些會議的權力，在最初也許必需限制，讓集體負責的新精神得有充分時間種下根基；但自此以後，就應當很快的增加他們的權力，以便到了產業轉移無害於技術效能的時候，即刻可以使產業轉移到代議基礎上的自治組織。

這是通過社會化統制形式下的每個工業中的內部組織的事情。但按照國家經濟計劃的概念，以調節各種社會化事業亦屬必要。每種產業或公務，大可組成一種照料他自己

內部事務的大自動法團——一種相當於現在俄國的「康拜因」那種團體——在大產業中，這些法團自然會區分為較小的自治部門，那有時是按照特別的區域來分，有時是按照生產的特別部門來分。這些較小的團體，將相當於俄國的「托辣斯」，這些「托辣斯」是各種「康拜因」的組成份子。在更大的範圍上，或許關係密切的產業會通過各種管理委員會而聯結起來——英國勞動黨對於燃料運輸事業社會化計劃建議的一部分，即電力運輸委員會（Power and Transport Commission），即其一例。這個委員會之下，必有許多關於鐵道、道路運輸、電煤以及其他生產部門的部分的法團，並且，當社會化的組織更向前發展時，其他工業（例如金屬工業、棉織工業）的類似的委員會也會發生；同時，合作運動對於分配的貿易與對於專為家庭消費的範圍很廣的各工廠，亦會占一個同樣的地位。最後要說的，就是社會主義者把那種依照國家計劃機關意旨行事的國家發展委員會，看作是對於社會化工業經營的同等的團體，很像在俄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ian）對於勞動國防會議（The Council of Labour and Defence）的關係一樣。

各種經濟會議

近年來，公共的與半公共的事業有很可觀的發展，這些企業與上述的構造有好些類似之點，至少是有表面的類似。即如大不列顛廣大的電流傳遞之社會化，已由一個法團的建立而實行。這法團名中央電局（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從事於社會化服務的管理。在德國，加拿大，甚至就在美國，都有通過法團而使公務機關社會化的同一傾向。近年還有一種運動，就是各國繼續設立各種中央經濟會議，並把顧問的職能給與這些機關，這至少是國家工業計劃理想的一個雛形。但是，這些會議的權力究竟太小，不足以獲得任何較大的成果。並且，就各種情形而論，他們全體人員也沒有鼓勵他們作他們可以發展到滿意的計劃團體的希望。在他們的組織中，專家太少，持有工業上之不同利益的代表者太多，他們大多數人，要保全資本主義構造與阻止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者多，要發展任何有聯絡性的國家工業計劃者少。他們在有些情形之下，對於政府作產業法的次要問題的貢獻是有用的；但對於工業制度上改造的任何獨立發動的領導，則從未有若何的表現。那些考察德國或其他國家的經濟會議行動的人們，越來越明白那些基於雇主與工

人代表間的平衡力量的團體決不能有任何真正有力的建樹。

第四節 馬克斯主義

自然，社會主義者都有一種堅確的信念，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要雇主與雇工之間超脫敵意，那是不可能的；他們以爲這種敵意，是建立在根本無從辯護的不平等，和目的無可調和的性質上。關於這件事情的社會主義的見解，很早以前就由馬克斯寫在他的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中。即使那些不用馬克斯術語的社會主義者，也還是接受馬克斯學說的精華。馬克斯的基礎意見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是不合理的被看作商品而買賣；勞動力在工業中成爲一種生產費用，勞動者的所得，並不看爲是工業進行的目的。「勞動力」被買被賣；資本家因爲它是生產的一種原素不得不買，勞動者因爲此外無謀生之道，不得不賣。但交易的條件是非常不平等的；資本家因爲有蓄積的資本由他處理，他可以把那些山大規模生產與勞動分工所增加的利益，給他自已獲得很大的部分。勞動者

由個人的努力取得報酬，他這種努力限度，係按照市場競爭的情形而決定；但當勞動因利用技術進步的結果，而增大其生產力時，生產力增加的主要利益，都以利潤的形式歸到資本家方面，而不歸到工人方面。工人們藉着團體的力量，也許可以從生產力增加所得到的利益中獲有一個分額；在勞動少於需要的地方，就令沒有有力的團體，真正的工資也許可以增加。但是，就馬克斯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中有一種內在的傾向，就是把經濟組織上不絕增大的生產力的利益，總是不合比例的分配於地租、利息與利潤，且還剝削工人，其給與工人的分額，遠較工人在生產上努力所應得的額數。

其實，馬克斯關於這種情形的敘述，比這裏所敘述的還要強而有力。因為，他曾從古典經濟學者得出一種『生存工資論』(Subsistence Theory of Wages)的信念，他由是主張由工業生產力增加所得的利益，全都給地租、利息、利潤所霸占，工人什麼也得不着。但馬克斯自己也承認維持生存的費用不是絕對固定於工人身體的物質必需，而是取決於傳統與習俗，所以那是可以變更的。這就是說：若是因勞動的缺乏或勝利的集團討價，使工人

們增加真正工資到過去的水準以上，並且這較高工資，如其一直繼續支持到這新的水準被承認爲「生存水準」，那末，工資就不一定會回復到從前的標準了。但是，這點如被承認，「生存水準」也就無多意義。馬克斯的論旨，只是要證明生產工具的獨占，使資本家有機會去霸占工業生產力增加利益中的非分的分額，除此以外，則沒有什麼真正的必要。我們在前章講過，在生產力增加期中，利潤的增進超過工資的增加，這個傾向，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安的根本原因；因爲這傾向必然會產生消費者需要受限制的結果，消費者需要受到限制，日益增進的生產力，乃不能爲滿足人類要求而充分利用。

因此，馬克斯主義的基本概念，就是生產工具由資本所有者所獨占，必然要招致剝削勞動的結果。近代工業上的生產，根本是一種合作過程；但這合作行爲的責任者，却分裂成爲敵對的團體，它們在生產過程中占着極不同的關係，這一來，合作的性質却又被否認了。在一定的時期中，這種差異，是必得加以改正的。照馬克斯看來，在所有權和生產品分配的立腳點上，產業的社會化，是勞動過程社會化的論理的結果，而勞動過程的社會化，則是機

械生產的結果。

但是，馬克斯並不主張每一個工人應該獲得其勞動所生產的生產品全部，不過有時別人以這個意見談諸馬克斯罷了。馬克斯在他所著的價值價格與利潤 (Value Price and Profit) 中，大部分是駁斥這種意見。在馬克斯看來，在現在的產業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一個人的勞動的特殊產品，只有許多人合作的努力之下的特殊產品；要指出這個人或那個人生產商品的複雜過程中真貢獻了多少，這是不可能的事，這些商品不過在製造的某種階段中經過他的手而已。工業的生產主要是社會的生產，其結果不僅是由於各種行業中很多合作生產者的日常活動，同時是由於很多過去的生產者的工作——現在工業制度較之過去制度能生產更多的生產品，凡對於造成現代生產制度有過任何發明與努力的貢獻的，其實都得算入社會生產中。現代工業生產品的價值大部分應歸功於生產力的社會遺產，這是現代人從那些已經過去的人們那裏得來的。因此，依照馬克斯的理論，工業生產品決不能按照特種用手或用腦的工人的特殊貢獻來分配。他主張，因為生產是社

會的生產，所以它是屬於整個社會，而其分配也就不是按照假定的他們對生產歷程的貢獻而給以報酬，而是分享所產生的財富，這些財富的目的，是爲了創造人類最大限度的幸福與滿足。自然，對於那些不願意對社會事業參加勞力的人，不能沒有處罰，甚至，爲了誘導對生產努力的必要，物質的報酬，亦是不可少的。不過，這兩者在分配所得上，都是次要的事體；主要的指導原理是需要的原理，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主張最合於這原理的辦法，是要逐漸使社會上的每個獨立份子最接近於所得的均等。關於所得均等的問題，我當在以後再來討論。

唯物史觀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僱主是由占有生產力增進的利益之非分分額，而進行勞動的剝削，這理論僅是馬克斯學說的一個成分。這個成分是在馬克斯著名理論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的基礎上成立的。但經濟史觀或唯物史觀對於了解馬克斯的地位，亦有同樣的重要。這個理論常常爲人所誤會，所以不能不仔思說明一下。馬克斯說：無論在何種文化中，或任何一定的時代中必有某種『生產力』(powers of Pro-

duction) 存在。這些力存在於爲人類所使用的物質資源中，與利用他們的人類知識中。好像，煤在地下時不是生產力，要直到人類發現它是可燃燒的，知道怎樣去開採它，然後才算生產力。這些生產力是隨着人類知識之增進而繼續變更的；因而人類文化所奠定的基礎，是一個常常變動的基础，在人類利用自然的任何階段——就是說，任何時代的任何文化——有一定的利用與組織，適合於生產力的最好的方法。人們生存的方式或以漁獵爲主，或以農業爲主，或以海外貿易爲主，或以各種不同的方法經營工業爲主，他們所採取的組織，其經濟生活的方法，必得和他所從事的生產行程的性質，所加諸他們的需要相符合。爲了去打魚，或去開採煤礦，或去生產電力，人們爲了設計進行這些特殊活動，必得組織一種經濟制度；這種制度自然包括財產關係以及人類關係。因爲誰將管理工具與生產資源，誰發號施令，誰執行各種相關的職務，是必得有決定的手段的。經濟關係的構造，就這樣自然的、無可避免的在人類處理生產力之性質與發展之下產生。但馬克斯並主張：這種經濟關係的構造，却又統制與決定其所存在的社會中的政治構造；因爲他以爲，國家是一種

組織人們的政治關係的團體，她主要是爲居民進行生產與準備生活手段而提供以必要的環境。馬克斯曾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歷述歐洲的政治組織的連續形態，適合於其經濟組織的連續的形態，而經濟組織的連續形態，却又奠基於人類使用自然資源的連續形態。因此，封建主義——它擁有一種依每個人每個階級對於土地的關係來說明其人的關係的制度——是在生產力進步中，基於純農業形態的經濟制度的一種政治表現。在別一方面，現在資本主義——它有契約的自由，有成千的私有投資者，成百萬的工資勞動者，有議會制度與其表面上的民主主義——則是機械生產的現代制度的反映，而這種機械生產是以勞動的分工與合作及進步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爲基礎的。

馬克斯主張：在生產力與財產關係及建立於這種關係上的政治結構的演進中，每一個階段產生這階段所特有的諸經濟階級的安排與對立。在世界史上每一個生產制度把人們劃分成兩個階級，他們以生產發展的必然，而不得不相互敵對。因此，封建主義產生一種階級關係的制度，這種制度是把農民在奴隸狀況下束縛於土地之上；而資本主義之演

進，却從奴隸狀態中解放了勞動者，而給以虛幻的契約自由因，爲他們必得要和那班獨占生產力的資本家作買賣勞動的交易。

馬克斯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演進中，資產階級爲了要利用機械制度所貢獻給生產的最鉅大的機會，不得不把工資勞動者組織成爲大羣體，而雇用於鉅大的工廠中，集中於大都市。它要是一面這樣做，一面又要有效阻止工人間的組織發生，那是不可能的事；經過若干時間，他們的組織非常強固嚴密，足以堅決要求與雇主們作集體交易的權利。他們開始發展對他自己的集合力的意識，發展對他們所從事的生產進程的集體性的理解。這種意識與理解，在他們心中逐漸孕育着反對剝削的意念，並且逐漸確信，社會所有權及支配權形式須符合於產業進程的集體特性。因此，他們中相信社會主義的逐漸的增加了；當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發達到足以使他們自己來取得生產工具以爲整個社會之用的時候，足以廢除資本的私有權的時候，且足以使雇主階級的繼續存在在生產努力上成爲沒有必要的時候，他們的組織，將給他們以力量。馬克斯以爲勞動階級的這種勝利的獲得，根

本是採取政治方式，並以爲那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勝利，而不是它的任何特殊部分的勝利。因爲他相信，生產的社會特性，把全工人階級緊聯在一起，工人階級克服資本主義的力量，全靠通過一個代表整個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政黨而發生的政治行動。

社會主義與獨裁

但在馬克斯理論中，工人階級的勝利與以前的階級關係的變更，在性質與結果上，有根本的不同。當新興資產階級強大起來，推翻封建主義，並創造具有議會制度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時候，那兒仍然留下一個極大的階級，以供其剝削——這階級在社會中是極大多數。資產階級逐漸吸收那些舊土地所有者階級到它的行列中來，直到土地已實際上變成一種資本的形式，無論在使用上，或從其中所得的收入的本質上，均無以異於別種形式的資本。新興資產階級第一步顛覆地主的權力，然後把地主的利益吸收給他自己。但是當工人階級再來履行推翻資本主義的程序時，再沒有其他被壓迫的階級留在它下面給他們壓迫了。所以，將來由工人的階級勝利創造出來的新社會，其本身就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這社會的基礎，不是建立在這一羣剝削那一羣的基礎上，而是

建立在分享社會經濟活動之生產物的基礎上。

可是過渡到無階級社會的轉變，不是即刻就能成功的。正如新興資產階級在自身吞沒地主以前，須把地主推翻一樣，工人階級在廢除階級分別以前，須把資本主義破壞到絕對不能挽回的粉碎。因此，有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必得成爲統治階級，而決不能讓那些已摔倒的階級再沾染政權的任何部分。這個時期，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獨裁』（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時期——以完全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資本主義的一個主要的過度形態。有些馬克斯主義者（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大部分自然在內），不承認這種理論，是健全的馬克斯主義，因爲這是很清楚的，他們主張社會主義得以漸進而無痛苦的建設的推移，用議會的行動，從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出來，所以他們和無產獨裁的理論是相衝突的。但馬克斯相信獨裁的中間時期爲必要，是無疑問的。他雖不會在什麼地方系統的表述他對變革過程的見解，但至少在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me）論文中說的非常明白，他這篇論文，是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五年改組時所採取的政策而寫的。

俄國共產黨以獨裁理論爲其政策的最主要成分。在他們看來，不到一切反革命的危險都已除去，不到俄國社會中殘存的非社會主義成分都已肅清，俄國不能成爲無階級的社會。所以，他剝奪資本家及統治階級的舊份子的政治權利，肅清富農（Кулак），加緊努力俄國農業的社會化。但俄國並不是想永遠獨裁，把俄國人口的一切份子都驅之於政治權利之外。獨裁只是存在於轉變沒有完成之前；那種轉變一經完成，無階級社會基礎上的真社會主義就開始了。

第五節 政黨

但實際上的俄國無產獨裁，不僅是把一部分人民的政治權利剝奪了，不僅是在俄國人民中肅清非社會主義份子，它還包含了以共產黨來有效的統制全俄的制度。就理論上說來，最高的權力，是屬於龐大的蘇維埃代表會議——從蘇聯各部分來的一個一千五百代表的大集會——同時是屬於從這個會議所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實際上，真的權

威是存在於共產黨本身的執行委員會，而這個嚴密組織的黨，不但能够左右蘇維埃會議的選舉的方向，並且還在那龐大的會議開會的時候，從會議中推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選人以作更安全的保障。俄國的真正獨裁是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獨裁；革命以來，龐大的蘇聯領土之得以統一政權，得以在統一的統制之下，達成五年計劃，那也許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方法。

但這却不是說，一個在經濟傳統上較爲集中，且較習於統一工作的較小國家，她也需像俄國那樣的獨裁。不過，就在英國，乃至在人口更多的美國，其政治與經濟政策的有效指導，就顯然非有一個組織很強、紀律很高的黨的制度不可，在所有這些國家中，現在的政治生活，都是通過政黨來進行，沒有政黨，簡直就無法推進；爲現存政權而工作，尙且需要政黨組織，若要實現一個完全的經濟制度，那當然需要一個更強有力與更堅固的黨的組織。因此，我們必得作這種預想，就是，社會主義假若實行於西歐，或者更進而實現於美國，在其實現過程中，必伴着一個比現在政黨有更好紀律與更強組織的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的創建，並且必然隨着將傳統的議會的實際大大的改變，使適於獨裁的方式。因為一個要求變更經濟制度的基礎的政府，當然要行動敏捷、決斷，並在各方面劃一步驟。至於為支持現存制度而設定的議會政治，其行動迂緩，很不像可以對付急進經濟改造上的極不同工作的適當工具。

黨的制度 黨制的概念，在俄國共產黨的心中，和在別國人的心中，很不相同，這自然是事實。依照議會制度下的各國的傳統慣例，黨制不止是一個組織選舉的工具，不止是用來造成一個強國政府，以實現一種明顯政策的工具，它同時還安排有一個在野黨，時常強硬的批難政府，並時常準備着自己來取而代之。政黨的這些特性，在有兩個大敵黨相互在朝在野的國家，特別顯著，在那些黨派較多的國家，政府照例是建立在較小的黨派的交互聯盟上，這些特性，就比較不大能顯現出來；因為，在這種情形下，政府例皆缺乏那種為實現野心政策所必需的積極的貫徹始終的力量，反對者寧提出部分的利益，而不提出一種籠罩全體的相反的政策。有兩個政黨的國家或兩個敵對的政黨占優勢的國家，其政黨制

度乃表現得最有聲有色，這是一般所承認的；戰後歐洲議會政治的弱點，大部分歸之於政治黨派的衆多，與政府建立在不安定與不完全的聯盟上的結果。

政黨制度的俄國的概念——我們可以加上意大利——是基於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因爲在共產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的理想中，不是需要兩個黨來完成在朝與在野的任務，而是需要一個單純的黨，在國家內及立法會議中都是一樣有強固的組織以執行一種建設的繼續的政策，其工作範圍較之簡單的選舉立法的活動，廣泛得多。這個觀點之不同，顯然是存於政府必須擔當的工作的不同認識上。「兩黨制」曾被譽稱爲一種確保現存制度之安全與逐漸適應性的工具。贊成兩黨制者所持的理由，就說是這制度依政府變易的彈性，來對付那些不滿現狀者，以保存現狀。但是在這種黨制上占着優勢的兩個政黨，其根基是密切的一致——雖然它們對於次要問題也許不盡一致。在十九世紀中，英國保守黨與自由黨儘管有很多不開社會基礎構造的事體表示不同意見，但是在希圖保全資本主義及其並行的議會制度，則彼此正同。在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基本理想的差異，較

之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間之理想差異，甚且更少。但一到另一個方式的政黨起來——這政黨不能承認現存秩序的基礎，而企圖社會制度的一個完全變更——或者，只要此種政黨已經強大到能夠在一國政治生活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則所有這些保存現狀的政黨制度，就完全無用，完全不合時宜了。因為，假若兩個是基本觀點上不同的政黨，交互在朝在野，那末，一黨得勢，它就得多時間去取消其前任者所進行的工作。在這種環境之下，要圖有所建樹，絕不可能；國家定會由此陷於紊亂，而獨裁制度與議會制度的利益，都將喪失。

新舊政黨制度 因此，當政治生活由一個關於社會組織基礎懷着根本差別意見的力量來統治時，舊的黨制就得摧毀；自然，在這些敵對的力量中，每個力量都想自己的政權能夠長久、穩固，因而盡量圖謀防阻對敵力量的重復拿到政權。但這不是說，一個國家達到這個地位，就可免除黨的組織。反之，因為重大的變更還成問題，所以還需要比從前更強固的黨制。若單靠議會的多數的力量，決不能把那些轉變實現；因為他們在國內的有效的實施，必需由整個領土內的各種人民的絕對合作，且必需這統治黨的目的及其所用以執

行的手段，得到廣大民衆的了解。就因此故，這種黨治，就會比以前更加堅強；這個取得了政權的黨，不僅要努力於使羣衆允許其繼續政權之暫時的安全，且要破碎、毀滅其敵黨的組織，使之永遠不能復活。這種情形，在意大利與俄國都遭遇到了；在這些國家之內，反對共產黨或法西斯黨，都視爲反叛國家。這種對政治意見的壓迫，頗受世人責難，世人都認爲是非民主的與不合法的；但是，假如有一個敵黨機關存在着，繼續不斷的反對政府，而且能使政府的命運隨時可以告終，那末，共產主義所希望的基礎變更是否可以完成，那就很難說定了。因爲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不能單靠在議會中或在代表大會中通過些議決案去達到的。那必得要在若干年的長期間中，依照一個計劃周到而又有系統的政策，繼續努力。

然而所有這些結論，那怕是全世界大部分社會主義者，還是非常不願意贊許的。因爲，在若干國家（其著者爲英國與北美）中，兩黨制已經深入骨髓，要在此種黨制以外，想到其他制度，那簡直是極難的事。在他們的心中，政府根本就是一個政黨交替統治的組織，或者無論如何，總設想有一個熱心企圖當政的敵黨，在繼續反對着。他們不肯承認這個兩黨

制，是在對敵黨雙方所假定的基本社會存在上託其生存，從而是保存現存秩序的一個極好的工具，而極不適於達成徹底的變革。因此，當社會主義政黨發達到可以當政的時候，它自己就很容易陷於自相矛盾的政策。他們企圖以各種不同的急進的理想新秩序來變革，來代替現存秩序；但同時他們却又爲了避免經濟活動之崩潰，而不得不撐持現狀。在他們自身亦沒有一種確信，認定在他們當政的期間，他們可以用議會爲急進改革的工具，以下必要的新社會的基礎；因爲，這些變革，要以議會爲工具來實現，那不僅是幾年的工程，而是幾十年的工程。但在新秩序的基礎沒有奠下以前，主要的工作，却是保存舊秩序；因爲他們不能讓人民去忍受飢寒，甚且不能使他們感到不舒服，使人民受苦的懲罰，就是政權的早日推翻。大多數在歐戰後執政的社會主義政府，動輒受到沒有多數明確的羣衆的掣肘，在事實上，它們只是得着許多舊黨的小部分的允許而執政的。這使它們對於任何建設工作的努力，增加極大的困難；而且，即使它們在議會有多數擁護他們，他們是否可以多成就一點，那也很難說定。因爲，假若政府要採取任何破壞現存秩序的步調，它就刻刻有顛覆的

危險——若不採取這種步調，它們就要向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前進一步，也不可能。

自然，這不是說：因為現在的政黨在現存黨制之下，用純議會的手段，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所以唯一的前途，只是俄國共產黨所採取的暴力革命政策；因為，俄國這種政策，雖說是俄國的唯一可能的路，但却顯然不能實施於英美這些國家。要大部份人民企圖革命，一個黨才能幹起革命來；或者，要大多數相信革命是建設順適生活環境的惟一手段，革命才有可能；但現在英美大多數人民，却特別沒有這樣設想。德國在經濟制度頻頻受到完全崩潰的威脅之下，其大多數人民也許實在會採取這種態度；並且在將來的某種階段，美國乃至英國，也不是決沒有發生這種現象之可能。但在這兩個國家，或在法國，現在決無此可能；在最近的將來，也不像會有可能；在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即使他們承認純議會戰略不足以建設社會主義，但接受共產主義的教條，是不能解答他們的問題的。

這一點也許可以證明下面兩者之一——在這些國家對於社會主義所必要的條件，沒有成熟；或沒有整備，不然的話，就是第三個政策存在，那不是社會民主的議會主義，也

不是共產黨的革命主義。美國現在是第一種情勢；因為在美國沒有堅強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存在，既不能由這樣的社會主義得到議會的成功，也不能得到非議會的成功。若美國的經濟災難繼續下去，形勢也許變化得很快；即使如此，但要建立起一個幫助美國社會基礎劇烈轉變的堅固的力量，必需要相當的時間。美洲合衆國現還安然保留在資本主義形態中，她是一個西方的國家——就因此故，她不能再說是現在歐洲的任何國家。

其在英國，很久就有一個很強的社會主義運動存在，它成了國內兩個領導黨的一個。勞動黨實在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者黨團；因為它通過職工組合及合作社而包含了很多非社會主義的成分。但自有黨以來，其策動的中心力量，却是社會主義者；而領導此黨的大多數人，也無疑自視爲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主張經濟生活基礎的急烈轉變，與主張以所有權及統制的集體制代替私有企業。如其要問在什麼地方有非純代議制與非純共產主義的第三種政策試行的希望，那就可以在說是在英國。

第六節 英國的社會主義

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和大陸諸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有若干極重要的不同之點。特別是它無論在字句上或在意識形態上，從來不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實在英國住得很久，並且也常有英國的馬克斯主義者。但英國社會主義就在憲章派（Chartists）的時代以來就已經在走它自己獨立的路向。從它在一八八〇年復活以至於今，其所受費邊社（Fabians）及前自由主義者的影響，遠甚於其所受馬克斯學派之階級意識的薰陶。它從沒有把階級戰或唯物史觀等辭句用之於任何廣大的範圍；它常是更着重它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不着重於以階級鬥爭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它在這個意義上曾經是空想的，它曾以貢獻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最高理想來向人們陳訴，而不努力於煽動反對現統治階級的敵意。

這種情形的可能，主要的是出於英國政治生活的較大的自由主義。英國不像德國一樣，保留着專制主義及土地封建的大成分在其社會構造中。英國不像法國有許多革命

的經驗，這些經驗教給他們壓迫對他們不利的主張。它也不像美國在其人口中包含了很
多外國分子，曾爲其長期致亂之源，美國大眾都由教育養成一種心習，就是爲求統一，不惜
一切犧牲。在一個世紀中，英國資本主義彷彿是全世界最安全最不能挑釁的，並且是最能
給批評者以充分的自由的，它不怕批評，正因批評不足以危害其統治。自憲章派的時代以
來，英國社會主義沒有遭逢過任何凌虐與壓迫的時期。在整個十九世紀的文化中，英國社
會主義得自由發展，使工人們和社會其他部門的人們，一樣得以逐漸增進其生活標準。在
這種環境之下，社會主義運動的必然的發達性，就勝於暴動性，其所表現的社會主義，就成
爲從現存事物中經過逐漸而無痛苦的演進而成長出來，它通過一些容易的階段，由工廠
法、工人補償金、退養金及失業準備的主張，到堅決要求爲公眾利益的重要工廠與公務的
共同管理。

費邊主義

英國社會主義者的經濟理論是和它這種政策的觀念相和諧的。費邊
社在其著名的費邊文獻（Fabian Essays）中的經濟學的基礎，不是馬克斯，而是彌爾

(指 John Stuart Mill 是 James Mill 之子 1806—1873——譯者) 與哲芳士(Jevons 1835—1882——譯者)彌爾的父親的功利主義，是最不可妥協的『放任』(laissez-faire) 的福音，而彌爾的新功利主義，則是主張社會立法，主張根據『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的一大部分社會主義學說。費邊社社員之由彌爾進而着重在功利主義者邊沁(Benthamite) 立場上所必需的一個較完全的社會主義，正如彌爾從他父親的功利主義進而主張新功利主義。在大陸的社會主義者大眾看來，英國社會主義像是無望的和緩與不科學；在事實上，假若英國資本主義這樣繼續下去，對於社會公務的改進，及生活標準的提高，作繼續不斷的新的讓步，而沒有根本的困難予以妨阻，那末，在這個期間，英國社會主義的政策，只有趨於和緩之一途。

但布丁好壞的憑據，喫了才知道。戰後歐洲情勢，是有些令人難得捉摸的。大陸社會民主黨口裏雖然說的是馬克斯的辭句，而堅持階級戰爭，其行動上却並不比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左傾。當他們實際行動時，馬克斯的辭句並非當務之急，而議會形勢的緊迫，却萬分

重要了。以純議會政策之追求，來實現改良主義，實際上和費邊主義有極密切的關聯，而且當一個黨的政策要在議會制度中施行，要靠選舉的宣傳來贏得無定的投票羣衆，那對於革命辭句的使用，是沒有多大的影響的。

英國勞動政策 但是，英國社會主義——和緩的漸進的政策的典型代表——因近年選舉勢力的增長，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種種困難；在戰後的經濟形勢下，它要由資本主義得到新的讓步，和生活標準的繼續增加，那已經是越來越困難了。資本主義受了世界不況的阻害，現在不是以多方的讓步，來收買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了；社會主義者之取得政權，無非是因爲選民對其敵黨懷抱不滿，但它自在不肯作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冒險的限內，又無法滿足選民的要求。在這進退兩難的情形下，英國社會主義乃在一九三一年之秋發生分裂，接着就形成了麥克唐納先生（Mr. Ramsay MacDonald）的『國民』政府。因爲照當時的事態，好像是資本主義若還要繼續其存在時，它就不但不對工人重新讓步，却要把它過去的施與，收回一些。英國社會主義者在這時候就遭遇着了一種很困難的選擇。

個可能的政策，是對資本主義作必要的讓步，希望好一點的時候快點回來，以便再採取榨取這資本主義的橘子的方式；這是麥克唐納和其他少數著名的黨中領袖所採取的途徑。但是其所領導的組織中的大衆，却沒有贊成這種態度的；當着要決定前途的選擇時，領袖裏面忠心於羣衆者所願意採取的政策，自然是他們以前掌握政權期間所設施的政策。因此，勞動黨領袖的大多數，就丟了麥克唐納而與大部分黨員走向反對的方面。但是他們這樣做時，却懷了極大的疑懼，因為他們多數意識到在他們過去行動所依傍的理論中，他們所拒絕的政策以外，沒有其他前途的政策。所以勞動黨在一九三一年的普選中，就沒有它自己的很鮮明的政策；沒有政策，自然不免失敗；但爲了投票者的害怕，與最著名的領袖的喪失，其失敗乃更加利害。

現在英國社會主義的情形是下面這樣：第一，資本主義的難關與世界的不況把它的傳統政策洗刷乾淨了；其次，若它仍要繼續成爲一個實際政治力量，它自己就必得找出一個新政策。假使它不能實現這種企圖，它也不至於真會消滅；因爲在選民中它有太多太忠

心的羣衆，不容易把它消滅。但是它却要失却兩黨交互執政的可能；並且英國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早期的光景，也將隨其失敗而消失。然而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可怖的共產黨也不能早期成長，因為英國的政治領域大部分仍是完全沒有接受共產主義教條的準備。在英國勞動黨中，對於計劃一個新政策以適應環境變通的需要，已經有所表現。他們已經認識新政策必別於舊政策，新政策不是許多資本主義制度的漸進與次要的改良，而是對資本主義主要制度的當頭一擊——最要緊的，是要擊中金融機關，若金融機關可以置於社會統制之下，然後就可用為國家經濟計劃的工具。

銀行的社會化 社會主義之所以主張以銀行社會化為他們的政策之先鋒，那並非因為看出了經濟體系上主要是貨幣上的必需變更，而同意於『通貨曲說』(currency curve)，而是因為它把資本與信用的統制視為產業改造任務的必需工具，視為使失業工人恢復工作的必需工具，視為使收入的分配更平等更充分的必需工具。但這樣一種關於對銀行制度及大基本工業的當頭的打擊的政策，在現存代議制的實際限制中不容易實

現，這是很明白的事。特別是在現存迂緩笨拙的立法方式仍然存在的限內，單靠議會，那決不能充分實現，決不能成爲一種能够推行的政策。就因此故，英國社會主義者乃逐漸轉向立法機構的急進的改造。他們認識，他們要開始來擒住貴族院；他對這個問題的解決，似乎很簡單是把它廢除。他們認識，他們要來改造議會的手續以及內閣的制度，庶足以使立法的速率加快，行政效率大大的改進，以及政府各部集中統制大大的增加。但是當他們重新得到政權來實現他們的新政策的時候，假若選舉者的意見一時對他們表示反對，他們說不定會又失去政權，而賸下大多數的工作沒有成就；這個更基本的問題，他們還沒有開始來解答。假使他們到了回到政權要保證其實現他們的新而更急進的政策時，他們會發現他們的政治方式，比他們現在所想像的還要近於法西的，甚至近於共產黨的政治方式。

因爲，英國社會主義者現在決定要把銀行社會化，要把全國主要的工業置於集合統制之下，其目的無非是企圖現存經濟秩序之整個基礎的急速轉變而已。一個社會化的銀行制度，與全國主要產業的社會化統制，能和其他資本主義機關的繼續活力錯雜存在着，

這是不能想像的事。要希望現在活力已經降低的資本主義在產業的其他範圍內能够機能自如的前進，就好像一個醫生挖去了病人的心，而後希望他站起來走路一樣。假若有一天，英國勞動黨回復了政權，它能照着它的新政綱所指示的途徑去走，它一定很快的覺得它自己非大大的更走向前去不可，它必得把資本主義企業範圍中一部分一部分的社會化，因為這些部分的生命，都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分出來的。社會主義不得不急於以新的集體制度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越是廣闊，而在轉變中的合於憲法的事體就越難見到。歐戰以後，英國政府也已經多次訴之於非常的權力，這種權力現在還正為英國國民政府所引用，且已成爲戰後歐洲大多數國政治上的家常便飯；當前想在主要經濟機構中，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的任何真正努力，都不能不逼着進一步推行這種非常權力。

第七節 經濟計畫

社會主義不管採取何種方式與戰略，其主要的勢力，總是想保證現存生產資源的最充分的利用，以期社會收入有較多的與較平等的分配。社會主義之攻擊現存經濟秩序，就是因為資本主義不能利用可供利用的生產資源。有一個時候，資本主義主要受非難之點，係因其對財富的不當分配；這種非難的力量，現在雖沒有減輕，但現在更加上一點，就是這種經濟制度的更明顯的失敗，就是它不能把它能夠生產的財富盡量使其利用。因此，各地社會主義的政策，都包含了生產資源的更充分利用，並由是防止失業。失業僅僅是一種表現在外面的徵兆；以準備工作的治標計劃來對付失業，那雖然不失為一種緩和困難的必要方策，但決不能把失業所由形成的亂源治愈，這事實，是逐漸為一般人所承認的了。為一大部分失業者準備工作的企圖，勢將在公家支出上增加過重的壓力，使任何國家的政府——至少在歐洲——都承擔不了；因為公共支出太大，必然要影響工業產生利潤的能力，因而影響到工業所能提供的雇傭數量。工作的計劃是必要的，但各國社會主義都知道，要使大失業羣恢復工作，那是一種更遠大的方案，特別是國家自身必得統制通常準備工作

的諸般手段，單靠臨時救濟計劃的改進，是決計不行的。一個政府假若不統制着工業，並把一切工業所能生產的財富的消費手段，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它決不能有效的阻止失業，或使失業工人恢復工作。只有一個在社會主義政權下的國家能有權力這樣做；因為在別的國度中，其經濟組織能提供的僱傭數量，乃取決於工業資源所有者眼中所預期的利潤，國家企圖在普通工業機構以外為失業者準備工作，那是必然失敗的。國家經濟計劃，無論在何種意義上，總得包含生產資源的充分利用，所以必得包含工業的公有，同時包含收入分配的公共管理。

計劃的意義 國家經濟計劃的概念是怎樣呢？第一步，它需要決定各種貨物的式樣與數量。它作這種決定，是根據可用的生產資源之考察，根據各別工業所當擴增的數量之通盤總計。第二，關於社會一面為準備直接消費，另一面為改進將來生產力所能提供的可用生產資源的數量，它必需作一通盤的決定。第三，配分給社會份子消費的所得，與其可供消費的貨物量數之價格上的購買力相符合；它並得使這個所得總數真是費在適用的

貨物上，而不是保藏着或移作別的用途。第四，購買那些已經決定生產的資本財的手段，要妥當的安排在那些需要此種資本財的人手裏，並且，他們這種購買力，也還得令其使用，而不能令其保藏或移作他用。第五，生產資源一有增加，新的所得就得分配此貨物增加額，並且，這種新增所得，必得適當的使用到可供使用的各種貨品中。第六，生產需要相當時間，生產者在他的生產活動與取得報酬之間，他需要經濟的接濟，對於這個期間的信用接濟，必得求其適當——不多也不少——且必得分配到那些在國家計劃下作生產活動的人，其所生產的貨品數量，計劃裏面皆有規定。

事實上，真正的國家經濟計劃，必得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以統制經濟生活的各方面，尤其是統制生產，統制各種形式的購買力的分配，乃至統制價格的規定。像這種計劃，顯然不能與資本主義相並存。它也許可與資本主義方式的殘餘，或與那些非主要產業與勤務上的獨立生產者的小規模生產，或與大工業的一些旁支，有相並存在的可能。但是，假若是真正的經濟計劃，商品生產的主要部分，必得是生產於適合經濟計劃的秩序之下。所得的

主要部分，必得使其對於可供使用的貨物與勞務的需要，作平衡的分配。此外，還須有一個強有力的統制物價的組織，因為沒有這個組織，殆無法估計某種特殊貨物的數量，而這貨物數量，是要社會所得之一定分配額創出需要來的。無疑的，一個不用包羅萬象的經濟計劃，仍可以存在；但如果缺陷太多了，它就必然無法支持。計劃是奠基在一個生產消費間恰到好處的有組織的平衡的理想上，在此生產消費間作中介的，就是價格體系；假使這平衡可以在任何主要部分破壞的話，這整個計劃就行不通。所以任何真正的經濟計劃，就不僅是把一些社會主義要素注入現存的體系，而是經濟生活之根本基礎的轉變。

英國的計劃

讓我們來逼視這樣一個計劃的面影，這計劃或者會採用於一個更發展的工業國家——英國，她較之前章所敘述的俄國的相似的計劃，顯然有好多異點。因為在俄國，其計劃至少有一個重要點是簡單的。那裏現在沒有任何重要貨品過剩的問題，也許將來在一個很久的期間，仍不會發生這個問題。進一步說，一切俄國自己所能產生的工業，當它們一在市場上出現的時候，消費者馬上就可以把它們吸收，並且消費者還會貪

得無厭的作多的要求。凡是俄國所能够生產出來的一切生產財，都早已爲發展得很快的產業企業及社會化農場所吸收了。假若分配於消費者的所得，以人爲方法降低，假若不論供給如何缺乏，一任工業品價格自由提高到使供給與需要平衡，那就是俄國，也不會有上述的情形。在事實上，俄國有一大部分消費財的產額，是定出合理的價格；只有超過基本需要的剩餘貨品，乃以較高的價格在所謂自由市場出賣；並且，所有的生產財，差不多都以規定的價格，轉售給集體組織，而集體組織則是按照計劃需要它們的。再者，在完全的國家統制之下，所得的增大與貨物供給的增大爲一致，這是俄國政策的一個彰明較著的和必然的目的。所以，俄國工業品就再過些時，也只缺乏，而沒有任何過剩的可能。

但是，像在英國那樣的國家，情勢就複雜多了；英國有一大部分的工業貨品——包括消費者貨品與生產者貨品——都是爲輸出而生產的，並且，在多數工業生產的主要部門中，其生產量，即令就最大限度的需要說，亦非國內市場所能容納得了。而且，生活標準即令本質的提高了，在許多情形下，過剩現象還是無法避免。因爲人民要用其增加的購買力去

買的，不是現在有過剩生產力所生產的那些門類的貨品，而是由外國運來，或藉新生產資源在國內作更大量生產的別類的貨品與勤務。因此，英國就在國家經濟計劃之下，仍然需要大量工業品的繼續輸出，然後用以抵付食品與原料一類貨品的輸入；並且爲要提高生活標準，她主要還得發展新式的生產，而不是將其已有的資源增加其使用。現在受不況影響感受痛苦最甚的那些基本工業，那是別的許多工業的主要供給者，假若有需要它們產品的新的工業發展，那它們由此得到的繁榮，就較之由現存生產資源增加使用得到的繁榮，還要大多了。但是，這不能適用到織物業，特別是棉業。因爲就國內的需要而論，棉業的發展，不見得能發生使失業工人與工廠恢復工作的影響。

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答案，俄國同英國在必恃出口以圖存的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她們不同之點，就是俄國的出口貨是食品與原料，入口貨是製造品，而英國的情形却正相反。這種差異是很關重要的。俄國只要有極少數的製造品輸入，它就可以緊縮過去；假使他的輸出市場破壞了，它在國內可以依生活提高的方法，完全消費它某一時期內能够生產的一

切農產品與其他主要商品。但在英國，它却不能消費它自己所能製造的棉織品；雖然她也許可以急速變更其經濟制度的結構，以減輕其對於食品原料一類輸入品的依賴性，但國內還沒有生產這類貨品的準備，它又決不能缺少這類貨品。在另一方面，它必得繼續的依賴輸出；若要減少對於出口的依賴性，或提高生活標準而不增加出口，那要大大的改變其經濟生活的性質與平衡。因此，經濟計劃在英國的方面，就較其在俄國方面要成爲更其複雜與更多爭論的事體。

英國在戰後這些年來的經驗，充分表示了一件事實，就是在私有企業下來變更經濟制度的平衡與組織，那是非常困難的。自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的戰後與隆氣象消去以後，顯然有兩種趨向昭示我們：第一，英國基本工業若希望能盡其效能生產，它就必需有基本的改造；第二，現存工業的平衡與戰後世界的需要已經不諧和了。

機械化與僱傭 現存工業的改組雖是減輕生產與分配的費用，因而使市場有若干的擴張，但這樣即使做得萬分順利，亦必得使許多工人離開，使他們永遠不能回復他們

的舊職業。因爲改革必得增加機械化的程度而在工作上將產額集中，那可用最低的費用生產；可以較少數工人之長期雇用，來代替較多數工人的間斷雇用。局部改變工業組織的方法，決不足以充分解決失業問題。因爲現在所必需的，不僅是使舊工業恢復常態，而且要發展新工業以吸收被擠出的工人，同時並增加購買力，使足以創造對於新工業的生產品的需要。

因此，舊的基本工業的改造，雖然是英國任何經濟計劃的主要部分，這種改造，雖然是關於國家的直接行動，但專是這些工業本身，或者把生產和購買力充分供給的分配分開，那決沒有任何可行的工業計劃。一個可以通行的國家計劃，那必定是非常廣博的，它不僅要致力於以機具、原料、燃料及人力上之最少消費作貨品與勤務之最大限度的生產，而同時且要爲生產出來的貨品謀得充分的銷場。假使戰後世界的經濟狀況，英國不能再以過去一樣的比例向國外輸出其工業產品（就算除開因不況影響而形成暫時失常的世界關稅不講，我們也很有理由可以這樣相信），那末，要新購買力之分配能充分吸收增加的

產品，那就必得要取擴張國內市場的方式，而這種擴張，且必得是增加本國生產的貨品的需要，而不是增加輸入品的需要。要解答英國在二十世紀的經濟制度上爲什麼不能繼承自由貿易政策的問題，這就是主要的理由。

英國農業之前途 假設英國的消費力要跟着工業生產力的增長而擴增，而不要增加對輸入品的需要，那末，英國生產體系的平衡，就必得有激烈的變更，特別是英國必得減少其對於輸入食物的依賴，而在國內增加其食物供給的生產。現在很多人都主張這個意見；但主張這個意見的人，多有一個錯誤的思想，以爲英國食物的供給，在小麥方面要得太多，在其他消費品方面要得太少。英國生活標準的提高，將不會增加小麥的消費；在實際，需要由麵包轉到其他較昂貴的食品，小麥的需要，還會進一步減少。英國對於小麥的生產的條件，遠不如加拿大、阿根廷、俄國那些大穀物產區。她既能以廉價購買外國的麵包材料，在國內自沒有擴張小麥產區的理由。至肉類，特別是臘肉、牛乳產品、蔬菜水果一類食品的情形，却很不同；生產標準一旦增高，對於這些食品的需要必然會大量擴張。而且，只要英國

的生產與分配都比現在有更好的組織，這些食品一定能在英國有很好設備的生產條件下，以同類輸入品的價格生產出來。

因此，英國的國家經濟計劃，首先是關於基本工業之改造，主要為國內需要的新工業生產的創設，與購買力分配的平等增加；其次是國內農業生產的大發展，與入口食品量的限制。但是，在基本工業上的改造，必得以完全社會化去完成；而在農業上，國家大體也許只取得國內的與入口的產品的貿易獨占為滿足，至實際生產的行動，則交給個人的農民。假若政府施行一種積極的政策，一方面為小農提供小保有地，一方面給失業者以充分的機會，使選擇並實驗其最適宜的土地上的工作，那定然會有增加農民數量的可能。英國對於大規模工業化農業的任何一般的採用的條件沒有成熟。在土地利用案 (Land Utilisation Bill) 之下，就曾經作過細密的考慮，這種耕種形態，是大可試行一下的；不過，大部分土地要由國家來直接行動，那却不在實際政治的範圍之內。

但是，爲了要賦予國家以權力，使其爲國家的農場與爲失業者的小保有地，取得適宜

的土地，而沒有什麼爭論；同時且爲要賦予國家以權力，使其通過租地契約的允許，把農民採用的生產諸形態與方式，作一個更有效的統治，這是對於國家需要土地的完全所有權的一個很強有力的理由。在稍後的階段，英國集體農場無疑是要實行的；但在農業繁榮復活的第一個階段，是土地的公共獲得，與農業生產品貿易的公共獨占的建立。

第八節 金融統制

顯然的，英國要澈底實現這種國家計劃的概念，不把全國的金融機構掌握在國家手中，是決計不行的。這是很明白的。英國勞動黨早就主張英格蘭銀行社會化，而現在該銀行是以獨立的私有公司的形式爲股東所有，那是我們已經在前面講過的。中央銀行的社會化，自然可給現在的政府以調整貨幣發行及供給更多信用的權力；但其自身對於國家經濟改造的廣大的計劃之實現，還不足爲一個很充分的工具。因爲在各種請求者中間的信用的分配，不是中央銀行的事務，而是那些合資銀行的事務。用完全社會化的手段，把這些

銀行置於國家計劃之軌道中，然後才能保證企業上之信用的有效提供，而這類企業，則是國家爲了完成計劃而提倡，而有希望其不致爲投機的或次要的活動所消耗，致擾亂其整個計劃的平衡的。

我們講過，國家對信用的統制是決不可少的。在英國銀行體系之下，多數銀行只通融短期的信用，而這些短期信用，則是爲了接濟工業生產上之青黃不接時期的。它們不以大規模的長期信用供給或幫助機廠、建造工事及其他持久的生產事業。這些事業的資本，現在是靠公積金，或靠大衆在證券、股票或產業公司、債票上的投資。我們知道，過去英國作資本準備的事業，其對國外輸出資本，要較之其應國內工業需要，有組織得多。但是，如果要實施一個國家計劃，顯然需要大量的資本，以爲國內舊工業改造及新工業發展之用；而在現在情況之下，要由公積金來供給這些需要，勢難做到。他們的供給，必然要求之於大衆手中可作投資之用的資本，或者是求之於國家本身；假若由國家供給，必定是根據以次三條路之一：第一，國家向國民借貸；第二，國家向國民徵稅，以圖準備資本與應付當前支出；第三，依

銀行制度的手段，創造貨幣——就是說，用一種通貨膨脹的方式。這三條路中的第二條路，不能適用於任何較大的規模；因為國家由徵稅所能獲得的一切收入，都要用以應付其經常的支出——若徵收遺產稅，把遺產稅得來的收入當作資本，當現在工業所有者死去時，其工業即轉移其所有權於國家；遺產稅能增高到這種程度，其收入當不只供應經常支出。但這種方式的應用，也有限制；假使遺產稅遠較現在為苛重，那國家如果要堅持賦稅以現金付納，就不可能，她必得接受債券、股票以及類似的所有權的券據，國家得到這些券據，只好自己保留起來，而不能投諸市場以引起破壞其價值的必然結果。

投資的公共統制 因此，需要的資本的大部分，就必得直接由公眾手裏可作投資之用的基金的投出，或經過國家，或通過銀行體系去借貸。在可能範圍內，充分採取這些方法的第二種方法，當然很好。我假定，在國家計劃之下，社會化了的工業，為輸入局（Import Boards）或國家商務局（State Marketing Corporations）之類的團體，將組織自治的團體，而在他們自己之間有相互聯合，關於政策方面受國家統制，而讓他們自己進行他們本

身的煩細日常事務。這些團體得允許其直接向公衆借款，國家對其利息與本金的擔保，可要不可要；或者僅對於利息作一定年限的擔保，這個方式是採自中央電氣局（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及其他有公共法團性質的團體。或者說，這些法團可以用借債或預墊的形式，向國家取得資本；在這種情形之下，用國家投資局（National Investment Board）或其他同樣的團體的手段，國家可向公衆借貸其欲借給或投資給其統制下團體的額數。這些方法中沒有理由去選擇好壞的。要從他們中去選擇，只有看便利的情形如何，就每種特殊的情形作分別的決定。自然，一個國家投資局得以使用現存公款及從投資者借款再出借給公有企業之權，那是國家經濟計劃的任何設計中的最主要部分。

假使投資者害怕將來的社會主義而拒絕借錢給國家，那怎麼辦呢？假使那些投資者，有充分的自由去使用他的錢，不論他使用在國內或在國外，那他們是很明白的要阻礙任何國家經濟計劃的實行。國家就不能實現她所用來求國家經濟生活的平衡的理想。所以國家在開始一個很嚴重的經濟計劃的政策的時候，必得有完全的權力去統制資本的投

資，不僅是國外投資，國內投資也一樣要加以統制。倫敦市場資本的發出，必須得到國家的許可，或者通過一個視同顧問代理機關的國家投資局。

但是，即使是這樣做，投資者也許會拒絕借錢給國家，甚至於像現在恐慌期間許多投資者所做的一樣，他們寧願懶散的存給國內的銀行，用以從事海外任何形式的生產企業。對外貿易的國家統制，自然會阻止他們把錢流到外國去。因為，金鎊的逃避，對國家金融與整個經濟體系的安定，顯然是一種威脅；阻止金錢的外流，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但阻止的結果必有一大部分的金錢留在銀行裏沒有用處，這時，政府就可用它的權力來利用這些無用的錢來填充，並由銀行代理者來創造新的貨幣。這種貨幣的創造，不會得到通貨膨脹的結果；在這些貨幣只用來補充那些資本所有者不肯投作生產之用的財源的限內，它却只能有阻止人爲的通貨緊縮的效力。因此，把銀行存款當作資本來利用，在通常的時候雖是一種危險的方策，但却是對付投資者罷工的一種必要例外的手段。並且一個努力進行廣大的國家經濟計劃的國家，一有必要的時候，她就應當毫不遲疑的採用這種方法。

第十三章 世界的展望

第一節 第一個途徑——資本主義的復興

現在，在這空前無比的世界不況的前面，世界對於它的出路感到猶豫與懷疑。有少數的人還只是信任「上帝」，以為這恐慌可以由它自動的結束，而且會自動的產生一個新的繁榮時代，這種意見是不值得注意的；因為從這本書所分析的看法，貿易衰落的原因，是太深了，聽天由命顯然不是一種可採的態度，世界是需要以積極的方法把它從現在貿易衰落中拯救出來，使之轉到繁榮大增的景況，那時人類始能控制着自然。但是這些積極的方法是什麼呢？現在還沒有什麼結論，主要的是因為在基礎論點上沒有一致。

廣泛的說，我們前面展開了兩個途徑。第一個是資本主義制度再造的企圖——而其方法是把每個國家國內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顯然不當的措施加以撤毀；把過去的錯誤

尤其是大戰的遺產，盡可能的加以清算；更借助於金融與產業事情的更開明的處理，以努力匡正資本主義使購買力落在生產力膨脹後面的趨勢。另一個途徑，是承認資本主義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對於生產力之發展曾經有過貢獻，到現在它的作用已經死了；所以今後不能不以一切可能的速度，對於改造的集中的有訓練的努力，在與資本主義不相同的思想上，不相同的人類動機上，建設起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秩序。這兩條路中，那一條路將為這世界所決定採用，現在還不能確定，並且在現階段內，也實在不會一致採用那一個方法。俄國已走定了一條路，美國走另一條；在這兩個極端之間，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動搖着，感到不安，努力於決定她的意見；因為其疑問不能解決，很尖銳的感到內部的分離。讓我們盡可能的在這最後一章裏，把重建這粉碎了的工業機構的兩種方式的一切，弄個明白。因為我們要來把各黨派中人的紛爭解決是沒有希望的，但至少我們可以把論點弄清楚，然後可以使得各人自己所需得的結論簡單化。

我們現在且把以另一體系來代替資本主義的一切企圖放在一邊，而專注意於想把

資本主義體系更堅定的站起來的一切企圖上面。要指出爲資本主義復活的必要的條件，必得要把它的障礙簡單說明一下。這些障礙大多數是大戰與議和的遺物。因爲，假使一九一四年沒有大戰，資本主義至少在大多數國家內仍然有其相當的功效。而社會主義運動則必然會在到處成長得較之一九一四年爲強；但是在大多數國家內，不會——無論如何在俄國不會——真正達到取得政權的程度，就對現存秩序的嚴重的威脅也不會有。資本主義誠有它全無關戰爭的困難的基本原因（這是除開戰爭自己是那些原因的產品的意義來講）存在，但是如其沒有戰爭，使資本主義解體的力量，就必定進行得緩慢得多，並且到現在也許還不會達到這樣一個局面，給世界擺出兩個敵對的經濟制度，使作明白的直接的選擇。因此，我們可以首先來考察那些由戰爭與和平條件直接形成的那些世界資本主義的困難；然後我們再進一步去分別考察那些不平衡與衰落的基本原因。

大戰的遺物 第一，戰爭的本身就引起了世界貿易的大紊亂，以及交戰國與中立國經濟體系平衡的破壞。它給那些戰爭直接需要的工業以很強的刺激；而把那些主要供

一般平民需要的工業拉向後退。這使每個國家國內生產的性質，引起大的變動；那些一向倚靠交戰國出口的大部分製造品的區域，亦盡其可能在它們自己的領土內刺激製造業之發展。戰爭使得交戰國的人們，都毫不費事的習於考慮幾百萬幾千萬的數字，並習於把經濟問題看作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不必要怎樣顧及其生產的費用，只把需要的商品，生產得越快越好，越多量越好就行了。戰爭使世界以臨時應急的組織方法，對工業作極大限度的集中統制，致其生產貨物之總量，遠過於戰前世界的生產水準；但是這些增加的生產品一經造出來之後，大部分馬上就毀滅掉；致使新資本的大部分，是用以創造那些在戰時才有價值的資產，一到政府不再需要保持那樣大的軍隊，不再需要川流不息的軍器、哈噶呢（khaki）以及其他用之於作戰軍隊的軍需用品時，它們的價值也就大大的低落了。在大戰的那些年間，世界生產上的努力，表示出了人類控制下的異常龐大的生產力。因為，那時交戰國的大部分人民，儘管完全離開生產工作，全產品的大部分，儘管是用之於純破壞工作，但在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八年間，世界大部分的人民，還繼續過着比戰前消費標準高

的生活。大戰實在提示了一種現象，使人相信人類指揮自然的大長進，與生產品之大量增加，使國民生活集中統治在到處成爲可能。

回復戰前狀況之企圖 當世界要從戰爭回到和平的時候，當戰前『通常狀態』

(normalcy)之恢復，成爲到處當政的政黨的口號時，困難就來了。因爲在已經變動了的戰後世界經濟情形下，要回到戰前的『通常狀態』是不可能的事。那些戰前需要貨物輸入的國家，戰時她不得不自己生產那些貨物，決不能要那些國家把她們的新興工業完全破壞，而回復到戰前的供給方式；而從戰時生產系統到較適合於和平時候的系統的轉變，却又受了不了解戰後世界市場的影響。她們不努力去建立那些適合戰後世界新需要與新市場環境的工業，每一個老的國家，却都儘可能的求訴於她們在一九一四年前占過地位的那些工業。而戰後曇花一現的繁榮，更增加她們對勝利的誤信。因此，在老一點的國家中，初期的產業再造的工作大都是走了錯誤的路。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間，費了極高的費用以創設的新工業的設備，一到戰後繁榮崩毀，多數都成了無用之物了。

因爲，卽或除開給與中立國製造發展的刺激來說，戰爭與重新劃分世界政治疆界的和約，也使國際貿易環境有劇烈的變更。歐洲的政治疆界，爲了德國的分割，奧匈帝國的破裂，以及由戰前俄國領土分出來的新邊境國家的創設而特別延長了。在世界經濟組織進步到需要更大的自由貿易的區域的時候，和約却給全歐洲突然增加許多小國。每一個這些小國，都儘可能的使她自己成爲一種自給的經濟單位；她們所努力培育的大多數工業，儘管其國內市場不致收到大量生產之經濟的效果，但他們多不管這些，一味在環繞其政治疆域的四周高築起關稅的壁壘。那些舊來輸出國家的販賣市場，大部分都被那些新關稅障壘以及其他類似的貿易障礙給她們關起來了。但她們要在進步的技術的基礎上再建起她們的經濟體系，又只有她們能大事擴張其製造品的出口才能進行得很經濟。因此，世界接着就引起大輸出國家間的生死的競爭，自一九二四年開始合理化了了的德國重新加入世界市場之後，此種競爭情形，乃更趨激烈。在此競爭中，最容易獲得勝利的方法，就是貨幣的貶價，或儘可能的降低工人的生活標準。

戰債與賠款

假使國際貿易單是各國間的剩餘貨物的交換，其情勢已經够壞了；但在事實上，爲了各國間新債務的交錯網的存在，事體乃更弄得紛亂與糟糕。協約國（Enties）對同盟國（Central Powers）所要求的賠款，和協約諸國相互間及其與美國間的戰債，那是債務中的尤爲可怕的債務。而戰債與賠款之上，又加上戰後再造時期舉借的別的國際債務，那些欠債國，沒有出口貨的剩餘來還這些債，如非那些債權國借錢給他們來還債，她們是無法償還的；而且，她們將來要希望由輸出剩餘以償還債務，勢必要向債權國多多借債，來發展其爭取出口市場的工業。本來和約的結果，國際債務的負擔已夠繁重，何況在再造這些年間還有所增益；由是，新債之川流不息的由債權國向債務國的增流，就顯然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繼續安定之一條件。那些重壓在債務之下的國家，乃拚命擴增其輸出，拚命減少其輸入；這種趨勢，自然要加強世界市場上之貨貨競爭，而使債權國方面採取提高關稅的報復手段。因此，在世界貿易衰落的前幾年中的平衡，乃異常動搖不定；因爲那時債務的負擔，儘管已經夠頭重腳輕，而其平衡的維持，仍然大部分靠着繼續的國際借貸。

金、通貨與信用

這情勢已經够壞了，但各國通貨的安定運動的成功，却使這情勢更壞。這些國家差不多普遍的回復到金本位，那誠然使她們貨幣的相對價值得到了一些時的安定；但她們所付的代價，却是使批發物價的世界水平繼續低落。因為她們要維持金本位，她們就得依靠其取得充分金量，並在其銀行體系中保存充分金量的能力。但是她們必得付還債款，在她們不能且不容許以貨物向債權國輸出來還債的限內，她們要保存黃金充分數量，就成爲不可能了。沒有輸出的贏餘，金子就非由債務國流入債權國不可，不然的話，就要債權國繼續向債務國投資。因此，由此種債務關係所引起的，即使不是全世界金供給的缺乏，無論如何，是在各國間之供給分配的不妥。這種分配的不妥和金的絕對缺乏，同樣會壓落世界物價的水準。因為在債權國銀行體系內過多的金子大部分是不生產的，所以對價格沒有影響。而價格水準的決定，却在那些缺乏金子的國家的貨幣狀況。但是，價格水準的跌落，到處的債務的負擔，將照同樣的比例增加，這種情形加重了向來的種種惡傾向，而使金子加速的流入那些大部分不生產金子的國家，信用在那些缺乏金子的國

家很利害的受到限制，而關稅則在債權國與債務國一樣的增加。

戰後債務與物價

早前在戰勝國有一種預想，以為由賠款的方式可以從德國取得一宗鉅款，但事隔不久，全世界都認識其荒謬了。凡爾賽的政治家們，即使不知道將來德國事實上只能訴之於以貨物還債之一法，大多數有識人士一到感情冷靜，可用冷靜的頭腦來思想的時候，自然就會明白的認識這個事實。但是要人們能像認識德國賠款的真正前途一樣的認識其他各種國際債務的前途，那却不是一時能辦到的事。同時，過於信賴其金融力的英國，曾與美國特別訂定完全以金圓償還其戰時債務的協定。這個協定實是一個可怕的災難；災難云云，不僅是因為給英國增加了一項重負，尤其是因為使大英國也站在繼續勒索德國賠款的這一方面，她不向德國勒索賠款，就不足以繼續清償對美國的債務。在當時，別的國家與美國解決債務問題，對於償還債務的困難，有一種較好的諒解；法國與意大利對美國與英國的債務的大大減輕，那是人所共見的。同時，在一九二四年道斯計劃 (Dawes Plan) 之下，德國的債務雖會實際減輕許多，但仍然超過了她的償付能力。在

某幾方面看來，道斯計劃的建立，實際反使情勢更加變壞，因在德國情況的假定安定之後，即因經濟生活之再造，而繼之以大量新債務的增加；由此，在此後數年中，德國不但沒有減少，却反迅速的增大。最後，就有一九二九年的楊格計劃（Young Plan）出現，楊格計劃表面雖是以繼續減輕德國的債務為目的，而實際上却得了增加其債務的結果。因為道斯計劃規定在物價低落時減輕付款，而楊格計劃却忽略了這一點，所以在楊格計劃下所應付的總數就很快的變得比保留道斯計劃規定所付的額數還大了。

戰後關稅的提高，以及國際債務負擔的積累，立即造成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之下，世界貿易要順利進行，就頗感困難了。前面講過，在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間，歐洲曾表示了很大的復興的力量。生產與貿易同樣增加了；這一來，歐洲更增加其信心，以為戰後的困難不難克服。但這裏有兩件事，足以致歐洲再建的勝利的死亡。第一是物價水準的跌落，由金子分配不當所演成的限制信用政策，更使這種水準的跌落加甚。第二是歐洲要依靠美國的不穩的借貸來維持歲入歲出的平衡。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的美國繁榮，使

美國停止這種借款，美國停止借款的直接結果，就是使歐洲的存金很快的往外流動，致使歐洲市場上的財政與經濟狀況，變得更加紊亂。在這種極度的惡劣情形下，美國亦陷於不況，美國不況很尖銳的影響到她對於世界市場的需要，由是歐洲以外的國家也立刻拖入這災難的圈中。因為那些專靠食品與原料出口的國家，亦多半是債務國家；她們現在突然感到對於她們的出口貨的需要因美國購買的縮小而忽然衰落，同時他們的債務，却因物價的低落而更變嚴重了。就因為這樣情形，所以在一九二九年華爾街（Wall Street）衰落之後，賴債的事情，乃不但很快的在歐洲發現，至少也同樣發現於澳洲、南美及遠東，因為那些地方除了這一般的惡劣情勢之外，又還加上其銀價對金價慘落的困難。

所有這些災難，雖然有些在戰前環境中就種下了根，但至少是在衝突加緊的關係上，我們很有理由可以視爲是大戰之經濟的結果。第一，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戰爭顯然是一個完全的錯誤。因為，即或戰爭可以產生打倒戰前敵方帝國主義的結果，但在經濟的意義上，勝利者和被克服者無疑是一樣的要蒙到損失。就大英帝國說，或者至少就不列顛說吧，戰

爭過去了，她儘管獲得了大批的領土她現在的情形，却要比她沒有經過戰爭的現在的情形，壞得多了。就在法國，儘管她增加了財富，與其現在據有歐陸上的優勝的地位，但她當作主要目的而追求的安，全却沒有得到保障。美國似乎可以算是戰爭的純勝利者。但在她內部的錯綜問題上，她也發現她自己受了世界不安的拖累。

國聯的弱點 假若在經濟上走上戰爭的道路是錯誤，那在跟着敵對的路線而來造成的一種和平，也難免不是錯誤。奧匈的破裂與橫斷中歐的一羣新的完全獨立國家的創造，對於正需要較大的經濟統一的世界，是一種經濟的危難。新國家的創設，在民族主義者的見地上，未始不是振振有辭；而且到了某種限度，還可說是難於避免的現象。但這裏有一種事實，就是戰爭的結果，把民族主義——即日益變為不合現代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的民族主義加強了。因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得是自決的與完全主權的；這種概念的具體表現，不可避免的要抬高各國領土上的新障礙，而這些領土，則都是期望經濟統一的。國際聯合會（League of Nations）之創立，對於這種建立在主權

國家增殖基礎上的民族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非常不相稱的均衡，因為，國聯一直到現在不能不在國家主權概念所樹立的限界之內工作，它不能超越國家的疆界，實現任何有效的統一。國聯實在是對敵的國家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間之遊戲，爲了害怕列強中會有一個拆它的台。它甚至由約章授予它的權力，也不敢輕於使用。有些較小的國家，特別是斯干的那維亞諸國（Scandinavians），對於國聯的努力，非常認真，把它當作真是國際合作的一個工具而使用它；但她們的努力，是絕少結果的。國聯主要當作一個代理機關來搜集並散佈有價值的消息，並在較小的程度內，當作一個在各國間創造國際主義的公意的工具，那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son）想使美國參加國聯之失敗，破壞了國聯超出歐洲爭論的許多機會；同時由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勝利所引起的恐懼，不斷的威脅它，使它變爲一個保持現狀（status quo），防阻社會主義的可能侵入的工具。對於在歐洲以外的大多數國家，國聯的意義更少；對南美，它主要是一個加強她們對合衆國獨立的工具；在遠東，因爲它對滿洲與上海危機之處理，很難鼓勵遠東諸國把它當做一個世

界大事體上的可認真的元素。國聯實在仍然是一個很微弱的東西，要使之加強，則更引起困難，因為它大部分是努力以一切不妥當的和製造困難的處置，來保障一九一九年的和約的。

歐洲經濟之糾紛 和平條約一經訂定，要解除是非常困難的。歐洲的新疆界雖然再不妥當，但現在却不能依據戰前歸屬的任何情形來重新劃分。假使歐洲要建立較大的單位時，勢必以諸新國為活動基礎，且致力於她們之間的合作。但就我們所知道的，這就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因為任何兩個國家傾向統一的接近，馬上會引起一種國際的很危險的嫉妬。這在一九三二年企圖解決多腦河諸國（Danubian States）的困難的當中，已經是很清楚的看得出來的。這些國家，或者說她們中間的大多數國家，很明白的應當更進於較密切的交互的經濟親睦，把現在存在於她們之間的高關稅障壁打破。但在她們間建立一個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的建議，立刻就引起很強烈的反對；因為東歐的農業國家，是德國很重要的市場，德國害怕任何包括捷克和這些農業國家的關稅同盟，會使這

些農業國傾向捷克的工業家，而排斥德國的製品。意大利也害怕她會被排除於東南部歐洲市場之外，和在她的北境上創立一個在法國主盟之下的諸國的有力同盟。就因此故，意大利乃與德國聯合反對多腦河流域諸邦的團結；但在德國方面，因為她要與奧國作政治與經濟的同盟，而又為法國所反對，所以其地位更加複雜。這些國家——德與意——並不否認團結之需要；但是她們切望一個更廣大的範圍，以便把她們自己也許連法國都包含在這建議中的關稅同盟或關稅相互降低的範圍之內。但是這個建議既然這樣放寬了，當着這樣多的利益不同的一羣要來考慮與團結，自然變成了不能解決的困難。因此，關於歐洲的更密切的團結，雖然有過許多談判，但事實上毫無結果；在多腦河諸國之破產與停付債款之後，總崩潰就一天一天的成了更直接的危險。

我曾經說過，和平條約把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和暫時地薩爾 (Saar) 煤礦劃給法國，德國重工業的統一經濟區已砍掉一半了。德國由此推到新境界的一面，而法國則在另一面，她們努力去發展兩個各別的自足經濟體系，她們兩者分別成就的效果，

都不及她們當作一個單純經濟區中的一部分所能成就的那樣多。但德法的政治的敵意，對於任何經濟合作企圖，都爲堅固的阻礙，像大陸鋼卡特爾（Continental Steel Cartel）的組織，那算是一個離開政治敵意的例子，但在大體上，德國與法國仍是政治與經濟的敵手，她們彼此對於歐洲大陸的事情，都在各國增強各自的地位與勢力。同時，英國却很不安定的在參加歐洲問題和把帝國建立爲一個堅固的經濟單位之間動搖。英國雖不屬於歐洲關稅同盟，但這個同盟對她太重要了，她不能毫不措意；但要她參加任何歐洲的協定，這類協定對於她和帝國諸邦之間的現存的最惠經濟關係，將會予以破壞，這也同樣是不可隨意處斷的。

恢復的條件

從上述的種種情形看來，大戰所留下的困難，與和約所增加的新困難，遂成了在安定基礎上改造資本主義企圖的可怖的障礙。可是，如果認真要作改造的企圖，其所應當做的事體，也不難加以說明。第一步，很明白的是各種國際債務問題之全般的重新考慮，那不但包括賠款與戰債，也包括公的私的新債，這些新債是戰後積起來的，因爲

物價跌落，這些新債亦膨脹到了欠債國完全不能擔當的地步。假若這問題非處理不可，也許得分階段去解決，開始努力解決賠款問題，從賠款到戰債，然後輸到一個更寬的問題，就是其他國際範圍的公的與私的債務。也許不會是德國沒有任何付款的經濟能力；問題是在怎樣減輕德國的其他債務而創造世界貿易復活的环境。但她現在沒有任何付款的能力，或者在她別的債務沒有修改以前，或者就修改了，而世界貿易衰落還是依然如故的時候，她沒有任何付款的能力却是很清楚的。即使將來有個時候德國能重新付款，但爲了這個假設的無定期的將來的小規模付款，而繼續課加德國以戰爭罪過的懲罰，使德國人感到深惡痛嫉，那對於債權國是否真的值得，是不言而喻的。從純經濟見地來說，不論德國將來有無再付款的能力，完全勾銷這賠款的理由，是很多很多的。

戰債的將來 假使賠款的問題要單獨來考慮，對於完全勾銷的方策有什麼機會可以得到一致的意見呢？那可說是很少的；因爲，那些有取得賠款希望的國家，若非她們至少可以看到她們自己和美國間，能廢除她們自己對戰債的付款，她們是不會願意完全把

賠款廢除的。即使英國和美國完全把戰債勾銷，對於完全勾銷戰債，也不見得就容易得到一致的意見；因為法國在這種情形下，把賠款的收入與戰債的支出比較起來，她無論如何要在紙上受到一大犧牲；雖然她們至多承認沒有取得揚格計劃下之全部債務的希望，但她們在現在沒有一點願意犧牲的表示。可是，這第一個障礙如不能順利的克服，以便恢復一個健全的國際關係，那其他的困難就沒有可以除去希望。因此，讓我們來假定（雖然這是一個很難的假定）賠款的勾銷已經一致同意了，這所謂勾銷，無論是一概抹銷的絕對協定，或者不能做到這點，而是一個長時間的延期，長到使人人認知事實上付款永不會恢復；那末，第二步將是什麼呢？

在戰債的問題上，顯然要談到美國了。廢除了德國的賠款之後，歐洲各國要向美國來談戰債的完全廢除那會比現在的情形好多了。不過，假若歐洲各國不準備貢獻些東西作交換，美國也不見得會採取接受的態度；這種貢獻，如我們在本書前面講過的，必得包含一種實質的裁減軍備的方策，以保證這筆放棄的債款不用以從事新戰爭的準備。裁減軍備

和戰債的廢除是絕對關聯在一起的；但一九三二年的裁減軍備會議的進步對於歐洲各國之裁減軍備，並沒有增進多大的樂觀。事實是這樣，假若她們沒有真正在經濟上合作的決心，她們決不會作裁減軍備的準備——而走向真正經濟合作的初步困難情形，我們已經知道的。但是讓我們假定（雖然這是很困難的假定）裁減軍備已有頗大的進步，當作真正經濟合作之初步障礙的歐洲現存關稅壁壘或其他貿易限制，已經減輕了，在這種情形下，要美國完全放棄戰債那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美國的納稅者雖不免要擔負歐洲所交卸去的負擔，但美國從歐洲信用環境之恢復所獲得的，將遠較其增擔賦稅所失的為多。而且，她也許不願意拋棄歐洲所該她的債務，而寧願減低關稅，以便使歐洲有償付的能力。她必定會取這兩者之一而為之；因為若非她打算大大的降低關稅，她必得放棄歐洲的債務，不然，就得承認歐洲不能付款的既成事實，而緘默的讓她們拖延下去。

美國海外投資 但是向美國要求的讓步，不能僅止於這一點；因為自大戰以來，投到世界上的極大部分的資本，是美國的，假若要實現世界的復興，那些把大量資本借給外

國的國家，尤其是美國與英國，是必得要同意於這些債務的削減的。這是實在的，除了少數例外的情形，假若復興的結果可以用其他方法來達到，則減輕別種債務的需要也許可以避免——這就是說，假若能再採取有效的國際行動，使世界物價水準提高到債務負擔還可忍受得住的程度。這也許是較容易的途徑；但過去的每一個月，在各國政府與各國中央銀行之間，沒有有效的去提高世界物價水準，這使這種工作更難進行。也許就現在世界的力量來說，要再把物價提高到無須重新酌量債務的程度，實所難能。那末，這裏就只有另一途徑，那就是債務國普遍的賴債。到了最後，或者兩個方法都得應用：債務的重新酌量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也會以國際行動去提高物價以避免減輕的必要。

世界金融的統一——提高物價的國際行動，不僅要世界各國政府間的密切合作，且要各國中央銀行間的密切合作，同時中央銀行且得與各國政府緊密聯繫，而當作一種國家政策的工具。在這種意義上，這就是一種世界銀行制度的實行統一，而不要藉助於一種簡單世界貨幣的創造——因為在這個階段，還不能談到此點——甚至不用普遍的回

復金本位制——因為這不能達到我們期待的結果，不能使世界物價提高到相當滿意水準，却還會使通貨更進一步的萎縮。世界銀行間的合作，必得依據提高物價的合作計劃，以增加貨幣流通的總額，與允許一切進行經濟改造國家間之信用的更自由的移動，以促成物價的提高。至關於此事之實行，必得國際間的一致動作，必得各國協同並進，要這樣，才能夠避免交換價率紊亂所惹起的他們的交互關係的失錯。但是各國中央銀行如非當作政府政策的工具而工作，各國政府如非採取有效的行動，以保障這增加的流通貨幣實在是用之於經濟企業的發動，那就無法使那些中央銀行在一起工作。每個國家採行政府資助與政府保育的國家發展政策，那是提高世界物價水準的努力所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們已經講過，政府對新貨幣如非準備一種出路，照商業界的現在情形而論，這大部分的新貨幣必會轉到銀行手裏，差不多一發出馬上就變為死的貨幣了。由政府經濟行動之範圍的擴張，把社會主義的方式大量地注入於經濟體系（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系），這是要使資本主義制度重新穩定的任何有成效的企圖所必不可的。並且即使資本主義可

以像在這一章裏所畫的輪廓的方式而復活，那也不是舊的資本主義，而是一種過渡的資本主義，在其結構中有大量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的成分。

獲利之果報

我已經把世界資本主義復興的那些情形討論得差不多了，他們主要是去彌補戰爭與和平的經濟上的惡果。即使和平的惡果可以很有成效加以處決（這也許可以由企業信心的復活，而恢復暫時的繁榮），但在這本書裏面所論斷的假如不錯，任何安定的繁榮的確實恢復是決不會實現的。因為從繁榮中產生衰敗的這種資本主義的內在傾向是仍然存在着；即使世界的改造是奠基於較大的經濟諸單位上，是奠基於債務的清算上，而這清算可以使商業得一個新躍進，但除非能採取有效的步驟，使消費力膨脹到充分的限度，這種躍進是會很快的遇着障礙的。因為在現在不況時候，世界生產儘管低落，而世界生產貨物的能力之增加，却遠超過從前，所以，商業信心一經恢復，貨品會有龐大的增加，投資範圍亦會演成經濟制度史上空前的擴大。在這種情形之下，假若工業生產品的分配仍然是依照一種比例，即依照一九二九年世界恐慌以前的繁榮期中的資本與

勞動間的分配的比例，那末，在不久的期間，世界就要遭遇一個新恐慌，那和前一次恐慌完全一樣的壞。這時，若圖維持短期的安定，只有由更進步的工業國家借出鉅量的債款，這一來，債務的負擔，將再度堆積起來；工資不能提高到適當的高度，勢將產生消費力的缺乏，很快的使許多新生產工具不能用之於生產利潤。

即使世界繁榮有一個時期的恢復，但要按照生產力擴張的速度來提高工資率，在大多數國家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她們仍在競爭的制度內進行工作，她們銷售的能力，仍是要靠她的生產費比較其競爭國的生產費為低。但是我們講過，生產費的壓低，多半要靠工資的壓低，工資在大多數企業的生產費中，是一個最大的成分，就在合理化以後，也是如此，並且在雇主看來，這是最容易着手的部分。在繁榮恢復的環境中，工資不但沒有照物價提高水平的比例而提高的可能，且也沒有照全世界生產總量增加的比例而提高的可能。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別的國家先把工資提高，然後再來提高她自己的工資。不然的話，她怕會失去她的市場。因此，在工業生產力的對比上，工資率降低的傾向還依然強有力的存在着。不

但如此，繁榮一經恢復，工業上的新資本隨即有大量投資。而這類投資的大部分，將會使用來備置機器，以代替人工的勞動。即使工資率能充分按照物價提高，而全部工資仍是傾向於減少；合理化的效果，減縮了工資雇傭的範圍；工資提高的速率，應當要在此點上能夠予以補償。顯明的，如非成立一種國際協定，那是決不能在這種限度提高工資的。因此由國際行動來提高世界物價水準之後，必然要繼之以提高工資的某種國際的協商。

國際工資的規定 但這件事也是不容易實現的。在戰後一九一九年的短期繁榮中，各國代表曾集議於華盛頓，同意起草一個限制工作時間的國際協定，限定在一切工業發展國家，其工作時間八小時，並且對遠東各國，也規定其對工作時間的實際減低。這個協定在國際勞動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開始會議時一致同意了。但是到十三年以後的今日，世界主要國家的大多數，還沒有實行。英國沒有接受它，法國沒有，德國也沒有，——美國也說不上——。這種事實，似乎是對於要實現國際工資規定上的更困難更野心的計劃的一個不良預兆。

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一天總是二十四小時，所以在技術上由國際協商來限制工作時間，那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工資標準是極多差異而且極難測定的——我們將就工資率來測定呢，抑或以勞動者所賺的工資額來測定呢？是以我們的標準貨幣工資去換成金的統一的通貨呢？還是有關係諸國以實際所付的貨幣工資的購買力去估量真正工資呢？或者不管這些工資率的差異，至少有一部分是各國生產率差異結果，而立意予以廢除呢？要統一切國家的工資率，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若不是這樣做，將以什麼為標準呢？現在且假定，走得通的路，只有以各國現存工資為基礎，由國際商同規定一個一般增加的百分率，至關於特種事業，則附以國際協定所決定的例外與變則。

這一類的任何計劃，必然會碰到以次兩者的強烈打擊：一是那些覺得其工人階級沒有爭價力量的國家，便以為她能由此攫取競爭上的利益；其次，是一切國家的資本主義當事人，都不願意把國民收入增加的部分轉移到工人方面去，並且，他們仍然不相信由工業生產力增加所抬高的工資，是繁榮的一個條件。但是，提高工資率的某種協商如果失敗，世

界資本主義的復活，那只是短命的繁榮，或者是另一個衰落的序幕。

時間的原素

凡屬我覺得是重建資本主義之任何真正企圖的主要條件，我都已在上文力求簡潔的畫了一個輪廓。但是當我寫下我的意見時，我自己是很知道——讀者無疑亦很知道——其中每一項的實現，都不是沒有可能——也許實行採取時，很感困難——但整個資本主義改造的全部綱領，却包含了這許多困難，且會招來這許多國家的與部分的既得利益的敵對，以致對於整個綱領的採取，似乎是極不可靠，與極其迂遠。在這方面也許是我錯了；說不定，世界資本主義的驚恐，現已迅速的到這樣的程度，在最近的將來，資本主義國家會採取她們現所未聞的激烈的步驟。在另一面，也許我對於資本主義改造所需的變化之大，作了過度的估量，也許資本主義還能來更延長些時，而不至於崩潰。所有這些必得留給讀者去判斷；但是，我想我不妨這樣說：不管我對於必要的方策，及世界對於採用那些方策的準備所作的估量是過高了或是過低了，時間總是一個主要事情。無論要做什麼，只要是做，就得早做。假若那些國際的會議與協商的滯慢的機構，是為要利用任何

成功的機會的話，那就必得大大的加快起來。我們早在前章講過：一九三一年的胡佛的延緩債務宣言，如遲了幾個星期，就會喪失它的功效；而且，比這更真確的，就是，世界如要進行改造的積極工作，它必得很迅捷的並在很廣的範圍內同時並進。國聯一直到現在還是那樣一個笨重而延滯的工具，那固然非大大變更不可，就是國際合作的新方式，亦必得很迅速的改進——其迅速的程度，要像人們在大戰期間所表現的一樣。

第二節 第二個途徑——資本主義的革除

還有一個途徑，是我們現在要注意到的，那不是資本主義的改造，而是很快的樹立別一種制度去代替它。在本質上，俄國是作了這種解決。不過，別的国家將待採取的形式，與俄國已曾採用的形式，會有絕大的差別。當一個人看見資本主義制度之有效重建的障礙之大，而各國一向向這個目標的努力又是那樣可憐的微弱時，他必然就會這樣嚷叫起來，滾吧！那些資本主義的債務，關稅，貿易妨礙，國家主義的與帝國主義的敏感與敵意，各國的階

級與階級間的內鬩，一切都給我滾開吧！讓我們把這舊的壞的世界的一切遺物肅清，而努力於較好的工作，創立一個在人與人與國與國間通力合作的精神上的一個清明而單純的世界。

假定我們就這樣說，但是對於這個工作，我們怎樣動手呢？怎樣動手來做改良現狀的工作，是我們容易知道的——雖然我們也許認識這工作是困難。若我們大下決心，以爲舊秩序已經腐化得不能修補，需要創造一個新的來代替它，那我們應當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困難得多的工作了。因爲我們都是在現在經濟政治制度的範圍中生活，而我們的一切當前的日常問題都是出於這個制度。選舉的鬥爭，大都不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選擇的較大的問題上鬥爭——因爲這種鬥爭只有到現行制度在崩潰的險界上才會發生——而是在那些小的直接事件——這對於想像與了解有限的那些通常選舉者，較易發生直接的興趣——上鬥爭。若我們努力於從先入爲主的次要問題的包圍中逸去，而要強制的把我們所生存的國家中的政治經濟生活組織的兩種途徑的大選擇的政治意識放

在前線，那我們就很容易感到我們自己是枉然在曠野中號呼，我們會覺得，我們不管好壞總可有效的做點事情的機會，是失掉了。就是像我們所知道的社會主義政黨，也覺得很難在進退維谷中找出一條路來；它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爲議會實際與選舉的急務所驅策，以社會主義置之腦後，而更集中於社會改良的直接與次要的問題。

俄國的局勢 若在俄國，要把第一位的事放在第一位，那是很容易的事；因爲社會主義者在那裏掌握了政權，而建設新秩序的工作，顯然是那些最直接的、最急迫的、乃至那些急需成就的最大的工作。舊秩序已經破壞了；沒有要補綴它而使之仍然工作的問題。成功與生活標準的提高是絕對依靠迅捷、技巧與力量，要有這三者，新制度才能很生動的進行。沒有時間給俄國去懷疑。他們是太忙了，沒有力量費在別的事情上。但在我們別的國家中，情形完全兩樣；因爲在我們之間，資本主義多少還是很響亮的，雖然它的困難逐漸增加，而資本主義所牽連的逐漸增加的困難，發生了更多緊急與直接的問題，就是要去緩和它所引起的不幸的問題。對於充分維持失業者的準備，以臨時工作的供應，去作緩和失業結

果的企圖，乃至阻止在國家節省的托辭上，使衛生教育一類社會事業陷於破產的鼓吹——像這一類的目前問題，是英國及德國的國民所不能忽視的。美國也是遭遇着同類的問題，不過她還有迅速建樹一些大的新社會事業，以與流行的災難相抗衡那種需要。當世界災難的壓迫，一天一天的變為更緊張時，政治乃日甚一日的轉在這些直接問題上了。

治本抑治標？

但是我們須知道，這些問題的解決，實際無補於世界經濟困難之出路。像這類的問題，必得就慈善事業的立場去解決；假若世界不能單純以臨時救濟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那就不應當自己欺瞞自己，以為這對於繁榮恢復有何等效力。根本需要的事體，不是救濟失業者，而是阻止失業發生；我們講過，失業是病徵，而不是病。我們無須把我們的主要努力，集中在這些眼前的慈善工作上，而必須努力去實現那些有除去這類無益的慈善救濟之需要的變革。那些完全致力於臨時救濟政策的政黨，其破產是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假使——現在我們要來考慮這新途徑了——實現資本主義的恢復是不可能，或者說，不值得去作這個企圖，那末全世界的責任，就是要馬上擔當起變革經濟制度基

礎的根本工作，一個人如相信世界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那他的責任就在盡他的可能，去克服通常男女對於基本問題的淡漠態度，並把我們時代的真正活的問題，提到政治生活的前線。現在，讓我們把進步的工業國家所應採用的政策，為那些相信世界的真正利益不在使資本主義復活，而在對社會主義制度最迅速的可能的建立的人們，畫一個輪廓。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太大了，要作一概括的提論，那於我們沒有多大的幫助，讓我們假定，如其一個英國國民持有這個見解，他應當怎樣做呢？

英國的展望 他第一步就得承認在英國的環境中，任何俄國意義的革命政策可以立刻拋開。英國的人民在目前固不需要革命，也不能以任何宣傳的功夫使他們需要革命。假若要英國的公意相信真正基礎變革的需要，靠強烈的革命的提倡是無用的，那全賴在人民之前，把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構及做法和用以實現變革的手段，可能地規劃一個最清楚的範圍。因為英國人民要知道：所提出的途徑之設計，在技術上與在管理上都要求其適當，以便實現起來沒有行不通的地方；此外，他們還要知道，在實現的步驟當中，不要通過

一個恐慌紊亂、悲慘甚至使大部分人民感到餓死的威脅的時期。

在前一章，我們討論國家經濟計劃的要素時，曾經很簡單的敘述了計劃的新秩序的諸般組織。但要說明這些組織將怎樣實際工作，那是遠過於這簡單敘述，且亦非本書所能企圖敘述的。這是那些要把這些計劃以精細的形式提出，而訴諸公意，使知其在技術上在管理上都稱妥適的人們的事體。英國的社會主義，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繼續去圖謀實現他們自己打算去完成的工作；這是他們現在的大缺點。這是他們措置失當的地方，好像他們對於現存秩序的非難之信心，遠過於他們對將來的理想。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在他們的信徒中間利用其技術上與管理上的才能。在現存秩序中，有很大部分技術上的與管理上的人，已經是站在社會主義的方面，而且樂意對於經濟社會組織的建設計劃的造成，能有所表現。這種幫助要算入很重要、很有效的作用，然後英國社會主義才可以有獲得超過片斷的競選勝利的希望——這類競選的勝利，在打算實現社會主義的積極企圖上作用很小。國家的發展，經濟計劃，輸入輸出局，國家投資局，銀行社會化，這一類詞句是什麼意思，

必得要詳細的規畫出來，而且要表現得使有智識的選民能容易了解。我不是說在這一方面一點成就也沒有；不過在這一方面顯然離充分的成就還很遠；而且積極的社會主義思想，就在英國贊助勞動黨的人們中間，也進步得非常緩慢，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英國社會主義的政策 社會主義政策之規畫，不僅是對目的的說明，而且要把達

到目的的手段盡可能的明白指示出來。這兩件事實在不能分開；因為把社會主義經濟的設計中的新制度的主要性質規畫了，在實際上，就包括了新制度的實現方式的計劃。但是，凡屬想把英國社會的主要制度，置於社會主義的統制之下的社會主義計劃，比之最勇進的社會主義政府所希望做而且即刻做的還要包含得多。所以，向前邁進的廣泛的諸階段，是必要說明的，並且還得再向公眾堅強的說明；最初的有效的方策，不是當着其餘的方策正在進行時就阻止其經濟機構繼續發生作用，以致去擾亂其餘一切經濟機構。這一點，我們曾於前章說及，這在大體上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當着手時，要把一切主要諸關鍵都包括在內，至大量的次要的事件，則不包含在目前綱領中。要立刻做而且同時做的，是銀行制

度的社會化；推行國家投資政策及國家經濟發展的機關之創設；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阻止『金鎊逃避』和制止金融恐慌之方策的制定。若把社會改良的應急方策及特種生產工業之國有化兩者來與這個方法比較，那末這兩者仍為當務之急；因為要使經濟制度進行無阻，或使經濟制度隨時發生紊亂，其權力都操在銀行或金融機構手中。若努力於其他社會主義方策的制定，而讓這個機構保留在資本家手中，那頗足以致社會主義的死亡；所以社會主義者當掌握政權之始，就必得把這種機構拿到手中，然後再把它當作一個工具，使經濟制度的每個部門，都向着社會主義方面轉動。假使社會主義對於英國經濟問題是一個正確的解決，那末，最緊急的工作，就是要在適才所描述的方案的範圍內，把社會主義的綱領與目標作一個明瞭的規劃。

美國的前途

假定我們在研究中的那個男人或女人，不是大英國國民，而是美國國民。他或她若相信世界最大的利益是在一切國家中極迅速的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那他或她將怎麼做法呢？我們講過，美國對社會主義政策的直接採取，不是在實際政

治的範圍之內。若是一個國家第一沒有一個有效的緊密團結的有紀律的黨，沒有一個對社會主義了解得透澈的團體，沒有一個在國內足以使其主義號召發生有力作用的廣大羣衆，這個國家就不能有社會主義。那末，美國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就顯然是創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主義政黨。但是任何這樣的政黨，不能夠完全抄襲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亦不能只是歐洲社會主義各種理論的學舌；因為它必得要按照美國的不同經濟情形，而規劃出它自己的社會主義。我不能冒充我能規劃出美國的社會主義，就連開一個頭也不行；因為，這是很清楚的，這個工作只有由美國人自己來做，而且一直到現在，在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及急進黨派的政治活動中，已有了過多的歐羅巴主義。而且，世界的不況，給了美國一個從來沒有的好機會，使他們很成功的提出他們自己的社會主義。爲什麼在過去美國很少積極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呢，其主要的原由，是由於美國資本主義整個的進行得太順利了，並且她有太多的未開發的資源，由她處置，所以她那裏不能使急進的經濟變革成爲實際政策。美國社會主義的日子也許還沒有到；但照過去幾年的事實看來，社會主義之來

也許較之多數美國人現在所能想像的要近多了。

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

在本章與前章，我似乎對於社會主義的政策，用了太多的國家的辭句去說明，而對於資本主義改造所提出的方案，在本質上却幾乎全是國際的。要解釋這一點很簡單。除俄國以外，各國都有它自己的國家性的資本主義體系；假若資本主義要繼續的話，在各國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內部變革雖然要緊，但那些相信資本主義有恢復可能的人的主要工作，却是要去糾正國際的不調協與組織缺乏所導來的結果。若資本主義是要在整個世界內圖改造，那它必得在一個世界的基礎上改造，而且主要的是用國際範圍的方案來改造。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在政策上與計劃上，不管根本有怎樣國際性，但它主要還是要在每個國家裏面建設起來，因為只有各國或够數的國家成了社會主義，然後國際社會主義的創立才成爲可能。社會主義在方策上不能不是國家的，雖然在目的上，它主要是國際的。自然，一起首，它就得努力在可能的極廣泛的範圍內，以類似的國際方策，去補足國家的計劃與經濟發展的方策。國際計劃與國家計劃有必然的交互關係，且

必得基於社會主義國家間之極廣泛的貨物的有組織的交易。商品輸出輸入之社會統制的建立，其目的並不是減少經過國際貿易之貨物的數量，而寧可說是在剩餘貨品之有組織的交換基礎上，促進諸國家間之廣大的經濟合作。社會主義與自由貿易的舊義是不相符合的；因為當批發買賣活動是由國家與團體進行，而不是由個人進行時，自由貿易就喪失它的意義了。但自由貿易在另一意義上，是從全球的各地域內的各種生產能力中，從全世界人民的各種部門各種技巧中，取得最大的利益，那是社會主義計劃中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世界只有在國家經濟計劃的基礎上，才能有國際經濟計劃；因為國家計劃是要由國際機關來予以調整的。每一國的國家計劃，必得參照其他各國的國家計劃而澈底的修正；將來必得有一個強有力的機關，把計劃的基礎由一個國家的區域，擴張到可以包括全世界的商品的相互交換。但國家計劃必然是演進程序中的第一步；而社會主義者的第一個責任，是取得政權，並有效的運用政權，以改造他們自己國家裏面的經濟生活。在實際，社會主義不像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一樣，它的目的在超越所有國家的疆域，而把全世界聯結

起來，這聯結，也許不是聯成一個單獨的國家，而是密切協作的諸羣體的聯邦，各各服從它自己的有相當限制的主權。未來最大的任務之一，是建立一個可以通行無阻的世界政府的機構，那不是建設在獨立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沒有絕對國家疆域的世界合作的基礎上。

世界統一之路 包含有很廣大的領域，包含有各種文化各種民族之蘇聯人民的蘇俄政治制度，那已經表現是一個超國家疆域的聯邦同盟的努力。我曾經說過，蘇聯的最高政府，是由一個一千五百人以上的代表大會授予權能的，這些代表是來自蘇維埃統治下的各區域。蘇俄聯邦的代表區，必得公開給一切的區域（不管它是構成戰前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與否），這是在蘇維埃憲法中明白規定了的。西歐人對於這種制度，很容易這樣批評，以為這樣大的一個代表會，集議於這樣短的一個時間，實沒有多大的意義；至對於蘇俄代表大會之選舉執行委員，他們亦會看為沒有民主精神。因為在那些習於議會制度的國家，早有反對間接選舉的很強的偏見。但是，假若世界要想演出一個超國界的聯邦政

府，到底僅是構成像現在國聯一樣的各國政府的同盟呢？還是努力去創造一種直接由各國民產生出來的民主會議呢？這兩者之間是很難選擇的。每種組織都有弱點。各國政府的同盟，不能破除國界，從而會固着於各個單獨國家主權觀念；而人民直接代表的代表大會，爲了要去代表，所以必需大得不能當作一個政府的工具去支配與運用——因此爲了要便於實行計，必得從它們的行列中，選出一些較小的團體，將大部的權力交給它。可是，這第二種形態的政府，較之第一種形態還更有它的長處，因爲假若世界將來生活在和平與統一——儘管其實現途中諸多困難——環境中，它必得發展國際組織的形式，而這形式必需比之僅由很多國家的代表集在一起要密切得多。那必得要有些團體代表世界統一的觀念，以反對每個特殊政府的國家分離主義；並且任何在更廣大範圍內作議會民主制度再生的企圖，都非失敗不可。

我並非提議要世界從國家主權的概念一躍而到世界統一的社會，由各國產生的代表會議來統治。在這兩者的推移中，或許會有一個中間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或有國際機關

產生，這機關不包括全世界，而是包括一羣一羣的國家——例如全歐或大部分歐洲的聯邦。假使歐洲聯邦是有她自己的獨立性，而超越國家的差異，那末，她對於加入聯邦的各國政府，必處於最高的地位，那是頗關重要的；而且，將來國際組織的問題，也會使這種形態的超國家組織在實際能行得通。國際組織的後面，若無國際的有組織的公意，在一個擴展到加入聯邦諸國的和團體裏面具體表現出有效的力量，她決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假若世界的前途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那就等於說是，社會主義運動必得發展一個更密切的團體，與更有紀律的國際組織，而其基礎，則是更廣的理想社會與政策。但這不是說社會主義將失去國家性質，成爲一個無國家差異的世界運動的組織；而是說，假使社會主義要爲世界創造正當的國際形態，和正當的國家組織，那它本身的組織方式，就必須在國際範圍上，使國際管理機關賦有實體與黏固力，這是世界唯一的需要。

我們當前的選擇

對於本書的收束，我不用教條式的提出世界所必循之路，而只是提出一串問題。我們當前有兩個途徑——改造的資本主義或投入社會主義試驗的不

可知之海。每一個途徑各有其自己的嚴重的困難。資本主義的改造所要求於各國政府的和各國資本主義團體的，是比過去更透澈得多的思考力，是比過去加倍敏捷與一致的行動。它至少要求資本主義機構本身的激烈的變更；要求以大量集體化的成分，注入於生產體系；以更大的平等，注入於分配體系。若資本主義要取得復活的機會（至少就西歐說），這些變革必得執行得很快而且普遍。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建立，對於人類的機敏與勇氣，要求得更大；但同時它以訴之於人心中一種強有力的動機為保證（這種動機因為資本主義沒有用它而生了鏽了），所以它貢獻更大的希望。世界必得在這兩條路之間決定它的去向；其決心越快越好。若主張兩面都嘗試嘗試，而動搖於兩者之間，其結果一定不幸。世界對於過去幾年間的問題所表現的弱點，大部分是這種沒有定見的結果；因為人們若沒有決定打算做什麼，他們是不能有效的行動的。世界必得選定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然後把它指揮之下的每一分努力，都放在增進其所決心追尋的目的的勝利上。我自己的選擇是社會主義；因為我相信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終了它的任務，在發展人類所支配的生產

力上，它的力量與作用已經消失了。自然，我希望別人所想的亦和我所想的不一樣，並勇敢的努力求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但是我很知道對於實現社會主義之無全盤計劃的努力，其結果不僅無用，而且過之，因為這樣只是破壞資本主義，而不以任何積極的東西去代替它。假使我們要社會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那我們就必須決心為社會主義奮鬥，盡我們所有的心，盡我們所有的力，當到人們對於什麼是他們所要的下了決心，而為了他們的目的之實現而一致行動時，他們是具有那種心與力的。

附錄

史太林與威爾士談話記

威爾士：很感謝你允許和我會面，史大林先生。我最近到過美國。我和羅斯福總統曾有一個長時間的會談，想確知他的主要理想是什麼。現在到你這裏來，請問你在做些什麼轉變世界的工作。

史太林：並不怎麼多。

威爾士：我是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在周遊世界，同時，像一個普通人一樣觀察我周圍正在進行的事情。

史太林：重要的名人像你一樣不能說是『普通人』。自然，只有歷史才能說明這個名人或那個名人是重要；總而言之，你不能當作一個平常人去觀察世界。

威爾士：我不是故意謙遜。我的意思是說，我要以一個普通人的眼睛去看世界，不像一個有黨派的政客或負責任的行政官吏一樣。我的美國之遊使我精神興奮。在那裏舊的金融世界正在潰落，他們的經濟生活正按着新的路線改造。列寧說：『我們要學習事務，從資產階級學習』。現在，資產階級不得不從你們學習去把握社會主義的精神了。我覺得美國所進行的是徹底的改造，就是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創造。你與羅斯福從兩個不同的立脚點出發。但是，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在理想上沒有一點關係嗎？沒有理想與需要的聯鎖嗎？我在這裏所見的正在進行着的東西，在華盛頓也同樣看見；他們在建築公務所，他們在創設很多國家管理團體，他們在組織久已需要的行政服務機關。他們需要指導人材，也和你們一樣。

史太林：美國所追求的目的，和我們在蘇聯所追求的不同。美國所追求的目的是起於經濟的紊亂，經濟的危機。美國人想在私有資本主義活動的基礎上從危機中救出他們自己，不想變革經濟基礎。他們想把現存經濟制度所引起的危難與損失減低到最小限度。

你是知道的，在這裏，一個完全不同的，一個新的經濟基礎是被創造起來了，代替了舊的已毀棄的經濟基礎。即使如你所說的，美國部分地達到他們的目的，就是說，使損失減低到最小限度，但是他們不會撤毀無政府的根基，這根基是從現存資本主義制度中承襲來的。他們正保存着這經濟制度，她不可避免，並且不能不引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此，她決不會是社會的改造，決不會撤毀產生無政府狀態與危機的舊社會制度，至多不過使其不良現象受若干限制，使其過剩受若干限制那麼回事而已。也許，這些美國人主觀地想改造社會，但他們客觀地是在保存現社會的基礎。這就說明了那不是社會改造的客觀原因。

那也不是計劃經濟。什麼是計劃經濟？什麼是計劃經濟的特質呢？計劃經濟是努力於失業的消滅。讓我們假定，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使失業減到一定的最低限度是可能的。但無疑的，沒有資本家會同意於失業的完全消滅，失業後備軍的完全消滅；其目的是在壓迫勞動市場，保證廉價勞動的供給。在這裏，你可以看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所謂計劃經濟中的一個漏洞。復次，計劃經濟是就民衆特別需要的貨品，而預先籌劃增加在生產這些

貨品的工業部門的產品。但是，你知道，在資本主義下生產的膨脹是由於完全不同的動機，資本是流入於利潤最高的經濟部門。你決不能強制資本家自甘損失，同意於爲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而取較低的利潤。資本家沒有消滅，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要素沒有撤廢，要創造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

威爾士：我大都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很想側重這一點，假使一個國家完全採用計劃經濟的原則，假使一個政府，逐漸的，一步一步的，堅定地去實施這個原則，金融的寡頭終於是要撤廢的，並且「社會主義」依盎格羅撒克遜的字義來說，終於會要實現的。羅斯福「復興計劃」(New Deal)理想的效果是很有力的，在我看來，那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我覺得，與其增加兩個世界的敵意，不如努力在現在的世界中爲一切積極的力量建立一種公論。

史太林：談到一面保留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而要實現計劃經濟的原則是不可能，我一點也不願輕視羅斯福的特出的人格，其發動，其勇氣及其決心無疑地，羅斯福在當代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切船長中是最強的人物之一。所以，我願意重新着重這一點，我所深信

的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之下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決非置疑於羅斯福總統的個人的能力、才氣與勇敢。要是環境不利的話，最有才能的船長也不能達到你所指定的目標。自然，就理論上說，在資本主義環境下逐漸的、一步一步的走向目標，是不會被阻礙的。那目標就是你所謂盜格羅撒克遜字義來說的社會主義。但，這個『社會主義』是什麼呢？充其量，不過把最無限制的資本家利潤的個人代表者，加以某限度以內的限制，而在國民經濟調節的原則的適用上，作若干利益之增加而已。這都是很好的。但當着羅斯福或任何別的領袖在當代資產階級世界中要去執行一些認真地反資本主義基礎的事情，他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慘敗。銀行、工業、大企業、大農莊都不在羅斯福手裏。這一切都是私有財產。鐵路，商業艦隊，這一切都屬於私有的業主。最後，熟練工人軍、司機者、專門技術人材，這些也不是聽命於羅斯福，而聽命於私有業主；一切工作都是為私有業主。我們不能忘記國家在資產階級世界的功用。國家是一個制度，用來組織國土的保衛，組織『秩序』的維持；它是一個徵稅機構。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大管到『經濟』，就經濟的嚴格意義說，經濟不在國家手裏。反之，國家

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手裏。所以，不管他的一切能力與才氣，我怕羅斯福不能達到你所說的目的，假定那真是他的目標。也許，經過若干代的時間多少可達到目標，但是，我個人想來，就這樣也不是很可能的。

威爾士：以經濟來解釋政治，也許我比你相信得更強些。從事於更好的組織，從事於社會的更好的功用，即是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偉力是以現代科學及發明而出現。組織與個人行動的調節變成了機械的必然，不關於社會的理論。假使第一步，由國家管理銀行，接着管理重工業、一般工業、商業等等，這樣一種全部包容的統制和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國有，其結果是相等的。這將是社會主義化的過程。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不像黑與白一樣的相反。他們中間有很多中介的階段。有的個人主義鄰近於劫盜，而有紀律與組織則與社會主義相等。計劃經濟的引進，大部分是依於經濟的組織者，依於熟練技術知識份子，他們可以一步一步的被轉變到社會主義組織的原則。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組織先於社會主義，這是更重要的事實。若無組織，社會主義的理想，只是理想而已。

史太林：沒有，也不會有一個不可調和的對立在個人與集體之間，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這樣的一個對立是不會有的，因為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不但不否認個人利益，並且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聯繫起來。社會主義不能把它自身從個人利益中抽象出來。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最充分地滿足私人利益。還有進於此者，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堅固地保障個人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不可調和的對立在『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但是我們能否認階級間的對立嗎？能否認有產階級、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嗎？在一方面，我們有那擁有銀行、工廠、鑛山、交通、殖民地的壟斷階級，有產階級。這班人除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對利潤的努力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他們不服從集體的意志；他們努力使每一個集體附屬於他們的意志。在另一方面，我們有貧窮階級，被剝削階級，他們既不享有工廠，也沒有工作，也沒有銀行，他們被迫着去售賣他們的勞動力於資本家以維持生活，並且他們沒有滿足他們的起碼需要的機會。這樣一種相反的利益與企圖怎能調和呢？就我所知，羅斯福並沒有找出一條使這些利益調和的道路。並且這是

不可能的，經驗已告訴我們了。再則，你對於美國的情勢知道得比我清楚，因為我從沒有到過那裏，我大部分是從文獻中觀察美國事情。但是我有點為社會主義戰鬥的經驗，這經驗告訴我，如果羅斯福真正努力用資產階級的錢去滿足無產階級的利益，那麼資產階級會以另一個總統充他的位置。資本家會這樣說：總統來，總統去，我們永遠向前走；假若這個總統或那個總統不保護我們的利益，我們另找一個。總統能違反資產階級的意志嗎？

威爾士：我反對把人類作貧與富的簡單化的階級劃分。自然，有一類人是專為利潤而努力的。但這些人，在西方，決不視為那樣可惡，像這裏的人所看的一樣。在西方，不是有許多人，他們並不將利潤看作目的嗎？他們有大量的財富，他們要去投資，從投資獲得收入，但也不是以此為其主要目的。他們視投資為不方便的不得已。不是有大量的有能力而專心的工程師，經濟的組織者，他們的活動是被利潤以外的東西所刺激的嗎？我的意見以為，有很多能幹人他們在現在制度中是不滿足的，並且他決要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盡很大的任務的。在過去幾年之間，在工程師、飛機師、軍事技術家等等廣大的範圍中作有利

於社會主義及世界主義的宣傳，我亦很幹過了一些，並且我亦想過這是很值得幹的。對於這一類人用雙軌階級戰的宣傳是毫無用處的。這些人懂得世界的情形。他們懂得這是一個人混蛋一團糟的世界，但是他們以為你們的單純階級戰的敵愾也是無意義的。

史太林：你反對將人類簡單作貧富的階級劃分。自然，有一個中間階層；有你所說過的技術知識份子，在他們中間有很好很誠實的人，在他們中間也有不誠實的小人，他們中間有各種各色的人。但是，主要地人類是分成富與貧，財產的所有者及被剝削者；要是一個人把他自己從基礎的區分中，從貧與富的敵對中抽象出來，等於把他自己從基本的事實中抽象出來一樣。我不否認有居間的中間的階層的存在，它在這兩個矛盾階級中間，或傾這面，或傾那面，或在鬥爭中取中立或半中立的地位。但是，我再重申一遍，一個人要把他自己從社會的基礎的區分中，從基礎鬥爭中，從兩個主要階級中抽象出來是完全不顧事實的事。這個鬥爭是正在進行着並且還會繼續下去。鬥爭的前途將由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來決定。

威爾士：不是有很多人，他們並不窮，但他們工作，而且爲生產而工作嗎？

史太林：自然，有小地主，有工藝師，有商人；但這些不是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的人，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者是生產社會需要的一切東西的勞動羣衆。

威爾士：但是有各種不同的資本家，有專計較利潤，專想致富的；也有準備犧牲的。舉一個例吧，像老摩根（Old Morgan），他專想賺錢；他是社會的一個寄生蟲，很簡單的；他只想積蓄財富，若舉洛克斐勒（Rockefeller）爲例，他是一個明敏的組織者；他樹立一個運送煤油的組織的規模，這是值得矜式的。或舉福特（Ford）爲例。自然福特是自私的；但是，他不是一個合理化生產的熱情的組織者爲你所取法的嗎？我高興着重這個事實，就是說英語的諸國家對蘇聯的意見最近有重要的變化。這原因所在，主要的是日本的情勢，德國的事變。但是除了國際政治的理由以外，還有別的理由。有一個更深刻的理由，就是基於私有利益的制度正在塌台的事實給很多人認識了。在這樣情形之下，依我看起來，我們不必把兩個世界的敵對放在前線，而要盡可能地努力聯合一切積極的運動，一切積極的力量在一

條戰線上。在我看來，我像是比你更左一點，史太林先生；我覺得，更甚於你所覺得的，舊制度是快要到末路了。

史太林：我說資本家的努力專為利潤，專為致富，並非說那些人都是最無價值的人，此外什麼才力也沒有。在他們中間很多人無疑地具有大組織天才，對於這點，我沒有夢想去否認的。我們蘇維埃的人們從資本主義者那裏學習了很多東西。就像摩爾根，你所特別認為不行的，却無疑地是一個好的、有才能的組織者。但假若你說的是準備改造世界的人，自然你不能在忠心為利潤而服務的那一列人中間去找。我們與他們站在相反的兩極。你提起福特，自然，他是一個有能力的生產的組織者。但是你不知道他對工人階級的態度嗎？你不知道多少工人給他捧出在街頭嗎？資本家和利潤是牢固地釘在一塊，世界上沒有一個力量可以把他和利潤分開。資本主義不會被生產的『組織者』所撤毀，也不會被技術知識份子所撤毀，還只是工人階級。因為上述的階層不能表演獨立的角色，那些工程師，生產的組織者不能照他所愛做的去做，只能照人所命令的去，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為他的

雇主的利息而工作。自然，也有例外，在這個階層裏面有些人從資本主義的麻醉中覺醒了。技術知識份子在某種條件之下可以演奏奇蹟並且大有益於人類，但這也可致巨害。我們蘇維埃的人民毫無技術知識份子的經驗。十月革命以後，技術知識份子的一部分拒絕參加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他們反對這種積極工作，並且爲之怠工。我們盡可能的引致這些技術知識份子來參加這種建設工作；我們試試這個方法，又試試那個。在我們鍛鍊出來的知識份子自動地願意協助新組織以前，經過了一個不短的時期。現在呢，這些技術知識份子的最好部分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築者們的前列了。有了這個經驗，所以我們對於技術知識份子的優面與劣面都不會作過低的估量，並且我們知道在一方面他們可以爲害，在另一方面，他們可以演奏『奇蹟』。自然，要一下子就把技術知識份子從資本主義世界在精神上拉開，即或是可能，也就大困難了。但這是烏托邦。技術知識份子敢於從資產階級世界分開而去做改造社會的工作的難道有很多嗎？你想這類的人很多嗎？就在英國或法國吧？這樣願意與他們的雇主們破裂走開，而去開始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

此外，要轉變世界是需要有政權的，我們難道能忽視這個事實嗎？在我看來，威爾士先生，你對政權問題估量得過低了，並且在你的概念裏面還全把它掉了。即或他們有一個世界上最好的目的，若不提出奪取政權的問題，若他們自己不能獲得政權，那些人能做什麼呢？充其量，他們能幫助正在掌握政權的階級，但是他們自己不能轉變世界。這祇能由一個將來會取資產階級的地位而代之的階級，並且成爲資產階級的統治主人的一個廣大的階級來幹。這樣的一個階級就是工人階級。自然，技術智識份子的幫助是必得接受的，但是智識份子亦得要受幫助的。但不能以爲技術智識份子可以演一個歷史上的獨立要角。世界的轉變是一個大的、複雜的、痛苦的過程。這個大工作要一個大階級來擔任。大船才能走長海程。

威爾士：對了，爲了長海程少不了一個船長和一個航海家呀。

史太林：這是對的，但長海程的第一個不可少的是一個大船。沒有船，航海家是什麼呢？一個遊惰者。

威爾士：這個大船是人類，不是一個階級。

史太林：你，威爾士先生，很明白的是從一個人性皆善的假定出發。我無論如何，不能忽略有很多小人。我不相信資產階級的善。

威爾士：我記得幾十年前技術智識份子的情形。那時候技術智識份子數量是很少的，但要做的事却很多，所以每個技術的與有智識的工程師，都能找得工作機會。這是技術智識份子所以為極少革命意識的階級的原因。現在，智識份子是過多了，並且他們的心理也很激變。這些技術熟練的人，他們從前從不聽革命的談論，現在却很有興趣了。最近我在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我們英國的最大科學會晚宴，主席的講演是關於社會計劃與科學統制的講演。現在，皇家學會的領導人把握了革命的觀點，並且堅持人類社會的科學組織。你們的階級戰的宣傳沒有跟着這些事實前進。心理轉變了。

史太林：是的，我知道，這是給事實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現在走到了絕路 (cul de sac)。資本家們正在找，但不可能找，一條絕路中的出路，以適合這階級的尊貴，與這階級的

利益。我們要找出一條路不基本地妨害資本主義的利益，只能在一定限度內，用手和膝爬出危機，決不能找一個他們可以昂着頭大步踏出去的通道。這自然爲技術智識份子所普遍承認的。智識份子中大部分人開始認識他們的利益的社會和那些能指出絕路中的出路。的階級是一致的。

威爾士：你們是知道革命的實際方面的一些事情的，史太林先生。羣衆是起來過嗎？一切革命是由少數人幹起來的這不是一個堅確的真理嗎？

史太林：革命的發動，一個領導革命的少數是必需的；但至少得靠成千累萬的民衆的支持，即使是消極的支持也成，不然，就是最有才幹的，最專心的，最有魄力的少數人也無能爲力。

威爾士：至少是消極的支持，也許是潛意識的吧？

史太林：也有一部分是半本能與半意識的，但是沒有成千成萬的羣衆的支持，最好的少數人也是無用的。

威爾士：我觀察共產黨在西方的宣傳，覺得在現在的環境裏面，這種宣傳太舊式了，因為這是造反式的宣傳。在直接反對暴政的時候，這種以暴力顛覆舊社會制度的宣傳是很多的。但在現在環境之下，這制度反正是崩潰中，重力應當加在效率上、能力上、生產力上，而不應在叛亂上。我覺得叛亂的調子是過時了。共產黨在西方的宣傳對於積極心理的人民是徒然滋擾的。

史太林：自然舊制度是正在塌台了，窳敗了。那是真的。但這也是真的，爲了保護、救濟這個在死亡中的制度，使用了別的方式，各種的手段在作新的努力。你從正確的假設得出錯誤的結論。你正確地說明舊世界在塌台了。但你以爲它的塌台是它的自動，却是錯了。不，社會制度的交替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這不是一個自然生長的過程，這是一個鬥爭；這是與階級衝突的過程相關聯的。資本主義是正在衰朽了，但不能簡單地把它比作一個衰朽的樹，衰朽到某種程度會自然倒在地上。不，革命、社會制度的交替是一個鬥爭，一個痛苦與殘酷的鬥爭，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每一個時代，新世界的人民拿到政權，必得

爲了保衛他們自己，以力量來反對舊世界作恢復舊制度的企圖。新世界的人民常常要提防，常常要準備去抵抗舊世界對新制度的攻擊。

不錯，當你說舊社會制度正在塌台，你是對的；但它不是自動的塌台。即舉法西斯主義爲例，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反動勢力，它是試用暴力來保存舊世界的。你對法西斯怎樣辦呢？和他們辯爭？去說服他們？但是這對他們是全無影響的。共產主義者一點也沒有把暴力的方式理想化。但是他們，共產主義者們，並不想做驚人的事，他們決不以爲舊世界會自願的退出舞台，他們知道舊制度在拚命保障自己，所以共產主義者對工人階級說：以暴力答覆暴力；盡你的力量阻止舊的在死亡中的制度來粉碎你，不讓它給你加上手銬，在你將要用來顛覆舊制度的手上加上手銬。如你所知道的一樣，共產黨並不簡單地把社會制度的交替視爲一個自然的和平的過程，而視爲一個複雜的，長期的，而激烈的過程。共產黨人是不忽視事實的。

威爾士：但是你看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情形。其塌台不是一個簡單事情，它是反

動暴力的一个騷亂，這反動暴力已經墮落到流氓主義了。在我看來，和反動與無知的暴力衝突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可以訴之於法，並且可以轉變視警察為敵人的態度，警察反而會幫助社會主義者作反對反動的爭鬥。我想舊的固執的造反社會主義的行爲是無用的。

史太林：共產主義者奠基於豐富的歷史經驗之上，經驗這樣的教訓他們，衰老的階級決不會自動的退出歷史的舞台。回想十七世紀的英國歷史。不是有許多人說舊社會制度已經衰老了嗎？但是，不需要克倫威爾（Cromwell）以力量去粉碎它嗎？

威爾士：克倫威爾在法的基礎上，在法制的名義上做。

史太林：在憲法的名義上，他訴之於暴力，他砍了王的頭，他解散國會，他拘禁一些人，殺戮一些人。

或以我們的歷史爲例，沙皇制正衰朽了塌台了很久，這不是很顯明的嗎？但是流了多少血才把它推翻了？

十月革命怎樣呢？不是有很多人都知道只有我們布爾塞維克們，指導僅有的正確的

出路嗎？俄國資本主義已衰朽了，不是很清楚的嗎？但是你曉得抵抗力是多大，爲了在一切內外的敵人環攻中來保障十月革命流了多少血！

或舉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爲例。一七八九年以前很久，王權與封建制度是如何的腐化，這是許多人都很清楚的。但是一個普遍的叛亂，階級間的惡鬥是不可避免。爲什麼？因爲必需退出歷史舞台的階級，不是開始就能相信其任務已經終了了。要使其相信是不可能的，他們以爲這舊制度的破房子是可以改良的，以爲這舊制度的將傾的大廈是可補救的。這就是在死亡中的階級所以死抱着不放，並訴之於一切手段以圖挽救其生存，當作統治階級而生存。

威爾士：但是，不是有少數的法律家在法國大革命的前頭嗎？

史太林：我不否認智識份子在革命運動中的任務。難道法國大革命是法律家的革命，不是平民革命嗎？不是發動廣大的羣衆反對封建主義擁護第三階級 Third Estate 而取得勝利的平民革命嗎？是不是那些法國大革命中領袖中的法律家按照舊制度的法律

來行動呢？他們不是引入了新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法律嗎？

歷史的豐富經驗教訓我們一直到現在沒有過一個階級對別一個階級甘願讓步的。世界史上無此先例。共產主義者們從歷史中學習了這一課。共產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的自願走開自然是很歡迎的。但這樣的事情是決無可能的，這是經驗的教訓。這就是共產主義者所以要準備最壞的一着，要喚起工人階級準備戰鬥的原因，誰願意要一個鬆懈他自己的軍隊的防警，不了解敵人不會投降，而自致於潰敗的那樣一個將軍呢？去做這樣一個將軍是欺騙工人階級，出賣工人階級。所以我想在你認為舊式的，實際上是為工人階級革命的上策。

威爾士：我不否認力量是要利用的，不過我想鬥爭的方式應當盡可能的接近現存法律所給與的機會，這些現存法律要以防衛反動的打擊的。對舊制度的破壞是不需要的，因為它自己已經解體了。所以在我看來，反叛舊秩序，反叛舊法律是已經陳舊的方式。為了使真理表現得更透切一些，我偶然誇張一點。我可歸結我的論點如下：第一，我愛護秩序；第

二，我打擊現存制度，在它不能保證秩序的範圍以內；第三，我想階級戰的宣傳可以從社會主義分開，不必對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受過教育的人民作這種宣傳。

史太林：爲了要達到一個大目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目的，必得要一個大力量，一個城堡，一個革命的階級。其次，爲了這個主要力量，必得組織一個助力作幫助；這助力就是黨，最好的智識份子的力量歸屬於它。你剛才說到『受過教育的人民』。但在你的心裏的有教育的人是那一類呢？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與在十月革命時代的俄國，不是有很多受過教育的人民站在舊制度一邊嗎？舊制度有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民爲他們服務，他們保障舊制度，反對新制度。教育是一種武器，其效力是憑着它在誰的手裏運用而決定，是視應被打倒的那些人來決定。自然，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需要高等教育的人民。這是很清楚的，蠢人不能幫助無產階級去爲社會主義鬥爭，去建造新社會。我對智識份子並不估量過低；反之，我還加重它。總之，問題是我們所討論的那種智識份子因爲智識份子中有不同的種類。

威爾士：沒有教育制度的澈底變革，就沒有革命。舉兩個例就够證明了——以德意志共和國爲例，她是沒有動搖舊教育制度的，所以不得變爲一個共和國；又舉英國工黨爲例，它對於堅持教育系統的激烈的變革缺乏決心。

史太林：那是很對的觀察。

現在，讓我答覆你的三點。第一，革命的主要事情是社會壁壘的存在。革命的壁壘是工人階級。

其次，一個助力是必要的，這，共產主義者們叫做一個黨。屬於黨的有智識的工人及那些技術智識份子，是密切地與工人階級關聯着。智識份子只有和工人階級聯在一起才能強而有力。若他反對工人階級，他們就無足輕重了。

第三，當作變革的槓杆的政權是必要的。新政權創造新法律，新秩序，那就是革命秩序。我不堅持任務制度，我只堅持合乎工人階級利益的制度。但是，若舊制度的任何法律可以利用於爲新制度鬥爭的利益，這樣的舊法律是應當利用的。我不能反對你這個假定：

現在制度到不能保證人民的必要的秩序時是必得要攻擊的。

最後，若你想共產主義者們酷愛暴力，那你就錯了。他們定會很高興地取銷暴力方式，若統治階級願意退讓給工人階級的話。但是歷史的經驗反對這個假設。

威爾士：却是英國的歷史上一個階級自願把政權讓給別一個階級的一個事實。十八世紀末，貴族的影響還很大，它在一八三〇及一八七〇年之間，自願地，沒有激烈的鬥爭，以政權投降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那時很熱情地支持君主。這政權之轉移終於引到金融寡頭統治之建立。

史太林：你無意中把革命的問題轉到改良的問題了，這不是同樣的事。你不曾想到基督教運動在英國十九世紀的改良上盡了很大的任務嗎？

威爾士：基督徒成就很少，並且沒有留下什麼軌跡就消失了。

史太林：我不同意你。基督教徒及其所組織的罷工運動，盡過很大的任務；他們逼迫着統治階級，使它應允許許多事情，好像關於選舉權之允許，關於所謂「腐化市邑」(Votter

boroughs)之廢除，以及關於『大憲章』(Charter)中之若干點之允許等。基督教所盡的歷史任務不爲不重要，並且逼迫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去作某種的允許，改良，以避免大的衝突。一般說來，我們應當這樣講，英國的統治諸階級，無論是貴族與資產階級，在一切統治階級中，從他們的階級利益的觀點，從撐持政權的觀點看來，是最聰明最有彈性的了。從現代史舉一個例——一九二六年英國的同盟罷工。別的資產階級當着這樣的事變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必定是拘捕工會的領袖，當工會總會命令罷工的時候。不列顛的資產階級却不這樣做，它很聰明地根據它自己的利益來行動。我想美國、德國、法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採用這樣一個有彈性的戰略。爲了支持統治，大不列顛從未堅持不給小惠，及小的改良。但如果以爲改良就是革命那就錯了。

威爾士：你對於我國的統治階級的意見較之我更爲高明。但一個小的革命與一個大的改良有多大的分別嗎？改良不算是一個小的革命嗎？

史太林：爲了從下面來的壓迫，羣衆的壓迫，資產階級有時允許某部分的改良，但仍

在現存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他們之所以爲此，因爲是他們估計爲了保存它的階級統治，這些小惠是必要的。這是改良的要義。至於革命是從一階級到另一階級的政權的轉移，這就是不能以任何改良認爲革命的理由。所以我們不能期望藉統治階級讓步，藉改良手段使社會制度的變革，當作一社會制度到另一社會制度的暗中轉換。

威爾士：我很感謝你這個談話，這談話對於我有很大的意義。你對我所解釋的那些事，你或者回想着你從前在革命前的非法範圍中所曾經解釋的社會主義的基礎。現在在世界上，只有兩個人，他的意見，他的每一個字，成千成萬的人在聽着，——你和羅斯福。別的人儘可愛說多少就說多少，但他們所說的不會刊布流傳或引起注意。我昨天才到的。但我業已看見那些健康的男人與女人的快活面孔，並且我知道一些這裏所成就的重要的事業，與一九二〇年比較起來是驚人的。

史太林：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們從前更聰明一點，所成就的應當更多些。

威爾士：不，假使人類是更聰明些的話，五年計劃的發明對於人類腦筋的改造是一

件很好的事情。因為關於人類腦筋的改造缺少很多東西，需要一個完善的社會秩序。

史太林：你不願為蘇維埃作家聯合會代表大會住些時嗎？

威爾士：不幸我還有各種要完成的期約，我只能在蘇聯留一個禮拜。我是來看你的，並且我對於我們的談話非常滿意。我如果能遇見一些蘇維埃作家，我很想同他們討論加入筆會（P. E. N. Club）的可能的事。這是作家的一個國際組織，由高爾斯華梭（Galsworthy）创建的；他死之後，我做主席。這組織還薄弱，但在很多國家有支部，最重要的是會員們的談話在刊物上刊布得很廣。它堅持這一點，意見的自由發表——即使是反對意見。我希望和高爾基（Gorky）討論這一點。我不知道你爲了這個是不是準備了很多的自由……

史太林：我們布爾塞維克們叫做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在蘇聯應用得很廣

譯自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八卷一九二二期，一九三四，十一，十五，於倫敦。譯者注：此文後來在國際

通信登出，並注明經過史太林威爾士二氏之親自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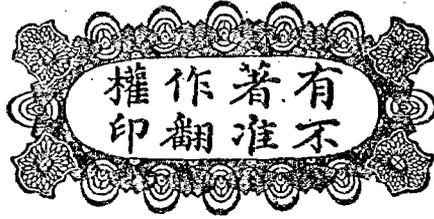
（終）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發行

現代經濟叢書 世界經濟機構總體系 (全二册)

上海實售中儲券二百零四元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G. D. H. Cole

譯者

王搏 王漁 今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1111111)

55
101068

1058

原價 G. Y.
廉價 G. Y.

標商冊註

